

第9典 宗教与民俗
第10典 中外文化交流
第1典 历史文化沿革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2 典

【地域文化】

第3典 民族文化
第4典 制度文化
第5典 教化与礼仪
第6典 学术
第7典 科学技术
第8典 文艺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原文化志

单远慕 撰

中华文化
通志

第 2

【地域文化】

中原
文化志

◎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K203
Z669
:2(2)

中华文化通志·地域文化典 (2-012)

宁可 主编

中原文化志

单远慕 撰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深圳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70毫米 32开

字数 410,000

印张 16.875

插页 1

版次 1998年10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7-208-02265-8/K·484

141550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萧 克

编 委 李学勤 宁 可 王 尧 刘泽华
孙长江 庞 朴 陈美东 刘梦溪
汤一介 姜义华 陈 昕 朱金元
张国琦

办公室主任 张国琦

办公室副主任 王科元

策 划 姜义华 张国琦

76/10/10

141550

中原文化志

作者简介

单远慕,1939年生。196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现为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古都开封的故事》、《诗仙李白》、《宋代的花石纲》等。发表论文近百篇。

总序

中华文化绵延了五千年的历史，起伏跌宕；哺育着差不多五分之一人类的身心，灿烂辉煌。它坦诚似天，虚怀若谷，在漫长的岁月里，广袤的土地上，有过无私奉献四面传播的光荣，也有过诚心求教八方接纳的盛事。它以直，健以稳，文而质，博而精，大而弥德，久而弥新，昂然挺立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勿论东西，不分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土壤和空气，都有它自己的载体和灵性，当然也就都有它自己的长处和短处，稚气和老练。准乎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天赋权利，以及尊重异质文化同等权利的人间义务。每一民族都需要学习其他文化的各种优点，来推动自身发展；都应该发扬自身文化的一切优点，来保证自己的存在，缔造人类的文明乐园。

现在，当二十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之际，为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中华民族正在重新检视自己，以便在新的世界历史发展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地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百

卷本《中华文化通志》，便是我们为此而向新世纪的中国和世界做出的奉献。

《中华文化通志》全书共十典百志。

唐人杜佑著《通典》，罗列古今经邦致用的学问，分为八大门类，“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务求做到“语备而理尽，例明而事中，举而措之，如指诸掌”。《通典》的这一编纂方法，为我们所借用。《中华文化通志》分为十典：历代文化沿革典、地域文化典、民族文化典、制度文化典、教化与礼仪典、学术典、科学技术典、艺文典、宗教与民俗典、中外文化交流典。每“典”十“志”。历代文化沿革典十志，按时序排列。地域文化典十志，主要叙述汉民族聚居区域的地域文化，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排列。民族文化典十志，基本上按语系分类排列。中外文化交流典十志，按中国与周边及世界各大区域交往分区排列。其余各典所属各志，俱按内容排列。

宋人郑樵《通志·总序》有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志者，宪章之所系。”指的是，史书的编纂关系到发掘历史鉴戒之所在，所以，编纂者不能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而应在驰骋于遗文故册时，“运以别识心裁”，求其“义意所归”，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

本书以典、志命名，正是承续这样的体例和精神。唯本书为文化通志，所述自然是文化方面诸事，其编撰特色，可以概括为“类”与“通”二字。

“类”者立类。全书十典，各为中华文化一大门类；每典十志，各为大门类下的一个方面；每志中的“编”“章”“节”“目”，亦或各成其类。如此依事立类，层层分疏，既以求其纲目分明，论述精细，也便于得门而入，由道以行，俾著者、读者都能于浩瀚的中华文化海洋里，探骊得珠，自在悠游。

“通”者贯通。书中所述文化各端，于以类相从时，复举其始终，察其源流，明其因革，论其古今。盖一事之立，无不由几及显，自微至著，就是说，有它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弄清楚了一事物一制度一观念的演变轨迹，也就多少掌握到了它内在本质，摸索到了它的未来趋势。

“通”者汇通。文化诸事，无论其为物质形态的，制度形态的，还是观念形态的，都非孤立存在。物质的往往决定观念的，观念的又常左右物质的；而介乎二者之间的制度，固受制于物质与观念，却又不时反戈一击，君临天下，使制之者大受其制。其内部的诸次形态之间，也互相渗透，左右连手，使整个文化呈现出一派斑斓缤纷的色彩。中华文化是境内古今各民族文化交融激荡的硕果；境外许多不同种的文化，也在其中精芜杂存，若现若隐。因此，描绘中华文化，于贯通的同时，还得顾及如此种种交汇的事实，爬梳剔理，还它一个庐山真面目。此之谓“汇通”。

“通”者会通。“会”字，原义为器皿的盖子，引申为密合；现在所说的“体会”、“领会”、“会心”、“心领神会”等，皆由此得义。《中华文化通志》所求之通，通过作者对中华文化的领悟，与中华民族心灵相体认，与中华文化精神相契合。

这就是《中华文化通志》依以架构旨趣之所在。是耶非耶，知我罪我，恭候于海内外大方之家。

《中华文化通志》由萧克将军创意于1990年。1991年先后两次在广泛范围内进行了论证。1992年组成编纂委员会。十典主编一致请求萧克将军担任编委会主任委员，主持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1993年1月和1994年2月，全体作者先后齐集北京、广东花都市，研究全书宗旨，商定典志体例，切磋学术心得，讨论写作提纲。事前事后，编委会更多次就全书的内容与形式、质量与速度、整体与部分、分工与协作等问题，进行研讨。近二百位作者进行了创造性构思和奋斗式劳作。这项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以及各界人士的热情支持。编委会办公室承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本书出版任务，并组织了高水准高效率的编辑、审读、校对队伍，使百卷本《中华文化通志》得以现今面貌奉献于世人面前。我们参与这一工作的全体成员带着兴奋而又惶恐的心情，希望它能给祖国精神文明建设大业增添些光彩，更期待着读者对它的不当和不足之处给予指正。

《中华文化通志》编委会

内容提要

中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早在五十万年前,中原就有人类居住。八千年前,中原人已过农耕定居生活。中国最初的两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夏朝和商朝都是在中原建立的。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经历了 30 多个王朝,其中在中原建都的就有 20 个。

在中国地域文化中,中原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产生过许多文化名人和文化成果,如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诗人杜甫、文学家韩愈、画家吴道子、乐律学家朱载堉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流人物。先秦诸子大多是中原人,或长期在中原生活。八卦学说、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都产生于中原。《老子》、《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南史》、《北史》、《旧五代史》、《新唐书》列传部分、《说文解字》等都是中原人的著作。

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中原文化长期起着骨干作用。它有强大的吸收力和融合力,又有强大的传播力和辐射作用,对中国东北、西南、江南、岭南、闽台、西北等地和邻近国家,都有巨大影响。

在中原地区,保留到今天的文化遗物特别多。已发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千处,古城遗址 150 余处。国务院公布保护的历史文化名

城,中原就有洛阳、开封、南阳、商丘、郑州、浚县七座。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代、北宋等朝的帝王陵寝绝大多数皆在中原。还有许多著名寺院、祠庙、宫观和大量碑刻。

本志在对中原地区数千年来人们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原文化发展的全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概括和总结。第一章集中记述产生中原文化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影响中原文化兴衰的因素和中原文化的主要特征。其他各章分别记述中原地区在思想(主要是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宋元以来哲学)、学术(史学、经学、文字学、目录学、法学)、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科技(天文学、医药学、农学、植物学、地学、数学、水利、陶瓷、冶金、采矿)、文学(诗歌、散文、赋、词、小说、剧本)、美术(绘画、书法、雕塑、工艺美术)、表演艺术(音乐、舞蹈、戏曲、曲艺)、建筑(都城、园林、古塔、桥梁、陵墓、民居)、教育(官学、私学、书院)、体育(足球、马球、骑射、相扑、围棋、田径、武术、水上运动、节令体育、养生术)、民俗(婚姻、生育、丧葬、节日、交往、禁忌)、语言(方言土语、谚语、歇后语、谜语)、行旅(道路、行路方式和习惯、旅店、运输)等方面丰富多采的文化内容。通过简洁的文字,以横分竖写的志体形式,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原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领域的基本面貌。

《中华文化通志》编辑出版人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总 决 审	陈 昕				
总 顾 问	余志明				
总 监 制	郁椿德				
编辑部主任	朱金元				
编辑部副主任	虞信棠				
责 任 编 辑	王有为	王界云	孔令琴	叶亚廉	朱子恩
	朱金元	汤中仁	苏贻鸣	杨承紘	李 卫
	李文俊	李远涛	吴书勇	宋慧曾	张 玟
	张 臻	张美娣	陆凤章	胡小静	郝盛潮
	秦建洲	顾兆敏	夏绍裘	唐继无	曹文娟
	曹培雷	屠玮涓	虞信棠		
责 任 决 审	王有为	王树鸣	王界云	宋 存	严忠树
	吴慈生	张 玟	张满鸿	周琪生	柳肇瑞
	胡小静	钱雪门	高登瀛	夏国智	黄行发
	魏允和				
装 帧 设 计	吕敬人工作室				
美 术 编 辑	孙宝堂				
监 制	戴 弘				
技 术 编 辑	沈树德	吴 坚	何永康	姜华生	曹伯祥
责 任 校 对	王秀菊	张新宇	陆永洲	陆秉熙	顾伟民
	唐毓华	谈 维	陶雪英	龚养耿	
编 务	朱玉堂	张大潮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	1
第一节 产生中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1
一、中原文化的区域范围.....	1
二、产生中原文化的自然环境.....	2
三、中原文化的地区差异.....	6
第二节 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影响	
中原文化兴衰的几个因素	10
一、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	10
二、影响中原文化兴衰的几个因素	16
第三节 中原文化的主要特点	20
一、发展持续,源远流长	20
二、文化渊藪,地位领先	22
三、领域繁多,异彩纷呈	23
四、骨干作用,影响广泛	25
五、遗迹遍域,文物首屈	29
第二章 中原思想文化	36
第一节 先秦哲学	36

一、中原哲学思想的产生	37
二、诸子哲学	39
第二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哲学	51
一、两汉哲学	51
二、魏晋玄学	55
三、无神论思想家范缜	60
四、韩愈的哲学思想	61
第三节 宋元以来哲学	63
一、宋元理学	63
二、明代的唯物主义哲学	70
三、近现代哲学	74
第三章 中原学术文化	75
第一节 史学	75
一、正史编撰	75
二、断代史研究	80
三、杂史著述	84
第二节 经学	88
一、《周易》研究	88
二、《春秋》研究	91
三、礼学研究	93
四、《论语》研究	96
五、《诗经》研究	97
六、《尚书》研究	99
七、诸经总体研究和版本学贡献	100
第三节 文字学	102
一、贾湖契刻	102

二、殷墟甲骨文·····	102
三、李斯与《仓颉篇》·····	103
四、许慎与《说文解字》·····	103
五、服虔与《通俗文》·····	105
六、江式与文字规范化·····	105
七、郭忠恕与《佩觿》·····	106
八、《集韵》和《类篇》·····	106
第四节 目录学 ·····	107
一、甲骨文与古代目录学的起源·····	107
二、郑默与《魏中经簿》·····	108
三、荀勖与四部分类法·····	108
四、阮孝绪与《七录》·····	109
五、元行冲与《群书四录》·····	110
六、王尧臣等与《崇文总目》·····	110
七、钟嗣成与《录鬼簿》·····	111
第五节 法学 ·····	112
一、应劭与《决事比例》·····	112
二、长孙无忌与《唐律疏议》·····	112
三、郑克与《折狱龟鉴》·····	114
四、郑汝翼与《永徽法经》·····	114
第四章 中原宗教文化 ·····	116
第一节 佛教 ·····	116
一、历史变迁·····	116
二、著名僧人·····	123
三、重要寺院·····	127
第二节 道教 ·····	135

一、历史变迁·····	136
二、著名道士·····	145
三、道教胜地·····	148
第三节 基督教 ·····	152
一、景教·····	152
二、也里可温教·····	153
三、天主教·····	154
四、基督教新教·····	156
第四节 伊斯兰教 ·····	158
一、中原穆斯林的来源·····	158
二、清真寺·····	160
三、教坊制与经堂教育·····	162
第五节 犹太教 ·····	163
一、开封犹太人·····	164
二、开封犹太教·····	166
三、开封犹太人的礼拜寺·····	167
四、犹太碑·····	170
第五章 中原科技 ·····	172
第一节 天文学 ·····	172
一、天象观测·····	172
二、历法·····	178
第二节 医药学 ·····	181
一、医疗学·····	182
二、方剂学·····	186
三、本草学·····	188
四、针灸学·····	189

五、医史·····	190
第三节 农学和植物学 ·····	191
一、农学·····	191
二、植物学·····	199
第四节 地学和数学 ·····	202
一、地学·····	202
二、数学·····	205
第五节 水利技术 ·····	207
一、运河开凿·····	207
二、黄河防治·····	210
三、灌溉工程·····	214
第六节 陶瓷 冶金 采矿 ·····	216
一、陶瓷·····	216
二、冶金·····	221
三、采矿·····	226
第六章 中原文学 ·····	228
第一节 诗歌 ·····	229
一、先秦诗歌·····	229
二、汉魏、西晋诗歌·····	232
三、唐代诗歌·····	236
四、宋元以来诗歌·····	243
第二节 散文 ·····	248
一、先秦散文·····	248
二、秦汉散文·····	252
三、魏晋散文·····	254
四、唐代散文·····	255

五、宋元以来散文·····	258
第三节 赋和词 ·····	260
一、赋·····	260
二、词·····	263
第四节 小说和剧本 ·····	267
一、小说·····	267
二、剧本·····	271
第七章 中原美术 ·····	274
第一节 绘画 ·····	274
一、原始绘画·····	274
二、汉代绘画·····	275
三、唐代绘画·····	284
四、宋代绘画·····	287
五、朱仙镇木板年画·····	296
第二节 书法 ·····	298
一、三国以前书法·····	299
二、魏碑·····	302
三、唐宋以来书法·····	305
第三节 雕塑 ·····	308
一、龙门石窟·····	308
二、巩义石窟寺·····	314
三、陵园石雕·····	318
第四节 工艺美术 ·····	320
一、南阳玉雕·····	321
二、南阳烙花·····	322
三、济源盘砚·····	323

四、开封汴绣·····	323
第八章 中原表演艺术·····	325
第一节 音乐·····	325
一、先秦音乐·····	325
二、汉代音乐·····	328
三、魏晋南北朝音乐·····	330
四、隋唐音乐·····	333
五、宋代音乐·····	335
六、元明以来音乐·····	337
第二节 舞蹈·····	339
一、先秦舞蹈·····	340
二、两汉南北朝舞蹈·····	341
三、唐宋舞蹈·····	343
四、金元以来舞蹈·····	345
第三节 戏曲·····	346
一、概况·····	347
二、丰富的剧种·····	350
三、表演技巧·····	360
四、演唱特色与戏班组成·····	362
第四节 曲艺·····	364
一、概况·····	364
二、主要曲种·····	365
第九章 中原建筑·····	368
第一节 都城建筑·····	368
一、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	369

二、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	373
三、北宋开封城·····	376
第二节 古代园林·····	379
一、从梁园到铜爵园·····	380
二、芳林园、金谷园和北魏佛寺园林·····	382
三、西苑、神都苑和唐代洛阳私人园林·····	385
四、北宋开封园林·····	387
五、北宋洛阳园林·····	389
第三节 古塔、桥梁和陵墓·····	392
一、古塔·····	392
二、桥梁·····	395
三、陵墓·····	398
第四节 中原民居·····	402
一、房屋·····	402
二、窑洞·····	406
第五节 李诫和《营造法式》·····	410
第十章 中原教育·····	416
第一节 官学和私学·····	416
一、官学·····	417
二、私学·····	425
第二节 书院·····	428
一、唐五代书院·····	428
二、宋代书院·····	429
三、元代书院·····	431
四、明代书院·····	432
五、清代书院·····	433

第三节 著名教育家	436
一、伊尹.....	436
二、墨子.....	436
三、贾谊.....	437
四、韩愈.....	438
五、程颢、程颐	439
六、许衡.....	440
七、王廷相.....	441
八、李时灿.....	442
第十一章 中原体育	443
第一节 足球、马球和百戏中的体育内容	443
一、足球.....	443
二、马球.....	445
三、百戏中的体育内容.....	447
第二节 骑射、相扑、围棋与养生术	448
一、骑射.....	448
二、相扑.....	449
三、围棋.....	450
四、养生术.....	451
第三节 田径、水上运动和节令体育	453
一、田径.....	453
二、水上运动.....	454
三、节令体育.....	456
第四节 武术	457
一、少林武术.....	457
二、陈氏太极拳.....	463

第十二章 中原民俗	468
第一节 婚姻习俗	468
一、婚前习俗.....	468
二、结婚习俗.....	470
三、婚后习俗.....	473
四、非正常婚习俗.....	474
第二节 生育习俗	476
第三节 丧葬习俗	480
一、葬前习俗.....	480
二、安葬习俗.....	482
三、葬后习俗.....	484
第四节 节日习俗	485
第五节 交往习俗	490
第六节 赶会习俗	492
一、庙会.....	492
二、集市.....	493
第七节 禁忌	495
一、饮食禁忌.....	495
二、住房禁忌.....	495
三、生产禁忌.....	496
四、人生禁忌.....	496
五、交往禁忌.....	497
六、其他.....	498
第八节 陋俗改革	499
一、缠足.....	499
二、敬神、信鬼.....	499

三、算卦、相面	500
四、看风水	500
第十三章 中原语言文化和行旅文化	501
第一节 语言文化	501
一、方言土语	501
二、谚语	508
三、歇后语	511
四、谜语	512
第二节 行旅文化	513
一、道路	513
二、行路方式	514
三、行路习惯	515
四、旅店	516
五、运输	516
六、通讯	517
后 记	518

第一章 导 言

第一节 产生中原文化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一、中原文化的区域范围

中原一词,在历史上有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

狭义的中原指今天河南省。今天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在古代属于中国的中部平原,所以人们把河南称为中原。《宋史·李纲传》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这里的“西北”是指陕西关中一带,“东南”是指江南,而“中原”就是指河南一带。

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它不仅包括河南,而且包括今天陕西、山西、河北、山东等省的一部分地区。诸葛亮《出师表》说:“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这里的“中原”就是指黄河中下游地区。

在古代,人们所说的中原,以指广义的为多。但近代以来,人们所说的中原,一般都是指狭义的中原,如“挺进中原”、“中原解放区”等,都是专指河南,而不包括其他地区。

本志所说的中原,都是河南的代称。本志所记述的中原文化,是

指狭义的中原文化,即河南文化。广义的中原文化,是指包括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文化。但由于本通志“地域文化典”中的《秦陇文化志》、《燕赵文化志》、《齐鲁文化志》等都已分别对陕西、河北、山东等地的文化作了记述,所以本志所涉及的区域范围,只限于今天的河南省境内。

古代河南虽然曾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域,甚至归不同的政权所统辖,但黄河中下游共同的地理环境,使它形成了共同的文化特征。特别是元朝以来,这里大部分地区都被捏到一起,由一个称作河南江北行省的行政区划所管理,这就进一步加快了中原文化区的形成。今天河南省的名称也就是从这里来的。

与“中原”一词意思差不多的还有“中州”。中州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州指河南,因河南大部分地区在古代属豫州。豫州是中国古代九州之一,位于其他八州中间,如汉代王充《论衡·对作》说:“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北宋王安石《黄河》诗云:“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临川集》卷三三)广义的中州指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三国志·全琮传》说:“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数。”如果将河南文化称之为中州文化也未尝不可。但“中州”一词的使用在历史上远远没有“中原”多,亦难以反映较多的文化内涵。

二、产生中原文化的自然环境

(一) 位 置

河南省的位置处在黄河中游的下段和黄河下游的上段,在今天的中国属于中部偏东。全省约有五分之四地区在黄河以南,五分之一地区在黄河以北。河南省是我国由东部平原向西部丘陵山区的过渡地区,也是我国由南部亚热带向北部暖温带的过渡地区。全省东西距

离约 580 公里,南北距离约 530 公里,总面积 16.7 万平方公里。它北与河北、山西,西与陕西,南与湖北,东与安徽、山东为邻。

唐宋时期,中原地区有大运河贯通。二十世纪以来,有陇海、京广、焦枝铁路交汇,京九铁路亦与陇海铁路相交于河南商丘。在交通上,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联南接北、承东启西的地方。

(二) 地 形

中原地区总的地形是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它的西部和南部主要是丘陵山地,有太行、伏牛、桐柏、大别四大山脉。北部和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统称豫东平原。

中原在地形上可以分为六大块。

1. 豫西北太行山区

豫西北太行山区在山西、河南交界处,北起林州,南到济源。

豫西北太行山区由陡坡中山、低山丘陵、山间盆地三种地形组成。陡坡中山主要在焦作西北部,海拔最高达 1500 米,以石英岩、石灰岩为主。低山丘陵主要在林州和辉县境内,海拔 400—800 米。山间盆地散布在山地和丘陵之间,重要的有林州盆地、临淇盆地等。

豫西北太行山区多峡谷峭壁,总的垦殖面积占 15—30%。

2. 豫西黄土丘陵区

豫西黄土丘陵区主要在郑州以西的黄河南岸。东西成带状,北至黄河,南至嵩山、熊耳山、崤山北麓。

豫西黄土丘陵区的黄土厚度,由西向东逐渐增加。灵宝、陕县黄土厚 20—30 米,巩义、荥阳黄土厚 40 余米。灵宝、陕县、渑池一带,还分布有许多黄土阶地和黄土塬。

豫西黄土丘陵区,大多已经开垦。特别是伊洛河沿岸的黄土丘陵,土地肥沃,适宜农业,是古代河洛文明的发源地。

3. 豫西伏牛山区

豫西伏牛山区是秦岭山脉的东延部分。西到河南、陕西交界处,

东到海拔 200 米等高线的豫东平原,北部包括崤山、熊耳山和嵩山,南到南阳盆地。

豫西伏牛山区由中山、低山丘陵和岩溶低山等地形组成。中山区主要在灵宝、卢氏、栾川境内,海拔高度为 1000—2000 米。灵宝小华山主峰老鸦岔海拔 2414 米,是河南的最高点。中山山脉主要由花岗岩、片麻岩、砂岩等组成。中山之间也有一些小盆地。低山丘陵区主要在登封、南召等地。岩溶低山区主要在淅川等地。

豫西伏牛山区多梯田,农业呈立体状。中山区多用材林,盆地河谷主要种庄稼。

4. 南阳盆地

南阳盆地在河南西南部,位于桐柏山和伏牛山之间。南阳盆地呈扇形,北高南低,向南开口。盆地中部为冲积洪积平原,盆地边缘为洪积岗地平原。

5. 豫南山区

豫南山区指桐柏山和大别山地区。这里是长江和淮河的分水岭,为亚热带向暖温带的过渡地区。

大别山南部为中山,商城金钢台、新县黄毛尖海拔 1500 余米。

大别山北部和桐柏山为低山丘陵和山间盆地。盆地内有浅丘和垄岗。

豫南山区适宜农林牧渔业综合发展。

6. 豫东平原

豫东平原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东部、北部到河南省界,南部到大别山北麓,西部到太行山和伏牛山东麓。

豫东平原以黄河为界,以北称黄海平原,以南称黄淮平原。它绝大部分由黄河、淮河冲积而成,也有一小部分属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的山前洪积平原。

豫东平原是中原重要耕作区,农业发达。

(三) 气候

中原地区为湿润和半湿润的大陆性季风气候。伏牛山和淮河以南属亚热带,以北属暖温带。

中原山区气候有垂直变化的特点,海拔越高,温度越低。

全省气候总特点为春季干旱多风,夏季炎热多雨,冬天寒冷少雨雪,秋天天气晴朗,日照最长,是全年最好的季节。

全省年平均气温为摄氏 12—15 度。其中太行山和豫西山区年均气温在摄氏 13 度以下,南阳盆地和淮河以南年均气温在摄氏 15 度以上。

全省一月份气温最低,平均为摄氏零度左右。南北气温有差别,以沙河、颍河为界,以南一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零度至二度,以北一月份平均气温为摄氏零度至零下二度。

全省七月份气温最高,山区平均摄氏 27 度以下,其他地区为摄氏 27—28 度。

全省无霜期为 190—230 天。河南北部和山区无霜期短,南阳盆地和沙河、颍河以南地区无霜期长。

全省日照率在 50% 以上,北部高于南部,平原高于山区。一年中的晴天比长江以南多。

全省年均降水量为 600—1200 毫米。河南北部降水量比南部少。淮河以南年均降水量为 1000—1200 毫米,豫西黄土丘陵和豫北年均降水量为 600—700 毫米。全年降水量不平衡,夏季降水量约占全年 50%,秋季约占 20%,冬季约占 10%,春季约占 20%。

(四) 河流

中原境内的河流,历史上变化较大。现有河流 220 多条,分属黄河、淮河、海河、汉水四大水系。

黄河过境长 700 余公里,南有伊河、洛河、汜水等支流,北有沁河、潞河等支流。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过境长 300 公里,南有史河、潢河、竹竿河等支流,北有洪河、沙河、涡河等支流。

汉水水系在南阳盆地。这里的唐河、白河等为汉水支流,汉水本身不过境。

海河水系在豫北新乡、安阳等地。这里的卫河是海河支流,海河本身也不过境。

中原四大水系中,以黄河流经的里程最长,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的影响最大。

中原地区的动植物资源和矿物资源都很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适宜各种农作物生长。

自古以来,中原人口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现在人口太多是不利因素,但在古代,人口多却是经济文化发达的重要条件。

中原地区四通八达,交通十分方便。

三、中原文化的地区差异

中原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但其内部也存在着地区性差异。大体说来,中原文化内部,可分为六个小文化区,即豫西、豫东、豫南、豫北、豫中和南阳文化区。这六个文化区有共同的地方,又各有其不同之处。

1. 豫西文化区

豫西文化区以洛阳为中心,包括洛阳和三门峡两个市。这里开发很早,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就是以三门峡市渑池县的仰韶村命名的。这个文化区北有黄河,南有伏牛山,西有函谷关,东有虎牢关,地理位置险要,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古建筑、古墓冢、古文化遗址、石窟、石刻等到处皆是。

豫西文化区的洛阳,位于豫西平均海拔最低的洛阳盆地底部,北

依邙山,南临伊阙,伊、洛、灋、涧四河贯穿其中,是中华民族文明发源地的腹地。洛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也是七大古都之一,作为城市,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九个王朝曾在这里建都。其中唐代是它极盛时期,商业发达,文化昌盛,有人口一百余万。夏代二里头文化遗址、商代西亳遗址、隋唐含嘉仓遗址、中国最早的寺院白马寺、驰名世界的龙门石窟、中国三大关公庙之一的关林、白居易墓、范仲淹墓等都在洛阳或其附近。洛阳还以盛产牡丹闻名于世。

2. 豫东文化区

豫东文化区包括开封市、商丘地区和周口地区。这个文化区以开封为大中心,另外还有商丘和淮阳两个小中心。

开封是一座具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城市,是中国七大古都之一和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战国时的魏,五代时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都在这里建都。其中北宋建都的168年是开封的鼎盛时期,人口超过百万,不但是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都会。史书和小说中所说的大梁、汴州、东京、汴京等,都是指开封。铁塔、龙亭、相国寺等名胜古迹,闻名海内外。北宋时期,冯义升等人曾在此发明以火药做的火箭,苏颂曾在此制造成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钟水运仪象台。

商丘位于黄淮冲积平原。公元前十七世纪,商朝的始祖契就在这里建立国家。周朝时是微子的封地,称为宋国。西汉时是梁孝王的封地,称为梁国。隋唐时称宋州。北宋时为陪都,称作南京。著名的古建筑阍伯台(又名火神台)、商代名臣伊尹的墓地伊尹林、永城的陈胜墓,都是有名的文化遗迹。永城的芒砀山相传是汉高祖斩白蛇而起义的地方。

淮阳即古代的宛丘。相传这里是伏羲氏和神农氏时的都城。淮阳的太昊陵,据说是伏羲氏的坟墓。这里商为陈地,周为陈国,秦为陈

郡,西汉为淮阳国,唐和北宋称陈州。《诗经》上的《陈风》,就是这里的民歌。战国时,楚顷襄王曾迁都于此。陈胜、吴广起义时,曾以此作都城。附近的太康县,相传是夏代都城之一,有夏代国王太康的陵墓。鹿邑县是先秦思想家老子的故乡。西华县相传是女娲之都,有女娲城遗址。

3. 豫北文化区

豫北文化区以安阳为中心,包括安阳、新乡、濮阳、焦作、鹤壁等市。安阳西靠太行山,北临漳河。二万年前,这一带就有人类居住。商朝自盘庚以后,八代十二王,前后 273 年都以安阳为首都,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北朝时,安阳称为邺城,曾是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的首都。举世闻名的甲骨文就出土于安阳。文峰塔、修定寺塔都是安阳有名的古建筑。

濮阳古称帝丘。相传五帝之一的颛顼曾建都于此。春秋时,卫国也在这里建都,前后经历二十一代国王,当时名为五鹿城。北宋称澶州,是宋辽澶渊之盟所在地。明清称开州。相传汉字的创始人苍颉,战国时的军事家吴起、政治家商鞅,唐朝天文学家一行和尚,唐代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清代农民起义领袖李文成,都是濮阳人。仓颉陵、子路坟等是这里重要的古迹。

新乡位于黄河冲积平原和太行山山前平原的过渡地区,它北依太行山,南临黄河。历史上有名的周武王攻打商纣王的牧野之战,就是在新乡进行的。西周时为鄘国所在地,《诗经》上的《鄘风》,就是这一带的民歌。西汉时称为新中乡。新乡这个名称起源于隋朝。市内始建于五代后唐时期的东岳庙,北郊的潞王坟,都是巍峨壮观的文化古迹。

鹤壁在周代属邶国。市内有东魏时开凿的五岩寺石窟。其他古迹有浚县的大伾山和淇县的纣王墓、摘心台等。

焦作在西周时属雍国。西晋王朝的创立者司马懿父子和唐代大

文学家韩愈都是这里人。现有文物保护单位胜果寺塔和汉献帝陵等。

4. 豫中文化区

豫中文化区以郑州为中心,包括郑州、许昌、平顶山、漯河市等河南中部地区。郑州是商朝中期的首都,至今已有三千五百余年历史。它在西周时属管国,春秋时属郑国,战国时属韩国。著名的中岳嵩山就在郑州市境内。市郊大河村有仰韶文化遗址。所属登封市有夏都遗址,还有中原名刹少林寺、建筑宏伟的中岳庙和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所属荥阳市有古鸿沟遗址、汉霸二王城和虎牢关。所属巩义市有闻名中外的北宋皇陵、杜甫故里和北魏时开凿的石窟寺。

许昌市在历史上长期称作颍川郡或许州。东汉末年,汉献帝曾以许昌为首都,并在这里“让位”给曹丕,成为曹魏初期的首都。相传,禹的儿子启曾建都于许昌市所属的禹州市境内。禹州市还以出产钧瓷闻名。

平顶山在西周时属应国,春秋时属楚国,战国时属韩国。所属宝丰县,每年正月十三日有马街书会(曲艺盛会),至今已有六百年历史。郟县有宋代大文豪苏轼墓。

漯河市是中国古代著名文字学家许慎的家乡。

5. 豫南文化区

豫南文化区包括驻马店和信阳两个地区,它在古代分别以汝南、信阳和潢川为中心。驻马店地区在春秋时有蔡、沈、江、房、道等国,汉称汝南郡,唐称蔡州,元以后属汝宁府,处于沙颍河之南,淮河以北。这里汝南县的天中山,在古代被称为“天下之中”(豫州在九州之中心,天中山又在豫州之中心)。驻马店地区有春秋时蔡国故城等古城址十余处,悟颖塔等古建筑七十余处,古墓葬、古文化遗址四百余处。

信阳地区位于淮河上游,南有大别山,西有桐柏山,淮河从中间穿过。西周时这里有申、蒋、息、蓼等国,春秋战国时又增加了黄、赖、弦等国,后来为楚国所统一,至今留有許多楚文化遗址。南北朝时以

淮河为界,北属北朝,南属南朝。这里是南北交界的过渡地带,文化上有较浓的过渡色彩。楚国水利专家孙叔敖、五代十国时对开发福建地区有贡献的王审知、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元代文学家马祖常、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等都生在这里。

6. 南阳文化区

南阳文化区以南阳为中心,它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周围有山,是个盆地。四、五十万年以前的南召猿人,就生活在这里的白河上游。西周时,这里有唐、邓、吕、渐等国。秦朝始称南阳郡,后来又称南阳府。在古代,这里是南下湖广、西入川陕的交通要道。水利发达,土地肥沃。东有淮河,南有汉水,西通长安,北通洛阳。东汉时,刘秀从这里起家,曾产生过张衡、张仲景等世界一流的文化名人。文物古迹有医圣祠、武侯祠、张衡墓等。

第二节 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和影响中原文化 兴衰的几个因素

一、中原文化的发展脉络

(一) 原始社会

中原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开发得最早的地方之一,曾创造过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被称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

中原文化源头很远。南召县发现有四五十万年前猿人的牙齿化石。安阳小南海发现有距今二万年前人类居住的洞穴。距今一万年至四千年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遗址,全中原地区有数百处之多。

裴李岗文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新郑裴李岗村首先发现的新

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它说明,距今八千年前后,中原大地上已出现原始农业,当时人们已用锄耕代替刀耕火种,过着定居生活。

到五六千年前,中原成为中国人类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河南境内黄河、淮河、洛河、漳河等河沿岸的台地上,到处有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址。其中著名的如澠池县仰韶村、陕县庙底沟、郑州大河村等。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也大多以河南为活动中心。相传,颛顼高阳氏居濮阳,太昊伏羲氏居淮阳,帝喾高辛氏居偃师,黄帝有熊氏居新郑,舜(有虞氏)居虞城。大量文化遗物说明,在原始社会晚期,中原文化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二) 夏商周时期

中国第一个有阶级的王朝夏朝,最早出现在中原。河南境内的阳城(今登封东)、阳翟(今禹州市)、斟鄩(在今偃师)、原(今济源)、帝丘(今濮阳)、老丘(今开封东南)、西河(今安阳西)等,相传都是夏朝建过都的地方。这说明,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原地区就进入了所谓文明社会(即阶级社会),这比西欧早一千多年。

商朝(前十六至前十一世纪)的活动中心也在中原。商朝曾多次迁都,其中在河南境内的有亳(北亳在今商丘北,南亳在今商丘南,西亳在今偃师)、囂(即郟都,今郑州)、相(今内黄东南)、邢(今温县东)、殷(今安阳)、朝歌(今淇县)等地。在这些都城中,以安阳殷墟最出名。

为了消除水患,发展农业,夏代的中原居民十分注意兴修水利。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也很发达。城市开始出现。登封告城镇的王城岗遗址和淮阳平粮台遗址,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两座古城遗址。它们都是属于夏代早期的城市。商代,城市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商代早期的西亳(在今偃师)遗址,中期的郑州商城遗址,后期的安阳殷墟,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城市遗址。商代的中原,不但有畜牧业、农耕业、狩猎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还出现了商品和货币。

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河南有封国五十多个,是中国境内封国

最多的地方。当时在洛阳建有王城和成周城，是周王朝的东都所在。

东周首都在洛阳，周围为王畿地区。东周前期称春秋，后期称战国。春秋时，河南有诸侯封国四十多个，其中主要有宋、卫、郑、陈等国，另外河南北境属晋国，南境属楚国。战国时，河南的诸侯封国主要有韩、魏、宋等国，楚国还曾一度把首都迁至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在周襄王元年（前 651 年）前后，为了加强物资交流，发展水上运输，灌溉农田，中原劳动人民开凿了我国古代大型的人工运河——鸿沟，第一次将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沟通起来。

以上这些情况表明，从远古到夏商周时期，中原文化都是很发达的。安阳殷墟保存下来的大量甲骨文，中原各地出土的为数众多的商周青铜器，《诗经》上收录的产生于中原的诗篇，春秋战国时期产生于中原的老子、庄子、韩非子等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都是这时期中原文化发达的标志。

（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朝实行郡县制，中原地区有三川郡、颍川郡、南阳郡、东郡、陈郡等。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城市，有三分之一集中在河南。三川郡的治所洛阳，颍川郡的治所阳翟（今禹州市），东郡的治所濮阳，南阳郡的治所宛（今南阳），陈郡的治所陈（今淮阳），河内郡的治所怀（今武陟南）等，都是当时有名的都会。

西汉时，中原地区分属司隶校尉部和豫州、荆州、扬州、冀州、兖州等刺史部，设有河南、河内、弘农、南阳、陈留、颍川、汝南、魏等郡和淮阳国、梁国等。西汉时期，河南境内约有人口 1260 余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数量和密度都占全国第一。

东汉建都洛阳，中原地区分属司隶校尉部和豫州、荆州、扬州、冀州、兖州等刺史部，设有河内、弘农、南阳、陈留、颍川、汝南、魏、东等郡和河南尹、陈国、梁国等。

三国曹魏建都洛阳，中原地区分属司州、豫州、荆州、冀州和兖

州,设有河内、弘农、南阳、陈留、颍川、汝南、魏等郡和河南尹、梁国等。

西晋建都洛阳,中原地区分属司州、豫州、荊州、兖州,设有河内、弘农、陈留、内乡、颍川、襄城、汝南、汝阴、顿丘、魏、汲等郡和南阳国、梁国等。

南北朝时,中原除南边一部分地区属于南朝外,主要地区都属于北朝。北魏建都洛阳,中原分属司州、豫州、相州、徐州、兖州等。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定都洛阳。东魏、北齐定都邺城(今安阳)。由于这些政治中心的存在,这就为当时河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虽然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频繁,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一定障碍,但总的来说,在当时,中原文化仍在全国占有很高地位。

在这个时期内,中原产生了帮助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的李斯、著名的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文字学家许慎等,佛教传入中原并广泛流行,洛阳太学盛况空前,贾谊、阮籍等人的文学作品传颂一时,何晏、王弼等人的玄学思想和范缜的神灭论影响深远,龙门石窟开始开凿,范曄《后汉书》写成等,也都是这个时期内重要的文化成就。

(四) 隋唐五代北宋时期

隋朝以洛阳为东都,实行郡县二级制,中原地区有弘农、河南、荊阳、颍川、淮阳、汝南、襄城、河内、南阳、春陵、梁、东、魏等郡。

唐朝亦以洛阳为东都,中原地区分属河南道、都畿道、河北道、山南道、淮南道等,设有濮、滑、怀、魏、相、卫、汴、许、陈、豫、宋、郑、陕、虢、汝、邓、唐、光、申等州。

五代时,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后梁、后汉、后周皆建都开封。

北宋建都开封,中原地区分属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等,设有开封府、河南府、颍昌府、应天府、郑州、孟州、汝州、陈州、蔡州、

唐州、邓州、光州、濮州、相州、卫州、怀州、陕州、魏州、信阳军等。

隋唐至北宋是中原文化的极盛时期。隋朝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河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隋唐时,东都洛阳成为仅次于长安的大城市,繁荣异常。五代和北宋建都开封,使开封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城市和国际著名的贸易中心。北宋开封有一百多万人口,从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繁华景况。隋唐以来中原经济的发展,为当时中原文化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唐代中原出现了杜甫、韩愈、元稹、李贺、李商隐等一大批诗人和文学家,出现了大画家吴道子、书法家孙过庭等。宋代出现了程颢、程颐的理学。城市建筑、市民文学、科学技术等也都获得长足发展。

(五) 金元明清以来

北宋以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开始衰落。南宋时,宋金以淮河为界,中原大部分归金朝统辖。从此,中原地区在全国不再是政治中心,而退居到一般行政区域的行列。

金朝中原地区分属大名府路、河北西路、河东南路、南京路等,设有濮州、开州、滑州、相州、卫州、浚州、怀州、孟州、魏州、睢州、陈州、蔡州、许州、唐州、汝州、钧州、郑州、嵩州、陕州、邓州、大名府、归德府、开封府等。

中原南部的光州和信阳军属南宋管辖。

元朝分全国为一个中书省和十一个行中书省。中原地区黄河以北属中书省,设有彰德路、卫辉路、怀庆路等。中原地区黄河以南属河南江北行中书省,设有南阳府、汝宁府、归德府、河南府路、汴梁路等。今河南省的名称就是从元朝来的。

明朝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今河南境内分属京师、山东、河南三个布政使司,设有彰德、卫辉、怀庆、开封、归德、汝宁、南阳、河南等府。

清朝又改称承宣布政使司为省,今河南境内分属直隶、山东、河

南三省,设有彰德、卫辉、怀庆、开封、归德、陈州、汝宁、南阳、河南等府和汝、许、光、陕等州。

民国时河南省的范围基本上沿袭了清代规模。

北宋以后中原文化的衰落,只是跟它以前在全国的领先地位相比而言的。就其作为地域文化来说,金元以来它还是在不断向前发展,尤其在明代和清代前期,中原文化的成就仍然是很突出的,与国内大多数省份相比并不逊色。在这段时期内,以张从正为代表的医药学,以少林武术和陈氏太极拳为代表的中原武术,以豫剧、曲剧为代表的地方戏曲,以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为代表的植物学,王铎的书法,富有特色的中原民俗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到了近代,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真正显得落后起来。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原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在中原修铁路,开矿山,建工厂,掠夺中原的资源和劳动力,中原成了帝国主义原料、劳动力的供应地和商品的销售市场。就在这个时期,国内不少省份都开始引进外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搞近代工业和交通运输,而中原却迟迟不动,中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比南方和沿海省区晚了30多年。当全国许多省份都传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兴西学时,中原的思想文化却仍然处在程朱理学的桎梏之中。这种情况,决定了近代中原人身上的陈旧观念较多,受愚昧落后思想的束缚较重,习惯于小生产的自给自足经济,重名轻实,严重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原文化又受到严重摧残。解放前这里竟成了全国最落后的地方之一,文盲占总人口的85%。

古代中原人民以勤劳、勇敢、朴实、善良著称。这些美德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原人民为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曾前仆后继进行过艰苦斗争。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发动了惊天动地的“二七”大罢工。1925年,焦作煤矿工人举行

了八个月的焦作大罢工。1929年,商城起义后,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2师。抗日战争时,中原有五个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淮海战役的最后决战是在豫东进行的。中原人民在从事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也曾创造过一些革命文化,但总的来说,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中原文化才掀开新的一页,开始走上新生时期。

二、影响中原文化兴衰的几个因素

中原文化从原始社会起,经过夏、商、周时期的最初发展,在秦汉以后持续发展,到唐宋时期达到了高峰。北宋以后,它的发展又趋于缓慢。

中原文化在不同历史阶段各有其突出的内容。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思想文化,北朝是佛教,唐代是文学,宋代是市民文化。

从史前时期到北宋末年,中原文化的总趋势虽然一直是向上发展的,但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停滞、破坏和小曲折。北宋以后更是大起大落。对中原文化发展造成影响的主要因素有全国政治中心的位置、中原的经济发展水平、交通状况、人口和战争等。

(一) 政治中心

中原地区是否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曾对中原文化产生深远影响。

在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期放在中原。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五代时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等朝都在中原建都。西周、隋、唐等朝,虽然不建都中原,但中原仍是它们的东都所在地。

因为许多全国性的文化机构主要集中在首都,首都的文化设施多,又是国内外文化名人会聚的地方,全国各地的先进文化也往往向这里集中,促进文化发展的条件比较优越,所以许多代表国家水平的

文化成果常常在首都及其附近产生。

北宋以后,南宋定都杭州,元、明、清建都北京,再没有什么王朝在中原建都。随着全国政治中心的转移,中原地区在文化上也就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地位。

(二) 经济水平

文化的发展跟经济基础分不开。古代中原的自然条件比今天好。西部、南部的山区丘陵,土肥林茂;东部平原,河流纵横,气候温和,这些都有利于农林渔牧业的发展。唐宋以前,中原经济的发展水平一直处在全国前列,对文化发展十分有利。随着时间向后推移,中原的气候发生变化,加之人为的影响,使山区森林减少,水土流失,经常干旱不收,土地荒芜;在平原地区,由于从金元以来,黄河经常在这一带决口泛滥。仅金代以来的八百年中,黄河在开封附近就决口一百二十多次。黄河决口时,洪水滔滔,怒涛万顷,千村万落,淹没一空。洪水过后,不少河流、湖泊都被黄河泥沙淤塞,许多肥沃的良田变成沙荒盐碱。中原的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这对中原文化发展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晌。

(三) 交通状况

一个地区文化发展得缓慢或迅速,与这一地区对外文化交流的情况有关。古代的文化交流,很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取决于当地的交通状况。

中原交通,在古代影响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是水路。

中原水路交通,起始于先秦,发展于秦汉,兴旺于隋唐、北宋。

中国古代常说的江、淮、河、济四渎,其中河、淮、济三渎皆从中原流过。但这些河流都是东西流向的,而文化主要是南北交流。因此,沟通各河之间的人工运河,在中原交通史上起过重大作用。

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中原。魏国开鸿沟,沟通黄河和淮河两大水系,冲破天然河流的局限,使中原地区的水运网呈现雏形。

隋代大运河,使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通,以洛阳为中心,南通余杭,北通涿郡,一水贯南北,八方变通途。大运河中的主要河段通济渠和永济渠,都起于中原。中原地区成为大运河航运的枢纽。

北宋时称通济渠为汴河。除了对它大力利用之外,又疏浚了蔡河和五丈河南北航线,成为古代中原水运的黄金时期。

北宋以后,中原水运由高峰跌落下来。先是由于金与南宋对峙,运河失修;后由于黄河泛滥,运河被淤平,无法通航。元明清时期,另开京杭大运河,南北水运大动脉不从河南经过,河南不再处在中国南北水运交通要道上。

中原古代文化的兴衰,正是与这种中原古代水运的兴衰相一致的。

(四) 人 口

在古代,人口多,素质高,往往有利于文化发展。

夏、商、周时,中原人口数目无考。但从文献记载看来,当时中原人口相当稠密。

西汉时,全国在籍人口约 5960 万,中原人口为 1500 万,约占全国 25%。当时全国 200 万以上人口的郡只有沛郡、颍川、汝南三个,其中两个在中原。

东汉时,全国在籍人口约 4900 万,中原人口为 1048 万,约占全国 21%。

隋代全国在籍人口约 4600 万,中原人口为 835 万,约占全国 18%。

唐代全国在籍人口约 5000 万,中原人口为 690 万,约占全国 14%。

北宋全国在籍人口约 2500 万,中原人口为 298 万,约占全国 12%。

元代全国在籍人口约 5950 万,中原人口只有 80 万,约占全国 1.34%。

明代全国在籍人口约 5300 万,中原人口为 261 万,约占全国 5%。

清代康熙年间,全国在籍人口约 2000 万,中原人口为 143 万,约占全国 6%。

由这些数字可见,从西汉至北宋,中原人口一直都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至八分之一。这么多的人口,对当时中原文化的发展曾起过促进作用。北宋灭亡之后,中原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对中原文化发展带来了不利。再加上北宋灭亡时,许多有钱人、文化素质高的人都纷纷逃到南方定居。大量的人口迁徙和人才外流,虽然促进了中国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但对中原本地的文化发展却有一定的消极影响。

(五) 战争

文化的发展,需要和平与统一的环境。战乱对文化起破坏作用,分裂阻碍文化交流,都不利于文化的发展。夏、商时,中原是国家领土的核心部分,社会安定。春秋战国时,虽然经常发生兼并战争,但几个大国都在中原,这使中原地区能较长时期处于和平和相对统一之中。汉代、曹魏、西晋、北魏、唐代、北宋中原地区也是和平统一时期,它们都是中原文化大发展的阶段。虽然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中原因为是兵家必争之地,也常常发生激烈战争,使文化受到严重破坏。但新朝代建立之后,由于政治、经济等多种原因,中原文化很快就又恢复和发展起来。

北宋灭亡之后,南宋和金,南宋和元,前后打了将近一百年,主要战场大多在河南境内,使中原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损失。原来有利于中原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逐渐消失,不利因素逐渐增加,从此中原文化再也无法恢复以前的发展势头。

第三节 中原文化的主要特点

中原文化的特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发展持续,源远流长;文化渊藪,地位领先;领域繁多,异彩纷呈;骨干作用,影响广泛;遗迹遍域,文物首屈。

一、发展持续,源远流长

中原文化不像某些地域文化那样,在发展过程中或者有头无尾,或者有尾无头,或者虽有头有尾,但中间断档。中原文化长期处于持续发展的状态中,源远流长,高潮迭起。

1978年在南召县云阳镇杏花山发现了一颗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猿人牙齿化石,该猿人被称为“南召猿人”,它表明距今大约四五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已在中原大地上繁衍生息。

1960年在安阳小南海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洞穴中,发现七千多件石器、原始人类用火的灰烬和许多现在早已灭绝了的动物化石。它表明距今约二万年前后,中原大地上的原始人类已会用火熟食,并能制造相当进步的石器。

1977年在新郑裴李岗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镰和猪羊骨骼,表明距今约八千年左右,中原先民已开始过着农耕定居生活,并有了原始畜牧业。

1921年以来,在澠池仰韶村等三百多处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石纺锤、骨针、彩陶、窖穴、房基等,表明距今约五六千年,中原已经进入母系氏族的繁荣时期。

建国以来,在河南各地 200 多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大

量新石器晚期遗物,表明距今约四五千年,中原已由母系社会进入父系社会,氏族社会已经开始解体。

中原地区在中国最早进入阶级社会。中国第一个国家政权夏朝是在中原建立的。夏曾多次迁都,大多在河南境内。登封王城岗发现我国时代最早的古城遗址,城为夯筑,并有奠基殉人,时间距今约四千年左右。有人认为这里就是“禹都阳城”的阳城。

偃师二里头遗址一期文化,其年代介于河南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有人认为二里头就是夏都斟鄩所在地。

中国第二个国家政权商朝也是在中原建立的。商曾五次迁都,有四次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商代早期城市。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商汤的都城“西亳”。

郑州商城遗址是商代中期的城市。有人认为这里是“中丁迁于囂”的囂都所在地。

至于安阳殷墟,则是商代晚期自盘庚以后二百七十三年间的都城。

西周建都镐京,但以洛阳为东都。东周正式迁都洛阳。

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后,二千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三十多个王朝,其中在河南建都的有二十个。洛阳被称为“九朝古都”,开封被称为“七朝古都”,在安阳建都的有六个朝代。

首都所在地,自然成为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从原始社会,经奴隶社会,直到封建社会的北宋王朝结束,中原文化一直持续向前发展,长期表现出兴旺发达的气象。这种长期性、持续性在国内是罕见的。

北宋以后,中原地区不再作为全国政治中心,其文化的发展水平与它以前相比,进步得不那么快。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文化并不落后。而且先进的中原文化逐渐扩展到南方,促进了南方文化的大发展。

二、文化渊藪,地位领先

早在史前时期,中国境内许多地区都出现了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原文化就在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原文化也在中国地域文化中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中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有许多开风气之先的东西。比如八卦、《周易》,还有所谓《河图》、《洛书》,最早都是在中原产生的。

新郑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加工谷物的工具。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是距今约八千年的中国最早的乐器。汝州阎村出土的鹳鱼石斧彩陶缸和郑州大河村出土的彩陶双连壶,是著名的原始绘画艺术品。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铜爵,是中国最早的青铜器制品之一。郑州出土的商代瓷尊,是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安阳出土的隋代白瓷围棋盘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浙川下寺出土的透雕云纹铜禁,是中国最早用失蜡法铸造的铜器。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学和宋学两个学派也是在中原产生的。创立汉学的东汉学者贾逵、马融、许慎、郑玄都活动于当时的首都洛阳。他们的经学成就影响深远。宋学就是理学,理学的早期代表人物程颢、程颐,都是洛阳人。理学对形成中国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影响巨大。

文学上,《诗经》中许多著名诗篇都产生于中原。

宗教上,洛阳是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方,长期成为国内佛教文化中心。

史学上,《汉书》、《资治通鉴》都是在洛阳写成的。

中原文化层次高,有许多文化名人和文化成果。如科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诗人杜甫、文学家韩愈、画家吴道子、乐律学家朱载堉

等都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流人物。《说文解字》、《伤寒杂病论》等都是中国古代一流的著作。

中原文化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这里始终是我们祖先活动的中心地区。正如司马迁所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狭小,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史记·货殖列传》)三河指河南、河内、河东,主要范围都在中原地区。

三、领域繁多,异彩纷呈

中原文化内容丰富,领域繁多,异彩纷呈,不是单方面的成果,而是在众多门类上全面发展。仅就著作而言,据民国初年统计,清代嘉庆以前,中原人所写的重要著作就达四万余种。

在语言文字学方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学著作之一。宋代丁度等编撰的《集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音韵学著作,是研究文字训诂和宋代语音的重要资料。

在历史学方面,汉代荀悦撰的《汉纪》和晋代袁宏撰的《后汉纪》是分别记载西汉和东汉史事的名著,受到唐代大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和宋代大史学家李焘的推崇。唐代李延寿撰的《南史》、《北史》专记南北朝史事。宋代薛居正等撰的《旧五代史》是著名的两部《五代史》之一。宋代宋祁和欧阳修合撰的《新唐书》是著名的两《唐书》之一。它们是中国二十四部正史中的四部重要著作。

在经济学方面,汉代桓宽撰的《盐铁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著作,对研究西汉社会矛盾和经济生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军事学方面,宋代曾公亮、丁度等编撰的《武经总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兵书。

在哲学方面,春秋时老子撰的《老子》和战国时庄周撰的《庄子》是中国古代两部著名的哲学著作,也是道家的两部主要经典。战国时韩非撰的《韩非子》,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提出一套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主张,是中国古代一部著名哲学著作,对后世影响很大。战国末期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杂家著作,是秦朝统一天下的思想武器。宋代程颢、程颐的理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水利学方面,清代黎世序撰的《续行水金鉴》,为后人研究中国水利史提供了大量文献资料。

在建筑学方面,宋代李诫撰的《营造法式》,是当时建筑学上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植物学方面,清代吴其濬撰的《植物名实图考》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植物学著作,至今仍为研究我国植物种属及固有名称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医学方面,东汉张仲景撰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学经典。明代朱橚等编的《普济方》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医方汇编。李时珍《本草纲目》所附医方,大多采自此书。

在文学评论方面,南朝梁代钟嵘撰的《诗品》是中国古代著名的诗歌评论著作,与刘勰的《文心雕龙》并称。

在文学创作方面,晋代干宝撰的《搜神记》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神话小说集。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韩愈的散文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元稹、李贺、李商隐等都是唐代著名诗人。元稹的《莺莺传》还是唐代著名的传奇小说。元代姚燧、马祖常、许有壬,明代何景明,清代侯方域等在散文和诗歌创作上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四、骨干作用,影响广泛

中原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中的骨干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骨干作用,非一般地域文化可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原文化始终占有核心和枢纽地位,人们常说的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实质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凝聚力。所谓汉族文化,就是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

中原文化有强大的吸收力和融合力,能把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外国文化吸收进来,融合在自己的血肉里,促进自身的发展,而又不丧失自己的个性。

河南东部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的遗物,河南南部的仰韶文化遗址中有湖北屈家岭文化的遗物。这说明早在远古时期,中原文化就受到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影响。

中原文化有些是中原人自己创造的,有些是外地人来中原创造的,有些是通过文化交流,吸收其他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后形成的。

中原文化发展快、成就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里一直处于各种文化的交流中心,吸收其他文化的机会很多。

文化要发展,固步自封是不行的。光靠本地人的力量创造新文化,发展不可能快。需要不断引进新文化,才能促进发展。

今天所说的中原文化,包含了大量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

中原文化有强大的扩散力和传播力,对中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和邻近国家的文化,有巨大的渗透作用和辐射作用,从而丰富了周围地区文化的内容,并带动它们的发展。

中国各地文化都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文化的传播方式

主要是通过和平交往、人口流动和战争等途径。

东北地区,早在原始社会就和中原有文化联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东北纳入中原中央政权统辖范围,文化联系更为密切。

《三国志·夫余传》说,东北夫余人“以殷正月祭天,国中大会,连日饮食歌舞,名曰迎鼓”。表明夫余人的历法,就是从商代继承过去的。

北魏至隋唐高句丽人墓中壁画题材都是中原神话传说,如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也是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辽国契丹人和金国女真人在婚、葬、饮食、居住、音乐、舞蹈、文学等方面,都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

《辽史·文学传》云:“及太宗入汴,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制度渐以修举。”用汉字和汉文学形式写的文学作品一直是契丹文学的主流。辽国史学也基本上接受了中原史学的传统。辽国还学习了中原先进技术和生活方式,如盖房子、坐桌椅等。契丹人妻后母、报寡嫂的旧俗也因受中原文化冲击而废除。

《金史·乐志》亦云:“初,太宗取汴,得宋之仪章钟磬乐虞,挈之以归。皇统元年,熙宗加尊号,始就用宋乐。”中原文化对女真人的影响也很大。

西南地区也受中原文化很大影响。杜甫曾在四川创作大量诗歌,生活九年。成都草堂至今是中国纪念杜甫的主要场所之一。

中原文化对江南、岭南和闽台地区的影响也十分突出。

中原文化影响福建,最早始于西晋末年。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石勒攻下洛阳,中原士民大量南迁。唐代林蕴《林氏族谱序》云:“今诸姓入闽,自永嘉始也。”宋代路振《九国志》也说:“永嘉三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其中陈姓祖先为颍川陈氏,郑姓始于河南荥阳,黄姓、何姓起源于河南固始。至今闽南语系许多人还称自己为“河洛人”。

唐末五代是中原人进入福建的第二个高潮。唐末藩镇秦宗权攻打光州(今河南潢川)刺史王绪,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资治通鉴》卷二五六),于光启元年(885年)入闽。后来这支队伍的首领王潮、王审知兄弟统一福建,建立闽国政权。他们招徕移民。蔡、刘、翁、吴等姓都是这时由中原迁到福建的。

北宋末年,中原百姓再一次南迁。开封、洛阳的封建贵族也大量迁入福建定居。

现在福建人的主体,大多是中原移民的后裔,特别是唐宋时期中原移民的后裔。

中原移民进入福建之前,福建人口稀少,文化十分落后。中原移民进入福建之后,福建文化很快发展起来了。

每次迁往福建定居的中原人,大多是文化层次高、有才干的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原人才的精华,懦弱无能的人既没有胆量也没有力量长途跋涉,迁到福建。如杨赞图、杨承休、王侗、郑戩等官僚贵族。北宋“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朱熹:《晦庵文集》卷八三)。当时入闽的士大夫大多有家学。

建立闽政权的王审知重视教育,在福建建了许多学校。到宋代,仅建阳就有同文、横渠、鳌峰等十一座书院。唐宋时期,建州被誉为“闽邦邹鲁”,泉州被誉为“海边邹鲁”(《八闽通志》卷三)。

唐宋时期,福建出现了许多人才。如莆田林氏在唐中后期有九人官至州刺史,号称“九牧林”。浦城章氏,宋代产生章得象、章惇二宰相。泉州曾氏在《宋史》有传者有曾公亮、曾从龙、曾诞等七人。建阳蔡氏,出了蔡元定、蔡渊、蔡沉等学者,号称“蔡氏九儒”。邵武严氏,出了严羽等十一位诗人。这些家族都继承了中原文化传统。

唐宋福建名人中,有许多是中原人后裔。如史学家郑樵的祖先为荥阳郑氏,晋代入闽。“蔡氏九儒”源于上蔡,唐代入闽。

中原佛学和理学对福建影响尤为突出。

禅宗发源于嵩山少林寺。六祖慧能的徒孙马祖道一是最早入闽的禅僧。马祖道一的弟子闽人百丈怀海在福建的徒子徒孙泐山灵祐和仰山开创了泐仰宗；黄檗希运和临济义玄开创了临济宗。另外，福建名僧曹山本寂开创了曹洞宗。福建名僧雪峰义存的弟子云门文偃开创了云门宗，他的三传弟子清凉文益开创了法眼宗。可见禅宗南派五宗的开创皆与闽僧有关。唐末五代福建成为中国南方的禅宗中心。

北宋初，福建儒学落后于中原。后来福建人杨时、游酢到中原颍昌向程颢学习。程颢死后，杨时又向程颐学习。

南宋初，杨时成为程门正宗。杨时的门人有罗从彦、胡寅、胡宏、刘勉之、陈渊等。

罗从彦与其门人李侗将二程理学传于朱熹。朱熹集大成，创立“闽学”。朱熹原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但生于福建，一生绝大部分岁月皆在福建度过。朱熹有弟子数千，蔡元定、陈淳、真德秀、黄榦等都是著名学者。朱熹学派的核心就是继承二程理学而发扬光大。

由中原迁入福建的许多人的后代，明清以来，又辗转迁往台湾，他们把中原文化也传到了台湾。现在台湾许多大姓的族谱上都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河南固始人。

历史上把从西晋末年至南宋末年由中原迁移到南方去的人，又常称为客家人。客家人除居住闽台以外，还广泛居住在广东、广西、江西、湖南等地，还有不少侨居海外。现在国内外的客家人，总数约有四五千万。客家人的语言跟河南话关系密切，风俗习惯犹有中原遗风。他们把中原文化带到所居住的地方，对当地文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是客家人。

五、遗迹遍域,文物首屈

在中原地区,历史上留存到今天的文化遗迹特别多。走遍中原各地,地上地下到处都是文化遗物。据统计,在全国各省中,河南地下文物数量排列第一,地上文物数量排列第二。

中原大地上众多的古文化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原已发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 36 处,主要分布在豫西伏牛山区,还有少数分布在太行山东麓和豫南平原。旧石器时代人们无固定聚落,一般靠狩猎和住洞穴为生。

中原已发现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近千处。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地区,大多集中在伏牛山东麓与平原相接壤的地方,尤以河流两岸为多。这些遗址规模大,遗存丰富,分布稠密,可以找出它们之间前后数千年的发展序列。其中有裴李岗文化遗址 70 余处、仰韶文化遗址 300 余处、以大汶口文化为主的遗址 1 处、屈家岭文化遗址 10 余处、河南龙山文化遗址 200 多处、重要的夏商文化遗址 10 余处。

中原已发现古城遗址 150 余座,其中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8 座,即郑州商代遗址、安阳殷墟、新郑郑韩故城、汉魏洛阳故城、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开封北宋东京城遗址;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36 座,如淮阳县有春秋陈国故城遗址,上蔡县和新蔡县有春秋蔡国故城遗址,淇县有春秋卫国故城遗址等。有国务院公布保护的历史文化名城 7 座,即洛阳、开封、安阳、南阳、商丘、郑州、浚县。

中原还发现许多商周冶铜遗址,战国和两汉冶铁遗址,古代煤矿、铁矿、金矿、银矿的开采遗址,陶瓷作坊遗址,粮仓遗址等。如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曾发现西汉各种炼铁炉 18 座和铁制工具、兵器 160 多件,在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安阳相州窑遗址是隋唐以

来北方的重要窑场。禹州市钧窑遗址、汝州市汝窑遗址,分别为北宋五大名窑之一。荥阳敖仓遗址、巩义洛口仓遗址、洛阳含嘉仓遗址,都是中国古代有名的粮食仓库遗址,尤以隋唐洛阳含嘉仓遗址保存得最完整,规模之大,建筑之科学,为国内所仅见。

中原地区,古代是中华民族的活动中心,并多次作为国都所在地,因而帝王陵寝、将相大臣及其他名人的坟墓很多,他们有些是中原人,有些是非中原人。

中原帝王陵寝,属于传说时代的,商丘县有燧皇陵,相传他是发明钻木取火的人。淮阳县有太昊陵,相传是人类始祖伏羲氏安葬的地方。内黄县有颛顼陵和帝喾陵,他们是传说中“三皇五帝”中的二帝,曾对中华民族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属于夏商时期的,太康县有夏朝国王太康陵,洛宁县有夏朝国王帝皋陵;安阳县有商代国王河宾甲陵,西华县有商代国王武丁陵,内黄县有商代国王帝乙陵。

东周皇陵在中原。太康县有东周平王陵,澠池县有东周桓王陵,孟津县有东周惠王陵,洛阳西南有东周灵王、景王、悼王、敬王诸陵,洛阳东北有东周威烈王陵。

东汉皇陵在中原。除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陵在孟津、东汉末代皇帝献帝陵在修武外,其余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桓帝、灵帝诸陵都在洛阳城南和城北。

曹魏皇陵在中原。如魏文帝曹丕陵在偃师首阳山,魏明帝陵在汝阳县。

西晋皇陵在中原。如文帝司马昭陵、武帝司马炎陵在偃师南蔡庄。其余如宣帝司马懿陵、景帝司马师陵、惠帝司马衷陵都在洛阳附近。

北魏皇陵在中原。如北魏孝文帝陵在洛阳北郊官庄村,宣武帝陵在洛阳北郊冢头村,孝明帝陵在洛阳北郊西山岭头村,孝庄帝陵在洛

阳北郊上砦村。

五代皇陵在中原。如后梁太祖朱温陵在伊川县常岭村,后唐庄宗李存勖陵在新安县,后晋高祖石敬瑭陵在宜阳县石陵村,后汉高祖刘知远陵和后汉隐帝刘承祐陵在禹州。后周太祖郭威、世宗柴荣、恭帝柴宗训等陵都在新郑陵上村一带。

北宋皇陵是中原保存得最好、最完整的皇陵。它位于巩义市,共有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七个皇帝的陵墓,还有宋太祖的父亲赵宏殷和北宋二十多个皇后的陵墓。

此外,汝阳县有金哀宗陵,安阳市有做了八十多天皇帝的袁世凯的墓。

中原将相大臣墓,著名的如虞城县有伊尹墓,他是商代有名的奴隶出身的宰相。卫辉市有比干墓,他是商代著名的敢于直谏的大臣。长葛市有子产墓,他是春秋时郑国著名的政治家。开封县有张仪墓,他是战国时连横政策的创始人。辉县市有蔺相如墓,他是赵国大臣,完璧归赵的名人。巩义市有苏秦墓,他是战国时合纵政策的创始人。上蔡县有李斯墓,他是秦国著名的丞相。商水县有秦国大将蒙恬墓。中牟县有萧何墓,兰考县有张良墓,原阳县有陈平墓,郑州市有纪信墓,舞阳县有樊哙墓,唐河县有周勃墓,许昌市有晁错墓,滑县有汲黯墓,他们分别为西汉时著名的大臣和大将。洛阳有三国名将关羽首级墓。灵宝有王濬墓,洛阳有羊祜和杜预墓,他们都是西晋著名大将。荥阳有东晋北伐名将祖逖墓。滑县有隋朝大将韩擒虎墓。开封有唐朝名将李靖墓。襄城县有唐朝名相房玄龄墓。淇县有唐朝名臣尉迟恭墓。偃师市有唐朝名臣褚遂良墓。洛阳有唐朝名臣狄仁杰墓。商丘县有唐朝名将张巡墓。永城市有北宋大将曹彬墓。巩义市有北宋名相赵普墓、寇准墓和北宋名将高怀德墓。洛阳有北宋名将石守信墓。安阳有北宋名相韩琦墓、文彦博墓和北宋名臣富弼墓。伊川县有北宋名臣范仲淹墓。舞阳县有北宋名将狄青墓。焦作市有元代名臣许衡

墓。新郑市有明代名臣高拱墓。睢县有清代名臣汤斌墓。

中原文化名人墓,如原阳县有西汉天文学家张苍墓。鄆城县有东汉著名文字学家许慎墓。南阳有东汉大科学家张衡墓和大医学家张仲景墓。淮阳县有曹魏著名文学家曹植墓。偃师有曹魏著名书法家钟繇墓。许昌市有东汉末著名医学家华佗墓。尉氏县有曹魏著名文学家阮籍墓。中牟县有西晋著名文学家潘岳墓。洛阳有西晋著名文学家张华墓。偃师有唐代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墓和唐代大诗人杜甫墓。孟州市有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墓。洛阳有白居易墓、孟郊墓、贾岛墓,济源市有卢仝墓,沁阳市有李商隐墓,荥阳市有刘禹锡墓,鲁山县有元结墓,他们都是唐代著名诗人。济源市孙真坟村还有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墓。伊川县有宋代理学家程颐墓、程颢墓和邵雍墓。郑县有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墓、苏辙墓和他们的父亲苏洵的衣冠冢。新郑市有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墓和宋代大建筑学家李诫墓。禹州市有李梦阳墓,信阳市有何景明墓,他们都是明代著名文学家。沁阳市有朱载堉墓,他是明代大科学家,世界文化名人。辉县市有明清之际著名学者孙奇逢墓。固始县有清代植物学家吴其濬墓。

中原其他名人墓也很多。如偃师市首阳山有伯夷、叔齐墓,他们是古代著名的义士。浚县有子贡墓,濮阳有子路墓,杞县有冉伯牛墓,范县有闵子骞墓,内乡县有巫马期墓,上蔡县有漆雕开墓,他们都是孔子的著名学生。禹州市有古代著名刺客聂政墓。永城市有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墓。新密市有窦建德墓,睢县有李密墓,他们都是隋末农民起义领袖。延津县有太平天国起义将领陈玉成墓。

中原大地上有大量古代遗留下来的寺庙祠观、台院阙碑。

中原著名的佛寺很多。如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所建的第一所寺院,始建于东汉,至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

登封少林寺,是佛教禅宗的祖庭,始建于北魏,至今已有1500年历史。

开封相国寺,是中国古代的一座妇孺皆知的著名寺院,始建于北齐天保六年(555年),至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

登封法王寺,是我国另一座建筑最早的寺院。它始建于东汉永平十四年(71年),只比白马寺晚三年。

中原著名的古庙很多。如登封中岳庙,是中原目前所存规模最大的庙宇。它始建于秦朝,是历代皇帝祭祀中岳神的地方。庙中保存了大量汉唐以来的文物。

济源市的济渎庙,也是河南现存规模较大的庙宇之一。它始建于隋朝,是历代祭祀济水神的地方。

汤阴岳飞庙,是纪念宋代抗金英雄岳飞的庙宇。

内乡文庙,是河南现存最早的纪念孔子的庙宇。它始建于元朝大德八年(1304年),毁坏后又在明初重建。

周口关帝庙,是纪念三国时大将关羽的庙宇。它始建于清初。

中原古祠很多。现存著名的有南阳武侯祠。它是纪念三国名人诸葛亮的祠宇,始建于唐代。相传,在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曾在此隐居。

中原道教宫观很多。现存著名的有鹿邑太清宫。鹿邑是道教所尊始祖老子的故乡。该宫始建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宫中有唐玄宗时期所立的《道德经注》碑和宋真宗撰文、书写和篆额的《先天太后之赞》碑。

浚县碧霞宫,始建于明代,是豫北一处重要的名胜古迹。

济源阳台宫,是唐玄宗时著名道士司马承祯始建的道宫。

济源奉仙观,始建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宋代著名道士贺兰栖真曾在此居住。

中原有名的古台很多。如商丘的阍伯台,是中原现存历史最早的古台。相传这里是帝喾高辛氏之子阍伯的葬地。由于该台位于商地,故又称“商丘”。今天商丘这个地名就是从这里来的。

禹州市的钧台,又称夏台,始建于距今4000年前。相传夏启曾在此举行宴会,招待诸侯。

开封的吹台,相传是春秋时大音乐家师旷吹奏乐器的地方。

偃师的灵台,是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台。建于东汉,至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

淮阳的厄台,相传是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的地方。

登封观星台,是元代大科学家郭守敬建筑的一座天文观测台。

在书院方面,著名的有嵩阳书院。它位于登封,宋代是它的鼎盛时期,是当时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

在石阙方面,著名的有登封汉代三阙,即少室阙、太室阙和启母阙。它们都建于东汉年间。分别为汉代少室山庙、太室山庙和启母庙前的神道阙,每座阙上都有铭文和多幅石刻画像,是国家一级文物,具有重大价值。

在石碑方面,著名的有:东汉《尹宙碑》,隶书,现存鄢陵,记述东汉昆阳令尹宙的功德。东汉《袁安碑》,现存河南省博物馆,字为小篆,清秀挺拔。东汉《赵葑碑》,现存南阳市博物馆,字为隶书,端庄古朴。曹魏《受禅表》和《上尊号奏》二碑,现存临颖县。该碑是汉献帝禅位曹丕时所立,相传为大书法家钟繇所书,用方正遒劲的隶书所写。西晋《临辟雍颂》碑,现存偃师,为中国晋碑之冠。记载晋武帝司马炎巡视太学的情况。北魏《中岳嵩高灵庙碑》,现存登封,相传为寇谦之所书,这是中国第一块道教碑。唐《升仙太子碑》,现存偃师,为武则天所书,婉转俊逸,是中国第一块妇女所书的碑。《唐太宗御书碑》,现存少林寺,记载少林寺僧兵帮助李世民打天下的事。《元次山墓表》,现存鲁山县,为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所书,雄浑有力。《高元裕碑》,现存开封市博物馆,为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所书,苍劲古朴。宋《契丹出境碑》,又名《回銮碑》,现存濮阳,传为寇准所书。《大观圣作碑》,现存新乡市博物馆,为宋徽宗所书,是典型的瘦金体。《昼锦堂记》,现存安阳市,

为宋代大书法家蔡襄所书。元《韩魏公祠渔庄记》，现存新乡市博物馆，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所书。

全省有关部门收藏文物一百多万件。其中青铜器中著名的有1957年在偃师采集到的早商时期的长流爵，1965年在辉县出土的商代晚期的祖辛卣，安阳妇好墓出土的鸮尊，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1972年罗山出土的春秋时期的单匜，1973年固始出土的春秋时期的编钟等，都是国内少见的珍品。陶瓷中著名的有1978年在临汝出土的仰韶文化时期的鸮鱼石斧图彩陶缸，1981年淮阳出土的西汉三进陶院落，1972年焦作出土的东汉彩绘四重陶仓楼。还有大量汉代画像砖，杂技、乐武陶俑，唐代的唐三彩文吏、武士、马、骆驼、鸳鸯枕、鹰头壶、镇墓兽等。

瓷器著名的有1954年郑州出土的商代青瓷尊（中国最早的瓷器），西周青釉瓷豆，隋代白瓷武士俑、围棋盘，北宋钧瓷大碗等。

此外，还有从仰韶时期到晋代的大量玉器，殷代以来的各种货币，秦朝以来的各种印章，殷墟甲骨文和历代传世书画墨迹等。

第二章 中原思想文化

古代中原人，善于理论思维。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五行思想和八卦学说，最初是在中原产生的。

创立学派，进行百家争鸣并给后世很大影响的先秦诸子，大多数也是中原人。

中原人首创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曾在中国思想界前后统治了近千年。

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大致都是在中原地区首先确立的。因此当时的中原人，思想活跃、开放，常常走在历史潮流的前头。但明代以后，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原无缘，西方思想对中原冲击不大。远离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中心，使中原思想界逐渐失去生气，长期陷于保守和僵化。

第一节 先秦哲学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开端，包含着后世各种哲学观点的胚胎和萌芽，是后世哲学发展的基础和源头。

先秦许多著名的思想家都是中原人，很多有名的哲学观点都是

在中原产生的。

一、中原哲学思想的产生

(一) 对精神与物质关系的最初思考

五十万年以前,中原已有会用火的先民活动。

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母系社会兴盛。陕县庙底沟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墓葬,有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作殉葬品,说明当时人认为,人死后有灵魂存在,还能过他生前的生活。

灵魂观念是当时中原人对精神与物质关系的原始看法,它就是哲学唯心主义的胚胎。

夏商两代都以中原地区作为基本领土。

夏人相信天命和鬼神。文献记载:“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又说:禹“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史记·夏本纪》)。

商代把天看成人格化的至上神,称为“帝”、“天帝”、“上帝”,作为世界的最高主宰,加以信奉。认为风雨变化、年成好坏、战争胜负、生病与否皆决定于“帝”。甲骨文中有许多“帝”字。

这都说明,夏商两代在中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客观唯心主义。

(二) 五行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

在中国历史上,广泛用以解释自然和社会变化法则的五行思想,最早产生在中原地区。

五行思想把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看成是世界的基本元素,认为它们可以生成万物。这是中原唯物主义思想的初期形态。

以五行思想与天命论相对抗,也是人们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中原五行思想的起源很早,传说夏朝建立前,已有掌管五行的专职人员和水、火、木、金、土、谷六府的设施。禹根据五行思想,治好了洪水。

五行思想传到商代,先归元老重臣掌握,甲骨文中与五行思想

相关的四风名称和五方观念。后来,五行思想传到民间。周武王伐纣时,中原有民歌云:“孜孜无怠!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尚书大传》)表明当时中原人民已将水、火、木、金、土当作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

商朝末年,五行思想又由箕子传给了周人。箕子是商纣王的同父异母兄,曾任太师,因反对商纣王的倒行逆施被囚,周武王灭商后从狱中释放了他。周武王请他谈谈商朝灭亡的原因,他回答说是因为商纣王违背了反映事物客观规律的五行思想。

在文献上最早记载五行思想的是根据箕子言论写成的《尚书·洪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穡。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这段话深刻地指出了水、火、木、金、土五种基本物质的自然属性和运动规律。

五行思想后来经过不断发展,在中国古代科技、政治、宗教、伦理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 八卦中的辩证法思想

八卦是古代占筮用的八种基本图象。由阳爻“—”、阴爻“--”两个符号,按照天、地、人三重关系排列组合而成。其卦名和图象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八卦最初也是在中原诞生的。

相传,八卦为伏羲所画。《周易·系辞下》云:伏羲氏“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①

^① 另一种说法认为,八卦与《河图》、《洛书》有关。西汉扬雄说:“河序龙马,洛贡龟书。”据说古代黄河中有龙马背负《河图》,洛水中有神龟背现《洛书》,伏羲据以画成八卦。而《河图》的出现处,就在洛水流入黄河的地方,即今河南巩义市境内。《洛书》的出现处在今河南洛宁县境内的洛水上。因此,不管哪个说法,都指明八卦最早是在中原产生的,是伏羲所画的。

伏羲是传说中的三皇之一，活动于今河南淮阳一带。他造网罟，造书契，教民田猎畜牧。淮阳人至今称他为“人祖”。相传为伏羲摆八卦用的蓍草，至今仍在淮阳太昊陵边长得很旺。

伏羲是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志，不同于一般神话。传说中伏羲所做的事，都是当时中原渔猎畜牧情况的反映。

伏羲八卦虽然只有阳爻“—”和阴爻“--”两个基本符号，但却代表了世界上万事万物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

由阳爻“—”和阴爻“--”组成的各个卦象，反映了宇宙间事物对立统一的现象。

八卦中相反的卦象，以阴阳两爻互易，表示事物的相互转化。

这些都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八卦的产生，是中原人对客观世界进行哲学思辨的结果，也是他们抽象思维能力的大飞跃。

商朝末年，被商纣王囚禁在羑里（在今河南汤阴）达六、七年之久的周文王，有机会接触到中原的八卦思想，对它进行系统整理，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并写了卦辞和爻辞，编成了《周易》古经，把八卦中的辩证法思想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

二、诸子哲学

诸子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光辉的一页。

所谓诸子，司马迁归纳为儒、道、法、名、墨、阴阳六家，班固又加入纵横家、农家、杂家，称为九派。

这些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大都是中原人。

孔子虽是鲁国人，但祖籍为今河南夏邑，曾祖父才迁到鲁国。他周游列国时，也主要活动在中原。

（一）道家老子和庄子

除儒家之外,道家是对后世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学派。

道家的创始人为老子,主要代表人物是庄周。他们都是中原人。

1. 老子的思想

老子,姓名有争论,有人认为他姓李,名耳;有人认为他姓老,名聃。春秋晚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任东周王朝守藏室之史,负责管理图书,饱览文物典籍。

老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老子》一书中。《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专著。

(1) 世界观

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天下万物都是由道产生的。这就第一次明确否认了夏商以来认为天是最高主宰的观点,提出了天地起源的新学说,把中国理论思维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老子又认为,道是无目的、无意志的,道生万物是自然而然的。它听任万物自然而然发展,从来不想去支配主宰万物。这就叫“无为”。这种自然无为观点是道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对后世影响极大。

老子还认为道是“先天地生”(《老子》二十五章)的,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从而反映了老子思想的客观唯心主义实质。

(2) 辩证法

老子思想中有丰富的辩证法内容。他认为事物都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它们“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老子》二章),互相联系,互相依存。

老子已认识到对立面是可以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他强调“正复为奇,善复为妖”(《老子》五十八章),“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老子》四十二章)。他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老子》五十八章),已成为千古名言。

从矛盾转化的观点出发,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老子强调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策略思想。这种贵柔学说,是老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3) 认识论

在认识论上,老子轻视感性认识的作用。他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老子》四十七章)认为不用感觉和实践经验,只要关起门来体验,就能认识天下事物。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先验论。

老子还否定学习的必要性,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绝学无忧”(《老子》二十章),把“为学”与“为道”对立起来。这在思想史上有很大消极影响。

但老子又提出“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的认识方法,主张排除感情欲望对于认识的干扰,这又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4) 历史观

在历史观上,老子认为生产能增加财富,也刺激贪欲,贪欲造成社会动乱。因而主张取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甚至连文字也不要,让历史倒退到古代去。

老子理想的社会是“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这种开倒车的思想不利于社会发展。

(5) 人道观

在人道观上,老子以“无为”作为人生的最高准则。他主张效法道,顺应自然,不要随意妄为。奉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老子》五十七章)的无为而治政策。

基于这种思想,老子对当时社会进行严厉批判。他反对贵族夺权战争说:“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

章)“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老子》三十一章)

老子把“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的贵族骂作“盗夸”(强盗头子)。(《老子》五十三章)他抗议统治者说:“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

这些话,表明老子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

然而老子又主张愚民政策。他说:“民之难治,以其智多。”“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子》六十五章)要“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老子》三章)。他一边同情人民,一边又为统治者出谋献策,思想上充满矛盾。

老子学说,不但直接影响了黄老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道教和佛教,而且对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发展都产生过影响。

2. 庄子的思想

庄子(约前 369—前 286 年),姓庄,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民权)人。出身贫寒,早年做过漆园吏,以后视富贵如浮云,以打草鞋、捕鱼为生,“终身不仕”(《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的思想主要反映在《庄子》一书中。

(1) 世界观

庄子继承老子思想,也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认为天地万物皆由道生。庄子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庄子·大宗师》)又说:“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他用“自本自根”的道解释宇宙万物的形成原因和运动规律,这是老子道中积极成份的发展,有合理因素。

但庄子又把道看成是人类的主观精神,认为人得道后,就能使“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这就把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发展为唯心主义。

(2) 人道观

在 人道观上,庄子继承老子的自然无为思想。认为“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庄子·在宥》),强调“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宣扬任其自然的人生哲学。

庄子主张维护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一切人为的束缚,认为自然的一切都是好的,人为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如果以礼乐、仁义来规范人类活动,人就丧失了自然天性;认为人类生活只有任其自然,摆脱是非、名利、生死的纠缠,就能超出一切利害得失的考虑,解除一切痛苦,达到一种无条件的绝对自由境界。

这种观点对反抗统治阶级的思想桎梏,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消极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后世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盛世通常持积极入世态度,而在衰世大多持消极避世态度,就与这种思想有关。

(3) 认识论

庄子用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他认为人的认识,任何时候都有片面性和局限性,从不同角度观察事物,就有不同的结论。这种观点含有要求克服主观片面性的合理因素,但认为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也是其认识论的一个缺陷。

庄子又认为,客观事物很难认识,“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养生主》)。这种观点促使人们积极思考问题,有积极意义,但由认识上的相对主义走向不可知论是错误的。

庄子主张将“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的差别等同起来,回到无差别境界中去。这只能是一种幻想。

(4) 道德观

庄子认为德是人和物的自然禀赋,“德在于天”。他说:“形非道不生,道非德不明。”又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庄子·天地》)他主张保持各人天赋的固有美德。他认为所谓“至人”、“真人”、“圣人”,都是“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刻意》)的人。

庄子还认为圣人、凡人在德上一律平等,天赋的德都一样多,只要不亏损,就是全德之人。任何人只要能保持固有的美德,就应受到尊敬。这种观点是有进步意义的。

(5) 美学思想

在美学上,庄子强调自然美,主张一切任其自然,反对人为。他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庄子·刻意》)他还认识到美具有超越狭隘功利的特征。反对人们为追求世俗美而做出“伤生”、“害生”的错误举动。

这种对美的自身价值和特征的认识,为儒家美学所不及,对后世影响极深。

由于庄子思想的复杂性,后世思想家中,积极的、消极的,先进的、落后的,官方的、非官方的,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的,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但总的来说,在中原古人中,庄子是对中国文化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在文学上,《庄》、《骚》并称;在哲学上,魏晋玄学、唐代禅宗、宋明理学,都从庄子著作中获得过营养;在诗歌、艺术、美学上也产生过深广影响。

(二) 法家商鞅、申不害和韩非

除儒家之外,法家是对后世中国政治影响最大的学派。

法家代表人物大都出生在中原,其中最有名的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

1. 商鞅的思想

商鞅(约前 390—前 338 年),原姓公孙,名鞅,因有功受封商地(今陕西商县)十五邑,故称商鞅。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人。先任魏相公叔痤家臣,后任秦国左庶长、大良造等职。

商鞅曾在秦孝公支持下,实行变法,废除分封制和世袭制,奖励军功;废井田,开阡陌,发展耕织;实行郡县制,统一度量衡;制订法

律,以法治国。加速了秦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并为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商鞅的思想和言论,大部分都被他的后学记载在《商君书》中。

商鞅思想的核心是主张并坚持法治。他还提出辩证的历史发展观,强调古今之变。他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商君书·更法》)主张在不同的时代采取不同的政治法律措施。这对后世思想家产生了很大影响。

2. 申不害的思想

申不害(约前 385—前 337 年),战国时郑国京(今河南荥阳)人。曾任韩昭侯之相十五年。

申不害思想的特点是重视“术”。他认为,除了实行法治之外,国君还必须讲究统治术,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在他看来,“法”是公开的硬性规定,“术”是国君专用的藏而不露的权术手腕,光有“法”是不够的,还要有“术”,才能对付那些寇盗和不忠之臣。

申不害的著作已失传,他的部分思想因《韩非子》而保存下来。

3. 韩非的思想

韩非(约前 280—前 233 年),战国后期韩国(今河南新郑一带)人。他是战国时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韩非的思想主要保存在他所著的《韩非子》一书中。

作为法家人物,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赵国人)重“势”。他们都从不同角度建立封建主义的政治学,但各有所偏。韩非的贡献就在于把“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法家理论体系。

“法”指实行法治的一整套刑罚制度,“术”指君主驾驭臣民的政治权术,“势”指威势,就是君主凌驾一切的高位和权力。在三者之中,韩非把“势”看作核心,主张处“势”握“法”而用“术”。这种思想,后来

长期成为封建帝王的统治法宝。在历史上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影响。

在历史观上,韩非强调社会进化,反对“是古非今”的倒退行为,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行”、“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的发展思想。

在认识论上,韩非提出“参验”的唯物主义观点。主张通过参照比较,根据实际情况,对认识进行验证。例如要判断刀是否锋利,就要用它宰杀牛羊进行考察。韩非说:“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认为一种意见,如果未通过“参验”检查就相信它,是愚蠢的;依据不能相信的意见办事,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辩证法上,韩非吸取并发展了老子思想,第一次使用“矛盾”二字。他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矛盾无所不在。只要具有一定的条件,矛盾的双方是可以转化的。转化时,内因起决定作用,外因也必不可少。他说:“木之折也必通蠹,墙之坏也必通隙。然木虽蠹,无疾风不折;墙虽隙,无大雨不坏。”这些观点都是很深刻的。

作为荀子的学生,韩非不但接受而且发展了老师的“性恶论”观点。他认为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私利,人与人之间都是互相算计对方的利害关系,从而否定道德的社会作用。这在理论上是片面的。

(三) 墨家创始人墨子

墨子(约前 468—约前 390 年),姓墨名翟,战国初期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人,一说今河南鲁山人。曾任宋国大夫。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家是战国时唯一能与儒家长期抗衡的学派,当时称儒墨两家为“世之显学”。

墨子出身低下，做过工匠，长期生活在劳动群众之中，掌握有丰富的生产技能。

墨子的思想言论，由他的弟子们记录下来，保存在《墨子》一书中。

墨子生活在动乱年代。他认为社会动乱的原因，是由于人们彼此不相爱。为了制止社会动乱，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要求人们之间互相献爱心。你爱我，我爱你，人人互爱；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好处，人人互相给好处。

从“兼爱”的观点出发，墨子提出“非攻”的主张，反对各国之间的兼并战争，认为战争影响农时，浪费财力。

在用人问题上，墨子提倡“尚贤”，反对任人唯亲，认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主张各级官员，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担任。“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

针对当时贵族社会的奢侈浪费、享乐腐化和厚葬习俗，墨子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其中除全面否定音乐的“非乐”思想带有明显片面性外，其余都是有进步意义的。

在认识论上，墨子第一次提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三条标准：“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即以过去的历史经验，当时群众的直接感觉经验和实际运用的社会效果为依据，来确定某种言论主张的是非，反对个人凭空臆想。这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真理观，对后世影响深远。

墨子反对天命论，认为人的成功与否不是由“命”而是由“力”决定的。“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原因不在于“命”，而全靠自己的力量。这是对人类劳动和自身力量的肯定。

墨子和他的门徒们，都具有劳身苦志、见义勇为的品格，在先秦独树一帜。

（四）名家邓析和惠施

名家是研究名称与实在、抽象概念与具体事物之间关系的学派。名家的研究范围，涉及概念、判断、推理等许多领域，他们对中国古代逻辑学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所以有人把名家称为逻辑学家。

名家以邓析为祖师，以惠施和公孙龙为主要代表。邓析和惠施都是中原人。

1. 邓析的思想

邓析(前 545—前 501 年)，春秋末郑国(今河南新郑一带)人。为名家创始人。曾任郑国大夫，反对礼治，主张法治。著作已佚，其思想资料记载在《吕氏春秋》等书中。

邓析注重分析名词概念的异同，认为名词概念必须具有确定性；重视名实关系的研究，坚持名实一致的逻辑思想。

子产在郑国执政时，邓析曾教人用“县书”(大字报)批评朝政。子产下令禁“县书”后，邓析又教人用“致书”(寄信)批评朝政。因为“县书”的概念不能包括“致书”在内，所以对“县书”的禁令，管不了“致书”。

邓析熟悉法律，经常钻法律条文概念不清的空子，替人打官司，故慕名向他学习的人很多。

2. 惠施的思想

惠施(约前 370—前 310 年)，战国时宋国(今河南商丘一带)人。曾在大梁(今河南开封)任魏相十五年，颇有政绩，魏惠王将他比作管仲。著作已佚，其学说散见于《庄子》等书中。

惠施博学善辩，为名家“合同异”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事物之间既有差异性又有同一性。而他着重研究事物差异中的同一性，合异于同，所以称为“合同异”派。

惠施还提出“山与泽平”的命题，说明山之高和泽之低都是相对的。因为地球上有的山(海拔低的山)和有的泽(海拔高的泽)确实是

一样高的。

惠施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由小得无法再小的“小一”构成，又都包含在大得无法再大的“大一”之内。因此，“一”便是万物的同一性。

惠施又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化之中，因而都是相对的。天上太阳正中的时候也就是它开始西偏的时候，生物开始生长之时也在开始走向死亡。

惠施能在联系和发展中看到事物差异的相对性，这对人类认识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贡献。

（五）兵家吴起和尉繚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战争频繁。许多优秀的军事家，总结战争经验，探索军事理论，著书立说，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兵家。

中原兵家代表人物是吴起和尉繚。

1. 吴起的思想

吴起（前 440—前 381 年），战国早期卫国（今河南濮阳一带）人。曾任魏国西河守、楚国令尹等职。

吴起曾著《吴起兵法》，在军事上与孙武齐名。现存《吴子》6 篇，虽是后人整理，但仍可以看成是吴起的兵书著作。

吴起强调“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吴子·图国》），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他认为，国家不团结，军队不团结，战阵不整齐，官兵不齐心合力作战，就没有胜利的把握。

吴起认为，发生战争的原因有争名、争利、仇怨、内乱、饥饿五种。战争的性质也可因此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五种。对不同性质的战争，应采取不同对策。

吴起强调知己知彼，首先了解敌方的虚实，然后根据形势，制订正确的战略战术。

吴起主张军纪严明，赏罚必信。兵不在多，而贵精。

吴起反对在战争中优柔寡断,认为“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吴子·治兵》),选择将帅时应把有勇有谋、善于决断作为重要标准。

2. 尉繚的思想

尉繚,战国时魏国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他曾对魏惠王讲述用兵作战的方法。在《尉繚子》一书中反映了他的一些军事思想。

尉繚认为,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是表和里的关系,也就是说,军事是由政治决定的。

尉繚认为,经济是军事之本,打仗要不夺农时,不损民财。

尉繚还强调战争的正义性,用兵的目的只能是“诛暴乱”,“禁不义”。

(六) 杂家吕不韦

杂家的特点是为了适应全国统一需要,兼采各家学说之长,把各家学说融合在一起。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

吕不韦(?—前235年),战国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人。曾任秦相国,封为文信侯。

吕不韦任相国期间,组织门客,汇集百家有用观点,重铸新篇,编成《吕氏春秋》二十六卷。其中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一百六十篇。

《吕氏春秋》全书体例统一,各篇有内在联系,是按一定计划进行编写的。书中对诸子百家思想按主编吕不韦的观点加以取舍,大致说来,对道家吸收其关于世界具有统一本原的自然观,反对其消极避世的倾向;对儒家,则吸收其德治、仁政学说和教育理论,抛弃其法古观点;对法家,则吸收其因时变法,重视耕战,赏罚分明的主张,但反对轻罪重罚;对墨家,则吸收其节用、薄葬的思想,但反对其“明鬼”、“非攻”、“非乐”的做法;对名家,则赞扬其能言善辩,但反对其诡辩。

《吕氏春秋》虽云杂家,但杂家亦自成一家,并非胡乱杂凑。其写

作目的,是在吸收各家比较合理、进步的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一套具有综合性的新思想,指导秦国统一大业和长治久安。

第二节 两汉魏晋南北朝唐代哲学

一、两汉哲学

两汉时期,中原出现了贾谊、桑弘羊、张衡、荀悦等一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的思想家。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当时中国其他地区所罕见的。

(一) 贾谊的思想

贾谊(前 200—前 168 年),西汉洛阳人。二十多岁被朝廷召为博士,很快提升为太中大夫。因遭元老重臣嫉妒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召回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后,他忧郁而死,年三十三岁。他的思想主要反映在《新书》和《鹞鸟赋》等著作中。

1. 唯物主义宇宙观

贾谊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阴阳二气生成的。他说:“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鹞鸟赋》)

2. 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贾谊认为,世界上的事物时刻都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中。他说:“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

贾谊还具有事物向对立面转化的思想,认为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充满矛盾,祸福、吉凶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并依一定条件转化为对立面。他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

贾谊还认识到,事物转化时,人的主观能动性起很大作用。他说:

“夫灾与福也，非粹在天，必在士民也。”“受天之福者，天不为功焉；被天之灾者，则亦无怨天矣，行自为取之也。”认为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

3. 反对生而知之的认识论

贾谊认为，人非生而知之，知识来源于后天的学习。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就能洞察世界，预知人间祸福和治乱安危，防患于未然。

贾谊主张变革，富有进取精神，他的思想在当时是很进步的。

（二）桑弘羊的思想

桑弘羊（前152—前80年），西汉洛阳人。出身商人家庭。曾任大农丞、御史大夫等职，他的思想主要记载在《盐铁论》一书中。

1. 进步的历史观

桑弘羊认为，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世殊而事异”（《盐铁论·国病》），人们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所施”（《盐铁论·大论》），大胆革除陈规陋矩，不能“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盐铁论·利议》），甚至“称往古而訾当今”、“道古以害今”（《盐铁论·刺复》）。

这些观点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2. 否定“天人感应论”

汉代统治者宣扬天人感应，不少人相信天命，认为“为善于下，福应于天”，作恶会“天报以恶”，出现“阴阳不调”、“水旱不时”的灾难。

桑弘羊认为，水旱系自然现象，与人的善恶无关。禹、汤是圣君，当时也有洪水和大旱。

3. 肯定功利原则

当时有人说：“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盐铁论·错币》）并借此批评桑弘羊违背先王之道，“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盐铁论·敦学》）。

桑弘羊说：“天下穰穰，皆为利往”（《盐铁论·毁学》），要想“国富

民强”，就不能不言利。“贫贱而好义，虽言好义，亦不足贵者也。”（《盐铁论·毁学》）古代贤君子如子贡、陶朱公都“以货殖尊于当时”（《盐铁论·贫富》）。

桑弘羊主张语言行动皆以功利实效为目的的思想，与晏婴、管仲、司马迁的思想一脉相承。

4. 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桑弘羊说：“多见者博，多闻者智。”“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盐铁论·刺议》）他认为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并认识到个体认识不如群体认识可靠、全面。

（三）张衡的思想

张衡（78—139年），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曾任南阳主簿、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他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灵宪》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1. 唯物主义宇宙观

张衡认为，宇宙形成阶段名为“太素”。太素之前是虚无。他说：“太素之前，……寂寞冥然，……其中唯虚，其外唯无。”“如是者永久焉，斯为溟粹，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灵宪》）

张衡所说的太素就是元气，是道的主干。“道干既有，万物成体”。他将元气作为万物起源的基础，认为万物是经过元气运动形成的。

张衡还用时间和空间来阐述宇宙的本质。他说：“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认识到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二者不可分离。

张衡还指出，宇宙形成之后，并无文化，要经过人类的创造才能产生历史文明。

张衡根据当时的天文知识，肯定了宇宙的物质性和无限性。他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就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为基础的。

2. 对谶纬的批判

讖纬起于西汉末年,是方士儒生们编造的充满迷信的政治预言。刘秀用它证明自己的政权是上天安排的。它在东汉时成为一种思潮,依傍、比附经义,成为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汉章帝时,在首都洛阳召开白虎观会议,班固据会议内容写成了《白虎通义》,对社会生活、国家制度和伦理原则等作了基本规定,成为一部权威性的法典。

《白虎通义》中许多观点是根据讖纬书写的。在东汉,凡经说分歧,国家礼乐制度等,都要以讖纬来决断。

张衡生于白虎观会议前一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讖纬盛行的时期。为了揭露讖纬的虚妄,他在汉顺帝时,上书朝廷,对讖纬进行批判。他说:古代并无讖纬书,西汉成帝、哀帝以后才出现。书中矛盾百出,“皆欺世罔俗”(《后汉书·张衡传》),根本不是圣人之言。并请求禁绝讖纬。

汉顺帝是一个视讖纬如生命的皇帝,张衡却敢于在他面前指责讖纬的荒谬,充分表明张衡为坚持真理而无所畏惧的胆识。

(四) 荀悦的思想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东汉颍川郡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曾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等职。

荀悦是东汉末年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所著《申鉴》五卷,为其哲学思想方面的代表作。

荀悦提倡“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人是君子,性善;下品人是小人,性恶;中品人则善恶相混。主张对君子用礼教,对小人用桎梏,对中人则刑礼兼用。

荀悦坚持无神论。他反对讖纬、神仙方术等宗教迷信,认为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来源于气。

荀悦坚持“霸王道杂之”的汉代传统思想。反对“峻刑害民”和超过法令规定的赋役。

荀悦的思想,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性三品说”还对唐代韩愈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魏晋玄学

东汉末年,经过数十年战争动乱,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哲学失去势力,代之而起的新思潮是玄学。

玄学在形式上与儒学相近,但思想本质与儒学不同。它是将道家的《老子》、《庄子》与儒家的《周易》、《论语》结合在一起,用来阐发玄理而构筑成的一种思辨体系。

玄学起源于中原,玄学思潮的中心始终在中原,主要代表人物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除嵇康外,也都是中原人。嵇康虽为谯郡铨(今安徽宿县)人,也长期住在中原。

糅合儒道学说的玄学,继承道家思想,克服汉代经学弊端,较深入地探讨了宇宙的本原问题,注意探求人生意义和个性的价值,提出了一些新范畴和新概念,丰富发展了中国哲学,对佛学和宋明理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它对中国知识分子玄远清虚生活情趣的形成,对古代名士思想的产生,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 何晏的思想

何晏(约193—249年),字平叔,曹魏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祖父何进,汉末谋诛宦官被害,何晏为曹操收养。齐王芳在位年间,何晏曾任侍中、尚书等职。

何晏熟读《老子》、《庄子》和《周易》。所著《论语集解》,收入《十三经注疏》,流传至今。又著《周易辞》、《道德论》、《无名论》等。

1. 引道释儒

何晏和王弼同为玄学创始人。

何晏建立玄学的方法是,通过注解儒家经书,用道家思想补充、

改造儒学的原有内容,将儒家与道家结合起来,成为由儒学通向玄学的开山之祖。

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他就在“颇为改易”中做文章,对儒学添加新成分。

《论语》“温故而知新”,原意为知其故即知其新(知道它的过去,就知道它的现在)。何晏却注为:“寻绎故者,又知新者,可以为师矣。”

《论语》“仁者乐山”章,何晏注云:“自然不动,而万物生焉。”这是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翻版。

《论语》“一以贯之”章,何晏注云:“不待多学,一以知之也。”这是道家“少则得,多则惑”、“绝学无忧”思想的再现。

2. 贵无论

何晏还发展了道家思想,进一步提出新道论。

何晏所说的道与老子的道不同。老子的道,“其中有象”,“其中有形”;何晏的道,为无象可见、无物可寻的虚无。老子认为人类对道可以认识掌握;何晏认为道不可知。

老子还有“有无相生”的辩证观点,何晏却认为万物皆生于无,无是宇宙的本体。他在《道论》中说:“有之为有,恃无以生,事而为事,由无以成。”这种贵无思想是何晏玄学世界观的基础。

(二) 王弼的思想

王弼(226—249年),字辅嗣,曹魏河内山阳(今河南修武)人。曾任尚书郎,二十四岁病亡。

王弼是曹魏正始年间与何晏并称的玄学家,著有《老子注》、《周易注》、《周易略例》等。他的哲学观点与何晏相似,但更深刻。

1. “以无为本”的本体论

王弼说:“万物皆由道而生”,而“道者,无之称也”。(《老子》第三

十四章注)又说:“凡有皆始于无。”(《老子》第一章注)他认为无是世界的根本。“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老子指略》)。

王弼的无,功用很大。他说:“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成者也。阴阳恃之以化生,万物恃之以成形,贤者恃之以成德,不肖者恃之以免身。”

王弼还认为万物都有必然性。他说:“物无妄然,必有其理。”这个观点对宋明理学有相当大的影响。与何晏一样,王弼的思想本质也是客观唯心主义。

2. “得意忘象”的认识论

魏晋玄学盛行清谈,讲究言辞内容和表达形式。王弼用言(言辞、论说)、象(图象、形象)、意(义理、思想)三个概念说明人们认识事物的方法和过程。他认为意是认识的目的,言和象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由于王弼认为“言生于象”,“象生于意”(《周易略例·明象》),所以他主张“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其中“得意忘象”思想含有透过现象,寻求本质的合理因素。对后世绘画、书法、诗歌影响极大。艺术创作中传神、写意理论,意境说,提倡弦外之音、画外之景等都是“得意忘象”思想的反映。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

3. 用自然统御名教的观点

名教指封建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是儒家强调的东西。自然指人的自然本性和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是道家提倡的东西。王弼认为,名教是末,自然是本。主张“举本统末”,用自然统御名教。顺自然之性而导入名教的规范。

(三) 阮籍的思想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曹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职。

阮籍与嵇康齐名,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重要的思想家。著有《阮

步兵集》，其中《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等，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1. “天地生于自然”的宇宙观

阮籍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达庄论》），万物各种各样，但本质上是相同的，皆统一于气。而天地万物都是自然而然地生成的。

2. 名教与自然的对立观

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阮籍反对名教，崇尚自然，认为儒家的名教违背自然。他向往没有君主和名教的社会，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称礼法为“天下残贼、乱危、死亡之术”（《大人先生传》）。

阮籍借酒谈玄，公开攻击名教，嘲笑礼仪。他讽刺那些循规蹈矩的儒士为裤裆里的虱子。说他们寄生在裤裆里，自以为是好住处；行不敢离裤缝，自以为有规矩；饿了咬人，自以为有吃不完的食物。其实它们的命运与裤子联系在一起。一旦裤子破了，扔到火里，这些可怜虫便被一起烧死。

阮籍傲然自得，任性不羁，从来不把权势放在眼里，平时不多说话，常用眼神表示他对人和事的态度，赞成的就以青眼相看，反对的就以白眼相待。魏晋玄学家的名士风度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四）向秀和郭象的思想

向秀（227—272年），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陟）人。曾任西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职。

郭象（252—312年），字子玄，西晋河南（今洛阳）人。曾任黄门侍郎、太子主簿等职。

向秀注《庄子》（书名《庄子隐解》），尚有《秋水》、《至乐》两篇未完，便不幸去世。郭象在向秀注本的基础上，补注《秋水》、《至乐》两篇，又对全书“广而述之”（《晋书·向秀传》），加以扩充修改，撰成《庄

子注》一书。当时人将它与王弼《老子注》并称，称郭象为“王弼之亚”（《世说新语·文学》注引《文士传》）。

《庄子注》一直流传至今。书中哪些部分是向秀原有的，哪些部分是郭象新添的，已很难分清。一般认为，该书是他们二人的共同成果。

向秀和郭象的思想基本相同，他们标志着玄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现以《庄子注》为依据介绍郭象的思想（向秀的观点自然也包括在内）。

1. “以有为宗”的崇有论

魏晋玄学分为“贵无”和“崇有”两个学派。郭象用“以有为宗”作他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否定王弼“以无为本”思想。

郭象认为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存在，在它背后没有，也不需要有一个“无”来作为它的本质和存在依据。一切事物都“变化日新，未尝守故”（《庄子·秋水》注），“天地万物，无时不移”（《庄子·大宗师》注），这就是世界的本质。他将现象和本质统一在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比王弼进步。

2. 万物自生学说

有神论者认为，世界是人格神创造的。王弼说“有生于无”，用“无”代替神。郭象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否认精神的东西能创造物质的东西。郭象又说：“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庄子·在宥》注），“造物者无主，而物自造”（《庄子·齐物论》注）。他用自生说否定造物主的存在，包含有无神论因素和唯物论倾向。

但郭象又把“物自生”称为“独化”。“独化”是郭象思想体系中的独有概念，意思是：每个事物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进行、无条件无原因、不必借助外力，事物之间没有任何内在联系，不会互相转化。这就带有唯心主义神秘色彩了。

3. 名教与自然的统一观

玄学的基本观点是崇尚自然，但对名教的态度有分歧。何晏、王

弼“贵无”，认为自然和无，名教和有，具有相同意义，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是自然的反映，应顺其自然。主张以自然统御名教。阮籍、嵇康强调自然与名教对立，认为名教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是束缚人性的绳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带有强烈的反儒倾向。

郭象采用折衷态度，主张名教即自然，想把儒家的名教观念和道家的自然观念调和起来。他认为，名教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是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名教和自然是一致的，遵守名教就是顺从自然。

郭象说：“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庄子·逍遥游》注）又说：“圣人常游外以弘内，无心以顺有，故虽终日挥形，而神气无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庄子·大宗师》注）。“游外”是崇名教，“冥内”是任自然。认为达官显贵，虽过世俗生活，只要精神清高绝俗，就跟在山林中当隐士一样。

这种既可当大官，过享乐生活，又可做名士，享清高之名的学说，是当时世家大族生活哲学的反映。

三、无神论思想家范缜

范缜（约450—约515年），字子真，南朝舞阴（今河南泌阳）人。曾任南齐宜都太守、梁晋安太守、中书郎等职。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无神论思想家。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危害。范缜著《神灭论》，对佛教宣扬的因果报应和神不灭思想进行了有力批判。

《神灭论》是用问答体写的。范缜针对佛教的“神可以离形”，形死而神不灭的观点，针锋相对提出“形神相即”、“形质神用”的观点。

范缜认为，形和神是统一的，“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谢”，二者不能分离。又认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人的形体是精神的物质

基础,人的精神是形体的功用。形体和精神不是两个不同东西的组合,而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二者不是并列的,精神作用从属于物质形体。人的形体死亡,其精神作用也必然随着消灭。这就犹如刀刃与锋利的关系一样,有刀刃才有锋利,倘若刀刃没有了,锋利也就不存在了。

范缜发表《神灭论》之后,遭到佛教徒群起反对。南齐宰相萧子良曾派人利诱他放弃神灭观点,他表示决不“卖论取官”。梁武帝除亲撰《敕答臣下神灭论》对范缜施以高压外,又指使曹思文等64人写七十五篇文章对范缜进行围攻。范缜据理答辩,毫不屈服。

范缜的《神灭论》在形神关系上坚持唯物主义一元论,是中国哲学史上辉煌的无神论文献。关于形神关系的论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无人超过他的水平。

四、韩愈的哲学思想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曾任监察御史、刑部侍郎、潮州刺史、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韩愈对后世文化影响很大。他不仅是著名文学家,在哲学思想上也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原性》、《原道》、《谏迎佛骨表》等。

(一) 性情三品说

在儒家思想中,对人性问题的看法,意见不一。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不言善恶,只讲后天形成的习性。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扬雄认为人性“善恶混”。荀悦等人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

韩愈继承人性分上、中、下三品说,又加进了情,第一次提出性情三品说,使性与情统一,成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互为补充。

韩愈说,性是人的先天素质,情是接触外界后产生的内心反应。性的内容为仁、义、礼、智、信五种品质,情的内容是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情绪。他把性分为上、中、下三品,情也与之相对应。上品人,纯善;下品人,全为恶;中品人,介于上、下二品之间,可导至为善,也可迷失为恶。

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论”曾受到韩愈性情三品说的影响。

(二) 道统论

韩愈宣扬“圣人”史观,他认为:“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原道》)

韩愈还把儒家仁义道德说成是“圣人之道”,并按历史顺序,提出一个圣人传道系统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他自己以孟轲之后的正统自居,宣称“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的道统论,不是整个中国的传统思想,但却为儒学本身的发展理出了线索。

中国过去只有君统,不提道统,韩愈把道统独立出来,对促进儒学发展有积极作用。

韩愈的道统论也是针对佛教的“法统”而提出来的。韩愈认为,孟轲之后,儒家道统中断,结果佛道思想统治人们头脑,他要在中国恢复道统,反对将“夷狄之法”加在“先王之教”之上。这迫使以后的佛教更加中国化。

宋代理学把韩愈的道统框架全部接受过来,以正统自命,但就是不承认孟轲和韩愈为道统中人,而自称直接继承孔子。

(三) 反佛观

唐代佛教泛滥成灾,有识之士纷纷反对。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

对佛教进行了严厉批判。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要把存在凤翔法门寺里的一枚佛骨迎进皇宫供养,韩愈写了有名的《谏迎佛骨表》进行反对。

韩愈说:佛教传到中国之前,国泰民安。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乱亡相继”,“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韩愈建议烧毁佛教经典,没收寺院财产,勒令佛教徒还俗,销毁佛骨,“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

韩愈还在《原道》中,将佛教斥之为异端,指责佛教徒不忠不孝。他以先王之道和君臣大义为武器,把反佛教斗争,说成是正统与异端斗争,就比光说僧侣不劳而获、寺院霸占土地等更有理论力量。

韩愈以儒反佛,不是用无神论反佛。韩愈本人,相信因果报应,相信天命,相信有鬼神。但反佛符合当时人民利益,因而受欢迎,有进步性。

第三节 宋元以来哲学

宋元以来,中原是理学的最早发源地。

理学初创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明代以后,理学日益保守僵化,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新生产关系萌芽。

在批判理学的过程中,中原又产生了几位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一、宋元理学

宋元时期,中原地区在思想史上的贡献,是产生了邵雍、二程、许衡等一批著名理学家。

理学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发展阶段。

广义的理学,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张载代表的气一元论哲学,二程、朱熹代表的理一元论哲学,陆九渊、王守仁代表的心一元论哲学和邵雍的先天象数学等。

理学中的气一元论哲学,论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把古代的气一元论发展到新水平。理一元论哲学,在认识论上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心一元论哲学,强调独立思考,也起过积极作用。

狭义的理学,指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是理学中最大的学派,它奠基于程颢、程颐,完成于朱熹。

朱熹为二程的第五代传人。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特别是程颐)思想。后人将他们的思想合起来,称为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从南宋后期起,经元明清,一直为官方哲学,在思想界占统治地位,对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很大。

(一) 邵雍的思想

邵雍(1011—1077年),字尧夫。祖先居范阳(今河北涿州),幼年随父迁居共城(今河南辉县),长大后曾隐居共城苏门山百源,人称百源先生。后移居洛阳安乐窝。一生未做官,死后赠秘书省著作郎。

邵雍原籍虽不在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一个地道的中原人。他是宋代百源学派的创始人。

邵雍曾著《皇极经世书》,运用易理和易数说明宇宙起源、自然变化、社会历史变迁等。书中有许多图式,是古代哲学中著名的象数学著作。

邵雍的思想基本上属客观唯心主义。他认为“道为天地之本,天地为万物之本”,又认为“道为太极”,所以在他看来太极是宇宙的本原,天地万物都是由太极产生的,而天地万物又是按照先天象数学的图式生成的。

先天象数学为象数学的一种,是邵雍自己创立的学说。象数学自秦汉以来就有,要旨是用形象化、符号化的八卦图象和数字表明各种事物的性质和联系。邵雍将道士陈抟提出的“先天图”与过去的象数学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故称先天象数学。邵雍所说的“先天”指自然的本来原则,“后天”指人为的规定。

邵雍的先天象数学,在数理逻辑和符号逻辑上有一定价值,但用它来解释宇宙起源和自然变化就不对了。

邵雍还按象数把历史进程分为若干周期,认为每个周期,都是由盛而衰,循环往复。这就掉进了历史宿命论的泥潭。

但邵雍思想对后世理学、易学、术数都有影响。朱熹在《伊洛渊源录》中把他称为理学创始人之一。

(二) 二程的思想

二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二人。他们是理学的奠基者。由于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他们的学说又被称为“洛学”。

洛学是北宋建立后一百多年学术文化发展的结果,也吸收了宋以前的思想成果,如道统论来源于韩愈,人性论来源于唐李翱《复性书》等。

二程以儒学为基础,综合前人思想,又采用释道二家观点,加以创造,建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他们的思想有不少合理因素,与简单粗糙的旧儒学不同,又与佛道哲学有本质区别。

二程冲破旧儒学章句训诂框框,直接探索五经义理;重视内心体会,废除师承家法束缚;提出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使古代哲学的天人关系之争转为理气之争,更富理论色彩。

程颢与程颐的思想基本相同,但也有差别。程颢为主观唯心主义,以心解理,开陆王心学之先声;程颐为客观唯心主义,把理与气相对论述,开朱学之先声。

1. 程颢的思想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学者称明道先生,北宋洛阳人。曾任晋城令、监察御史里行、京西路提点刑狱等职。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排挤出首都开封。四十岁以后,在洛阳以读书讲学为生。主要哲学著作有《识仁篇》、《答横渠先生书》等。

(1) 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程颢把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并把天与理等同起来,合称“天理”,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他说:“天者理也。”又说:“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强调他自己对“天理”二字的发明权。

程颢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天理派生出来的。天理又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纲常关系都是天理的体现,不能违背。

程颢认为,天理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永恒存在。他说:“天理云者,……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故大行而不加,穷居而不损。”(《二程全书·遗书》卷二上)他还说理和道是一回事,“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理则谓之道”(《遗书》卷一三)。

程颢还认为,天理就在人们心中,“心是理,理是心”(《遗书》卷一三)。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标志。

(2) 先验论的认识论

程颢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事物,而是天理。由于天理在人们心中,要想认识真理,“体是(心)而已,何尝……外求乎!”(《遗书》卷四)他主张通过内省的体验认识世界。

程颢还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割裂开来,他说:“耳目视听而不能远也,气有限耳,心则无远近也。”(《遗书》卷一一)

程颢又将认识论与伦理道德挂钩。认为“蔽于人欲,则亡天理”,要认识世界,须“存天理,去人欲”。

程颢受孟子影响较大,他的认识论思想主要来源于《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尽心》上)的观点。

程颢为主观唯心主义心学的发轫者，他的思想开南宋陆九渊和明代王阳明心学之先声。

2. 程颢的思想

程颢(1033—1107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北宋洛阳人。程颢之弟。曾任崇正殿说书、西京国子监守等职。他基本上没做过什么官，一生主要从事讲学和著书。

程颢为学，以主敬为主，非圣人之书不观。自云平生不吃茶，不观画，布衣素食；冠襟必整，蔬饭必洁；不义之财，一芥不取。为人刚毅宽厚，疏通简易。他在思想史上的成就比其兄大，主要哲学著作有《周易程氏传》等。

(1) 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

程颢认为，世界由理和气两大因素构成。气是“行而下”的，有物质的性质，是构成世界的材料。他承认气是客观存在的。

程颢又认为，理即道，是“形而上”的，也是客观存在的。气是由理产生的，“有理则有气”(《经说》卷一)。在他的思想中，物质是由精神创造的。

程颢还认为，理按自己的规律行动，圣人也不能违背，只能“循而行之”(《遗书》卷一《语录》)。理不是心，也不是心的产物，而是独立创造万物的客观精神。这种观点与程颢的理即是心不同，表明程颢哲学思想中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

(2)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

程颢认为，认识活动，不能仅求之于心(也与其兄不同)，而要通过与外界事物广泛接触来取得知识。

程颢重视实践经验，把亲身经历的知识，称为“真知”。他还强调见闻之知的重要性，说：“闻见之知，……物交物则知之，今之所谓博物多能者是也。”(《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程颢认为，要认识事物，须经过亲身接触事物的格物实践。他说：

“今人欲致知，须要格物。”“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近思录》卷三）什么叫“格物”？程颐自己解释说：“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只有通过格物，才能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直接体悟天理。

这种格物致知的思想，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3）变易、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程颐受《周易》影响大，对变易观点坚信不疑，认为世界是不断变化的过程。

程颐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即向反面转化。他说：“屈伸往来，只是理，……物极必返，其理须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近思录》卷一）

至于转化的原因，程颐猜到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他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天地之化，既是两物（阴阳），必动而不齐。”（《宋元学案·伊川学案》）

在事物变化的观点上，程颐认为孔子的话也不全对。他说：“孔子谓‘上智与下愚不移’，然亦有可易之理，……使人肯学，亦有可易之理。”（《遗书》卷一八）这是很不容易的。

（4）无神论

程颐坚持无神论观点。有人问他：名山大川兴云致雨，是山神所为吗？程颐说：“气之蒸成也。”他又说：“今人……才有大旱，便去庙中祈祷，……于土木人身上讨雨露。土木人身上更复有雨露耶？”（《遗书》卷二二上）

程颐这种反对鬼神迷信的思想，成为理学的好传统，影响深远。后世理学家一般都能与鬼神迷信划清界线。

（三）许衡的思想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元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曾任京兆提学、国子祭酒、集贤大学士等职。他对促进民族思想

文化融合起过积极作用。

理学兴起于宋代,但在宋代长期未受到国家重视,只能作为一种私学,在书院传授。南宋后期虽然影响扩大,但仅限于南方一隅。到了元代,许衡等人才把它推向全国官学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六七百年间主要的精神支柱。

许衡坚持程朱致知、笃实的学风,又能取陆学反求自悟的本心论,兼汇朱陆二家之长。明代王阳明曾受他影响,他是宋明理学的中心环节。主要哲学著作有《中庸直解》、《大学直解》、《读易私言》等。

(1) 理生万物的唯心论

许衡认为,理是世界的本原,世上万物都是由理派生的,“有是理而后有是物”。又说:“凡物之生,必得此理而后有是形,无理则无形。”(《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许衡还认为,理不但产生万物,而且还主宰万物的发展变化。

(2) 矛盾消长论

许衡认为,事物内部有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共处于统一体中,互相依存。他说:“万物皆本于阴阳,要去一件去不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妇皆然。”(《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

许衡认识到,矛盾着的双方,不是势均力敌,而是以一方占主导地位,“两物相依附,必立一个做桩主”。

许衡又认为,事物内部矛盾双方的地位是会转化的。“盖消之中复有长焉,长之中复有消焉。”(《鲁斋遗书》卷六)“此一气消缩,彼一气便发达。”(《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天下古今,一治一乱;治无常治,乱无常乱;乱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乱焉。乱极而入于治,治极而入于乱;乱之终,治之始也,治之终,乱之始也。”(《鲁斋遗书》卷九《与窦先生书》)

许衡还认为,中庸的“中”也是随时变化的。他说:“时有万变,事有万殊,而中无定体。当此时,则此为中,于彼时则非中矣。当此事,

则此为中,于他事则非中矣。”(《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时既不同,义亦随异。”(《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中正之中,又有随时之义也。”(《读易私言》)

儒家把中庸的“中”,一般都解释为调和折衷,即审其两端,取中而用之。许衡的观点与此相比,有明显的进步。

(3) 知行统一观

许衡认为,“世间只有两事,知与行而已”(《鲁斋遗书》卷一《语录》上)。他主张知行统一,“知与行,二者并进”(《鲁斋遗书》卷二《语录》下)。

许衡坚持知是为了行的观点,求知是为了博古通今,用于当时。他说,孔子教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就是为求得真知后能“独行之”。

许衡与一般理学家“不亲庶务”、“口不言利”不同。他强调实践,认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许鲁斋先生年谱》)。“道”就在日用行事之中,不是高远难行的,“柴米细事”也当讲究。

(4) 人性变易观

许衡认为,人的天赋之性是善的。然而一旦作为具体的人,就受所禀之气的影 响,气有清浊不同,人性也有智愚美恶“千万般等第”(《许鲁斋集》卷三《论生来所禀》)。

但许衡认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阴阳(二气)也,盖能变之物,其清者可变而为浊,浊者可变而为清。”人性“美者可变而为恶,恶者可变而为美”(《许鲁斋集》卷三《论生来所禀》)。人们学习和修养的目的,在于去其昏蔽,复其明德,使人性向好的方面转化。

二、明代的唯物主义哲学

明代,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与此同时,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水平。

在批判程朱理学的过程中,中原出现了王廷相、吕坤等一批重要的唯物主义思想家。

(一) 王廷相的思想

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明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曾任监察御史、山东提学副使、湖广按察使、兵部尚书等职。他与李梦阳等合称“前七子”,与安阳崔铣等合称“中州四杰”。有著作数十种,大多收在《王氏家藏集》和《王浚川所著书》中,其中《雅述》、《慎言》等是他的哲学代表作。

王廷相是明代最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之一,他的许多观点,在当时处于时代前列。

1. 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王廷相继承中国古代元气论,提出“气为理之本”的唯物主义观点,对程朱“气根于理”的思想进行批判,把他们颠倒的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

王廷相认为,元气是宇宙的基础,“天地未生,只有元气”(《雅述》上)。从时间上讲,元气无所始,也无所终。世间万物,有生有灭,但宇宙间“此气常在,未尝澌灭”(《太极辩》)。从空间上讲,元气存在于一切地方,“天内外皆气,地中亦气,物虚实皆气,通极上下,造化之实体也”。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王廷相认为,“万理亦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太极辩》)。他说:“气为理之本,理乃气之载”,“元气之上,无物,无道,无理”。(《雅述》上)他指责程朱理学把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观点为“谈虚架空,无着之论”(《答薛君采论性书》)。

2. “思与见闻之会”的认识论

王廷相认为,知识有思虑之知和见闻之知两类,二者缺一不可。用现在的话来说,王廷相已认识到知识分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两种。

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

王廷相认为,人的认识来源于“思与见闻之会”,主张“知行兼举”(《慎言》)。针对程朱末流空谈心性,不务实际的毛病,他强调实践经验在认识中的重要性。他说:“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雅述》上)又说,一个小孩,如果“生而幽闭之,不接习于人间,壮而出之,不辨牛马矣”(《石龙书院学辩》)。指出当时理学家,“终日端坐”,“徒虚静以养其心”,就跟这类幽闭的小孩一样。

王廷相也充分肯定理性认识的重要性。他说:“知之精由于思,行之察亦由于思。”(《慎言》)有了思虑之知,才能“究其理之有无”(《慎言》)。

3. “气有偏盛,遂为物主”的辩证法思想

王廷相认为,天地万物都是由阴阳两个不相分离的对立面组成的。他说:“阴阳即元气,其体之始,本自相浑,不可离析,故所生化之物,有阴有阳,亦不能相离。”

王廷相还认为,阴阳两个对立面虽处于一个统一体内,但事物性质是由阴阳两方之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一方所决定的,即“气有偏盛,遂为物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王廷相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观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王廷相还注意用发展观点看待社会问题,认为“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众古者不能宜于今”,充分肯定古今制度变化的必然性。

王廷相以气作为哲学最高范畴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对宋代张载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是由张载过渡到王夫之的桥梁,黄宗羲、王夫之都曾受到他的影响。他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 吕坤的思想

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号心吾,明宁陵人(今属河南)。曾任吏部主事、刑部侍郎等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上书陈时

弊,触犯权贵,被迫引疾归田,家居二十多年,潜心著书、讲学。

吕坤著有《去伪斋集》、《呻吟语》等。他是继王廷相之后,中原批判理学最有成就的思想家。

1. 理即是气的唯物主义观点

吕坤认为世界万物都来源于气,“天下万物只是一气聚散”(《呻吟语》卷四)。

吕坤还指出理与气不可分离。他说:“道器非有两物,理气非是两件。成象、成形者器,所以然者道;生物、成物者气,所以然者理。道与理,视之无迹,扪之无物。必分道器、理气为两项,殊为未精。”(《呻吟语》卷一二)

2. 道存在于日常事物之中

吕坤认为,在日常事物之外,不存在超自然的道。他说:“不日用,非道也;离事物,非道也。”(《明庸》)要了解道,“苟不于日用体贴,而瞑目端坐,见性明心,此禅氏之寂也。高说性道,卑视彝伦,忽于一动一言,只说无声无嗅,此俗儒之患也”(《日用说寄杨启昧门人》)。

吕坤还认为道是公物,不是圣人所私有的。他说:“道非圣人所得专也,圣人亦未尝专道。”(《易广引》)又说:“道无津涯,非圣人之言所能限。”(《呻吟语》卷一)

吕坤指出,自韩愈提出“圣人之道”以后,世儒“言心循经,事必稽古,曰‘卫道’”。这些世儒,充其量只是一些守藏吏,“守藏者之于所守也,期保故物,不敢一毫加损……奈之何但为圣人守藏吏也!”(《易广引》)

吕坤否定孔子“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的提法,说:“形上形下之说,乃仲尼之强名。”

3. 民本思想

吕坤曾大胆提出,天生百姓不是为了君主,君主当权必须为了百姓的观点,表现了民本主义思想倾向。从吕坤的《呻吟语》中,可以觉

察出明代中国社会正在酝酿一种脱离中世纪的变化。

吕坤敢于向官学挑战的批判精神,在历史上可与王充、李贽并称。

三、近现代哲学

在近现代思想史上,中原有名的代表人物是冯友兰和赵纪彬等。

(一) 冯友兰的思想

冯友兰(1895—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著有《人生哲学》(1926年)、《中国哲学史》(1930年、1934年)、《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皆抗战时)、《中国哲学史新编》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皆建国后)等。其中《人生哲学》将实用主义、新实在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提出“中道”人生观。《新理学》等六本书,将程朱理学与新实在论相结合,构成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史》等是他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成果,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

(二) 赵纪彬的思想

赵纪彬(1905—1982年),原名化南,字象离。河南内黄人。自学成才。建国前曾任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平原师院院长、开封师院院长、河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等职。

赵纪彬著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知行学说简史》、《困知录》、《论语新探》等,又与侯外庐合撰《中国思想通史》。他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史家和哲学史家。

第三章 中原学术文化

中原地区在历史上长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就为学术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中原学术史上，史学、经学、文字学、图书目录学、法学等都有很高成就，一度体现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第一节 史学

史学研究是中原学术的强项。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为中原史学家提供了大量研究素材，中原史学家获得重要史料的机会比较多，这是中原史学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中原学者敦厚朴实的学风也适合他们从事史学研究。

他们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一、正史编撰

(一) 褚少孙补《史记》

褚少孙是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县)人，通经术，擅史著，元帝、成帝

时为博士。《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正史，司马迁写成于汉武帝时，共一百三十篇。司马迁死后，该书散佚《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十篇。为了保持该书的完整性，褚少孙对它进行补写，作《武帝本纪》、《外戚世家》、《三王世家》、《滑稽列传》、《龟策列传》、《日者列传》等。凡褚少孙所补，在书中一般皆标明“褚先生曰”四字。

对褚少孙的补文，历代学者评价不一，有人认为，“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史记·龟策列传》张守节《正义》）。但今天看来，褚少孙所补各篇，大多是好的。如《梁孝王世家》叙事详细，《田叔列传》朴实生动，《滑稽列传》文辞优美等。

当然，《武帝本纪》据司马迁原作《史记·封禅书》改写，就未免过分偷工减料。

然而，褚少孙在西汉时期就能将残缺不全的《史记》补成完书，确实是一个极大的贡献。所以他的补文一直随《史记》流传至今。

（二）司马彪与《续汉书》

司马彪（？—约306年），字绍统，西晋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曾任散骑侍郎、秘书丞等职。著《续汉书》纪、传、志共八十篇，记东汉从光武帝到献帝十二世，二百年史事。

司马彪之书，内容详实。刘勰《文心雕龙》云：“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南朝梁刘昭为范曄《后汉书》作注时，因范书无志，乃取司马彪《续汉书》八志补之。北宋时将司马彪《续汉书》八志与范曄《后汉书》合刻为一书，得以流传，而司马彪《续汉书》中的纪、传部分则已散佚。

今日范曄《后汉书》中的《律历志》、《礼仪志》、《祭祀志》、《天文志》、《五行志》、《郡国志》、《百官志》、《舆服志》三十卷，即司马彪《续汉书》中的八志。它已成为“二十四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范曄与《后汉书》

范曄(398—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人。曾任左卫将军、太子詹事等职。他仿效《史记》、《汉书》体例,撰《后汉书》纪、传九十篇。原计划写一百篇,其中十篇志,因他牵涉谋立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为帝一案,以谋反罪被杀而未能完成。

范曄写作《后汉书》时,其他人所写的《后汉书》已经有了十多种,范曄认为皆不能令人满意,乃以《东观汉记》为主要依据,参考众家之长,写成此书。

范曄《后汉书》成就很高,在许多地方都超越了前人。特别是列传部分,记载人多,覆盖面广。不论官位高低,只要对社会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范曄都为之立传。书中的《列女》、《文苑》、《逸民》、《独行》、《党锢》、《宦者》、《孝子》等列传,都是他首创的。尤其是《列女传》,写了十七名妇女的事迹,从各个侧面反映东汉妇女的风貌,这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里是难能可贵的。

范曄重史实,亦重史论。《后汉书》的序、论、赞都写得文采横溢,议论精辟。他曾自信地说:“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狱中与诸甥侄书》)清代学者李慈铭认为:“范氏此言,自诩非过。”(见《四库提要补证》卷一三)

范曄《后汉书》问世后,深受学者推崇。唐代将它与《史记》、《汉书》并称“三史”,其他各家《后汉书》遂渐湮没。后来,“三史”又加《三国志》称为“前四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很高地位。

（四）李延寿与《南史》、《北史》

李延寿,字遐龄,唐朝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曾任崇贤馆学士、符玺郎兼修国史等职。在唐初,参与过《晋书》、《隋书》的写作。

先是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570—628年),有感于南北八朝政权所修国史,详于本国,略于他国,又南方称北为“索虏”,北方指南为

“岛夷”，互相轻侮，往往失实，想予改正，于是仿《吴越春秋》体例，撰写南北朝编年史，未成而死。

李延寿继承父志，就其遗稿，改用纪传体，并以当时流行的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为依据，用十六年时间，写成《南史》和《北史》。他站在全国统一的立场上，以朝代为序，将南、北双方的历史各作为整体进行统一编撰，使它既符合《史记》一类的通史体例，又具有《三国志》一类国别史的特征。

《南史》先成，共八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记宋、齐、梁、陈一百七十年史事。其编写方法，主要是根据宋、齐、梁、陈四书进行改动删补而成。《宋书》删的多，《梁书》补的多。《南史》叙事简洁，保存了许多今天已经失传的珍贵史料。后人参校宋、齐、梁、陈等书，主要依靠《南史》。

《北史》后成，共一百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记北魏、北齐、北周、隋二百三十三年史事。《北史》主要依据《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删削增补、重新剪裁而成。《魏书》删多补少，《北齐书》、《周书》增补较多。

李延寿写《北史》比写《南史》花的功夫大。加上他世代居住北方，见闻较近，故所著《北史》，叙事详密，首尾典贍。《四库提要》认为：“征北朝之故实者，终以是书为依据。故虽八书具列，而二史仍并行焉。”

由于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删除了南北朝八书中的重复部分，又改正补充了许多材料，叙述客观，不带感情色彩，因此比起以前的八书，不仅便于阅读，也更真实可信，成为我国史籍宝库中的两部佳作。

（五）长孙无忌与《隋书》

《隋书》共八十五卷，记隋朝三十八年史事。清武英殿本《隋书》题“长孙无忌撰”，实为魏徵、长孙无忌等奉敕撰。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唐洛阳人。曾任吏部尚书、尚书

右仆射等职。

《隋书》纪、传部分由魏徵主持编写，撰成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与南朝《梁书》、《陈书》和北朝《北齐书》、《周书》合称“五代史”。

《隋书》志部分由长孙无忌主持编写，撰成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它原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各史之志，称为《五代史志》，历叙各朝典章制度，尤以隋代最详细。后来各史单行，便将《五代史志》附于《隋书》之后，成为《隋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隋书》中保存了很多珍贵资料，在唐代所修史书中，质量最高。

（六）张昭远与《旧唐书》

张昭远，字潜夫，五代濮州范县（今河南范县东）人。入宋，曾任礼部尚书。《旧唐书》为他与贾纬等主撰。因成书时，刘昫正以宰相监修国史，由刘昫进呈，故题“刘昫撰”。

《旧唐书》共二百卷，记唐朝二十一帝二百九十年历史。起初只称《唐书》，后为区别于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始加“旧”字。

《旧唐书》部头宏大，内容丰富，虽然有些部分重复冗杂，缺乏剪裁，但保存了大量重要的原始资料。

（七）宋祁与《新唐书》

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宋雍丘（今河南民权）人。曾任翰林学士承旨、工部尚书等职。宋朝政府对《旧唐书》不满，命宋祁、欧阳修撰成《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其中本纪、志、表为欧阳修撰，宋祁专撰列传一百五十卷。

宋祁修《新唐书》，前后十余年，在出任亳州太守等地方官的时候，仍将草稿随身带，一直修撰不停。

《新唐书》所记的事情比《旧唐书》多，文字却比《旧唐书》简练，故曾公亮说“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进唐书表》）。与《旧唐书》相比，其列传部分删六十一传，新增三百一十传，共增二千多条

史事。

《新唐书》比《旧唐书》虽有很多改进,但仍有繁简失当,考核未周之处。新旧二《唐书》相比,互有短长,不可偏废。

(八) 薛居正与《旧五代史》

薛居正(912—981年),字子平,宋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后唐进士,历仕后晋、后汉、后周,入宋曾任门下侍郎、平章事,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等职,前后任宰相十八年之久。

开宝六年(973年),薛居正奉诏主持修撰《五代史》。参与撰写的有卢多逊等人。卢多逊(934—985年)是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后周进士,入宋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加兵部尚书。

《旧五代史》分纪、志、传三部分,共一百五十卷。它原名为《梁唐晋汉周书》,总称《五代史》。后世为了区别于欧阳修所撰《五代史记》,加“旧”字。而将欧阳修所著书称为《新五代史》。

《旧五代史》记载五代十四帝五十三年历史。写作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由于采用范质的《五代通录》为底本,又以各朝实录作补充,门类齐全,资料相当丰富,且首创《选举志》一目。

《旧五代史》原与欧阳修《新五代史》并行于世,金代朝廷下令学官只用欧史,致使此书几乎湮没。清朝修《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复刊行于世,与《新五代史》互为补充。

二、断代史研究

(一) 中原人与《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是东汉历朝陆续撰成的官修史书。它是纪传体的东汉当代史,上起光武帝,下至灵帝。因在洛阳南宫之东观修成,故称《东观汉记》。

东汉首都在洛阳,刘秀又出生于南阳,所以东汉时期,中原在朝

中做官的人较多,参与《东观汉记》写作的人也较多。如尹敏,堵阳(今河南方城)人,光武帝时任长陵令,明帝时为谏议大夫。《东观汉记》中的《世祖本纪》,就是他和班固等写的。又如延笃,南阳犍(今河南鲁山)人,曾任侍中、京兆尹。朱穆,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曾任侍御史、冀州刺史。边韶,陈留浚仪(今河南开封)人。他们三人在桓帝时曾一起从事史学研究,撰《东观汉记》中的《皇后传》、《外戚传》、《儒林传》、《百官表》,以及孙程、郭镇、郑众、蔡伦等传。

(二) 荀悦与《汉纪》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东汉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曾任秘书监、侍中等职。所撰《汉纪》三十卷,记西汉一代二百年史事,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

《汉纪》为奉命之作。《后汉书·荀悦传》云:“帝(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

荀悦撰《汉纪》的方法是,以帝纪为线索,将《汉书》传、志、表之文,按年月顺序,分别编入,文字比《汉书》大为减少,而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事迹,皆已述及,简明扼要。其立意主要在于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汉纪》的材料虽然来源于《汉书》,但已进行了选择、加工、剪裁和再组织。已经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表达了一些与《汉书》不同的思想内容。

《左传》之后,编年体史书中断。《汉纪》问世后,编年体史书得以复兴,而且发展到更为完善的阶段。其后,袁宏仿其例撰《后汉纪》,干宝仿其例著《晋纪》。从此纪传体与编年体并驾齐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两大重要体例。刘知幾《史通》说:“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各有其美,并行于世。”

唐代科举考试,曾将《汉纪》与《史记》、《汉书》列为一科。宋代司

马光写《资治通鉴》，许多史事，皆据《汉纪》，而不用《汉书》。

（三）袁宏与《后汉纪》

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曾任吏部郎、东阳太守等职。所撰《后汉纪》三十卷，为记述东汉一代历史的编年体著作，与荀悦《汉纪》齐名。

在袁宏之前，记载东汉历史的史书已有十多种，他认为都不够理想，于是博采群书，另行撰作，写成《后汉纪》。

荀悦《汉纪》，主要依靠《汉书》旧文剪裁连缀而成。袁宏《后汉纪》则根据张璠、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等所著后汉史书及《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和诸郡耆旧先贤传等众多资料，整理编次，组合成章，其难度比荀悦《汉纪》更大。

宋代王铨《两汉纪后序》称：“荀、袁二纪，明白条畅，启告当代，垂训无穷。”

（四）干宝与《晋纪》

干宝，字令升，晋新蔡(今属河南)人。西晋末为著作佐郎，东晋时任司徒右长史、散骑常侍等职。撰编年体史书《晋纪》二十卷，记述司马懿在曹魏当权至西晋愍帝五十三年历史。

《晋书·干宝传》评价《晋纪》说：“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并受到《文心雕龙》和《史通》的推崇。可惜《晋纪》在宋代已经散佚。只有《晋纪总论》因收入《文选》，流传至今。

（五）王隐与《晋书》

王隐，字处叔，东晋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曾任著作郎，封平陵乡侯。

王隐之父王铨为历阳令，有著述之志，私撰西晋史及功臣行状，未成而卒。王隐继承父业，于晋元帝大兴元年(318年)，受命于朝廷，撰著《晋书》，记述西晋史事。

与王隐同时，著作郎虞预正私撰晋史，因他从小生长江南，不了

解北方朝中情形,便多次访问王隐,并借其书稿进行偷抄。虞预害怕事情败露,千方百计打击排挤王隐,使他免官归家,无法写书。后来,王隐在征西将军庾亮的帮助下,才于咸康六年(340年)写成《晋书》九十三卷。

王隐《晋书》分纪、记(即志)、传三部分,内容详细,颇有可读性,可惜未能流传下来。但唐宋类书中所引用的众家晋史,皆以王隐《晋书》为最多,其中可见的篇目有《外戚纪》、《地道记》、《礼乐记》、《刑法记》、《瑞异记》、《寒俊传》、《处士传》、《鬼神传》等。

(六) 司马贞与《史记索隐》

司马贞,字子正,唐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曾任朝散大夫、弘文馆学士等职。所著《史记索隐》三十卷,与裴骃《史记集解》、张守节《史记正义》齐名,为今本《史记》所附有名的三家注之一。

《史记索隐》原采用古代注书惯例,只标出被注文字,进行注释,不注在《史记》正文行间,在《史记》外单独行世。明代刻印监版《史记》时,方将此书与裴骃《集解》和张守节《正义》一起拆开,分散于《史记》正文的相关文句之下。这种做法,虽然“恣意删削”、“漏略殊甚”(《四库提要》卷四五),但给读者带来不少方便,且使《史记索隐》流行更广。

《史记索隐》纠正《史记》原书叙事疏误颇多,并征引古史增补《史记》缺略,其论证细密,对《史记》的贡献在《集解》、《正义》之上。

(七) 孙甫与《唐史论断》

孙甫(998—1057年),字之翰,北宋许州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曾任天章阁待制、河北转运使等职。精于唐史,每为人讲说,如身临其境。人称“终日读史,不如一日听孙论”(《宋史·孙甫传》)。

孙甫在史学著作上首创先叙史实后加论断的论断体。他认为《旧唐书》繁冗难读,用十六年时间撰成编年体《唐史记》七十五卷,其中对善恶昭著、可为鉴戒的人和事,写有论断九十二篇。欲以唐代历史,

为宋代提供借鉴。

《唐史记》全书已佚，但九十二篇论断，经孙甫的孙子孙察编为《唐史论断》三卷，流传至今。

（八）尹洙与《五代春秋》

尹洙(1001—1047年)，字师鲁，北宋河南(今洛阳)人。曾任太子中允、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等职。著《五代春秋》二卷，记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史事。

尹洙《五代春秋》，仿《春秋》体例以示褒贬，本不可取，但其笔法严谨，故欧阳修写《新五代史》帝纪时多所仿效。

（九）王惟俭与《宋史记》

王惟俭，字损仲，明代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曾任潍县知县、兵部职方主事、工部左侍郎等职。

王惟俭认为元代所编的《宋史》，芜乱繁杂，便将它删削改编为《宋史记》二百五十卷。比原书增帝系、帝号二纪，又增南唐等国和辽金年表，并将类传加以省并，力求简明。工程颇为浩大。

（十）汤斌与《明史稿》

汤斌(1627—1687年)，字孔伯，号荆岷，晚号潜庵，清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曾任江苏巡抚、工部尚书等职。所著《明史稿》二十卷，包括《太祖本纪》四卷，《历志》三卷，高、文、昭、章、睿、景、纯七朝后妃传一卷，王直方以下英、景、宪、孝四朝诸臣列传十二卷。

汤斌在史学上，推崇陈寿，以《三国志》为楷模。所写《明史稿》，尽去繁枝，独存劲干，颇有特色。

三、杂史著述

（一）荀勖与汲冢竹书

荀勖(?—289年)，字公曾，西晋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在

曹魏，曾任安阳令、骠骑从事中郎，至西晋，曾任中书监、侍中、中书令等职。

汲冢竹书是指汲郡(今河南卫辉)出土的一批竹简。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人不準盗掘该地魏襄王墓，出土竹简数十车。它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这批竹简包括《纪年》、《易经》等七十五篇，共十多万字。

竹简出土之后，朝廷派荀勖等进行整理研究。结果，《纪年》被整理成书，称为《竹书纪年》。它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从夏禹开始，到周幽王后接晋国，晋亡后接魏国，至魏襄王二十年而止。该书以夏正纪年。书中所记商中宗为祖乙、齐桓公十八年事与甲骨文、金文一致。但书中所记舜放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位等，又与传统说法不同，这便遭到正统人士的排斥。据后人研究，此书可信程度不亚于《史记》。司马彪曾据《竹书纪年》纠正譙周《古史考》之误一百二十二处。

此外，据竹简整理的《穆天子传》五篇，记周穆王游四海等事，经晋人郭璞作注后，一直流传到现在。

(二) 朱敬则与《十代兴亡论》

朱敬则(635—709年)，字少连，唐宋州永城(今河南永城)人。曾任宰相，兼修国史。常以高洁自励，不与武三思等人同流合污。他根据魏晋以来各朝君臣成败得失的史实，著《十代兴亡论》十卷，颇有名气。

(三) 吴兢与《贞观政要》

吴兢(670—749年)，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曾任谏议大夫，兼修文馆学士。所撰史著，“叙事简核，号良史”(《新唐书·吴兢传》)。

《贞观政要》是吴兢的代表作，写成于唐玄宗开元八年(720年)，共十卷四十篇。书中根据官方实录、奏疏、档案，参照旧史、旧闻，记述

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之间的政论问答、谏诤事迹和政治措施等。其编写方法为专题记事，分类排纂。

《贞观政要》系统总结了“贞观之治”的历史经验，写了唐太宗的良法善政、嘉言妙行，也写了他晚年的腐化衰退，是研究唐太宗和唐初历史的重要资料。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关于唐太宗的事迹，于此书取材最多。由于该书的内容可供鉴戒，故历代珍传，至今无阙。

（四）韩愈与《顺宗实录》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曾任监察御史、吏部侍郎等职。他曾奉诏与沈传师等撰《顺宗实录》五卷，记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至八月唐顺宗在位时的史事。

韩愈写这部实录的原则是：忠良奸佞，莫不备书，苟关于时，无所不录。书中对“永贞革新”记载较详，颇有史料价值。由于《顺宗实录》比较真实地记载了宦官干涉皇位继承的事实，故在当时遭到宦官的强烈不满。

（五）曹勋与《北狩见闻录》

曹勋，字公显，宋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曾任太尉等职。著《北狩见闻录》一卷，记宋徽宗自靖康二年(1127年)二月初七日被金兵俘虏北去的过程。

《北狩见闻录》中的内容皆作者亲身经历，与得自传闻者不同。记事大都近实，足证《北狩日记》诸书之妄。书中记载牛车木栅，取水支粮，敌营的防察，途中的艰苦，十分具体、详细，为难得的宋金战争史料。

（六）王在晋与《三朝辽事实录》

王在晋，字明初，明浚县(今河南浚县)人。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等职。著《三朝辽事实录》八卷，记万历、天启、崇祯时辽东兵事。所有战争梗概、兵饷筹措、政府聚讼及将卒怯乱之状，皆据实直书，是研究明

末明与女真辽东战争情况的重要文献。

(七) 白愚与《汴围湿襟录》

白愚,字惊凡,明开封(今河南开封)人。曾任参政张达远的幕僚,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打开封时参与守城。

所著《汴围湿襟录》记载李自成三次围攻开封和黄河决口史事,为当时人目睹记录,价值颇高。该书从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下洛阳,东下窥汴写起,至明统治者扒开黄河大堤、开封被淹为止,以初围、二围、三围为纲而分隶事实于后。书中所记明朝统治者决河灌城之后,开封城市变为丘墟,杀人如杀猪,百姓以蛆虫充饥的惨状,目不忍睹。

(八) 郑廉与《豫变纪略》

郑廉,字介夫,号石廊,晚年自号柳下野人,商丘人。清初诸生。著《豫变纪略》八卷,为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河南的战争史。起于明天启六年(1626年),讫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共记二十年事。

当时许多记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著作,皆得自耳闻,错误较多。《豫变纪略》则主要根据作者的亲身经历所写成,材料比较可靠,条理亦很清楚。比较详细地反映了当时“两河之间,千里之内,二十年之中”(《豫变纪略·凡例》)阶级斗争和社会情况,是研究李自成农民起义的重要文献资料。

(九) 常茂徠与《汴梁水灾纪略》

常茂徠,字逸仙,号秋崖,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道光五年(1825年)拔贡。著《汴梁水灾纪略》,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决口于祥符三十一堡,水淹开封史事。

书中自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黄河决口至二十二年正月初八堵口合龙,前后八个月,按日详细记载当时的灾情民隐、河员积弊、官吏畏葸情况。作者当时在城中,亲罹灾患,所记皆亲身经历和见闻。生动具体,非局外人所能知。读后,惊心动魄,有如亲历其境。

书中说,黄水来时,“驱神以入苦海,高庙仅露屋檐;惊鬼而出黄泉,浮棺都悬树杪”,“人民同鱼鳖之游,村落尽蛇龙之窟”;黄水去时,“辨树识村,积沙没屋,平皆如砥,深更兼寻”。

《汴梁水灾纪略》是记载中国古代大城市遭黄河水淹情景的罕见的的第一手文献,价值很高。

第二节 经 学

经学也是中原学术研究中的优长学科。

《礼记》为中原学者所编定。《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春秋穀梁传》和《论语》皆采用中原学者的注本。

从汉代以来,直到“五四”运动,二千年间,经学几乎成为中国人的思想灵魂。自汉武帝采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经学被奉为官学,儒家经书成为学者必须研究之书。隋唐以后,经书成为法定教科书和科举取士标准,在社会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这些文献,在今天仍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周易》研究

《周易》又称《易经》,为儒家经典之一。其成书时间,有周初、春秋、战国说三种。

《周易》虽是占卦书,但在神秘的形式中包含了深刻的理论思维和辩证法思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它以八卦学说为基础,阐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有关规律。

汉代以来,研究《周易》的《易》学,形成许多流派,其主要的有义理学派和象数学派。

中原研究《周易》的人,最早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其所著《子夏易传》是中国第一部说《易》之书。但《子夏易传》在汉代就已亡佚,今传《子夏易传》系后人伪托。

唐朝以前解《易》之书,完整保存到今天的,有京房、王弼、孔颖达、李鼎祚、史征五家,其中中原占了三家,即京房、王弼和史征。唐朝以后,中原也产生了一些研究《周易》的重要著作。

(一) 京房与《京氏易传》

京房(前 77—前 37 年),字君明,本姓李,因吹律自定为京氏。西汉东郡顿丘(今河南清丰)人。曾任魏郡太守等职。他是西汉宣、元时期的经学家,以研究《周易》出名。汉元帝时,曾将京房《易》学立为博士。

京房是今文《易》学的开创人。所著有关《周易》的著作,计有《易传》三卷、《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卦》七卷、《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又六卷、《周易混沌》四卷等十四种。大都遗佚,今仅存《京氏易传》三卷。

《京氏易传》主要阐述八卦与天人关系,用《周易》理论研究灾异现象。由于它并没有直接解释《周易》经文,所以有人认为,此书可能不是京氏《易》学的主要成果。

(二) 王弼与《周易注》

王弼(226—249 年),字辅嗣,曹魏河内山阳(今河南修武)人。曾任尚书郎等职。

王弼曾注《周易》上下经六卷,并撰《周易略例》一卷,共七卷。晋人韩康伯又注《周易·系辞》三卷。后人将他们二人的著作合在一起,共十卷。唐代孔颖达为他们二人的注文作疏,这就是今本《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在历史上曾产生很大影响。

王弼注《周易》时,曾对《周易》进行认真整理。他确定各卦顺序,将“传”文皆析附“经”后,使《周易》面貌为之一变。

《周易》本是卜筮之书，王弼注《周易》，全废象数，专门阐明义理，不守汉代经师门户之见，使《周易》与术数占卜严格区分开来。这是很大的功绩。但他以道家思想注《周易》，崇尚虚无，又带进了一些消极的东西。

然而从总体来看，王弼对《周易》的贡献是大的。他终于取郑玄而代之，隋唐学者专宗王注，使他成为中原《易》学的祖师。

（三）史征与《周易口诀义》

史征，唐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生平不详。著《周易口诀义》六卷。他以王弼注和孔颖达疏为基础，提纲挈领，解释《周易》。

在王、孔注疏之外，史征又旁征博引，采用了宋衷、陆绩、王奘、荀爽、何妥、周宏正、郑众、侯果等汉魏以来许多人关于《周易》的研究成果。当时这些人的著作还都能见到，千年以后的今天，其书皆已亡佚。因而史征所引，都成吉光片羽，宜为学者所重视。

（四）郭京与《周易举正》

郭京，唐洛阳人。曾任苏州司户参军。著《周易举正》三卷，订正当时流行本《周易》差谬一百零三处。凡所改定，皆以朱墨书加以区别。

从文义上看，郭京所说，往往有理，朱熹曾多处引用。

（五）程颐与《易传》

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人。曾任崇正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职。

所著《易传》，刚写出草稿，未及成书而生病将逝，将书稿交给门人张绎，不久张绎也去世，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今本《易传》四卷，系程颐未成稿，由门人杨时整理而成。

程颐《易传》只解六十四卦，不解大传，而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程颐不信象数，此书以理解《易》，既讲天道，又讲人事，是影响较大而又具有特色的重要《周易》注本之一。

（六）陈抟与《易龙图》

陈抟(?—989年),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

陈抟从道教角度研究《周易》,认为《易》生于意言象数,不需文字解说,只用两个图就能说明问题:“先天圆图,阳左阴右,《易》之体也;后天横图,阴左阳右,《易》之用也。”他著《易龙图》二卷,共二十一篇,即以二图居于书末。为《易》学象数派的重要著作。书已早佚。

（七）朱睦㮮与《易学识遗》

朱睦㮮,字灌甫,号西亭,明开封人。周定王六世孙。万历五年(1577年),举文行卓异,为开封周王府宗正,主持宗学十余年。著《易学识遗》一卷,讨论诸家说《易》之异同,并发表自己的意见。“虽荟萃不多,而颇有卓见。”(《四库提要》语)对《周易》经传皆有补益,深得学者好评。

二、《春秋》研究

《春秋》是古代编年体史书,为儒家经典之一。相传为孔子删削《鲁春秋》而成。

《春秋》的文字十分简练。诠释之作有《左传》、《穀梁传》和《公羊传》。前一种以叙事为主,后二种以解经为主,合称“《春秋》三传”。中原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左传》、《穀梁传》和《春秋》经文本身。

（一）服虔与《春秋左氏传解诂》

服虔,字子慎,东汉荥阳(今河南荥阳)人。曾任九江太守等职。

西汉时,研究《春秋左传》的中原学者,有张苍(阳武,即今河南原阳人,官至丞相)、贾谊(洛阳人)、尹更始和尹咸父子(汝南,即今河南汝南人),东汉时有郑兴和郑众父子(开封人)、贾逵(洛阳人)、延笃

(南阳犇,即今河南鲁山人)、服虔等。其中服虔是研究《春秋左传》的代表人物,著有关《春秋》的著作多种。他的《春秋左氏传解诂》三十一卷,从曹魏时起行世数百年。

晋代,杜预又作《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是服、杜二注并列于国学。但晋代学者多尊服义,常用服义驳斥杜注。

北魏,盛行服注,河洛诸儒讲授《春秋左传》,皆用服氏说。

到隋代,杜注盛行,服注衰微。唐孔颖达奉诏撰《五经正义》,《春秋》专用杜注,服注便日渐亡佚。今有辑本。

(二) 范宁与《春秋穀梁传集解》

范宁(339—401年),字武子,东晋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曾任豫章太守。他是研究《春秋穀梁传》的专家,著《春秋穀梁传集解》十二卷。“其义精审,为世所重。”(《晋书·范宁传》)为今存最早的《穀梁传》注解本。

《穀梁传》由穀梁子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一名赤,受《春秋》于子夏,为之作传。后由他的弟子写于竹帛,称《春秋穀梁传》。

《春秋穀梁传》的经、传原来分编,大约是范宁作《集解》时,将它们合在一起,以传附经。

范宁为《春秋穀梁传》作注时,兼载门生、故吏、子弟之说,故称《集解》。

唐代杨士勋为范注作疏,称《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后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传。

(三) 卢仝与《春秋摘微》

卢仝(约795—835年),号玉川子,唐济源(今河南济源)人。著《春秋摘微》四卷。

卢仝研究《春秋》的特点是“解经不用传”(《郡斋读书志》)。唐代韩愈说他:“《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寄卢仝》)宋代李焘也说他,“治《春秋》,不以传害经”。许颢称他的《春秋摘微》“辞简

而远,得圣人之意为多”。

(四) 张沐与《春秋疏略》

张沐,字仲诚,号起庵,清上蔡(今河南上蔡)人。顺治时进士,曾任内黄知县,主讲游梁书院。

张沐著《春秋疏略》五十卷。他认为《春秋》的经文是鲁史,《左传》为孔子所作。他说,孔子取鲁史尊之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挨年顺月附录于经左,命名为《左传》。这是自有经籍以来,从未有过的奇怪观点。

(五) 常茂徠与《读左漫笔》

常茂徠,字逸仙,号秋崖,清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前文谈《汴梁水灾纪略》时已述及。他还精通考据学,长于《春秋》。曾著《春秋女谱》、《春秋国都考》、《增订春秋世族源流考》。又积数十年之力,撰《读左漫笔》十六卷。“考订精核,可补顾炎武、朱鹤龄、惠栋三家之遗”(《河南通志艺文志稿》)。

三、礼学研究

礼学研究是指对《周礼》、《仪礼》和《礼记》的研究。在这三《礼》中,《周礼》、《仪礼》被古代学者称为经,《礼记》被视为记。中原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礼记》和《周礼》上。

(一) 戴圣与《礼记》

戴圣,字次君,西汉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九江太守等职,为西汉今文礼学“小戴学”的开创人。

《礼记》是秦汉以前各种礼仪文章的选集。唐代列为“九经”之一,宋代列为“十三经”之一。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礼记》中的文章,大多为“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孔子的门徒“七十子”及其学生所记关于礼仪的文章,流传

到汉代的约二百多篇。西汉宣帝时,戴圣从中选出四十九篇,编辑成书,称为《小戴礼记》,即后代通常所说的《礼记》。

《礼记》主要讲秦汉以前的礼乐理论和礼乐制度,包括社会组织、生活习俗和道德规范等。它由于得到郑玄作注,故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成为旧时士子必读之书,影响很大。

(二) 戴德与《大戴礼记》

戴德,字延君,西汉梁郡(今河南商丘)人,戴圣之叔。曾任信都王刘嚣的太傅,为西汉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人。

戴德与其兄之子戴圣同学《礼》于后苍。西汉宣帝时,他从先秦流传到汉代的二百多篇礼仪文章中选出八十五篇,编辑成书,称为《大戴礼记》。

《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的材料来源是一样的,编成的时间也差不多,但由于《大戴礼记》未有学者作注,故在唐代以前即已残缺。今存十三卷,共四十篇。

(三) 蔡邕与《月令章句》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任左中郎将等职。是著名的经学家。

《月令》是《礼记》中的一篇,记述每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和相关事物。蔡邕曾著《月令章句》十二卷和《月令问答》一卷,为研究《礼记·月令》的有名著作。

(四) 王廷相与《夏小正集解》

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明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等职,是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

《夏小正》相传为夏代遗书,是《大戴礼记》中最古的一篇。记载一年中动植物的习性和活动。

王廷相认为,各家对《夏小正》的注解,多疏谬穿凿,于是自作《夏小正集解》一卷,每月一篇,共十二篇。

（五）杜子春与《周礼注》

杜子春(约前30—约58年),东汉河南缙氏(今河南偃师)人。他是刘歆的学生,贾逵和郑兴、郑众父子的老师。

《周礼》,又称《周官》,相传为周公撰于周初。但今传本非周公旧书,又掺入了周公以后的一些内容。《周礼》在诸经中出现最晚。汉武帝时由李氏发现于屋壁,经河间献王献给朝廷。成帝时,刘向之子刘歆校理秘书,方予著录,始置博士。

杜子春受业于刘歆,又用以授徒,流传渐广。所著《周礼注》,对正音通读,研究颇详,筌路蓝缕,实开马融、郑玄之先河。今《十三经注疏》本《周礼》用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其中杜子春的注,曾为郑玄所采用。

（六）郑兴与《周礼解诂》

郑兴,字少贛,东汉开封人。曾任大中大夫、凉州刺史。经学家。精于《周礼》和《左传》。

郑玄《周礼序》云:“大中大夫郑少贛及其子大司农仲师皆作《周礼解诂》。”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郑兴、郑众传授《周礼》,康成引之,以参异同。其称大夫者,兴也;称司农者,众也。”

郑兴所著《周礼解诂》早佚,有清马国翰辑本一卷存世。

（七）郑众与《周礼解诂》

郑众(?—83年),字仲师,东汉开封人。郑兴之子,曾任大司农。经学家。著有《周礼解诂》,今已佚。郑玄《周礼注》对郑众的《周礼解诂》征引最多。清马国翰从郑玄注文中辑得六卷。

唐孔颖达《礼疏》认为,“郑众所解说,近得其实”。评价很高。后世称郑兴、郑众父子为“先郑”,郑玄为“后郑”。

（八）子夏与《丧服传》

卜商(前507—?),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的弟子。曾著《丧服传》。

《丧服》是《仪礼》中的一篇。《仪礼》是春秋战国时礼制文章的汇编，古称《礼》或《礼经》，西晋以后改称《仪礼》。

《隋书·经籍志》云：“《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其原因是：“《丧服》本文省略，必待注解，事义乃彰。”（《晋书·礼志》）

子夏《丧服传》原来单行，后人编入《仪礼》十七篇中。

四、《论语》研究

《论语》是孔子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书。成书于战国初期。汉代人将它作为传看待，宋以后列为经。它是“五四”以前初入学必读书，影响中华民族心理素质和精神面貌二千年。

（一）张禹与《论语安昌侯说》

张禹（？—前5年）字子文，西汉河内轵（今河南济源）人。曾任太学博士、丞相，封安昌侯。对《论语》的统一定本贡献巨大。

西汉时，《论语》有《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和《古论语》（二十一篇，出于孔壁）三种，文字、篇次各有不同。

张禹早年治《鲁论》，晚年讲《齐论》。后来他将《鲁论》和《齐论》合并考订，去伪存真，删去《齐论》中的《问王》、《知道》二篇，合《鲁论》二十篇为一书，称为《张侯论》，即《论语安昌侯说》。

经张禹合并的《论语》，成为后世的范本。当时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

东汉包咸、周氏为《张侯论》作章句，列于学官。《熹平石经》也是用的这个本子。

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主，参考《齐论》、《古论》而为其作注，曹魏陈群等为它作义疏，何晏又为它作集解，成为后世《论语》的流传本。

(二) 何晏与《论语集解》

何晏(约193—249年),字平叔,曹魏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曾任侍中、尚书,封关内侯。魏晋玄学家。著《论语集解》十卷,对《论语》的发展和流传有重大贡献。

在何晏以前,为《论语》作注者多家,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何晏把诸家训诂之善者汇集在一起,记其姓名,沿用其义;有不妥者,则予以改易。

何晏所集注文,包括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人之说,并加上自己的观点。南朝梁皇侃又征引了晋卫瓘、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淳、蔡系、李充、孙绰、周瑰、范宁、王珉等十三家注文,为何晏《论语集解》作义疏,称为《论语义疏》。

宋代邢昺在皇侃《论语义疏》的基础上,剪除枝蔓,稍加整理,改定为《论语正义》二十卷,即今存《十三经注疏》本。

(三) 程颐与《论语说》

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洛阳人,曾任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职,前文讲《周易》时已提到。

《论语说》一卷,为程颐门人记录他对《论语》的解说,不注意文辞,直接以俚语记之,颇具特色。书中解“贤贤易色”为“见贤改色,有敬贤之诚也”;解“骅且角”为“角始生也,可用时也”;解“井有仁焉”为“以赴井为仁”等,皆与朱熹的注解不同。

朱熹认为,“《论语》惟伊川所解,语意含蓄,旨味无穷”。

五、《诗经》研究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五百年间诗歌三百零五篇。在孔子出生之前的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编定成书,汉代被朝廷列为经典。

（一）子夏与《毛诗序》

卜商(前 507—?),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的学生,前文谈《丧服传》时已述及。

子夏比孔子小四十四岁,曾任莒父宰。孔子死后,他到魏国西河(济水、黄河间)讲学。李克、吴起是他的学生,魏文侯尊他为师。相传《诗经》和《春秋》等都是由他传授下来的。

《汉书·艺文志》诗类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

郑玄《诗谱》云:“‘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

《隋书·经籍志》云:“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宏)又加润益。”

陆德明《经典释文》云:“孔子最先删《诗》,以授于子夏,遂作序焉。”

孔颖达《诗疏》云:“诗三百一十一篇,子夏作序。”

可见唐以前人,皆认为《毛诗序》为子夏所作。

但自唐代韩愈以来,至宋欧阳修、郑樵、苏轼、朱熹等都认为《毛诗序》非子夏作。他们根据范曄《后汉书》卫宏作《毛诗序》之说,断定《毛诗序》为卫宏所作。

子夏在孔子死后,曾教学于西河,并被魏文侯尊为老师。《史记索隐》也说:“子夏文学著于四科,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属商,又传《礼》,著在《礼志》。”因此,子夏曾作《诗序》是可信的。但今传《诗序》,当经后人多次修改,卫宏可能是最后写定的人。《隋书·经籍志》所说,近于实际。子夏对《诗经》的流传和诗歌理论建设是作过重要贡献的。

《诗序》是研究《诗经》的著作。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称“小序”。《诗经》首篇《关雎》“小序”之后一大段文字,论述全经,称“大序”。

《诗序》为论诗总纲,是先秦至汉代儒家诗说的总结。它说:“诗

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对诗与志、志与情的关系和诗歌艺术特征有精辟见解。

（二）郑众与《毛诗传》

郑众(?—83年)，字仲师，东汉开封人，曾任大司农等职，前文谈《周礼解诂》时已述及。

郑众所著《毛诗传》，亦颇有独到见解。如认为“家伯维宰”的“宰”是“宰夫”，与郑玄《笺》作“冢宰”不同。

（三）程颐与《诗说》

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宋洛阳人，曾任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职，前文谈《周易》和《论语》时已提到。又著《诗说》二卷，为门人记其有关《诗经》的言论。

《诗说》称：“古之人，幼闻歌诵之声，长而识刺美之意。古人之学由诗而兴。”又说：“史氏得诗，必载其事，然后其义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则说诗者之辞也。”见解独特。

（四）王栎与《读诗补注》

王栎，字少白，号毅斋，清武陟(今河南武陟)人。道光十七年(1837年)拔贡。著《读诗补注》八卷，是增补改造朱熹《诗集传》的著作。

朱熹《诗集传》自元代延祐以来，用以取士，学者承习数百年。但该书屏弃序说太过分，往往引人疑惑。王栎于朱熹书的不足之处，采众说或以己意予以补充。

六、《尚书》研究

《尚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集，为儒家经典之一。《史记》说是孔子所编，但近代学者多认为编定于战国时期。

（一）桑钦与《古文尚书桑氏说》

桑钦，字君长，汉河南（今河南洛阳）人。《尚书》自孔安国数传至桑钦，桑钦为之著《古文尚书桑氏说》。书已失传，其说《尚书·禹贡》之文，班固《汉书·地理志》和许慎《说文解字》皆有引用。

（二）周防与《尚书杂说》

周防，字伟公，东汉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人。曾任陈留太守。师事徐州刺史盖豫，研究《古文尚书》，著《尚书杂说》三十二篇，四十万言。

（三）刘陶与《中文尚书》

刘陶，一名伟，字子奇，东汉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曾任谏议大夫。精通《尚书》训诂，曾将汉代夏侯建、夏侯胜、欧阳和伯三家《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相对照，订正文字七百余处，起名为《中文尚书》。

（四）范宁与《尚书注》

范宁（339—401年），字武子，东晋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曾任豫章太守，前文谈《春秋穀梁传》时已述及。曾著《尚书注》十卷。《古文尚书》中原有许多古字，范宁作注时，统统改为当时的通用字。

（五）张九成与《无垢尚书详说》

张九成（1092—1159年），字子韶，号无垢，宋开封人。曾任礼部侍郎。是理学家杨时的学生。著《无垢尚书详说》五十卷。援引详博，文义丰富，有利于读书人开阔眼界，避免堕入浅狭的注解之中。

七、诸经总体研究和版本学贡献

（一）许慎与《五经异义》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曾任洧县长、太尉南阁祭酒等职。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和经学家。经学名家马融很推重他，当时人称：“五经无双许叔重。”

许慎曾撰《五经异义》十卷，对经典著作提出疑问，很有胆量。郑

玄又写《驳五经异义》进行反驳。二人“皆一代通儒，……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四库提要》语）。但这两种书，唐以后皆已失传。《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等对《五经异义》曾多处引用。

（二）朱睦㮮与《五经稽疑》

朱睦㮮，字灌甫，号西亭，明开封人。周定王六世孙。曾任周王府宗正，主持宗学十余年。著《五经稽疑》六卷，颇为精赅。

朱睦㮮在《五经稽疑》中认为，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直书其事，美恶自见之义。《春秋》中有些句子少了一些字，是由于传写脱误，不是孔子有意笔削。他为此旁征博引，足破许多人穿凿附会之论。

在《礼记》部分，朱睦㮮辨后儒增益之词，亦很有见地。

（三）蔡邕与《熹平石经》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任左中郎将等职，前文谈《月令章句》时已提及。

蔡邕任郎中时，曾校书东观。他认为当时的经典，文字多有谬误，又有俗儒穿凿附会，对读者影响不好。熹平四年（175年），他与堂谿典、杨赐、马日磾、张驯、韩说、单飏等官员一起上书，要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汉灵帝允许。

正定后的“六经”，由蔡邕等用隶书写成，刻在四十六块石碑上，立于洛阳太学讲堂前，称《熹平石经》。这是我国最早的官定石刻儒家经典，为当时的标准读本。石经刻成后，每天摹写者堵塞了洛阳的大街小巷。

蔡邕在经学版本史上有重大贡献。

（四）岳珂与《相台九经》

岳珂（1183—1234年），字肃之，号倦翁，岳飞之孙，宋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曾任户部侍郎、淮东总领制置使等职。他据家藏经学名本，对宋代九经刊本进行校正，重新刻印，称《相台九经》。为宋代经学的著名版本。

岳珂还为《相台九经》作总例一卷，其内容包括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个方面。《四库提要》称赞说：“皆参订同异，考证精博，厘舛辨疑，使读者有所据依，实为有功于经学。其论字画一条，酌古准今，尤属通人之论也。”

第三节 文字学

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和文字都是人们在劳动中创造的。语言产生于原始社会早期，文字产生于原始社会晚期。

中原是最早产生语言文字的地区之一，在文字学的研究上也起过重要作用。

一、贾湖契刻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城北二十四公里贾湖村东侧，是距今八千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类型的遗址。出土文物多种，其中龟甲、骨器和石器上有契刻符号。有的符号与殷墟甲骨文某些字形相似。这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符号（比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字符号早一、二千年）。至今尚无人能识读。

二、殷墟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汉族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可识读的有系统的文字。

甲骨文被发现，是 1899 年以来的事情，它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

郊的小屯村。小屯一带是商代后期盘庚至纣王八世十二王的都城。甲骨文就是商朝的文字。

1899年以来,被发现的甲骨共有十五万多片,其中单字大约有五千个,已被识读的字有二千个左右。

甲骨文中不但有象形字(其字如画,一看便知其义),而且还有指事字(表意的文字)、会意字(把意义上有关联的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意义相关的字)和形声字(由一个表意和一个表声的字符组成的新字),说明殷墟甲骨文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造字理论,在字体结构上已经具备后代汉字的某些规律。它是经过长期发展起来的比较成熟的文字。

三千年前保存下来的甲骨文,是我们今天研究殷商历史的最重要的资料。甲骨文的研究也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被称为“甲骨学”。

三、李斯与《仓颉篇》

李斯(?—前208年),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曾任秦朝丞相等职。

秦朝统一之前,各国文字形体不同。统一之后,李斯奏请统一全国文字,以秦国文字为标准,废弃与秦国文字不同的字。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李斯亲自用小篆作《仓颉篇》,以供统一文字之用。

统一后的文字,全国划一,又便于书写。这是中国文字学史上一件意义深远的进步事件。

四、许慎与《说文解字》

许慎(约58—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

人，曾任汶县长、太尉南阁祭酒等职，前文谈《五经异义》时已述及。他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贡献是用二十二年时间写成了不朽的名著《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部文字学专著。它以“六书”理论为指导，仔细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探讨汉字的原始意义，为中国汉语文字学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研究汉字，曾提出过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总称“六书”。但在许慎以前，对“六书”没有具体解说，许慎第一次给“六书”下定义，并第一次用“六书”理论分析当时所有汉字。《说文解字》的诞生，表明了“六书”理论的成熟和中国汉语文字学的正式建立。

《说文解字》共收字 9353 个，重文 1163 个，解说文字 133441 字。按部首排列，共五百四十部。原分为十四篇，另加《叙目》一篇，共十五篇。五代南唐徐铉等以篇帙繁重，将每篇分为上下卷，共三十卷。

《说文解字》也是中国第一部字典。书中所创偏旁部首编纂法，为后代的字典、词典长期沿用。晋吕忱《字林》、南朝梁顾野王《玉篇》、明梅膺祚《字汇》和清张玉书《康熙字典》等皆以《说文解字》为先例，按偏旁部首汇集文字。

《说文解字》对研究古文字、汉语语音史和古代社会史都有重大价值。它保存了大量古字，还保存了大量古义，也是训诂学名著。书中保存有大量古音资料，有益于上古音研究。还有许多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风俗资料，是研究古代典籍和文字学的必读著作。

从《说文解字》问世到清末，中国文字学研究主要就是围绕它进行的。千百年来，研究《说文解字》成了一种专门学问，被称为“《说文》学”或“许学”。

五、服虔与《通俗文》

服虔，字子慎，东汉荥阳人，曾任九江太守等职，前文谈《春秋左氏传解诂》时已述及。其所著《通俗文》一卷，在中国文字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许慎的《说文解字》只收先秦古籍上的正字，不收汉代流行的新词。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词语、俗文字不断出现。服虔的《通俗文》就是专收《说文解字》中没有而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通俗字词的著作。

《通俗文》的问世，开了字书中俗字派的先河，“文义允惬”（《颜氏家训》），为俗文字在文字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

六、江式与文字规范化

江式（？—523年），字法安，北魏陈留济阳（今河南兰考）人。曾任骁骑将军、著作左郎等职。工于书法，篆体尤佳。洛阳宫殿诸门匾额都是他写的。

江式曾为汉字的规范化作过很大努力。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他上书朝廷，批评当时社会上文字的混乱现象说：“皇魏承百王之季，绍五运之绪，世易风移，文字改变，篆形谬错，隶体失真。”（《魏书·江式传》）又有许多人随意造字，致使不规范的文字广为流传。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请求朝廷允许他编一部能起文字规范化作用的字书，得到皇帝批准。

江式所编字书，名为《古今文字》，共四十卷。其体例大体与《说文解字》相同，上篆下隶，即收录的文字用篆书，解释的文字用隶书。古字、奇字、俗体字皆附列于后。对所收字一一注音，并指出官话和方言的不同读法。

可惜此书因江式去世而未能最后完成。但在《魏书》中保存下来的他要求文字规范化的奏表,却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七、郭忠恕与《佩觿》

郭忠恕(?—977年),字恕先,洛阳人,生于五代,卒于北宋。曾任北宋国子监主簿等职,是著名画家和文字学家。

郭忠恕著《佩觿》三卷,是古代辨别文字形体的主要著作之一。上卷分造字、四声、传写三部分,论述形声演变中存在的问题,中卷和下卷按四声选收字形相似、读音相近或相同的字,而分别说明其意义的不同。由于郭忠恕对汉字结构原理了解很深,故书中所言皆有条理,非一般文字学家可比。

八、《集韵》和《类篇》

《集韵》和《类篇》都是宋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著作。《集韵》系韵书,作者为丁度等。《类篇》是字书,作者是王洙等。

(一) 丁度与《集韵》

丁度(990—1053年),字公雅,宋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曾任参知政事等职。

宋代陈彭年等所修《广韵》,多采唐代韵书旧文,繁简失当,朝廷命丁度等重修,称为《集韵》。修撰《集韵》时,做实际工作的主要是宋祁(宋雍丘,即今河南民权人,前文谈《新唐书》时已述及;当时任太常博士、直史馆)。由于丁度是修书负责人,担任主编,故刊本多标丁度名。

《集韵》共十卷,平声四卷,上、去、入三声各二卷。分二百零六韵。共收字53525个,比《广韵》增加27331字。除正体字外,兼收古体、俗

体字,有的一字多达八九体。既注宋代读音,又注古音和方言。

《集韵》的特点是收字很全,注重文字的形体和训诂,但注释较简。它是研究宋代语言文字的重要典籍。

(二) 王洙与《类篇》

王洙(997—1057年),字叔原,宋宋城(今河南商丘)人。曾任侍讲学士等职。

《集韵》修成后,因收字量大,无相应字书与之配套,朝廷命王洙等另撰《类篇》。

《类篇》从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修起,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完成,前后修了二十多年。最后由司马光奏进,故署名司马光,实为王洙等撰。

《类篇》共十五卷,每卷分上中下,故又称四十五卷。分为五百四十四部,共收字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五个。它以《集韵》所收字为基础,补其遗漏,去其重复,与《集韵》并行于世。

第四节 目录学

目录学是研究图书编目分类的科学。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区别学科范围,阐明学术源流,揭示图书内容,为读者提供使用方便和指引治学门径。

中原古代目录学家,曾为中国目录学作出过重大贡献。

一、甲骨文与古代目录学的起源

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证明,中国古代史官是把记录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的文献资料集中收藏的。为了检索方便,它们都排有一

定次序,编出相应数码,并将这些数码等另编清单。如殷墟出土的每一个甲骨文窖穴,大多只收藏以一个帝王在位时间为断限的甲骨。这说明入藏时是经过分类的。另外,有些甲骨的尾部或背部,刻有“入”、“示”和一些数码。这是保藏人所做的记号,表明这些甲骨的入藏、排列、参考使用等都有一定方法。与这些记号和数码相适应,必然另有简单的目录或清单,以供检索。这就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起源和雏形。

二、郑默与《魏中经簿》

郑默,字思玄,曹魏开封人。曾任光禄勋等职。

曹魏代汉后,国家图书皆藏在秘书中外三阁。当时担任秘书郎的郑默,根据这些藏书,编成书目,名为《魏中经簿》。当时人称赞说:“而今而后,朱紫别矣。”

《魏中经簿》后来散佚,但它为西晋时编成《晋中经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荀勖与四部分类法

荀勖(?—289年),字公曾,西晋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曾任中书监、侍中、中书令等职,前文谈“汲冢竹书”时已述及。

荀勖所撰《晋中经簿》(又称《中经新簿》)十四卷,首创四部分类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隋书·经籍志》云:“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

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这种分类法是为了适应当时文化典籍发展变化的实际需要。在荀勖之前，图书分类中没有单独的史部类，皆将历史书附在经部书之后，荀勖第一次将历史书单独分为一类，这是由于当时史部书大量增加的缘故。又由于诸子、兵书、术数、方技等书相对减少，所以合并为一类，使刘向、刘歆的“七略”分类法变成“四部”分类法，从此奠定了中国传统图书分类法的基础。

《晋中经簿》的分类顺序为经、子、史、集，其后四部分类法的发展，只是将子部和史部的的位置互换，变成经、史、子、集而已。这种分类法一直沿用到清末，《四库全书》就是这样分类的。

《晋中经簿》是魏晋时期最好的目录学著作。它的成就不仅在于体系的变革上，而且在于著录图书的丰富和正确。略嫌不足的是，它没有题解或提要。该书久已亡佚，《三国志注》、《经典释文》、《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中保存有若干引文。

四、阮孝绪与《七录》

阮孝绪(479—536年)，字士宗，南朝梁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一生未做官。他博采宋、齐以来王公之家所藏图书，又参考官修书目，编成目录学名著《七录》一部。

《七录》分内外篇。内篇五录：一是经典录，纪六艺；二是纪传录，纪史传；三是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是文集录，纪诗赋；五是技术录，纪术数。外篇二录：一是佛录，二是道录。全书共著录图书六千二百八十八种，四万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七录》是南北朝时期最有参考价值的全国综合性图书目录，也是当时目录学的代表作。

《七录》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比它以前的图书目录

增加了佛录和道录,集中反映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佛教和道教的典籍情况。二是对所收图书都编有简要说明。这种以个人力量为四万余卷图书作题解的做法,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阮孝绪的《七录》已经散佚,其序尚保存在《广弘明集》中。

五、元行冲与《群书四录》

元行冲,名澹,字行冲,唐洛阳人。曾任陕州刺史、关内道按察使、太子宾客、国子祭酒等职。

开元七年(719年),元行冲奉皇帝之命主持编修国家图书目录。经过三年时间,他与毋煚、韦述、殷践猷、余钦等人一起,编成《群书四录》二百卷,序例一卷,共著录图书二千六百五十五部,四万八千一百六十九卷。

《群书四录》又称《开元群书四部录》。它是唐以前收录图书最多的目录学著作。它不但收录了朝廷各图书馆的藏书,而且包括从长安、洛阳搜罗来的一批私家藏书。编撰体例完备,对所收每种书,都作有题解,说明该书内容和作者情况,并在每类图书前面分别写有小序,十分便于阅读。

《群书四录》编成后,很快成为全国书目的标准和依据。以前各种书目因它的出现而失去时效,纷纷被它所代替。北宋前期的一百年中,它还是全国标准书目,直到《崇文总目》问世为止。

六、王尧臣等与《崇文总目》

王尧臣,字伯庸,宋应天虞城(今河南虞城)人。曾任吏部侍郎、参知政事等职。

宋仁宗时,王尧臣奉朝廷之命,与欧阳修、张观、宋庠、宋祁、李

淑、王洙、吕公绰等一起,根据当时国家藏书机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收藏图书的实际情况,仿照《群书四录》,编成系统的国家图书目录《崇文总目》六十六卷,叙录一卷,共著录图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

《崇文总目》是宋代著名的图书目录,它从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编起,至康定二年(1041年)完成,前后用了七年时间。

《崇文总目》所收各书,皆有提要,内容包括书本沿革、残缺情况、篇卷存佚、作者考订等。有的提要介绍图书内容,并给予一定评价;有的书因内容一目了然,则不在提要中进行介绍。其提要,皆简明实际,继承而又发展了唐《群书四录》的优良传统。清代学者朱彝尊认为,《崇文总目》提要,“辞不费,而每书之本末具见,法至善矣”。

在分类上,凡大类皆有大序,小类有小序。并将佛经和道经第一次正式纳入四部之中,列为子部的两个类目,而不再作附录处理。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

郑樵《通志·校讎略》说《崇文总目》中道书和杂史两类编得特别好,为“古人不及,后来无以复加”。《四库提要》赞扬《崇文总目》将“数千年著作之目,总汇于斯”,为“册府之骊渊,艺林之玉圃”。

七、钟嗣成与《录鬼簿》

钟嗣成(1279—1360年),字继先,号丑斋,元开封人。著有我国第一部戏曲目录学著作《录鬼簿》。

《录鬼簿》专门收录元代戏曲作家的著作并介绍其生平,包括四百余种作品和一百五十二人的小传。

自古以来,所有目录书都是收录藏书的,从没有专收著作的目录。《录鬼簿》是我国第一本专门收录一代著作的目录学著作。它也是我国第一本戏曲专科目录,在它以前的目录学著作都不收戏曲作

品。

《录鬼簿》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和戏曲史上具有特殊地位。

第五节 法 学

中原是我国最早出现法律制度的地方之一。

禹都阳城,汤都亳、盘庚迁殷,它们都在今河南境内,因此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都产生于中原。

春秋时,郑国子产“铸刑书于鼎”,将法律公布于众。

战国时,著名的法家人物大多是中原人。

其后,著名的法学家代不乏人。

一、应劭与《决事比例》

应劭,字仲远,东汉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人。曾任泰山太守等职。博学多识,平生著作十一种,一百三十六卷。其中法律著作有《决事比例》、《律本章句》、《廷尉板令》等。

有些案件,在判决时,没有相应的法律条文可套,则按以前同类案件的判决先例,采用类比法,加以判决。这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是经常出现的事。应劭的《决事比例》,就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此类问题的法学著作。

二、长孙无忌与《唐律疏议》

长孙无忌(?—659年),字辅机,唐洛阳人,曾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前文谈《隋书》时已述及。

唐太宗时,长孙无忌曾受命与房玄龄等,在隋律基础上修定《唐律》。

但新修的《唐律》,使用起来,解释不同。所以唐高宗永徽二年(652年),又令长孙无忌组织人员,对《唐律》进行统一解释,编成《唐律疏议》三十卷,亦称《永徽律》。

《唐律疏议》第一卷曾简要地谈到这个过程,它说:“今之典宪,前圣规模,章程靡失,鸿纤备举,而刑宪之司,执行殊异:大理当其死坐,刑部处以流刑;一州断以徒年,一县将为杖罚。不有解释,触涂睽误。皇帝彝宪在怀,……是以降纶言于台铉,挥折简于髦彦,爰造律疏,大明典式。”为了解决这种因理解不同而执行各异的弊端,长孙无忌等对《唐律》予以逐条疏解。

《唐律疏议》全书分十二篇,即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每篇少至一卷,多至六卷不等。共收律文五百零二条。律文下皆有大段疏文,述其源流,设问辨疑。疏文因经皇帝批准,也有法律作用,成为唐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清雍正时刑部尚书房廷仪《唐律疏议序》赞扬该书云:“其书凡五百条,共三十卷。其疏义则条分缕别,句推字解,阐发详明,能补律文之所未备。其设为问答,互相辨难,精思妙意,层出不穷,剖析疑义,毫无遗剩。……于刑名大有裨益,其灌溉来学者不浅。然则是书洵可为后世法律之章程矣。”清代学者王鸣盛称《唐律疏议》为“稀世之宝”。《四库提要》亦云:“上稽历代之制,其节目备具,足以沿波而讨源者,要惟《唐律》为最善。”

《唐律疏议》广泛征引当时的令、格、式,涉及各种典章制度,为后代保存了大量真实准确的唐代政治、经济资料。

《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最完整的法典,为世界五大法系中“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它承前启后,集秦汉至隋以来法律理论的大成,成为

以后宋元明清各朝封建法典的蓝本。

三、郑克与《折狱龟鉴》

郑克，字克明，宋开封人。曾任上元县尉、湖州提刑司干官等职。所著《折狱龟鉴》，又名《决狱龟鉴》，为古代著名的对每案都附有评论的案例汇编。

《折狱龟鉴》原为二十卷，已佚，清修《四库全书》时又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因书收入《永乐大典》时已经合并，各卷界限无法确定，四库馆臣便将它校订为八卷。与原本相比，卷数虽有减少，但文字不缺。

《折狱龟鉴》全书分为释冤(上、下)、辨诬、鞠情、议罪、宥过、惩恶、察奸、核奸、撻奸、察慝、证慝、钩慝、察盗、迹盗、濡盗、察贼、迹贼、濡贼、严明、矜谨等二十门，计二百八十条，三百九十二事。

书中所收案例，上起春秋时郑国子产，下至北宋末年。材料来源，除历代正史、实录外，兼采各种文集和笔记著作，内容广泛。

每条后面以按语形式撰写的分析、评论，基本符合古代司法实际，并具有一定的辩证法思想，比较深刻。

全书通过案例，介绍历代在侦破、检验、审讯、判决和平反等方面的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四、郑汝翼与《永徽法经》

郑汝翼，字鹏举，洛阳人。曾任金刑部检法、元大理寺丞等职。为金元时期著名的法学家。著《永徽法经》三十卷。

《永徽法经》是在《永徽律》的基础上写成的，故称《永徽法经》。它

先列唐律于前,再附金律于后,并详注其存亡、异同、增减情况。书中还对战国李悝《法经》以来的法律异同、前后分合、源流沿革等进行剖析介绍。

《永徽法经》写成于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它是元代以前的一部法经大全,为当时法学工作者的必读之书。

第四章 中原宗教文化

历史上在中原流行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等。它们曾对中原人的社会生活、思想意识、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产生过深远影响。

第一节 佛 教

中国佛教从印度传来,又传往日本、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

中原是佛教最初传入的地方,又是南北朝、隋唐、北宋佛教活动的主要舞台。

佛教影响了中原文化,中原文化也改造了佛教。

一、历史变迁

(一) 东汉魏晋中原佛教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创始人为位于今尼泊尔境内的迦毗罗卫国王子乔答摩悉达多,即释迦牟尼。

公元前一世纪,佛教沿丝绸之路从大夏(今阿富汗)、安息(今伊

朗)等国东传。西汉末年,西域使节和商人给汉地带来一些佛经。东汉明帝时,佛教正式传入中国。

永平七年(64年),东汉明帝夜里做梦,见到一个金人,身长一丈六尺,头顶放光。有大臣告诉他,他梦见的就是西方的神,名叫佛。于是明帝在永平八年(65年)派蔡愔、秦景等人去天竺(印度)求取佛法。

永平十年(67年),蔡愔等在大月氏国邀请到中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二人,用白马驮着佛经和佛像回到洛阳。永平十一年(68年),在洛阳城西建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作为僧人居住、译经、礼佛之处。摄摩腾、竺法兰是最早到中国传教的印度高僧,为“汉地有沙门之始”(《高僧传》),是中国佛教的开山之祖。

佛教是外来宗教,经典需靠翻译。早期皆由西域僧人翻译,汉人协助。

中国第一部汉译佛经是《四十二章经》,译者为摄摩腾和竺法兰,译经地点在白马寺。该经论述人生无常和解脱烦恼的方法,为佛学入门读物,属小乘经典。现行本非原书之本,古本已难考定。

佛教刚传来时,最早的寺院中住的都是胡僧,朝廷不允许华人建寺居住或出家。

随着佛教的发展,中国贵族们开始在府邸建佛堂,平民开始建寺。

佛寺首先建在洛阳。又沿汴水往东传播,依次在陈留、睢县、徐州建起佛寺。其中徐州佛寺建于汉献帝初平四年(193年),规模宏大,可容三千人。

建安年间,南阳、许昌也建起佛寺。

曹魏时期,不少中原贵族喜读佛经,又爱梵呗(佛教歌曲),促进了中原佛教音乐的发展。

西晋时,洛阳有佛寺 42 所。

(二) 十六国北朝中原佛教

十六国时期,中原战乱不止,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悲观厌世并对未来抱有幻想的佛教教义颇合人心,使佛教得到较大发展。

后赵石虎建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北),支持西域高僧佛图澄在中原传教,有门徒万人。

邺城贵族妇女二百人,随佛图澄出家,朝廷专门为她们修筑一座建贤寺。

佛图澄的弟子安令首,曾在洛阳建竹林寺,接待女尼受戒。升平元年(357年),洛阳竹林寺净检等四人从胡僧昙摩竭多受具足戒,成为中国最早受戒出家的尼姑。

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道安也是佛图澄的高足。他曾在邺城代佛图澄讲经。佛图澄死后,他成为中原重要的僧团领袖。后赵灭亡后,他逃往太行山,后又逃往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隆和元年(362年)进嵩县(今属河南)陆浑山中,以草木充饥修道。后又因前燕慕容儁军队追赶,逃到新野(今属河南)。

道安首先提出僧人不用俗姓,以释为姓的主张,后代一直遵守。他有弟子数千人,其中慧远最有名,被尊为佛教净土宗的初祖。

北魏迁都洛阳后,中原佛教发展到空前的水平。皇帝、皇后和大臣都笃信佛教。孝文帝皇后冯氏曾在洛阳瑶光寺为尼以终,宣武帝高后、胡后后来也都出家为尼。

北魏洛阳佛寺最多时达 1367 所。城东建阳里,士庶二千余户,就有十所寺院,平均二百户就要负担一个寺院的费用。

洛阳最大的寺院永宁寺,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说自己“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洛阳伽蓝记》卷一)。

许多域外僧人来到洛阳。城西永明寺有房屋一千余间,住“百国

沙门三千余人”(《洛阳伽蓝记》卷四)。

闻名中外的龙门石窟,就是北魏时期开始开凿的。

东魏、北齐以邺城为首都,完全继承了北魏的崇佛传统。北齐时,邺城有僧尼八万人。名僧法上,朝歌(今河南淇县)人,曾任东魏、北齐两朝僧统,主持两朝僧务近四十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尊儒灭佛。建德六年(577年)攻占邺城,灭北齐,焚经毁像,没收寺院财产,勒令僧尼还俗。中原许多名僧逃往深山老林、江南陈朝或西域。

(三) 隋唐五代中原佛教

隋文帝推行佛教治国政策,中原在北周时被捣毁的寺院得到恢复。

朝廷下令按口出钱,造佛像,写佛经,置于新恢复的寺院中,使中原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倍。

朝廷又下令在嵩山修建佛寺,并一次赐给少林寺土地一百顷。

洛阳有译经道场,收藏大量梵文贝叶经,故又称“梵夹道场”。

隋炀帝信道又信佛,自称菩萨弟子,在中原广度僧尼。又令沙门智果在洛阳编佛经目录,分类考订佛教著作。

唐初崇道抑佛,尊老子李耳为皇室始祖,借以神化政权。但佛教传入中原已五百余年,基础深厚,虽有政府限制,而仍不断发展。

武则天称帝时,因得到佛教支持,天授二年(691年)下诏云:“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衣应处黄冠之前。”提高佛教地位。武则天长住洛阳,宠信河内(今河南沁阳)尼姑净光、洛阳僧人薛怀义,并在龙门石窟大造佛像。

唐代中原,禅宗盛行。

禅宗起自北魏,初祖菩提达摩,开教于登封少林寺。中原是禅宗的发源地。

禅宗二祖慧可,虎牢(今河南荥阳)人,曾在相州(今河南安阳)传

教,遇北周武帝灭佛,逃往南方。

禅宗五祖后,分为南北二宗,中原成为他们竭力争夺的地盘。

起初,中原佛教以北宗为主。北宗创始人神秀,武则天时召至洛阳,“亲加跪礼,丰其供施”(《宋高僧传》)。

神秀的门人有普寂、义福等。普寂在洛阳传教二十余年,死时,倾城送葬,里巷为之一空。义福于开元十一年(723年)到洛阳,士庶执幡欢迎,死后“葬于伊阙之北,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方伎传》)。

南宗创始者慧能长期在南方。开元八年(720年),其弟子神会进入中原,在南阳龙兴寺宣传南宗思想。后又在滑县大云寺与北宗禅师辩论,赢得大量信徒。天宝四年(745年)神会进入洛阳,后被倾向普寂的御史卢比排挤到荆州开元寺。

安史之乱时,神会以财物助唐军,被唐肃宗又迎到洛阳。他以南宗慧能“明心顿悟”的观点进行宣传,使北宗“普寂之门盈而复虚”(《宋高僧传》卷八),终于取北宗地位而代之。从此,南宗成为禅宗正统,流传宋元明清历朝。

禅宗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佛教宗派。南宗的胜利,实质上表明禅宗的最后形成,也是佛教彻底中国化的标志。

中原除了作为禅宗基地之外,登封会善寺又是唐代律宗中心。寺中有琉璃戒坛,为名僧一行所创建,全国各地僧人争着来此受戒,“岁成具戒者盈千”(陆长源:《会善寺戒坛记》)。

五代各朝一般都压制佛教,禁止私度僧尼,不准新建寺院。但中原民众仍然信佛。名僧有贞峻、贞海、延诏等。

贞峻,新郑人,熟读经论数万卷,人称“有脚经笥”。曾在开封相国寺讲经十多年,有弟子三千余人。

贞海,曾在开封相国寺讲经三十余年,有弟子一千余人。

延诏曾在汝州(今属河南)风穴寺讲经七年,听者众多。

五代中原僧人,生活简朴,多以讲经说法为主要任务,有的以终

身讲一经而知名于世。

(四) 北宋中原佛教

宋初对佛教采取保护和鼓励政策,开封成为全国佛教中心。乾德四年(966年),宋太祖召僧人蕴崇进宫讲《金刚经》。乾德五年(967年),令僧人文胜编《大藏经》,并于开宝四年(971年)下令全部刻印,共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

译经中心也由洛阳转到开封。译经场所在太平兴国寺西院,后改名传法院,曾选童子50名入院培养为翻译人材。太宗、真宗二朝,传法院共译佛经二百三十四部。

北宋中原,对外佛教交流进一步发展。乾德二年(964年),有沙门300人赴天竺取经。乾德三年(965年),僧人道圆游学印度十八年回到开封,带回佛舍利和贝叶经。乾德四年(966年),沙门行勤等157人西去求法。

从宋初至景祐末年八十年间,印度有80多名僧人带梵文佛经来中原。

雍熙元年(984年),日本僧奝然、成算、嘉因等来中原求法,住太平兴国寺,受赐佛经五千余部。

咸平六年(1003年),日本僧寂照来开封献金字《法华经》。

熙宁五年(1072年),日本天台宗大云寺僧成寻等七人来华,居中原九年,后死于开封开宝寺。

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僧义天来开封学佛法。

北宋中原佛教界重视教义的理性思考,不拘泥于佛经的章句和古注。

东汉中原佛教界热衷于译经。南北朝隋唐中原佛教界忙于注经和讲经。宋代中原佛教界已由讲经转向谈禅。

过去,高僧不入城市,不叩权贵之门,不拜帝王。宋代高僧不少都集中在开封的皇家寺院相国寺,与政府官员来往密切。

许多达官贵人喜读佛书。宰相王旦，在开封结社念佛，死后以僧衣入殓。参知政事张方平，知陈州（今河南淮阳）时，以佛门弟子自居，常读《楞伽经》。诗人杨亿，在开封编《大藏经》目录，校刊《传灯录》，润色译经馆所译佛经。

文人、画家喜禅宗自由放达，寺院幽静，多与僧侣结友，相国寺成为士大夫游乐场所，成为文人俱乐部。

北宋中原佛教已结束与儒、道的纠纷，“三教合一”成为潮流，不再互相排斥。

中原道士陈抟，拥护儒家纲常伦理，也赞同佛教教化。

理学创始人程颢、程颐思想体系中有很多佛教禅宗观点。

士大夫学佛，佛家学儒。中原高僧皆儒学化。相国寺主持赞宁，不以讲经说法出名，而以“有大学问，洞古博物”为人称誉。人们称他“空门今日见张华”、“兼有董狐才”、“博览强记，亦自能著述”。相国寺僧秘演，“善诗，复辩博，好论天下事，自谓浮图其服而儒其心”（《河南先生集》卷五）。相国寺僧惟俨，“虽学于佛而通儒术，喜为辞章，……平生所为文数百篇”（《欧阳文忠公居士集》卷四一）。

在唐代佛教完成中国化的基础上，北宋中原佛教进一步民间化、通俗化，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

宋代中原僧人很少讲经说法，但佛教大为流行。这主要是因为说唱艺人成了佛教的传播者，他们代替了和尚的宣传功能。

佛教历史、释迦本事的宣扬由话本、杂剧等民间通俗文艺所承担。演员们把枯燥的内容，变成了丝竹盈耳的戏文。

轮回转世、天堂地狱、善恶报应、因果循环的观念，人生如梦、色即是空的思想，广种福田、慈悲戒杀的行为规范，不通过讲经，而由艺人在中原各地的剧场、酒楼、妓院中演唱传播，达到家喻户晓。

这些是任何寺院和僧人都做不到的。

佛教在中原民间又和儒家修身、道家养生思想相结合，成为当时

人们的生活准则,文化基调。中原佛教在宋代完成了世俗化,从此与民众生活血肉相连,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 金元以来中原佛教

北宋以后,中原佛教衰落。

金代中原比较有名的僧人有政言、广义等。政言,俗姓王,许州长社(今河南长葛)人,先在开封学唯识论,后到嵩山学禅法,曾主持郑州普照寺和洛阳法云寺教务。广义曾拜嵩山戒坛寺威公为师,又向南阳丹霞山志禅师学禅法,后在方城宝泉山建普济寺,潜修二十多年。

元代朝廷曾命僧人龙川主持白马寺,兼管江淮僧务。又命僧人福裕总领释教,主持少林寺,在寺三十多年。

明清时期限制佛教,禁止私建寺院,寺院日渐减少。清末,河南有寺院庵堂 900 余所,最大的寺院也不足百人。但念佛、烧香、放生、吃素等行为,在明清时期的中原百姓中,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1927 年,冯玉祥在河南主政,曾一度没收寺产,遣散僧尼。四十年代末,河南有寺院 340 余所,僧 540 人,尼 75 人,共 615 人。

二、著名僧人

自佛教传入中原后,一千九百多年来,中原出现了许多有名的高僧。他们在佛学、科技或其他文化方面,曾作出过卓越贡献。

(一) 朱士行

朱士行,颍川(今河南禹州)人,为三国时中原高僧。

起初,中原虽有许多佛教信徒,但未受戒,不能算作正式僧人。

曹魏嘉平二年(250 年),中天竺僧人昙柯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一卷,并与其他僧人一起商订出家仪式和应遵守的规定,为中国僧人受戒做了准备。他被称为中国律宗的始祖。

曹魏正元二年(255 年),安息沙门昙谛来到洛阳,译出《昙无德

羯磨》一卷,使戒律之法更加完备。

五年后,朱士行在洛阳白马寺依佛教戒律受戒,成为中国最早受戒出家的汉僧。

朱士行也是中国第一个往西天取经求法的僧人。

朱士行曾在洛阳宣讲大乘佛典《道行般若经》,发现旧译本删节较多,且夹有音译,词意难晓,决心去寻求足本。曹魏甘露五年(260年),他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求得该经梵文足本《大品般若》。二十年后,他派弟子弗如檀等护送该经返回。由于当时小乘佛教在于阗占统治地位,视大乘为邪说,阻止《大品般若》外传。朱士行想尽办法,才将该经送到洛阳。他自己留在西域研究佛学至80余岁而终。

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大品般若》在陈留(今开封东南)仓垣水南寺译成汉文,名为《放光般若经》。翻译该经的是生于中原的天竺人竺叔兰和长期居住陈留的于阗人无叉罗。译本迎合了当时玄学之风,在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

(二) 玄奘

玄奘(约600—664年),俗姓陈,名祜,唐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人。十三岁出家于洛阳净土寺,后往长安、成都、荆州、扬州、相州、赵州等地游学,四处拜师,好学不倦。

在游学过程中,玄奘发现各家对佛经的解释很不相同,为了寻求标准答案,他决心前往印度求法。

贞观三年(629年),玄奘从长安西行,越过玉门关,经新疆、中亚等地,进入印度。先从戒贤法师学《瑜伽师地论》等五年,又从胜军法师学《唯识抉择论》等两年。同时他还学习了印度当时的各派佛教学说,很快成为声名远扬的大佛学家,得到印度大小乘诸派的一致推崇。一次,在曲女城召开的佛学大会上,到会者六千人,有十八国国王参加,大会以玄奘为论主,玄奘提出的论点,在十八天大会上,竟无人能驳倒。

后来,玄奘沿原来去印度的路线,经西域东归,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到长安。

玄奘西行求法,往返行程五万里,历时十七年,“经百余国”(《旧唐书·方伎传》),带回梵文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的事迹后来被小说家编成了《西游记》。

玄奘在中国佛教史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翻译佛经,创立唯识宗,传播因明学。

玄奘回国后,先后在长安弘福寺、慈恩寺、西明寺等地从事译经工作。共译出佛教经典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这个数字超过唐代译经总数的一半。主要译著有《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和各类《般若经》的汇编《大般若经》等。他是唐代具有最高水平的翻译大师。

唯识宗又称法相宗,是中国佛教史上重要的宗派之一。

唯识宗主张“万法唯识”。它认为,认识世界时,第一识为眼(视觉),第二识为耳(听觉)。“阿赖耶识”为第八识,意为近似灵魂的精神实体。而阿赖耶识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一切宇宙现象,皆由阿赖耶识派生。这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由于唯识宗照搬印度思想传统较多,中国色彩很淡,不大符合中国国情,所以在佛教八大宗派中寿命最短。

因明即佛学上的逻辑。因明学即逻辑学。玄奘曾将印度《因明入正理论》和《因明正理门论》二书译为汉文,并用以授徒,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又于七世纪传到日本,使日本出现了因明学派。

玄奘还根据印度僧人的要求,把在中国流传的《起信论》回译成梵文,又把道教经典《老子》译成梵文,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更是研究中亚和印度等地不朽的历史地理文献。

(三) 神 秀

神秀(606—706年),俗姓李,唐汴州尉氏(今河南尉氏)人。为禅宗北派法系创始人。

神秀少读经史,隋末出家为僧。后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双峰山东山寺拜禅宗第五代祖师弘忍为师,得到弘忍的器重。

唐咸亨五年(674年)弘忍死后,神秀往荆州当阳山(今湖北当阳县东)玉泉寺传授禅学。武则天听到他的名字后,把他请到首都,“肩輿上殿,亲加跪礼”(《旧唐书·方伎传》)。从此神秀贵为“两京(洛阳、长安)法主”、“三帝(武则天、中宗、睿宗)国师”,王公贵族“争来谒见,望尘拜伏”(《旧唐书·方伎传》)，“天下号释氏者,咸师事之”。

在修行方法上,神秀遵循达摩以来的传统,主张“渐悟”,认为循序渐进,通过坐禅领悟,不断修炼,才有成佛的可能。他的著名偈语为:“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坛经》)

与神秀一起在东山寺向弘忍学习的僧人中有一人名叫慧能,弘忍死后,慧能到韶州(今广东韶关)广果寺授徒。武则天和神秀都曾邀请慧能到首都,但慧能说:“吾形貌丑陋,北土见之,恐不敬吾法。”(《旧唐书·方伎传》)坚决不来。

在修行方法上,慧能的观点与神秀正好相反,他主张“顿悟”,创立了禅宗南派法系。慧能认为,修行不拘形式,用不着循序渐进,可以不坐禅,不读经,只要内心忽然觉悟,便可成佛。他的著名偈语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坛经》)他比神秀的空无观点更彻底。

慧能在世时,禅宗南派并没有多大影响。在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是禅宗北派。但由于慧能提出的方法简便易行,人人皆可成佛,不再高不可攀,因而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终于战胜了北宗,取得了禅宗正统

地位。

(四) 一行

一行(673—727年),俗姓张,名遂,唐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博览经史,尤精历算、阴阳、五行之学。

一行二十一岁出家为僧,先在嵩山向神秀的弟子普寂学习禅宗,又去荆州当阳山向悟真学习律宗,后又到洛阳向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学习密法。一行曾协助善无畏翻译密宗经典《大日经》,并自著《大日经疏》,成为中国密宗的第一代传人,为密宗传入中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行的主要成就在科技上,他曾实测地球子午线,编制《大衍历》等,在本书科技章有述及。

三、重要寺院

中原历史上有无数佛教寺院,有些至今在国内外还有很高知名度。

寺院不仅是僧尼居住和从事佛教活动的场所,也是译经和传授佛学的学府。许多寺院都是重要的佛教文化宝库。

(一) 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位于洛阳市东12公里处的白马寺村。它背依邙山,南望洛水。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建寺,至今已有一千九百多年历史。

白马寺名称的来源是,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是用白马驮经来到洛阳的,到洛阳后又曾暂住在鸿胪寺(接待外国使节的机构),所以汉明帝下令为他们修建僧院时,便取“鸿胪寺”的“寺”字为名,并在“寺”前冠以“白马”二字,称白马寺。从此,“寺”也就成为佛教僧院的通称。

中国佛教宗派繁多,但不论哪一派僧人,都公认白马寺为中国第

一古刹，尊白马寺为“祖庭”和“释源”。

中国早期的佛经，大多是在白马寺翻译的。其中著名的，东汉时期除《四十二章经》（系《阿含经》部分章节的编译）之外，有安息王太子安世高译的《安般守意经》，该经教人默数呼吸次数，静虑凝神，进入禅定状态，虽属小乘，实为禅宗基本功。还有大月氏僧人支娄迦谿译的《道行般若波罗蜜经》，为《般若经》最早的汉文译本，是大乘教义流传中国的先声。曹魏时，除前文所提到的《僧祇戒心》之外，还有康居僧人康僧铠译的《无量寿经》等。西晋时，有月氏僧人竺法护译的《文殊师利净律经》、《正法华经》等。这些都对中国早期佛教的传播起过决定性作用。

白马寺在历史上曾多次毁坏，又多次重修。以唐代白马寺的规模最大。武则天派薛怀义为白马寺主持，他把山门几乎建到洛河岸边，因距僧舍很远，曾有“跑马关山门”之说。寺内殿阁辉煌，长廊豪华，偏院众多。全寺有僧人三千余人。诗人王昌龄曾在白马寺住过，他在一首诗中描写唐代白马寺的情景说：“月明见古寺，林外登高楼。南风开长廊，夏夜如凉秋。”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至三十五年（1556年），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黄锦，曾主持对白马寺修建一次，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就是那时奠定的。

白马寺现存建筑，主要有山门、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清凉台、毗卢阁、齐云塔等。

山门为牌坊式建筑，有三个门洞。门前两匹石马系宋代驸马都尉魏咸信墓前遗物，非白马寺所故有。

天王殿为寺内第一重大殿。殿内正中供弥勒佛坐像，右手持念珠，左手握布袋，为明代“夹纆干漆”造像。殿内两侧的四大天王，为清代泥塑作品。

大佛殿为第二重大殿，是寺内主要殿堂，建于明代。殿内正中佛

坛上供释迦牟尼和迦叶、阿难、文殊、普贤等像,其中释迦牟尼、文殊、普贤称“释迦三圣”,为明代泥塑作品。大佛殿内东南角悬明代所铸大钟一口,重二千五百斤。“马寺钟声”为旧时洛阳八景之一。

大雄殿位于大佛殿之后,建于元代,明清时重修。殿内正中供释迦牟尼、药师佛、阿弥陀佛三尊主像。主像两边有韦驮、韦力二天将。殿内两侧供十八罗汉。这些佛像都是元代“夹纆干漆”造像作品,为稀世珍宝,国内罕见。用夹纆干漆工艺制造的佛像,又称“脱胎漆”像,分量轻,造型美,防潮耐腐,经久不坏,其价值在古代比铜像更高。

接引殿为一小型建筑。阿弥陀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站在殿中,接引人们走向西方极乐世界。他们合称“西方三圣”,为清代泥塑作品。

清凉台为白马寺后部的砖砌高台。相传为汉明帝避暑之处。摄摩腾、竺法兰来洛阳后,曾在此居住和传教,《四十二章经》就是在台上译成的。后来成为白马寺历代藏经之处。

清凉台上的建筑自成院落。主要建筑物毗卢阁,建于明代,内供毗卢佛(大日如来)和文殊、普贤二菩萨,合称“华严三圣”。

齐云塔位于白马寺东南半公里处。十三层,高25米,为四方形砖塔,建于金大定十五年(1175年),是洛阳一带现存最早的古建筑。

此外,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的坟墓,也在白马寺山门内东西两侧的偏院里。

(二) 登封少林寺

少林寺是中岳嵩山的著名寺院。它位于登封西北13公里处,面对少室山(嵩山山脉的主峰之一),背依五乳峰。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魏孝文帝为印度高僧跋陀所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

北魏孝昌三年(527年),印度高僧菩提达摩在少林寺开创中国佛教禅宗,从此开始了它的辉煌历史。少林寺被称为禅宗祖庭。

唐宋时期,少林寺有寺基 540 亩,殿宇僧房 5048 间,僧众 2000 余名。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名刹”。元明两代,也常有僧众 2000 人。明朝王子曾先后有八人到少林寺出家。

现在的少林寺,包括主院、塔林、初祖庵、二祖庵等。主院是少林寺的核心部分,为住持和尚和上层僧人居住之处,人们平常所说的少林寺就是指的这里。它依山而建,四周绕以围墙,共有七进院落,每一进都顺山势逐次增高。

主院中的主要建筑,1928 年以前,有山门、天王殿、钟楼、鼓楼、大雄殿、东西禅堂、法堂(藏经阁)、方丈室、立雪亭、白衣殿、毗卢阁等。1928 年 3 月,军阀石友三与樊钟秀在此打仗,石友三占领少林寺后,放火烧寺,大火延续一个多月,使天王殿、钟楼、鼓楼、大雄殿、东西禅堂、法堂等建筑和明代佛经等,全部化为灰烬。近年来,这些建筑大部分都已重建起来。

在主院现存古建筑中,山门建于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门上“少林寺”三字匾额系康熙皇帝所写。方丈室是乾隆皇帝游嵩山时,曾在里面住宿的地方。立雪亭相传是禅宗二祖慧可站在雪地里,以利刃断臂表示诚意,请求达摩收为徒弟的处所。毗卢阁又称千佛殿,建于明万历十六年(1588 年),是寺里最大的佛殿。它东、北、西三面墙上画有彩色壁画《五百罗汉朝毗卢》,画面达 320 平方米,规模宏大,线条精美,罗汉形象古朴,神态生动,是明代壁画中的精品,为国内所罕见。白衣殿墙上画有《锤谱》(即拳谱)、《十三和尚救唐王》等壁画,皆为清末作品。

塔林位于少林寺西一里的山脚下,是少林寺历代住持和有地位的和尚的墓塔群,一般和尚的墓塔不能建在这里。现存唐贞元七年(791 年)至清嘉庆八年(1803 年)六朝一千多年间的和尚墓塔 227 座(可惜有许多墓塔已被历代山洪冲毁,这个数字约相当于原来数字的三分之二),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塔林。其中明塔最多,有 138 座,元塔

次之，共 40 座。塔林里的塔，大小不等，种类繁多，形状各异，几乎每个塔上都有记载塔主简历的塔铭和佛像雕刻。它是展现我国古代佛教墓塔建筑艺术的博物馆。

初祖庵位于少林寺主院西北二里多的山坡上，是后代僧人为纪念达摩而建。初祖庵大殿建于北宋宣和七年（1125 年），是河南省现存最古的一座砖木结构建筑物，在建筑学上很有价值。

初祖庵后一里的山顶上有达摩洞，深二丈，宽一丈，是达摩当年在少林寺面壁九年的石洞。

二祖庵在少林寺主院西南八里的钵盂峰上，是当年禅宗二祖慧可立雪断臂后养伤的地方。元代日本名僧邵元在少林寺时，也在这里住过多年。

少林寺保存有唐代以来碑刻 300 多通。其中以《唐太宗赐少林教碑》、唐王知敬书《武则天御制诗书碑》、裴灌书《少林寺碑》，宋苏东坡书《观音像赞》、黄庭坚书《达摩像颂》，元赵孟頫书《裕公和尚碑》、日本僧人邵元书《息庵禅师道行碑》，明董其昌书《道公禅师碑铭》等，最为珍贵。

历史上的少林寺也是一个地主庄园，土地最多时达八百余顷，分布在周围六七个县里。靠出租和雇长工耕种，并在土地较集中的外县，设置下院，住僧人收租。

住持是历代少林寺的最高首领。在封建社会里，少林寺住持都是皇帝任命的。在住持之下，有四大班首、八大执事协助处理各种事务。

过去少林寺僧人之间，一般都按照师傅和徒子、徒孙的关系组成众多家庭，住在寺院周围。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房屋和财产。除了初一、十五和佛教节日要到寺院一起礼佛之外，平时都在各家活动。

少林寺之所以出名，除了因它是禅宗祖庭之外，还因为它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和在历史上曾养有僧兵。这些都是本书“体育章”的内容，这里不作详述。

（三）开封相国寺

相国寺位于开封繁华的市中心。原为战国时魏公子信陵君的宅第遗址，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开始建寺，名为建国寺，后毁于战争。

唐初，这里成为歙州司马郑景的宅园。景云二年（711年），被僧人慧云购得，又改建为寺。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为了纪念自己在做皇帝以前曾被封为相王，便将它赐名为“大相国寺”。

唐代相国寺虽是初创，但由于皇帝命名，声誉很高，共有殿宇四百余间，是相国寺历史上第一个发展高峰。当时寺里最大的建筑物是排云阁，高达三十丈。山门也非常精巧，连北宋著名建筑学家喻皓也不知它的“卷檐”是如何建的。

唐代大画家吴道子、韩幹，大雕塑家杨惠之，大书法家李邕等，都在相国寺创作过他们冠绝一世的壁画、塑像和书法作品。

北宋是相国寺的全盛时期，被称为“皇家寺院”，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佛寺。宋太宗晚年和宋真宗初年曾用七年时间对相国寺进行大规模扩建。扩建后的相国寺占地540余亩，共有殿庭、门廊、楼阁455区。正殿高大得如同小山，长廊伸展开去，就像飞鸟的翅膀。庭院里种满花木。除中轴线上众多的殿阁之外，四边还有鳞次栉比的僧房。宋代宋白形容当时相国寺的豪华气派是“金碧辉映，云霞失容”（《大相国寺碑铭》）。

宋代著名画家高益、燕文贵、孙梦卿、石恪、高文进、崔白、李元济等都在相国寺画有壁画。

宋代相国寺在中外文化交流上起过重要作用。出家为僧的天竺王子曼殊室利到中国，曾在相国寺住了好几年。日本僧人成寻也曾在相国寺进行佛教活动。朝鲜曾派画家到相国寺，把壁画全部临摹回国。

宋代相国寺的住持都是皇帝任命的，他们经常出入皇宫。国家有

水旱灾害,皇帝常到相国寺去祈祷。皇帝生日,文武大臣常在相国寺让和尚念经,为皇帝祝寿。

宋代相国寺也是民间贸易和游乐场所。寺内有定期庙会,每月开放五次,庭院和走廊里可容一万多人做生意,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市民们元宵观灯,夏日纳凉,冬天赏雪也常到相国寺去。

相国寺在金元两代比较萧条,明代相国寺又变得兴旺起来。当时寺中最好的建筑物是大殿,地基六亩三分,除上面盖琉璃瓦外,其余全用木料,不用砖石,被称为“中原一宝”。

明末,统治者扒黄河淹李自成起义军时,相国寺被淹得只剩下一些屋顶。水退之后,成为一片废墟。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朝廷拨银一万两,在河南巡抚阿思哈主持下对相国寺进行重修,寺内现存的几座大殿都是这次所建。

现在相国寺的主要建筑有大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八角殿、藏经楼等。大门为牌楼式样。天王殿又称前殿,内有四大天王和弥勒佛塑像。大雄宝殿又称正殿,是相国寺的主殿,面阔七间,重檐复宇,顶盖黄色和绿色两种琉璃瓦。八角殿又称罗汉殿,由八面体的外廊和中心亭组成,造型奇妙,风格独特。中心亭里有一座千手千眼观音像,四面有脸,身高两丈,全身有手1048只,每只手掌上都有一个眼睛。相传为乾隆年间用一棵白果树雕成,精美绝伦,为国内佛像中少见。藏经楼又称毗卢阁,建筑高大雄伟,是收藏佛经的地方。

历代相国寺都有大量寺产。他们在城里盖房子,出货收租。在农村置买土地,雇人耕种。如清代相国寺就在尉氏县和尚庄、开封城西和尚庄和开封城东羊尾铺有土地四千三百亩。

(四) 浚县天宁寺

天宁寺位于浚县大伾山东麓。东瞰黄河故道,西倚大伾悬崖,面水背山,形势壮观。

天宁寺始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原名大伾山寺,坐西朝东。明代始

改称天宁寺,并改为坐北朝南。清代道光年间又改为坐西朝东。故今寺院建筑布局有南北、东西两条轴线。

天宁寺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现存古建筑有山门、天王殿、藏经阁、大佛楼、罗汉殿、大雄殿(又称“三尊佛殿”)、钟楼、禅房等,大多为明清两代重建。

寺内大佛楼中保存有十六国后赵时期所凿大石佛一座,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它是全国最早、北方最大的一座大型摩崖造像。

大佛为坐式弥勒佛像,依山崖而凿,高八丈多,身披袈裟,左手扶膝,右手前举,掌心向外施无畏印。头梳发髻,脚踩仰莲,双颐饱满,两目平视,挺肩闭唇,神态庄重。大佛屈膝而坐,趾大满抱,膝上可环坐数人。

浚县古称黎阳,古代黄河就流经黎阳大伾山之东,常有水患。相传,大佛就是后赵石勒采纳西域高僧佛图澄的建议,凿以镇河的。故当地人也称大佛为“镇河将军”。

北魏时,曾建阁保护大佛,元末毁于兵火。现在的大佛楼系明代重建,以后又多次重修。

大佛楼倚崖而建,高与崖顶齐,共分三层。由于佛足深入地下,故大佛楼仅高七丈多就将大佛罩住。于是“八丈佛爷七丈楼”传为当地美谈。

天宁寺藏经阁建于明万历三年(1575年)。阁内原藏明代藏经六千零五十三卷。经本长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为毛笔抄写与木刻刷印混合本,用洁白竹纸裱装。每年六月初六,寺僧邀请知名人士开箱翻晒,称为“晾经会”。历四百余年,保存完好。现移藏新乡市博物馆。

天宁寺内刻于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年)的《准敕不停废记碑》,是研究周世宗灭佛的重要资料。

（五）汝州风穴寺

风穴寺位于汝州市东北九公里刘沟村。创建于北魏，原名香积寺，隋称千峰寺，唐称白云寺。因位于风穴山中，故俗称风穴寺。

风穴寺四面环山。正北为风穴主峰，高耸如削，左右各伸一翼，形如屏风。风穴寺位于主峰腹部，倚山而建，高低参差，错落有致。

风穴寺以明代香火最盛，有殿宇 300 余间，僧徒一千余人。

寺中现存唐至清代建筑 143 处。主要有山门、天王殿、中佛殿、毗卢殿、方丈院、地藏殿、观音阁、钟楼、藏经阁、七祖塔等。

其中七祖塔建于唐开元年间，为九层密檐式方形砖塔，高 22 米，内葬唐代著名僧人贞禅师骨灰。钟楼又名悬钟阁，建于宋代，为三檐歇山式楼阁，高约 20 米。内悬北宋宣和七年（1125 年）铸大铁钟一口，高 8 米，重 9999 市斤。中佛殿建于金代，为单檐歇山式殿宇，红墙绿瓦，古朴雄伟。毗卢殿建于明成化年间。这些建筑皆保存较好。

风穴寺东、西、南三面，有塔林三处，共有元、明、清三朝僧塔 83 座，是仅次于少林寺的中原第二大塔林。

寺东山中有大小二风穴。大穴洞口数米，小穴洞口不足一米，皆深不可测。每当大风将起，便听到穴中声响，接着从大穴中吹出狂风，从小穴中喷出云雾，气势壮观。

第二节 道 教

道教产生于东汉时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

道教认为，经过修炼，人可以长生不死，成为神仙。

道教起初在民间流传,后来被统治者改造利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三大宗教之一。

道教以老子为教主。老子是春秋时苦县(今河南鹿邑)人,在道教诸神中地位崇高,称为“道德天尊”、“太上玄元皇帝”。所著《老子》,被尊为《道德经》,是道教的基本经典。

道教另外两部经典《南华经》(即《庄子》)和《冲虚经》(即《列子》)的作者是庄子和列子。庄子是宋国蒙(今河南民权)人,被尊为“南华真人”。列子是郑国圃田(今河南中牟)人,被尊为“冲虚真人”。皆为中原人。

道教诸神大多为中原古代部落首领、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和古史上的圣君贤臣。如被道教神化的黄帝,相传就活动在嵩山一带,建都有熊(今河南新郑)。

中原是道教理论的主要源头和许多神仙的老家。中原文化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历史变迁

(一) 东汉道教

中原最初的两个道教派别是东汉时的天师道和太平道。

1. 天师道

天师道由张道陵在东汉顺帝时创始于蜀中鹤鸣山(今四川大邑县境)。因张道陵自称“天师”而得名。又因信道的人须交五斗米,所以又称“五斗米道”。

张道陵死后,其子张衡、其孙张鲁相继传道。张鲁还在汉中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祖孙三代,世称“三张”。

天师道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作为主要经典。张道陵又假托老子口授,编撰“道书”,用以传道。张鲁曾撰《老子想尔

注》^①，通过注解《老子》，阐述天师道的教义。它是我国第一部用神学观点解释《老子》的著作。

天师道起自民间，中小首领称为“祭酒”，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教徒主要是下层群众，具有农民反抗官府、互相帮助的性质，常为农民起义所利用。

张道陵曾设立二十四个传教点，称为“二十四治”。洛阳北邙山治是张道陵在四川境外所设的唯一传教点。

张鲁的汉中政权灭亡后，曹操曾将汉中百姓“徙洛、邳者八万余口”（《三国志·魏书·杜袭传》），使天师道在洛阳、安阳一带得到较大传播，豪门士族中也出现了许多信徒。

2. 太平道

太平道由张角创立于东汉熹平年间（172—178年）。以崇奉《太平经》而得名。

太平道也用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的方式传教。

太平道成立后十余年，发展教徒数十万人，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万人，小方六、七千人，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地。中原颍川（今河南许昌）、汝南、南阳等地，各有太平道教徒数万人。东汉首都洛阳的官吏、市民和太监中也有不少太平道信徒。

后来张角在太平道基础上，成立黄巾军，决定在邳郡（今河南安阳）发动推翻东汉皇朝的农民起义。由于叛徒告密，洛阳太平道徒一千多人被杀，起义只好提前。

^① 《老子想尔注》又称《老君道德经想尔训》。据唐玄宗《道德真经疏外传》和杜光庭《道德真经广义》等记载，为张道陵作。而正统《道藏》第989册正乙部《传授经戒仪注诀》认为出自张鲁之手。是张鲁得道后，“化道西蜀，蜀风浅末，未晓深言，托遣《想尔》，以训初回”。近人有的认为，《老子想尔注》是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相继写成，张鲁是最后总其成和定稿的人。这种情况，按照中国古代惯例（如李延寿继承其父李大师撰《南史》和《北史》等），把《老子想尔注》说成是张鲁撰亦可。

黄巾起义军在今河南境内的主要战场有阳城(今登封)、宛城(今南阳)、长社(今长葛)、西华、邓州、阳翟(今禹州)、汝南等,可见当时中原太平道教徒之多。

黄巾起义失败后,太平道受到镇压,中原许多太平道教徒改帜加入天师道。于是中原天师道的教徒大增,为其后中原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 南北朝道教

南北朝时期,中原流行的是经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

寇谦之(365—448年)出身于官僚家庭,性好道术,少修天师道,隐居嵩山石室三十余年,采药服食,精专不懈。人称“嵩山道士”。

自张鲁死后,天师道失去统一领导,组织涣散,号令不一,戒律废弛,各级道官乱受道徒财帛,引起道徒的普遍不满。

北魏神瑞二年(415年),寇谦之托言于嵩山顶上遇见老子,老子赐他天书《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并授以天师职位,让他清理道教。寇谦之说老子对他说:“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魏书·释老志》)

寇谦之废除旧天师道的祭酒世袭制,不准道官任意取人钱财,反对滥传房中术等。特别是他把遵循封建礼法作为修道的首要任务,禁止教徒的反封建活动,并模仿佛教仪轨,通过立坛宇、做功德、诵经持戒制约信徒之心。

北魏明元帝泰常八年(423年),寇谦之又假托老子的玄孙李普文降临嵩山,宣称刚即位的北魏太武帝是天上的太平真君下凡,道教有责任辅佐他的统治。

这些做法都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太武帝派人到嵩山把寇谦之的门徒四十余人全部请到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平城设“天师道坛”,亲受符箓,并封寇谦之为国师。

从此东汉以来的民间道教团体变成了官方的正统道教,道教首次取得国家宗教的地位,成了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

改革后的道教称“新天师道”,流行于中原等北方地区。

(三) 隋唐道教

1. 隋代道教

隋朝时期采取佛道兼容政策,中原道教得到进一步发展。

隋炀帝在洛阳西苑,挖地为海,修蓬莱、方丈、瀛洲等道教仙山。并于洛阳城内外造宫观“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历代崇道记》)。又召道士徐则、宋玉泉、孔道茂等到洛阳讲《老子》、《庄子》、《灵宝》、《升玄》等经。在洛阳城东南角有道术坊,集中招待天下道士。

嵩山道士潘诞最受隋炀帝尊重。潘诞自言三百岁,为炀帝炼长生不死金丹。炀帝为他在嵩山“作嵩阳观,华屋数百间,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给使,位视三品;常役数千人,所费巨万”(《资治通鉴·隋纪五》)。后来由于炼丹六年不成,炀帝发现潘诞是在骗他,才把他杀了。

2. 唐代道教

李渊在晋阳起兵时,道士岐晖、王远知等曾编造道教教主老子李耳下降人间,自称唐室始祖,作出“告吾子孙,长有天下”(《龙角山记·唐明皇御制庆唐观纪圣铭》)的预言,利用道教为夺取政权制造舆论。

唐高祖武德三年(620年),李渊派大将尉迟敬德监工,扩建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太清宫,使它方圆数里。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李世民正式承认老子为唐朝皇室始祖,又一次扩建真源太清宫,并令天下诸州广建道观。

唐高宗李治曾亲赴真源拜祭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的母亲为“先天太后”,并将《老子》定为科举考试内容。

唐玄宗继续将老子作为唐皇朝的“圣祖”和护国神。称《老子》为《道德真经》，地位在儒家之上，为百家之首。亲自为《老子》作注疏，令全国士庶，每户皆藏一本。加封老子为“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

有人为了迎合唐玄宗的心意，在桃林县（今河南灵宝）关令尹喜宅旁绘制“灵宝符”，诡称符由天降。唐玄宗马上派人去取，并改桃林县为灵宝县，作《灵符铭》刻石于获符处，大赦天下。

唐代中原的道教中心，除真源太清宫外，主要有嵩山和王屋山。王远知曾在嵩山修炼，辟谷养生，活到126岁，门徒很多，被称为“王法主”。王远知的弟子潘师正，在嵩山双泉岭、逍遥谷修炼20多年，名满天下。唐高宗几次去嵩山祭祀都召见他。问他所需，他说：“所须松树清泉，山中不乏。”（《旧唐书·隐逸传》）所居薜荔掩墙，绳床朽坏。唐高宗为他在嵩山建隆唐观、精思院。在王屋山，司马承祯死后，其弟子李含光主持阳台宫，被赐号“玄静先生”，唐玄宗曾从他受《上清经篆》。

道教兴盛，引起佛教不满。贞观十一年（637年）在洛阳进行的佛道之争最激烈。最后唐太宗出来作结论，指出：道教兴于远古，有益治道。佛教起于西域，东汉才传入中国。不能让外教居先，华夏之教反居其后。今天下大定，道教有功，应予提高地位。道士和女冠地位宜在僧尼之上。使道教获得胜利。

（四）北宋道教

北宋建都开封，真宗、徽宗又是历史上有名的崇道皇帝，故北宋时期中原道教进一步发展。

1. 真宗封禅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以后，为了“镇服四海，夸示戎狄”（《续资治通鉴》卷二七），宋真宗和大臣王钦若等人大搞封禅活动。

宋真宗先是谎称神仙下凡,降“天书”于开封皇宫左承天门上。“天书”即所谓《大中祥符》三篇,内容是说宋真宗以至孝至道继位,做事清净简俭,可使国祚永延。后又说有“天书”降于泰山,上有“国祚延永,寿历遐岁”等文。

为了答谢“天书”,宋真宗决定东封泰山,北祀汾阴,西祭华山,谒鹿邑太清宫,封五岳帝号。并把黄帝说成是宋朝皇室的老祖宗,尊黄帝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尊老子为“混元上德皇帝”。耗费巨资在开封建玉清昭应宫,规模大达2610间。仅铸玉皇像、黄帝像和宋真宗像就用去黄金一万两,白银五千两。

宋真宗时的所谓“天书”,都是在皇帝授意下,由大臣们伪造的。主要是为了政治需要,借以安定社会,巩固政权,对道教教义并无多大发展。

2. 徽宗崇道

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一贯崇奉道教。受宋徽宗宠信的道士有刘混康、张继先、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

政和三年(1113年),宋徽宗自称梦见老子,并编造在开封南郊亲自见到天神降临的神话,撰写《天真降临示见记》颁布全国,在开封建迎真馆。

政和七年(1117年),宋徽宗下令让群臣和道箬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并声称自己是天神下凡,在他身上集人君、天神、教主三位为一体。

宋徽宗命各地选拔道士送到开封左右街道箬院学习,又在道教系统举行科举考试,殿试合格者授以道官道职。其中“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宋史·徽宗纪》)。道官级别最高的称“金门羽客”,身带金牌,可以出入皇宫。开封许多道教首领,政治地位在一般大臣之上。

宋徽宗还在开封建玉清神霄宫和上清宝箬宫等道教宫观,供安放道教神像和道士修道之用,并一度令佛教从属于道教。

当开封被金兵围困时，朝廷许多大臣还幻想道士们能用“六甲法”和“北斗神兵”等道术杀退敌军。宋徽宗被俘时，仍身穿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作道士装束。

3. 道教典籍的整理

南北朝时，开始为道教著作编写书目。唐开元时，玄宗下令搜访道书，编成《开元道藏》三千七百四十四卷。这是中国第一部《道藏》。到唐末五代时，大多已散失或焚毁。

宋代中原在《道藏》的编纂整理上作出过重要贡献。宋太宗时搜集道书，得七千余卷，命徐铉等删去重复，校正书写送入皇宫，共三千七百三十七卷。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又命开封左右街道箴院选道士冯德之、朱益谦等十人校定《道藏》，第二年又命崇文院官员参与详校，共收道书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其目录赐名为《宝文统录》。后来又增至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分装466函，以“千字文”编排函目，始于“天”字，终于“宫”字，故称《大宋天官宝藏》。天禧三年（1019年），缮写七部，分藏有关部门。

宋徽宗时又多次下令搜访道教遗书，在开封设书艺局和经局，召集道士刘道元、元妙宗、王道坚等进行校勘和整理。他们先将《大宋天官宝藏》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后又增至五千四百八十一卷，分装540函，另取名为《政和万寿道藏》，由福州知州黄裳在福建闽县雕板，运到开封印刷。这是中国第一部刻板印刷的《道藏》。印成后分送开封中太乙宫、建隆观、上清储祥宫、祥源观、嵩山崇福宫、鹿邑太清宫等处收藏。

《政和万寿道藏》与中国以后的《道藏》关系密切，金元《道藏》皆以此为蓝本，加以增补而成。

《道藏》是道教典籍的总汇，保存了大量传统文化资料。

宋徽宗还命开封道箴院仿照《史记》体例，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全面叙述道教历史的巨著《道史》。

(五) 金元道教

金元时期,中原道教主要流行太一教和全真教两大派别。

1. 太一教

太一教是金代卫州(今河南卫辉)道士萧抱珍(?—1166年)所创。主张以老子学说修养身心,以巫祝的方术济世,属符篆派道教。

由于“太乙教法,专以笃人伦、翊世教为本”(王恽《秋涧集》卷六一《三代度师王君墓表》),注重伦理纲常,所以得到金元两朝统治者的扶植。

太一教以卫州太一万寿观为中心,传至元末方衰。在二百年中,共有七代教主。

太一教规定,嗣法教主中如有不姓萧的人,一律都要改为“萧”姓。这为所有道教派别中所仅见。如二祖萧道熙本姓韩,三祖萧道冲本姓王,五祖萧居寿和六祖萧全祐本姓李,七祖萧天祐本姓蔡。

太一教七代教主中,除萧抱珍外,二祖萧道熙、四祖萧辅道、五祖萧居寿也都是卫州人。

太一教一至三代教主时当金代。二祖萧道熙曾于大定十四年(1174年)被金世宗召到中都(今北京),任过一年天长观(今白云观)住持。四至七代教主时当元代。四祖萧辅道在忽必烈当太子时就与忽必烈相互来往,忽必烈即位后,封他为“太一中和仁靖真人”,当时人喻为“山中宰相”。

太一教道士都须出家,遵守教规。

2. 全真教

全真教由金代王喆(1113—1170年,字知明,道号重阳子)于大定七年(1167年)创立于山东宁海(今牟平)全真庵。

全真教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崇拜老子、孔子和释迦牟尼,把老子《道德经》、儒家《孝经》和佛教《般若心经》列为教徒必读经典,尊奉王玄甫、吕洞宾、汉钟离、刘海蟾、王喆为五祖。

王喆有丘处机(1148—1227年)等七大弟子,世称“全真七子”。在这七大弟子中,孙不二(女,人称“孙仙姑”)曾居洛阳凤仙姑洞,在中原传教六年。刘处玄曾传教于洛阳云溪观,谭处端传教于宜阳(今属河南)长真庵,郝大通传教于开封重阳观,丘处机传教于镇平(今属河南)太极观、嵩山崇福宫和嵩阳观等地。全真教在中原从金代一直流传至今。

金世宗大定九年(1169年),王喆率弟子西上传教,死于开封重阳观。五十年后,元朝政府任命丘处机掌管全国道教,他派人到开封把重阳观扩建成方圆七里的万寿宫,“殿宇壮丽,气压诸方”。明清以来的开封延庆观就是在万寿宫基础上改建的。

金元时,中原许多有名道士,都是全真七子的徒弟。如河南范县人李志常(1193—1256年)曾于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随其师丘处机去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行营拜见成吉思汗,回来后著有闻名中外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后来掌管全国道教。道士张志素(号谷神子),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元代时曾主持鹿邑太清宫。

全真教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以“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教徒们遵守“敬天爱民”、“清心寡欲”的行动准则,不尚符箓,不事烧炼。

全真教道士实行禁欲主义,过苦行生活。主张减食、少睡、断色欲,认为“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则多睡,多睡情欲所由生”(《秋涧文集》卷五六《大宗师尹公道行碑》)。与南方正一教不同,正一教道士可以不出家,可以娶妻生子,称为“火居道士”。全真教道士都必须出家住宫观,不准结婚。

(六) 明清以来道教

明清时,中原道教在教义上没有多大发展。但道教思想却在中原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神仙信仰、金丹修炼等内容充塞了各种小说、戏曲等通俗文艺作品。《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等道教

劝善书在民间广泛流传。城隍庙、土地庙、火神庙、山神庙、吕祖庙、关帝庙、岳飞庙、龙王庙、三官庙、老君庙、天师庙、送子娘娘庙等道教神庙,遍布中原城乡。佛道进一步合流。人们把治病除灾、发财致富、生儿育女、功名利禄等都寄托在求神拜佛上。

道教的最终目标原来是为了长生、成仙,但明清时,人们对成仙已不太注意,大家所关心的是希望道教能在现实生活中帮他们获得更多利益,解决实际问题。

明清以来,中原道教主要是正一教和全真教两派。1949年,河南有道教宫观500多所,至1987年还有400多所。其中著名的有鹿邑太清宫、洛阳上清宫、济源阳台宫、登封中岳庙、淮阳太昊陵、南阳武侯祠等。

二、著名道士

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中原出现了许多杰出道士。他们有的创立了新教派,有的致力于道教理论的研究,有的在科学技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 司马承祯

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微,号道隐,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晋朝皇室的后人,因轻视为官,便出家为道,成为唐代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

司马承祯学识渊博,曾勘正《道德经》文句,定为5380字,成为天下定本。又善书法,以篆、隶、籀三体合一书写,号“金剪刀书”,独具一格。

唐睿宗曾向他询问治国之道,他说:“无为之旨,理国之道也。”(《旧唐书·隐逸传》)主张以无为治国。

唐玄宗曾从司马承祯受《上清经法》和《三洞宝篆》,又为司马承

祜在王屋山建阳台观。并命其妹玉真公主拜司马承祜为师，在王屋山出家修道。死后赐号“贞一先生”，玄宗亲自撰写碑文。有弟子七十余人。

司马承祜重视教理研究，著有《坐忘论》、《天隐子》、《修真养气诀》、《服气精义论》等。

在《坐忘论》中，司马承祜以老庄思想为基础，吸收儒家正心诚意和佛教止观禅定观点，讲述修道理论，提出斋戒、安处、存想、坐忘、神解五个修炼步骤，简易方便，扫清了神秘迷雾，成为后世道士修炼的圭臬。

司马承祜认为，人的天赋中本来就有神仙素质，只要安心坐忘、守静去欲，人人都可成仙。坐忘就是一种端坐而彻底忘掉物我是非差别的精神境界。该词来源于《庄子》，司马承祜又作了发挥。

司马承祜的修道方法，与禅宗北派相近，认为道有渐门，“不能顿悟”（《天隐子》）。

司马承祜的思想对北宋理学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二）陈抟

陈抟（？—989年），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五代宋初著名道士和道教学者。

后唐时，陈抟考进士未中，不得志而出家修道。与当时著名道士吕洞宾、谭峭等交往甚密。

他不讲神仙黄白之事，只讲兴化致治，清静无为。显德三年（956年），周世宗召他问黄白之术，他说：“陛下为四海之主，当以致治为念，奈何留意黄白之事乎！”（《宋史·隐逸传》）

宋初，陈抟曾建议宋太宗远招贤人，近去佞臣，轻赋万民，重赏三军，是一个关心国家大事和民众疾苦的人。宋太宗赐其号为“希夷先生”。

陈抟熟读经史，尤精《易》学，著有《易龙图》、《九室指玄篇》等。他

以《易》理论证仙道,把道教思想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又作《无极图》和《先天图》,首创以图式解《易》的道士《易》和哲学上的图象学。他建立的先天《易》学思想体系,不仅为其后道教各派的指导理论,而且促进了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周敦颐、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都受到陈抟《易》学的影响。

陈抟会睡功,“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东都事略》卷一一八),人称“睡仙”。对后世气功有一定影响。陈抟的睡功又称“蛰龙法”,是道教的一种内丹功夫。睡时似睡非睡,境界玄妙。吕洞宾评陈抟睡功说:“抟非欲长睡不醒也,意在隐于睡,并资修炼内养,非真睡也。”(《华山搜隐记》)陈抟自己诗中也说:“至人本无梦,其梦乃游仙。真人亦无睡,睡则浮云烟。”

(三) 萧抱珍

萧抱珍(?—1166年),卫州(今河南卫辉)人,金代太一教创始人。

萧抱珍声称得仙人所授秘篆,在乡间以符水、符篆为百姓治病,以祈祷咒语驱蝗求雨,得到民众信任,在卫州城东三清院故址创立道教庵堂。由于他“传太一三元法篆之术,因名其教曰太一”(《元史·释老传》)。

太一教于金熙宗天眷年间(1138—1140年)创立后,受篆为门徒者,每年多达千人。不久,萧抱珍的弟子侯元仙又把太一教传到河北赵县、正定一带。

皇统八年(1148年),金熙宗把萧抱珍召到首都,为皇室看病,赐萧抱珍所居庵堂名为“太一万寿观”。

金元时期,太一教在中国北方流传七世,盛行二百年。元宪宗二年(1252年),追赠萧抱珍为“太一一悟传教真人”。

(四) 李志常

李志常(1193—1256年),字浩然,开州观城(今河南范县)人,元

代著名全真教道士。

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他拜丘处机为师,号真常子。后被丘处机选为随行十八弟子之一,去西域拜见成吉思汗。

元太宗五年(1233年),李志常奉旨创办国子学,选蒙古贵族子弟,教以《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又选汉族子弟学习蒙古语言。成为蒙古族学习汉族文化之师。

元太宗十年(1238年),李志常继任全真教掌教,被朝廷封为“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

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记述丘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于元太祖十五年(1220年)至十九年(1224年),跨高山,过沙漠,到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见成吉思汗的往返过程,对沿途山川地理、风土人情,记载颇详,是中国古代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文献,可与玄奘《大唐西域记》相提并论。王国维评价说:李志常“文采斐然。其为是记,文约事尽,求之外典,惟释家慈恩传可与抗衡。三洞之中,未尝有是作也。”

三、道教胜地

在道教发展过程中,中原形成了几处道教胜地。

道士们把道教胜地看作道教仙境的一部分,称之为洞天福地。认为天下共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洞”是通的意思,道教认为这些地方由神仙主治,为众仙所居,在此修道,就可以成仙通天。

中原道教胜地主要有王屋山和嵩山。

(一) 王屋山

王屋山位于今河南济源市西北45公里处,因山有三重,其状如王者之屋,故名。

王屋山东临沁水,南望黄河,层峦叠嶂,气象万千。山上气候变幻,风雨无常,白云缭绕,蔚为奇观。有三十八座奇峰秀岭,二十六处神洞名泉,八大碧潭飞瀑,山清水秀,风景如画。被道教称为第一洞天,“是十大洞天之首,三十六小洞天之总首”(杜光庭:《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山中道教宫观星罗棋布,有道教碑刻不计其数。

王屋山主峰天坛山,海拔 1711 米,上有天坛,相传是轩辕黄帝祭天的地方。登天坛山须沿石径小道,过十八盘,山路惊险陡峭。山顶旧有虚皇观、轩辕庙、真君祠、南天门、北天门等。明代欧阳熙诗云:“瘦龙盘旋十八弯,盘弯尽处见天坛。莫言凡骨寻来易,任有仙风到也难。”

在天坛山北的深山中,群峰叠翠,山中有著名的王母洞和灵山洞。王母洞在玉簪峰半腰,西洞如井倒悬,东洞深不可测,传为轩辕黄帝与西王母相会之处。灵山洞在灵山半腰,共有七个洞口,各洞在山腹中交会,四通八达,形同街市,故人称山腹中有四十八道街,相传此洞是众神仙聚会的地方。

王屋山道教历史悠久。南北朝时陶弘景所撰《真诰》中,已有东汉道士毛伯道、刘道恭等在王屋山服丹成仙的记载。

唐代是王屋山道教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著名道士司马承祯、李含光、张探玄等和唐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都曾在山上修道。当时著名道观有上方院、奉仙观、阳台观、白云道院、灵都观、清虚观等。

宋代著名道士贺兰栖真也曾在王屋山修道,被宋真宗封为“宗玄大师”,并在山上新建了紫微宫。

金元时是王屋山道教的第二个兴盛时期,丘处机等人的门徒王志祐、张志谨、孙志玄、申志贞等一批有名的全真教道士曾在山上修道。他们对原有宫观进行重修,把阳台观改名阳台宫、灵都观改名为灵都万寿宫等,又新建了通仙观等。

明代以来,王屋山的道教开始衰落,但明中期以前,山上的道观

还大致完好,以后又多有重修。

王屋山现存道教建筑主要有阳台宫、迎恩宫、灵都宫、麻姑庙、孙思邈坟、玉真公主坟等。其中阳台宫系两进院落,依山向阳,错落有序。前院三清殿,阔五间,深四间,单檐歇山顶,为河南现存最大的明代殿宇建筑。后院玉皇阁雄踞于五米高的高台上,也建于明代,阔三间,深三间,三重檐歇山琉璃瓦顶,四周二十根方形石柱上雕有精美浮雕。三清殿前有巨大的菩提树一棵,桧柏五棵,树龄皆有一千多年。

(二) 嵩山

嵩山位于河南登封市境内,古名外方山,又名崇山或嵩高山,为中国五岳中的中岳。

嵩山由少室山和太室山组成,东西长70多公里,南北宽20多公里,山峦起伏,多悬崖峭壁,气势磅礴,景色壮丽。既多奇特的自然景象,又有丰富的人文景观。被道教称为三十六小洞天中的第六洞天。

嵩山七十二峰,最高峰为太室山的峻极峰,高1440米。有四条路可登上峰顶,但每条路都很险要。如从黄盖峰上登,须经因山峰中断而形成的“阎王鼻梁”;从万岁峰或逍遥谷上登,须经曲折陡峻的羊肠小道;从老君洞上登,须经只能爬着走的“十八限”,当地谚语说:“提起先掉胆,换脚莫眨眼,倘若一失足,就进鬼门关。”

相传嵩山为“黄帝之所常游”(《史记·封禅书》)。大禹是嵩山人,所以古书上也称他为“崇禹”。传说中大禹的首都阳城,就是今嵩山脚下的告城镇。太室山下有块裂开的巨石,据说是大禹的夫人、夏启的母亲涂山氏变的,故称“启母石”。汉代曾在石前建“启母庙”,庙前的“启母阙”一直保留至今。又据说周灵王的太子王子晋曾在嵩山得道成仙,乘鹤而去。汉武帝登太室山时,从官曾听到山呼“万岁”的声音。可见嵩山自古就充满“神仙气氛”。

早在魏晋时期,道教就传入嵩山。三国时曹魏的左慈、郗鉴和西晋道士鲍靓曾在嵩山修道。相传鲍靓还在山中石室内得古《三皇文》刻石。

北朝时,在嵩山修道的著名道士有寇谦之、赵静通、韦节、潘弥望等人。寇谦之还在北魏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奏请朝廷重建了中岳庙。现存《中岳嵩高灵庙之碑》,相传就是当时寇谦之用魏碑体书写的,为嵩山一带现存最早的石碑。

隋唐是嵩山道教的兴盛时期,山中有许多著名道士。如潘诞住嵩阳观,有“华屋数百间”(《资治通鉴》卷一八一)。潘师正先居双泉岭十余年,后来唐高宗为他在逍遥谷建隆唐观。司马承祯和吴筠曾在嵩山拜潘师正为师。李含光在嵩山修道二十余年。李筌曾在嵩山虎口岩得《黄帝阴符经》。山上山下,道观林立,大小石洞都住有修道的人。正如后唐熊皎《游嵩山》诗所说:“深逢野草皆疑药,静见樵人恐是仙。”

宋元时,嵩山道教又有发展。贺兰栖真在去王屋山之前,曾在嵩山紫虚观修道。乔志高曾在嵩山崇福宫修道三十余年。

明清以来,嵩山道教衰落,宫观大都失修。

嵩山现存道教建筑主要有中岳庙、崇福宫、奉天宮、老君洞等。其中中岳庙保存最好。它位于黄盖峰下,从中华门起,经遥参亭、天中阁、配天作镇坊、崇圣门、化三门、峻极门、嵩高峻极坊、中岳大殿、寝殿到御书楼共十一进,计有殿阁四百余间,为河南现存规模最大的寺庙建筑。天中阁原为中岳庙大门,阔五间,深五间,重檐歇山顶,是清代仿照北京天安门的式样重修的。中岳大殿又称峻极殿,阔九间,深五间,重檐庑殿黄色琉璃瓦顶,是清代仿照皇宫太和殿的式样重建的。庙内有北魏以来碑刻74通和唐宋以来古柏三百余棵。

中岳庙是历代祭祀中岳神的地方。原名太室祠,始建于秦代。北魏时改称今名。庙址屡有变更,唐代以后才固定在现在这个地方。宋、元、明、清皆有修葺,现在的格局和规模是明清时奠定的。

第三节 基督教

基督教于公元一世纪产生于巴勒斯坦地区,四世纪成为罗马国教。中世纪,它统治了整个欧洲思想界。

1054年,基督教分为东西两派。东派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自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派以罗马为中心,自称公教,即天主教。

十六世纪,天主教内部不满罗马教皇统治,发生改革运动,脱离天主教的一些新派别自称基督教新教,称天主教为旧教。

唐代传入中原的景教是未分裂为东西两派的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元代传入中原的也里可温教主要也是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明代以后传入中原的是分裂后以罗马为中心的天主教,即旧教。鸦片战争前后传入中原的是基督教新教。

建国前,河南天主教有九个教区,其中七个教区的主教是外国人,基督教有二十五个教区,其中二十个直接受命于外国教会。

一、景教

最早传到中原的基督教,中国称之为景教。

景教传到中国的时间是唐代。

景教是基督教中一个名叫聂斯脱利派的小支派(当时基督教尚未分裂为东西两大派)。第一个到中国的传教士是叙利亚人阿罗本。他在贞观九年(635年),从波斯(今伊朗)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得到唐太宗的礼遇,让他在皇家藏书楼翻译圣经。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又批准他在中国传教,并拨款为他在长安建造一座礼拜堂,当时称作“波斯寺”。

景教传到中原的具体年代,史无明文。据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所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并序》记载,唐高宗时,阿罗本被封为“镇国大法主”。景教得到广泛传播,“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作为东都洛阳所在的中原地区,这时有景教流传,大约是可以肯定的。

天宝四载(745年)九月,唐玄宗下令将天下“波斯寺”都改名为“大秦寺”。诏令云:“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唐会要》卷四九)

这里所说“两京”是指长安和洛阳,它是当时中原有景教流行的有力证据。

据文献记载,景教徒的特点是通医术,擅奇器,尚豪侈。

唐朝信奉景教的多为西域商人和少数唐朝贵族,景教传教士差不多都是叙利亚人或波斯人。

景教在唐朝流传了二百余年。会昌五年(845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也在消灭之列。从此景教就在中国本土失传了。

二、也里可温教

元朝蒙古人称基督教为“也里可温教”。

“也里可温”是叙利亚文和希伯来文“上帝”的意思。也里可温教就是“上帝教”。

在元朝前期,也里可温教也是指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和唐朝的景教一样,但它与唐朝的景教并无继承关系。忽必烈的母亲就是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徒。

元朝后期,由于罗马天主教派传教士到汗八里(今北京)传教,所以这时的也里可温教也包括天主教在内。

元朝时也里可温教徒前后大约有六万多人。元朝称也里可温教堂为“十字寺”。

早在蒙古人攻打南宋的时候,也里可温教就在中原传播开来。元太宗九年(1237年),曾在今河南林州宝岩禅寺内刻保护也里可温教的圣旨碑。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朝廷又令河南也里可温教徒所开的店铺照常纳税。

元朝中原著名文学家马祖常是也里可温教徒。

元朝灭亡之后,基督教在中国再次绝迹。

三、天主教

(一) 明代天主教

明代天主教传入中国从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1552—1610年)来华开始。利玛窦为意大利人,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他是在葡萄牙殖民势力支持下到中国来的。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年)、金尼阁(1577—1628年)、毕方济(1582—1649年)等也来中国。艾儒略、毕方济是意大利人,金尼阁是法国人。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毕方济留居河南,在开封洪河沿建教堂。与此同时,艾儒略、金尼阁等也到开封传教。其后,费德乐曾在开封发展教徒一千多人。

明末,李自成攻打开封,开封守军为了水淹起义军,决开黄河大堤,使开封城全被淹毁。开封天主教徒除二人幸免于难外,其余的人,包括费德乐,都被洪水淹死。

(二) 清代前期天主教

清初统治者不喜欢西方宗教,但欣赏西方科技。西方传教士因擅

长自然科学,受到优容。

康熙初年,河南巡抚佟国印的哥哥佟国器是天主教徒,他支持西方传教士恩理格到开封传教。

康熙三年(1664年),河南按察使许纘之母(徐光启孙女,自幼入天主教)也对恩理格在河南传教进行赞助。当时在河南朱仙镇、鹿邑、南阳靳岗、林县(今河南林州市)田家集都设有天主教堂。

由于罗马教廷不准中国天主教徒尊孔敬祖,激恼了康熙皇帝,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皇帝下令驱逐反对中国礼仪的传教士。雍正二年(1724年),朝廷下令禁教,所有外国传教士都被驱逐出境。从此至1840年一百多年间,河南无外籍传教士。鹿邑冯桥、南阳靳岗、林县(今河南林州市)田家集还有教堂,中国教徒进行半公开活动。法国遣使会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和道光十五年(1835年)曾分别派法籍传教士刘方和董文学偷越入境,潜入南阳靳岗,皆被中国官府逮捕处死。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以前,河南共有天主教徒二千人左右,主要集中于鹿邑冯桥、南阳靳岗、林县田家集三地。

(三) 鸦片战争后的天主教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签订的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国有保护教堂的义务。签约后,法国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同年,法国天主教遣使会在南阳靳岗建立河南教区总教堂,并向河南桐柏、镇平、襄城、光州(今潢川)、商城、汝阳发展势力。

天主教的传播引起农民和儒生反抗,清政府袒护传教士一方,故不断发生“教案”。后来,罗马教皇只得派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到靳岗取代法国遣使会。

光绪八年(1882年),意大利米兰外方传教会又在林县田家集成立河北教区,后迁至辉县,改名卫辉教区。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意大利巴尔玛外方传教会到襄城,成立新教区,后迁郑州,称郑州教区,管32县。

1916年,豫东成立开封教区,管32县。

1927年,德国人主持的罗马圣言会,到驻马店成立新教区,后迁信阳,称信阳教区,管16县。

1928年,豫西成立洛阳教区,管16县。

1928年,西班牙重整奥斯定会,在商丘成立归德教区,管6县。

这时,河南共有7个教区,属6个外国天主教教会掌管。

1933年,从南阳划出4县,信阳划出3县,成立国际教区,由王基之任主教。这是全省唯一由中国人任主教的天主教教区。

1936年,从卫辉教区划出12县,成立新乡教区,由美国圣言会的米干任主教。

从此,河南共有九个天主教教区,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四、基督教新教

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也单称基督教或耶稣教。

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年)来到广州,他在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任职,将《圣经》译成汉文,是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之始。但鸦片战争前,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影响很小;鸦片战争后才迅速传播开来。

基督教新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的传教士大多懂医学,懂技艺,因而到处建医院、办学校。

1858年(咸丰八年),清政府和英、法、美、俄四国签订的《天津条约》规定,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不久,英国人戴德生创立

的基督教新教内地会进入河南,在周口、社旗、襄城等地传教。1883年(光绪九年),戴德生和他的儿子戴存信,还在河南周口设立内地会的总教堂。

内地会势力很快发展到上蔡、许昌和开封近郊。由于省城开封的军民排斥洋教,传教士几次都未能进城。直至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内地会牧师怀里德·根勒司勾结官绅,才在开封购得一地,兴建教堂。

在豫北传播基督教新教的是加拿大长老会。最初在内黄县楚旺集传教,1893年(光绪十九年),内黄掀起反洋教斗争。第二年,长老会由内黄迁到安阳。长老会曾在安阳办英贤(后改斌英)中学,在汲县(今河南卫辉市)办牧野中学和牧野小学。

在河南传教的基督教新教信义会有两支。一支是挪威信义会,于1894年(光绪二十年)进入镇平、内乡、鲁山,后来又发展到邓县、郾城、南召、淅川、西峡等地。另一支是美国信义会。他们于1915年在潢川建教堂;1916年在临汝(今汝州市)建信义医院;1918年在许昌建信义医院,后又建育德中学、明德女中、妇女工读学校、高级护士学校,并将湖北浠口的信义神学院迁到许昌。

1904年(光绪三十年),基督教新教浸言会进入河南,在郑州、开封、商丘等地建博文中学、博育女中、博育小学、济汴中学、施育女中、华美医院等。

同年,基督教新教循理会进入河南,在郑州、荥阳、开封、杞县传教。

1909年(宣统元年),基督教新教门诺会进入河南,在濮阳、滑县、长垣、开封等地建教堂、医院、学校等。

河南的基督教新教圣公会是由加拿大传入的,以开封为中心。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加拿大圣公会传教士怀履光来到中国,最初在福建传教。1909年(宣统元年),他被封为圣公会河南教区第一

任主教,由福建到河南,先在开封行宫角建阅报室和布道所,后又建三一教堂。1913年,魏亨云成为圣公会河南教区第一个中国牧师。

圣公会曾在开封办安得烈中学、圣玛利亚女中,又设保生孤儿院、圣保罗医院等。后因内地会已在开封设有福音医院,他们反对再办圣保罗医院,故圣公会只好把圣保罗医院迁到商丘北关。

圣公会主要沿陇海铁路发展。在郑州设履光堂、兰封(今兰考)设新馨堂、商丘设救主堂、永城设永生堂,在夏邑、虞城等地也建有教堂。

据统计,1920年河南境内有基督教新教徒12418名,天主教徒51592名,共64010名;共有教堂71座,教会办学303所,办医院18所(当时河南官办医院只7所)。

第四节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于公元七世纪初产生于阿拉伯半岛的麦加,创始人为穆罕默德(约570—632年)。伊斯兰是阿拉伯语“顺从”的意思。中国旧称伊斯兰教为“回教”。

伊斯兰教信奉安拉,认为他是唯一的神,世上一切都是由安拉预先安排的,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古兰经》是安拉的“启示录”。

伊斯兰教首先传遍阿拉伯半岛,后来发展到非洲、西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信仰伊斯兰教的人通称为穆斯林。

一、中原穆斯林的来源

唐朝时,有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在洛阳做

生意。这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原之始。

唐宣宗时，汴州（今开封）刺史推荐大食（阿拉伯帝国）人李彦升参加科举考试，考中大中二年（848年）进士。李彦升的姓名已完全汉化，表明他是一个长期住在中原的伊斯兰教徒。

北宋与伊斯兰教国家来往频繁。阿拉伯商人和技术人员纷纷来到中国，在开封经商、做官。

大约从南宋开始，中国把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作“回回”。“回回”一词最早就是出现在南宋人周密（1232—1298年）所著《癸辛杂识》一书中。

金元之际，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回回”参加蒙古军队，随军到达中原。

元太宗六年（1234年），“回回”军大将曷思麦里伐金，曾驻军怀孟（今河南沁阳、孟县等地）。后来，曷思麦里家族曾祖孙四代在沁阳任地方官。

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年），在南阳成立屯垦总管府，以“回回”军屯田，“回回皆以中原为家”（《元史·世祖本纪》）。

至元十八年（1281年），朝廷令“回回”炮手，“散居他郡者，悉令赴南京（今开封）屯田”（《元史·世祖本纪》）。

现在河南境内称作“回回”寨、“回回”营、“回回”凹、教民村的地方，皆与元军屯田有关。如巩义“回回凹”为元军牧马之处。封丘塔村李姓，世称“军李”，系元朝屯田军后裔。

元朝以后，一部分从唐朝以来就陆续迁入中国的信仰伊斯兰教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和中亚人，在与汉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回族。这样，原来定居在中原的伊斯兰教徒，就形成了中原的回族。

中原回族形成的历史，也就是伊斯兰教在中原传播和发展的历史。

明清以来，由于战乱、灾荒、经商，许多外地回民迁到河南。如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西北回民起义遭镇压后，有些人逃到中原。开封回民中的“马客伙”，就是这批人，从而使中原的回族人口进一步增多。

据 1982 年统计，河南全省有 41 个少数民族，共 79.97 万人，其中回民 73.03 万人，占河南少数民族人口的 91%。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形式居住在河南各地。

到 1987 年，河南已在郑州、开封、洛阳三市各建了一个回族区，在全省建了十三个回族乡、八个回族镇。回族与其他各族人民一样，过着民族平等的的生活。

二、清真寺

清真寺是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诵经、做礼拜、传授宗教知识等活动，均在清真寺进行。旧时施医药、办义学、搞社会福利，也在清真寺。清真寺与中原穆斯林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有密切关系。

伊斯兰教规定，祭坛都要背向麦加，使教徒向麦加方向跪拜，因而中原清真寺的大殿皆坐西朝东，穆斯林做礼拜时都面向西。

中原清真寺的历史很长。开封鼓楼广场东北文殊寺街清真寺内，有道光十八年（1838 年）郑怀玉所立碑，碑云：“文殊寺街，旧有清真寺一座，创自唐代，历宋、元、明各代。”可见这里在唐代就有清真寺存在。

开封北大寺始建于北宋；西华县逍遥镇清真寺亦始建于北宋。襄城县颍桥镇北街清真寺始建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 年）。

沁阳县郭集清真寺始建于金代。

元代,每一处回民聚居点都有清真寺。如沈丘县槐店镇清真寺创建于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博爱县清化镇清真寺创建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郑州北大寺创建于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年);许昌艾庄、叶县马庄、武陟木城镇、睢县西门里的清真寺也都创建于元代。

明代河南有清真寺一百多座,分布在五十多个县内。

清代河南有清真寺五百多座,分布范围比明代更广。

中原历史上的清真寺,有的已经毁坏,有的经过重修,得以保存下来。到1987年,河南已开放清真寺698座,其中有不少都是重要的古代建筑群,成为受各级政府保护的文物。

中原的清真寺,既有阿拉伯建筑格调,又融合了浓厚的中原传统建筑特色。具有代表性的有朱仙镇清真寺、沁阳清真寺、开封东大寺、郑州北大寺等。

朱仙镇清真寺位于开封县朱仙镇老虎洞街。又名“绿瓦寺”,系明代建筑。现存大门、大殿、左右厢房等。山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上盖绿色琉璃瓦。大殿面阔五间,进深六间,高15米,面积800平方米,为硬山卷棚勾连搭式,上盖绿色琉璃瓦,是河南现存最大的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大殿建筑。左右厢房皆为硬山灰瓦顶。它既是穆斯林的活动场所,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沁阳清真寺,也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沁阳市城内,创建年代不详,明代重修,清代又扩建。为河南省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伊斯兰教建筑群。由男寺和女寺组成。女寺建筑皆为硬山灰瓦顶。男寺现存大门、过厅、南北讲堂、拜殿、主殿等。大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单檐歇山,上盖蓝色琉璃瓦。过厅面阔三间,进深三间,悬山卷棚,上盖绿色琉璃瓦。南北讲堂各三间,硬山卷棚,上盖灰瓦。拜殿为长方形,卷棚歇山,上盖绿色琉璃瓦,梁柱皆施彩绘,规模壮丽。主殿又称窑殿,位于拜殿之后,与拜殿相连,高耸挺拔,不用梁柱,保存了较

多的阿拉伯风格,上盖蓝色琉璃瓦。

开封东大寺位于开封市清平南街,为开封市现存规模最大的伊斯兰教建筑,市文物保护单位。始建年代不详,明永乐五年(1407年)重修,后几次毁于黄河洪水。现存建筑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所建。寺分三进院落,有大门、二门、左右廊房、讲堂、水房、大殿等。大门五间,上盖绿色琉璃瓦。大殿十间,高10米多,宽16米多,深24米,也盖绿色琉璃瓦,能同时容纳数百人举行宗教仪式。廊房内有明代阿拉伯文《古兰经》碑。

郑州北大寺位于郑州市清真寺街,始建于明,清代重修,为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大门、望月楼、大殿等。大门面阔三间,进深两间,歇山,上盖灰色筒瓦,飞檐挑角,造型优美。望月楼上下两层,平面呈正方形,重檐歇山,上盖绿色琉璃瓦,每层楼角皆挂有风铃,建筑精美,庄重大方。大殿为主体建筑,面阔五间,前后由卷棚、前殿、后殿、窑殿以硬山、卷棚、庀殿组成勾连搭式,上盖彩色琉璃瓦和灰筒瓦。殿内后窑饰以五彩。寺内还有一棵高约30米的古槐和碑刻19通。

三、教坊制与经堂教育

(一) 教坊制

中原伊斯兰教在管理上实行教坊制。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回民聚居区称为“教坊”。

明代中原教坊,实行三掌教制。三掌教指掌教、督教和赞教。

掌教称“伊玛目”,是全教坊穆斯林的首领,掌管教律执行,主持婚礼、葬礼和其他宗教仪式。

督教称“海忒布”或“海推布”,协助伊玛目管理教务,宣讲伊斯兰教教义。

赞教称“默尔精”，河南又称“唱礼”，按规定时间，召集穆斯林做礼拜。

清代前期，在三掌教外，又增加一名“设教”，即后来的开学阿訇。

清代中期以后，阿訇制代替了三掌教制。

中原伊斯兰教有格迪目派和伊赫瓦尼派，皆主张实行互不隶属的教坊制，每个清真寺为一独立单位。

三掌教或阿訇都是由清真寺里社头、乡老组成的会议聘请的。这种做法具有较多的民主气息，与中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门宦制度不同。

中原阿訇聘期为二三年、四五年不等。任期内有固定年薪，还可接受教徒礼品。

（二）经堂教育

经堂教育是旧时中原伊斯兰教培养宗教职业人才的教育。

经堂一般设在清真寺的厢房里。因为经堂里藏有伊斯兰教经典，所以有时也称“经房”。阿訇在这里给学徒讲经传教。

中原伊斯兰教采用汉文与阿拉伯文并重的教育。

清初，河南襄城县舍起灵（1638—1703年），曾先后在洛阳、荥阳、襄城等二十五处，开办经堂授徒，前后四十余年，培养出全国知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五十多人，其中河南籍九人。

清末，河南孟县杨振龙在开封、洛阳、孟县、沁阳、博爱、修武、襄城、禹州、南阳、荥阳、长葛等地发展经堂教育，也培养了大批伊斯兰教学者。

第五节 犹太教

犹太教是历史上开封犹太人所信奉的宗教。历经宋、金、元、明、

清五朝，曾在开封存在了七百余年。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开封犹太人被汉人彻底同化，犹太教也就不存在了。

一、开封犹太人

远在汉代和唐代，就有犹太人到中国，但开封犹太人不是那时遗留下来的。

开封犹太人是北宋时由国外来到开封的。他们向北宋皇帝进贡西洋布（即棉布，当时中原不会种棉），皇帝说：“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于是他们就在开封定居下来。

开封犹太人没有听说过耶稣基督，他们尊崇的主要是《摩西五经》，对《摩西五经》产生以后出现的其他犹太教经卷了解不多。这说明开封犹太人早在公元前好久就已离开巴勒斯坦本土。

开封犹太人自称“出自天竺”（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可能他们进入中国以前，已在印度等地居住了很长时期。

这支犹太人初到开封时，有 73 姓，500 多户，其中主要有李、俺、艾、高、穆、赵、周、张、石、黄、聂、金、左、白等姓，总人数约 2500 人。

这些犹太人的汉姓，都是到中国以后改的，如犹太人列微支派改姓李等。

犹太人到开封后，在语言、行为上“循由旧章”（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严格遵守犹太教的一套；而在衣冠礼乐上却“遵行时制”（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

犹太男子做礼拜时，头戴蓝帽，以区别于信仰伊斯兰教头戴白帽的回族人。

犹太人在开封从来不受歧视，政府对他们“一视同仁”（弘治二年

《重建清真寺记》碑)。许多犹太人曾在各地做官。如明代赵诚,曾任锦衣卫指挥、浙江都指挥僉事;高年曾任徽州歙县知县;举人艾俊曾任德府长史。清代赵承基,曾任大梁道中军守备;进士赵映乘曾任分巡福建漳南道等。

明代是开封犹太人口最兴旺发达的时期。当时有不少犹太人还迁到宁夏、淮南、扬州等地居住。

经过五六百年的淘汰离散,开封犹太人在清初剩下“七姓八家”。七姓为李、赵、艾、张、高、金、石。因赵姓有两支,故称“八家”。总人数共约 1000 人左右。

由于强大的汉族文化影响,许多犹太人走上科举道路,不再致力于犹太教经典的研究,使神职人员后继乏人;加之不准与外族人通婚的戒律逐渐废弛,不少犹太人与汉人通婚,使开封犹太人逐渐被汉人同化。

雍正元年(1723年),开封犹太人对希伯来文已很生疏,读起来带中国口音。但仍遵守割礼,守安息日,过逾越节、普珥节等犹太教节日。

十九世纪初,开封犹太人最后一个拉比(掌教)死去,从此再无人认识希伯来文。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黄河决口,开封城里被淹,犹太人损失惨重。咸丰元年(1851年),开封犹太人礼拜寺已破烂不堪,贫困的犹太人常将礼拜寺上的砖瓦、木料拆下来出卖。

同治六年(1867年),礼拜寺已不存在。开封有犹太遗民二三百家。他们已不做礼拜,不行割礼,虽然还知道有逾越节、感恩节、住棚节等,但已不过这些节日。他们家中有偶像,在面相、衣着上已与汉人没有什么不同。

1932年,开封有犹太人后裔二百人左右。他们对犹太教已一无所知。作为一个整体,已无宗教,开封犹太民族也早已不复存在。

现在,开封犹太人后裔 66 户,150 多人。生活习惯,全跟汉人一样。

二、开封犹太教

开封犹太人把他们信仰的犹太教称为“一赐乐业(以色列)教”。由于开封犹太人吃牛羊肉时要挑去大腿窝里的筋,所以外界也称犹太教为“挑筋教”。

开封犹太人承认自己是阿无罗汉(亚伯拉罕)的后裔,认为也摄(摩西)是一赐乐业教的“正教祖师”,曾著经文五十三卷,人人必须尊奉。

一赐乐业教认为耶和华是唯一的神,把他称之为“天”。

为了表示对天的敬畏,一赐乐业教徒每日早、中、晚要进行三次礼拜。礼拜之前,要斋戒沐浴,穿着整齐。礼拜时,不准互相交谈,不准向后看。

为了表示对祖宗的尊崇,一赐乐业教徒重视祭祀,祭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等。春祭用蔬菜,秋祭用果实,冬夏祭用当时的时新食品。“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他们祭祖跟敬天一样虔诚。

一赐乐业教徒严守安息日,每七日一次,星期六不升火做饭,所有的食品都在头一天准备好。每逢安息日,教徒都要到礼拜寺听掌教宣读一卷《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共五十三卷,正好一年宣读完。

一赐乐业教反对偶像崇拜。无论是耶和华还是犹太人祖先都无画像或塑像。认为“塑之以像态,绘之以形色者,徒事虚文,惊眩耳目。此固异端之说,彼固不足尚也”(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碑)。

一赐乐业教徒不准与外界通婚。男孩出生第八天要举行割礼,即用石刀割损阴茎包皮。

一赐乐业教禁食猪肉。食牛羊肉时要挑去腿窝里的筋。

犹太教不向外传授,只在本民族内遵守,这与佛教和基督教不同。开封所有的一赐乐业教徒都是犹太人,所有的犹太人也都是一赐乐业教徒。

犹太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犹太人之所以能在开封一直坚持到七百年之后才被同化,就是因为他们有犹太教作为生活准则和精神支柱。

但开封犹太人毕竟生活在中国,他们十分注意尊重中国文化。在礼拜寺内设皇帝“万岁牌”。他们认为,犹太教经卷“其中文字,虽古篆音异,而于《六经》之理,未尝不相同也”(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又认为犹太教与儒教在“敬天道,尊祖宗,重君臣,孝父母,和妻子,序尊卑,交朋友”方面都是一致的。还说做礼拜是为了尽“报国忠君之意”,祝皇上“国祚绵长,祝圣寿于万年”(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等。

三、开封犹太人的礼拜寺

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原来主要集中于耶路撒冷的圣殿。圣殿毁坏之后,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他们的宗教活动就在各地的“犹太会堂”里进行。犹太教规定,只要有十个犹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犹太会堂”。

开封犹太人的礼拜寺就是这样的“犹太会堂”。

开封犹太人把自己的礼拜寺称作“清真寺”或“道经寺”。“清真寺”这一名称虽然与伊斯兰教一样,但它的内容和实质却与伊斯兰教不同。

开封犹太人的礼拜寺初建于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年)。当时开封正处于金朝统治下。但北宋时期来华的这支犹太人不喜欢金朝,所

以他们的后代在记述建寺历史时,不用金国纪年,都说建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

礼拜寺的位置在今开封土街路东教经胡同(明代称线儿李胡同,清代称挑筋教胡同)一带。

开封犹太人十分重视他们的礼拜寺。从建寺至康熙二年(1663年)五百年间,曾分别于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天顺五年(1461年)、正德七年(1512年),清顺治十年(1653年),先后重修十次。重修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被黄河洪水淹毁或毁于火灾。

每次重修的经费皆由犹太人共同集资,有时也由某些犹太人出资包修一个或几个建筑物。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法籍神甫孟正气,曾到开封为犹太人礼拜寺画过两张线条图,一为全景,一为内观。

图中反映的是经明末黄河大水,清初重修后的礼拜寺面貌。

从图上可见,当时的礼拜寺宽约15丈,长约40丈,周围绕以围墙,共有三进院落。

大门朝东,礼拜时,教徒面朝西,朝向圣地耶路撒冷的方向。

大门两边有石狮一对。

大门内有牌楼一座,上书康熙皇帝“敬天祝国”四字。

过牌楼有一广场。广场后为二门。

过二门后,也有一广场。

礼拜寺的主要大殿,即一赐乐业殿,在第三进院落内,它宽约4丈,长约六丈。大殿四周,围以白色大理石栏杆。大殿前有铁香炉、石刻花盆等。

大殿后有后殿,称“至圣所”,外方内圆,是收藏犹太经卷的地方。

大殿旁有教祖殿(纪念犹太人祖先亚伯拉罕)、圣祖殿(纪念犹太

教创始人摩西)、讲经堂、厨房(挑筋处)等建筑。

这座礼拜寺既有犹太教的特征,又有中国的建筑风格。每当安息日,开封犹太人都要到寺中做礼拜。

开封犹太人的礼拜寺前后存在约七百年(1163年至1866年)。到十九世纪中叶,寺已全部毁坏,以后再未重建。1914年,礼拜寺的旧址被犹太人后裔卖给加拿大基督教新教圣公会修建教会医院。

礼拜寺中的石头莲花盆、藏犹太教经卷的金色圆筒等,也被加拿大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所得,现藏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礼拜寺内原来收藏的最有价值的文物是犹太教的经典《摩西五经》(《旧约》的前五卷,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开封犹太人称之为《正经》、《大经》或《道经》。

《摩西五经》皆用希伯来文写在羊皮上。明末寺中共有十三部,其中一部据说在当时已有四五百年历史。这部《摩西五经》所用的希伯来文无母音,与西方流传的古本相同。另外,全书分五十三卷,与后来西方流行的五十四卷本不同。这都说明开封犹太人礼拜寺中《摩西五经》的版本是很古老的。

开封犹太人原来把他们的犹太教经卷视若至宝,尊崇备至,不准抄写,不准窃卖。认为谁出卖经卷,就是出卖上帝。经卷对他们来说,具有最高的权威,是他们行动的准绳。

这些经卷,现在分别藏于伦敦犹太人布道会、牛津大学博得连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美国圣经公会、美国犹太人神学院图书馆等地。

康熙二年(1663年)《重建清真寺记》碑说当时的开封犹太人,“惧寺废而教众遂涣散莫复”,后来果如其言,寺毁而教亡,犹太人亦被同化。

四、犹太碑

犹太人在开封曾留下三块著名的犹太碑。三块碑上共刻五篇碑文,皆用汉文写成。

第一块碑立于明弘治二年(1489年)。正面碑文为弘治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作者金钟;反面碑文为明正德七年(1512年)《尊崇道经寺记》,作者左唐。

金钟和左唐都是犹太人。

这块碑最初竖立在犹太人礼拜寺大院中的碑亭内。清同治五年(1866年)前后,寺已全毁,碑亭亦毁。该碑曾一度矗立于礼拜寺废墟的空地上。

1912年,这块碑被在开封传播基督教新教的加拿大圣公会所得,移至“三一教堂”。现藏开封市博物馆。

第二块碑立于清康熙二年(1663年)。正面碑文为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作者刘昌;反面为《碑阴题名》,不署作者和时间,从内容看,也刻于康熙二年或其后不久。

作者刘昌,非犹太人,但与几个当官的犹太人为莫逆之交。

这块碑早在清同治五年(1866年)就已不见了,至今下落不明。但意大利的罗马保存有该碑正反两面的碑文拓片,相传是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葡萄牙传教士骆保禄神甫拓了寄到罗马去的。

第三块碑立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碑文为《祠堂述古碑记》,又称《清真寺赵氏建坊并开基源流序》,内容是记述赵姓犹太人的家史。碑文剥落严重,难以辨认。

这块碑也在1912年被加拿大圣公会移至“三一教堂”。现藏开封市博物馆。

这三块碑上,详细记载了犹太教的发展历史、基本教义,开封犹

太人做礼拜、祭祖先、守安息日的方法,开封犹太人的来华时间,开封犹太人礼拜寺始建和历次重修情况,开封犹太人礼拜寺所藏希伯来文经卷情况,开封犹太人的姓氏和历代著名人物,开封犹太人与中国其他地方犹太人的交往等,内容十分丰富。

为了阐述犹太教的历史、教义和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碑文中多次借用中国儒家、道家、佛教和伊斯兰教的术语,并引用《易经》、《诗经》等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字。每处地方都用得水乳交融,恰到好处。

民国初年,加拿大圣公会河南教区主教怀履光曾企图将明弘治二年和清康熙十八年两碑窃往国外,由于开封全城人民的反对,才未得逞。

这些碑对研究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历史以及古代中国的对外交往等,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从十七世纪初起,利玛窦和其他一些西方传教士曾先后对开封犹太人进行了长达三百年的接触研究,留下了一批文献资料。今天我们对开封犹太人和犹太教的了解,主要就是依靠这些文献和这几块开封犹太碑。

第五章 中原科技

中原古代,科技发达。自然科学家,人才辈出。不少科技发明,在当时处于全国和世界领先水平。

农学、医学、天文学和数学是中国古代最发达的四门自然科学。古代中原,在这些方面都曾取得很高成就。

第一节 天文学

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原又是中国天文学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中国古代天文学包括天象观测和历法两个主要方面。中原天文工作者在这两方面都达到了很高水平。

一、天象观测

天象观测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重要内容。“二十四史”中专门有记载这类资料的篇章,称为《天文志》。中原天文学家在天象观测的方法、仪器和成果研究上都曾作出重要贡献。中原地区还曾在大部分时

间内作为中国天象观测的基地。

(一) 春秋以前的天象观测

1. 裴李岗文化中的天象观测

天文学的发展,跟生产水平和人民的生活需要关系密切。原始社会中的中原先民,已学会靠观测天象来确定方位、时间和季节。

从中原距今八千年前后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可以看出,当时的房屋和墓葬,都是按一定的方位、方向进行建筑和布置的。这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如果不靠观测天象是难以做到的。

2. 《夏小正》中的天象观测资料

《夏小正》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物候著作。因传说为夏朝人所著,故而得名。它在西周和春秋时期流传于夏朝统治者后裔所建立的杞国(今河南杞县)一带。经后人研究,虽然无法确定它就是夏朝的作品,但其中有一些资料反映了夏朝的天文情况。

《夏小正》按夏历十二个月顺序,依次记载每月的星象、气象、物候和应从事的农事活动。其中的星象包括昏中星(黄昏时南方天空所见恒星)和旦中星(黎明时南方天空所见恒星)的变化、北斗星斗柄的每月指向、银河的位置、太阳的位置等。

这表明当时已达到一定的天文学水平。

3. 商代的天象观测

殷墟甲骨文中有许多观测天象的资料。雨、雪、雹、云、雷、虹等记载已很频繁。日食、月食、火星、鸟星、新星等恒星,木星等行星,彗星、日珥等也都有记载。

殷墟甲骨文中有一条关于日食的刻辞说:“癸酉贞:日夕有食,佳若?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殷墟佚存》第347片)其意是说,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吉利的吗? 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

这是中国最早的日食记载。学者们认为,这次日食大约发生在公

元前 1200 年左右,比巴比伦可靠的日食记录还要早。

4. 登封周公测影台

西周初年,周公曾在中原立圭表^①,测量日影。其遗址在今河南登封告城镇。根据圭表日影长短的变化,可以定出每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节气的时日和一年精确的时间长度。

唐代负责天文工作的官员南宫说,曾在该遗址上立石表一座,上刻“周公测影台”五字。

中原周公测影台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台,比公元前二世纪西方最早的亚历山大天文台和罗得斯观星台都要早得多。

(二) 石申与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战国时期,魏国石申著有《天文》八卷,为古代中原乃至中国最古老的天文学专著。西汉以后被尊称为《石氏星经》。

《石氏星经》的内容包括五星运动、交食和恒星等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记载有 121 颗恒星的坐标位置。(经今人计算,其二十八宿距度等,确与石申所处时代相合)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

《石氏星经》虽已亡佚,但《史记》和《汉书》中保存有一些引文,唐代《开元占经》中有大量节录。

(三) 张衡与世界上最早的漏水转浑天仪

张衡(78—139 年),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曾两度任太史令,前后 14 年,在天文学上有卓越成就。还是文学家和思想家。郭沫若在他墓碑上的题辞称:“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

^① 圭表是一种古老的天文仪器。创制年代不可考,大约在商代就已产生。由圭和表两部分组成。表是直立在平地上的标杆(石柱或铜柱),圭是正南北方向平放在地面的尺(石制或铜制)。表立在圭的南端,并与圭相垂直。根据正午表影在圭上的长度,可以推定二十四节气。由表影长短的周期性变化,可确定一回归年的日数。表影正北的时刻,就是当地的正午。郑玄:《周礼注》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古希腊开始用圭表,在公元前 6 世纪,比中国晚得多。

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张衡写有《灵宪》和《浑天仪》两种著名的天文学著作。他认为大地是个圆球，宇宙是无限的，月光是由日光照射而产生的，月食是由于地球遮住了日光而形成的。这些观点都是符合科学的。

张衡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漏水转浑天仪。这种浑天仪的主要部分是浑象。浑象是一个直径四尺多的铜球，上面刻有黄道、赤道、二十八宿、南北极等，类似现代的天球仪。它原是西汉耿寿昌发明的，张衡又对它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浑天仪的另一部分是古代计时器漏壶和齿轮传送系统。张衡将浑象与漏壶联结在一起，漏壶定时漏水带动齿轮转动，使浑象随着时间推移，每天转动一周，借以演示天象。由于浑象的转动速度与地球的自转速度相等，所以它显示的天象和夜空中真正的天象完全相符。

浑象和计时漏壶虽然前已有之，但用齿轮系统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天文表演仪器，却完全是张衡的创造。这项被称为“漏水转浑天仪”的发明，成为后来天文钟的前身。

张衡根据观测，统计出当时在中原地区能看到的星球共约 2500 颗，这与现代天文学认为用人类肉眼能看到的六等以上星数为 2500 至 3000 颗是很接近的。它表明 1800 多年前，中原人的天象观测能力已达到惊人的水平。

张衡还发明在五丈高的长杆上安装可以随风转动的铜鸟，用以观测风向。这种仪器称为“相风铜鸟”，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向计。西方国家到十二世纪才会在屋顶上安装“风信鸡”，比中国晚得多。

（四）张子信与太阳视运动不均匀性现象的发现

张子信，北齐河内（今河南沁阳）人。除一度被征为太中大夫之外，长期隐居山中。潜心观测天象 30 年，为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

张子信是我国古代最先发现行星运动速度有周期性变化的人，并发现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

张子信还发现,当合朔发生在黄道和白道的交点附近时,如月球在黄道北,则有日食;如月球在黄道南,虽在食限里,也可能不发生日食。这种现象,反映了视差对交食的影响。

张子信的这些发现,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继东晋虞喜发现岁差现象之后,又一划时代的发现,对后世历法改进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导致了隋唐时期天文学的飞跃发展。

(五) 一行与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

一行(683—727年),本名张遂,唐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唐初功臣张公谨之曾孙。青少年时期开始钻研天文学。武则天时,为了避免与武三思(武则天之侄)来往,在嵩山出家为僧,取名一行,成为佛教密宗的首领。

由于李淳风的《麟德历》几次预报日食不准,唐玄宗即位后,召一行进京,编制新的历法。一行认为,要使新历符合天象实际,就必须进行实测。开元十二年(724年)他在全国选择十一个地方,进行当地北极高度和冬夏至、春秋分太阳影子长度的测量。

这次测量中,一行以中原地区经度相近的白马(今河南滑县)、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属河南)、上蔡(今属河南)四地为重点。测量结果表明:如果南北两地的北极高度(实际即地理纬度)相差一度,则两地之间的地面距离相隔351里80步(相当于129.22公里)。这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度。

子午线即经线,是通过地面上某一点及地球南北极的平面同地球表面的交线。测量子午线一度的长短,实际就是测量地球的大小。

现代科学证明,子午线一度的实际长度为111.2公里,一行的测量结果虽然不很准确,但却是世界上第一次对地球子午线的实测,意义巨大。它否定了古代所谓“南北隔千里,影长差一寸”的传统说法。这是天文学史上的一次创举,比最早由阿拉伯人对子午线的实测早

90年。

一行还在张衡漏水转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制造了一座以水力推动而运转的浑象,叫做“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或“水运浑天”。它上面装有报时器。报时器上有两个木头人,一人管打鼓,一人管敲钟。一行把浑象放在木头柜子里,一部分露在柜外,一部分藏在柜内,两个木头人在柜面上分立于浑象两侧。随着浑象的转动,每过一刻钟,则一木人击鼓,每过一个时辰(二小时),则另一木人敲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

一行又是第一个发现恒星移动现象的人。他制造了一架黄道游仪,并用这架仪器观察了150多个恒星的位置,发现这些恒星的位置与汉代所测的位置有很大变化。这比英国人哈雷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说,约早1000年。

(六) 宋代开封的恒星观测

北宋时期,在开封曾对恒星位置进行五次大规模的观测。其中第四次观测在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观测结果被南宋人绘成星图,刻在石碑上。此星图石刻现藏苏州,是现存世界上著名的大型石刻实测天文图。第五次观测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这次观测发现,二十八宿距度误差,平均仅0.15度,比起前人,大为精确。

(七) 元代登封观星台

元代登封观星台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它位于登封市区东南15公里处,建于元朝初年。

这座天文台由砖石砌成,分台体和石圭两部分。台体高9.46米,北侧有砖砌凹槽直壁充当铜表。石圭又称“量天尺”,南接凹槽直壁下部,由36块青石在地上连接向北铺成,长31.196米。

登封观星台有测量日影、观测星象、滴漏记时等多种功能。它设计科学,使用方便,曾在中国天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八）王英明与西方天文学

王英明，字子晦，明代开州（今河南濮阳）人。万历时举人。

王英明认识欧洲来华的天文学家，是中国最早向西方学习天文学的人士之一。著有《历体略》三卷，共十七篇。书中介绍了国外研究天文学的成果，是在徐光启之前较早全面、系统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的天文学家。

《历体略》所论，都是天文学的基本内容，为初学天文者的入门之书。王英明在书中还注意把中国的天文学成果与西方的天文学思想结合起来叙述，“所讲中法，亦皆与西法相吻合”（《四库提要》语）。

二、历 法

历法就是根据一定法则去计算编排年、月、日、正朔、节气、日月食等的方法。

历法是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又一重要内容。“二十四史”中专门记载历法的部分，称为《历志》。

历法以天象观测为基础。

古代中原人编制的历书，著名的有《戊寅元历》、《大衍历》、《应天历》和《圣寿万年历》等。至于从事历法活动，则源远流长。

（一）周代以前的历法

原始社会，中原先民已知道寒暑季节变化。

据文献记载，夏代中原已会分一年为十二个月，并会用天干纪日，且有十天为一旬的概念。

从甲骨刻辞可见，殷代中原历法，确知的有如下几点：一是用阴阳合历，有闰月。闰月最初置于年终，后改在年中。二是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三个月。三是月有大、小之分，大月30天，

小月 29 天。一年中大小月相间。季节和月份有大致固定的关系。四是纪月用数字,纪日用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相配合组成的六十干支。殷代还把一天分为旦(早晨)、中日(午)、夕(晚)等时间。

殷代的阴阳合历体系,曾在中国沿用数千年。

周代中原历法比以前更进步,当时用十二地支纪时,并分一天为十二个时辰。

(二) 张苍对《颛顼历》的整理

张苍(?—前 152 年),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曾任丞相,封北平侯,为著名历法学家。

战国时期制定的《颛顼历》^①,在秦末农民起义中被毁。汉朝建立后,张苍对它进行了重新整理,使之在西汉初期继续使用了一百年,才被邓平、落下闳等创制的《太初历》所代替。

(三) 傅仁均与《戊寅元历》

唐代滑州(今河南滑县)人傅仁均(官至太史令),在唐高祖武德二年(619 年),曾与崔善为一起制定《戊寅元历》。

中国以前的历法皆用平朔法^②制定。《戊寅元历》是中国第一部采用定朔法^③的历法。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

① 《颛顼历》为古六历之一。它是四分历。以一回归年为 $365\frac{1}{4}$ 日,一朔望月为 $29\frac{499}{940}$ 日,19 年中设 7 个闰月。以立春为一年节气的计算起点。用夏正,以十月为岁首,岁终置闰。它是秦朝统一后,颁布全国的历法。

② 平朔,又称“恒朔”。中国古代历法家取月的平均日数为 29.5 日,大月 30 日,小月 29 日,大小月相间,用这种方法定出的每月初一日叫“平朔”。这样做,太阳和月球黄经相等的时刻不一定在每月初一,日食因此有时发生在月终晦日或初二,这是平朔法的缺点。

③ 将太阳和月球黄经相等(合朔)的那一天,定为每月的初一日,叫“定朔”。定朔法比平朔法更符合天象变化实际。南朝宋何承天,隋刘孝孙、刘焯等都建议在历法中采用定朔法,但都未被政府采用。

《戊寅元历》在唐初曾使用了半个世纪。

(四) 一行与《大衍历》

一行(683—727年),本名张遂,唐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测子午线的人,前文已述及。

一行在编制新的历法上也作出了很大成绩。他于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至十五年(727年),编出了《大衍历》的初稿。逝世后,由他的继承人于开元十六年(728年)整理定稿。《大衍历》对太阳视运动不均匀规律的描述比前人更合实际,对日月食的确定也有很大改进。

《大衍历》是定气(节气)历,以定气编太阳运行表。它将太阳在一个回归年内所行度数分为24分,太阳每到一个分点,为一个节气。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不相等。一行还发明不等间距二次差内插法来对它进行计算。在金、木、水、火、土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上,他采用具有正弦函数性质的表格和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他还提出全国不同地点对标准点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的食差算法。《大衍历》比以前唐代的任何历法都精密。

《大衍历》共有历术七篇,略例一篇,历议十篇,结构严谨,条理清楚。此后修历皆仿《大衍历》结构,直至明末用西欧办法编历为止。

《大衍历》于开元十七年(729年)颁行全国,唐肃宗上元二年(761年)停止,前后使用32年。它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年)传到日本,在日本使用了近百年。

(五) 王处讷与《应天历》

王处讷,北宋洛阳人,曾任司天监等职。由于五代时王朴所编《钦天历》,多有疏误,他于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编成《应天历》。经宋太祖作序后,第二年开始在全国使用,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为止。

《应天历》比以前的历法更完备,前后使用十八年。它的一个特点是将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为中国有更点制的开始。

(六) 朱载堉与《圣寿万年历》

朱载堉(1536—约 1610 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沁阳(今属河南)人。早年从舅父何瑋学天文、数学。后因父亲被捕入狱,他筑土室于王宫门外,独居十年,钻研天文、数学、律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明初使用的《大统历》,就是元代郭守敬创制的《授时历》。用了 270 多年,未曾改动。成化(1465—1487 年)以后,预报日月食往往不准,故人们纷纷议论改历。

针对这种情况,朱载堉先后编成《圣寿万年历》和《黄钟历》。前者以嘉靖三十三年(1554 年)为历元,后者以万历九年(1581 年)为历元。二历皆源于《授时历》,但修正了《授时历》的一些错误。其论述历算岁差的方法,尤为详密。

由于朝廷主管历法官员的保守,朱载堉的《圣寿万年历》和《黄钟历》都未能代替《授时历》而颁行使用,但在我国历法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医药学

中国医药学是中国独创的并无法由世界其他医药学代替的传统科学。它以整体观念、辨证施治、防治结合见长,曾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中原地区在医疗、方剂、本草、针灸、医史等中国医药学的重要领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并出现了像张仲景、张从正等那样一些伟大的医学家。

一、医 疗 学

医疗学是研究人类疾病发生、发展规律以及防止和消灭疾病的科学。殷墟甲骨文中已有不少治疗内科、外科、妇科和五官科疾病的记载,但中医治疗学的基本内容,是汉代张仲景奠定的。

(一) 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约 150—219 年),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今属河南)人。相传曾任长沙太守,为汉代著名医学家。

东汉末年,天下战乱,瘟疫流行。张仲景家族二百余人,不到十年,死去三分之二,而其中死于伤寒病者又占十分之七。这种情况,激发了他刻苦钻研医学的决心。他认真总结前人的医疗经验,广泛搜集民间验方,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写成不朽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十六卷。

《伤寒杂病论》集医家之大成,体大思精,被历代医者奉为经典,张仲景也因此被尊为医圣。一千多年来,中外学者研究、整理、注释张仲景著作而成书者达 1700 多家。

《伤寒杂病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论述外感热病,即伤寒,二是论述内科杂症,即杂病。《伤寒杂病论》成书之后,因遭兵火,辗转散佚。经西晋王叔和搜集整理后,便把它分为《伤寒论》和《金匱要略》(又称《金匱玉函要略》或《金匱玉函经》)两书,流传至今。要是将二书合起来,就是《伤寒杂病论》。

张仲景在中医学上的杰出贡献,主要是在诊断、治疗和方剂三方面。在诊断上,他确立了辨别症状的六经和八纲思想。六经即太阳、阳明、少阳(三阳症,多属热症、实证)和太阴、少阴,厥阴(三阴症,多属寒症、虚症)。张仲景在书中按此六经分症,把各种复杂的疾病分为六大类,即六大症候群,分别论述每类疾病的基本特征、相应治法,以

及相关的并发病或因治疗不当引起的病变等。八纲即阴、阳、寒、热、虚、实、表、里。张仲景以阴阳为总纲,对病先辨明是阴症还是阳症,然后再区别表里、寒热和虚实的不同,通过认识症候的属性和表现,做到对症下药。这就为中医病因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在治疗方面,张仲景提出了辨症施治的八种方法,即病在肌表用汗法,病壅于上用吐法,病实于里用下法,病在半表半里用和法,寒症用温法,热症用清法,虚症用补法,肿滞用消法。这又为中医治疗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在方剂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书中记载各种药方 375 首,所用药物达 384 种。这些药方成为后来中医处方的基础,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疗效显著。该书因而被誉为“方书之祖”。下文讲方剂学时还要谈到。

由《伤寒杂病论》分编成的《伤寒论》和《金匱要略》,不但是中国历代学习中医的必读教科书,而且流传到日本、朝鲜、蒙古和越南,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 张文仲与《疗风气诸方》

唐代张文仲,洛阳人,曾做尚药奉御,为武则天时御医。他是治疗风疾的名医,著有《疗风气诸方》和《随身备急方》等书。

张文仲认为:“风有一百二十四种,气有八十种。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性,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唯脚气、头风、上气尝须服药不绝,自余则随其发动,临时消息之。”(《旧唐书·张文仲传》)这种观点颇有见地。

(三) 孟诜与养生医学

唐代孟诜,汝州(今属河南)人,曾任凤阁舍人、同州刺史等职。退休后,住在伊阳山中,专门研究养生学。著有《补养方》三卷、《必效方》十卷、《食疗本草》三卷,是养生学专家。他认为,要想保身养性,“常需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旧唐书·孟诜传》)。

(四) 甄立言与内科

唐代甄立言,许州扶沟(今属河南)人,曾任御史大夫等职。为内科名医。著有《本草音义》七卷、《本草药性》三卷和《古今灵验方》五十卷等。有一个尼姑,患心腹鼓胀已二年。甄立言诊断后,断定她腹中有虫,系误食头发所至,因令其服雄黄,结果吐出小指头大一条虫,病便好了。另有一个叫杜淹的人,患风毒发肿。甄立言诊断后,认为他只能活十一天,后来果如其言。

(五) 郭雍与《伤寒补亡论》

宋代郭雍,字子和,洛阳人,对《伤寒论》研究很深。

张仲景医术高超,振古无伦。经王叔和整理的《伤寒论》,虽被历代名医奉为指南,但与张仲景原书相比,内容略有亡佚。郭雍著《伤寒补亡论》二十卷,对《伤寒论》进行疏解补充,并作了创造性的发挥。

(六) 张从正与“攻下派”

张从正(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金代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人。自幼刻苦学习,青年时便成为名医。曾在太医院任御医四年,后辞归故里。

张从正精通内、外各科,是一个具有革新思想的医学家。他认为疾病是由邪气侵入所致,主张用“汗、吐、下”三种方法治病,人称“攻下派”。凡风寒致病,在皮肤间、经络内的,用汗法,包括针灸、洗熏、推拿、气功等解表的都属汗法。凡风痰宿食,在胸膈或上腕的,用吐法,包括豁痰、引涎、催泪、喷嚏等上行的都属吐法。凡寒湿痼冷,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疾病,用下法,包括行气、通经、下乳、逐积、消水等下行的都属下法。“汗、吐、下”三法,是张从正医学理论的精华。当时官僚贵族生病,好补成风,张从正力主攻下,从临症实际出发,反对迷信补药,亦具有进步意义。

用张从正的医方治病,“起疾救死多取效”(《金史·张从正传》)。如当时有人在他指导下,取六一散,以新汲井水锉生姜调服,治霍乱

重症,就曾获得神奇的效果。

张从正的主要著作是《儒门事亲》十五卷。此外还有《治病撮要》一卷、《张氏经验方》和《秘传方》各二卷等。由于他在医学上的卓越成就,后人把他与金代刘完素、李杲和元代朱震亨并称为金元四大名医^①。他的著作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并流传日本等国。

(七) 吕坤与《疹科》

明代吕坤(1536—1618年),字叔简,号心吾,宁陵(今属河南)人,曾任刑部侍郎等职。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上书陈时弊,触犯权贵,引疾回乡,著书讲学二十余年。所著《疹科》一卷,是治疗疹病的专著。

痘、疹不同,诸家医书多详痘而略疹,或只讲痘而不讲疹。吕坤的《疹科》,对疹病进行了详细论述。并附以医方,是治疗疹病的重要参考文献。

(八) 杨浚和刘鸿恩的医术

清代,中原有医药学著作的名医,不下二百五十家。其中著名的有杨浚和刘鸿恩等。

杨浚,字玉衡,夏邑(今属河南)人,乾隆时贡生。他是温病专家,著有《伤寒温疫条辨》六卷,辨别伤寒与温病的不同之处,指出温病的根源、脉症、治法、方论等,颇有价值。

刘鸿恩,字位卿,号春舫,尉氏(今属河南)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进士,曾任陕西凤邠道、署按察使等职。著《医门八法》四卷,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法,为医家重要入门书。于病情复杂,方剂分歧,皆能探讨论辩,提纲挈领以阐明其要旨,使后学者易于掌握。

^① 他们四人各为一派。张从正是“攻下派”。刘完素长于使用清热去火的凉药,被称为“寒凉派”。李杲长于使用补养脾胃的补药,被称为“补土派”。朱震亨长于使用泻火滋阴之药,被称为“养阴派”。

二、方剂学

方剂学是中国医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研究药方的组成原则、药物配伍、剂量、功效、主治和剂型等。

(一) 伊尹制汤液

殷墟甲骨文有关于汤剂和药酒的记载,说明当时中原已会煎熬中药治病。

传说“伊尹制汤液”。伊尹,名伊,一说名挚,尹是官名,曾任商朝第一代国王商汤的宰相。相传他是河南西部伊河流域人。因此,中药汤剂最早大约是在中原产生的。

(二) 张仲景与《张仲景方》

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因记载各种药方 375 首,用药 384 种,从而被称为“方书之祖”,前文已提到。这些医方,见于《伤寒论》的 113 首,用药 170 种;见于《金匱要略》的 262 首,用药 214 种。包括汤剂、散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软膏剂、灌肠剂、肛门栓剂、阴道栓剂等。对药物炮制、配伍原则和用法都提出了严格要求。元代名医朱震亨称:“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局方发挥》)对中国医药学贡献极大。

此外,张仲景还在系统研究前人方剂成果的基础上,撰“论伊尹汤液为十数卷”(南宋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引晋皇甫谧语)。张仲景的原方,后经王叔和编辑整理为《张仲景方》十五卷,它是中国最早的方书之一。可惜已经亡佚。

(三) 阮炳与《阮河南药方》

西晋阮炳,字叔文,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任河南尹。精于医术,著《阮河南药方》十六卷。善用苦酢之药,有起死回生之效。他认为,“除热解毒,无过苦酢之物;不用苦酢,如救火不以水,必

不可得脱免也”。非一般后世名医可比。其书已佚，唐孙思邈《千金方》中有若干引文。

（四）范汪与《范东阳方》

东晋范汪，字玄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善医术，常以拯恤为事，凡有疾病，不限贵贱，皆为治，十能愈其八九。”（《晋书·范汪传》）尤以治疗杂病擅长，著《范东阳方》一百零五卷，“后人采用，多获其效”（《晋书·范汪传》），全书已佚，有一部分存于《太平御览》中。

（五）北齐石刻药方

洛阳龙门石窟药方洞中保存有我国最早的石刻药方，刻于北齐武平六年（575年）。其中有完整的药方118个，是北齐中原医学家临床经验的结晶。

这些药方治疗的疾病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肿瘤科、传染病等。剂型有丸、散、膏、汤多种，用法分服、洗、熏、敷各类。所用药材大多为中原地区所产动植物，既有疗效，又便于采集。

（六）王怀隐与《太平圣惠方》

北宋王怀隐，宋州睢阳（今河南商丘）人。起初为道士，住开封建隆观。善医术，宋太宗为开封尹时，曾请他看过病。后奉命还俗，任翰林医官使。

宋太宗重视医学，自藏名方千余首，又令翰林医官各献家传验方，得万余首，派王怀隐等于淳化三年（992年）编成《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刻版颁行天下，命诸州各设医学博士掌管。

《太平圣惠方》每部分皆以隋太医令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冠首，然后汇集方药。共收药方16834首，分为1670类。由于该书广泛搜集前代方书和民间验方，对病症、病理、方剂、药物也有论述，故内容相当丰富，反映了当时的医学水平。

(七) 王贶与《全生指迷方》

北宋王贶,字子亨,考城(今河南兰考)人。以医术受朝廷重视,官至朝请大夫。著《全生指迷方》三卷,传本久绝,清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依类编次,分为四卷,共二十一门。

《四库提要》称:“此书于每症之前,非惟详其病状,且一一论其病源,使读者有所据依,易于运用。其脉论及辨脉法诸条,皆明白晓畅。凡三部九候之形,病症变化之象,及脉与病相应不相应之故,无不辨其疑似,剖析微茫,亦可为诊家之枢要。”它不但是重要方书,对诊断学也很有贡献。

(八) 朱橚与《普济方》

明代周定王朱橚(?—1425年)是明王朝封于开封的第一代周王。他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来到开封,建周王府,世代相传,直至明亡。

朱橚精通医学,著有我国中医方书中规模最大的著作《普济方》四百二十六卷。其中包括有1960论,2175类,778法,61739方,239图。

《普济方》中保存了大量医学资料,李时珍《本草纲目》的附方,大多采用自此书。

三、本草学

本草是中药的统称。本草学即药物学。药有玉石、草木、虫兽等类,而诸药以草类最多,故记载中药的书籍多称本草。

中原医家一向重视本草研究。

东汉蔡邕著有《本草》七卷。唐代长孙无忌等著有《本草》二十卷。

中原研究本草最兴旺的时期是宋朝,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宋太

祖开宝七年(974年),李昉等撰《开宝本草》二十一卷,收药 983 种。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掌禹锡、林亿等撰《补注神农本草》二十卷。其撰写方法是以《开宝本草》和其他各家本草进行参校,采拾遗佚,共收新旧药 1082 种。又称为《嘉祐本草》。与此同时,朝廷又令各州县绘制当地所产药本,送到开封,由掌禹锡等哀集众说,类聚詮次,编成《本草图经》二十卷。明代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即以该书为蓝本。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年),朝廷令唐慎微等编成《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三十二卷,又称《大观本草》,收药 1746 种。宋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曹孝忠撰《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又称《政和本草》。此外,宋代洛阳人王侯还撰《编类本草单方》三十五卷,取本草诸药条下所载单方,分类编列,共 4206 方。

北宋时期,在开封对本草的历次增订、研究,为以后中国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针灸学

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社会,中原先民会用砭石治病。用砭镰、砭刀做外科手术,用砭镞、砭针做针刺,用砭核作按摩、热熨等。

中原古代对针灸有突出贡献的人是甄权和王惟一。

(一) 甄权与《明堂人形图》

唐代甄权,许州扶沟(今属河南)人,曾任隋秘书省正字、唐朝散大夫等职。是针灸名医。著有《明堂人形图》一卷、《针方》一卷,《针经抄》三卷和《脉经》一卷。

甄权是前文所述唐代内科名医甄立言之兄。兄弟二人,皆因母亲生病,才去研究医学的。

隋朝鲁州刺史庠狄嵌,生风疾,手不能拉弓,诸医皆不能治。甄权

取其肩隅一穴，一针下去，便能拉弓射箭。他治病，大多如此具有神效。甄权活了103岁，唐太宗曾亲自到他家，访以医药，赐几杖衣服。

（二）王惟一与腧穴铜人

北宋时期，中原针灸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朝廷御用医官王惟一，总结前人针灸医疗经验，考定了明堂经络孔穴，在开封设计铸成两个同真人身体一般大的针灸腧穴铜人模型。铜人身体表面刻制腧穴，并标注名称，使穴位一目了然。这两个铜人，一藏翰林医官院，一藏相国寺。

王惟一还纂集旧闻，订正讹误，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用图说明治病穴位，由朝廷颁行全国。

图经和铜人对针灸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早就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北宋末年，宋朝被金国打败时，金人曾指定以铜人作为议和条件之一，可见价值之大。

五、医史

古代医家不受重视，许多名医无传，籍贯履历不清。流传至今的不少有名医著，皆不知作者姓名，或有姓名，而爵履不明。

明代李濂，字川父，祥符（今河南开封）人，曾任山西按察司金事等职。著有《医史》十卷，为历代医药学家树碑立传。

《医史》采录古代名医，自《左传》医和以下，迄元李杲，见于史传者五十五人；又采诸家文集自宋张扩以下，迄张养正，凡十人；其张机、王叔和、王冰、王履、戴原礼、葛应雷六人，李濂为之补传。每传之后，各附论断。

此外，另一开封人朱睦㮮著有《医史》四卷。

研究医史，是明代中原医学的一个新动向，其研究成果亦在国内首屈一指。

第三节 农学和植物学

一、农 学

中原古代农业,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走在全国的前面,达到了很高的发展水平。

(一) 粮食作物栽培

七八千年以前,中原已有原始农业。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人工栽培的谷物。其中粟,古称禾、谷(小米),起源于中国北方,由狗尾巴草驯化而来。裴李岗出土的碳化粟,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粟。

五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有稻谷痕迹,陶器上也印有稻的植株。

原始社会末期,中原开始种麦。

殷墟甲骨文中有黍、稷、来(小麦)、麦(大麦)等记载。据于省吾统计,甲骨文卜黍之占有 106 条之多。(据《中国青铜时代》)可见黍、稷成为殷人的主要粮食。

此外,殷墟甲骨文中出现的粮食作物名称还有粱、糜、芑、秔等谷类;稻、稭等稻类;牟等麦类;菽、荏等豆类。表明商代中原农作物的种类相当繁多。

西周时中原农业,在《诗经》上有所反映。主要作物是黍、稷、稻、麦等。已经懂得治虫、选种、灌溉等技术。

东周时,中原已开始使用旱田改水田的技术。据《战国策》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所以只好将稻田改种麦。这里的东周和西周都在今洛阳附近。

战国初期,魏文侯已在今安阳一带用泡水种稻法,利用盐碱土栽

培粮食作物。《汉书·沟洫志》曾记载说：“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乌卤兮生稻粱。”

战国时，注意精耕细作，施肥、除草、密植已成为基本技术。

西汉时，中原农业技术飞跃发展。黄河、汝河之间，农田会用复种技术，“四种而五获”（《管子·治国》）。武帝时，发明“代田法”，采用轮作制度。耕作技术、田间管理技术有很大提高。平整土地、适时播种、施用绿肥、改良土壤、除虫除草、预防霜冻、积雪保墒等技术普遍使用。

东汉时，南阳出现稻麦水旱轮作。《南都赋》云：“决渫则曠，为溉为陆，冬秣夏穉，随时代熟。”《广韵》解释说：“穉，稻下种麦。”

南北朝时，农业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重视选种育种，注意因地制宜，适时播种，中耕除草，防旱保墒。

唐宋时期，中原农业进一步发展。到了元代，强调地宜时宜，推广优良品种，发展农田水利，讲究牛耕技巧。

明代以来，中原不断引进新作物，如玉米、红薯等。玉米原产美洲，后传至欧洲，又传至南洋，再传我国沿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钩州志》载，当时该地已种玉米。

红薯原产美洲。明代万历时，开始由越南、吕宋引进到广东、福建。明末，中原开始种植。清初，普及中原各地。

（二）粮食贮藏

原始社会，中原先民把粮食贮藏在地窖内，到商代已会用廩贮藏谷物。殷墟甲骨文中有廩字，说明谷物贮藏方法已由地下发展到地上。

战国时，洛阳出现大型粮窖。1970—1973年，在洛阳先后发现粮窖74座。它们分布于南北长400米、东西宽300米的范围内，东西、南北大体成排。窖为圆形，口大底小，一般口径为10米左右，深为10米左右。这一粮窖群兴建于战国中期或更早。

隋唐两代洛阳的含嘉仓是我国已知最大的地下贮藏仓库。含嘉仓在隋唐洛阳宫城东北。据钻探,仓城东西 600 米,南北 700 米。1971 年,发现了数以百计的仓窖,并有仓铭砖出土。砖铭上记载该仓在仓城中的位置,储粮数量,入窖年月,管理人员职务姓名,粮食来源等。地下粮窖有防火、防盗、防潮、防鼠、防雀、储量大、建筑费用低等优点,是中原劳动人民储粮的先进方法。

(三) 粮食加工

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经碳-14 测定,绝对年代为公元前 5935±480 年。它说明距今七八千年前,中原已有粮食加工工具。在裴李岗出土的石磨盘共有 40 件,皆为砂石琢制而成。磨盘平面皆作椭圆形,分有足和无足两种;足为柱形,每个磨盘四足。最长的磨盘达 73.8 厘米,厚达 10 厘米以上,腰部凹下 2 厘米,皆有使用痕迹。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磨制粮食的器具。

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墓出土有加工谷物的陶风车。风车有方形出米口、圆形风口、风扇、曲轴等构件。这说明最迟在西汉晚期,中原已出现加工谷物的风车。

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创有自动舂车和磨车。《邺中记》云:“石虎……又有舂车木人,乃作行碓于车上,车动则木人踏碓舂,行十里成米一斛。又有磨车,置石磨于车上,行十里辄磨麦一斛。”

(四) 经济作物栽培

殷墟甲骨文中有关于桑蚕、丝帛的记载。殷墟还出土有粘附于青铜器上的丝绸残片。当时的丝绸有平织、斜织、回纹、云锦纹等图案。这表明中原的桑蚕业起源很早。

西周和春秋时期,中原的桑蚕业得到进一步普及。《诗·卫风·氓》云:“桑之未落,其叶沃若。”《诗·郑风·将仲子》云:“无折我树桑。”《诗·邶风·桑中》云:“期我乎桑中。”《诗·邶风·绿衣》云:“绿兮丝兮,女所治兮。”这些都表明当时的桑蚕业相当兴旺。

殷墟甲骨文上有麻、纆等麻类作物的记载。春秋时,中原已采用沤渍法提取麻纤维。《诗·陈风·东门之池》云:“东门之池,可以沤麻。”

明代以来,棉花和烟草等经济作物引进中原。棉花从国外传来后,先在边疆种植,宋元时在内地推广,明代“中州沃壤,半植木棉”(钟化民:《救灾图说》)。

烟草原产墨西哥,后传至菲律宾。明中叶传入闽广,明末传到中原,后逐渐推广,至清末,河南烟叶闻名全国,产量、质量都很高。

(五) 家畜饲养

距今七八千年以前,中原已开始饲养猪、羊。在裴李岗遗址上,1978年发现了陶塑猪头二件,张口、短嘴;陶塑羊头一件,角长而粗。还发现猪羊头骨和牙齿。这说明当时已饲养猪、羊等家畜。

殷墟甲骨文上有马、牛、羊、鸡、犬、豕等字样,还有牢、厩等记载。说明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代,家畜品种增多,并已进行舍饲,出现了猪圈、羊牢、马厩等。殷墟还发现有绵羊头骨,被命名为“殷羊”。

中原地区,出土有很多汉代猪圈模型。这些模型有独立式,有与厕所连接在一起的,有与作坊连接在一起的。其中以与厕所相连接的最多。这说明当时已开始采用人厕连猪舍的养猪积肥法。

(六) 花果蔬菜的栽培和鱼的养殖

在古代,与作物相比,花卉栽培,地位较次。因其“徒有春花,而无秋实”(贾思勰:《齐民要术》序)。《诗·郑风·溱洧》讲郑国男女到溱洧二水(今河南密县一带)岸边相聚,彼此以芍药和兰花相赠,是中国关于花卉植物的最早记载。

但由于花卉有观赏和药用等价值,所以在中原的栽种也越来越普遍。西汉时,茂陵富人袁广汉曾在洛阳北邙山修筑私人园林,广栽花木。

中原花卉中最有名的是洛阳牡丹。牡丹原为野生,后经人工栽培

为观赏花卉。秦汉时《神农本草经》有牡丹根皮入药的记载。隋代成为奇花,唐宋时最盛,成为全国名花,至今犹声名不衰。

唐代洛阳牡丹有红、白、黄、紫等色,硕大美妍。

宋代,中原花卉大发展。有“洛阳牡丹甲天下”之誉。除洛阳以外,陈州(今河南淮阳)牡丹亦颇负盛名。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反映了当时牡丹的生长盛况。宋代洛阳各个园圃共种有牡丹数十万株,其品种在《洛阳牡丹记》中为 24 个,到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中已达 109 个。广泛采用杂交、嫁接手法,不断培育新的品种。

宋代已会用硫磺治牡丹花虫。《洛阳牡丹记》云:“花开渐小于旧者,盖有蠹虫损之,必寻其穴,以硫磺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针孔,乃虫所藏处,花工谓之气窗,以大针点硫磺末针之。虫既死,花复盛。此医花之法也。”

牡丹在八世纪传到日本,十八世纪传到英国,此后辗转流传为世界性名花。

现代洛阳牡丹共有 200 多个品种。

原始社会,中原先民处于采集经济阶段时,人们以树木果实当食物。商代开始栽种果树。以后,种果树的经验越来越丰富,果树品种也越来越多。《盐铁论·非鞅》记载:“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这说明,至迟到西汉时期,中原人民对果树结果有大小年之分的规律,已有深刻认识。这也是中国关于果树结果有大小年的最早记载。

原始社会采集经济阶段,野菜是人们的采集对象之一。后来逐渐学会栽种蔬菜。

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有一瓮炭化粮食和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两枚莲子。说明在公元前 3075 年前后,中原已食用莲藕。

殷墟甲骨文有圃、囿等字样,表明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商代,中原已用园圃栽种蔬菜。这是中国关于园圃的最早记载。

《东京梦华录·十二月》有开封街市卖韭黄的记载。这是中国关

于韭黄的最早文献。

黄河鲤鱼,在西周和春秋时就已成为中原名鱼。《诗·陈风》云:“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

春秋末年的范蠡是中国最早研究池塘养鱼技术的人。范蠡,字少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先为越国大夫,助勾践灭吴。后至陶(今山东定陶),改名陶朱公,以经商致富。相传他著有《养鱼经》一卷。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曾加以介绍,他说:“如朱公收利,未可顿求,然依法为池养鱼,必大丰足,终天靡穷,斯亦无贵之利也。”

据《吴郡图经续记》卷下记载,隋代大业年间,吴郡曾把太湖白鱼鱼种送到洛阳,使其繁殖于“苑内湖中”。“至唐时,东都犹有白鱼”。这表明在隋代,中原已从南方引进优良鱼种。

(七) 农具发展

原始社会的农具,主要是石器。新郑裴李岗遗址中,曾出土石镰、石铲等。

中原农业获得长足发展是在金属农具出现之后。目前国内已发现的最早的金属农具是商朝的青铜器,大都在河南境内,如三门峡出土的青铜锛,郑州二里岗出土的青铜钁,安阳出土的青铜铲等。

战国时期,中原开始用铁犁耕地,并广泛使用锄、耨、镰等铁制农具。河南辉县固围村五座魏墓曾出土犁铧、钁、锛、锄、镰等铁农具 58 件。中牟曾出土舌形大铁犁铧,浉池县曾出土铁犁。这些都是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表明中原农业在中国古代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中原出现牛耕,并发明了穿牛鼻技术。《庄子·秋水》曾说:“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

战国以后,铁制农具普遍使用,尤其是铁犁和牛耕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南北朝时,中原农具种类增多,旧有农具得到改进。唐宋以后,整

地、中耕、播种、收获农具齐全，并比以前有所提高。到元代，中原农具达到了封建社会农具发展的高峰。

（八）农学著作

1. 《吕氏春秋》中的农学篇章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学术著作，写成于秦王政八年（前 239 年）。

吕不韦，濮阳（今属河南）人，曾任秦国丞相，前文已经述及。

《吕氏春秋》中《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农学著作。《上农》阐述重农思想。《任地》论述耕作的原则和方法。《辨土》论述土壤条件和栽培技术。《审时》论述适时播种的重要性。这几篇所讨论的耕作种植技术，如根据土质肥瘠情况合理密植、采用深耕、掌握农时以防虫害等技术，都反映了当时的农学水平。

这几篇著作第一次对农业中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科学分析，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精耕细作思想的理论支柱。它们是以以前农学技术的总结，又是以后传统农学理论的基础。

2. 卜式与《养羊法》

卜式，西汉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曾任御史大夫，赐爵关内侯。

起初，卜式专以经营田地和牲畜为业。父母亲死后，他将田宅财产全部交给弟弟，自己带一百多头羊，独自入山放牧。十余年后，他的羊发展到一千多头，又重新买了田地房产。

由于他善于养羊，得到汉武帝的赏识，被拜为郎，让他在皇家上林苑中负责养羊。结果他把皇帝的羊也养得很肥，从此逐步升官。

卜式曾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著《养羊法》一卷。“所言调养、饲鬻、圈息、放铍之法略备。”（《河南通志艺文志稿》）这是中国古代第一本著名的养羊学专著。

卜式曾对汉武帝说：“非独羊也，治民亦犹是也。以时起居，恶者辄斥去，毋令败群。”能把养羊的成功经验，推广到人事管理上。

3. 畅师文与《农桑辑要》

畅师文，字纯甫，元南阳人。曾任翰林学士等职，为元初著名的农学家。他与孟祺等人编撰的《农桑辑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官修农书。

《农桑辑要》分为典训、耕垦、播种、栽桑、养蚕、瓜菜、果实、竹木、药草、孳畜十门。它吸收古代农书精华，删除浮文琐事，又补充许多新材料，对指导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具有很高价值。

《农桑辑要》的内容大多辑自古代和元初农书，许多已佚农书的宝贵资料，因而得以保存。

书中总结以往农学遗产，分别论述各种作物的栽培和家畜、家禽的饲养技术，并详述养蜂、养鱼和栽桑养蚕知识。又专门论述苧麻和棉花的种植、管理和加工。书中已记载棉花打头、整枝技巧。还提出从四川、唐邓（今河南南阳一带）将柑桔类果树向北移植的主张。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农桑辑要》曾由官方多次颁布，用以指导生产。《四库提要》认为它“详而不芜，简而有要，于农家之中，最为善本”。“有元一代，以是书为经国要务”。日本学者把它和《齐民要术》、《东鲁王氏农书》、《授时通考》、《农政全书》并称为中国五大农书。

（九）耕作特点

中原农业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一套鲜明的特点，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条。

第一，以旱地作物为主。中国原始农业，北方以旱作粟为代表，南方以水田稻为代表。以后互相发展交融。但长期以来，粟一直是北方农民的主粮。

南方农业起源并不晚于北方,但后来却一度发展得比北方慢。在隋唐水稻大发展以前,粟在全国粮食中也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中原农业是古代北方农业的代表,主要栽培耐旱的粟、黍、麦、豆等作物,因此中原早期文化,也可称之为旱地耕作的粟黍文化。

第二,男耕女织的传统十分明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征非常突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相结合。饲养畜禽,主要是为了役使和食用。农业以家庭为生产单位,长期分散经营。

第三,在两汉和唐宋时期,中原农业上,庄园经济相当发达,不少大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出租或雇人耕种。又由于中原人口稠密,土地较少,为了提高产量,十分注意精耕细作,耕、耙、耨、锄、施肥、轮作等都有比较先进的方法。

二、植物学

古代中原,在植物学尚未创立的时候,人们就在农业、医药等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关于植物的知识。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植物学中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也相继在中原产生。

(一) 嵇含与《南方草木状》

嵇含,字君道,西晋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因“家在巩县亳丘,自号亳丘子”(《晋书·嵇含传》)。曾任襄阳太守、广州刺史等职。他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写成的《南方草木状》三卷,是中国最早的植物学专著,标志着中国古代植物学的正式诞生。

《南方草木状》广泛记载了我国广东、广西和越南的植物,包括草类 29 种,木类 28 种,果类 17 种,竹类 6 种,共 80 种。书中用蚂蚁防止柑桔害虫的记载,是我国用生物防止虫害的最早文献。

越南植物,周秦以来没有人介绍过。汉武帝开拓疆土,搜求珍异,当地常取典型物产进贡,但中原人往往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作

者便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本书。前人称其书风华典丽，文理斐然。

（二）宋祁与《益部方物略记》

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宋雍丘(今河南民权)人，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职，为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前文已述及。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宋祁任益州知州时，所撰《益部方物略记》(又称《益部方物纪略》)，记载四川地区草木41种，药9种，鸟兽8种，鱼虫7种，共65种。它是一部描述四川动植物的专书，以植物为主。

作者所记动植物的原则是“凡东方所无，及有而自异者，皆取之”(《自序》)。书中的动植物都是当时中原没有或与中原不同的。

《益部方物略记》对每种动植物皆绘有图，写有赞词。可惜流传到今天的书中，图已散佚。

（三）朱橚与《救荒本草》

朱橚(?—1425年)是明朝开封周王府中的第一代周王，前文谈医药学时已述及。他著的《救荒本草》是中国一部特殊的植物学专著。它记载了可在荒年用来充饥的野生植物414种。

朱橚所任藩王的开封一带，是历史上著名的黄泛区。史载洪武年间，黄河决口二十余次，大多在他的领地内。因而利用可食的野生植物，就成了救荒的重要途径。

《救荒本草》写成于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年)。书中所记植物，有138种在以前的本草书中曾记载过它们的治病功能，朱橚又增补了救荒的内容。另外276种是以前本草书上没有的，为朱橚所新增。

《救荒本草》对每种植物的产地、性味、苗棵大小、花叶形状、生长环境、可食部位和食用方法等都作了详细介绍。并对每一种植物都绘了图。这些图是用中国传统画法画的，虽然比例不十分准确，但却生动逼真，极易识别。

《救荒本草》将可用来救荒的植物,按草、木、果、菜、谷分为五类,下面又根据根可食、叶可食、实可食等分出细目。在描述中多突出植物的叶、茎、花和果实的特征,充分表明中国古代在植物形态学上的巨大进步。

为了编写《救荒本草》,朱橚曾在开封专门开辟园子,进行植物栽培试验,并请画工将植物形态画下来,自己写上说明。他还在河南各地广泛进行调查研究。

《救荒本草》对植物的收录,以开封为中心,北到太行山,南到桐柏山,西到伏牛山、华山,东到商丘。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植物群为基础的河南省植物志,也是一部很有科学价值的综合性植物学著作。

《救荒本草》是中外公认的十五世纪初期的中国植物学名著。十七世纪传到日本,后来又传到西方。德国人布瑞施耐特于1851年开始研究它,并为其中176种植物定出了学名。伊博思还对其中358种植物做了成份分析测定。

(四) 吴其濬与《植物名实图考》

吴其濬(1789—1847年),字淪斋,别号雩娄农,清固始(今属河南)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状元,曾任湖南巡抚、兵部侍郎等职。所著《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代表了中国古代植物学发展的最高水平。

吴其濬一生到过很多地方,每到一处都留意观察植物,采集标本,并从古籍和当时人著作中广泛搜集有关植物的记载和论述。他先将文献资料编为《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收录植物838种。这不仅为他自己进一步研究和撰写《植物名实图考》准备了材料,也为后人查阅文献提供了方便。

《植物名实图考》是一部很有科学性的植物学名著,它收植物1714种,比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多500多种。这些植物的产地遍及

中国 19 个省。书中对每种植物,都详细说明它的形状、性味、颜色、产地、生长习性、用途和不同名称等,并配以 1800 多幅精确的植物形态图。

吴其濬强调“目验”,反对“耳食”,不拘泥于前人说法,曾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和调查,在书中订正了以前文献中许多名不副实的错误记载。

《植物名实图考》以植物的形态、生长环境和性味等作为分类标准,把植物分成谷类、蔬菜、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类、木类,共 12 类,每类又分若干种。这种分类法比前人更合理,使中国古代植物学的分类法更具有科学性,并与现代植物学的自然分类体系产生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中国植物种属和固有名称的重要参考文献,为现代植物的分类和定名提供了依据。

《植物名实图考》不仅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外也享有盛誉。1940 年出版的《日本植物图鉴》中有不少内容就取材于这部书。美国植物学家劳弗尔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引用了《植物名实图考》的材料。

第四节 地学和数学

一、地 学

中原地学文化成果主要反映在地理著作、方志和地学仪器三方面。

(一) 地理著作

1. 朱贛与《地理书》

西汉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朱贛撰的《地理书》,是我国最早的以

“地理”为名的著作。书中按区域讲述全国各地的地理风俗，“言皆雅正，事无偏党”（《史通·杂述》）。其内容为班固写《汉书·地理志》时所采用。

2. 桑钦与《水经》

西汉成帝时洛阳人桑钦所撰的《水经》一书，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全书三卷，约7000余字，共介绍全国137条河道的源流和吐纳情况，涉及黄、淮、海、江等水系。北魏酈道元不朽的名著《水经注》就是为该书作注的。

3. 玄奘与《大唐西域记》

唐代洛州缙氏（今河南偃师）人玄奘不仅是高僧、佛学家，而且是著名的地理学家。所著《大唐西域记》十二卷，记载了他去西天取经时亲身经历的11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得之传闻的28个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历史、山川、气候、交通、物产、宗教、城邑、语言、风俗等。文笔流畅，资料丰富。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中亚和我国西北地区古代历史地理的宝贵文献，为中外学者所重视。

（二）方志

方志是综合记载地方自然和人文情况的著作。分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性的志书两类。

1. 全国性的总志

（1）谢偃与《括地志》

谢偃，唐卫州卫县（今河南淇县）人，贞观初对策高第，曾任弘文馆直学士等职。他受魏王李泰之命，与萧德言等撰作《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及序略五卷。

《括地志》先述历代舆地沿革和唐初都督府区划，然后分述各州县山川古迹。唐宋人著作中多曾引用它。其后散佚，今有辑本数卷。

（2）李贤与《大明一统志》

李贤,字原德,邓州(今属河南)人,曾任吏部尚书兼翰林学士等职。他主编的《大明一统志》,是继唐《元和郡县志》、宋《元丰九域志》、元《大元一统志》(已佚)之后,又一部记载全国各州府建置沿革、形胜风俗、古迹人物等的地理总志。成书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共九十卷。它是明代唯一的一统志,为古代地学的重要著作。书中保存了大量明代资料。

2. 地方性志书

现知中原最早,也是中国最早的方志是东汉初的《南阳风俗传》。刘秀出生于南阳,为表彰乡里之盛,“始诏南阳,撰作风俗”。这是目前所知中国修撰地方志的最早记载。

其后,中原地方性的志书日渐增多。它们具体记载一个地区的地理、风俗、历史、物产等情况,有区域性、连续性、综合性、资料性等特征。著名的有晋江敞撰《陈留志》十五卷,记地理和人物,历代学者多有引用;宋环中撰《汴都名实志》三卷;元王恽撰《汲郡志》十五卷。王恽在书中广泛搜集文献资料,又通过调查访问,实地考察进行验证,选取有关治乱可为后世之法的资料,分类记述。明清以来,省、府、州、县、山、镇志等层出不穷。据统计,河南现存方志共五百五十四种,其中以县志数量最多。有的县志前后修过六七次、八九次。它们大都是中原人自己所撰。

这些方志都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 地学仪器

在地学仪器方面,东汉张衡(78—139年)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发明的候风地动仪,是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位的仪器。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曾两次担任太史令,前后14年,是伟大的天文学家,前文已述及。他还是伟大的地学家。

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以铜制成,形似“酒樽”。周围有八个口含

铜球的龙头,对准八个方向,龙头下面有八只铜制的张口蟾蜍,当某一方向发生地震,龙嘴里的铜球就会吐出来掉到蟾蜍口中。这架地动仪曾在东汉顺帝永和三年(138年)成功地测报了陇西地震,该地距张衡所在的洛阳有千里以上。

直到1880年,欧洲才制造出同类仪器,比张衡的发明晚了1700多年。张衡是世界地震学的鼻祖。

二、数 学

(一) 商代数学与十进制制

六千年前,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上有圆形、方形、三角形等几何图案,并刻有表示Ⅰ、Ⅱ、Ⅲ、Ⅳ(1、2、3、4)的数学符号。表明当时数学已开始萌芽。

殷墟甲骨文中已有奇数、偶数、倍数、分数等数学资料,并出现了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会用一至九这几个数码,再加上十、百、千、万这四个数值成份,表示大量自然数,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古希腊用24个字母和另外3个符号相配合,才能表示1000以内的数。苏美尔人用六十进制制。玛雅人用不固定进制制。印度在九世纪以前,凡10的倍数,如20、30、100等,都用专门符号表示。他们都比中国落后。

中原在三千多年前,已能熟练地运用十进制制。

(二) 张苍与《九章算术》

张苍(?—152年),西汉阳武(今河南原阳)人,曾任丞相,封北平侯,为著名历法学家,前文已述及。他在整理《九章算术》上也曾作过很大贡献。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经过很长时间、历经众手而形成的数学典籍。书中系统总结了我国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但它在流传过

程中出现了残缺。张苍“因旧文之遗残，各称删补”(刘徽：《九章算术注序》)，为之改定篇目，增加新内容，使它基本定型，成为中国古代十大算书之首和世界古代著名的数学著作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这个体系的特点是以筹算为中心，与希腊数学完全不同。

《九章算术》以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形式编成。全书分为九章，内容包括分数四则运算、正负数运算、比例运算、求平面形面积和立体形体积、开平方和开立方、一次方程组解法和勾股定理的应用等。其负数、分数计算和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具有世界意义的成果。

唐宋两代，政府曾明令规定《九章算术》为国家法定数学教科书。北宋政府又加以刊印，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著作。

现传本《九章算术》大约最后成书于公元一世纪下半叶。有曹魏西晋时刘徽和唐李淳风等的注释本。曾被译成多种外文，在世界上享有盛誉。

(三) 庾曼倩与《注算经》

南北朝时期，梁朝庾曼倩，新野(今属河南)人，精于数学，曾有《注算经》一书行世。

(四) 朱载堉与《算盘开方》

明朝朱载堉(1536—约1610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明宗室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沁阳(今属河南)人，为著名的天文学家。前文讲天文时，已述及。他在数学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著有《算学新说》、《嘉量算经》、《圆方勾股图解》等。

朱载堉是我国珠算史上第一个用算盘进行开方的人。

珠算，由筹算演变而来，简单易学，运算方便，宋代《清明上河图》中已见有用算盘算账的，约在明初开始广泛流行，并流传到东亚各国，是我国的一大发明。

朱载堉还用珠算进行九进位制和十进位制的换算,并指出不同进位小数的换算方法。这比欧洲早一百多年,处于当时世界的高峰。

(五) 杜知耕等人与西欧算法

清初杜知耕,字端甫,号伯瞿,柘城(今属河南)人。所著《几何论约》七卷,取利玛窦和徐光启所著《几何原本》加以删削,故称“论约”。删繁举要,颇有心得。又著《数学钥》六卷,将中国传统的“九章算法”与西欧算法相结合,很有价值,被清代大数学家梅文鼎评为“颇中肯綮,可为算家程式”。作者把该书称为学数学的钥匙是不无道理的。二书皆收入《四库全书》。

清初鹿邑(今属河南)人李子金,也是有名的数学家。著有《算法通义》五卷、《天弧象限表》二卷、《几何简易》四卷、《后天图说》一卷、《解环谱》一卷等书,既讲述中国传统的数学原理,又研究西方的计算法则,在数学上颇有贡献。

清代睢县(今属河南)人孔兴泰,精研西方数学。著《大测精义》,专讲求半弧正弦等方法,对近代数学发展也起过一定作用。

第五节 水利技术

中原处于内陆地区,为了发展航运交通和克服水旱灾害,自古就注重开凿运河、防治洪水和兴修灌溉工程。在水利技术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一、运河开凿

中原古代运河工程,重要的有徐偃王运河、鸿沟、通济渠和汴河等。

（一）徐偃王运河

中原古代最早的，也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人工运河，是西周时徐偃王在今天河南的淮阳县和上蔡县之间挖掘的，长度约 75 公里，可用来行船作战。

徐偃王是西周时徐戎的首领，统辖淮泗流域五百里地区。他开的这段运河被称为“徐偃王运河”。

（二）鸿沟

鸿沟是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它是战国时魏惠王十年（前 361 年）开始修凿的。由今天的荥阳北引黄河水，通过圃田泽，经开封北，转弯而南，至淮阳分为两支，一支南入颍水，一支东入沙河，最后皆入淮河，使黄河和淮河沟通起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史记·河渠书》）。要掌握沿河的地形、土质、水源等复杂资料，建闸造坝，鸿沟才能挖成，可见当时水利工程技术相当高超。

宋代的蔡河，大致就开挖在鸿沟的位置上，元代以后才淤塞。

鸿沟将许多天然河道联接起来，形成一个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它北通黄河，南连淮河，通过邗沟还可以进入长江，促进了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三）通济渠

通济渠为隋朝大运河的一部分，是当时联系黄河和淮河的骨干工程。它为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 年）发动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而成。

通济渠西段自洛阳引谷水、洛水入黄河，东段自板渚（在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自古汴水故道至开封，再离开古汴水故道转弯向南，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商丘、夏邑、永城，安徽宿县、灵璧、泗县，江苏泗洪、盱眙等地入淮河。

通济渠是隋代大运河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联系中原与江南经济

文化的交通线,也是隋朝大运河中开凿得最早的一段。以后它发展为南通余杭(今杭州),北通涿郡(今北京)的大运河,成为以洛阳为中心的隋朝南北水运大动脉。

通济渠开凿的时间不长,从设计、施工到管理,解决了大量技术难题。

(四) 汴 河

隋朝开凿的通济渠,到唐朝改名为广济渠,宋代称为汴河。

汴河为北宋国家运输命脉所在。江南、淮南、浙东西、荆湖南北六路的粮食自淮河,经汴河,运到首都开封。陕西的粮食,自三门峡、白波转黄河,入汴河,运到首都开封。汴河是北宋国内最重要的一条运输线,每年都要从江淮地区向开封漕运大米数百万石。

通济渠分为东西两段,而汴河实际上只是它的东段。汴河的源头在板渚(今河南荥阳北),由板渚引黄河水入汴,以通航运。

由于汴河以黄河为水源,而黄河水含沙量很大,因而河道容易淤塞。又由于黄河的河身常常南北滚动,这样从黄河中引水的汴口就需经常移动,所以整个北宋时期,对汴河的管理技术,主要集中在河道、汴口和水源三方面。

在河道方面,每年自春至冬,常于汴口调节水势,使汴河水位只深六尺,以通航重载船只为准。

在汴河两岸筑有汴堤。有些地方,设置木岸。并令沿河百姓,在汴河两岸植榆种柳,以固堤防。

每年发动开封附近三十多个州县的民夫疏浚一次。汴河河底,埋有石板石人,作为标志。每年疏浚汴河时,只到石板石人为止。

在汴口方面,每当黄河发生滚动,旧汴口无法引水时,就要勘察地形,测量水势,重开新的汴口,将黄河水引进汴河。由于这一带地形复杂,有时工程相当艰巨。

在水源方面,由于宋代汴河以黄河为水源,泥沙淤积,熙宁初,

“京城东水门，下至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梦溪笔谈》）漕运困难。

为了改善汴河水源条件，元丰二年（1079年），在宋用臣主持下，撇开黄河，改引洛水入汴河，以通漕运。他先制定了具体的引洛入汴方案，接着又组织实施：利用黄河南岸滩地，花45天时间，自任村沙谷口至河阴县（今河南郑州北）瓦亭子，开河51里，取得引洛水入汴河的成功。其后汴河泥沙大为减少，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航运通畅。

引洛清汴，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工程。主持这项工程的宋用臣，字正卿，开封人，曾任瀛州刺史、蔡州观察使等职，是宋代著名的水工专家。

二、黄河防治

黄河是中国第二条大河，它从河南中部穿过。由于黄河水含沙量大，自古造成下游河身常淤、常决口、常迁徙的特点。它既是孕育中原文明的河流，又常给中原百姓带来一定灾难。因此，中原历代都注意黄河水患的防范和治理。

（一）大禹治水

中原最早的黄河防治活动，可以追溯到大禹。大禹是古代部落联盟的首领，为著名的治水英雄。

相传四千年前的尧舜时期，黄河发生大洪水，尧命居住在崇（今河南登封）的部落首领鲧组织治水，鲧采用堵塞洪水去路的办法治水，九年而未成。

舜继位后，命鲧之子禹继续组织治水。禹认真总结前人治水的经验教训，采用与其父相反的疏导之法，即疏通主干河道，排除障碍，引

导洪水回到固定河道，东流入海。取得了治水的成功。

大禹治水时，公而忘私，不畏艰险，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也不进去看看。

据说，河南境内的三门峡砥柱石、神门、人门、鬼门和洛阳南面伊河上的伊阙，皆为大禹所凿。他是我国民族精神的象征。

通过治水，大禹取得了极高的威望。他的儿子启建立了夏王朝，定都阳翟（今河南禹州），成为中国第一个帝王。

（二）筑堤固岸

为了防止黄河泛滥，从春秋时起，中原地区就在黄河两岸筑堤。战国时，中原有关诸侯国的河岸，皆有大堤。

秦汉时期，全国统一，对黄河堤岸进行了统一治理。西汉末年，黄河决口次数增多，河道紊乱。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黄河改道。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奉命治河，他在今河南荥阳至千乘海口之间，筑了一条千里大堤，使黄河基本稳定了八百年。至唐末、五代，黄河危害才又严重起来。

古代称黄河两边堤岸为黄河大堤，汉代以后也称之为“金堤”。由于黄河每次迁徙，河身两边均要修筑大堤。因此，中原古河道行经的地方，常形成多重大堤。

北宋时，中原所修黄河大堤，名目繁多，有正堤、遥堤、缕堤、月堤、横堤、直堤等。并用岸边束埽、堤上种树的办法对大堤进行保护。

金元以来，中原黄河决口频繁，所以修堤、堵口不断。

明代，刘大夏和潘季驯都曾治理过河南境内的黄河，分别对两岸大堤修理加固。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由向东南经徐州、淮阴夺淮入海，从铜瓦厢（今河南兰考西北）改道向东北流。新的河道，到光绪十年（1884年）才将堤岸筑成。

现在流经河南境内的黄河下游河段，皆为悬河，河床底面高于堤外地面，全靠大堤约束河水。

（三）瓠子堵口

中原历史上，曾进行过多次黄河堵口工程，其中瓠子堵口，是西汉时中原黄河上一次大规模的堵口工程。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境）决口，淹梁、楚等十六郡。汉武帝派汲黯率十万民工进行堵塞。因物料供应不上，口门太大，加上汉武帝的舅舅、丞相田蚡因封地郿（今山东平原）在旧河道以北，怕堵口后影响收成，肆意阻挠，结果堵口未能成功，使黄河为害二十余年。

汲黯死后，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年），又派汲黯之弟汲仁主持堵口。他派人到百里外的淇园砍来竹子，在决口处全面打桩，然后填以草料，压上土石，终于制服了湍急的水流，堵住了黄河决口。历史上把汲仁创造的这种堵口方法称为“平堵法”。

汲黯、汲仁兄弟，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最早主持黄河堵口工程的人。他们都是濮阳（今属河南）人。

汉武帝曾亲临堵口现场，并作《瓠子歌》，记述决口的灾难和堵口的经过。

（四）治河著作

治理黄河是个大学问，历代著作甚多。其中中原人所撰作品，著名的有张伯行的《居济一得》和黎世序的《续行水金鉴》。

张伯行（1652—1725年），字孝先，号敬庵，清仪封（今河南兰考）人。曾任江苏巡抚、礼部尚书等职。他任河道总督时，著《居济一得》八卷，记载自己的治河认识及体会。

张伯行认为，“河自宿迁而下，河博而流迅，法宜纵之；宿迁而上，河窄而流舒，法又宜束之；徐邳水高而岸平，泛滥之患在上，宜筑堤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冲刷之患在下，又宜卷埽以制其下”（《四库提要》卷六九）。

清代学者称张伯行这些观点，“皆得诸阅历，非徒为纸上之谈者。”

伯行平生著述,惟此书切于实用”。

黎世序,字湛溪,清罗山(今属河南)人,嘉庆元年(1796年)进士,曾任镇江知府、南河河道总督等职。

黎世序治理黄河,注重防御,常在沿堤积土备料,在滩地广栽柳树,成绩显著。

黎世序还善作束水对坝,并使他管辖的南河修防费由每年300万两银减省为270万两。

黎世序的主要贡献是主编了《续行水金鉴》一百五十七卷,汇集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一百年的水利史料,总结治水经验,成为继淮阳道傅泽洪所编《行水金鉴》之后,中国又一部重要的水利文献。

(五) 近代河工技术

近代以来,治河技术有了很大发展。在中原治河技术上作出贡献的人有陈善同、靳钊等。

陈善同(1876—1941年),字雨人,河南信阳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士。曾任清都察院御史。民国后,于1923年至1927年任河南河务局局长,1927年任河南省省长。

陈善同主持河南河务时,重视近代河工技术的应用。在各工段增设电话,沿河设水工站,组建水文测量队,沿河修汽车路,铺设轻便铁轨。

陈善同还主编了《豫河志》和《豫河续志》两部重要著作。

靳钊(1910—1990年),河南封丘人,原系农民,后参加封丘黄河修防段工程队工作。他从小家贫,曾以钢丝在黄河滩上挖炭块谋生,练就一套锥挖地下淤埋物的技术。

洪水期间,黄河大堤最怕暗洞。靳钊用锥探技术,能将这些暗洞全找出来。

通过锥探,还能摸清水下上质情况。1949年夏,封丘段黄河大堤

出现险情,六道坝埝相继沉入水中,救护无效。靳钊用8号钢丝反复锥探,判定水下全是流沙,深不可测。据此,治河工人采用相应对策,取得了抢险成功。

三、灌溉工程

中原在国内属于降水较少的半干旱地区,而且一年中降水的时间很不平衡,因此很早就会依靠人工调节农田水利。殷墟甲骨文中“沟洫”一词,说明当时已在田间挖有灌溉和排水渠道。

中原古代较大的灌溉工程,主要集中在豫东南、豫西南和豫北地区。其中著名的有期思陂、鸿隙陂、六门埝、漳水十二渠和丹沁灌溉工程等。

(一) 期思陂和鸿隙陂

期思陂为春秋时期孙叔敖所建。孙叔敖是期思(今河南淮滨)人,曾任楚国令尹(丞相)等职。他修建的期思陂,故址在今豫东南的淮滨、固始一带。

孙叔敖用水渠引期思水(今史河和灌河)灌溉。并将水渠与许多陂塘连接起来,在陂塘上设闸门,需要时开闸放水,不需要时闭闸蓄水。这是我国最早的大型陂塘蓄水工程。它在淮河上游形成了灌溉网。

鸿隙陂建于西汉时期,在今河南息县和正阳一带。它是古代淮河上游的又一大型蓄水灌溉工程。陂水自淮河分出,经鸿隙陂蓄聚调节,再回流到淮河,沿途灌溉农田。

西汉后期,因这一带发生洪涝,鸿隙陂曾一度被丞相翟方进废毁。东汉初,又被地方官许扬修复。此后一直使用到北魏时期。

(二) 六门埝

西汉时,南阳太守召信臣为了发展唐白河流域的农业,曾亲自查

水源,开沟渠,修堤坝、水门,建水利工程数十处,灌溉面积多达三万顷。“民得其利,畜积有余。”(《汉书·召信臣传》)其中最著名的工程是六门埭,故址在南阳穰县(今河南邓州),可灌溉穰、新野等地农田五千多顷。

为了加强灌溉管理,召信臣还于公元前33年前后,在南阳地区制订“均水约束”,刻石立于田边,规定沿渠农田用水次序,防止水利纠纷。这是我国最早见于记载的分水规章。

东汉时,杜诗任南阳太守,又在当地进一步修筑陂池,灌溉农田,使郡内家家富足。当地人将他跟召信臣相比,称:“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汉书·杜诗传》)

宋代,曾在南阳地区修复召信臣所建的水利工程,灌溉农田几百万亩。

(三) 丹沁灌溉工程

丹沁灌溉工程,位于古代河内,即今豫北焦作地区。它始于秦朝引沁水灌溉的枋口渠,故又称秦渠。渠首在今济源五龙口(古称枋口)。

曹魏黄初六年(225年)前后,司马孚^①曾奉魏文帝之命,整修河内枋口引沁工程。他发现秦代以来使用的枋口木门容易损坏,以致造成进水过多,稻田泛滥。于是将木门改为石门,“夹岸累石,结以为门,用代木门枋”(《水经注》)。

唐代崔洪礼、李元淳等相继对该渠进行修浚,节度使温造又对它进行重修。明代河内令黄中色、袁应泰也对它进行了重修。

丹沁灌溉工程由济源五龙口引沁水,经沁阳、孟县、温县、武陟入黄河,前后使用了二千多年。清代渠宽8尺,长150里,分24堰,灌溉

^① 司马孚(199—272年),字叔达,河内温(今河南温县)人。司马懿之弟。曾任尚书令,封安平献王。

效果良好。时至今日,仍可灌溉大片农田。

(四) 漳水十二渠

漳水十二渠是从漳河引水的大型灌溉渠系。灌区在今豫北安阳市北,漳河以南。

漳水十二渠是战国初期魏文侯(前 445—前 396 年在位)时的邺令西门豹发动群众开凿的。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多首制渠道灌溉工程。第一渠首在邺(今河南安阳北)西十八里漳河边。渠首往下,在漳河上每隔一里筑拦河低溢流堰一道,共十二道。并在各堰上游右岸开一引水口,共成十二道渠。故称漳水十二渠。可灌溉农田十万亩。

漳河水多泥沙,落淤肥田,邺地因此而富。魏襄王时,邺令史起又对漳水十二渠进行整修。正如《水经注·浊漳水》所说:“昔魏文侯以西门豹为邺令也,引漳以溉,邺民赖其用。其后至魏襄王,以史起为邺令,又堰漳水以灌邺田,咸成沃壤,百姓歌之。”

东汉末年,曹操以邺城为根据地,又对该灌溉工程进行整修,称十二堰为十二堰。东魏改为单一渠首,扩大灌区面积,改称天平渠。唐代又开分支,灌区更大。

这套灌溉渠系一直使用到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才被漳河上所建的岳城水库所代替。

第六节 陶瓷 冶金 采矿

一、陶 瓷

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陶瓷王国,而中原又是中国最早生产陶瓷的地区之一。

（一）制 陶

陶器由粘土烧制而成。由于粘土所含成分及烧制温度不同，陶器的颜色也不同。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之一，它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原陶器经过了原始陶器、红陶、白陶、唐三彩等几个阶段。

1. 原始陶器

新石器早期的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上曾出土过一批我国最早的陶器。它们被称为原始陶器。这些陶器器形简单，火候低，质地疏松，用手捏制而成，器壁厚薄不匀。陶土未经过淘洗。主要有碗、钵、壶、罐等。其中也有少数陶器，造型比较优美，已带有某种艺术性。中原原始陶器一般皆呈褐色。

2. 红陶

新石器中期的仰韶文化时期，中原主要生产红陶。红陶由原始陶器发展而来。陶料细腻，造型端正。红陶上常有彩绘，故又称彩陶。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标志。其出土地点有澠池、郟县、郑州、登封等地。器物有盆、罐、钵、瓶、杯等，还有刀和纺轮。当时已会淘洗陶土，去除杂质，并会用陶轮制坯，会在坯上画制花纹，用高温烧制。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一般以赭红、黑、白三种颜色进行彩绘，其花纹画于未烧的坯上，烧成后不会脱落。彩绘工具，可能是毛笔，笔法相当流畅。彩绘花纹主要是花卉图案、几何图形、动物图形等，表现中原先民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艺术的向往。

3. 白陶

白陶是从红陶发展到更高一个档次的陶器。中原最早的白陶是在郑州出土的，它是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文化过渡时期的产品。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白陶更多，已发现的有鬲、爵等。

商代中原的制陶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安阳殷墟出土的白陶，胎

质洁白,表面雕刻有饕餮纹、夔纹、云雷纹等仿青铜器纹饰,已是非常雅致的艺术品。

烧制白陶是中国制陶技术上的一次大飞跃。它以瓷土和高岭土作原料,在 1000°C 左右烧成。白陶器皿表面和胎质都呈白色,它已是瓷器的先声。

4. 唐三彩

唐三彩是唐代中原生产的一种具有特殊风貌的陶器。它由古代的釉陶(商代已出现,当时在陶器上加石灰作釉)发展而来。1972—1982年曾在巩义市小黄冶村、铁匠炉村及白河乡三地唐三彩窑址发现大量唐三彩器物 and 陶范。

唐三彩用白色粘土做坯,经过两次烧制而成。先将坯体烧至 1100°C 左右,然后上釉,再以 900°C 的温度烧成成品。

唐三彩釉质的主要成份是硅酸铝,呈色剂为铁、铜、钴、锰等。

中原唐三彩器物,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罐、盘、碗、壶、灯等,殉葬用品有骑士俑、三彩马和三彩骆驼等。

同一种唐三彩器物上,往往呈现出黄、绿、白三种颜色,也有呈现黄、蓝、白或三种以上颜色的。缤纷多彩,造型美观。

中原唐三彩,生产技术先进,艺术价值很高。曾通过丝绸之路传到西亚,波斯、埃及都有仿造。

(二) 制 瓷

瓷器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在英语中,瓷器和中国两词通用,说明中国的瓷器早已闻名世界。

瓷器是以瓷土或瓷石为原料烧制的器物,它的化学成份主要是氧化硅和氧化铝等。胎呈白色,质地细密,不吸水或吸水率很低。瓷釉透明。

中原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出现原始瓷器,东汉时期,瓷器正式形成,到唐宋时期发展到它的高峰时代。

1. 原始瓷器

中原的原始瓷器最早发现于郑州二里岗,它们是商代中期的产品。郑州商代中期的其他住宅和墓葬遗址中也有原始瓷器发现。

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和辉县琉璃阁,西周时期的洛阳和浚县辛村卫国墓地,也都发现了原始瓷器。

中原的原始瓷器,以瓷土作胎,经 1200°C 烧制而成。胎呈灰色,器表有釉,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它们大都为生活器皿。如郑州发现的瓷尊,敞口、折肩、凹底,形状与陶尊相似。

一般说来,原始瓷器选料不精,工艺较差。

2. 隋唐五代瓷器

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方主要出产青瓷,北方的中原地区则以制造白瓷著称。安阳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比南方青瓷质量更高,为国内所罕见。

隋唐五代时期,中原瓷器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产品以青瓷、白瓷、彩瓷最出名。

巩义市铁匠炉村有隋代瓷窑遗址,是当时生产青瓷之处,出土有青瓷碗等残器。

安阳北郊隋代瓷窑遗址面积达 9 万平方米。所产瓷器有青中带黄、青中带绿、青灰、青褐等颜色,胎质细腻,釉质透明有光泽。并用印、刻、划、贴等多种方法,装饰出莲花瓣、水波纹等图案。产品有碗、盘、瓶、杯等和各种工艺品。

唐代瓷窑遗址遍及豫西、豫南、豫北各地。釉色有白、黄、黑、青等。其中巩县(今巩义市)瓷窑烧制的白瓷质量最佳,据《元和郡县志》和《新唐书》记载,它曾作为贡品献给朝廷。质地洁白,釉色滑润。此外,巩县瓷窑还生产一种著名的绞胎瓷花枕,即枕面用褐白两色瓷土相间构胎,经过加工后,成为一朵朵镶嵌于枕面上的团花。

唐代鹤壁瓷窑,主要生产民间用品,以白釉瓷为主,黄釉瓷和黑

釉瓷次之。

唐代鲁山瓷窑以生产花瓷闻名,风格凝重豪放。它的方法是在黑釉或褐釉上泼洒一些蓝釉或灰白釉,烧制时,利用釉的流动形成奇异的花纹,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是花瓷腰鼓。

五代时期,中原最著名的瓷窑是柴窑。它为周世宗柴荣所建,相传窑址在郑州。生产的瓷器为天青色,其质量有“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之誉(见《五杂俎》卷一二)。

3. 宋代瓷器

北宋时期是中原造瓷技术最兴旺发达的时代。当时国内定、汝、官、哥、钧五大名窑中,汝、官、钧三窑都在中原。

汝窑在今河南汝州,主要生产青瓷,有天青、豆青、虾青、鸭蛋青等颜色。汝窑瓷器以玛瑙为釉,并有意利用胎质和釉质膨胀系数不同,在开窑时出现裂纹的奇妙效果,生产具有冰裂纹、蟹爪纹、芝麻花等花纹的瓷器。这种瓷器被称为“开片瓷”。

有些汝窑瓷器上还有印花。画面凸起于瓷器表面,内容有缠枝花、折枝花、水波游鱼、莲池鸳鸯,以及被誉为“雨过天晴云破处”的天青纹等。

由于汝窑瓷器制作精细,艺术水平很高,深受人们喜爱,当时就被人看作商彝、周盘一样的宝贝,后世流传很少。

官窑在首都开封,为宋徽宗时官府所建。由于明清以来,开封多次遭受黄河水淹,窑址淤埋地下,至今未能找出具体地点来。

据文献记载,官窑瓷器“文色尚白而薄如纸”,但也有粉青色和油灰色等品种。瓷器表面的花纹,有的如冰裂,有的似梅花,工艺水平皆很高。传品不多,皆为稀世珍宝。

钧窑在今河南禹州,因禹州古称钧州而得名。钧窑瓷器,器形浑厚,端庄古朴,有天蓝、天青、月白、葱绿、墨绿、朱砂红、茄皮紫等颜色。

钧瓷的色彩以窑变而闻名。所谓窑变,就是在釉中加入少量铜等物质,烧制时,釉与炉火产生化学作用,使瓷器表面发生奇妙变化,生成红里带紫,紫里带青,白里带蓝,蓝里带红等变幻无穷的五彩图画。

钧瓷表面色彩斑斓,有的如蓝天晚霞,有的上面还有珍珠点、菟丝、蟹爪、蚯蚓走泥等纹路。巧夺天工,耐人寻味,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钧瓷在青釉瓷系统中异军突起,其窑变技术是制瓷工艺中的一项重大创造,对后世影响很大。元代的海棠红、玫瑰紫,明清时期的宝石红、桃花片等瓷器,都是利用窑变原理烧制而成的。

中原瓷器,在北宋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对中国造瓷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金元以后便逐渐衰落下去。

二、冶 金

中原是青铜文化的故乡,又是古代冶铁生产的摇篮。冶金技术在国内长期处于领先地位。

(一) 青 铜

青铜是铜和锡(有时还有铅)的合金,可做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武器等。中原冶炼和铸造青铜的技术发展很早。中原青铜文化在中国和世界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1. 商代以前的青铜

原始社会后期,人们认识了天然红铜。但红铜太软,不能代替石器作为生产工具。大约在4000年前,中原人们了解到“金柔锡柔,合两柔则刚”(《吕氏春秋·别类篇》)的道理,便根据这一合金强化的原理,把铜和锡等金属熔合在一起,制成青铜。青铜硬度大,可以用在各个生产领域。从此开辟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时代。

青铜时代是继石器时代之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它标志着社

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水平。

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和汝州煤山出土的青铜固化熔液,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遗存。它们都是四千年前夏朝的遗物。

2. 商代青铜

商代是中原青铜器的鼎盛时期,器物种类多,铸造规模大,冶铸技术达到了世界的高峰。器物大小不等,有各种形状、花纹,有些还有铭文。

中原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形状匀称,但器型不大,略显粗糙。河南偃师二里头商代早期文化遗址出土的刀、锥、凿、铲、镞、铤、戈、爵、鱼钩、乐器、装饰品等近30件青铜器,就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这里还出土有铸铜陶范。其中的铜爵就是用组合陶范制成的盛酒容器。经电子探针定量分析,铜爵的含铜量为92%,含锡量为7%。

中原商代中期的青铜器,数量较多,器型较大,铸造技术比商代早期有很大进步。郑州杜岭出土的两只青铜方鼎,就代表了这个时期的青铜冶铸水平。其中一个方鼎高100厘米,重82.3公斤,另一个高87厘米,重64.2公斤。在郑州商城遗址上还发现了两处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

中原商代后期的青铜器,技术高超,世界罕见。当时已能熟练掌握熔铜、制模、浇铸、修饰等技巧,并能按照产品的不同性能,随意调配铜和锡的比例。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期大批青铜器就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

安阳殷墟出土有直径一米的坑式炼铜炉、炉渣和铸铜范块等。当时的青铜器广泛采用分铸法进行铸造。纹饰华美,品种繁多。仅一座妇好墓就出土精美青铜器440多件。

安阳殷墟出土的最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是司母戊鼎。它为长方形,四足,高133厘米,宽79厘米,长166厘米,重875公斤,是当今世界

上出土的最大的古代青铜文物。司母戊鼎以陶范铸造,其合金成份为:铜 84.77%,锡 11.84%,铅 2.76%。

中原商代后期的青铜器,都具有庄重浑厚的风格,一般都是冶铸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3. 周代青铜

西周时期,中原铸造青铜的作坊规模更大。洛阳有一处西周青铜作坊遗址,大达 12 万平方米。

春秋时期,中原青铜器的纹饰趋于纤细,器型趋于轻巧,形状和装饰都更加精致。河南新郑出土的一对莲鹤方壶,每个高 118 厘米,重 64.28 公斤。壶上有龙纹和雕成龙状的双耳,壶下有吐舌怪兽,壶顶莲花瓣中有展翅欲飞的立鹤。整个壶的造型非常新颖生动。

春秋以后,中原在青铜器铸造技术上,还发明了失蜡法和焊接技术。河南浙川就出土有公元前六世纪用失蜡法铸造的铜盂部件和铜禁。

(二) 钢 铁

铁是由铁矿石在高炉中冶炼而成的。中原是古代冶铁的最早发源地。韧性铸铁、球墨铸铁和炒钢技术,最早也是在中原产生的。

中原铁制生产工具出现于春秋末年,战国时得到普及。辉县出土有战国时铁制的锯、凿、斧、刀等工具和锄、镰、锛、镢等农具,还有 V 形铁犁头。汉代,生产工具彻底铁器化。从此,铁器时代代替青铜时代,把人类社会推向一个新阶段。

1. 人工冶铁的发明

中原先民最早用的铁是陨铁。1931 年,河南浚县出土了周初的铁刃铜钺。其铁刃就是用天上坠落的陨铁锻打而成。

中原最早的人工冶铁出现于西周后期。三门峡市虢国墓地曾出土一把西周后期人工铸造的铜柄铁剑。它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人工冶铁迅速发展。国内发现的大小战国冶铁遗址,多集中在河南。西平出土的春秋战国铁剑,至今仍很锋利。相传,春秋末年的铸剑名师干将、莫邪,曾在西平棠溪(冶炉城一带)铸造宝剑。棠溪附近有龙泉水,用以淬铁特别锋利,故当地所产剑又称龙泉剑。洛阳和辉县出土的战国铁器,也都显示了很高的生铁冶铸水平。

2. 战国韧性铸铁

由于生铁脆性大,所铸造的工具、农具和兵器,容易断碎,所以战国时期发明了生铁柔化技术,冶炼出韧性铸铁。

洛阳水泥制品厂灰坑出土的战国早期的铁铤和铁铲,就是韧性铸铁的产品。铁铤经低温脱碳退火而成,系白心韧性铸铁,它的表面相当于低碳或中碳钢。铁铲经较高温度和较长时间脱碳退火而成,系黑心韧性铸铁,又称可锻铸铁。

韧性铸铁的炼成是中国冶金史上的重大创造,表明战国时期已会运用热处理脱碳以增加铁的韧性的技术。这比欧洲早 2000 年,欧洲出现这种韧性铸铁是在 1720 年之后。

3. 汉代冶铁的规模和手段

汉代中原是全国重要的冶铁基地。在全国已发现的 30 多处汉代冶铁遗址中,有 18 处在河南境内。其中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发现有长、方、圆等各种形状的炼铁炉 18 座、熔炉 1 座和铸成的铁器 166 件。郑州古荥镇冶铁遗址,发现有大型椭圆形炼铁竖炉 2 座和重约 30 吨的炉底沉积物。竖炉底大 8.5 平方米,高约 6 米,炉容约 50 立方米,日产生铁估计有 1 吨左右。南阳瓦房庄铸铁遗址面积达 12 万平方米。温县铸铁遗址出土铸铁泥范 500 多套。

在河南巩义市和郑州古荥镇的汉代冶铁遗址上,都发现有煤块和煤饼,说明这时已用煤作冶铁燃料(当时,一般炉用木炭,煤主要用于加热炉和退火炉)。欧洲开始用煤炼铁是十八世纪的事,比中国晚

约 1800 年。

汉代炼铁已从人力鼓风,发展到畜力鼓风和水力鼓风。东汉初年,南阳太守杜诗(今河南卫辉人)发明了水排。水排是以水为动力的鼓风机械,它利用水流的力量推动排扇,把风鼓入炼铁炉内,提高铁产量,“用力少见功多”(《后汉书·杜诗传》)。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鼓风设备。欧洲用水力鼓风是十一世纪的事,比中国晚约 1000 年。

汉代炼铁还会使用耐火材料和碱性熔剂,巩义市铁生沟冶铁遗址曾发现有石灰石。

这些都表明,汉代中原的冶铁技术已达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

4. 汉代球墨铸铁

球墨铸铁是具有优良机械性能的灰铸铁。铸造前需在铁液中加入少量球化剂(通常为镁、稀土镁合金)和孕育剂(通常为硅铁),使铸铁在凝固后内部形成球状石墨。其韧性和强度高于其他铸铁,可代替铸钢和锻钢。

现代球墨铸铁技术是 1948 年在欧洲发明的,但西汉中期以后,球墨铸铁已在中原地区出现。1974 年在河南滎池出土的一把汉代铁斧,经金相分析,长度 50 毫米的截面上有球墨 30 颗,球墨直径约 20 微米。河南巩义市和南阳出土的铁器中,也都有球墨铸铁发现。

中原球墨铸铁的炼成比外国早了 1900 多年。

5. 汉代炒钢技术

西汉末年产生的炒钢技术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巩义市铁生沟和南阳瓦房庄冶铁遗址都出土有炒钢炉。炒钢就是向熔化的生铁鼓风,并进行搅拌,使生铁中的碳氧化,变成熟铁,再经过渗碳,锻打成钢。或者有控制地将生铁含碳量炒到一定程度,再锻打成钢。炒钢经加热反复叠打变形,细化晶体和杂夹物,就成了百炼钢。

炒钢技术的发明,是炼钢史上的一场大革命。英国在 1744 年出

现炒钢时,曾有力地推动产业革命。中国的炒钢技术比欧洲早了1700年。

此外,汉代中原还会生产一种铸铁脱碳钢。其方法之一是由制造韧性铸铁工艺发展而来的,用温度较低的冶炼炉对生铁脱碳。其方法之二是将生铁铸成薄板,再经过热处理脱碳成为钢板。这种钢板在郑州古荥镇曾有出土。

三、采 矿

中原古代矿业,主要是采煤、采铁和采金。

(一) 采 煤

西汉文帝时,宜阳(今属河南)已有煤窑,生产煤炭。据《史记·外戚世家》记载,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曾在宜阳采过煤。

巩义市铁生沟西汉冶铁遗址出土的煤块和煤饼,很可能就是在附近开采的。

东汉时,有在林虑山(今河南林州一带)采煤的记载。(见《后汉书·党锢传》)

宋代,中原采煤规模很大,而且有一套科学方法。1959年,在鹤壁(今属河南)发现的宋代煤窑遗址,南北长250米,东西宽200米。这个煤窑的竖井深46米,直径2.5米,内有十个采煤工作面。巷道结构合理,有主、副井两条主巷道,可通风、防火和排除瓦斯。巷道上部凿壁龛,放油灯照明。井底堆放荆条筐多件,以辘轳作提升工具。支护、排水设备齐全。这种先进的采煤技术比欧洲早数百年。

明清时,中原采煤业进一步发展。巩义、宜阳、安阳、焦作、鹤壁、新密等地皆有大量开采。

(二) 采 铁

春秋战国时,西平(今属河南)棠溪以铸剑出名,其所用铁大约采

自今舞钢矿区一带。

汉代巩县(今河南巩义市)冶铁所用矿石,也是采自其附近地区。

汉代以后,中原铁矿开采量逐渐增加。

明清时,中原已开始采用“烧爆”、“炸爆”等办法开采铁矿。

(三) 采 金

金在地壳中含量稀少。主要呈游离状态。分原生脉金矿床和次生砂金矿床两种。

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金箔,厚度只有 0.01 毫米。经金相分析证明,它在加工时曾经过退火处理。这说明 3000 年前中原已掌握开采、冶炼和加工黄金的技术。

春秋战国时,汉水、汝河、金沙江是当时中国三大砂金产地。汝河发源于河南嵩县,嵩县至今仍有金矿。

古代中原主要采砂金,“取细沙淘炼成”(《天工开物》)。明代以后,才开始开矿山采金,称山金。灵宝(今属河南)小秦岭的采金古矿硐,有明代景泰二年(1451 年)的开硐题记。当时中原开采金矿,主要采用锤击、烧爆、炸爆诸法。

第六章 中原文学

中原文学在有文字以前就产生了,当时的表现形式是神话传说。如果从有文字的商代算起,也有 3500 年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原作家曾创作了大量不朽的作品。

春秋时期是中原诗歌的早期黄金时代,《诗经》中有关中原的诗歌,对当时中原人民的生活风采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

战国中原诸子散文,不但含有哲学思想,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学内容。

两汉时期,中原文学迅速发展,先后出现了贾谊、晁错、张衡、蔡邕等文学巨星。

南北朝时期,阮籍、潘岳、潘尼、干宝等为中原文学增添了绚丽的色彩。

唐代中原文学,群星璀璨,以杜甫和韩愈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用他们的传神妙笔,把中原文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宋代以后,随着文化中心的南迁北移,中原文学与国内其他地方相比较,已经不占领先地位,但元人杂剧、明清小说、诗文等也都取得了很大成就。

中原文学,从产生以来,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积极反映现实,干预生活,不搞无病呻吟。第二,能紧跟主流,领导潮流。长期成

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干。第三,作家个人生活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第四,具有不平衡性。重现实主义,轻浪漫主义;善于写实,不善于虚构;重诗歌、散文,轻剧作和小说。宋以后的文学成就不如宋以前,“五四”以后又出现了新面貌。

第一节 诗 歌

在中原文学中,诗歌是产生得最早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发展得最充分的体裁。

诗歌起源于原始时代人们的劳动号子。到周代,《诗经》中收录了中原第一批诗歌作品。唐代,中原诗歌发展到它的高峰时代。

诗歌是抒情艺术,是感情激流的产物。它需要鲜明的节奏和铿锵的音调,语言要求精炼、含蓄和形象。

诗歌是中国的正宗文学,也一直是中原文学的主体。从《诗经》算起,中原诗歌已有了二千五百多年历史,曾出现过许多中国一流的诗人和作品。

一、先秦诗歌

(一)《诗经》中的《商颂》

中原先秦诗歌,主要收集在《诗经》一书里。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前十一世纪)到春秋中期(前六世纪)约500年的三百零五篇作品。

《诗经》中的作品原来都是配乐的歌辞,跟音乐、舞蹈关系密切。后乐谱、舞姿失传,便只剩下了诗。

《诗经》中的作品包括“风”、“雅”、“颂”三种类型。“风”是各诸侯

国的土风民歌，共 160 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国风”。“雅”是西周王畿地区奴隶主贵族举行典礼或宴会时演唱的乐歌，共一百零五篇。其中《大雅》三十一篇，为诸侯朝会之乐，《小雅》七十四篇为贵族宴享之乐。“颂”是统治者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共四十篇。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诗经》中的作品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 2500 年前的社会面貌。

由于“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乐歌，所以与中原关系不大。《诗经》中的中原作品主要收在“颂”和“风”中。

《周颂》是西周初年周王朝的祭祀歌辞，《鲁颂》是春秋时鲁国的祭祀歌辞，它们分别是今陕西和山东地区的古代诗歌。只有《商颂》是春秋时宋国人祭祀祖先的歌辞，为中原人的作品。

宋国位于今河南商丘一带，国君是商朝国王的后裔。因而《商颂》实际就是宋颂。

《商颂》原十二篇，《诗经》中只收《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五篇。《那》是祭祀成汤的。《长发》、《玄鸟》记载了商代的神话和史实，颇有史料价值。

在艺术性上，《商颂》文字简洁，叙事具体，音律和谐，篇幅较长，不空洞抽象，比《周颂》那样缺乏形象和韵律的歌辞，大大前进了一步。

（二）《诗经·国风》中的中原诗歌

《国风》是《诗经》中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最大的部分，是《诗经》中的精华。

《国风》中的诗涉及范围很广，包括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等地，但主要是河南地区的作品。

在十五《国风》中，召南指召公所治理的南国，在今陕西南部 and 湖北西北部。周南指周公所治理的南国，在今洛阳以南至湖北江汉一

带。秦、豳在今陕西。齐、鲁在今山东。魏、唐在今山西。此外，邶、鄘、卫、王、郑、桧、陈都在今河南境内（前三个在黄河以北，后四个在黄河以南）。如果再加上《周南》的一部分，那么《诗经》十五《国风》中，河南就占了七个半。由此可见，2500年前，在中华大地上，中原是盛产诗歌的地方。

有关中原的七个半《国风》，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统治者的揭露和批判。如《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邶风·击鼓》表现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大兴兵役、徭役的不满情绪。《卫风·伯兮》反映士兵厌战思家。《陈风·株林》讽刺陈灵公荒淫腐朽。《邶风·新台》揭露卫宣公把儿子的新娘占为己有，将他比作癞蛤蟆。《鄘风·相鼠》和《鄘风·墙有茨》也对统治者进行了无情揭露和鞭挞。

第二，表现劳动时的欢乐。如《周南·芣苢》就表达了妇女们劳动时的欢乐气氛。

第三，歌颂爱国主义精神。如《鄘风·载驰》就歌颂了许穆夫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四，反映爱情和婚姻生活。《诗经》中关于这方面的诗歌，数量多，也最精彩。如《鄘风·桑中》云：“要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描写了青年男女在桑间约会的愉快心情。后来桑间、濮上成了情人约会的代名词。《邶风·静女》描写一个在城墙下苦等意中人“搔首踟蹰”的少女神态。《卫风·氓》描写一个被丈夫抛弃的少妇“静言思之，躬自悼矣”的沉痛悔恨心情。《郑风·风雨》写相爱中的男女相见之乐。《郑风·鸡鸣》写男女夜会，缠绵悱恻。《郑风·褰裳》写少女“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洒脱精神。《郑风·大车》写少女对爱情坚贞不渝的情怀。《郑风·采葛》写少女对恋人的苦苦思念，“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郑风·溱洧》写青年男女在春天相约远游，赠物定情的情景。《郑风·将仲子》写少女思念情

人,但情人来与她幽会时,她又畏父母、兄弟、人言的重重顾虑。《郑风·狡童》写热恋中的女子对情人的戏谑。《卫风·木瓜》、《郑风·蓍兮》表现男女爱情中的欢乐和谐等。这些爱情诗,有的表现热恋之乐,有的反映相思之苦,有的哀怨,有的热情奔放,大胆泼辣,都写得活灵活现,生趣盎然。

《诗经》中有关中原的《国风》反映了当时中原人民的喜怒哀乐和民风民俗。富有韵味和感染力,表现了古代人民群众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展现了他们开朗的性格和纯洁的心灵。这些作品,大多为劳动人民自己的创作。诗中多群众口语,鲜明生动。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个性突出,很有生命力。

与《诗经》中其他诗歌一样,有关中原的《国风》也都采用赋、比、兴的手法。如《郑风·溱洧》全用陈述铺叙(赋)。《卫风·氓》用桑树由茂盛到凋落,比喻妇女容貌由盛而衰(比)。《邶风·燕燕》为送别诗,以燕子飞时差池不齐起兴,联想送别时的依恋之情等(兴)。

这些诗歌,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成为后代文学作品的现实主义典范。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二、汉魏、西晋诗歌

(一) 张衡的诗

张衡(78—139年),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曾任南阳主簿、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前文已述及。

张衡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对文人五、七言诗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西周盛行四言诗,西汉文人诗大体也用四言体,但四言“文繁而意少”(钟嵘《诗品序》),故东汉之后,逐渐被五言诗所代替。五、七言诗的出现,使中国诗歌向前

跨进了一步。

张衡诗歌的代表作有《同声歌》、《思玄诗》和《四愁诗》等。

《同声歌》是一首完整的五言诗，一唱三叹，技巧熟练。今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是东汉班固的《咏史》，但“质木无文”（《诗品序》），技巧不高。《同声歌》的出现，表明早期文人五言诗的进步，为建安以后五言诗的盛行铺平了道路。

《思玄诗》全为七言，句式工整，摆脱了秦汉以来七言诗一韵到底，全用平声的格局。《四愁诗》通篇也是七言，对仗比《思玄诗》还要工整。它以情诗形式，表达诗人无法实现政治抱负的忧伤。这些都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的文人七言诗，对魏晋以后文人七言诗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二）蔡琰的诗

蔡琰（177—？），字文姬，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蔡邕之女。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她被南匈奴左贤王所虏，为其妻，生二子，居匈奴十二年。曹操派人把她赎回，再嫁陈留董祀。

蔡琰生逢乱世，婚姻不幸，一生坎坷。她传世的诗作有三首：二首《悲愤诗》和一首《胡笳十八拍》。

《悲愤诗》一首为五言，一首为骚体。五言《悲愤诗》公认为蔡琰所作。诗中描写汉末大乱和她被虏于南匈奴的苦难生活及赎回后的复杂感受。通过她自己的一生遭遇，反映汉末战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笔端饱含血泪，悲怆动人，是现实主义的诗歌杰作。骚体《悲愤诗》情节与蔡琰生平不符，多数学者认为系伪托。

《胡笳十八拍》为琴曲歌辞，始见于朱熹《楚辞集注》，文体与当时作品有所不符，故有人认为是后人假托。郭沫若认为是蔡琰所作无疑。

（三）阮瑀的诗

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东汉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在曹操手下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仓曹掾属等职。

阮瑀是蔡邕的学生,为“建安七子”^①中的重要作家。

阮瑀的诗歌成就很高。以《驾出北郭门行》、《七哀诗》、《怨诗》著名。风格苍劲凄凉,对东汉后期兴起的五言诗的进一步完善起过促进作用。

(四) 阮籍的诗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三国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曾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职。前文已述及。

阮籍与谯国嵇康、河内山涛、河内向秀、沛国刘伶、陈留阮咸、琅邪王戎,六个名士一起,合称竹林七贤。^②

阮籍蔑视礼法,常以清白眼看人。魏晋之际,处于司马氏篡权阶段,政治斗争残酷。为了避祸,他常借酒掩饰苦闷,“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晋书·阮籍传》)。

阮籍作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表现了他身处危乱之世的忧愤心情,也代表了他文学上的主要成就。由于他不敢直抒胸臆,所以内容写得很隐晦,后人读其诗,只能“粗明大意”而已。(《文选》卷二三阮籍《咏怀诗》李善注)内容主要是讲述生平理想和抒发惧祸忧生心情。

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却不满现实,内心充满焦虑和痛苦,于是把政治倾向和生活感受,都倾注到咏怀诗中。因而他的诗既有慷慨悲歌之气,又有委婉曲折以抒忧世伤生之叹,自然浑朴,不加雕琢而文采俊逸。他以含蓄的诗风,为五言诗创作开辟了一条在高压政治下抒发情怀的道路,风格独特,陶渊明、李白等人都曾受到他的影响。

① “建安七子”是东汉末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

② 竹林系嵇康之家,其周多竹林,在河内山阳县(今河南修武)。三国魏末阮籍等七人常在此交游酣饮,故世称“竹林七贤”。

(五) 潘岳的诗

潘岳(247—300年),字安仁,西晋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一说从父辈起,即居巩县(今河南巩义市)。曾任河阳县令、怀县令、给事黄门侍郎等职。

潘岳能诗善赋,与陆机齐名。钟嵘《诗品》评之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

潘岳的《悼亡诗》五言三首,怀念亡妻,悲切感人。诗云:“帟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睹物伤情,缠绵悱恻。

《河阳县作诗》二首,在《在怀县作诗》二首,是抒发下层官僚矛盾苦闷心情的作品,比较真实,既怨自己名位卑下,又怕在任没有政绩。写景状物,辞藻华丽,比较注意形式美。“川气冒山岭”,“游鱼动圆波”(《河阳县作诗》),都是很生动形象的名句。

(六) 潘尼的诗

潘尼(约250—约311年),字正叔,西晋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中书令、太常卿等职。潘岳之侄。

潘尼的《三月三日洛水作》诗:“南山郁岑崟,洛川迅且急。清松荫修岭,绿繁被广隰。”描写春景,清新秀丽。

《迎大驾》反映西晋八王之乱的社会现实:“狐狸夹两辕,豺狼当路立。翔凤婴笼槛,骐驎见维挚。”

《送卢弋阳景宣》,述别离之情,哀惋动人。

钟嵘《诗品》称潘尼的作品“文采高丽,并得虬龙片甲,凤凰一毛”。

(七) 王济的诗

王济(?—311年),字正长,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西晋末年,曾任侍中、陈留内史,在阳夏(今河南太康)被石勒俘虏杀害。

王济诗句有云:“朔风动劲草,边马有归心。”辞简意丰,感情至深,颇为后人称赞。

三、唐代诗歌

(一) 上官仪的诗

上官仪(约608—664年),字游韶,唐陕州陕县(今属河南)人。曾任宰相等职。

上官仪善作五言诗,风格华丽妩媚,许多人摹仿,称为“上官体”。较好的代表作有《入朝洛堤步月》等。

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等诗歌对仗理论,对律诗的形成起过推动作用。

(二) 宋之问的诗

宋之问(约650或656—712或713年),一名少连,字延清,唐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曾任洛州参军、鸿胪主簿、越州长史等职。

宋之问人品不佳,曾因谄事张易之,贬为泷州参军,又因贪污受贿,受降职处分。

宋之问起初多作应制诗,意义不大。贬官后诗风转变,所作《题大庾岭北驿》、《经梧州》、《渡汉江》等,内容充实,凝练生动。

宋之问长于五言律诗,格律严整,文辞华丽,胡应麟评他为初唐五律之冠(《诗薮·内编》)。

宋之问与沈佺期齐名,并称沈宋,是把律诗形式固定下来的代表人物。

律诗发端于南朝沈约等人,到唐朝宋之问、沈佺期时正式定型。律诗对句数、字数、对仗、声调都有严格要求。绝句实为律诗的一部分。宋之问、沈佺期完成了律诗“回忌声病,约句准篇”任务,才把律诗的形式固定下来。

(三) 沈佺期的诗

沈佺期(约656—714或715年),字云卿,唐相州内黄(今属河

南)人。曾任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等职。曾因受贿入狱,又因谄事张易之,流放驩州。

沈佺期与宋之问一样,起初多作应制诗,形式华丽,意义不大。流放之后,诗风转变,《驩州南亭夜望》、《岭表逢寒食》等描写对家室的思念,感情真挚。

沈佺期长于七言律诗,精细严密,被胡应麟评为初唐七律之冠(《诗薮·内编》)。代表作《独不见》(又名《古意呈补阙乔知之》)情韵高古,气势雄畅。

沈佺期与宋之问一起,同为律诗定型化的代表作家,为近体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四) 杜审言的诗

杜审言(?—708年),字必简,唐洛州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杜甫的祖父。曾任洛阳丞、膳部员外郎、国子监主簿等职。

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所作《登岳阳城》、《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描写山川景物,艺术精湛,笔力雄健。

杜审言晚年与沈佺期、宋之问相唱和,同为近体诗的奠基人。杜甫对杜审言的诗法,曾作了创造性的继承。

(五) 王梵志的诗

王梵志,唐卫州黎阳(今河南浚县)人。初唐诗人,生平不详。

王梵志在诗歌上的突出贡献,在于“不守经典,皆陈俗语”(敦煌写本《王梵志诗原序》),创立了一个通俗诗派。内容多劝善惩恶,风格浅显平易,嬉笑诙谐皆成诗篇。

王梵志的诗,在当时很有名声,佛寺甚至用它“开悟愚士昧学之流”,“教诫诸学道者”。王维、白居易都曾受到他的影响。他的诗,在唐代就已传到日本。

(六) 刘希夷的诗

刘希夷(约651—?)字庭芝,唐汝州(今属河南)人。上元二年

(675年)进士,未做官。

刘希夷所作宫体诗,如《白头吟》、《公子行》等,格调清柔。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等名句。所作边塞诗,如《从军行》等,则雄浑豪放,另是一番风貌。

(七) 崔颢的诗

崔颢(?—754年),唐汴州(今河南开封)人。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进士,曾任太仆寺卿、司勋员外郎等职。

崔颢有多方面的诗才。《长干曲》四首,写江南民间恋情,水乡色彩很浓。《雁门胡人歌》:“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边塞风光跃然。

七律《黄鹤楼》是传颂千古的名篇。宋人严羽《沧浪诗话》称:“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该诗深受李白称赞,曾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诗纪事》)

(八) 王湾的诗

王湾,唐洛阳人。唐玄宗先天年间(712—713年)进士及第,曾任荥阳主簿、洛阳尉等职。

王湾最有名的诗是《次北固山下》:“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意境开阔,风格壮丽,通过北方人的眼光,把江南山川描写得生气盎然,深受当时和后世人看重。《河岳英灵集》卷下称“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为“诗人已来,少有此句”。

(九) 祖咏的诗

祖咏,唐洛阳人。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进士及第。与王维友善。仕途多挫,归隐汝水。

祖咏以写山水诗出名。《终南望余雪》脍炙人口。《望蓟门》意境开阔。皆文字清新,格调脱俗。

(十) 杜甫的诗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唐巩县(今河南巩义市)人。曾任右卫率府胥曹参军、左拾遗、华州司功参军、检校工部员外郎等职。

杜甫生逢安史之乱,颠沛流离,受尽苦难,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为后人留下1400多首诗篇。

杜甫诗中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变历程,因而有“诗史”之称。

杜甫的许多诗歌,都是不同凡响的杰作,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式。其名篇有《望岳》、《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悲陈陶》、《春望》、《哀江头》、“三吏”(《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杜甫曾在诗中表达他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抱负,提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希望,诅咒“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社会,感叹安史之乱期间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的社会景象。

在杜甫的诗中,作者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艺术上情、景与时事交融,技巧上精益求精,“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集古典诗歌艺术之大成,并加以发展创新,取得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达到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正如元稹所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杜甫诗歌的基本风格是深沉凝重。在这种基调上,不同的作品又有不同的风采,有的雄浑,有的悲壮,有的奔放,有的瑰丽,有的质朴,有的轻灵,出神入化,变幻无穷。

杜甫的诗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他被后人奉为诗歌史上的

最高典范“诗圣”。韩愈曾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不但唐代白居易、元稹，宋代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诗人受到杜甫的影响，而且历代广大读者都从他的诗中得到爱国爱人民精神的教育和熏陶。

（十一）元结的诗

元结（719—772年），字次山，号漫叟，唐鲁山（今属河南）人。曾任道州刺史、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等职。

元结为人正直。所写诗歌，敢于触及社会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代表作有《悯荒诗》、《贱士吟》、《贫妇词》、《去乡悲》、《舂陵行》等。

元结曾斥责横征暴敛的官吏说：“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舂陵行》）

（十二）韩翃的诗

韩翃，字君平，唐南阳（今属河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天宝十三载（754年）进士及第。代宗时，在汴宋节度使田神功幕府；德宗时为中书舍人。

韩翃存诗较多，清新流丽，技巧上乘。“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是尽人皆知的名句。“蝉声驿路秋山里，草色河桥落照中”（《送王光辅归青州兼寄储次郎》）、“落日澄江乌榜外，秋风疏柳白门前。桥通小市家林近，山带平湖野寺连”（《送冷朝阳还上元》），也都写得很工整，很有意境。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说韩翃的诗“方之前载，芙蓉出水，未足多也”。

（十三）元稹的诗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唐洛阳人。曾任监察御史、虢州长史、宰相、武昌军节度使等职。诗作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

元稹曾与白居易一起，倡导新乐府运动。元稹所作乐府诗，内容充实，思想深刻。代表作有《田家词》、《织妇词》、《上阳白发人》、《连昌

宫词》等。皆能有力地反映社会现实。

元稹的悼亡诗,以《遣悲怀三首》著名,为悼念其妻韦丛而作,写得很有感情。他追念少年时情人的艳体爱情诗,如《增双文》、《会真诗三十韵》等,也写得细致生动,颇有特色。

元稹的一些小诗,后人评价也很高。如《行宫》只二十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洪迈说它“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容斋随笔》)。

(十四) 李贺的诗

李贺(790—816年),字长吉,唐福昌(今河南宜阳)人。曾任奉礼郎。唐宗室郑王李亮之后。英年早逝,只活27岁。

李贺继承屈原以来的积极浪漫主义传统,采用自由奔放的乐府体和古体诗来反映现实。代表作有《秦王饮酒》、《雁门太守行》、《公无出门》、《开愁歌》、《天上谣》、《高轩过》、《李凭箜篌引》等。或讽刺统治集团的黑暗腐朽,或抒发自己的愤懑心情,或描写诗人对神仙世界的奇思妙想,或表现艺术家的高超技艺,都写得既思想深刻,又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名句有“一唱雄鸡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收取关山五十州”,“天老地荒无人识”等。

李贺的诗歌,常有荒诞浪漫色彩,熔铸词采,驰骋想象,新奇幽巧,形象独特,自成一家,号称“长吉体”。

唐代李商隐、宋代刘克庄、元代萨都刺都曾受李贺影响。清代王夫之认为李贺可与李白相匹敌。(《唐诗评选》)

(十五) 王建的诗

王建(约767—约831年),字仲初,唐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曾任昭应县丞、太府寺丞、陕州司马、光州刺史等职。

王建以写乐府诗与张籍齐名,世称“张王乐府”。

王建乐府诗,思想深刻,生活气息浓烈,痛斥社会黑暗,同情人民疾苦。代表作有《田家行》、《织锦曲》、《水夫谣》、《射虎行》、《辽东行》

等。诗多白描,简洁含蓄,节奏有力,富有民歌色彩。

(十六) 卢仝的诗

卢仝(?—835年),号玉川子,唐济源(今属河南)人。无官职。

卢仝作诗,峭挺险怪,深得韩愈赞赏,称为“卢仝体”。他的《月蚀》一诗,奇伟恣肆,长达千言,翁方纲誉为“雄快不可逾”(《石洲诗话》)。

与李贺诗歌的瑰诡一样,卢仝的怪体(怪而新的风格),亦在唐诗中独树一帜。

(十七) 李商隐的诗

李商隐(约812—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唐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父时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

李商隐是晚唐重要诗人。他生活在牛李党争时期。牛党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是他的老师,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是他的岳父。他与两派都有瓜葛,而两派都不喜欢他。故一生受政治打击,只做过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尉等小官,长期落魄江湖。“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就是他无可奈何感伤心情的流露。

李商隐的政治诗《有感二首》,抨击宦官的专制暴行,《寿安公主出降》痛斥藩镇割据,都能触及时事,具有一定思想深度。长诗《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可与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提并论。

李商隐的咏史诗《汉宫》批评封建帝王荒唐误国,《隋宫二首》指斥隋炀帝逸游亡身,《陈后宫》批评陈朝皇帝宴乐无度。借古讽今,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

李商隐的无题爱情诗,常借香草美人表达感情,含义深远,辞藻瑰丽,音调和谐,情致缠绵,具有迷人的光彩,并为后代开创了一个无题诗新传统。“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无题》二首)、“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都是为人称道的名句。

李商隐的诗,对仗工整,用字讲究,感情真实,构思巧妙,曲折委婉,余味无穷。无论感时、吊古、言情,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在唐代诗人中,李商隐风格独特,人们常把他与杜牧一起,并称“小李杜”。又把他跟温庭筠一起并称“温李”。宋代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体诗人,清代大诗人钱谦益、吴伟业、龚自珍都受到他的影响。他还开宋代婉约词派的先河。

四、宋元以来诗歌

(一) 魏野的诗

魏野(960—1019年),字仲先,号草堂居士,陕州(今河南三门峡)人。宋初的隐士和诗人。终身不仕,常在林泉间弹琴作诗,结交的人多为寇准之流,声望很高。

魏野“为诗精苦,有唐人风格,多警策句”(《宋史·魏野传》)。他性爱山野,诗中多超俗出世之语,如《寻隐者不遇》云:“寻真误入蓬莱岛,香风不动松花老。采芝何处未归来,白云满地无人扫。”

魏野的不少诗中,还有宋初少见的苍劲壮阔气氛。《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云:“日暮北来唯有雁,地寒西去更无州。数声塞角高还咽,一派泾河东不流。”

魏野诗名,远播国外。契丹曾派使者专门访求他的诗篇。他的《草堂集》上帙在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已传到契丹。

(二) 贺铸的诗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宋卫州(今河南卫辉)人。他是宋太祖贺皇后的族孙。曾任徐州宝丰监钱官、和州管界巡检、泗州通判等职。为人豪爽耿直,由于主要担任冷官闲职,故一生不得志。

贺铸词作得好,所作诗,成就亦高。曹庭栋《宋百家诗存》称其诗

“有风度，有气骨”。名篇有《黄楼歌》、《海陵西楼寓目》、《秦淮夜泊》等。或悲壮，或秀丽，各尽其宜。

（三）陈与义的诗

陈与义(1090—1138年)，字去非，号简斋，宋洛阳人。北宋时曾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等职，南宋时官至参知政事。

陈与义是两宋之际，中原最杰出的诗人。

北宋时，陈与义的诗，明快清新。《襄邑道中》：“**飞花两岸照船红，百里榆堤半日风。**”《对酒》：“**白竹扉前容醉舞，烟村渺渺见高台。**”都写得很有特色。

南渡后，陈与义的诗中充满思乡之情。他在诗中一再表明他“曾为庾岭客，本是洛阳人”(《瓶中梅》)，“**遭乱始知承平乐，居夷更觉中原好**”(《居夷行》)。

陈与义最有名的怀念故乡的诗是《牡丹》和《题画》。《牡丹》云：“**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牡丹本是洛阳名花，看到牡丹，最容易勾起他对故乡的思念。《题画》诗云：“**分明楼阁是龙门，亦有溪流曲抱村。万里家山无路入，十年心事与谁论。**”流落南方十余年，洛阳龙门的山川风光，怎么也无法使他忘怀。

陈与义在战乱中经历的流亡生活，与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的遭遇十分相似，在心灵上与杜甫有共鸣之处。所以他南渡后的诗，不但继承了杜甫的爱国主义精神，艺术上也师承杜甫，雄浑悲壮，多慷慨之语。名篇有《登岳阳楼》、《再登岳阳楼感慨赋诗》等。此外，“**丧乱那堪说，干戈竟未休**”(《感事》)、“**万里南征无赋笔，茫茫远游不胜悲**”(《醉中》)、“**臣少忧国今成翁，欲起荷戟伤疲癯**”(《雷雨行》)等都是杜甫式的诗句。

陈与义的诗，擅白描，重意境，多有新意。他是宋代学杜甫成绩最好的诗人之一。

(四) 辛愿的诗

辛愿,字敬之,自号女儿野人,又号溪南诗老,金福昌(今河南宜阳)人。他是金代末年的诗人,为元好问的三个好友之一,一生未做官。

辛愿喜杜诗韩文。金末丧乱,他曾作《乱后》诗云:“兵去人归日,花开雪霁天。川原荒宿草,墟落动新烟。困鼠鸣虚壁,饥鸟啄废田。似闻人语乱,县吏已催钱。”真实,清新。

(五) 王恽的诗

王恽(1227—1304年),字仲谋,元卫州汲县(今河南卫辉)人。曾任监察御史、翰林学士等职。

王恽是元初著名文学家。散文学韩愈。《烈妇胡氏传》写弱女子为救夫而杀虎的故事,凛凛有生气。词,清丽豪放,属苏轼、辛弃疾一派。

王恽的诗歌,充满了对贫苦人民的同情之心。《挽漕篇》写老百姓被官府强迫去拉船的痛苦:“钜野到齐东,着浅凡几处。必资州县力,涩滞方可度。漫村赶丁夫,所在沸官府。”“中间吏因缘,为弊不可数。蛮稍贪如狼,总压暴于虎。”“舟中一斛粟,百姓几辛苦。”《流民叹》描写水旱灾害下,农民沦为乞丐的悲惨生活:“虽云生处乐,乏物得生活?扶携远趁河南丰,道路无资日行乞。毳衣穿结杖蒿藜,气力凌兢双胫赤。”作者在诗末叹道:“君门万里安得知,作诗代洒流民血。”

王恽的抒情诗,写得很清新。《梁园对月》云:“儿时曾住汴梁城,二十年来重此行。一片凤凰池上月,向人还是旧时情。”

(六) 马祖常的诗

马祖常(1279—1338年),字伯庸,元光州(今河南潢川)人。蒙古族。先世为雍古特部。曾祖在金末任凤翔兵马司判官,即以马为姓。曾任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

马祖常主张文学秦汉,诗学汉魏盛唐。“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元诗选·马祖常小传》)

马祖常的诗,多描写各地风土人情,赞美各族人民勤劳勇敢,揭露统治者荒淫无耻和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著名的有《河湟书事》、《宿迁县》、《马户》等。

(七) 许有壬的诗

许有壬(1286—1364年),字可用,元彰德汤阴(今属河南)人。曾任枢密副使、中书左丞等职。他具有民本思想,主张改革弊政。著《至正集》八十一卷,《圭塘小稿》十三卷。

许有壬的词学苏轼、辛弃疾,散文数量也很多,尤以诗作成就最大。《哀弃儿》描写一对夫妇饥寒交迫,把儿子抛弃在路上,儿子啼哭追赶父母的情景,读后使人有撕心裂肺之感。《登岳阳楼》呼吁人们绘流民图,向最高统治者反映人民的困苦。这些都是富有人民性的作品。

(八) 何景明的诗

何景明(1483—1521年),字仲默,号白坡,又号大复山人,明信阳(今属河南)人。曾任吏部员外郎、陕西提学副使等职。

何景明是“前七子”^①的主要成员,主张文学秦汉,古诗宗汉魏,近体诗宗盛唐。他与李梦阳同倡复古运动,反对当时流行的以粉饰太平为目的“台阁体”诗和八股文,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

何景明的诗,较能反映现实,或借古讽今,或反宦官专权。代表作有《玄明宫行》、《盘江行》、《兴隆祀丁曲》、《罗女曲》等。

何景明心地正直,鄙视荣利,不满黑暗现实,诗中颇多激情。他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力求创新,不要生搬硬套,不做“古人影子”。这比起李梦阳主张的句模字拟,又高一筹。

^① “前七子”为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进步文学流派。他们的复古主张,对消除八股文影响,改变萎靡不振的诗风,起过积极作用。他们在政治上敢于与权贵、宦官作斗争,创作上敢于反映现实。

(九) 王廷相的诗

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明兰封(今河南兰考)人。曾任兵部尚书等职。前文已述及。

王廷相是明代著名哲学家,诗亦可观,也是“前七子”之一。他骂宦官专权的诗句云:“卖官何止金为堂,通贿能令鬼上树。”(《西山行》)痛快之至,切中时弊。

(十) 周亮工的诗

周亮工(1612—1672年),字元亮,号栎园,清开封人。曾任明潍县知县,入清任布政使、户部右侍郎等职。

周亮工博物强记,见高识广。诗多悲时之作,苍凉古朴,与晚明浮靡诗风不同。他的《汴上谣十二首》、《寒食后一日新乡道上简许傅岩》等,都是歌咏河南山川人物、风光民情的名篇。

(十一) 宋莘的诗

宋莘(1634—1713年),字牧仲,号漫堂,又号西陂、绵津山人,清河南商丘人。曾任江苏巡抚、吏部尚书等职。

宋莘在文坛上,与王士禛齐名,影响很大。他论文,推崇唐宋。曾合刻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文为《国朝三家文钞》,流传很广。

宋莘的诗歌,清秀隽永。内容多题画、咏物、记游、赠答之作,颇有特色。名篇有《盘山诗》、《乌江》、《椰子》、《石盆峪龙潭歌》、《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相和》等。

宋莘论诗,尊崇杜甫,著有诗论《漫堂说诗》。但创作实践上,他主要是学宋代苏轼等人。

(十二) 李季的诗

现代中原最有名的诗人是李季。李季(1922—1980年),河南唐河人。曾任八路军连指导员、县政府秘书,建国后先后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诗刊》主编等职。

1946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被郭沫若称作是从

“人民翻身”到“文艺翻身”的信号。它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具有代表性的诗歌作品。它采用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叙述了一对青年农民的爱情故事，语言生动，节奏明快，内容和形式都很新颖。

第二节 散 文

散文在中国古代是与诗歌并列的另一正宗文体。曹丕称它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

散文可以抒情，可以叙事，也可以议论。古人写东西讲究文采，那怕是政治报告、露布、碑志、书信等都充满了文学色彩。

甲骨刻辞是散文的萌芽。《尚书》标志中国散文已经形成。以后经过了先秦和秦汉子史散文、唐宋古文、明清复古运动和小品文等几个发展高潮。

散文是中原文学的又一主体。从甲骨文和《尚书·盘庚》算起，已有了三千三百年历史。

中原作家在散文发展的每一关键时刻都起过重要作用，产生过许多一流作家和大量有影响的作品。

一、先秦散文

（一）甲骨刻辞

甲骨刻辞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辞。

十九世纪末以来，安阳殷墟先后出土了十多万片刻有文字的商代甲骨。这些甲骨上的文字，大都是占卜的记录，长的达90余字；也有少数是关于某次历史事件的记载，长的约达150字。

甲骨刻辞，语言精炼，表达准确。它们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中

原地区,也是中国最原始的散文。

(二) 《尚书·盘庚》

中原地区通过简册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散文是《尚书》中的《盘庚》等篇。

《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是上古历史档案文献汇编。但今天所见的《尚书》,并不完全是真实可靠的原始史料。

《尚书》中记载尧舜和夏代历史传说的《虞书》和《夏书》,是战国时期,甚至更晚人的作品;作者是否为中原人,亦难以说清。《周书》中大约有近二十篇是可靠的档案文献,但多系周人作品,非中原人所著。只在《商书》中有六篇是比较直接的档案文件,它们都是中原人的作品。

《尚书》中的《盘庚》三篇,记载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三次讲话,系记言散文。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尚书》中最古的真实史料。

《书序》认为《盘庚》三篇是盘庚当时的记录,《史记·殷本纪》则认为是盘庚之子小辛时追记的作品。盘庚和小辛都是公元前十四世纪上半期的殷王。所以《盘庚》三篇不论是作于盘庚时,还是作于小辛时,距今都已三千三百多年。

《盘庚》三篇,中心突出,夹叙夹议,颇富感情色彩,表现了盘庚超越常人的胸怀、胆略和精神。语气坚定、果断,并用“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视国家衰败,都很形象,初具文学特征。

《盘庚》三篇,结构比较完整,有一定层次,它是中国古代散文已形成的标志,为春秋战国散文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老子的散文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一说姓老,名聃),春秋晚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任东周柱下史,管理国家图籍。

老子所著《老子》一书，是有韵的散文。全书 5000 余字，用语录体写成。音节响亮，语言精炼，且多对偶排比和警句，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

《老子》充满哲理，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又具有很强的文学性，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四）庄子的散文

庄子（约前 369—前 286 年），姓庄，名周，战国时宋国蒙（今河南民权）人。曾任漆园吏。由于家贫，曾一度靠编草鞋度日。前文已述及。

庄子所著《庄子》一书，既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又是优美的散文作品。

庄子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他的散文具有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和丰富的想象力。

运用寓言是庄子散文的一个重要艺术特点。如轮扁斲轮寓读书之法（《天道》），匠石运斤寓知音难得（《徐无鬼》），庖丁解牛寓认识事物的规律（《养生主》）等，都很具体贴切。先秦其他子书中的寓言，多为引自历史传说和民间故事，而《庄子》中的寓言大多为作者虚构。《庄子》中有些寓言很长，单独成篇，如同短篇小说，让寓言中的人物代表作者说明道理，对话、情节也很生动。

使用比喻是庄子散文的另一个艺术特点。如《秋水》用河与北海、北海与天地、稊米与太仓比喻大与小的相对性，《逍遥游》用比喻论证超越时空的绝对自由，《天运》用比喻说明做事要因时而变，不能拘泥成法等，都很巧妙，而且富于变化。

利用夸张手法是庄子散文的第三个艺术特点。如《逍遥游》开头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设想奇妙，气势宏伟，令人叫绝。

运用讽刺手法是庄子散文的第四个艺术特点。如《徐无鬼》讽刺

魏武侯对人民的搜刮；《则阳》嘲弄诸侯征讨，掠夺财物；《外物》描写儒者的虚伪性；《秋水》讥笑惠施的疑心病；《列御寇》鞭挞拍马溜须之辈等，都很深刻有力。

庄子散文，色彩瑰丽，文思浩瀚，内容丰富，含义深蕴。山川人物，鸟兽虫鱼，影子骷髅，皆可驱之笔端，嬉笑怒骂，总成文章。

清人金圣叹称《庄子》为“天下第一奇书”，把它与《离骚》、《史记》、《杜诗》、《西厢记》、《水浒》并称。鲁迅说《庄子》“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秦汉以来，贾谊、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都曾受到《庄子》的影响。

（五）韩非的散文

韩非（约前 280—前 233 年）为战国时韩国（今河南新郑一带）贵族。他与李斯同学于荀况，后被李斯所害。

韩非所著《韩非子》五十五篇，文笔潇洒，说理缜密，谈锋犀利，议论透辟，不但是著名的哲学著作，也是很好的散文作品。《孤愤》、《五蠹》、《说林》、《说难》、《显学》、内外《储说》等篇尤为出名。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写文章的目的在于“功用”。他写《韩非子》的目的就是为了阐述法家思想。

韩非在说理时，用先讲论据，再作论证，最后得结论的三步曲，使文章生动而又有说服力。

韩非在论辩时，喜用“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难势》）的方法，使论敌无法招架。

巧妙地、大量地运用寓言故事，是韩非文章的又一重要特色。《说林》和内外《储说》共收寓言故事 300 多则，其中《说林》全为寓言。“涸泽之蛇”、“三虱食彘”（《说林》）、“守株待兔”（《五蠹》）等已成为尽人皆知的寓言，有的还被当作成语使用。

（六）《吕氏春秋》的散文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吕不韦（？—前 235 年）主编的一部书。

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今属河南)人,为阳翟(今河南禹州)富商,入秦为相国。被秦王嬴政罢免贬蜀后,自杀。

《吕氏春秋》主要为吕不韦的门客执笔所写,共一百六十篇。由于撰稿人较多,书中包容儒、墨、名、法等各家观点,故有杂家之称。

但杂家也是一家。全书是经过吕不韦严格加工整理的,体例统一,结构完整,语言形象生动,文学色彩很浓。书中亦多寓言,《察今篇》中的“刻舟求剑”就是典型的例子。

二、秦汉散文

(一) 李斯的散文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属河南)人。曾任秦国长史、客卿、丞相等职,为秦朝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对秦朝统一全国,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统一文字等有重大贡献。

李斯最有名的散文是《谏逐客书》。有理有据,文采飞扬,笔锋犀利,气势酣畅,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秦王政(始皇帝)十年(前237年),朝廷决定驱逐一切客卿。李斯的《谏逐客书》就是为劝阻这件事而写的。文中先用历史,说明客卿对秦国的许多重大贡献,又列举事实,说明只有广招全国人才,才能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李斯这篇文章,使秦王政改变了错误做法。

如果当时真把秦国以外的人材全部赶走,秦始皇也就无法统一中国了。这篇文章拨正了秦朝统一全国的航向,决定了一批人以及一个朝代的命运。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巡游各地,多次刻石纪功。其辞,相传亦出自李斯之手。这些刻石,质朴壮伟,对汉晋碑铭影响极大。

鲁迅说:“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由现存者而言,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汉文学史纲要》)

（二）贾谊的散文

贾谊(前 200—前 168 年),西汉洛阳人。曾任博士、太中大夫、长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等职。前文已述及。为汉初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贾谊通晓诸子百家,少年时即以博学能文著称。由于年轻、有才华和受到皇帝信任,遭到周勃、灌婴等元老重臣的忌恨,屡受排挤打击,长期不得志,三十三岁就忧郁而亡。

贾谊为著名的政论家,主要政论作品有《过秦论》、《治安策》(又称《陈政事疏》)、《论积贮疏》等。他在文章中,总结历史兴亡经验,为巩固汉朝统治出谋献策,对西汉政治经济起过重要影响。

刘向认为,“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贾谊传赞》引)。

贾谊的散文,气势充沛,语言激切,说理透辟,议论起来毫无顾忌,情感浓郁,文采斐然,极富感染力。

鲁迅称贾谊、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

（三）晁错的文章

晁错(前 200—前 154 年),西汉颍川(今河南禹州)人。曾任太子家令、中大夫、御史大夫等职。为著名的政治家和散文家。

晁错的代表作是《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贤良对策》、《言兵事疏》等。他主张贵粟劝农,与民休息,入粟于边,以巩固边疆。

这些“西汉鸿文”(鲁迅语),言切时政,立意深邃,议论中肯,文笔流畅。晁错的文采虽不如贾谊,但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有时为贾谊所不及。

（四）蔡邕的散文

蔡邕(132—192 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任议郎、尚书、左中郎将等职。前文已述及。

蔡邕是东汉末年著名的经学家、书法家、辞赋家和散文家。他的散文成就主要表现在碑志上,代表作有《郭有道碑文》等。多用偶句,音节和谐,典雅工整。

东汉末年是中国散文风格的一个转变时期,西汉以来厚重朴实的文风开始改变,魏晋时盛行的清丽典雅的文风开始兴起,蔡邕就是这个转变中的代表作家。

(五) 阮瑀的散文

阮瑀(约165—212年),字元瑜,东汉末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在曹操手下任司空军谋祭酒、丞相仓曹掾属等职,为建安七子(东汉末年七位文学家的合称)中的重要作家,前文已述及。

阮瑀以作檄文、书信见长,代表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为魏武与刘备书》等。皆行文畅达,舒卷自如。

阮瑀文思敏捷,曾在马上为曹操给关西军阀韩遂写信。稿成,曹操竟无法增删一字。

三、魏晋散文

(一) 阮籍的散文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曹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职。

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为竹林七贤之一。前文已述及。

阮籍的诗著名,散文亦好。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写于辉县(今属河南)苏门山,长达4000余字。文云:“汝君子之处区之内,亦何异夫虱之处裯之中乎!”这个有名的“虱处裯中”的故事,至今读来,犹觉醒目提神。

(二) 潘岳的散文

潘岳(247—300年),字安仁,西晋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有人

认为,他从父辈起,即居住今河南巩义市)。曾任河阳县令、怀县令、给事黄门侍郎等职。

潘岳对诗、赋、散文皆精,前文皆述及。

潘岳在散文上,“善为哀诔之文”(《晋书·潘岳传》),代表作有《杨荆州诔》、《杨仲武诔》、《夏侯常侍诔》、《马汧督诔》等。其中以《马汧督诔》最有名。文中叙述氐人齐万年起兵叛乱,围攻汧城,汧督马敦奋勇作战,保住城池而反被诬陷致死的悲壮事迹,歌颂了一位大智大勇的义士。笔力刚劲明快。

明代张溥认为,这篇诔文的价值,可与班固《汉书》的《苏武传》相提并论。他说:“余读潘安仁《马汧督诔》,惻然思古义士,犹班孟坚之传苏子卿也。”(《潘黄门集题词》)

潘岳还有许多哀悼亲戚朋友的作品,如《哀永逝文》、《杨荆州诔》等,也皆辞美情切,哀感动人。

(三) 潘尼的散文

潘尼(约250—约311年),字正叔,西晋中牟(今属河南)人。潘岳之侄。曾任中书令、太常卿等职。

潘尼的散文以《安身论》闻名。文中讲混迹官场的经验,从举止、言语、欲求、行动等方面论述,批判“人人自私,家家有欲,众欲并争,群私交伐”的官场现状,颇为别致。

四、唐代散文

(一) 元结的散文

元结(719—772年),字次山,号漫叟,唐鲁山(今属河南)人。曾任道州刺史、容州都督充本管经略守捉使等职。

元结为人正直,同情人民疾苦,关心国家安危。所写散文,大多篇幅短小,文笔犀利,形象生动,具有杂文的战斗风格。名篇有《丐论》、

《恶圆》、《恶曲》、《七不如》等。

唐人裴敬把元结与陈子昂、萧颖士、韩愈相提并论。

（二）独孤及的散文

独孤及(725—777年),字至之,唐洛阳人。曾任礼部员外郎、常州刺史等职。

独孤及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作家,长于议论。代表作有《古函谷关铭》、《风后八阵图记》等。

韩愈曾受到独孤及的影响。

（三）萧颖士的散文

萧颖士(716—768年),字茂挺,唐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曾任集贤校理、史馆待诏、扬州功曹参军等职。

萧颖士的散文与独孤及齐名,他也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为文注重内容,反对华而不实。当时,新罗国(今朝鲜)人都愿拜他为师,代表作有《赠韦司业书》等。

（四）樊宗师的散文

樊宗师(?—823年),字绍述,唐南阳人。曾任国子主簿,著作佐郎,绵、绛二州刺史等职。

樊宗师著作甚丰,撰有文、赋五百二十一篇,诗七百十九首。韩愈称赞他说:“多矣哉,古未尝有也!”(《南阳樊绍述墓志铭》)

由于樊宗师立志创新,“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故有些诗文写得晦涩难解。但大部分诗文都写得文从字顺,明白易晓。代表作有《绛守居园池记》等。

（五）韩愈的散文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曾任监察御史,国子祭酒,河南令,刑部、兵部、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前文已述及。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在散文创作上,韩愈提出学习先秦两汉古文的主张,反对六朝以

来浮艳的骈体文风,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实质上的革新。韩愈写文章,强调“词必己出”(《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他与柳宗元一起,开辟了唐宋以来中国散文发展的新时代。

韩愈所作文章,是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座高峰,历来都被评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柳宗元说他与司马迁“相上下”(《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杜牧将韩愈的文章与杜甫的诗歌并提,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

韩愈把自己的文学主张,广泛运用到政论、书启、赠序、祭文、墓志铭等各种体裁中,写了大量优秀散文。其中《送孟东野序》、《祭十二郎文》、《毛颖传》、《师说》、《送穷文》、《进学解》、《柳子厚墓志铭》、《平淮西碑》等都是人们经常传诵的名篇。

韩愈文章的风格,如大江大河,一泻千里,而又纵横开合,变化无穷。他的议论文,或结构严整,说理透辟,或构思奇巧,锋芒毕露,或气势磅礴,汪洋恣肆。他的记事文,或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大笔淋漓,或描写英雄人物,生动具体。他的抒情文,情景交融,真挚动人。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韩愈散文的语言,新颖朴实,句型长短不一而又错综变化,行文流畅并富有节奏感。

韩愈还把写散文的方法,贯彻到写诗中去,开创了一条“以文为诗”的路子,在唐诗中另成一派,对宋代诗歌创作影响较大。

(六) 李商隐的散文

李商隐(约813—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父起迁居郑州荥阳(今属河南)。曾任秘书省校书郎、弘农县尉等职。前文谈唐代诗歌时已述及。

李商隐的散文虽写得不多,但成就颇高。《李贺小传》写李贺的生

平逸事,生动活泼。《容州经略使元结文集后序》风格鲜明,思想解放,高度评价了元结的文章。

李商隐所写的骈体文亦较自然清新,独具特色。他与温庭筠、段成式为晚唐骈体文的代表作家,三人皆排行十六,所作骈体文称“三十六体”。

五、宋元以来散文

(一) 尹洙的散文

尹洙(1001—1047年),字师鲁,宋洛阳人。曾任太子中允、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等职。

尹洙论文,推崇孟子、韩愈,他是宋初提倡古文的三个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另二人为柳开和穆修)

尹洙的文风,简洁刚劲,名篇有《息戍》、《悯忠》、《志古堂记》、《论朋党疏》等。

尹洙是范仲淹的好朋友,对欧阳修的散文写作影响较大。欧阳修称尹洙的文章“简而有法”、“通知古今”。

(二) 宋祁的散文

宋祁(998—1061年),字子京,宋雍丘(今河南民权)人。曾任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前文已述及。

宋祁是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著《新唐书》列传一百五十卷,是二十四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不少列传,都是相当精采的传记散文。

宋祁的一般散文,博奥典雅,有的颇具感情色彩和思想深度。

(三) 姚燧的散文

姚燧(1238—1313年),字端甫,号牧庵,元洛阳人。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职。

姚燧以作散文著称。黄宗羲说他的文章，“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明文授读序》）。

姚燧的散文，叙事简要，格调高古，结构严谨，亦不乏生动活泼。名篇有《归来堂记》、《序牡丹》等。

（四）马祖常的散文

马祖常（1279—1338年），字伯庸，元光州（今河南潢川）人。蒙古族。先世为雍古特部。曾祖在金末任凤翔兵马司判官，即以马为姓。马祖常曾任礼部尚书、御史中丞、枢密副使等职。前文已述及。

在创作上，马祖常主张文学秦汉，诗宗汉魏盛唐。对当时文风产生很大影响，“后生争慕效之，文章为之一变”（《元诗选·马祖常小传》）。

马祖常的散文，清新明晰。敢于揭露政治弊端，思想内容颇好。名篇有《记河外事》、《小石山记》、《息氓传》等。

（五）侯方域的散文

侯方域（1618—1655年），字朝宗，商丘（今属河南）人。明末诸生，复社成员，曾在扬州入史可法幕府。入清，应河南乡试，为副贡生，没有当过官。

侯方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擅散文，与魏禧、汪琬并称“清初三大家”。他提倡韩愈、欧阳修的风格，力矫明末浮靡文风之弊。

侯方域的散文以《李姬传》、《马伶传》等著名。前者为具有侠骨柔肠的李香君立传，有声有色。后者给刻苦学艺的伶人树碑，具体动人。书信《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痛斥权奸，词严义正。都具有颇高的感染力和艺术性。

（六）周亮工的散文

周亮工（1612—1672年），字元亮，号栎园，开封人。曾任明潍县知县，入清任布政使、户部右侍郎等职。博闻强记，见高识广。前文已述及。

周亮工擅长古文,宗唐宋八大家。文必己出,陈言务去。由于他是经历改朝换代的人,故文中多抑郁之气。

喜绘画、书法、篆刻,善鉴赏文物,故集中多题跋、考订文字,颇见功力。著有《赖古堂全集》二十四卷。

(七) 魏巍的散文

当代,在散文创作上知名度较大的中原人有魏巍等。

魏巍(1920—),原名魏鸿杰,郑州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长期在部队从事宣传工作。

魏巍曾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题材,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等传颂一时的作品。他的散文,激情澎湃,格调高昂,真挚、炽烈,具有较强的感人力量。

第三节 赋 和 词

一、赋

赋是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一种体裁。它导源于楚辞,盛行于两汉,以后历朝都有作者。

赋在历史上,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等几个演变过程。它既有散文的章法和句式,又有诗歌的韵脚和节奏。

赋注重铺叙和形容,辞藻一般都比较华美。其功用是“体物写志”(《文心雕龙·诠赋》),即通过摹写事物以达到规劝讽谏、抒情述志的目的。

中原有名的赋作主要集中在两汉和魏晋时期。

(一) 贾谊的赋

贾谊(前 200—前 168 年),西汉洛阳人,曾任博士、太中大夫、长

沙王太傅、梁怀王太傅等职，前文已述及。

贾谊除写了许多有影响的政论文之外，还是汉初著名的辞赋作家。他的作品，上承楚辞，下开汉赋的先声。

贾谊在世时，新体汉赋的形式尚未形成，他仍用骚体写作，但标题上已出现了“赋”字。

贾谊赋的代表作为《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吊屈原赋》为贾谊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途经湘水，凭吊屈原，感古伤今之作，表现作者不愿与世沉浮的坚定信念。虽吊屈原，实为自喻，作者是在借吊屈原抒发自己的感慨。《鹏鸟赋》为谪居长沙时所作，寓志遣怀，用与鹏鸟对话的主客问答体，表现作者身处逆境时愤懑的心情。

贾谊在气质上、心境上、文才上与屈原有颇多相似之处，故后人常将他们二人并称为“屈贾”。

（二）张衡的赋

张衡（78—139年），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曾任南阳主簿、太史令、侍中、河间相等职。前文已述及。他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文学家。

张衡处两汉文学发展的转变时节，创作上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张衡赋的代表作有《二京赋》、《归田赋》、《髑髅赋》、《鸿赋》等。

《二京赋》是《西京赋》和《东京赋》的合称，为东汉著名的散体大赋。主题是规劝统治者不要奢侈腐化，以免引起人民的仇恨，要统治者记住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表明作者对当时社会危机的忧虑。

《二京赋》不但铺写了帝都繁荣，宫室华美，物产丰富，还记载了当时许多风俗民情，容纳了较多的社会内容。《东京赋》叙述景物，文笔清新。《西京赋》描写杂技表演，仿佛就在眼前。既有文采，又很生动。

（三）蔡邕的赋

蔡邕（132—192年），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任议郎、

尚书、左中郎将等职，前文已述及。

蔡邕不仅是著名的经学家、散文家、音乐家、书法家，而且擅长辞赋，代表作为《述行赋》。

汉桓帝时，当权宦官听说蔡邕善于弹琴，请皇帝下令强行征召他到首都洛阳。蔡邕走到偃师（今属河南），托病而回。《述行赋》中描写的就是作者在被征途中的感受。赋中批判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同情人民生活疾苦。语言朴实，格调冷峻，凄楚动人。

汉赋中歌功颂德者多，像《述行赋》这样直接控诉统治黑暗的作品罕见。

（四）向秀的赋

向秀（约 227—约 272 年），字子期，魏晋间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曾任黄门散骑常侍等职。为著名的玄学家、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

为了悼念嵇康，向秀曾写了著名的《思旧赋》。

嵇康是向秀的好朋友，因得罪朝廷而被杀。向秀在去首都洛阳时，途经嵇康故宅，睹物伤情，作《思旧赋》表示对亡友的怀念。

由于嵇康是因政治问题而死的，容易触犯时忌，不能多说，故全赋才 260 个字，“刚开头却又煞了尾”（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然而作者心情沉痛，情意绵长，欲言而又不肯尽言之状，跃然纸上。

（五）成公绥的赋

成公绥（231—273 年），字子安，西晋东郡白马（今河南滑县东）人。文学家，长于辞赋。

成公绥有《天地赋》、《啸赋》传世。此外还有 20 首赋的残篇。其中《啸赋》，笔法生动，文辞隽永。张华推崇说：“每见其文，叹服以为绝伦。”（《晋书·成公绥传》）

（六）潘岳的赋

潘岳（247—300 年），字安仁，西晋荥阳中牟（今属河南）人，曾任

河阳县令、怀县令、给事黄门侍郎等职，为著名文学家，前文谈晋代诗歌、散文时已述及。

潘岳所作赋，名篇较多，前人评价很高。萧统《文选》收潘岳赋八篇，是《文选》中收赋最多的作者。

《秋兴赋》写秋天凄凉，描摹景物，隐寓感伤，抒发自己长期不能升官的惆怅情怀。格调清新，语言流畅，情景交融，意境高远。

《射雉赋》称被猎人射中的雉鸡“毛体摧落，霍若碎锦”，观察入微，形象生动。

《西征赋》描写沿途山川古迹，怀古感今，内容体制之大，可与左思《三都赋》相提并论。

二、词

词又称“长短句”或“诗余”。它起源于隋唐之际，原是与当时新兴乐曲相配合的歌词。最初流行于民间。文人填词始于盛唐以后，晚唐五代获得迅速发展，宋代是它的极盛时期。

不同的乐曲，有不同的词牌。每个词牌对字数、平仄、韵位、句式等都有固定要求，称为词律。

宋代以前，人们填词，都要求既合于音乐腔调，又合于词律。宋代以后许多人，只懂词律，不懂音乐，他们只照词律填词。这些词虽然不能唱，但也不失为很好的文学作品，可以“言诗之所不能言”（王国维：《人间词话》），具有特殊的艺术个性。

中原有成就的词人主要产生在中唐至两宋时期。

（一）王建的词

中原文人填词，最早要数中唐时期的王建。

王建（约767—约831年），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人。曾任昭应县丞、太府寺丞、陕州司马、光州刺史等职。

王建所作《宫词》百首，是难得的唐代宫廷生活画卷，其材料为史传所不载，千百年来广为传诵。如《宫词》中的[调笑令]（又名[宫中调笑]），就是写宫中美人失宠的哀怨的。

王建还写过《宫中三台》、《江南三台》等小令（篇幅短小的词）。后者有对商人生活的描写。

王建是中唐文人词的重要作者之一。

（二）贺铸的词

贺铸（1052—1125年），字方回，宋卫州（今河南卫辉市）人。他是宋太祖贺皇后的族孙，曾任徐州宝丰监钱官、和州管界巡检、泗州通判等职。为人豪爽耿直，由于主要担任冷官闲职，故一生不得志。前文已述及。

贺铸善填词，为北宋作词大家。他的风格是婉约与豪放兼备，辞美情深，意境开阔。当时人张耒称其词“高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嫵、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贺方回乐府序》）。

贺铸作词，受苏轼影响，他又影响了南宋前期的豪放派词人。

贺铸的爱情词《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飞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若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清新秀丽，脍炙人口。

贺铸描写身世和社会现实的词，苍劲豪放，直抒胸臆。名篇有《六州歌头》、《诉衷情》等。

此外，贺铸的代表作还有《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水调歌头·南国本潇洒》等。

（三）朱敦儒的词

朱敦儒（1081—？），字希真，号岩壑，宋洛阳人。他是两宋之际的爱国词人。

朱敦儒早年在洛阳隐居不仕,所作词多表现悠游自在的隐逸生活,其名句有“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鹧鸪天》)。

南渡后,朱敦儒曾任两浙东路提点刑狱,主张抗战。所作词常寄国破家亡的哀思,抒发爱国情怀。他高唱“北客翩然,壮心偏感……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水龙吟》),以歌词形式,反映现实生活,体现时代精神,清新自然,自成一家。

(四) 陈与义的词

陈与义(1090—1138年),字去非,号简斋,宋洛阳人,在北宋曾任秘书省著作佐郎等职,在南宋官至参知政事,前文谈宋代诗歌时已述及。

陈与义不仅诗写得好,词也清新俊秀。今存词十八首,为人称道的名句有“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临江仙》)等。

(五) 岳飞的词

岳飞(1103—1142年),字鹏举,宋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曾任枢密副使、太尉、少保等职。为南北宋之际的抗金名将。

岳飞的词写得很好,今存三首。其中《满江红》“怒发冲冠”一首慷慨激昂,气势磅礴,充满爱国激情。“千载之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白雨斋词话》)另一首《满江红》和《小重山》,或写忠愤之气,或抒幽怨之情,亦皆传唱千古。

岳飞的诗和文章,也都质朴刚劲,真挚感人。

(六) 赵佶的词

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他不仅是有名的书画家,作词上也有较高成就。

赵佶前期词,华美雍容,多反映宫廷生活,意义不大。有一首悼念妃子刘氏的《醉落魄》:“无言哽咽,看灯记得年时节。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今年华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虽有一点真情实感,但很平常。

赵佶当俘虏后所作《燕山亭》、《眼儿媚》等词，深沉悲凉，充满了亡国哀痛和对旧山河的怀念，可与李后主亡国后的词相媲美。

（七）曹组的词

曹组，字元宠，宋颖昌（今河南许昌）人。曾任武阶兼阁门宣赞舍人、给事殿中等职。宋徽宗曾命他作《艮岳百咏》诗。

曹组的词以“侧艳”、俚俗著称，语言生动，手法新奇，在北宋末年曾传唱一时。

曹组词中所写的羁旅生活，意境深远，感受真实。情调和手法，继承了宋仁宗时期的大词人柳永的风格。他的“竹篱茅舍，酒旗沙岸，一簇成村市”，“一声征雁，半窗残月，总是离人泪”（《青玉案》）等名句，已开元人马致远《天净沙》和王实甫《西厢记》中某些曲子的先声。

（八）赵令畤的词

赵令畤（1051—1134年），字景贶，又字德麟，自号聊复翁。他是赵太祖次子赵德昭之后。曾任北宋签书颍州公事、南宋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安定郡王等职。

赵令畤曾作商调《蝶恋花》十二首，咏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散语与韵文相间，有说有唱，成为大曲的雏形，也为北宋词增加了新品种。

赵令畤的作品带有从词向宋金诸宫调变化的痕迹，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九）康与之的词

康与之，字伯可，号顺庵，宋滑州（今河南滑县）人。南宋初词人。

宋高宗南渡时，康与之曾上书建议组织河北民众，进行抗金斗争，声望甚好。秦桧当权后，又依附秦桧，曾任台郎，受到当时人鄙视。

但前人对康与之的词作却评价较高。宋人张炎把他与柳永并称为“康柳”。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称他的词“篇篇精妙”。

今天看来，康与之〔诉衷情令〕《长安怀古》等词，抒发了国破家亡的感慨。到临安（今杭州）后的应制作品，粉饰太平者较多。

(十) 韩元吉的词

韩元吉(1118—1187年),字无咎,宋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一作许昌(今属河南)人。北宋灭亡后,南渡居上饶。曾任南宋礼部尚书,封颖川郡公。

韩元吉的词风,浑厚豪放,与辛弃疾相近。内容多怀念北方之作。“中原何在,极目千里暮云重”([水调歌头]《雨花台》)，“梦绕神州归路”([水调歌头]《寄陆务观》)，这些名句都流露出国破家亡的感慨。

陆游称韩元吉的作品：“落笔天成，不事雕琢，如先秦书，气充力全”(《祭韩无咎尚书文》)。

第四节 小说和剧本

一、小说

鲁迅说：“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且介亭杂文二集》)在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中，小说历来地位低下，因而发展较晚。

中国古代小说开始于汉魏六朝时期。唐代传奇小说，标志着它的进一步成熟。到明清时才迅速发展的高峰。“五四”以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最重要的体裁。

中原是历史上受传统观念束缚比较严重的地区，因此，小说未能像诗歌、散文那样蓬勃发展起来。但是，在中国小说发展的每个关键时期，中原也都有重要的作家和作品出现。

(一) 邯郸淳与《笑林》

邯郸淳，三国魏颖川(今河南许昌)人，颇受曹操父子器重。他所

著的《笑林》，是中国第一部笑话集。

汉魏六朝小说，有志怪、志人、志物三类。笑话就是当时志人小说中的一种。

《笑林》原书三卷，亡佚于宋。清马国翰和鲁迅从《艺文类聚》、《太平广记》、《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得了三十则。

《笑林》的内容相当广泛。《长竿入城》、《治驼背》等讽刺愚蠢行为。《汉世有老人》、《楚人有担山鸡者》讽刺统治者的贪婪。《甲啮乙鼻》记述巧言善辩的人物。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

（二）干宝与《搜神记》

干宝(?—336年)，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晋代文学家和史学家。晋元帝时，以著作佐郎领修国史，著《晋纪》二十卷，记西晋一代史事，时称良史，本书学术章已述及。

干宝所著《搜神记》三十卷，是我国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对以后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志怪文学的创作都有较大影响。

《搜神记》原书在宋代已佚，今传本《搜神记》二十卷由明代人从《法苑珠林》、《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录而成。

《搜神记》所记多神怪灵异，也有许多优美的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名篇有《韩凭妻》、《干将莫邪》等。《天仙配》、《窦娥冤》等传统戏曲的原型，也多出自本书中。此外，卢汾梦入蚁穴的故事，是《南柯太守传》的蓝本。胡毋班给河伯传书的故事是《柳毅传》的滥觞。

《搜神记》中的民间传说，都带有一种神异色彩，常以非现实的情节，反映现实中的社会问题，表达下层群众的爱憎和愿望。有的故事歌颂英雄人物的优秀品德，有的鞭挞统治者的残暴行为，有的描写男女之间的真挚爱情。其中不乏思想内容好，艺术价值亦高的篇章。

（三）元稹与《莺莺传》

元稹(779—831年)，字微之，唐河南(今河南洛阳)人。曾任监察

御史、宰相等职,前文已述及。他不仅是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在小说创作上也很有成就。

元稹二十五岁时写的《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唐代不朽的传奇作品。

《莺莺传》原题为《传奇》,《太平广记》收录时改作《莺莺传》。写张生与崔莺莺恋爱,又将她遗弃的故事。宋人王铨《〈传奇〉辨证》认为张生的原型就是元稹本人,得到历代学者认同。

《莺莺传》文笔优美,叙述生动,人物形象刻画得有血有肉,尤其是崔莺莺的性格心理,塑造得十分鲜明。

《莺莺传》的故事流传很广,从宋代以来,就有人把它改编为鼓词、戏曲。至今妇孺皆知的《西厢记》就是以它为蓝本的。

(四) 袁郊与《甘泽谣》

袁郊,字子乾,晚唐蔡州朗山(今河南确山)人。一说陈郡汝南(今属河南)人。曾任祠部郎中、虢州刺史。

袁郊著传奇小说八篇,合为一书,称《甘泽谣》。其中《红线》一篇,塑造晚唐藩镇割据时期,名叫红线的一个智勇双全的侠女形象,构思精妙,设想奇特,为唐人小说中的上品。京剧《红线盗盒》即据此改编。

(五) 李绿园与《歧路灯》

李绿园(1707—1790年),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清宝丰(今属河南)人。乾隆元年(1736年)举人,曾任贵州印江知县等职。

李绿园花二十年时间著的长篇章回小说《歧路灯》,以开封为背景,描写封建社会末期“败子回头”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河南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

《歧路灯》认为,子弟之败,都是由于不喜读书,不亲正人。因而书中极力描写家庭溺爱,世途险恶。使读者感到,一堕歧途,若非十分聪明的人,回头猛醒,知悔知耻,就不能脱胎换骨,获得新生。作者把书

中故事作为年轻人的宝鉴,做父母的警钟。

郭绍虞、朱自清对《歧路灯》评价很高,朱自清甚至认为它的价值仅次于《红楼梦》。今天看来,《歧路灯》的艺术性不是很强,但对我们认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面貌,颇有作用。

(六) 中原现代小说

现代小说家中,中原知名的有师陀、姚雪垠和李準等。

师陀(1910—),原名王长简,笔名有师陀、芦焚等。河南杞县人。1931年开始发表作品。早期小说多取材于农村,散发乡土气息,后期主要描写城市中层社会。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谷》,中篇小说《结婚》、《马兰》等。皆发表于建国前。

师陀作品风格细腻,爱憎分明,笔下充满人情世态。

姚雪垠(1910—),原名姚冠三,河南邓县(今邓州市)人。1929年开始发表作品。抗日战争时期写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和中篇小说《牛全德和红萝卜》,反映农民在抗战中的觉醒,语言生动活泼,曾产生较大影响。前者曾被译成英文和俄文。

抗战胜利前后写的长篇小说《长夜》,以作者15岁时被土匪抓去当义子的三个月生活作素材,描写了豫西山区破产的农民沦为盗贼的过程,以及他们传奇式的绿林生活。内容独特,形象生动,译成法文后,被授予马赛纪念勋章。

建国后,姚雪垠写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描写明末李自成起义军的战斗历程。结构宏大,社会背景广阔,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被称为悲剧性的史诗。第一卷译成日文后,曾获日本文部省、外务省的文化奖。第二卷曾获1983年茅盾文学奖。

李準(1928—),洛阳人。1953年开始发表小说。196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刻画了一个性格开朗的农村妇女形象,改编成电影后,几乎家喻户晓。“文革”后发表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以1938年国民党在郑州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为背

景，描绘了黄泛区人民被黄水淹没家园后的悲惨生活。曾获 1985 年茅盾文学奖。

二、剧 本

剧本是戏曲文学。

历史上，中原的戏曲艺术非常发达。但戏曲作家的地位一般都很低下，因此他们的名字和许多优秀作品都未能保存下来。

从中原流传到今天的剧本看来，虽无全国一流的东西，但也卓然可观，具有鲜明的特色。

（一）郑廷玉的杂剧

郑廷玉，元代彰德（今河南安阳）人，生平事迹不详。为著名杂剧作家。

郑廷玉共作杂剧 22 种，现存 5 种，即《布袋和尚忍字记》、《宋上皇御断金凤钗》、《包待制智勘后庭花》、《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楚昭王疏者下船》。前三种写的是中原社会生活，或故事情节以中原为背景。《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是他的代表作，取材于晋干宝《搜神记》“张车子”的故事，进行加工创造。剧中用富有生活气息的生动情节，将守财奴贾仁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很有典型意义。

郑廷玉对社会观察深刻，熟悉人情世态，善用讽刺手法，嬉笑怒骂，涉笔成趣。语言技巧熟练，情节曲折而又严谨细密，深谙舞台演出规律。

（二）宫天挺的杂剧

宫天挺，字大用，元代大名开州（今河南濮阳）人。曾任钧台书院山长，是《录鬼簿》作者钟嗣成父亲的好朋友。诗文都写得很好，可惜皆已散佚。

宫天挺共作杂剧六种，现存《死生交范张鸡黍》、《严子陵垂钓七

里滩》^①二种。前者取材于《后汉书·范式传》，描写东汉范式与张劭之间的深厚情谊，痛斥权贵“一个个智无四两，肉重千斤”，“有钱的无才学，有才学的却无钱”。借古讽今，痛抒不平。由于它是元人杂剧中唯一写布衣文人交往的作品，因而影响很大。

朱权《太和正音谱》称宫天挺的作品，“其词锋颖犀利，神采烨然”，如“西风雕鹗”。王国维说宫天挺的杂剧“瘦硬通神，独树一帜”。（《宋元戏曲考》）

（三）朱有燬与《诚斋乐府》

朱有燬（1379—1439年），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明开封周王府的第二代周王，谥宪王。明初著名的杂剧作家。

朱有燬著杂剧31种，合称《诚斋乐府》。内容大体包括歌颂太平盛世、表现神仙道化、反映下层妇女悲惨命运等方面。既有《香囊怨》、《桃园景》等描写风尘女子爱情故事的作品，也有《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两种直接反映梁山好汉除暴安良行为的《水浒》戏。

朱有燬的杂剧结构、形式不拘泥成法，已出现合唱、轮唱、生旦对唱等形式，打破了元杂剧只由一人主唱的格局，并冲破了一剧四折的框框。曲词流畅，音律和谐，符合舞台演出规律。

《诚斋乐府》当时在中原影响很大。李梦阳《汴中元宵》诗云：“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

（四）王铎的传奇剧本

王铎（1607—1671年），字子陶，号大愚，孟津（今属河南）人。明末清初戏曲作家。书法家王铎之弟。曾任清江苏昆山知县、刑部河南司员外郎、山东学政使等职。

^① 《严子陵垂钓七里滩》一说为张国宾作，经王国维、傅惜华考订为官天挺作。

王铨著传奇剧本《秋虎丘》、《双蝶梦》等。《秋虎丘》四十八出,以明朝中期的历史事实为背景,描写汪伯玉和于桂娘的爱情故事,揭露当时的腐败政治。结构巧妙,语言朴实自然。《双蝶梦》三十三出,描写沈瑞和董璠珠的爱情故事,揭露明末朝廷昏庸,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

(五) 吕履恒与《洛阳庙》

吕履恒(1650—1719年),字元素,号坦庵,又号青要山樵,清新安(今属河南)人。曾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户部右侍郎等职。

吕履恒著传奇剧本《洛阳庙》四十四出。以明朝末年的政治斗争为背景,用一对雌雄香扇坠作为贯穿线索,描写洛阳书生何寅与贾绿华的爱情故事,结构严谨,曲词流畅。

(六) 鸥波亭长与《梦花因》

鸥波亭长,本名和生平不详,字子贞,号鸥波亭长。清浚仪(今河南开封)人。约嘉庆(1796—1820年)前后在世。精通音乐,爱写剧本。所著杂剧《梦花因》(又作《梦华因》),写书生刘芳尘和风尘女子李湘帘的真挚爱情。格调清新,曲词工丽。刘芳尘的侠义行为和李湘帘的悲惨命运,也很感人。

第七章 中原美术

中原的美术成就,主要集中在绘画、书法、雕刻、工艺美术和建筑艺术等方面。由于建筑在本书中另有专章,故本章侧重记述其他几个方面。

第一节 绘 画

绘画是用色彩和线条在平面上绘制图像的艺术。

中原绘画,源远流长。无论是原始绘画、汉唐绘画,还是宋代以来绘画,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中原画家强调形神兼备,注意表现神韵和动态气势,善于用高度概括的手法,描绘自然物象,表现优美动人的意境。

一、原始绘画

中原绘画起源于原始社会,它的产生比文字还早。

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陶坯上绘制花纹,烧制彩陶。彩陶上画有鱼类、鸟类和其他动物的彩色图像等。当时已会用颜料、笔等绘画工具,

并能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进行描绘。

河南汝州阎村仰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彩陶缸上,有一幅鹤鱼石斧图。它是我们今天已发现的中原也是全国最精彩的原始绘画杰作,距今约 6000 年历史。

这幅画位于缸的腹部,高 37 厘米,宽 44 厘米。画上画一白色鹤鸟,高腿,短尾,长嘴上叼一条大鱼,面对一柄石斧。鹤鸟的身躯以没骨法画成,鹤眼、鱼和石斧以黑线勾出。表现手法丰富,形象生动。

二、汉代绘画

中原汉代绘画,流传到今天的,主要是画像砖、画像石和壁画。它们都是从汉墓中出土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气魄宏大,风格豪放,既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又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一) 画像砖

中原汉代画像砖是一种带有图像的砖头。它们都是汉代建筑陵墓的材料。主要有空心砖、实心大砖和实心小砖三种类型。其中空心砖最大,有的长达 160 厘米,宽 52 厘米,厚 20 厘米,就像今天常见的盖楼用的小型预制水泥板一样。实心大砖比空心砖小,有的长达 80 厘米,宽 25 厘米,厚 6 厘米,比明清以来修筑城墙的大砖还大。实心小砖,一般长 43 厘米,宽 13 厘米,厚 6 厘米,比今天盖房用的普通小砖略大。

画像砖上的画像,除了极少数是直接刻在砖坯上的以外,都是用预先刻好的木模在砖坯上印成的。从线条来看,又可分为阴线刻、阳线刻、阴阳线混刻、浅浮雕、高浮雕等类型。

中原出土汉代画像砖的地方很多,其中以洛阳、郑州、南阳等地区最有名。画像砖上的画面都是汉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1. 洛阳画像砖

洛阳汉代画像砖,皆为空心砖,以阴线刻为主,主要是西汉时期的作品。画像线条,粗细匀称,浑朴显明。画面构图清晰,主要题材是武吏、猎人、骏马、猛虎、朱雀、鹰、鹤、树木、花卉。画面风格式样,颇似近代的剪纸。

洛阳汉代画像砖上的树木,皆枝叶繁茂。画上的骏马皆线条流畅,或昂首嘶鸣,或撒蹄狂奔。画上的猛虎皆生气勃勃,或回首眺望,翘尾欲奔,或项系长索,有人牵持,用以逐鹿。朱雀在展翅起舞,鹰在飞翔,鹤在鸣叫。皆清新明快,生动秀美。

2. 郑州画像砖

郑州汉代画像砖,皆为空心大砖,其表现手法分浅浮雕、阳线刻、阴线刻、阴阳线混刻等多种,主要是西汉晚期和东汉早期的作品。内容比洛阳西汉时期的画像砖更丰富。

(1) 浅浮雕画像

在郑州出土的画像砖中,以浅浮雕画像最广泛。主要有宫阙、侍吏、车骑、狩猎、斗兽、喂牲畜、舞蹈、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等。

浅浮雕画像砖上的画像,都凸出于砖头的表面,画像上又有阳刻线条,以显示画像的细部。它们都是用小模子将画面压印到砖坯上烧成的。

浅浮雕画像砖在构图上,一般是一块砖面上有十几幅甚至几十幅画像,只有极少数是一块砖面上只有一幅画像的。

画像砖上的宫阙,中间一般都是重檐宫殿式建筑,殿门外有两个武士执戈守卫,两边是对称的双阙。

画像砖上的车骑,常画成马拉辎车奔驰的情景,车上共二人,一人坐车,一人驾驭,人头上罩有伞形华盖。辎车皆给人风驰电掣般的飞动之感。有的辎车后面还有人执戟骑马跟随。

在一幅狩猎的画面上,画一人骑马飞奔,弯弓转身射箭,后有一兔惊慌逃窜的情景。

另一幅狩猎的画面上,画一马撒腿前奔,马上一人正转身拉弓射虎。有一只虎口已中箭,恼怒异常,正昂首竖尾,奔腾前扑,追赶那马,气氛十分紧张。

两幅斗牛图也很精彩。一图为:赤膊一人,一手按一健壮公牛的牛头,一手举拳猛击,牛正翘尾踢腾。另一图为:赤膊一人,一手握牛角,一手举锤砸牛头,牛正弹蹄怒吼。

关于舞蹈的画像中,常见的有建鼓舞。鼓上羽葆飘扬,鼓两边各有一人执桴,边打鼓边起舞。看了画面,仿佛能听到鼓声。

一幅饮牛图中,画一肥大壮实的牛,正在饮水。牛角呈弧形,角尖锐利。牛鼻穿一环,以绳系环,绳的另一头缚在柱上。牛头下有一盛了水的釜。画面栩栩如生。

一幅喂羊图中,画一大羊,双角向后弯曲。一绳系在脖间。羊嘴下有一石槽,槽中有草料,形象逼真。

神话传说中,画得最多的是西王母和东王公。西王母穿长衣,拱手踞坐,面前有玉兔持杵捣不死药。

历史故事中,主要画有“狗咬赵盾”、“亭长讨贼”等。

(2) 阳线刻画像

在郑州出土的阳线刻画像砖上,画像题材主要有门吏、骑射、苍龙、鱼、龟、牛、鹤等。阳线刻画像的方法,也是用小印模将画面压印在砖坯上烧成的。虽然压得不深,但阳线却很突出。

这类画像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一幅持棨戟门吏图。画中门吏立于门下,头戴笼冠,身穿长袍,须髯秀美,手持棨戟,面貌沉静,已经略具性格化。画衣纹的线条,褶叠曲折,亦颇具概括力。

(3) 阴线刻画像

郑州出土的画像砖中,阴线刻的画像最少。主要内容有苍龙、斗鸡、朱雀、铺首衔环等。

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苍龙图和斗鸡图。苍龙图中的龙,身躯很长,

长有双角,遍体鳞甲,颇有逶迤婉转之势。斗鸡图中的两只公鸡,尾巴高翘,脖颈相交,厮杀得难解难分,情景十分动人。

(4) 阴阳线混刻画像

在郑州出土的阴阳线混刻画像砖,其制作方法是,用不同图案的小印模,在砖面上印出具有有机联系的画面。小印模上有阴刻轮廓,轮廓内又有阳线勾勒的细部。一个小印模只是某幅画像的一部分,拼合起来才成为完整的画像。用这种拼合方法制作的大幅画像,能生动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是其他形式的画像砖做不到的。

阴阳线混刻画像砖上最有名的是反映汉代地主庭院生活的两幅画像。在画面上,庭院四周有高墙围住,并有隔墙把庭院分为前后两院。庭院前有阙门,中有望楼,后院有楼阁,楼阁上有人。庭院内外,树木葱茂,道路纵横,车马络绎。它生动反映了汉代大地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的宅第生活。这类画像在国内十分罕见。

阴阳线混刻画像砖,还有不少都只有图案花纹,而没有别的内容。主要花纹有柿蒂纹、云纹、常青树纹、百乳纹等。由它们相互配合组成的大幅图案,也很美观有趣。

3. 南阳画像砖

南阳出土的画像砖有空心砖和实心砖两种。实心砖又有方砖和长条砖之分。它们都是东汉中晚期的作品。

南阳画像砖的制作手法是高浮雕。整个砖面是用一个模子印的,构图精美。其艺术水平,比洛阳和郑州画像砖都高,不少题材也是郑州画像砖上没有的。主要画像有凤阙图、兽斗图、历史故事和乐舞杂技图等。

凤阙图中,在重檐阙楼前面,亭长双手执盾站立。阙顶有凤凰展翅,阙下有玄武(龟)和三足乌。所反映的内容比郑州画像砖上的宫阙要多。

兽斗图中部画一熊,后腿站立,两前肢一只伸向前,抵挡前面的

虎，一只伸向后，拦阻后面的牛。牛正跃起后蹄，低头向熊猛抵。虎正张开大口，伸开前爪向熊猛扑。作者捕捉到的这一刹那场景，异常生动。

在南阳画像砖上，已经能反映相当复杂的历史故事。有一幅反映秦始皇故事的“泗水取鼎”图，画中画一拱桥。桥的两边各有三人赤膊拉绳牵引一鼎。桥下两只小船，船上各有一人，执圆环引鼎向上。桥上一人骑马扛柴戟为前导，后有驷马驾安车，车上坐二人，正在过桥。后面还有二马驾车向桥奔来。远处有人击鼓跳舞。这种场面，很容易使人们联想起《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

南阳画像砖上的戏车图，是过去少见的。《邺中记》记载汉代戏车时说：“设戏车，立木橦其车上，长二丈，橦头按横木，两伎儿各坐一头，或鸟飞，或倒挂。”砖上画的就是这种场景：右部一人骑马扛柴戟为前导，后有二马各拉一辆戏车前行。车上各立一橦杆。前面戏车橦杆上端有横木，一人倒挂在横木上，双手平伸，每手托一人，其中一人单腿独立于手上，另一人双手叉腰蹲在手上。后面戏车的橦杆顶上蹲一人，他与前面戏车车厢内的人分别拉住一根绳索的两头，绳上有一演员正在表演踏索。这幅表现踏索和寻橦的画像，反映古代杂技艺人的技艺十分高超，画面上演员表演的动作变化多端，也非常惊险。

还有一幅乐舞杂技图，左画一人赤膊跳八丸（将八个球分别由一手抛出，另一手接住，循环往复），一女伎挥长袖跳舞。右画三人踞坐奏乐：一人吹竽，一人击建鼓和鞀鼓，一人鼓瑟。画面气氛非常热烈。

如果说，洛阳、郑州画像砖上某些画面还比较单纯、呆板的话，那么南阳画像砖上的画面，已复杂丰富得多。作者已很注意捕捉并表现各种人和动物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动作情景。

（二）画像石

画像石是将绘画刻在石头上的一种汉代艺术品。这些画像石大

都是镶砌墓壁用的,一般皆成长条状,大小不等。中原画像石主要出土于南阳、新密等地。

1. 南阳画像石

南阳汉代画像石分别出土于南阳、唐河、新野、方城、邓州等地的汉墓中。它们大多被收藏在南阳汉画馆中,至1987年就出土有1500多块。

南阳汉代画像石始于西汉晚期,盛于东汉前期,衰于东汉末年。它的产生和流行是由于两汉时浓烈的厚葬风气和相信迷信造成的。加之南阳是刘秀的故乡,“帝乡多近亲”,豪门世家、王侯将相很多,他们死后,都采用带有画像的豪华石室墓。

南阳画像石,内容丰富,题材众多。包括生产活动、社会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天文星象、装饰图案等。

生产活动的画像有牵牛图、捕鱼图、狩猎图、阉牛图等,反映当时牛耕、网罟、打猎、阉牛等情景。其中方城出土的东汉阉牛图(该石长228厘米,宽41厘米),是南阳画像中最精彩的篇幅之一。图上刻一壮大公牛,正弓颈低头,扬踢后腿。牛后一人戴尖顶小帽,深目大耳,高鼻阔嘴,赤裸上身,在牛狂跳腾起后腿时,左手迅速抓住牛睾丸,右手执刀阉割,动作十分利索。

社会生活的画像有宴飨、讲经、厨房、武库、斗牛、驯象、车骑出行、乐舞百戏等图。宴飨图表明,汉代贵族吃饭不但酒肉丰盛,而且有歌舞助兴。讲经图反映老师讲经,弟子静听的情景。车骑出行图表现达官贵人出行时,一种车马喧腾的浩荡场面。画面皆质朴、形象。

画像石上有大量乐舞百戏的画面,包括角抵、冲狭、倒立、鼓舞、长袖舞等。

角抵包括人与人相搏和人与兽相斗两种。人与人相搏,又分徒手和持器械两类。徒手角抵类似现代的摔跤和散打,持器械角抵,仿佛现代的击剑。在人与兽的角抵中,有人与猛虎搏斗的画面,还有一人

同时与猛虎和公牛搏斗的画面。

冲狭类似现代马戏团中的钻刀圈。以草或树枝扎成狭圈，圈上插尖刀。艺人通过助跑，纵身腾跳穿越狭圈，给人以迅速惊险之感。

画像石上还有一幅画，生动展现了汉代的杂技场面：一人右手摇小鼓，左手跳十二丸；一人口中吐火；一女子一手托壶，另一手按樽作单臂倒立。在另一画中，一女子头上顶碗，单臂倒立于樽上，也很生动。

画像石中的历史题材，有鸿门宴、荆轲刺秦王、聂政、范雎受袍、二桃杀三士等。皆构图简练，情节连贯。作者善于抓住故事发展变化过程中一刹那的情景，予以表现，形神兼备。如荆轲刺秦王，画中三人，荆轲左手抓秦王衣袖，右手持匕首，秦王横剑还击，秦舞阳惊惶失措，皆神态活现。

画像石中的神话传说故事，有伏羲女娲、牛郎织女、嫦娥奔月、黄帝战蚩尤等。

画像石中的天文星象有苍龙星座、白虎星座、北斗七星、日食图、彗星等。

此外，还有辟邪、吉祥的神荼郁垒、蹶张、黄龙、凤凰和菱形套环等装饰图案。

南阳画像石的雕刻手法，主要是减地加阴刻线，即在石头上将所绘物像以外的空间部分剔低，使物像突出如浮雕，再在浮雕上面用阴线刻出细部。

南阳画像石上的画像，喜用夸张手法，突出主要情节，注意神态和动势，构思精巧，线条流畅，刚柔恰当，粗犷浑厚，气魄宏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2. 新密画像石

新密画像石主要保存在新密打虎亭汉墓中。打虎亭有两座汉墓，一座为画像石墓，一座为壁画墓。

画像石墓规模宏大,由七个墓室组成,墓主为太守张伯雅。

画像石内容丰富,包括禽兽图、迎宾图、收租图、庖厨图、宴饮图等。

禽兽图刻于门扉、门楣、门额等处。有形象威严的衔环铺首,腾跃的青龙,展翅的朱雀,奔走的麒麟、神龟、玉兔,以及嬉戏、追逐的鹿群等。

迎宾图刻于甬道两侧。表现客人到来后,主人相迎的情景。

收租图刻于南耳室。画一地主在仓楼旁边收租的情景。收租者身体肥胖,表情严酷,有奴仆服侍。交租人身体瘦弱。这种直接表现封建剥削的作品,甚为难得。

庖厨图刻在东耳室。画面上,厨役们忙忙碌碌,有的在屠宰,有的在洗涤,有的在烹调。架子上挂着宰好的鸡羊,仆人们正将做好的菜肴用盘子端走。

宴饮图刻在北耳室。头戴桂冠、身穿长裙的女主人端坐室内,其他人正陆续入座,案上已摆好盘、碟等物。

这些画像石刻工精细,层次分明,主题突出。收租图、庖厨图、宴饮图,连在一起,系统地反映了汉代贵族地主的日常生活。

(三) 壁 画

中原汉代壁画都是在汉墓中出土的。

1. 永城汉墓壁画

河南永城芒砀山有西汉梁孝王及其后代的墓葬群。

1991年在该地梁贞王墓中出土了我国至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彩色壁画。壁画位于墓室顶部及两侧,面积为二十多平方米。主要内容为赤龙、鱼龙、朱雀、白虎、云气等,色彩鲜艳,形象生动。

2. 新密汉墓壁画

新密汉墓壁画都保存在打虎亭壁画墓中。共有64幅壁画,总面积一百多平方米。

该墓中室东壁有长达七米多的车骑出行图。画辎车数辆,各车皆驾肥马,作奔驰状,后有随骑和侍从。

中室北壁有长达七米多的宴饮百戏图。室内帷幔前放大案,上摆杯盘。主人居中坐,陪者在两侧。一边宴饮,一边观看盘舞、跳丸表演。画中共有七十多个人物,色彩富丽,构图严谨,为汉代壁画中少见。

墓门旁所画高达1.2米的五个侍女像,也很引人注目。她们面貌丰腴,皆手捧礼品,盛饰严妆。

3. 洛阳汉墓壁画

洛阳曾先后发现汉代壁画墓多座。墓中的壁画,异彩纷呈。

在一座墓主为卜千秋的壁画墓中,画有升仙图,描绘卜千秋夫妇升仙的情景。画中卜千秋乘龙,其妻乘三头凤,由持节羽人引导前行,后有青龙、白虎、朱雀、赤豹护卫,西王母正派仙女和九尾狐前来迎接。

在另一座壁画墓中,画有多幅彩色驱鬼图、天象图和历史故事。

驱鬼图共三幅,内容连贯。第一幅画方相氏戴兽头面具,披熊皮,执长戈,与数人一起饮酒,作驱鬼前的准备。第二幅画驱鬼场面,方相氏跳起追杀,左右有人摇小鼓助威,另有兽面人持刀相助。第三幅画被杀的女魃挂在大树上,凶猛的飞虎正在吃恶鬼之肉,取得了驱鬼胜利。

天象图共12幅。用传说手法,以金乌配太阳,蟾蜍和玉兔配月亮。所画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的位置也很准确。

历史故事画有鸿门宴和二桃杀三士等。前者画刘邦、项羽相对而饮,范增、张良、项伯,或坐或立,神情各异。后者采用连环画手法,分别表现晏子献策,齐景公赐桃,三勇士相争和自杀场面。

还有一座壁画墓,主要描绘天象和神话人物。如日图、月图、岁星、辰星、风伯、雨师等,风格古朴,气势雄浑,构图严谨,格调清新。

三、唐代绘画

唐代是我国绘画的成熟时期,在绘画史上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中原唐代绘画,气势恢宏,技法熟练,出现了以吴道子为代表的许多著名画家和一大批珍贵作品。

(一) 吴道子的画

吴道子,名道玄,字道子,唐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曾被唐玄宗封为内教博士,后任宁王友。

吴道子的绘画成就是多方面的。人物、佛像、神鬼、山水、草木、台殿、禽兽,无不精妙。唐人称他“冠绝于世,国朝第一”(《唐朝名画录》)。宋人称他为“百代画圣”(《图画宝鉴》卷二)。他在中国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吴道子出身贫寒,曾向当时的大书法家张旭和贺知章学过书法,但成就不大,转而学画,名声大振。他在绘画上,主要师法南朝梁代画家张僧繇,并受到一些西域画风的影响,自成风貌。

唐玄宗时,人们将张旭的草书、裴旻的剑舞、吴道子的画称为“三绝”。一次在洛阳,三人相逢于天宫寺,裴旻先驰马舞剑,激昂奇伟。舞毕,吴道子奋笔在墙上作画,落笔生风,顷刻而成。张旭接着书狂草于壁。洛阳人说:“一日之中,获睹三绝。”

吴道子画山水,着重写意。是他开创了水墨山水和写意的新风。一次,他受唐玄宗之命,往嘉陵江写生。他不画写生稿,而将嘉陵江山川风光熟记于心,回来后,在大同殿画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毕。

吴道子尤以画宗教题材著名。他曾在长安、洛阳寺庙作壁画三百余间。其“变相人物,奇踪异状,无有同者”(《唐朝名画录》)。他在长安兴善寺作画时,“市肆老幼士庶竞至,观者如堵”。所画佛像“圆光,

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唐朝名画录》）。他在菩萨寺所画《礼骨仙人》，“衣服宽松，裙带飞举”，“满壁风动”，有“吴带当风”之称。他画的其他人物，“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历代名画记》卷二）。在人物造型、着色上都很注重立体感。人们称吴道子所画人物式样为“吴家样”。

吴道子在洛阳城北玄元皇帝庙所画唐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真容和朝廷官员为《五圣千官图》，气势浩大，杜甫称之为“森罗移地轴，绝妙动宫墙”（《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

吴道子在开封相国寺佛殿所画文殊、维摩像，是唐代相国寺十绝之一。

除壁画之外，吴道子一生还创作了大量卷轴。据《宣和画谱》记载，宋徽宗的宫廷就存有吴道子的绘画 93 件。

现存古画《送子天王图》，相传为吴道子所画。表现净饭王和王妃摩耶，抱太子释迦牟尼送入神庙的场面。

少林寺现存一通线刻《观音画像碑》，观音神态飘逸，线条流畅，亦传为吴道子所作。

吴道子绘画，强调传神，形象生动而富感染力。所创画风，影响深远。五代、北宋时期的许多著名画家，都效法于他。宋代苏轼赞扬吴道子云：“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又说：“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东坡集》卷二三）

（二）韩幹的画

韩幹，唐大梁（今河南开封）人（一说长安人），主要活动于唐玄宗（712—755 年在位）时期。曾任太府寺丞、寿王主簿等职。

韩幹出身寒微，少年时帮酒店收账出去的酒钱，去到大诗人、大画家王维家。王维发现了他的绘画才能，曾资助他学了十年画。

韩幹善于画鞍马、人物和鬼神，特别以画马著称。笔端如有神，成就很突出。流传到今天的代表作有《照夜白图》和《牧马图》。他对后世鞍马画有很大影响。宋代大画家李公麟画马就是以韩幹为师。元代赵孟頫也曾受到他的影响。

韩幹画马，以真马为师，他曾对唐玄宗说：“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

唐玄宗喜欢大马，御厩有马40万匹。韩幹常在其中进行写生，并为玄宗精绘名马玉花骢、照夜白图等。杜甫曾说韩幹画马“画肉不画骨”（肉中藏骨），这正是韩幹善于写生的结果，因当时御厩之马，据文献记载，皆养得很肥，具有一种盛唐气象。

韩幹所画马，当时流散人间，不下千万幅，皆神采焕发如生。他笔下的马，一般皆无鞍辔，而处于自由状态，有的还似在振鬣长鸣。

（三）郑虔的画

郑虔，号广文，唐荥阳（今属河南）人。曾任著作郎、广文馆学士、台州司户等职。

郑虔曾向唐玄宗进献自己所作的诗、画和书法作品，玄宗称之为“郑虔三绝”。他与杜甫有深厚友谊，杜诗中不少关于郑虔的诗篇。

郑虔擅长画山水、人物。所作《山庄图》，“画法圆健如锥画沙，绝无尘俗气”（《书画记》卷三）。所画《渊明图》，“画法精好”（《书画记》卷四），画中陶潜，“风气高逸，前所未见”（《宣和画谱》卷五）。

郑虔为官不大，生活贫困，创作书画，常苦无纸，便在慈恩寺贮了几间房子的柿叶，每日取以书写，不久便把所有的柿叶都写满了字。

郑虔所画山水的风格特征是笔墨浓润，树枝老硬。对五代大画家黄筌有较大影响。

《北山文集》卷五称郑虔“高才在诸儒间，如赤霄孔翠，酒酣意放，搜罗物象，驱入毫端，窥造化而见天性，虽片纸点墨，自然可喜”。

（四）卢鸿的画

卢鸿，一名鸿一，字浩然，唐洛阳人。隐居嵩山，聚徒讲学，学生多至五百人。唐玄宗时征召入朝，坚决不愿做官。后放还山，官府为他修建草堂一所。

卢鸿长于书法，善画山水树石。所作《草堂图》，是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作品。画中画了作者隐居之处的草堂、樾馆、暮翠庭、洞玄室、期仙蹬、涤烦矶、云锦淙、金碧潭、倒景台、枕烟庭十处风光，故又称《草堂十志图》。

由于卢鸿长期居住在山中，对自然环境感受很深，故所作“山水平远之趣，其笔意位置，清气袭人”（《图画宝鉴》卷二）。

（五）张图的画

张图，字仲谋，唐末洛阳人。曾在后梁太祖朱温手下掌管行军资粮和簿籍，时人称为张将军。

张图善画泼墨山水、释道人物，尤其长于画大像。他是唐末中原最有名的寺院壁画家之一。

在绘画风格上，张图善于混合运用粗细线条。他在洛阳广爱寺山门两壁所画水神等，意境高远，视之如生。

张图所画人物衣纹，皆用浓墨粗笔，像草书一样，颤掣飞动，势极豪放，不再受“吴衣当风、曹衣出水”的影响。至于画中人物的脸和手，则用细笔轻色，详缓端慎，一丝不苟。怪怪奇奇，自成一派之妙。

四、宋代绘画

宋代是中原古代绘画发展的顶峰时期。画家们通过绘画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

当时中原绘画，发展最充分的是山水画，其次是花鸟（包括兽类）

画,界画和人物画也达到了很高水平。

五代绘画是北宋绘画发展的基础,故在此一并记述。

(一) 山水画

1. 荆浩的画

荆浩,字浩然,五代河内(今河南济源)人。为了避乱,他隐居于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

荆浩长于山水画,与弟子关仝一起被后人称为北方山水画派的创始人,对中国山水画发展有很大贡献。

荆浩以描绘大山大水为特点。所作画气势宏大,结构严谨,高峰入云,穷谷深邃。他曾对人说:“吴道子画山水,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吾当采二子之所长,成一家之体。”(《图画见闻志》卷二)现存作品有《雪山行旅图》和《匡庐图》。北宋山水画大师李成和范宽都曾受过荆浩的影响。

荆浩在自己绘画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笔法记》,是我国山水画的第一部理论作品。他认为,绘画只有形似是不够的,必须“废物象而取其真”。他还创造性地提出山水画创作的“六要”法则,即气、韵、思、景、笔、墨。这些理论对后世山水画的创作和评论曾产生深远影响。

2. 屈鼎的画

屈鼎,北宋开封人(一说陕西人)。宋仁宗时曾任画院祗候。

屈鼎善画山水,一度曾与范宽齐名。后来由于范宽的画法,人们易学,屈鼎的画法难学,故范宽的名气比屈鼎越来越大。

屈鼎所画山林四时风物和烟霞泉石,都富有浓厚的生活情趣。

3. 燕肃的画

燕肃(?—1040年),字穆之,北宋阳翟(今河南禹州)人。进士起家,曾任考城知县、越州知州、权知审刑院、龙图阁直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多有政绩。他不但是著名画家,而且是诗人和科学家。

燕肃善作山水寒林。不施彩色,注重写实。他曾为寺庙和自己主

管的官署作过许多山水壁画,这在当时高级官员中是很罕见的。

燕肃所画山水,清雄奇伟,变化无穷。苏轼称燕肃的画为“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也”(《东坡题跋》卷五)。

燕肃存世作品有《寒岩积雪图》等。

4. 宋迪的画

宋迪,字复古,北宋洛阳人。出身进士,曾任度支员外郎、司封员外郎等职。

宋迪以作平远山水闻名,师法李成。苏轼说他的画“妙绝一时”(《东坡续集》卷八)。元代汤垕说他在“士大夫中画最佳”(《画鉴》)。

宋迪所作山水,体态雍容,情致闲雅。或览物得意,或写物创意,皆运思高妙,笔墨清润。

宋迪又喜画松,或高耸或偃卧,或单或双,以至于千株万株,森森然,气象万千。

宋迪的代表作为《潇湘八景》,包括《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这些画常为后代所仿效。

《梦溪笔谈》曾记载宋迪教别人绘画的方法,十分精采,确有真知灼见。他说,要画山水,“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坎者为谷,缺者为涧,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飞动往来之象,了然在目,则随意命笔,默以神会,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谓活笔”。

5. 郭熙的画

郭熙,字淳夫,北宋河阳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宋神宗时曾任画院待诏,是北宋著名的大画家。

郭熙长于画山水寒林,他反对墨守成规,主张师法自然。所画山

水,千态万状,不拘一格。《图绘宝鉴》称他“得云烟出没、峰峦隐显之态,布置笔法,独步一时”。他把中国山水画创作推向更加真实细腻的境界。宋代皇宫里收藏了他的许多作品。

郭熙还为宫廷、官府和寺庙画了许多壁画和屏风。有的屏风,高达二丈多,长达十二幅。现存郭熙作品有《早春图》、《窠石平远图》、《山庄高逸图》、《树色平远图》、《关山春雪图》、《秋山行旅图》等。

郭熙为官署所作画,以学士院屏风《春江晓景》最出名。苏轼曾赋诗云:“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东坡集》卷一六)。

郭熙画的山水,高远雄奇,意趣新颖。《墨庄漫录》卷四说,把他的画挂在堂上,使人有亲临深山大壑的感觉。他画的山,都比较险峻。在布局上,溪谷桥梁,渔舟钓竿,人物楼观等,各得其所。

郭熙还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著绘画理论《林泉高致》一卷,分《山水训》、《画意》、《画诀》、《画题》等篇,为我国绘画史上的宝贵遗产。郭熙在书中认为,不同时间,山的形象也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可见观察细致入微。

郭熙活了八十多岁,一生创作刻苦。外出时,常将画笔装在皮袋内随身带,一遇好景,或见到长相怪异的树木,就要随时描画下来。所以他早年巧赡致工,晚年落笔益壮。

6. 王诜的画

王诜(约1048—约1104年),字晋卿,北宋开封人。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代,宋英宗的女婿。曾任左卫将军、定州观察使、庆州刺史等职。

王诜幼喜读书,长能作文。擅长作山水画,代表作有《江山秋晚图》、《烟江叠嶂图》、《着色山斋图》、《蜀道寒云图》、《万壑松云图》等,并在私第筑“宝绘堂”,收藏历代书画。

王诜作水墨山水,学李成皴法,清润可爱。又画着色山水,师法唐

代李思训，自成一家。黄庭坚称他所画“水石云林，缥缈风尘之外”（《山谷别集》卷八）。

王诜画的烟江远壑，柳溪渔浦，晴岚绝涧，寒林幽谷，桃溪苇村，皆落笔有神，达到了超越古人的水平。现存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等。

7. 李唐的画

李唐（约1050—1130年），字晞古，宋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在宋徽宗时期和南宋初年，曾两次任画院待诏，是南北宋之际的大画家。

李唐长于画山水、人物，也善于画牛。南宋著名画家刘松年、夏圭等都曾受他影响。

李唐在山水画技法上，首创“大斧劈”皴染法。用水多，行笔快，笔阔、皴长。布局多取近景，积墨深厚，酣畅淋漓，开南宋一代山水画新风。

李唐有一首题画诗，广为传播：“雪里烟村雨里滩，看之如易作之难。早知不入时人眼，多买胭脂画牡丹。”诗中表明，要画好山水是很不容易的，也不如花鸟讨人喜爱。但李唐自己却在山水画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李唐流传至今的作品有《长夏江寺图》、《万壑松风图》、《江山小景图》、《采薇图》、《晋文公复国图》等。

《万壑松风图》画于宋徽宗宣和甲辰年（1124年）。画中深山群壑，峭壁悬崖，林木葱茂，飞瀑垂涧，云雾缭绕，气象万千，是李唐山水画的代表作。

《采薇图》画于南渡之后。借商代亡国后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隐藏于首阳山采薇而食的故事，谴责南宋初年的投降妥协行为，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为当时绘画中所难得。

宋高宗曾多次在李唐画上题诗。

（二）花鸟画

1. 吴元瑜的画

吴元瑜，字公器，北宋开封人。曾任光州兵马都监、合州团练使等职。

吴元瑜善作花鸟画，自出胸臆，构思和笔法生动活泼，给当时流行的以工整富丽为特征的画院体绘画以很大冲击。许多习惯于作画院体画的人，都因他而改变了画风。

吴元瑜的花鸟画，线条纤细，色彩鲜明，与唐五代和宋初的画法不同，自成一家。宋徽宗赵佶曾向他学过画。现存作品有《荔枝图》等。

2. 赵令穰的画

赵令穰，字大年，北宋开封人，宋太祖五世孙，曾任光州防御使等职。

赵令穰虽身为贵族，却喜爱丹青。长于作小景，常以汀渚水鸟为题材。现存作品有《湖庄清夏图》、《秋塘图》等。

赵令穰所作小轴，格调清丽。雪景似王维的画；汀渚水鸟，有江湖意境；又学苏轼作小山丛竹，情趣亦佳。

赵令穰画的《归田图》，“竹林茅舍，烟林蔽亏，遥岑远水，咫尺千里，葭芜鸥露，宛若江乡”（《墨庄漫录》卷八）。又作《秋村暮靄图》，抒发荒寒平远之思，笔法秀美，景象旷绝。这些都是他的得意之笔。

但由于赵令穰一生主要来往于开封、洛阳两地，足迹“不出五百里内”（《画继》卷二），没有见过其他地方的壮丽山川，故其所作画，气魄不够宏大。

3. 赵佶的画

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开封人。他是北宋亡国之君，政治上昏庸，但在书画上却很有成就，是划时代、开宗派的大师。

赵佶以画花鸟见长。他的作品工细入微，生机盎然，达到了形神兼全的艺术境界。南宋邓椿称他：“艺精于神”，“妙体众形，兼备六法，独于翎毛尤为注意。”

在赵佶倡导下，北宋翰林图画院得到很大发展，又编成了《宣和

画谱》，为中国绘画史保存了许多宝贵资料。

赵佶在绘画上受王诜、赵令穰、吴元瑜的影响。现存作品有花鸟画《柳鸦芦雁图》、《竹禽图》、《御鹰图》、《金英秋禽图》、《枇杷山鸟图》、《杏花鹦鹉图》、《瑞鹤图》和山水画《雪江归棹图》等。

《竹禽图》、《柳鸦芦雁图》，格调雄健，用笔粗放，为其前期之作。

《御鹰图》中的鹰，形体生动自然，鹰眼神姿英发，显示威猛之气。整幅画清新文雅，已无粗犷之气，为其中期之作。

《金英秋禽图》，雍容高雅。图中两只喜鹊，笔势俊放；其后两只秋禽，用工笔细描，充满野趣。

《枇杷山鸟图》，纯墨无彩，画中除鸟与蝴蝶外，都以没骨法画成，透挺温婉，形象俊俏，为北宋所独见，是赵佶晚期的作品。

此外，《祥龙石图》，描绘一块巨大的太湖石，玲珑剔透，奇趣盎然。《瑞鹤图》，群鹤翻飞，姿态各异。《杏花鹦鹉图》，色彩艳丽，画面秀美。

山水画《雪江归棹图》，为赵佶所画四时山水图中的冬景图，气势磅礴，是他青年时的作品。

赵佶的绘画，以清新俊美的神韵，登上了一座艺术高峰。

赵佶所画墨竹，下笔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从稠密处微微露出一些白道，自成一家，不蹈袭古人。如今存《写生珍禽图》中所画竹，就全用焦墨，不分浓淡，竹叶交错之处，都空一道白，使二叶不相混。赵佶所画鸟，点睛时多用黑漆，隐然如豆，似能活动。这些都是他的独创。

为了绘画，赵佶对事物观察得很细致。一次，他重赏画龙德宫壶中殿柱上斜枝月季花的人。太监问其原因，他说：月季花是很少有人能画好的，因为四时早晚花蕊花叶皆不同，这幅画画的是春天日中时的月季，丝毫不差，故予厚赏。又一次，他让画院里的画家画宣和殿前的荔枝孔雀。所画孔雀，登高时先举右脚，他说：不对，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脚。（邓椿：《画继》卷一〇）这些都是一般人注意不到的。

4. 智融的画

智融(1114—1193年),原名邢澄,开封人。生于北宋,南渡后曾任成和郎,后入杭州灵隐寺为僧,是南北宋之际的画家。

智融擅长画牛,自号老牛。他采用减笔画法,“精深简妙”,“惜墨如惜命”,“间作物象,不过数笔,寂寞萧散,生意飞动”(《玫瑰集》卷七九)。在当时很有影响。

日本现藏有他的《牧牛图》。

(三) 界 画

界画是指以宫室、楼台等建筑物为题材,用界笔直尺划线的绘画。宋代中原界画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郭忠恕。

郭忠恕(?—977年),字恕先,洛阳人。生于五代,卒于北宋。曾任后周《周易》博士、北宋国子博士和国子监主簿等职。政治上不得志,精力主要集中在书画上。

郭忠恕所作界画,十分精确,几乎可作建筑施工图。清藩曾莹《画品》云:“至于屋木桥阁,忠恕自为一家,最为独妙。栋梁楹桷,望之中虚,若可躐足。阑楯牖户,则若可以扞历而开合之也。以毫计分,以寸计尺,以尺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字,皆中规度,曾无小差。”《玉壶清话》卷二也说:“郭忠恕画殿角重复之状,梓人校之,毫厘无差。”

郭忠恕画的楼观台榭,不但精密,而且萧散简远,气势高爽,户牖深秘,一点没有尘埃气。

许多人都以收藏郭忠恕的画为荣。但他想画时才画,若别人硬请他画,他必愤怒而去。

郭忠恕喜欢与一般老百姓交往,而很少把富人放在眼里。有个富人想得到他的画,以酒菜招待他很长时间。他感到不画也不好,但认真画又不愿意。于是他在富人准备好的大纸一角画卍角小童手持线车,在纸的另一端画一风筝,中间引线长达数丈。富人十分生气。

郭忠恕现存作品有《雪霁江行图》，其中两艘大船，精细无比，是界画中罕见的精品。

郭忠恕的书法也很好，尤长于篆书。欧阳修认为“篆法自唐李阳冰后，未有臻于斯者”（《欧阳文忠集》卷一四三）。亦精文字学，曾著《佩觿》三卷，已见本书学术章。

（四）人物画

1. 武宗元的画

武宗元（？—1050年），字总之，北宋白波（今河南洛阳市吉利区）人。曾任虞部员外郎等职。

武宗元擅长画释道人物。他学习吴道子的风格，得其闲丽之态，被《画鉴》称为宋代的吴道子（“宋之吴生也”）。

武宗元曾在开封、洛阳等地寺庙画过很多壁画。在洛阳上清宫画三十六天帝，用宋太宗的相貌画赤明和阳天帝，宋真宗一见就认出是他父亲的形象，连忙焚香叩拜。

开封建玉清昭应宫，召募天下画家画壁画，应召者超过三千人，入选者才一百多人，而“宗元为之冠”（《宣和画谱》卷四）。

武宗元传世《朝元仙仗图》一卷，现存美国，为白描人物，可能是壁画的稿本。又徐悲鸿存有武宗元《八十七神仙图》，结构与前者同，笔法有变化，大约是在前者基础上加工而成。画中五方帝君，及其随从，眉目顾盼，一一如生。

武宗元作画，注意神韵，《图绘宝鉴》卷三说他“行笔如流水，神采活动，大抵如写草书”。

2. 苏汉臣的画

苏汉臣，宋开封人，曾在北宋宣和年间和南宋绍兴年间任画院待诏。

苏汉臣擅长画人物，尤以画儿童画出名。他的作品，线条工整，色彩艳丽，构图匀称，画面热闹，生活气息浓郁，适宜装点年节，对后代

的年画发展有很大贡献。

苏汉臣的作品现存有《秋庭戏婴图》、《婴戏图》、《货郎图》、《击乐图》、《开泰图》、《五瑞图》等。

《秋庭戏婴图》系巨幅绢画，长 197.5 厘米，宽 108.7 厘米，形象生动，设彩精妙。画上庭院一角，两个孩子正聚精会神地以手拨转用鲜枣插篾片制成的小磨，模仿成人推磨的动作。从稚气的神态里，可看出幼儿纯真可爱的心灵，情节平凡而有趣。庭院里，假山耸立，芙蓉盛开，菊花斗艳，对人物的优美形象起着烘托作用。幼儿微妙的手势、天真明亮的眼睛，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婴戏图》画一对婴孩扑蝴蝶的情景。幼儿走近蝴蝶时，蹑手蹑足的神态非常传神。

《货郎图》表现婴儿见到货郎担上杂陈的货物和玩具时的喜悦情状。

《击乐图》描绘一个艺人满身乐器，两个婴儿扶肩饶有兴味地看他演奏的情态。

《开泰图》画娃娃骑羊。以曲栏竹榭、梅花山茶为衬景，构图活泼，色彩富丽，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大约是春节悬挂的节令画。

苏汉臣的画，富丽精工，既具有院体特征，又生动活泼，具有民间色彩，故蜚声南北，广泛受到人民喜爱。

五、朱仙镇木板年画

年画初创于汉代，形成于宋代，兴盛于明清时期。它是中国绘画领域的特有品种，主要是供新年时粘贴，借以点缀节日气氛。

朱仙镇在开封市南 45 里，所出木板年画，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山东潍坊、河北武强齐名。

朱仙镇年画，是北宋末年从开封转移去的。北宋开封，“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东京梦华录》卷一〇）。外地许多商人也到此贩卖。

元代以后，朱仙镇因位于贾鲁河岸边，成为水旱码头，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江西景德镇并称为全国四大名镇。商业繁盛，年画业也发展起来。

明清时，每逢阴历九月初九日，朱仙镇都在岳飞庙前举行“门神会”，开始销售年画。当时重要画店有万通、晋泰涌、德胜昌等。清代年画业繁荣时，从事年画业者近三百户，著名画店有天义、天成、振源永等。民国时还有画店四十多家。抗日战争前后，朱仙镇的振兴永、泰盛源、广益振等画店曾迁到开封营业。所有这些画店都既制作又销售。

朱仙镇年画，继承了古代人物画和风俗画的优良传统，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从内容上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普通年画，室内、院中随处可贴。其内容大都是吉祥图画、神话传说、戏曲故事等，这是朱仙镇年画中最精采的部分。如《天河配》描绘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喜鹊搭桥，二人叙话情景；《盗仙草》描绘白娘子为救许仙到昆仑山盗灵芝仙草，与巡山鹤童相斗场面；《天仙送子》画一仙女骑着麒麟，手抱男孩，进行送子的形象；《渭水河》画姜子牙手执钓竿，周文王礼贤下士的神态，皆绘刻精细，人物秀美，表情逼真。此外还有《长坂坡》、《寿州城》、《对花枪》、《岳飞》、《二进宫》、《四霸天》、《九龙山》、《对金抓》、《罗章跪楼》、《哪吒》、《三娘教子》、《福禄寿三星》、《五子夺魁》、《和合二仙》、《八仙》、《镇宅钟馗》等，也都生动传神。

第二类是门神。一般多画秦琼和尉迟敬德二人手执钢鞭的形象，每人一幅，两扇门，每扇贴一张。钢鞭拿法各有不同，有“步下鞭”、“马

上鞭”、“抱鞭”等。

第三类是纸马。所谓纸马，据赵翼《陔余丛考》解释说：“昔时画神于纸，皆画马其上，以为乘骑之用，故称纸马。”纸马画中，主要是灶神。中部画神像，旁有二十四节气日期，下画“摇钱树”、“聚宝盆”等。灶神像，有“蓝袍”、“红袍”之分。其次是画天地全神。以玉帝居中，围以值日功曹、四大元帅。也有的画天、地、人三界诸神，包括释迦牟尼、玉帝、地藏王等。第三是单独画财神、场神、牛王神、马王神，供分别张贴于堂屋、场院、牛棚、马厩等处。

朱仙镇年画上有的还巧妙地插进一些吉祥图案，如荷花隐喻和睦，蝙蝠隐喻幸福，柿子表示事事如意等。这些年画，迎合人们盼望平安吉祥、人畜兴旺、多福多寿、招财进宝、驱邪避灾、五谷丰收的心理，因而受到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欢迎。

朱仙镇年画皆用水印套色，一般有黑、黄、红、绿、青、金等色，都分别刻成木板，每种颜色印一次。其总的效果是，神像画庄重简洁，戏曲画活泼有趣。线条粗犷有力，彩色单纯浓重，具有古老纯朴的风格。

除朱仙镇之外，河南其他地方，如商丘、周口、嵩县、灵宝、卢氏、正阳、汝南、获嘉、新乡等地，清代以来也有年画制作。其中卢氏年画，还远销山西、陕西等地。这些地方的年画风格，与朱仙镇差不多，但题材和制作手法各地又有不同。

第二节 书 法

中原书法家曾在中国书法史上有过杰出贡献。李斯是小篆的创始人，钟繇是楷书的发明者，蔡邕的隶书是艺术与应用相结合的典范。魏碑是汉晋隶书向隋唐楷书过渡的产物，承上启下。赵佶创造瘦

金体,王铎克服明末书坛颓风,成为中国古代书法殿军。他们的作品都绚丽非凡,魅力无穷。

另外,上自夏商周,下至宋金,三千多年,中原一直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洛阳、开封久为帝王之都。文人学士络绎不绝,书坛巨匠之宝刻石传世者,亦遍布中原各地。

一、三国以前书法

(一) 甲骨文和金文的书法

甲骨文和金文是中原最早的书法。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有的笔画瘦硬方直,简洁刚劲;有的笔画粗壮,线条豪放;有的谨饬工整,横竖分明。结体一般细长,上下左右注意对称平衡。章法布局参差斜倚,取法自然,具有早期书体的艺术特色。如商代《祭祀狩猎涂朱牛骨刻辞》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写刻甲骨文的人就是当时的书法家。

金文又称钟鼎文,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铭文。

中原青铜器铭文出现于商代中期,一般为二三字。如司母戊鼎上有“司母戊”三字。到商代晚期已有几十个字的铭文。

商代金文,字体丰腴,笔画首尾尖锐,中部肥大;线条多直线,行款参差,气势凝重雄奇。

西周晚期,中原金文发展到高峰。用笔纯熟,字迹秀劲,一般皆布局整齐,雍容华美。

商代中原甲骨、玉石和陶片上曾发现有朱墨笔书写字迹,说明当时已有毛笔。但最早的毛笔实物却是在信阳战国墓中才发现的。

(二) 李斯的书法

李斯(?—前208年),楚上蔡(今属河南)人。辅佐秦始皇统一全国,被封为丞相。前文已述及。为秦朝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杰

出的书法家。

秦统一中国后,李斯主持了全国文字的统一工作。

原来各诸侯国文字不一样,李斯以秦国文字为主,对各国文字加以整理,化难取易,简化字形,废除异体字,规范部首,创制了一种名叫小篆的标准文字。

小篆书写简便,形象优美,大受国人欢迎。

李斯曾用小篆写过一部《仓颉篇》,作为标准文字的范本,在全国推广。

李斯被历代书法家尊为“小篆之祖”、秦书法家之首。

李斯的书法风貌,主要反映在秦始皇巡游全国的刻石上。当时共刻6块,分别立于山东峰山、泰山、琅琊台、之罘山,河北碣石和浙江会稽,内容都是为秦始皇歌功颂德。

秦始皇死后,李斯又随秦二世巡视全国,并把这次行动刻字补记于秦始皇所立各石之上。

这些刻石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泰山刻石》残件和《琅琊台刻石》,皆为小篆。

《泰山刻石》为纪念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东巡泰山而立。风格谨严,字体圆润。今石残存10字,藏山东泰安岱庙中。

《琅琊台刻石》为纪念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登山东琅琊台而立。石高5米,底宽2米,顶宽1米。秦始皇时所刻文字已佚,二世时补刻文字仍存,共13行,计86字,每字约3厘米见方。石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李斯所书小篆,偏旁部首写法固定,笔画平直宛曲,粗细不变,字形狭长,上半部较紧,下半部较舒展。中锋运笔,笔力雄健。

(三) 蔡邕的书法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任左中郎将等职。前文已述及。

蔡邕在书法上,擅长隶、篆。所作隶书“骨气通达,爽爽有神”。

东汉灵帝时,将《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刻在四十六块石上的《熹平石经》,就是蔡邕等用隶书书写的。

这部石经,后遭兵火损坏。近人搜集残片,得 8000 余字。

《熹平石经》是书法界公认的汉隶典范。

相传“飞白书体”也是蔡邕所创。笔画中丝丝露白,魏晋时多用于书写匾额和楹联。

据说,书法理论著作《九势》也为蔡邕所撰。书中对落笔结字、转笔、藏锋、藏头、护尾、疾势、掠笔、涩势等笔法要领进行了中肯的阐述,大为有益于后学。

(四) 钟繇的书法

钟繇(151—230年),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东汉末,以侍中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协助曹操平定北方,功勋卓著,曾被曹操比作楚汉相争时镇守关中的萧何。曹魏建国后任相国、太尉、太傅等职。

钟繇是三国时的大书法家,擅长隶书、楷书和行书。他的书法特点是幽深古雅,刚柔兼备,点画之间多有趣意。

钟繇曾学书法于同乡刘德升(约 146—189年)。相传刘德升为行书的创始人。行书是在草书向正楷演变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书体。钟繇的行书,潇洒自如。

与钟繇一起向刘德升学书法的还有颍川(今河南许昌)人胡昭(162—250年),二人的成就各有特色,时人称“胡肥钟瘦”,就是他们的最大区别。

钟繇以隶书写得最好,但在后世却以楷书得名。钟繇的楷书,用笔结体,古朴纯真。他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由隶书进入楷书的代表人物,被称为“楷书之祖”。

三国时期,曹魏占据中原腹地,是两汉文化的延伸,许多中原书法家继承汉末书体的变化,而加以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钟繇。他完成了楷书的创建,为东晋书法艺术的兴盛开辟了道路。

钟繇的真迹已经不多。宋代以来法帖中保存下来的有《贺捷表》、《宣示表》、《荐关内侯季直表》等,皆为后人临摹。

《贺捷表》,作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笔法自然流畅,保留了不少隶书笔意,为隶书向楷书过渡时的典型作品,收入《郁冈斋》帖中。

《宣示表》字形略扁,布局严密,笔画横细竖粗,点捺丰茂,疏朗有致。现流传的刻本相传为王羲之所临,收入《淳化阁帖》。

《荐关内侯季直表》已是典型的楷书作品。

相传曹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碑和《受禅表》碑,也是钟繇所书。二碑皆为隶书,今存河南临颖繁城。前者刻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华歆、王朗等大臣劝曹丕即皇帝位的奏文。碑文共32行,每行49字,其中22行刻于碑阳,10行刻于碑阴。后者刻汉献帝在繁城筑受禅台让帝位于曹丕的经过,碑文共22行,每行49字。二碑风格相似,笔法皆古朴方整。

历史上,钟繇与其后东晋的王羲之齐名,并称“钟王”。王羲之少时曾向卫铄(272—349年,世称卫夫人)学习书法,而卫铄的书法又是学习钟繇的。

二、魏 碑

魏碑指北魏时期的碑刻书法艺术。它是南北朝时期中原书法风貌的代表。

(一) 龙门二十品

中原魏碑的代表作为“龙门二十品”。

龙门二十品是洛阳龙门石窟中二十则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这些题记在书法上有独特风格,被称为“魏碑体”,又称“龙门体”。

龙门石窟共有北魏时期的造像题记约 2000 块,这二十则就是从中精选的魏碑代表,在清朝中叶开始以拓本传播。

这二十则题记中,除“慈香”一则见于慈香窟外,其余皆集中在古阳洞内。

魏碑上承汉晋隶书,下启隋唐楷书,代表了整整一个书法时代,对后世影响很大。

魏碑的书体特点是棱角鲜明,字形端庄,刚健质朴,方峻雄强。大多用笔如刀削,锋芒毕露;也有少数转角圆浑,笔迹俊秀流畅。

龙门二十品中,最有名的是慧成、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四人的造像题记。

慧成造像题记(又称“始平公”),每字皆刻在方格中,且用阳文,为当时碑刻中罕见。字形宽博,结体严谨,势雄力厚,风骨峻健。清代胡鼻山称此题记“字形大小,如星散天,体势顾盼,如鱼戏水”。钱叔盖称此题记:“此龙门石刻之冠于当世者也。石刻中之阳文,古来只此矣。”书法家赵之谦也认为它是“北魏造像中最佳者”。

孙秋生造像题记,是龙门二十品中规模最大的,长 104 厘米,宽 49 厘米。书法劲健有力,气韵险峻。康有为说它的艺术特点是“沉着劲重”。

杨大眼造像题记,字体峻拔,书势雄健,康有为说它“气雄力健”,为“峻健丰伟之宗”。

魏灵藏造像题记,用笔纵肆,斜撇稍卷,捺脚略长,重心聚中。书法风格和杨大眼题记相似,但比杨大眼题记,用笔更方硬、舒放,横画起落展开,结体更和谐。

此外诸品,也各具特色。如尉迟造像题记(又称“牛橛”或“长乐王”),刻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 年),为龙门造像题记中纪年最早

的。章法工整,疏朗有致,结体清秀。康有为评其特点为“体方笔厚,画平竖直”,属“端方峻整”一类(《广艺舟双楫》)。

解伯达造像题记,转折方硬,撇捺有力,干净利索。康有为评为:“有奇趣妙理,兼备方圆,为北碑上乘。”(《广艺舟双楫》)

郑长猷造像题记(又称“云阳伯”),书法质朴粗放,骏厉凝重,体在隶楷之间。

元祐造像题记,笔势圆转,近于唐楷。

慈香造像题记,笔法洒脱,方圆并用,隶楷兼备。其章法龙蟠凤舞,纵横相涉。其用笔顿挫沉着,酣纵逸宕。结体飞扬绵密。在魏碑中别具一格,开宋明之体。

总之,从艺术风格看,龙门二十品中,杨大眼、魏灵藏、慧成、慧感、道匠、孙秋生、郑长猷、侯太妃(贺兰汗)等题记结体端庄稳重,重心聚中而微偏上,毫无松散之感;笔法方硬有棱角,魄力雄伟,锋颖铄利,气象浑穆,意态奇逸。尉迟、一弗、解伯达、高树等题记,其风格与上述各题记基本相同,但笔画较细,于稳重深厚中又显得俊秀。这些都是魏碑体的典型风格。而元详、元夔、高太妃、马振拜等题记,用笔趋于圆转,笔迹流畅,是留有隶书笔意的楷书。侯太妃(广川王)、元祐、法生等题记用笔含蓄,锋芒内敛,转角圆浑,已同以后的唐楷没有多少差别了。慈香题记,在结体用笔上更为自由,柔和,潇洒奇逸,是魏碑中另一种别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二) 郑道昭与《郑文公碑》

郑道昭(?—516年),字伯喜,号中岳先生,北魏荥阳开封(今河南开封)人。曾任国子祭酒、秘书监、使持节督光州诸军事、平东将军、光州刺史、青州刺史等职。他博闻好学,是北魏有代表性的大书法家。

郑道昭之父郑羲,在北魏孝文帝时,曾任中书令,与当时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太原王琼并列名门。

郑道昭在光州(今山东莱州)为官时,曾于光州境内的云峰、太

基、天柱三山亲自书写摩崖刻石多处,其中最有名的是《郑羲下碑》。

《郑羲下碑》又称《郑文公碑》,为摩崖磨石刻成,在今山东莱州南十五华里的云峰山上。真书,碑额作“莱阳郑文公之碑”。碑文共 51 行,每行 29 字,字大二寸见方。内容是记述郑羲事迹。

早在北宋时期,赵明诚在《金石录》中就对《郑文公碑》进行著录。清代阮元又介绍它的拓本,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更对它加以推赏,以致声名大著。包世臣《艺舟双楫》评此碑“字独真正,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叶昌炽《语石》评此碑:唐初欧、虞、褚、薛诸家尽在笼罩之内,不独为北魏第一,自有真书以来第一人。康有为、杨守敬等将它与南朝《瘞鹤铭》相提并论。

三、唐宋以来书法

(一) 孙过庭的书法

孙过庭(约 648—约 703 年),字虔礼(一作名虔礼,字过庭),唐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曾任率府录事参军。一生不得志,四十多岁生急病,死于洛阳客店。

孙过庭工正、行、草各体,尤以草书著名。他作草书,师法二王。用笔刚断峻拔,好奇尚异,天才横溢。米芾认为,“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孙过庭自撰自书的《书谱》,是中国古代著名的书法理论著作。

《书谱》作于武则天垂拱三年(687 年),用草书写成,共 351 行。

在《书谱》中,孙过庭总结前代书法家的创作成就,阐明自己的书法思想,讨论创作方法,见解精辟。他提出的“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四条要求,抓住了书法要害,被杨慎称为“鲸吞海水尽,落入珊瑚枝”。

《书谱》中提出的“执、使、转、用”四大法则，成为历来学习正、草二体书法者的指南。

《书谱》的书法，也十分精美，运笔自如，神采矫健，历来均受赞扬。宋高宗称《书谱》不但文词华美，而且草法皆备。

（二）赵佶的书法

赵佶(1082—1135年)，即宋徽宗，开封人。前文已述及。他的草书写得很好。但他在书法上的贡献，主要是创造了楷书瘦金体，在中国书坛上独树一帜。

瘦金体又称“瘦劲体”或“瘦筋体”。笔画细瘦有劲，字体清新挺拔，洒脱明快，气韵脱俗。

瘦金体的结体，大多抑上扬下，抑左扬右，抑内扬外，即每个字的笔画分别向上、向左、向内集中。一般说，字体多呈长形，笔画相对集中在字的上半部。尾钩锐利，横笔末端和竖笔下端，一般皆有顿挫，右肩转角处因用力而形成肿节，撇捺末端作柳叶状。法度严密，一丝不苟。

赵佶的楷书书法，渊源于初唐的薛稷、薛曜兄弟(薛氏师承褚遂良)，又学宋代黄庭坚。从薛稷《信行禅师碑》、薛曜《夏日游石淙诗》、黄庭坚《伯夷叔齐庙碑》可看出，赵佶用笔源于薛，结体笔势取于黄，又加以融会贯通，加上自己的飘逸潇洒风格，就创造出楷书新体瘦金体。

瘦金体一直受到后人称赞。元代表袁桷说：“笔法飞动，有凌云步虚之意。”(《清容居士集》卷四六)赵孟頫说：“天骨遒美，逸趣霭然。”(《珊瑚网·画录》卷三)

当时和后世摹仿瘦金体的人很多。宋版衢本《居士集·目录》、《通玄真经》是书坊用瘦金体刻印的。“崇宁通宝”、“大观通宝”、“宣和通宝”等宋代钱币，也用瘦金体字。金章宗(赵佶的外孙女婿)所写瘦金体尤为逼真。现代画家于非闇用瘦金体题画引人瞩目。印刷用的

仿宋体也由瘦金体变化而来。

赵佶传世的瘦金体作品有《正书千字文》、《秣芳诗帖》和许多题画诗等。

赵佶的草书,也达到很高水平,主要学唐代僧怀素,而比怀素的草书更为劲峭刻厉。传世作品有《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

赵佶还广泛搜集历代书法作品,加以整理,鉴定,主编为《宣和书谱》二十卷,收录书家 197 人,作品 1344 件。并刻有《大观帖》,对古代书法作品的保护、流传作出了贡献。

(三) 王铎的书法

王铎(1592—1652年),字觉斯、觉之,号嵩樵、石樵、痴庵、雪山道人等。明末清初河南孟津人。曾任明翰林院编修、经筵讲官等职。入清,任顺治朝礼部尚书等职。

王铎为明清之际的大书法家。各体皆能,尤以行书和草书成就最高。

明末书坛流行董其昌书风,以俊逸柔媚相标榜。王铎取法高古,在董派书风盛行之时,别树一帜。

王铎广泛吸收古代书法营养,“远宗魏晋,近绍北宋”。特别注意学习二王和米芾的优点,创造自己的特色。他练字勤奋,一日习字,一日酬请索,终身不易。

正如近人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所说:“王铎一生吃着二王法帖,天分又高,功力又深,结果居然能够得其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末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的‘中兴之主’了。”

王铎的书法,风格激烈,气势夺人,笔势连绵,凝重沉着,取法奇险,精深酣畅。他用笔收得起,放得开,得心应手,号称“神笔”,其味无穷。

王铎传世墨迹较多。无论条幅、对联,还是诗文手稿等,都是很好

的艺术品。

王铎书法作品刻石的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

《拟山园帖》全为王铎自书(包括他临摹历代书法家的作品),共十卷,刻在 90 块汉白玉石上,镶在孟津老城王铎旧宅厅壁上。

《琅华馆帖》为王铎与其姻亲来往书信,以汉白玉石刻好窖藏,1958 年在河南洛宁出土。

二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王铎书风在日本有很大影响,曾一度盛行于日本书坛。

第三节 雕 塑

中原古代雕塑成就,主要表现在石窟造像和陵园石雕上。

在中原近二十处石窟中,首数龙门。它吸收中原传统文化精神,把外来艺术与传统艺术融为一体。

巩义石窟寺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原陵园石雕上,最有代表性的是巩义宋陵石雕群。

一、龙门石窟

(一) 位置和开凿经过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南面 12.5 公里处。该地东西两山对峙,伊水由南向北从中间流过,古称“伊阙”,又称“龙门”。

伊阙一带,石质坚硬,山林葱郁,风景秀美,气势磅礴。状如蜂窝的洞窟就开凿在伊水两边的崖壁上,南北长约一公里。

龙门石窟为我国三大石窟之一,与甘肃敦煌石窟、大同云冈石窟齐名。

龙门石窟,从北魏开始,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至宋,前后陆续开凿四百多年。其中集中开凿的时间是北魏和唐代。

龙门石窟现存洞窟 1352 个,佛龕 785 个,造像 10 万余尊,碑刻题记 3680 多块,佛塔 39 座。其中北朝的作品约占 30%,唐朝的作品约占 60%。

(二) 北魏开凿的洞窟

北魏时期,佛教盛行。开凿石窟成为王公贵族等人崇奉佛教、祈福禳灾的精神寄托。

龙门石窟中开凿于北魏的洞窟,主要有古阳洞、宾阳中洞、莲花洞等。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南头,始凿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年),即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的第二年。为北魏首凿大窟,也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洞窟。

古阳洞系利用天然溶洞雕凿而成。它是北魏皇室和官僚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洞窟。洞顶似穹庐,地平面呈马蹄形。洞内有佛龕 200 多个。

主像释迦牟尼身穿袈裟,略带微笑。二菩萨站立两侧,分别提宝瓶、持摩尼宝珠,仪态庄严文静。

古阳洞南北两壁,各有上下三列大龕,雕刻释迦坐像、交脚弥勒等。大龕之间还密布众多小龕和千佛。

古阳洞北壁最有价值的作品是贵族妇女礼佛图。两个穿长裙的贵族妇女,一人捧熏炉,一人提香袋,率领十来名女侍,鱼贯而行,构图简洁、和谐。

古阳洞南壁最有价值的作品是描述释迦牟尼一生经历的佛传故事,包括乘象入胎、树下诞生、九龙灌顶、立为太子、山林之思、苦修成道等,情节完整,经过精心构思和设计,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力。

整个古阳洞,雕刻琳琅满目,纹饰丰富多采。

宾阳中洞为北魏所凿第二大窟，靠龙门西山北端。是北魏宣武帝元恪为其父母孝文帝元宏和文昭皇太后做功德而凿的。凿了二十四年，方才凿成。它是龙门石窟中最富丽堂皇的一窟。

宾阳中洞有大像十一尊，皆高大雄伟，轮廓分明。主像释迦牟尼坐在中央须弥座上，面部秀长，眉作半弧，眼如新月，嘴角上翘，微露笑容。左手屈三指，右手伸向前。褒衣博带，肩宽体壮。这个形象，已不像云冈昙曜五窟本尊那样深目高鼻，服饰也已汉化，表明魏孝文帝改制已取得成果。

主像两侧侍立二弟子、二菩萨。主像座前有两只护法狮子。南北两壁各为一佛、二菩萨立像。菩萨的手臂雕得如同少女的手臂一般，丰满而富有弹性。

十一尊大像和两只狮子，都是圆雕，朴实洗练，整体感极强。大像周身崖壁还雕有背光和头光，或作火焰，或作莲花。

窟顶作穹庐形，雕莲花宝盖、8个伎乐天和两个供养天。地平面作马蹄形，饰以莲花图案，如同铺有地毯一般。

宾阳中洞的内壁全被雕刻品占满，并敷以鲜艳色彩。其中最有名的是浮雕皇帝礼佛图和皇后礼佛图。二图皆高2米，宽4米，分别以孝文帝和文昭皇太后为中心，组成前护后拥的礼佛行进队列。构图严谨，人物生动，刻工精美，衣褶、裙带飘逸多变，为一千四百年前，我国雕刻艺术的精品。可惜三十年代被盗凿，现分别藏于美国纽约市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博物馆。

莲花洞位于龙门西山中部偏南。凿于北魏晚期。因窟顶雕有一朵美丽的大莲花而得名。它也是利用一个天然溶洞雕凿的。

莲花洞窟楣作火焰纹尖拱式样，构成完美的装饰图案形象。窟顶的莲花图案由莲蓬、莲瓣和忍冬纹组成的圆盘构成。莲花周围雕有六个飞天，姿态婀娜，形象传神。

莲花洞主像为释迦牟尼立像，褒衣博带，衣褶明快。

在洞内各像中，迦叶的形象最突出。高鼻深眼，满脸皱纹，颈露青筋，胸显肋骨，手握禅杖，充分表明他虔诚而刚毅的苦行僧形象。

莲花洞南北两壁布满密密麻麻的佛龕。龕楣、龕额装饰丰富多采，活拨生动。

（三）唐代开凿的洞窟

唐代是中国石窟艺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洞窟规模，还是佛像的高大气魄都远远超过前代。

龙门石窟中，开凿于唐代的主要有潜溪寺、奉先寺、万佛洞、看经寺等。

潜溪寺是龙门西山北头第一大窟，开凿于唐高宗前期。

洞内主像阿弥陀佛，高7.38米，结跏趺坐于须弥方座上，袒胸，穿褒衣博带袈裟。厚唇丰颐，静穆慈祥，神态自若。

主像旁边的二菩萨造像，比例和谐，线条流畅，双目俯视，仪态文静，是龙门石窟大型菩萨造像中最优美的两尊。

潜溪寺窟顶作穹庐形，有莲花藻井，但为了突出主像，洞窟四壁未作任何浮雕装饰。

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山腰，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洞窟。东西深38.7米，南北宽35.5米。凿成于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年）。

主像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头长4米，耳长1.9米，为中国石窟雕像中罕见。

大佛结跏趺坐在须弥座上，发髻为螺形，宽宽的前额，胖胖的面颊。肌肤圆润，相貌端庄。嘴角上翘，呈现一种宁静含蓄的微笑。身穿袈裟，俯视下方，仪态庄严慈祥。形象饱满，栩栩如生。

大佛两侧，雕有迦叶、阿难二弟子和二菩萨、二供养人立像。南北两壁各雕有一天王、一力士。

迦叶像一位刚毅持重、饱经风霜的老僧，阿难却是一个文静虔诚的小和尚形象。

二菩萨头戴宝冠，身披璎珞宝珠，盛装艳服，体态妖娆，俨然是贵族妇女形象。

梳双髻，穿长裙的供养人，分明是两个妙龄少女。

北壁天王，身穿铠甲，足踏夜叉，手托宝塔，表情严肃。北壁力士，怒目圆睁，威武逼人。他们都是勇猛战将的写照。南壁天王和力士与此相似，可惜风化严重。

相传，大卢舍那佛是按照武则天的形象雕凿的，所以外貌上有一些女性特征。武则天曾为雕凿此佛“助脂粉钱二万贯”（《河洛上都龙门山之阳大卢舍那像龕记》）。当时雕凿这座大像，是为了给武则天歌功颂德，为她由皇后当皇帝作舆论准备。

大卢舍那佛，是艺术上完美的典型，可与古希腊雅典娜女神雕像相媲美，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由于窟中雕像过分高大，所以艺术家在雕刻时，让像的上身长大，下身短小，从而使人们在下面从仰视角度看上去，并不感到比例失调。对大佛、力士、天王等的处理都是如此。这种利用人们视觉上的误差，进行造像比例设计的做法，是非常先进的。

整个奉先寺群像，采用烘托、对比手法，主题突出，形象鲜明，规模宏大，布局和谐，雕刻精细，达到了形神俱佳的艺术效果，标志中国石窟造像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万佛洞在龙门西山中部。凿成于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因洞内南北两壁刻有15000尊小坐佛而得名。

万佛洞主佛阿弥陀佛，高4米多，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莲花座上有四个造型威武的力士浮雕。佛像面容丰满，安详肃穆。

主像两侧为二弟子、二菩萨。后面石壁上雕54支莲花，每一莲花上雕一个菩萨或一个供养人。他们有的端坐，有的私语，有的嬉戏，形

象都很生动。

南北两壁下部雕乐伎、舞伎。乐伎手持乐器，吹打弹奏；舞伎长裙曳地，飘带飞舞，为唐代乐舞的真实写照。

万佛洞南壁观音菩萨，左手提净瓶，右手执麈尾，面带笑容，体态丰盈，端庄文雅，温顺善良犹如宫中少女。

看经寺是龙门东山规模最大的洞窟。开凿于武则天时期。

看经寺的最大特色，是在洞内南、东、北三壁雕有 29 尊高浮雕罗汉群像。他们披袈裟，穿云履，身高皆为 1.8 米左右。

29 尊罗汉是佛教禅宗崇奉的从摩诃迦叶到菩提达摩二十九代西土祖师的形象。

雕刻者把 29 尊罗汉雕成以摩诃迦叶为前导，菩提达摩殿后的行进队伍，彼此呼应衔接，形象惟妙惟肖。

这些罗汉，或托莲梗，或握锡杖，或提串珠，有的侧身，有的躬背，有的拱手，姿态各别，神情生动。他们都是以唐代生活中的人物为模特儿加以夸张提炼而创造出来的，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看经寺藻井上四个体态丰润的飞天，凌空飞舞，衣带飘扬，也是优美的艺术形象。

（四）造像艺术的特点

总体看来，龙门石窟的造像艺术，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政治性。龙门石窟在北魏和唐代都是皇家礼佛的地方。开凿洞窟的都是皇室贵族、文化官僚和一些有钱的人。许多重要洞窟都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当时的皇帝把自己说成是佛的化身，因而不少洞窟的大佛就成了帝王的模拟像。如宾阳中洞主像和奉先寺卢舍那大佛就是魏孝文帝和武则天形象的艺术体现。

龙门石窟中有些大规模的造像工程，由于政治形势变化，或因主持人犯罪，或因被歌颂的对象死亡，都曾发生停止雕凿、中途废弃的情况。

在龙门石窟的造像上,许多宗教问题都是和政治问题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二,世俗性。佛教艺术本是外来文化。北魏前期所凿云冈石窟的主像,大多为高鼻深目,保留了较多的外来影响。刀法平直,棱角太硬,真实感不强。

迁都洛阳之后的北魏和唐代,佛教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步伐加快。龙门石窟中的主像,大多成了面貌圆润、慈祥微笑的中国人形象。菩萨像脱胎于中国贵妇和少女。天王、力士像是中国武将的翻版。千姿百态的飞天,更是中国妇女和天使的结合体。他们体态轻盈,长袖翻舞,左顾右盼,神情婉然,充满了运动的旋律,包含着娇柔的风韵。

雕刻家们不但让印度的佛祖穿上中国式的服装,而且姿态和脸型都变了。

在创作手法上,主要用圆雕法,一般不用平直刀法,消除了僵硬的棱角,产生了逼真的写实效果。

第三,综合性。佛教在中国传播时曾产生了许多教派。这些教派的造像在龙门石窟中都能找到。如奉先寺大卢舍那佛是按华严宗的教义雕凿的。看经寺和大万五佛洞是禅宗的产物。西方净土变龛与净土宗有关。千手千眼观音龛、擂鼓台北洞,为密宗所造。属于法相宗的有优填王造像。属于三阶教的有地藏菩萨龛。

各派佛教造像,都有不同特点,但在龙门石窟却能平安相处。

此外,龙门石窟中还有唐玄宗时期开凿的道教天尊造像。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和东王公,也被组进了佛教画面。

二、巩义石窟寺

(一) 位置和开凿经过

巩义石窟寺在今巩义市东北9公里的寺湾村。

石窟寺南临洛河,北依大力山(唐名花笑岭或限山,宋后称大力山)。山的上部为黄上层,厚 4.5 米;下部为岩石层,岩石层露出地面 20 米高,石窟就开凿在岩石层上。

这里往东北不远就是洛河入黄河的河口,往西北 5 公里为黄河重要渡口小平津,自古形势险要。

巩义石窟寺,北魏称希玄寺,唐宋以后称净土寺,清代以来方称石窟寺。

巩义石窟寺始凿于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它是北魏皇室继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之后开凿的第三座石窟,专供皇家礼佛之用。

北魏之后,东魏、西魏、北齐、唐、宋各代亦相继有所开凿和修葺,至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历史。

巩义石窟寺兴盛于北魏后期。唐代又曾繁盛一段,当时所雕小龕,皆有题记。北宋在窟前建有大雄宝殿,并于皇祐年间在石雕佛像外部进行泥塑。明代万历年间又对佛像加以粉妆。虽显得臃肿,但却保护了佛像。1973 年,考古工作者对石窟进行分区编号,剥去佛像上的泥塑,才使其露出北魏时的本来面貌。

由于洛河泛滥,巩义石窟寺曾遭泥沙淤埋,它北宋以前的地面,约在今地面 1.4 米以下。近代以来又曾遭到盗凿,被盗珍品,大多藏在日本,少数藏在美国。

(二) 主要内容

巩义石窟寺现存五个大窟、三尊摩崖大像、一个千佛龕和 328 个历代造像小龕。全石窟寺共有造像 7743 尊,造像题记和其他铭刻 186 篇。

整个石窟寺分东、中、西三区。西区二窟,东区三窟,中区为北齐所凿 40 个小龕。

除第二窟在北魏时凿出窟形后,未经雕像即废弃,到东魏时才开始在里面继续雕凿外,其余四个大窟和所有三尊摩崖大像都是北魏

雕成的。窟中虽然盗损严重,但礼佛图、飞天、伎乐、神王、异兽等保存完整,雕刻精美,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北魏服饰、乐器、神话等的宝贵材料。千佛龕和小龕为北魏以后增凿,以唐代为多,是研究唐代雕刻的重要资料。

第一窟规模最大,正方形,高宽各6米。中心有一方柱,方柱四面佛龕内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佛座下为蹲伏的披毛狮子。方柱基座四周雕力士、神王。方柱上端雕有莲花、彩铃、飘带等组成的帐幔。窟内四壁上部刻千佛龕。南壁窟门内两侧各刻三排帝后礼佛图。窟顶雕方格平棋,方格内雕飞天、莲花、化生、卷草等。

第二窟由于岩石裂缝较多,不宜雕像,北魏时将中心柱雕出轮廓后即放弃。窟内佛像多为唐代所凿。中心柱南面的佛龕上刻一佛、二弟子、二菩萨,皆立于莲花或莲蓬上。

第三窟长宽各5米,布局与第一窟相似。中心柱西面龕下刻有罕见的双面神王。南壁窟门内两侧各有礼佛图三排。四壁下部为怪兽或伎乐人。窟顶为方格平棋,方格内雕有飞天、化生、莲花。

第四窟与第三窟相似。南壁左右两侧有帝后礼佛图。平棋保存完整,彩色可见。窟内地面刻有与平棋相应的图案。

第五窟形制最小,无中心柱。窟高3米,长宽各3.2米。东、西、北壁各雕大佛龕一个,内刻一佛、二菩萨、二弟子像。窟门两侧雕九级佛塔,每级皆有佛像。窟顶为莲花藻井,有六个飞天。地面刻有图案,与藻井相应。窟外有北魏普泰元年(531年)一位佛弟子的造像记。这是巩义石窟寺年代最早的石刻题记。

千佛龕凿于唐代乾封年间(666—667年),又称“千佛洞”。共有999个小佛,加中央一座较大的坐佛,计1000尊。

(三) 艺术特色

巩义石窟寺虽然规模比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要小,但布局谨严,内容丰富,雕刻精美,艺术特色鲜明,其地位不在云冈、龙门之下。

采用中心柱是巩义石窟寺的一个重要特点。除第五窟由于较小，未雕中心柱外，其余四窟中央都有中心柱。中心柱很大，呈方形，四面皆雕有大型佛龕。

雕中心柱的原意是由于这里崖层裂纹较多，用方柱以防塌顶。但艺术家们却利用中心柱四周雕出了大量精致的作品，反而更增加了石窟的造像面积。

而龙门石窟中没有一个窟有中心柱。

雕有多幅帝后礼佛图是巩义石窟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五个窟中有三个窟有礼佛图，这为国内其他石窟所罕见。

礼佛图是巩义石窟寺的优秀作品。第一窟六幅，今皆存。第三窟原六幅，今存二幅半。第四窟原八幅，今存五幅半。以第一窟各幅和第四窟西侧两幅雕刻最精。每幅都是深浮雕，10至20人组成一幅。每幅又分若干组。皇帝和皇后的礼佛队伍，每支都由三幅或四幅画面组成。皇帝头戴通天冠加冕旒，前有比丘导引，后有太子、王公重臣及侍从。皇后头戴莲花冠或菩萨冠，前有比丘尼导引，后有公主、妃嫔及侍女。仪仗众多，衣冠富丽。有人执扇打伞，有人捧供品、持香炉，前呼后拥。

礼佛队伍都呈行进状态，静穆中富有生动气息。刀法熟练，构图虽然分组，但前后连贯，并无割裂感，彩色隐约可见，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礼佛图人像都为世俗装束，男女主从皆挺腹拱背，线条简练概括，面貌各异其趣。

设计周密，构思精巧是巩义石窟寺的第三个重要特点。

北魏皇室崇信大乘佛教，故巩义石窟寺多大乘佛教题材，内容主要以《妙法莲华经》为依据，多表现三世佛和千佛。

每一窟都是精心构思的完整的雕刻艺术整体。各窟开凿前都经周密设计，窟内各壁皆有构图重心，迎门中心柱佛龕是全窟中心。窟

型、规模、外观立面、窟内壁面、中心柱、平棋、地面都经过认真构思。

窟中总体构图由若干大小、形状、内容不同的小面积构图组成，并注意利用自然光照产生的明暗阴影来突出主题。

每龕中佛像以尺寸大小表示主次关系。佛最大，菩萨次之，弟子再次之。佛在正中，左右雕像对称。龕内各像都是圆雕，活泼多变。

巩义石窟寺中的佛像，大多为坐像。面貌方圆，削肩长颈，衣裾下垂盖在膝前。头稍前倾，双目下视，面容慈祥，嘴角略带神秘的微笑。衣纹富有韵律感。

菩萨全为立像，面貌沉静，微笑而少神秘。

飞天体态优美，都有强烈的飞翔感。

金刚皆头大肩宽，体形粗壮，勇武有力。

佛和菩萨雕像，形体、面貌、衣纹虽然都有一定程式，但富有细节变化。五官配置近似童年人，形成肃穆庄严气氛。每像都有笑容，而笑容并不雷同。他们优美端正的姿态，宁静高雅的神情，相互融洽画龙点睛的刀法，都很突出。

特别应指出的是，除帝后礼佛图外，巩义石窟寺中的伎乐、神王、异兽等浮雕，也是其他石窟中少有的。伎乐与礼佛图一样，体态面貌有较多的写实成份。神王指风神、河神、山神、火神等，异兽指狮、虎、龙、象等，皆奇形怪状，有的还长着两鼻两口、三只眼睛。多取材于中国神话传说，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巩义石窟寺造像风格与龙门相近，与云冈不同。深目高鼻的雕像都被面容丰润的雕像所取代，表明佛教艺术进一步民族化。

三、陵园石雕

（一）宋陵石雕

宋陵是北宋历代皇帝、皇后的陵墓。位于巩义市，以芝田为中心，

周围三十公里。为中国古代巨型陵墓群。

宋陵的每个陵区,都有各种大型石雕。过去散失很多,至今尚有800多件。主要集中在各陵神道两旁。为我国现存最大的宋代石刻造像群。

宋陵每个帝陵和后陵前面的石雕数目是一样的:望柱一对,大象和控象人各一对,瑞禽一对,角端一对,马和控马官四对,虎二对,羊二对,客使三对,武臣二对,文臣二对,狮一对,武士一对,宫人(太监)一对。

望柱即华表,为八棱形。帝陵望柱刻翔龙,后陵望柱刻丹凤和牡丹。柱础皆为莲花形。

大象上身粗壮,四腿如柱。象齿翘起,长鼻下垂。背披锦绣,神态温顺。控象人双手贴胸,似在行进。

瑞禽形象奇特:马首、龙身、鹰爪、孔雀尾,并长有双翼。俗称“马头凤”。立于山峰,正欲奋飞。

角端,又称獬豸,即独角兽。头大体胖,鼻上长着独角,仰头怒吼。

四对骏马,鞍鞴华丽,项有銮铃。控马官衣冠整齐,等命待发。

四羊四虎,姿态同中有异。羊多作卧姿,头微仰,角向后弯。虎皆后蹲,口微张,前足挺直。

由于各国各族客人的相貌不同,故宋陵所雕客使形象各异。有高冠、毡巾,也有虎头巾和布帛缠绕的;有浓须深目,也有脸色圆润的;有穿鞋穿靴,也有赤足的;有戴耳环,也有挂犀角、小刀的,皆为历史事实的写照。

文臣武将皆穿朝服,文臣持笏板,武将抚宝剑。

石狮,全宋陵今存140多只,造型多变,刻工精细。有背披锦,项悬铃,正在行进中的;有前立后蹲,张口卷毛的。

武士戴盔披甲,抚剑、持钺。皆体态魁伟,神情严肃。

宫女皆苗条削肩,面目秀丽,有的垂手,有的手持球杖。

宋陵石刻,气势恢宏。由于处于旷野,背景为墓冢和山峦,故皆设计得厚重高大,与环境相协调。雕刻细致,技法熟练,注意以神写意。整个石刻群充满生气。

(二) 潞王坟石雕

潞王坟是明代万历皇帝的弟弟潞简王朱翊鏐的坟墓,位于新乡市北 15 公里凤凰山南麓。

墓区周围以青石筑墙,墓室用青石砌成拱券形。

墓前神道上,有刻有各种图案的汉白玉石坊、墓表、石象、石狮、石麒麟、狻猊、虎、羊、骆驼、獬豸等。雕刻精细,栩栩如生。

墓冢前供案上,有石雕花瓶、香炉、烛台等。

潞简王墓西为其次妃赵氏墓,享殿后石坊上刻梅、竹、荷、牡丹等图案,雕刻技艺精湛。

潞王坟主要建筑和陈设皆为石制,堪称石刻艺术馆。

(三) 袁林石雕

袁林即袁世凯墓,位于安阳北郊,在原袁氏私邸“养寿园”附近。

袁世凯墓系北洋政府所建,费银 73.2 万元。

神道前端有六棱望柱,上刻苍龙、猛虎、长尾猿、五彩雉、山川流水、日月星辰。神道两旁有石雕文武官员、马、虎、狮子等。

墓台为钢筋水泥,墓前有雕刻精致的巨型石供桌、石香炉等。

第四节 工艺美术

中原工艺美术,青铜器、陶瓷等门类,在有关章节已述及。这里主要记述南阳玉雕、烙花、济源盘砚及开封汴绣的流传和生产情况。

一、南阳玉雕

南阳玉雕是利用独山玉为原料雕刻成的艺术品。

独山位于南阳市北郊,玉石材料丰富,自古以来就有开采。所产玉质地细腻,光泽好,硬度大,有赤、橙、黄、绿、青、蓝、紫等 30 多种色彩,适宜制作各种工艺品。

南阳玉雕历史悠久。1959 年,在南阳市区北部的黄山新石器遗址中曾出土用独山玉雕成的玉铲和玉凿,距今已有 5000 多年历史。

汉代南阳玉雕得到进一步发展。以后,玉雕逐渐成为南阳著名特产之一。

建国前,南阳玉雕主要为手工劳动,一般为前店后作(作坊),产销结合。建国后建成玉器厂,手工操作被机械生产所代替。

主要玉雕品为人物、花卉、鸟兽、炉薰等一百多个品种。

人物多取材于古典小说和神话故事,如天女散花、嫦娥奔月、黛玉葬花、贵妃醉酒等,精采生动。

花鸟多取吉祥意,如百鸟朝凤、松鹤延年、喜鹊闹梅、孔雀牡丹等,生趣盎然。

五环炉,雕镂精细,造型美观。多层转球花薰,玲珑剔透,巧夺天工。所雕兽类,骨骼肌肉,生动逼真。

此外,还有传统的玉镯、烟嘴、餐具、酒具、戒指、如意等。根据玉石的不同色彩形状,灵活制作,随宜赋形,都有很高的艺术效果。

南阳玉雕畅销日本、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英国、瑞士等 32 个国家和地区。

二、南阳烙花

烙花是南阳著名的工艺美术。它以带有温度的铁笔,在木、竹、纸、绢等物上烙烫出各种风韵独特的图画,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厚的地方色彩。

烙花起源于清朝光绪年间。最初只以粗细不同的铁丝制成各种型号的铁笔,用油灯加热进行烙制,画面多为花鸟虫鱼,产品为烙花尺子、筷子、木梳、手杖等。建国后,烙花工艺有了很大发展。铁笔改用通电加温,由“灯烙”变为“电烙”,烙烫技术更为完善。产品已达 70 多个。还创造了“套色烙花”和“填彩烙花”新工艺。

烙花效果类似绘画中的白描,呈茶褐色,古朴大方。烙板、烙纸、烙绢等,皆惟妙惟肖。

传统产品冬青木烙花筷子,畅销欧美、东南亚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量近 80 万把。筷子上所烙作品有卧龙岗全景图、百子图、人民大会堂等。(不是每双筷子烙一幅画,而是一把筷子拼起来烙一幅画)

烙板画著名的有动物画《八骏图》、山水画《黄河三门峡》、人物画《红楼梦故事》和各种古字画的仿制等。

烙纸画著名的有《清明上河图》、《江天楼阁》、《长城》等。它是把烙板工艺用到纸上,可以卷之成轴。

还能烙制茶叶盒、烟盒、笔筒等精美艺术品。

南阳烙花,有的存于人民大会堂,有的销售国内外,深受各界人士好评。如用套色和填彩烙制的画屏,远销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巨幅烙板填彩画《红楼梦大观园图》和烙纸挂屏《清明上河图》等,已成为我国宝贵的艺术珍品。

南阳烙花在国内外久享盛名,南阳被誉为“烙花之乡”。

三、济源盘砚

盘砚是中原历史名砚，因产于盘谷而得名。它为我国古代四大名砚之一。

盘谷位于豫西北济源市境内的王屋山中。唐朝大文学家韩愈的著名散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就是写的这个地方。

相传轩辕黄帝曾在王屋山主峰顶上建筑祭天的天坛，盘砚的砚石就产于天坛附近，故又称天坛砚。

盘砚在唐代就受文人重视。韩愈《天坛砚铭》云：“儒生高常与予下天坛，中路获砚石。似马蹄形，外棱孤耸，内发墨色。幽奇天然，疑神仙遗物。宝而用之，请予铭焉。铭曰：仙马有灵，迹在于石。棱而宛中，有点墨迹。文字之祥，君见其昌。”

盘砚石质坚柔，文理细密，温润凝重，精美大方。用以磨墨，经久不干。砚石好者，晶莹如玉。

清代纪昀评盘砚说：“石出盘涡，阅岁孔多，刚不露骨，柔足任磨。”

建国后，济源建有专门生产盘砚的工厂，根据不同形状的砚石，精心雕琢成各种形状的盘砚，如马蹄形、竹节形等，并在上面刻丹凤朝阳、海天旭日等图案，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传统工艺品。

四、开封汴绣

汴绣是开封刺绣工艺品的总称。起源于宋代，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北宋时期，为了供应皇室和百官需要，在开封设有官办文绣院一

所,招刺绣工 300 人,又从全国各地选拔技术高超的刺绣匠人到开封,指导他们从事刺绣生产。

北宋开封妇女多从事刺绣。相国寺东门外有一条街,名叫绣巷。寺庙的尼姑,也是绣品的重要生产者。相国寺每月定期进行商品交易,专门辟有绣品市场,供“诸寺师姑卖绣作”。

北宋开封酒楼挂“珠帘绣额”,富人穿“锦绣之衣”(《东京梦华录》),此外,还有绣帽、绣伞、绣扇、绣毯等,刺绣品被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

北宋汴绣具有很高艺术水平。明代张应文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丝只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采夺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宾啜之态。佳良较画多盛。”(《筠清轩秘录》)

建国后,汴绣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为了增加画面立体感,绣工们创造了滚针、练针、绳针、别针、发针、双合针、蒙针、游针等手法。所绣人物、花卉、山水、金鱼等都表现了很高的艺术技巧,尤其是开封汴绣厂所绣张择端名画《清明上河图》,可谓汴绣一绝。

第八章 中原表演艺术

表演艺术是指必须通过演员的表演才能最后完成的艺术。

表演艺术是一种时间艺术,需要在时间流动过程中塑造艺术形象。人们在时间推移过程中,通过欣赏演员的表演,了解艺术作品的内容。

中原表演艺术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音乐、舞蹈、戏曲、曲艺等。

第一节 音乐

音乐是通过乐音表达人们思想感情的艺术。它是在原始人类进行劳动时的呼唤声中萌芽起来的。

音乐一般可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它的基本表现手段为旋律和节奏,又常跟诗歌和舞蹈等结合在一起。

中原历史上音乐文化发达,而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一、先秦音乐

(一) 原始音乐

中原音乐,起源很早。原始社会,已有打击乐器和吹乐器。

1987年，在河南舞阳县贾湖村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16根骨笛。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乐器。

骨笛皆为七孔，系用猛禽腿骨精制而成，形式固定，制作规范。一般长度约20厘米，直径1厘米，具有音阶结构。其中一支长22厘米，至今仍可用它吹奏五音阶曲子《小白菜》。

这些骨笛，比埃及发现的古笛要早2000年。当时能制造出这样完美的乐器，说明那时中原的音乐已经相当成熟。

（二）商代音乐

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殷代大墓墓主椁室的西侧，出土有女性骨架24具，骨架旁有乐器和三个小铜戈。表明这些妇女是为墓主殉葬的“女乐”。小铜戈是她们的道具。

1950年在安阳武官村殷墓还出土有虎纹大石磬。石磬为鱼形，上面雕有虎形图案。虎为线刻，张口卷尾，作匍匐状，形象生动。磬上有穿孔，系悬挂之用。石磬制作精美，纹饰瑰丽，声音悠扬浑厚。长84厘米，高42厘米，厚2.5厘米，为稀世珍宝，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磬。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殷墓出土有编钟和三个殉葬的乐手。

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墓出土有商代的五音孔埙。它为圆形，上尖，底平，腰粗，形如鸭梨。顶端一孔，两侧各二孔。可以吹出七声音阶和部分半音。

埙是在原始社会就已发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但仰韶文化时期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商代变为五个音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埙的这种形制一直沿用到清代。

作为重要打击乐器的鼓，在中国音乐史上曾产生重大影响。它最初也是在中原产生的。

1935年，安阳殷墟曾出土一面蒙有蟒皮的粗腰木腔鼓。还出土了一面商代双鸟饕餮纹铜鼓。铜鼓是按照皮膜木腔鼓的形状铸成的，

鼓上有尾巴相对的两只鸟，鼓下有四短足。铜鼓现存日本。

（三）周代音乐

《诗经》不仅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周代音乐中的歌词，是一部未能传下乐谱的歌曲集。

《诗经》中中原的风诗特别多，说明西周和春秋时期，中原的民间音乐特别发达。

《诗经》的曲调虽已失传，但今天人们仍能从诗句中隐约探索出当时歌曲的结构形式。如有的歌在主题曲前有引子，有的歌在主题曲后有尾声，有的歌在每个乐章后有相同歌词的副歌等。

春秋时期，中原最有影响的音乐是“郑声”和“卫音”，合称“郑卫之音”。它们都是郑国和卫国新兴的民间音乐。

当时的郑国和卫国，社会繁荣，经济发达，思想解放，改革力度较大，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较快。因而郑国和卫国新兴的民间音乐，都生动活泼，充满青春活力。这在《诗经》的《郑风》和《卫风》等歌词中还能清楚看出来。

“郑声”以柔美著称，季札曾称它：“美哉，其细已甚。”（《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卫音”以“趋数”见长，即节奏明快。它们都是当时艺术性最强、感染力最大的音乐。魏文侯曾对子夏说：“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礼记·乐记》）《史记·货殖列传》也说：“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揄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说明这些歌舞之乡的艺人，对外是颇具诱惑力的。

战国时期，中原各国音乐都很发达。韩国的民间女歌唱家韩娥，路经齐国，在临淄雍门卖唱求食。她哀歌一曲，老少为之悲泣，三天后还吃不下饭。于是派人把她追回来，又唱了一首快乐的歌曲，大家的心情才高兴起来。人们听了韩娥美妙的歌声，三日之内都感到她的余音在房梁间缭绕。“余音绕梁”这个成语，就是由此传下来的。

战国时期,中原乐器也很进步。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有十八弦锦瑟。

二、汉代音乐

(一) 中原最早的乐谱

《汉书·艺文志》有《河南周歌诗》七篇和《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的记载。表明汉代除歌词之外,还有“声曲折”存在。“声曲折”就是乐谱。王先谦《汉书补注》云:“声曲折即歌声之谱,唐曰乐府,今曰板眼。”这是中原,也是全国关于乐谱的最早记载。

(二) 蔡邕的音乐成就

蔡邕(132—192年),字伯喈,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曾任议郎、侍御史、左中郎将等职。前文已述及。他不但是文学家、经学家、书法家,而且是大音乐家。

为逃避宦官陷害,他曾亡命江湖十余年。这期间,蔡邕曾创作琴曲五首,称“蔡氏五弄”,即《游春》、《绿水》、《幽居》、《坐愁》和《秋思》。

蔡邕精通音乐理论,作有《琴赋》。相传《琴操》也是他著。

《琴操》是汉代的琴曲题解,共著录琴曲四十七首,分别记述它们的作者、创作背景、立意、有关故事和一部分歌词等。这些琴曲共分“歌诗五曲”、“一十二操”、“九引”、“河间杂歌二十一章”四类。

《琴操》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琴学专著,它讲到琴的形制和作用,是了解汉代音乐情况的珍贵文献。

蔡邕还善于制作乐器。一次,他听到吴人烧饭时木材爆裂的声音不寻常,立即将那块木材抢救出来制成琴,果然音响不凡。由于琴的尾部被火烧焦,故称“焦尾琴”(《蔡邕别传》)。至今,七弦琴的尾部仍称作“焦尾”。

（三）蔡琰与《胡笳十八拍》

《胡笳十八拍》相传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前后蔡琰(177—?)参考胡笳的声调而写的琴曲,内容是歌咏作者自己的身世。

蔡琰是蔡邕的女儿,字文姬,东汉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一生遭遇悲惨。前文已述及。

《胡笳十八拍》歌词以蔡琰的口气,先叙自己处于乱世的不幸,被南匈奴俘虏后如何思念家乡,生子后如何对他们疼爱,听到赎她的消息后,如何高兴,又如何舍不得离开孩子;再叙她回汉途中思绪万千的复杂心情,回来后如何思念孩子;最后说明,她如何把胡笳的声调翻为古琴曲调,用以抒发自己的浩大怨气。

《胡笳十八拍》共分十八段。它在内容上反映了蔡琰对家乡的思念和对儿子生离死别的感情。在艺术上它把匈奴的管乐器胡笳和汉族的弦乐器古琴结合起来,促进了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创造了一种结合胡笳与古琴特点的新曲。

蔡琰有特殊经历,与少数民族人士有夫妻、母子感情,熟悉少数民族音乐和汉族音乐,又具有高深的文化艺术修养,所以她表达自己生活感情的《胡笳十八拍》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胡笳十八拍》的音乐已经流传下来了。起伏跌宕,一气呵成。高昂处,琴声激越;低回处,如胡笳哀哀。深沉如渊,奔腾如流,节拍自然而富于变化,为千古绝唱。

（四）琴曲《广陵散》

除《胡笳十八拍》之外,汉代中原还流行琴曲《广陵散》。

《广陵散》为乐器独奏曲,它是我国古代很有名的一部标题音乐。

《广陵散》的名称,最早见于汝南应璩(190—252年)给刘孔才的信:“听《广陵》之清散。”(《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

《广陵散》的内容,在蔡邕的《琴操》中有记载。大意说:公元前四世纪,聂政之父为韩王铸剑,误期被杀。聂政为报仇,用十年时间学得

高超的弹琴技艺。韩王召聂政进宫弹琴，聂政乘韩王听琴，从琴中抽出预先藏好的刀子，将韩王刺死。《广陵散》就是表现这样一个故事。

聂政是战国时轵(今河南济源)人。韩国首都在今河南新郑。这个故事是在中原发生的，故事中的人物也都是河南人。

三、魏晋南北朝音乐

(一) 阮籍的音乐成就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阮咸和嵇康，都是著名的音乐家。

阮籍(210—263年)，字嗣宗，曹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曾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职，中原文学章等已述及。

阮籍著有音乐理论著作《乐论》，主张把音乐作为“使人无欲，心平气定”的工具，攻击“郑卫之风”，不喜欢“歌之者流涕，闻之者叹息”的音乐。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

但阮籍所作著名的琴曲《酒狂》，却与他的理论相矛盾。该曲结构严谨，凝练生动。用跳荡的节奏，扬而又抑，抑而又扬的旋律，生动刻画了作者等人一脚高一脚低，摇摇晃晃的狂放不羁的醉态，反映了司马氏统治下作者心理上的痛苦和压抑。这首天才的曲子，一直流传至今。

(二) 阮咸的音乐成就

阮咸，字仲容，曹魏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阮籍之侄。曾任散骑侍郎、始平太守等职。前文已述及。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晋书·阮咸传》)。工于作曲，所作琴曲《三峡流泉》，唐代还流行。

从晋代人所画的《竹林七贤图》可以看出，阮咸所弹的古琵琶用圆形共鸣箱，直杆，四弦，有柱。所以从唐代起，就称这种乐器为“阮咸”，简称为“阮”。目前，民族乐队中大小不同的阮，也皆以此得名。

（三）荀勖的音乐成就

荀勖(?—289年),字公曾,西晋颍阴(今河南许昌)人。曾任光禄大夫、尚书令等职。前文已述及。

荀勖对中国音乐的贡献,主要在乐器改良上。晋武帝泰始十年(274年),荀勖见当时艺人所用的笛(形如今天的箫),没有一定规格,七个孔位,平均排列,不符合乐律的准确要求,便设计制造了发音准确的十二支不同音高的笛,每支吹奏一个调子。

荀勖制造这十二支笛时,已经使用“管口校正”法。笛的管口校正很不容易,因为笛需在旁边开若干音孔,每一音孔的音高常与其下相邻音孔间距离及各孔大小有关。故它的管口校正比一般单纯开口管难。然而,荀勖根据声学原理,通过计算,找到了符合三分损益律的笛的管口校正规律,制造成发音准确的笛。这是很重大的科学成就。

（四）鼓吹乐的发展

鼓吹乐是以击乐器和吹乐器的演奏为主的一种音乐。击乐器以鼓为主。吹乐器有排箫、横笛、笙、角等。

鼓吹乐在汉代开始流行。到魏晋南北朝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影响,中原鼓吹乐又有进一步发展。河南邓州彩色画像砖墓中有几幅精采的鼓吹乐乐队画像。

一块砖上,画四人,正在行进,步伐一致。前二人吹角,角弯曲成弧形,尾端呈喇叭状,上翘,喇叭口有纓,飘拂向后。后二人打鼓,鼓挎在腰间,边走边打。

另一砖画五人,前二人吹横吹、排箫,后三人吹角和笙篥(现代北方管子的前身),角成弧形,喇叭口由腰间向后弯,也在行进中。

两幅画中的人物穿戴相同,皆戴高帽,穿短衣,似胡人打扮。行进队伍俨然是军乐队的形象。

（五）少数民族歌曲的流行

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民族文化大融合。中原

广泛流行少数民族歌曲。如《折杨柳》歌云：“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蹴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

由于洛阳是鲜卑人所建北魏的首都，所以当时中原歌曲中，鲜卑风味较浓。著名的如洛阳流行的《真人代歌》，讲鲜卑人建国经过和群臣兴废事迹。用丝竹合奏，也用箫鼓。

北魏洛阳开始出现铜锣，当时称为“打沙锣”（陈旸：《乐书》）。

钹原为天竺乐器，北魏时流传到中原民间。《北齐书·神武帝纪》曾提到北魏孝明帝时“洛下以两拔（钹）相击，谣言曰：‘铜拔打铁拔，元家世将末’”。

南北朝时期，中原的歌曲都比较粗犷。当时南方的歌曲，如吴歌和西曲，都比较细腻。这是由当时的生活环境决定的。但中原的歌曲传到南方后，也很受欢迎。陈后主还专门派人到北方学习。

（六）佛教对音乐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中原佛教盛行。为了向群众宣传教义，佛教常利用民间音乐，放进宗教内容。

有些僧人也懂音乐，如《高僧传》卷一三云：“释法愿（414—500年）……颍川长社人。……家本事神，身习鼓舞，世间杂技及蓍爻占相，皆备尽其妙。”

有些宫廷贵族的女乐，年长或主人死了以后，常被迫出家。如北魏高阳王雍有“妓女五百”，“入则歌妓舞女，击筑吹笙，丝管迭奏，连宵尽日”。“雍死后，诸妓悉令入道。”（《洛阳伽蓝记》卷三）这些人出家，壮大了寺院音乐队伍。

洛阳其他寺院也都如此。如汝南王悦“召诸音乐，逞伎寺内，奇禽怪兽，舞扑殿庭，飞空幻惑，世所未睹，异端奇术，总萃其中。”（《洛阳伽蓝记》卷一）

虽然佛教对中原音乐进行了利用，但客观上也对中原民间音乐

起了保护作用。佛教音乐对活跃人民文化生活也起过辅助作用。

四、隋唐音乐

(一) 隋代音乐

隋唐时期,经过魏晋南北朝动乱之后,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统一局面。各种音乐艺术荟萃中原,中原乐坛出现了新局面。

隋炀帝是一个喜爱音乐艺术的皇帝。他曾将全国的音乐艺术分为燕乐、清商、西凉、扶南、高丽、龟兹、安国、疏勒、康国九部,并在每年正月初一到十五日,把各地的音乐艺人集中到洛阳,在皇宫端门外八里长的大街上搭台演出,供官员百姓欣赏。

隋炀帝开运河,中原百姓曾创作民歌《杨柳枝》,控诉徭役繁重。后蜀何光远《监戒录》云:“《杨柳枝》者,亡隋之曲。炀帝将幸江都,开汴河,种柳,至今号曰‘隋堤’,有是曲也。”

《杨柳枝》本是“怨调”,但后来流传开来,并经过加工改造,在中唐时发展为“洛下新声”。白居易说:“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隋代音乐文物,在中原亦多有发现。1959年,安阳隋张盛墓曾出土有乐俑六个,皆作跪地吹、弹乐器姿势。

(二) 唐代音乐

唐代主管音乐的机构是教坊,由朝廷直接派人管理。教坊的业务有歌,有舞,有散乐,所属成员有男有女。唐玄宗时,教坊有五处,三处在长安,两处洛阳。可见唐代中原也是全国重要的音乐中心。

唐代的“梨园”有三个,两个在长安,一个在洛阳(称“梨园新院”)。梨园是教练宫廷歌舞艺术的场所。洛阳梨园主要演奏一般俗乐,有1500人。

唐玄宗是中国古代皇帝中的大音乐家,会作曲、演奏、指挥。所作《霓裳羽衣曲》是历史上有名的大型乐曲。

据《杨太真外传》注云:“《霓裳羽衣曲》者,是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所作也。故刘禹锡有诗云:‘伏睹玄宗皇帝《望女儿山诗》,小臣斐然有感:开元天子万事足,惟惜当时光景促;三乡驿上望仙山,归作《霓裳羽衣曲》。’”

女儿山在洛阳南面的宜阳县境内。女儿山的美景,启发了唐玄宗幻想仙境的音乐思维,从而创作了《霓裳羽衣曲》。该曲包括“散序”、“中序”、“破”三部分,共36段,常在长安和洛阳演出。

唐玄宗还在洛阳举行过声乐比赛。

唐代,中原民间音乐很发达。元稹《立部伎》诗云:“宋晋郑女歌声发,满堂会客齐喧歌。珊珊佩玉动腰身,一一贯珠随咳唾。顷向圜丘见郊祀,亦曾正旦亲朝贺。太常雅乐备宫悬,九奏未终百僚惰。愆滞难令季札辨,迟回但恐文侯卧。”宋、郑皆属今河南。说明生动活泼的中原民间音乐比听后昏昏欲睡的官方雅乐,更受大家欢迎。

唐代中原最有名的民间音乐节目之一是《踏摇娘》。

《踏摇娘》是反映妇女社会地位的作品,具有完整故事情节。内容是说北齐时期,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地区有一个姓苏的男人,大鼻子,相貌很丑,又好喝酒,实际并未做官,而自号“郎中”。每当酒醉而归,就要殴打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长得很美,而且善于唱歌。她受了丈夫殴打,就自编自唱歌曲,倾诉自己的怨苦之情。后来,当地人将她唱的歌曲配上乐器,进行表演。由于她唱歌倾吐自己的悲哀时,边走边唱,边摇晃身体,故称《踏摇娘》。逐渐在黄河以北流传开来。

《踏摇娘》表演时,有歌,有舞,有伴奏,还有众人帮腔。起初由男人扮妇人表演,后来用妇人表演,逐渐发展为唐代著名的歌舞节目。

五、宋代音乐

(一) 市民音乐的兴起

北宋时期,工商业发展,城市居民增多,市民音乐兴起。

开封的几个瓦子中,大的勾栏能容数千人,观众场场爆满。

表演场所还发展到大街上。《清明上河图》上有一处说唱画面。说唱地点就在大街旁边的店铺门口,表演的人坐着,周围有十几个人在听,都站着,没有座位。街上的行人照走。

开封市场上小贩的叫卖声,都被艺人编成歌曲传唱。高承《事物纪原》云:“京师(开封)凡卖一物,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采其声调,间于词章,以为戏乐也。”

这种情况起源于北宋至和、嘉祐年间,称为“叫果子”、“紫苏丸”,最长的有十段,故称“十叫子”。

除开封外,其他城市的市民音乐也有所发展。如归德(今河南商丘)城南临汴河处,就专有河市乐人。

(二) 清唱歌曲

北宋中原流行一种清唱歌曲形式,叫做“唱赚”。

“唱赚”包括“缠令”、“缠达”两种。“缠令”由若干曲调连接而成,前有引子,后有尾声。“缠达”只有引子,引子后用两个曲调轮流重复演唱。

“唱赚”有鼓、板、笛伴奏。《事林广记》有一《唱赚图》:表演者三人,一男子吹笛,二女子一人击鼓,一人拍板。众人静听。唱者为击鼓的人。

“唱赚”表演的是宋代最高水平的艺术歌曲,演唱难度较大。

(三) 说唱音乐

北宋时期,中原说唱艺术有了迅速发展。它的门类主要有“鼓子

词”、“诸宫调”、“陶真”等。

“鼓子词”只用一个曲调。流传至今的北宋开封赵令畤所作《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是其代表作。内容是叙述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全篇由说白和唱词相间构成，共轮流十二次。曲调只《蝶恋花》一个，要反复唱十二遍，比较单纯。表演时有唱者、伴唱者、伴奏者，至少要三人。

“诸宫调”创始于北宋开封瓦子勾栏中的民间艺人。《都城纪胜》云：“‘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东京梦华录》曾有关于“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的记载。

“诸宫调”为大型长篇说唱音乐，其结构是由不同宫调的乐曲连缀而成，各曲间插有说白。但它不像“鼓子词”那样只用一种曲调，而是由几种不同宫调的乐曲组成，能表现复杂的故事和场面，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平。

“诸宫调”是起源于开封的音乐形式，而流播宋境，连西夏也流行。

“陶真”是明清弹词的前身，说唱者多为男女盲艺人。它起源于开封附近的农村，也为农村大众所喜爱。

“陶真”以琵琶伴奏，歌词多为七字句，比较通俗。

作为北宋“汴京遗俗”（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〇）的“陶真”，明清时还在全国许多地方流行。

（四）少数民族歌曲

北宋中原，少数民族歌曲亦甚流行。宋曾敏行《独醒杂志》云：“先君尝言：宣和末，客京师，街市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

六、元明以来音乐

(一) 戏曲音乐的发展

元明以来,中原戏曲音乐得到高度发展,而传统的歌舞音乐渐居次要地位。当时,中原的音乐艺术水平,主要表现在戏曲音乐上,歌舞音乐更多地被吸收在戏曲音乐中。

杂剧在宋代已成为独立的艺术。到元代,杂剧已成为当时音乐艺术的主要载体。杂剧由曲、宾白和科三部分组成。宾白是语言部分。明姜南《抱璞简记》云:“两人相说曰宾,一人自说曰白。”科是“科范”的简称,是动作部分。而曲就是歌唱部分。

明清时期,中原出现了许多地方戏曲。它们都是包含歌唱、说白和舞蹈等多种艺术因素的综合艺术形式。

在这些地方戏曲中,以梆子戏最有名。梆子戏是在北方民间曲调基础上产生的,因以枣木梆子击节伴奏而得名。

一般认为,最先形成的梆子是陕西梆子。它又有西路和东路之分。《甘肃调》与陕西西部民间音乐结合形成西路梆子,与陕西东部民间音乐结合形成东路梆子。陕西东路梆子传到河南,与河南民间音乐结合形成河南梆子。河南梆子高亢激越,具有莽莽苍苍的气概。

(二) 流行小曲

明代中原,民歌小曲空前繁盛。民歌小曲最初大多产生于农村,后来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受到城市艺人的加工利用,并演变为城市流行小曲。

明沈德符(1578—1642年)《万历野获编》卷二五云:“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琐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

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属。”

当时,许多文人也很喜爱民歌小曲。李开先(1502—1568年)《词谑》记载何景明对《琐南枝》的态度说:“何大复继至汴省,亦酷爱之,曰:‘诗词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

明代有些小曲并不短小,如关于林冲夜奔的一曲《劈破玉》,有四拍子二百几十个小节,可唱颇长一段时间。这些民歌小曲皆属北方小曲风格。

(三) 弦索调

弦索调是明代中原的一种新兴音乐。它是在明太祖洪武年间,由中州藩王府里的乐工们创作出来的。在创作过程中,可能受到了北方民歌的影响。

弦索调是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进行演唱的曲调。曲调的名称,有些在杂剧和散曲中也有,但唱法却与杂剧和散曲不同。

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中原弦索调经乐工顿仁传到北京。嘉靖年间(1522—1566年),又经因罪谪发太仓的北方士兵张野塘传到太仓。在那里受到昆曲名家魏良辅的推崇,很快流行江南,并分为太仓、苏州、嘉定三派。

弦索调传到南方之后,逐渐南音化,已跟中原原来的弦索调有所不同。沈宠绥《度曲须知》说:“至如弦索曲者,俗呼为北调,然腔嫌袅娜,字涉土音,则名北而曲不真北也。”

明代中原,演奏乐器的能手,有洛阳张雄的琵琶,开封常礼和归德(今河南商丘)林经的筝等。

(四) 朱载堉与十二平均律

朱载堉(1536—约1610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沁阳(今属河

南)人。明郑恭王朱厚烷之子。早岁从舅父何瑋学习天文、数学。后因父系狱,自己筑室宫门外,独居十年,钻研数学、天文和律学。前文已述及。

朱载堉在音乐方面的重大贡献,是发明了律学上的十二平均律。西周时,中国已认识十二律和七音阶。十二律即将一个八度音程分为十二个半音的律制。

十二律名称由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春秋时,开始用三分损益法确定管弦乐器发音高低。但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中每律间频率差不相等(即只能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音程不完全相等的半音),实为十二不平均律,不宜进行“变调”及和声演奏。朱载堉经过精密计算和科学实验,创造了十二平均律(又称“十二等程律”或“新法密律”),并将其理论写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以前所著的《律学新说》中。朱载堉将八度音程值开12次方,使十二律构成以 $\sqrt[12]{2}$ 为公比的等比数列,于是将八度音程平均分为12份,使十二律中每律间频率差相等,故称十二平均律。

朱载堉利用等比级数平均划分音律的做法,是音乐史上划时代的发明,近代键盘乐器和竖琴等皆用12平均律定音。朱载堉的创造比欧洲威尔克万斯特的同类发明早了一百多年。

第二节 舞 蹈

舞蹈是人体动作的艺术,借人体运动,表达思想,抒发感情。

舞蹈包括表情、节奏、构图三个基本要素。它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具有认识、审美、教育等功能。

中原地区具有丰富的舞蹈文化传统。

一、先秦舞蹈

(一) 原始舞蹈

原始社会时期,中原先民,为了表达思想感情,常进行一些模仿劳动的舞蹈。这种舞蹈,在劳动之前,是对将要从事的劳动的练习,如在劳动之后,则反映了劳动带来的欢乐。

中原地区是传说中伏羲、女娲和黄帝的故乡。相传伏羲氏有舞名《凤来》,女娲有舞名《充乐》。这些舞蹈,歌颂伏羲氏发明网罟,教民捕鸟捉兽和女娲制定婚嫁制度的业绩。黄帝以“云”为图腾,其图腾舞蹈名为《云门》。

这些都是原始形态的舞蹈。

(二) 夏代舞蹈

夏代,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阶级产生,中原出现了专业舞蹈人员。当时的舞蹈,主要用于祭祀,也用于宫廷娱乐和对臣民的教育。

夏代国家祭祀舞蹈,最主要的是《大夏》,内容是表现夏禹治水的业绩,传为皋陶所作。

(三) 商代舞蹈

商代中原舞蹈,有了进一步发展。

甲骨卜辞中,现已发现一百多条关于舞蹈的记载。主要用于祈雨,也用于祭祀、驱傩等。

甲骨文中的“舞”字,为一正面双手持相同舞具而舞的形状。其舞具大约主要是羽毛制品,也有盾、鼓,或其他乐器。

商代祭祀舞蹈,有名的除相传为伊尹所作的《大濩》(颂扬汤灭夏桀的功绩)外,还有《隶舞》、《皇舞》、《羽舞》等。

(四) 周代舞蹈

周代中原舞蹈,大致分为文舞和武舞两类。文舞是雅舞,舞者手

执羽(雉鸡尾)旄(牦牛尾)而舞,主要用于祭祀。武舞又称“干戚舞”,舞者手执干(盾)戚(斧)而舞,主要用于朝会和节庆。

舞蹈是周代青少年上学时的必修课。

河南禹州市出土有西周时期的青铜面具一副。面具高15厘米,宽18厘米,形状和普通人的脸型一样,为当时表演傩舞者所佩戴。这是国内罕见的周代舞蹈遗物。

傩舞是古代傩祭仪式中的一种舞蹈,用于驱逐鬼疫。傩舞表演的主要特点是演员都要戴假面具。表演风格比较粗犷强悍。傩舞后来发展为娱乐性的民间舞蹈,至今在南方的许多省份仍广泛流行。

周代民间舞蹈常在空旷的高地上举行。《诗经·陈风》云:“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露漙。”说明在公元前七世纪,河南淮阳一带的老百姓常在宛丘击鼓、执羽,举行舞会。

春秋战国时期,今河南商丘一带已经有人善于踩着高跷进行跳舞。《列子·说符》云:“宋有蓝子者……其技以双枝长倍其身,属其胫,并驰并驱,弄七剑。”这是中国有关高跷的最早记载。

高跷从那时一直流传到现代。后来的高跷,多男女对舞,也常成舞队表演,几人、十几人不等。有的跷高达2.5米,技术性很强。

二、两汉南北朝舞蹈

(一) 汉代舞蹈

汉代,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中原社会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繁荣的经济,促进了舞蹈的发展。

汉代舞蹈艺人,在跳舞时,有的挥舞长袖,有的手持武器,有的打击乐器等。或在音乐伴奏下跳舞,或边唱边舞,形式各异。

挥舞长袖的舞蹈有《长袖舞》等。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幅长袖舞画面。画中一细腰女子,正挥动长袖而舞。只见她双臂斜伸,

一手向上，一手向下，正在做跳跃的动作，舞姿优美，体态袅娜轻盈。她旁边，一人在吹箫，一人在击鼓，神情都很专注。

手持武器的舞蹈有《剑舞》等。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有一幅关于鸿门宴的画像，就生动地展现了汉代剑舞的场面。画中项羽神态傲慢，按剑而坐。刘邦表情谦逊，戴冠坐在席上。项庄正持剑起舞，怒目竖眉，充满杀机。项伯一边以身体掩护刘邦，一边拱手请与项庄共舞。

打击乐器的舞蹈有《鼗舞》等。鼗是一种有柄小鼓，鼓的两侧系有击珠。艺人执柄摇击而舞。此外，还有边击建鼓，边作舞的双人《建鼓舞》等。

汉代最精采的舞蹈之一是盘舞。盘舞是一种踏在盘子上表演的舞蹈。表演时将盘子(一般为七个)按一定规律放在地上，舞者在上面来回跳舞。

南阳许阿瞿墓出土的汉画像石，有关于盘舞的画像。画中一个女子梳双髻，舞长袖，双足在盘上，翩翩起舞，姿态美妙，形象生动。

盘舞的动作难度大，风格为优美典雅与热情奔放相结合。它常和百戏中的弄丸、跳剑、走索等同时演出，并有大型乐队伴奏。它不但表现舞容，而且追求舞蹈意境。

汉代中原还流行少数民族舞蹈。

东汉时，有的皇帝好“胡舞”，所以京都贵族皆模仿。班固曾在《东都赋》中描写“四夷”乐舞齐集洛阳表演的盛况。中原出土的汉画像石中，也有胡人表演舞蹈的形象。

汉代中原流行的少数民族舞蹈，主要有“西南夷”的《羽舞》，“北夷”的“干舞”，“东夷”的《矛舞》，“西夷”的《戟舞》等。

(二) 南北朝舞蹈

南北朝时期，佛教舞蹈盛行，是当时中原舞蹈艺术的一个新特点。

洛阳龙门石窟中，北魏时期开凿的古阳洞中的伎乐天、飞天，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原民间舞蹈的风貌。

这些飞天,一般皆下着长裙,上身半裸,佩有很长的飘带,展示各种舞姿。她们或回首拂袖,或曲膝半跪,或从云海中慢慢落下,皆体态优美,形象秀丽,表情生动。

南北朝时期的寺院里,还常有舞蹈表演。据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北魏洛阳的景乐寺,在大斋时,“常设女乐,歌声缭绕,舞袖徐转”,“得往观者,以为天堂”。

三、唐宋舞蹈

(一) 唐代舞蹈

唐代中原盛行剑舞。既可健身,又能抒情。舞起来,动作英武,韵律优美,刚健明快,矫捷多姿,很有神采和气派,令人叹为观止。杜甫名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就是描写河南临颖一位女舞蹈家精彩表演的。诗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燿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青光。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临颖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这首诗,至今脍炙人口。

此外,一些舞姿飘逸,动作优雅柔婉的舞蹈,在唐代中原也颇为流行。

五代时期,在洛阳建都的后唐庄宗李存勖,酷爱歌舞,常跟演员一起粉墨登场,并把不少演员都封为大官。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曾专门为此写了一篇《伶官传》。

(二) 宋代舞蹈

宋代是中原舞蹈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当时在首都开封演出的主要是宫廷舞蹈队和民间艺人。

宫廷舞蹈队分小儿队和女弟子队两种。小儿队包括柘枝队、婆罗

门队、醉胡腾队、异域朝天队等。小儿队的演员多为十几岁的男孩。女弟子队包括菩萨蛮队、佳人剪牡丹队、采莲队、彩云仙队等。女弟子队皆由妙龄少女组成。宫廷舞蹈队演出的节目，一般都分几个段落，有些还具有一定的故事情节。

开封的民间舞蹈艺人，主要在瓦子里演出。瓦子，又称“瓦舍”，是宋代开封新兴的一些固定的文艺表演场所。这些瓦子，遍布东西南北四城，著名的有桑家瓦子、中瓦、里瓦、朱家桥瓦子、州西瓦子、州北瓦子等。以城东靠近大商业区的瓦子最大。

瓦子中又按不同专业分成若干表演棚，叫做勾栏。有的瓦子中，勾栏多至50余座。瓦子内的艺人以卖艺为职业，观众主要是市民阶层。

瓦子里演出的节目，除舞蹈外，还有说唱、杂技、影戏、傀儡戏、杂剧等。观众很多，“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东京梦华录》卷五）。

瓦子勾栏的出现，是宋代中原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也曾对歌舞等表演艺术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

宋代，在中原其他地区流动演出谋生的舞蹈艺人，称为“路岐人”。他们没有固定演出场所，成年奔波于各个城镇和乡村。但这时，专供表演用的露台已在各地出现。他们就在露台上演出，老百姓在露台台下观看。

宋代还有由军士扮演的舞蹈。《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载有军人装扮成神鬼、判官等，在乐器伴奏、烟火弥漫中表演《抱锣》、《硬鬼》、《哑杂剧》、《抹跄》等舞蹈的情景，表演者有的多达一百多人。

宋代中原，民间还盛行社火。社火是民间歌舞的通称。它最初来源于古代对土地和火神的崇拜。

社火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业余性的；二是通常在节日期间

演出，如元宵节和迎神赛会时；三是在广场上或在队伍行进时表演。

《东京梦华录》卷八云：“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这是中原也是中国关于社火的最早记载。

社火以歌舞为主，也有杂技、武术、焰火等，是一种大型的广场和队列表演艺术。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其舞蹈有跑竹马、跑旱船、高跷、大头舞、狮子舞、龙舞等。

跑竹马，《东京梦华录》称为“竹马”。以竹篾扎架，蒙以纸或布，分为两截，制成马形，系在腰间表演。马脖系铃，骑者脚绑响板，走起来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表演者在马上做各种姿态和表情。

大头舞，《东京梦华录》称为“大头和尚舞”。一般为两人扮演。一人饰和尚，头戴面具，手执蒲扇，一人饰女子，手持巾帕，互相对舞，滑稽诙谐。

宋代，中原民间在元宵、中秋时，还盛行踏歌舞。舞者成群结队，手拉手，脚踏地，边唱边舞。

四、金元以来舞蹈

（一）金代舞蹈

北宋灭亡之后，河南大部分被金人占领。

金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女真族原居长白山和黑龙江一带，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宋徽宗时期，女真民间舞蹈《臻蓬蓬》传入开封，很受欢迎。《宣政杂录》记载：“宣和初，收复燕山归朝，金民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为《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

金人占领河南之后，中原流行伞舞。焦作西冯封村金墓出土有金代伞舞童子砖雕。童子上身穿开襟短袖衫，下身围短裙，腰扎飘带，肩

扛长伞,正收左腿,做高跳姿势,形象生动逼真。

(二) 元代舞蹈

中原专业舞蹈,自元代以后,不如以前兴盛。这是由于蓬勃兴起的戏曲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单纯舞蹈的作用。

戏曲艺术是在过去的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形式的基础上综合发展而成的。这时的舞蹈已跟戏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了。

元代有的戏曲中,虽然还有一些插入性的完整舞蹈,如元杂剧《追韩信》中有《跑竹马舞》,《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中有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舞》和安禄山的《胡旋舞》等,但它们也都成了戏剧剧情的组成部分,一般不再独立演出。

(三) 明清舞蹈

明清时期,中原专业舞蹈情况,跟元代差不多。当时,社会上很少有专业舞蹈艺人,也没有专业舞蹈表演团体。舞蹈都跟戏曲结合在一起,成了戏曲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段。

明清时期中原的民间舞蹈非常发达。今天中原的民间舞蹈,大部分都是在明清时期定型成熟并流传下来的。就舞蹈艺术风格来说,有软有健。软舞多以管弦乐器伴奏,舞姿轻盈婀娜。健舞多以打击乐器伴奏,舞姿雄浑粗犷。既有独舞、双人舞,也有群舞。这个时期的民间社火,更是场面浩大,气氛热烈,节目繁多,数百年来,经久不衰。

第三节 戏曲

戏曲是以唱、念、做、打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形式。

中原戏曲源远流长。明清以来形成的中原地方戏曲(指产生于河南的戏曲),剧种繁多,类型亦各有不同。虽然有些剧种已经衰落,但大多数仍然广泛流行。

这些剧种构成了中原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使河南成为中国地方戏曲种类丰富的省份之一。

一、概 况

(一) 宋代戏曲

中原戏曲起源很早。河南项城出土有汉代三层百戏陶楼。洛阳烧沟汉墓出土有九个百戏陶俑,生动,夸张,质朴有趣。新密打虎亭汉墓出土有宴饮百戏壁画。南北朝时洛阳寺院里有百戏戏场。唐代洛阳有五凤楼百戏舞场。

作为完整的戏曲艺术,是在宋代以来才形成的。宋代杂剧是中原也是中国最早的独立的戏曲形式。《梦粱录·伎乐》云:“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球曾做杂剧本子,葛守成撰四十大曲。”北宋杂剧能表演完整的故事情节。

宋徽宗时期,开封有一个杂剧女演员,名叫丁都赛,本系“露台弟子”,十分有名。

河南偃师曾出土一块刻有丁都赛演出形象的宋代雕砖。她身材苗条,面容丰腴,头部裹巾,巾上插以花枝。穿两边开衩的女式长袍,足蹬小靴。背后腰带上插一把团扇,正抱拳作揖,表情特别生动。

这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早的形象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北宋杂剧,一般为五人表演。这在1958年发现于偃师酒流沟水库西岸宋墓中的杂剧砖雕上有清楚的展现。在三块砖上雕有宋代杂剧演出图,图上共五人,他们分别为抹泥色、装孤色、引戏色、副净色和副末色。他们中有的手执立轴,有的正对别人说话,有的手托鸟笼,有的正将手指放在口中吹哨,各自都在做着精采的表演,非常传神。

河南温县、禹州、洛宁也出土有北宋杂剧砖雕。新安宋墓出土有杂剧演出壁画。荥阳宋墓石棺上有杂剧线刻图。

北宋末年,杂剧脚色的服饰已经趋于定型。北宋灭亡时,开封许多杂剧演员都被金兵俘虏到北方,促进了金朝杂剧艺术的发展。

(二) 金元戏曲

金代中原的戏曲文献不多,但文物不少。中牟有始建于金代的乐楼(戏楼)。焦作出土有金代杂剧砖雕,制作精致,人物生动。安阳出土有金代戏俑和舞台模型。

元代,杂剧盛行,中原出了不少杂剧作家,如郑廷玉、宫天挺等。元代中原著名演员有梁园秀、王金带等。新乡市关帝庙舞楼(戏楼),就是元代创建的。在唱腔上,元代河南有“中州调”,与河北的“冀州调”不同。

(三) 明清戏曲

明代是中原戏曲大发展的时期。开封周王府和豪绅有“大梨园七八十班,小吹打二三十班”(《如梦录》)。第二代周王朱有燬著有杂剧31种,流传很广。开封有专门出售戏衣和头盔的店铺。演戏用的戏楼在各地大量出现。明代中原戏曲唱腔属北曲系统,昆腔也开始传入河南。

清代中原戏曲的发展势头比明代更大。地方剧种纷纷形成,戏班如雨后春笋。明代中原的戏曲班社大多为私家所有,清代却出现了许多职业民间班社,艺人靠走江湖吃饭。煤窑和商行有戏班。如河南密县(今新密市)超化煤窑太乙班兴旺于乾隆末年,许昌山西油行的大油梆戏班兴旺于同治年间。县衙、府衙也建有戏班。戏曲爱好者还建立了以自娱为目的的“玩友班”。不少剧种都能演出“袍带戏”,剧目来源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演出场地以高台、戏楼为主。班社之间的激烈竞争,促进了戏曲水平的提高,尤以河南梆子发展为快。专门从事戏曲教育的科班也大量涌现。中原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对看戏、谈戏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其热情决不亚于今人对电影、电视的着迷程度。

清代中原的戏楼很多。它们因地制宜,风格各异。豫北多双脊卷

棚式,豫西多两面坡式,豫南多亭榭式。临河有戏码头和船戏台。还有可移动的太平车戏台等。

目前,在河南全省保存下来的三百多座古戏楼,大多建于清代或在清代重修的。它们一般都建在祠庙内外或大门上。著名的有郑州城隍庙乐楼、周口关帝庙戏楼、开封山陕甘会馆戏楼、洛阳关林舞楼、安阳白龙庙神怡楼、社旗山陕会馆悬鉴楼、浚县碧霞宫驻云楼、汝州钟楼戏楼、浙川白浪街戏楼(即“三省戏楼”)、武陟龙王庙戏楼、淇县云濛山戏楼、博爱天爷庙戏楼、获嘉王氏祠堂戏楼、新县普济寺大殿戏台等。

中原祠庙中的古戏楼,一般都坐南朝北,面对大殿或大门。有些地方,相隔几米或几十米,还一连并列有两个或三个戏楼。有些戏楼前的观众场地,严格划分男女区,男区在前,女区在后。

清代开封的戏园里,起初不准女人看戏。1910年由河南巡抚陈夔龙修建了四年的丰乐园开始营业,方准妇女入园看戏。但男女要分开坐,不能混杂,夫妇也不得例外。

(四) 民国以来戏曲

民国时期,河南梆子势力遍及全省,大弦戏、百调和怀调开始衰落,曲剧和坠剧开始兴起。戏园大批兴建。戏曲演出场所由高台、戏楼,转向戏园。并出现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王镇南、樊粹庭等一批知识分子进入戏曲界,从事编导,组织演出,大大提高了地方戏曲各方面的质量。女演员也大批登台。二十世纪以前,河南地方戏曲基本上无女演员。清末民初开始有少量女演员,到三十年代女演员大量涌现。从此,舞台和剧目面貌为之一变。抗日战争时,各剧种都演了一批宣传爱国抗日的戏。三十年代普遍兴起彩头砌末、机关布景,“腾云驾雾”、“活龙吐水”等出现于舞台,吸引观众。

建国后,对地方戏曲进行改革,使戏曲艺人的艺术水平和思想素质,都有很大提高。1952年,全省有专业戏曲表演团体152个,1954

年发展为 215 个,1957 年为 282 个。其中豫剧占压倒优势,曲剧次之。中原编演现代戏,在六十年代处于全国先进行列,豫剧《朝阳沟》等曾产生很大影响。据 1957 年统计,全省各剧种的传统剧目有 4000 多个,其中豫剧 1000 多个,越调、大平调和宛梆各有 600 个左右。进入八十年代后各种表演团体又有了新的发展。1982 年,河南全省有职业半职业剧团 435 个,业余剧团 5000 多个。其中豫剧有专业剧团 127 个,曲剧有专业剧团 43 个。

二、丰富的剧种

(一) 豫 剧

豫剧就是河南梆子。称豫剧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由于豫剧在豫西山区演出时常依山搭台,所以又名“靠山吼”;又因它唱时起腔收腔尾音带讴,故又称“河南讴”。

豫剧是河南第一大剧种,流行全省。它也是中国梆子戏中最吸引观众的剧种之一,流布全国十多个省区。

清乾隆年间,豫剧已在河南盛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已有女演员登台。辛亥革命后,省城开封建了很多戏园(当时称茶社),争相邀请豫剧团体演出。郑州、洛阳、新乡也有茶社上演豫剧。从 1927 年以来,由知识分子王镇南、樊粹庭介入,对豫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效法京剧,将豫剧的科白、词句、腔调、做工、化妆、行头,都予以改造创新,并新编了一些好剧目,大大提高了豫剧品位。

由于语言音调不同,豫剧在发展过程中曾形成几个不同调派。祥符调以开封为中心,豫东调以商丘为中心,沙河调以漯河为中心。这三种调大同小异,统称豫东调,多用假嗓,音域较高。豫西调又称西府调,以洛阳为中心,多用真嗓,音域较低。豫东、豫西两派区别较大。前者激越、轻快,后者悲凉、缠绵。1936 年,唱豫西调的常香玉进入开封

演出,促进了豫东调和豫西调的交流。抗日战争期间,为了谋生需要,豫东豫西两派演员逐渐消除门户之见,互相搭班演戏,互相学习,加速了两派艺术的融合。

豫剧音乐属梆子腔系,音乐结构为板式变化体。男女声基本同腔同调。净脚多用“炸音”。

豫剧伴奏为“一鼓二锣三弦手,梆子手钹共八口”。特色乐器主要有板胡、小三弦、方笙、闷子。板胡,又称瓢儿,琴筒以半个椰子壳蒙薄桐木板。小三弦为弹拨乐器。方笙为吹奏乐器,一般十四管。闷子为双簧吹奏乐器,像喇叭,以竹为管,上有哨片,下有音碗。

豫剧有剧目 1000 多个,但大多没有脚本。内容多为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地方色彩浓厚,唱词道白,通俗易懂。据统计,保存下来的传统剧目有 647 个,主要有《花木兰》、《穆桂英挂帅》、《秦香莲》、《花打朝》、《桃花庵》、《洛阳桥》、《唐知县审诰命》、《朝阳沟》等。

豫剧脚色行当主要是四生(老生、小生、大红脸、二红脸)、四旦(青衣、花旦、老旦、彩旦)、四花脸(黑脸、大花脸、二花脸、三花脸)。名演员很多,风采各异。陈素真、常香玉、马金凤、崔兰田、阎立品被称为“五大名旦”。旧谚云:“卖了牲口押了套,也要看狗妞的《三上轿》。”(狗妞是陈素真的乳名)。又云:“梆子‘十八兰’,唱遍全河南。”(“十八兰”指以“兰”字排行的十八个著名演员,是三十年代周海水主持太乙班时培养出来的,崔兰田为其中之一。)

(二) 曲 剧

曲剧又称“曲子戏”,是河南第二大剧种,分布很广。1982 年,河南有曲剧职业剧团 43 个,湖北、山西、安徽、河北等地也有一些曲剧职业团体。

曲剧形成于清朝末年。由河南民间说唱艺术洛阳小调曲子和南阳大调曲子汇合后吸收其他剧种的艺术形式发展而来。其发展过程,先是在广场上走高跷唱曲子,称“高跷曲子”;后来登上高台演出,称

“高台曲子”。1926年在临汝(今汝州市)首先搬上舞台。

曲剧起初行头简单,不用锣鼓伴奏,打板的要帮腔。多“三小戏”(生、旦、丑),以民间生活故事为内容,儿女情长,唱白通俗易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行当逐渐齐全,采用锣鼓等打击乐器,开始演“袍带戏”。

曲剧唱腔音乐为曲牌体,共有曲牌 150 多个。用真嗓演唱,悠扬自然,富有抒情性,颇有感染力,谚云:“迷曲子,曲子迷,三天戏唱跑大闺女。”主奏乐器为坠胡,也称曲胡,琴筒用硬木或黄铜制成,蒙蟒皮。

曲剧有传统剧目 210 多个,大多没有脚本,唱词道白多用“活词”。主要剧目有《陈三两爬堂》、《卷席筒》、《寇準背靴》、《风雪配》等。张新芳是曲剧第一代女演员。

(三) 越 调

越调由南阳一带的民间清唱“月调”演变而来。主要流行于河南郑州、开封、许昌、周口、南阳等黄河以南地区。乾隆年间已有班社演出,清末河南有越调班社一百多个。民国初年在开封演出,票价比豫剧还高。建国后得到大发展。

越调唱腔音乐,初为曲牌体,有“九腔十八调”之称,后过渡为板式变化体,间用杂腔小调。有特色的乐器是短杆坠胡和四弦。坠胡与曲剧坠胡相似,但较短小。四弦,琴杆如象鼻,张四根丝弦,琴弓马尾分两股,分别夹在一、二弦和三、四弦之间。

越调剧目分“正装戏”和“外装戏”两种。正装戏是越调原有剧目,唱词少,道白多,词句深奥严谨,只能按曲牌唱,不能随便改。外装戏是据小说改编的剧目或移植自其他剧种的剧目,唱多白少,通俗易懂,不受曲牌词格限制。随着越调的发展,外装戏逐渐代替了正装戏。主要剧目有《收姜维》、《李天保吊孝》、《火烧绣楼》、《白奶奶醉酒》等。名演员有申凤梅、毛爱莲等。

(四) 二夹弦

二夹弦又称“两夹弦”，由主奏乐器四胡的琴弓系两股马尾夹在四根琴弦间拉奏而得名。它是由豫东、皖北、鲁西南的“花鼓丁香”与民间小调结合发展而来的。最初，艺人腰挎花鼓，串乡卖唱。后来发展为地摊表演。清道光年间，已有戏班演出。

二夹弦在河南分布较广，杞县、柘城、西华、太康、扶沟、淮阳、濮阳、长垣、清丰、延津、开封、郑州、宝丰、汝南皆流行。起初戏装简单，生、旦脸上抹红色，丑角脸上抹白色。旦角胸前挂朵红绸扎成的绣球花，生角腰间扎块红布，不穿戏衣也可演出。先有旦、丑戏（二小戏）和旦、生、丑戏（三小戏），后来才有“袍带戏”。民国初年开始有女演员。

二夹弦的唱腔音乐以板式变化体为主，同时保留少量杂曲小调。主奏乐器为四胡，八棱琴筒，略呈喇叭状。琴杆上有四根弦。琴弓上马尾分两股，分别夹于一、二弦和三、四弦之间。打击乐器有鼓、钹、锣等。

二夹弦旦角唱腔细腻，发音柔和，表演活泼，花样繁，调门多，语言通俗，富有情趣。其他脚色唱腔亦清新柔和，轻快甜美，颇受群众欢迎。上演剧目前后 150 多个，主要有《货郎翻箱》、《打狗劝夫》、《狸猫换太子》等。

(五) 南阳梆子

南阳梆子又称“宛梆”或“南阳调”。它起源于南阳，为河南梆子（豫剧）的一支。清乾隆年间开始形成，道光以后广泛流行，民国初年特别兴盛。流行范围以南阳为中心，包括邓州、内乡、新野、社旗、泌阳、唐河等地。

南阳梆子属梆子腔系，唱腔高亢有力，火爆粗犷。音乐结构为板式变化体。有特色的乐器是大弦（非月琴，属板胡类）和二弦（又称二嗡，琴筒、琴杆、弓杆皆竹制，琴筒蒙蟒皮，可奏出“嘟噜”之声，效果

特殊)。

南阳梆子很受群众喜爱。内乡县名演员王春生,艺名生娃,人称迷七县,有云:“生娃喊一腔,迷了八道岗,男人不下地,女人忘烧汤。”剧目以“外八脚”(四生四花脸)为主。传统剧目 600 多个,常演的有 300 多个,如《和氏璧》、《九莲灯》、《化心丸》、《卖苗郎》、《火烧战船》、《水淹七军》等。

(六) 怀 梆

怀梆又称怀庆梆子。主要流行于豫西北旧怀庆府所属沁阳、孟县(今孟州市)、武陟、修武、获嘉、济源等县。为当地说唱艺术吸收梆子声腔发展而成。既受河南梆子影响,又与上党梆子有血缘关系。乾隆时已有演出,清末最盛。唱白用当地语调,富有地方风味,很受群众喜爱。济源民谚云:“三天不吃油,要看得运(小生)《上门楼》;三天不吃盐,要看小翠(旦)《双孝廉》。”又云:“卖裤当衣裳,要看红卓《反西唐》。”得运、小翠、红卓都是怀梆名演员。

怀梆属梆子腔系,音乐结构为板式变化体。特色乐器为尖弦(又名大弦,形状与京胡相似,但琴筒比京胡粗大,蒙薄桐木板)和胡胡(与豫剧板胡相似)。传统剧目 300 多个,多为“袍带戏”,主要有《对花枪》、《反西凉》、《下河东》、《伐子都》等。

(七) 大 平 调

大平调又称“大油梆”。流行于豫北的濮阳、清丰、南乐、滑县、浚县、内黄、卫辉和豫东兰考、民权等地。乾隆年间已有演出,清中叶以后更加兴盛。由于语言风格不同,又分东路(濮阳)平、西路(滑县)平等派。

大平调以黑红脸为主,表演粗犷。早在清代,演员为了谋生,班社之间竞争激烈,常唱“对台戏”,争创绝招,以求压倒对方,客观上促进了艺术水平的提高和演员的成长。

大平调属梆子腔系,音乐结构为板式变化体。特色乐器有五种:

(1)大弦,即八角月琴,俗称“老鳖”。(2)二弦,即木制短杆胡琴。(3)大梆,枣木制成。(4)“四大扇”,即大饶、大镲。(5)尖子号,又名大号,状如喇叭,但长至120厘米,能吹出“堆嘀堆嘀”的尖音。

大平调有剧目600多个,多取材于《三国演义》、《水浒》、《封神演义》等小说。主要有《闯王进京》、《杨广篡朝》、《三搜太白府》、《白玉杯》、《战洛阳》等。

(八) 怀 调

怀调又称“漳河老调”,产生于漳河两岸。清乾隆年间就在豫北盛行。主要流行于河南安阳、汤阴、内黄、鹤壁等地。怀调演员训练严格,班规很严。起初女角都是男扮,但吃住赶场不准与男角在一起,平时要穿女人衣服,模仿女人习惯,如有违犯,即受处罚。

怀调属梆子腔系,音乐结构为板式变化体。主奏乐器原为大弦(月琴)、二弦。建国后废大弦,只以二弦主奏。二弦状似京胡,但琴筒蒙薄桐木板。

怀调传统剧目有300多个,以“袍带戏”为主,如《平辽东》、《闯幽州》、《雷振海征北》、《樊梨花投唐》等。

(九) 大 弦 戏

大弦戏由元明以来流行在中原地区的北曲小令和弦索调发展而来。相传,豫北在明代已有大弦戏班。乾隆时流行于开封、太康、漯河等地。近代以来,主要流行在豫北的安阳、滑县、林县、濮阳、长垣一带。

大弦戏声调曲折,说白全用土话。脚色以生、净为主,表演泼辣夸张,自成风格。曾在抗日宣传上作出过贡献。

大弦戏的唱腔音乐属曲牌体。主奏乐器为锡笛,即锡管小唢呐。有特色的乐器还有大笛、大饶、大镲(四大扇)、尖子号。剧目以历史题材为主,号称“唐三千,宋八百,演不完的三列国”。如《苏护进女》、《伯邑考探监》、《战蚩尤》、《连环记》、《黄巢起义》等。

（十）百 调

百调亦称“北调子”。主要流行于河南濮阳、清丰、南乐、台前等地。它是在当地俗曲小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柳子戏的一支。清嘉庆年间，就有班社存在。

百调前后有剧目 100 多个，主要有《秦英挂帅》、《张达德游寺》、《马前泼水》、《李三娘》、《荷花》等。

（十一）四 股 弦

四股弦又称“五调腔”。流传于豫北、冀东、鲁西一带，由当地的民间小调发展而来。在豫北，主要流行于安阳、林州、淇县、汤阴、清丰、南乐等地。由演“三小戏”（生、旦、丑）发展为演“袍带戏”。特点是粗犷奔放，富有乡土气息，一度比当地的落腔班社更能吸引观众。

四股弦的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主奏乐器为四弦，又名四胡。琴筒为木质八角形，琴杆上有四根弦，琴弓上的马尾分两股，分别夹在一、二弦和三、四弦之间（与二夹弦所用四胡相似）。

四股弦的主要剧目有《单刀会》、《贺后骂殿》、《大保国》、《沙区扫荡》、《刘金定下南唐》等。

（十二）落 腔

落腔又称“安阳腔”。它由安阳、内黄、南乐一带民间曲艺莲花落发展而来，形成于清道光年间。主要流行于豫北安阳、内黄、鹤壁、林州、获嘉、清丰、南乐、浚县、滑县、濮阳等地和晋、冀、鲁交界处。

落腔服装道具简单，深得群众喜爱：“三天不看落子腔，心里闷得直发慌。”脚色以生、旦、丑为主，叙事、抒情兼佳。但“落腔虽好，敬神不唱”，因相传落难讨饭的人常唱落腔。

落腔的唱腔音乐以板式变化体为主，主奏乐器为两把唢子（又称胡胡，有头把、二把之分），系小板胡的一种。

抗日战争中，落腔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起过重要作用。其后逐渐发展，更加普及。主要剧目有《刀劈杨藩》、《借鬻鬻》、《蓝桥》、《王定

保借当》等。

(十三) 坠 剧

坠剧又称“化妆坠子”，主要流行于豫北的内黄、清丰、南乐和豫东的商丘、郸城、淮阳等地。

坠剧是由曲艺河南坠子演变而来，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唱腔音乐属板式变化体。主奏乐器为坠琴，系由小三弦改造而成。

坠剧剧目，以从大鼓书、坠子书改编者为多，也有从其他剧种移植的。主要有《张廷秀私访》、《雷公子投亲》、《回龙传》等。

(十四) 四 平 调

四平调由砀山(今属安徽)花鼓演变而来，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主要流传于河南夏邑、柘城、商丘、范县、长垣和皖、苏、鲁接壤地区。

四平调唱腔音乐以板式变化体为主。一般用真嗓。主要伴奏乐器是高胡。它的主要剧目有《丝绒记》、《三省庄》、《扒瓜园》、《陈三两爬堂》等。

(十五) 道 情 戏

道情戏由皖西北和河南历史悠久的渔鼓道情与民间小调、鼓儿词相结合演变而成。形成时间在清道光年间。主要流行于河南西华、扶沟、太康、杞县、尉氏、淮阳、鹿邑、柘城等地。

道情戏起初行头简单，扮女的，只要穿花衣裙，或在胸前挂一朵绸花，头上顶块花手巾即可。扮男的只要脸涂红色，身穿长袍即可。多表演儿女情长的剧目。后来学习豫剧和越调，表演逐渐完善起来。民国初年，开始出现女演员。

道情戏的唱腔音乐属板式变化体。主奏乐器为短杆坠琴，形状比河南坠子所用坠琴短小。过去曾用简板和渔鼓为主要击节乐器，六十年代废弃不用，只用板鼓。主要剧目有《温凉盏》、《王金豆借粮》、《小包公》等。

（十六）柳琴戏

柳琴戏因主奏乐器像柳叶而得名,也称“拉魂腔”。它由豫东、鲁西的民间小调发展而成。主要流行于河南永城、虞城、夏邑,及鲁西、皖西、苏北部分地区。

柳琴戏最初只是以一家人为主,收几个徒弟进行演出。所以剧目一般都比较简单,唱词多,人物少。解放后,出现了非家族式的戏班,行当日渐齐全。剧目有《金镯玉环记》、《孟丽君》、《四告李彦明》等。

（十七）豫南花鼓戏

豫南花鼓戏也称“花鼓灯”。主要流行于河南大别山地区的信阳、新县、光山、罗山、息县等地。据说是弋阳腔传到大别山后和当地民歌小调结合而形成的。清道光年间信阳已有花鼓戏班。

豫南花鼓戏的演唱以真嗓为主。乐队只有武场(打击乐)。板鼓、堂鼓、大锣、小锣、手镲等乐器只用三个人。唱腔中用以起腔、承接、转折和收尾的锣鼓点,具有鲜明的特色。由于没有文场(管弦乐),故以锣鼓击节,众人帮腔,采取一唱众和的形式表演。在唱腔上,板式结构与曲牌并存。

豫南花鼓戏的剧目多爱情故事。民谣云:“椰子南征北战,皮影公子遭难,花鼓婆娘养汉。”又云:“花鼓戏,拉魂腔,迷住小伙子大姑娘。”主要剧目有《张德和休妻》、《薛丁山征西》、《夫妻观灯》、《棋盘山》等。

（十八）嗨子戏

嗨子戏最初流行于豫南固始县境内。因服装道具少到可以装在一个花篮内,所以又称“花篮戏”。它是由当地民歌小调跟戏剧表演形式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清朝末年,由固始发展到潢川、商城、息县等地。

嗨子戏不用管弦乐器伴奏,采用一唱众和的帮腔形式表演。乐队只有武场(打击乐),没有文场(管弦乐)。板鼓、堂锣、大锣、手镲、梆

子、小锣只用三位乐手操作。在唱腔上,板式结构与曲牌并存。这些都与豫南花鼓戏相似。

嗨子戏的剧目多为“二小戏”和“三小戏”,尤以“苦戏”出名。主要剧目有《薛平贵》、《白扇记》、《秦雪梅》等。

(十九) 罗 戏

罗戏又称“罗腔”。主要流行于河南的荥阳、上蔡、杞县、开封、方城、通许、滑县等地。冀、鲁、豫交界处亦有流传。

罗戏形成时间不明,在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已非常盛行,曾受到当时河南总督田文镜的明令禁止。但由于受到百姓喜爱,始终禁绝不了。“两淮风土,自秋成以后,冬月以至新春三四月间,无处不以唱戏为事”,“男女杂沓,举国若狂”。(康熙二十九年《上蔡县志》)乾隆十八年《鄆城县志》云:“赛神招梨园,其名罗戏者,最俚鄙淫秽,民间尤尚之。百货俱集,男女杂逐,一村演戏,众村皆至。”“移他村,亦如之。转相矜耀,有一时至五六部及十余部者,糜费不资。或一村不能演罗戏,众皆鄙之,村人亦自为耻。”

罗戏唱腔音乐属曲牌体。主奏乐器为大笛(唢呐)。伴奏时“包头不包尾”,即演员开口唱时,伴奏停止,唱至腔尾时,再进行伴奏。

罗戏在清末开始衰落,解放后已无职业罗戏班子。主要剧目有100多个,著名的如《吴三桂勾鞑兵》、《秦琼卖孩子》、《核桃园》、《打灶王》等。

(二十) 卷 戏

卷戏相传由道士念经卷的音乐发展而来,故名。主要流行于河南开封、泌阳、遂平、西平、邓州、内乡、唐河、汝南、沈丘、叶县、上蔡等地。清乾隆年间已有卷戏演出。

卷戏唱腔婉转幽雅,细腻动听。旦角多舞姿,活泼喜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民谚云:“舍得爹,舍得妈,舍不得才娃的《打灯花》;舍得

爹,舍得娘,舍不得才娃的《三开堂》。”才娃系演员邵世镇的艺名。许多人都着了迷。

卷戏常跟罗戏、河南梆子(豫剧)同台演出,称为“梆罗卷”,又称“三下汤”。旧谚云:“骚罗戏,浪卷戏,要看还是梆子戏。”

卷戏唱腔音乐为板式变化体。不用弦乐器。主奏乐器为锡笛,即锡制小唢呐。主要剧目有《打灯花》、《三开堂》、《保定府》、《下南唐》等。

(二十一) 扬高戏

扬高戏据说是由放羊人所唱的山歌小调发展而成的,所以又称“羊羔戏”。最初流行于豫西灵宝。光绪初年,传入陕县。民国初年流传到卢氏,并很快传入山西平陆、芮城等地。

扬高戏的唱腔属曲牌体,主奏乐器为板胡。主要剧目有《战洛阳》、《反西唐》、《金瓶梅》等。因后继无人,现在只有灵宝少数乡村在年节时有演出活动。

三、表演技巧

中原地方戏曲,集中反映了中原人民的思想感情、性格特征和文化风貌。其主要特点是:激越奔放,火爆热烈;机智舒朗,泼辣夸张;细腻含蓄,委婉深沉;生动自然,通俗幽默。

长期以来,中原地方戏曲艺人,不断磨练创新,演出时,“三五人千军万马,六七步四海九州”,积累了丰富的表演经验,而且很有地方特色。

在表演身段上,手法、眼法、步法,内容都很丰富。如在眼法上,就有笑眼、怒眼、媚眼、俊眼、嗔眼、醉眼、疯眼、疑眼、冷眼、傲眼、泪眼、滚眼、闪眼、对眼、吊眼、呆眼、颤眼、瞎眼、偷眼、贼眼、流星眼、三角眼、丹凤眼、朦胧眼、惊怕眼等名称。

在特技上，有水袖功、扇子功、翎子功、盘子功、把子功，还有变音、变脸、变须、耍牙、耍蛤蟆、转眉、祭风竖须、吊水桶、顶灯、倒踢靴、双头人、缩身、睡三孔桥、背钱搭、砸瓦、耍椅子、耍脸盆等。

其中耍蛤蟆，怀调、怀梆、豫剧皆有。用于《荀家滩》和《王彦章夜看兵书》两出戏中。演员脸上画一只蛤蟆，运用脸部肌肉的伸缩颤抖，分别使蛤蟆动爪、动眼、张口、合口，或左腿蹦，或右腿蹦，或前腿蹦，或后腿蹦，或四腿皆蹦，活灵活现，就象一只蛤蟆要从脸上跳下来一样。

扇子功的表演方法是：“旦角扇子不离鬓，小生不离大衣襟。老生垂手扇膀骨，花脸张臂与肩平。”“文人学士爱扇袖，教书之人扇坐凳。苦力之人只扇裆，盲目之人扇眼睛。”

翎子功的表演方法是：“低头耍圈叫绕翎，一前一后叫耍翎，大笑之时双掬翎，忿怒忧愁双搓翎，自惭形秽三抹翎，表示决心双咬翎。”

中原地方戏曲独具特色的表演程式有抬轿、推圈、上楼（规定楼梯十三级，上楼只能迈十三步）等。此外对各个行当的表演法则也有详细规定：

旦角表演特征是：“青衣两手交，闺门目下瞧，武旦风摆柳，丑旦手掐腰。”“老旦清，正旦俊，花旦全身有风韵。”“行不动裙，笑不露齿。”

闺门旦表演特征是：“说话不看人，走路不踢裙，男女不挽手，坐下看衣襟。”“上场伸手似撵鹅，回手水袖搭手脖，飘飘下拜如抱子，跪下不能露脚脖。”

彩旦表演特征是：“斜眼偷看人，说话咬嘴唇，一扭浑身动，走路甩汗巾。”

小旦表演特征是：“出门按鬓角，双手掖领窝，弯腰提绣鞋，再整衣裳角。”

生行表演特征是：“生忌油，丑忌脏，文生媚，武生刚。白胡卖苍劲，黑胡卖稳当，马上红脸卖气派，相貂老生卖排场。”

表演手势的特征是：“红脸齐眉，花脸过顶，小生齐唇，小旦齐胸。”“男掌四合拇指炸，女掌护心似兰花。”

中原地方戏曲艺人还用谚语总结了许多表演经验。如“脸上没戏，观众生气；身上没戏，瞎费力气；心里没戏，挨骂受气。”“滑稽出在眼上，诙谐来自脸上，幽默长在嘴上。”“痴者吊眼，疯者定眼，病者泪眼，喜者俊眼”等。

四、演唱特色与戏班组成

（一）演唱特色

中原地方戏的唱词，有长短句和上下句两种类型。长短句按曲牌规定，一曲一个式样，每曲的句数、字数和格律皆不同。上下句分七字句、十字句和五字句三种句式，其结构为“二二三”、“三三四”和“二三”。梆子腔诸剧种，皆用上下句。曲剧和大弦戏多用长短句。越调和二夹弦有时用上下句，有时用长短句。语言音调虽然各剧种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它们的音韵基础都是北方话中的河南方言。

中原地方戏曲的音乐结构，分板式变化体、曲牌联套体、板式变化与曲牌联套兼存三种类型。乐队一般都有文场（管弦乐）和武场（打击乐，即锣鼓点）两种。但罗戏和卷戏只有管乐，没有弦乐。嗨子戏、豫南花鼓戏既无管乐也无弦乐，只以锣鼓击节，众人帮腔。

中原地方戏曲重视“寓情于声，以唱带做，传神出神”。认为“声音是外形，感情是灵魂”。“戏无情不感人，戏无理不动人。”主张“快唱让人听字儿，慢唱让人听味儿”。“慢板要紧，快板要稳，散板要准。”“不要音包字，而要字包音”。

中原地方戏曲的脚色扮相,都是在现实生活基础上进行提炼加工的。演漂亮的人,扑粉描眉;演丑的人,粉墨勾脸;生角挂胡须,旦角鬓插花。各穿与其身份相称的袍衫裤褂。明末清初以后,服装逐渐定型,有关道具纷纷出现,某些表现手法日益固定化。如皇帝上场有宫女太监,官员上场有龙套,武将出场有兵丁,马鞭代表马,船桨代表船等。

(二) 戏班组成

明清以来,中原地方戏曲的戏班子,一般为30人左右。其组成人员为四生四旦四花脸,八个场面(“一鼓二锣三弦手,梆子手撩共八口”),两个箱馆,一个掌班,三至五个厨子。各人岗位明确,无闲散人员。谚语云:“庙里不敬假神,戏班里不养闲人。”

旧时戏班里皆为男性。戏班每到一处,大都住在庙内。台上扮夫妻者,夜晚睡觉,不准靠近,要一个在左角,一个在右角。江湖艺人之间遵循“人不亲行亲”的原则,不论走到山南海北,有困难向同行求援,必定得到帮助。

旧时中原各地请戏班唱戏,习惯称为“写戏”(定戏)。写戏的原因很多,有神庙戏(给神唱)、还愿戏(求子、求雨后还愿)、祝寿戏、贺喜戏、加官戏(庆升官)、赔情戏(伤了人,打官司输了赔礼)、竣工戏(工程完工)等。

清代以前,戏班子本身又是艺人教育机构。清乾隆以后,中原出现了专门培养戏曲艺人的科班,有的为官办,有的为富商、煤窑、行会所办。坐科的时间一般是3年,教学方法为口传心授。旧时演员大多不识字,全靠心记,有的能记数百出,甚至上千出戏的对白和唱词。学戏时也要参加演出,边演边学。但要真正学出名堂,时间较长,俗语说:“状元三年一科,戏子十年一窝。”

自从有女演员上台之后,各个戏班里都十分注意女演员的培养,因为经验说明:“响了生,稀巴松;响了旦,吃饱饭。”

第四节 曲 艺

一、概 况

曲艺是由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发展演变而来的，通过说与唱，加以动作表情，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写景抒情，深为群众所喜爱。

唐代寺院中的讲唱变文和社会上的“市人小说”(说话人说书、说故事)，标志着曲艺艺术形式的基本形成。

宋代城市经济繁荣，促进了曲艺的蓬勃发展。开封勾栏中已有说“三分”、“五代史”等讲史题材，技艺上已有很高成就。

元明时期，说唱向长篇发展，俗曲注意演唱有故事性的节目。

清代，南方兴起弹词，北方兴起鼓词。大鼓书、三弦书在中原农村广为流行。

由于曲艺人员少，道具简便灵活，故在中原地区，就连没有戏曲的地方，也有曲艺存在。

中原人自古喜爱曲艺，至今每年还在马街举行书会。

马街是宝丰县城南八公里的一个村镇。从明末以来，每年正月十三日，全国各地艺人，都要集中到这里来说书赛艺。一年一度，历三百年而不衰。

在这曲艺盛会上，参加演出的书摊有时多至五六百个，让人们随意欣赏观看。各地需要邀请艺人去演唱的，可在书会上自由挑选。

中原地方曲艺，语言洗练形象，生动活泼。重故事，重情节，演员说功、唱功、做功并重，说演弹唱都有功底。

二、主要曲种

中原地方曲艺（指形成于中原的），现代还流传的，主要有十几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河南坠子、鼓儿哼、三弦书、大调曲子、河洛大鼓等。从事曲艺活动的人，除一部分专业演员外，大都是民间艺人。

（一）河南坠子

河南坠子形成于 1900 年左右，为中国流行最广的曲艺形式之一。清末以来，先后流传于山东、安徽、天津、上海、沈阳、西安、兰州、武汉、重庆、香港等地，成为一种全国性的曲种。

河南坠子由河南道情和颖歌柳子书^①两种曲艺融合发展而成，因主要伴奏乐器为坠胡而得名。

建国前，著名的河南坠子演员有张三妞，她是 1913 年出现的第一个河南坠子女演员。其后有乔清秀、程玉兰、董桂枝等。她们三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形成于天津的河南坠子三大唱腔流派的代表。

除主要伴奏乐器坠胡外，坠子演员自用乐器有简板、枣木梆、铍子（即小铜钹）、矮脚书鼓等。

演出时，一般为一人拉坠胡，一人演唱。演唱者以简板或枣木梆击节。演唱中，拉坠胡的人，有时也对唱或说白几句，创造活泼气氛。也有自拉自唱的，这时演员以踩脚梆为节，时而配以铍子和鼓。也有二人或多人演唱的。

河南坠子长期在民间流传，具有朴素的中原乡土风味和浓厚的生活气息。有曲目 200 多种，著名的有《借髻髻》、《梁祝下山》等。

^① 河南道情形成于元代，流传于豫、鲁、皖三省交界处。颖歌柳子书又名莺哥溜书，形成时间无考，流传于豫鲁、豫晋交界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尚有演唱，现已并入河南坠子。

（二）鼓儿词

鼓儿词形成时间无考。表演风格类似北方大鼓书，吟、诵、唱、白并举。

鼓儿词因唱腔尾声习惯以沙哑鼻音哼出，故又称“鼓儿哼”。又因它的伴奏乐器简单，只用一面小鼓或战鼓，配以击节筒板即可，故又称“单大鼓”。

鼓儿词流行于洛阳、商丘、许昌、信阳、南阳等地。又可细分为豫东大鼓、颍河大鼓等支。

鼓儿词多演唱长篇历史故事和小说，如《刘公案》、《西游记》等。

（三）三弦书

三弦书形成于清初，流传在开封、洛阳、许昌、南阳等地。

表演时，一般为二人，一人弹三弦伴奏，一人拿小铜钹（即铍子）或八角小鼓击节演唱。有时二人也互相问答或对唱几句。以小铜钹击节的称“铍子腔”，以八角鼓击节的称“鼓子腔”。这是三弦书中风格不同的两种类型。前者唱腔刚健明快，后者淡雅平稳。

三弦书也可以一人自弹自唱，或多人同唱。演唱时，配以动作烘托气氛。板式灵活，音域宽大，朴实清新，风趣盎然。有《绣鞋记》、《蓝桥会》、《诸葛亮招亲》等传统曲目 300 余种。

（四）河洛大鼓

河洛大鼓形成于清朝光绪末年，流行于洛阳等地。它由洛阳琴书和南阳鼓儿词相结合发展而成。

河洛大鼓演员以书鼓、月牙钢板击节。琴师以坠胡、三弦等伴奏。曲调奔放，板式灵活，多演唱英雄人物故事，既有表现历史题材的《温凉盏》、《鸾凤配》等中长篇节目，也有反映现实生活的《焦裕禄风雪探茅屋》等。

（五）大调曲子

大调曲子形成于清初。又称八角鼓、鼓调、鼓子曲。流行于开封、

洛阳、安阳、南阳等地，以南阳为盛。它的演出场所，城镇常在茶馆，农村常在场边、地头，妇女们一边做针线一边听，所以又有“活筐箩曲子”之称。

大调曲子是曲牌连缀体的说唱艺术，声腔悠扬。伴奏乐器以三弦为主，还有筝和琵琶等。击节乐器为檀板和八角鼓。由于清中叶至建国前，演唱大调曲子的人中有许多文人和富家子弟，他们借以自娱，故曲调典雅，演唱内容多由元明以来的优秀戏曲剧本和小说改编而成。

此外，流行于豫东永城的大饶，流行于豫南新野的槐书（又称怀书）和流行于商丘、周口等地的锣鼓书等，也都各有特色，具有一定影响。

第九章 中原建筑

中原古代建筑历史悠久,风格典雅,布局严谨,气势雄伟。

中原地区是中华古代建筑体系形成的地方之一。壮丽辉煌的古代都城,灿烂多姿的古代园林,成就突出的古塔、桥梁和陵墓,以及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原民居,都在中国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原古代建筑大师们,不仅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精美的建筑物,而且为我们留下了一流的建筑学著作。

第一节 都城建筑

中国历史上作过都城的城市加到一起,不少于二百。其中有很大一批在中原地区。现在人们常说的中国七大古都,中原就有安阳、洛阳和开封三个。

这些都城,在规划上,一般都以皇宫为中心,周围是纵横交错的街道。在建筑物的群体布置上,体现一种整齐规范的原则。

一、汉魏洛阳城和隋唐洛阳城

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唐等王朝的都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中以汉魏时期的洛阳和隋唐时期的洛阳最有名。

（一）汉魏洛阳城

汉魏洛阳城，是指作为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首都的洛阳，它与今天的洛阳不在一个位置上，而在今天洛阳以东约三十华里的地方。

东汉洛阳城是一座长方形的城市，东西六华里，南北九华里，所以又称“九六城”。它北倚邙山，南濒洛水。经过考古发掘，除了南城城墙被洛水冲毁之外，北、东、西三面城墙的遗址现在都已发现。

东汉洛阳城用夯土筑成。共有十二个城门。其中平城门是正南门，规模最大。城内共有二十四条主要街道，每个城门都与主要街道相通。

主要街道都分为三股，中央一股只有皇帝和公卿贵族可以行走，一般老百姓都在左右两股行走。街中央一股与两边，由两条四尺多高的土墙隔开，不得逾越。

东汉洛阳城内有两座皇宫，即南宫和北宫。南宫在洛阳南部，早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北宫在洛阳北部，是东汉明帝时期修建的。两宫相距七华里，它们大小差不多。两宫之间有封闭式的道路相连。这种在一个城市里有两座皇宫的情况，在其他都城中是少见的。

南宫主要的殿是却非殿。建武元年（25年），刘秀以洛阳为首都，最初就住在却非殿。其次是南宫前殿，它是建武十四年（38年）修建的。北宫主要的殿是德阳殿。它规模宏大，可容万人，“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古今图书集成·宫殿部》），是皇帝在正月初一和其他节日举行大朝会的地方。

东汉洛阳的商业贸易是集中进行的，在城南有南市，城中有金市，

城东有粟市和马市,城内的用水主要依靠洛水。据《历代宅京记》记载,当时的洛阳,“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异常繁华。

东汉以后,曹魏对经过战乱毁坏的洛阳进行重建,地址没有改变,建筑布局和规模也改变不大,但城门名称都分别作了改动。魏文帝时,主要使用北宫的建始殿接见群臣,到魏明帝时又在南宫建太极殿、昭阳殿等。

曹魏时,洛阳最有名的建筑物是凌云台。据《世说》记载:“凌云台,楼观精巧,先称平众木轻重,然后造构,乃无锱铢相负揭。台虽高峻,常随风摇动,而终无倾倒之理。”可见它的建筑技术是非常高明的。其次是总章观,观高十余丈,上面建有一展翅飞翔的大凤凰,非常别致。

西晋和曹魏政权交替的过程中,洛阳没有受到多少破坏。西晋建国后,洛阳的宫殿变得更加豪华富丽。

曹魏和西晋的洛阳,主要沿用东汉的体制。到北魏定都时,洛阳的面貌才有较大的改变。北魏洛阳除仍用汉晋旧城外,又增加了一道外城。内城还是“九六城”,外城南北十五华里,东西二十华里。内城与外城的不同之处在于:内城南北长,外城东西长。北魏洛阳内城,除东汉和西晋时期原有的十二个门外,又在西北隅新辟一个承明门,共十三个城门。每个门上都有城楼,其中大夏门(北门)规模最大,楼为三层,高达二十丈,别的“洛阳城门楼皆两重,去地百尺”(《历代宅京记》卷八)。

北魏洛阳只有一座皇宫(它废弃东汉以来的南宫,而用北宫)。皇宫南门至内城南门——宣阳门之间的街道称铜驼街,宽40余米,为北魏洛阳最宽大的街道。

北魏时期,佛教盛行,洛阳城里寺庙多达1367所。其中最有名的叫永宁寺,寺中有一座九层木塔,塔身高90丈,塔刹高10丈,共高出地面100丈,远在百里之外,都能看见。木塔北面有佛殿一座,规模建制如同皇宫里的太极殿一般。此外还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皆雕梁粉

壁，富丽堂皇。

北魏洛阳在城市管理上实行严密的坊里制。除皇宫、官署和宗庙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每里四面有围墙，东、西、南、北各开一个门。全城共有二百二十个里。

北魏洛阳商业十分发达。城西(内外城之间)有大市，周围八华里，包括十个里，皆工商货殖之民。城东(内外城之间)有小市，主要卖水产鱼鳖之类。城南(内外城之间)有四通市，市中多蕃胡客商，“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洛阳伽蓝记》卷三)。

(二) 隋唐洛阳城

隋唐洛阳城在汉魏洛阳城西约三十华里。唐代以后直至今天的洛阳都在这个位置上。

隋唐洛阳城的选址特点是“前直伊阙，后据邙山，左瀍右涧，洛水贯其中”(《新唐书·地理志》)。它南面对着伊阙，北面依靠邙山，东面有瀍水，西面有涧水，洛河从城中由西向东穿过。这种位于伊、洛、瀍、涧四水交会处的地理位置，为洛阳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隋唐洛阳城始建于隋炀帝时期。隋炀帝修建洛阳的原因，是由于这里水路运输方便，比起长安来，更容易控制富饶的中国南方。为了充实这座新城的户口，隋炀帝从北魏以来老洛阳城的居民中和附近各州的富商大贾中向这里迁移了数万户。又从江南和河北诸郡向这里迁移了许多人家，当时称为“陪京户”。

隋朝灭亡后，唐朝又在隋朝洛阳城的基础上进行修建，特别是武则天曾多年住在洛阳，称洛阳为“神都”，使洛阳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繁荣的程度。

关于隋朝洛阳城的情况，文献记载不够具体，这里我们把隋唐连起来谈，主要以唐朝为准进行叙述。

隋唐洛阳城的城墙，在隋朝时不太高，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进行了增筑。它周围52华里，东城墙和南城墙较长，北城墙和西城墙

较短,基本上成四方形。南面三门,东面三门,北面二门,城西与禁苑(隋称西苑、会通苑,唐称神都苑、东都苑)相连,没有城门。城内纵横各十条街道,其中定鼎街宽达百步。其次是通上东门和建春门的两条横街,各宽75步。通长夏门、厚载门、永通门、徽安门、安喜门的街各宽62步。其余小街各宽31步。全城共有113坊,3个市。每坊东西南北各长300步,坊内有十字街,与该坊四面的门相通。

定鼎街又称天街,是由皇城端门向南,穿过天津桥,通往定鼎门的一条南北大街。全长7里137步,中间为御道,两边种樱桃、石榴、槐树和柳树。它不但是隋唐洛阳城里最宽大的一条街,而且也是绿化得最美丽的一条街。

宫城和皇城都在洛阳的西北部。宫城在皇城的北面,周长13里241步,城高4丈8尺。

皇城在宫城之南,周长13里250步,城高3丈7尺。皇城内南北向的街道和东西向的街道各四条。是中央机关所在地。

皇城西南、禁苑之东有上阳宫,它南临洛水,西近谷水,唐高宗晚年曾在此听政。

宫城里正殿叫含元殿,又称乾元殿,高120尺。它是皇宫里最大的建筑物。武则天曾将含元殿改建为明堂,号称万象神宫,它上面建有一只巨大的用黄金装饰的凤凰,离洛阳很远的地方,都能看见。

武则天时期曾以铜铁铸成天枢,立于皇城正南门(端门)外,铭功纪德。天枢高105尺,直径12尺,八棱形,每面各宽5尺。天枢下面是铁山,周围170尺,四面萦绕着铜铸的蟠龙和麒麟。天枢上面是腾云承露盘,直径3丈,还有四个龙人捧着火珠,高1丈。天枢周围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姓名。在皇城前面,用铜铁铸成如此巨大的颂德碑,这是其他任何朝代都没有的。

商业贸易主要在“市”里进行。隋唐洛阳有三市,其中以洛水之南的南市(隋称丰都市)规模最大。市里店铺林立,货物充足。

隋唐洛阳城的建筑对后代影响很大。宋代开封的皇宫就是模仿隋唐洛阳的皇宫修建的。

二、曹魏邺北城和东魏北齐邺南城

安阳在中国七大古都中,开始建都的时间最早,所以有人称它为中国第一古都。自商代盘庚迁都到这里以后,经历了八代十二个国王,前后 273 年。后来,三国时期的曹魏,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南北朝时期的东魏和北齐,也都在这里建都,前后共达 126 年。虽然城址屡有变迁,但都相距不远。考古工作者已在安阳附近的殷墟,发现了商朝的宫殿建筑遗址和贵族墓葬。但对商朝时期这个地方的城市情况,一时尚难说得十分具体。现在我们着重叙述曹魏、东魏和北齐时期的安阳,当时叫做邺城。

(一) 曹魏的邺北城

曹魏时期的邺城与东魏、北齐时期的邺城,不在一个城址上。曹魏时期的邺城在北,史称邺北城。东魏和北齐时期的邺城在南,史称邺南城。两城原来都在漳河以南,后因漳河南迁,邺北城遗址现在已到漳河以北去了,在河北省临漳县境内。邺南城遗址在漳河以南,河南省安阳县境内。

将邺北城作为都城的除曹魏以外,还有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和前燕。邺北城主要是在曹魏时期修建的,以后几个朝代又进行了一些重修和改建。由于文献不足,邺北城在每个朝代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好细分,现以曹魏时期为基础,将其他几个朝代的情况结合起来叙述。

邺北城东西 7 里,南北 5 里。后赵时,城墙全部以砖包砌,每百步有城楼一座。

邺北城共有 7 个城门。南面 3 门,东面 1 门,西面 1 门,北面 2

门。这7个城门都是曹魏时期所建。后赵时,因建九华宫,又将与该宫相对的风阳门进行重修,使它高达25丈,并在上面建造城楼,又在城楼上安置两只铜凤,凤头高1丈6尺。后来城楼发生倾斜,一只铜凤掉进漳河,另一只用铁索绊住。所以当时邺城有歌谣说:“风阳门楼天一半,上有鸳鸯相呼唤,欲去不去铁索绊。”

邺北城的宫城部分,在城市的北部居中。宫城里的文昌殿,与宫城的端门和大城的正南门永阳门在一条直线上,是天子接见群臣、会见宾客、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它是皇宫里的主殿。曹魏的宫室被焚毁之后,后赵又在文昌殿的旧址上建太武殿,作为朝会正殿。太武殿基高2丈8尺,东西70步,南北65步,全用济北谷城山的文石砌成。太武殿下有地下室,可住卫士五百人。“屋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柱础亦铸铜为之。珠帘玉壁,窗户宛转,尽作云气。”(《历代宅京记》卷一二)非常豪华。

曹魏时期,文昌殿为外朝,内朝有听政殿,在文昌殿东。听政殿与宫城司马门和大城广阳门在一条直线上。听政殿前有听政门,听政门与司马门之间有尚书台、御史台、丞相诸曹等衙署。听政殿北是后宫,其中有鸣鹤堂、文石室、楸梓坊、木兰坊等建筑。

宫城西边有铜爵园,园子西部从南往北建有金虎台(后赵时改名金凤台)、铜雀台和冰井台。后赵时期的九华宫就建在铜雀台东北。九华宫中正殿为显阳殿,显阳殿后有九座殿,三座殿一组,共有三组,居宫嫔万余人于其中,所以总称该宫为九华宫。

宫城东边有戚里,是皇亲贵族聚居的地方。在司马门(宫城南面偏东之门)南大街左右,有相国府、奉常寺等官府。

邺北城的官署有在皇宫的,有不在皇宫的。不在皇宫的官署,周围并无类似皇城的墙壁,这与其他有些朝代不同。

邺北城的水源来自漳河。曹魏曾在城西十里,筑漳渠堰,引漳水东入邺北城,经铜雀台下,流入宫中,再分南北二沟,东流出城。水在

城内，又“枝流裂灌，所在通溉”（《历代宅京记》卷一二）。

邺北城自曹操创基以来，用冀州民力，取上党山林之材修建，其建筑之壮丽已于文昌、听政等殿，金虎、铜雀之台，鸣鹤、楸梓之宫这些建筑物上充分体现出来。至后赵石虎统治时期，又盛修宫室，银楹金柱，珠帘玉壁，使邺北城的建筑又得到进一步发展。

（二）东魏北齐的邺南城

邺南城是东魏时建的，在邺北城的南面。高欢因嫌邺北城窄隘残破，派仆射高隆之新筑此城。筑城时，用 10 万人拆毁北魏洛阳的宫殿，将材料运到这里进行修建。因城市靠近漳河，曾筑长堤防护。又修水渠围绕城郭，以造水碾碾。

邺南城东西 6 里，南北 8 里 60 步。共有 11 个城门。南面 3 门，东面 4 门，西面 4 门。邺南城与原来的邺北城紧挨在一起，邺南城的北门就是用的邺北城的南门。在这些门中，以正南面的朱明门最为壮丽。门上有楼，楼上“东西二十四门，朱柱白壁，碧窗朱户，仰宇飞檐，五色晃耀”（《历代宅京记》卷一二）。

邺南城的皇宫，位于城市的北部居中，东西 460 步，南北连后园共 900 步。皇宫正门叫闾阖门，其前先有端门，再前有止车门。闾阖门，“峥嵘耸峙，干云迥出，飞檐峻宇，梁楹欹危。”（《历代宅京记》卷一二）建筑得精巧辉煌。

皇宫中的正殿是太极殿。太极殿周围有 120 根柱子。殿基高 9 尺，皆以珉石砌成。门窗以金银为饰。椽楸斗拱，皆以沉香木制成，椽端又装以金兽头，每间都缀以五色朱丝网，上与飞檐相连。外面还涂以胡桃油，光辉夺目。

太极殿北有昭阳殿。殿周围有 72 根柱子。殿基高 9 尺，皆以文石砌成。门窗全以镂金装饰，栏楯用沉香木制成。梁拱间雕刻奇禽异兽，生趣盎然，姿态逼真。昭阳殿东有含光殿，西有凉风殿。这三殿皆以走廊相通，庭院里有流水珍木，布满香草。

昭阳殿后是永巷,巷北有五凤门,门内为后宫,是嫔妃所居之处。后宫分左右二院,其中修文、偃武二殿,装饰用玉珂八百,大小镜万枚,又以曲镜抱柱,门窗皆用七宝,每当夜色晦暗之时,光亮犹能照见数十步远。后宫又有圣寿堂,用玉珂八百、大小镜二万枚进行装修,又作曲镜抱柱,并用丁香末涂壁,胡桃油涂瓦,四面垂挂金铃万余枚,微风一吹,方圆十来里都能听到响声。圣寿堂北有玳瑁楼,纯用金银装饰,悬五色珠帘,挂白玉钩带。

邺南城自东魏迁都这里以后,四民辐凑,人口众多,全城共有400余坊。

邺南城的建筑规模,是以北魏洛阳城和曹魏邺北城为依据的。高欢建城之后,高洋又进行修饰,所以它的规制严密于曹魏时期的邺北城,奢侈程度超过后赵时期的邺北城。

三、北宋开封城

北宋开封,在中国城市建筑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它跟唐代城市有继承关系,在许多地方,又跟明清城市有相似之处。

(一) 历史渊源

早在战国时期,开封就是魏国首都所在地,当时叫大梁。到唐代,城市有了很大发展。至五代时期,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把开封作为首都。北宋建都开封,是从五代时期沿袭过来的。

开封在五代周世宗时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扩建。

1. 扩大市区范围。取消原来的罗城(外城),在原来的罗城外面另筑范围更大的罗城。对新罗城,周世宗采取利用农闲时间逐渐修筑的办法,每年冬末春初修筑,一到农忙就停止。在修筑之前,先立标识。当时规定,所有墓葬、窑灶和草市,都要建在标识之外七里。在标识之内,先由朝廷规划,确定军营、街巷、仓库和官府的位置,在这些

位置以外,方许百姓建造。

2. 扩展街道。由于开封百姓常侵占街道盖房子,使街道狭小,车辆难以通行,周世宗下令取直加宽,最宽的地方达到 30 步。

3. 加强城市绿化。周世宗鼓励市民在街道两边种树。显德三年(956年),他规定,凡开封城内街道阔 50 步的地方,允许两边住户各在靠边五步内种树、挖井,修盖凉棚。阔 30 步以下至 25 步的地方,各给三步种树。

4. 发展水路运输。显德四年(957年),周世宗下令从汴河开掘一条支流,引水北入五丈河,又疏浚五丈河,使它与济水相通。自此以后,齐鲁舟楫,皆能直达开封。显德六年(959年),又在开封东面引汴水入蔡河,加大蔡河水量,以通漕运。

(二) 平面结构

北宋开封城是在后周开封城基础上修建起来的。共分三道城墙。最外面的叫罗城,又叫新城,周围 50 里 165 步,“其高际天,坚壮雄伟”(《宋东京考》卷一)。新城外有城壕,称护龙河,阔十余丈。城壕内外皆植杨柳。新城城门都有瓮城三层,屈曲开门,只有南面、东面、西面、北面四个正门,为直门两重,以通御路。

中间一道城墙叫旧城,又叫里城,周围 20 里 155 步。共有 10 个城门:南面 3 门,东面 2 门,西面 2 门,北面 3 门。

最里一道城墙是宫城,位于里城中部偏北,周围五里。它以五代宫城为基础,宋太祖时又对其东北隅进行扩建,并派人去画洛阳宫殿图,回来后按图修建。

(三) 宫殿布置

宫城正门称宣德楼,楼下有五个门。门皆金钉朱漆,墙壁皆砖石砌成,镌镂龙凤飞云图案。雕甍画栋,峻桷层榱,上盖琉璃瓦。

宫中正殿称大庆殿,是举行重大典礼的地方。文德殿是日常上朝的地方。垂拱殿是皇帝平时处理政务的地方。集英殿是春秋大宴及

考进士的地方。紫宸殿是贺祥瑞、皇帝生日举行宴会的地方。长春殿是宴对蕃使的地方。宣和殿是收藏书画文物的地方。此外还有内殿，如万岁、复古、迩英、蕊珠、凝华、福宁、睿思等殿。宫中还有几个有名的阁，如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谋阁、徽猷阁、敷文阁等，它们是分别收藏宋朝历代皇帝手稿的地方。

修建北宋皇宫时，宋太祖曾下令：“凡诸门与殿，须相望，无得辄差。”（《石林燕语》卷一）因此，宫中的建筑物基本上都成直线排列，前后左右互相对照。

宫城的北门称拱宸门，东门称东华门，西门称西华门。其中东华门外有繁荣的市场，因为宫中都在这里买东西。

（四）河道利用

北宋开封，穿城而过的河道有四条，它们对开封经济和人民生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宋代开封最南面一条河流叫蔡河。它从外城西南面的戴楼门入城，流到外城东南面的陈州门出城。这条河流经开封时，上面建有13座桥。蔡河只流经开封外城，不经里城。

中间一条河流是汴河。它的上端在今天的荥阳市境内与黄河相通，流经开封后，东到泗州入淮。中国东南地区的粮食和其他货物都是从这条河流运进开封的。自东水门外7里到西水门，汴河上也有13座桥。其中有名的如虹桥、州桥等。

流经开封东北部的是五丈河。它来自济郛，从开封外城东北的新曹门旁边流入开封。河上有广备桥、青晖桥等。开封以东的粮食和货物，主要依靠它运进开封。

流经开封西北部的是金水河。它从开封西南分京索河水，以渡槽从汴河上空跨过，由西北水门流入开封，曲折流进皇宫，灌溉后苑池浦。

这些河流是开封的生命线，它们主要有四个用处：一是漕运，尤

其以汴河最为重要,其次是蔡河和五丈河;二是饮用;三是灌溉;四是排水。这些河流和桥梁也给开封这座北方城市带来了南方水乡色彩。

(五) 街道设施

北宋开封城里,由东西走向的街道和南北走向的街道交叉成棋盘网络状。其中有四条街道,分别通往外城的南薰门、新郑门、新宋门、新封丘门这四个正门,它们为主要街道。这些主要街道中,又以从皇宫南门宣德楼通往外城正南门南薰门的街道最宽大,称为“御街”。御街阔二百余步,两边有御廊。起初允许商人在廊下做生意,自宋徽宗政和年间起被禁止。御街中间有朱漆杈子两行,杈子中间是中心御道,只有皇帝和大臣才能通过,一般百姓不能行走,一般百姓的道路在朱漆杈子之外。朱漆杈子里有砖石砌成的御沟两道,沟里种荷花。御沟两岸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美如锦绣。

北宋开封的商店,跟唐代长安、洛阳不同,不是集中在“市”里,而是分散在全城的各条街道两旁。它彻底改变了唐代城市住宅区与商业区严格分离的局面,对商业区不再实行集中封闭管理。

唐代城市的坊,坊门夜里关闭,以防盗贼。宋代开封的坊已经失去这种作用,坊门不一定关闭,坊只起街道上的管理作用,此外别无他用。许多作坊、店铺和住宅混合在一起,面街建造,取消夜禁,成为日夜营业的商业街。

北宋开封对后来的城市建筑很有影响,如开封三道城墙,最中间是宫城的体制,就被金代中都城、元代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所继承。

第二节 古代园林

今人谈起园林,往往称道北京和江南。其实,北京和江南的园林,主要是明清以后才发展起来的。明清以前,中国园林之胜,当首推中

原。

中原古代园林,崇尚意境,富于变化,精美别致,源远流长。虽然多为人造,但追求清新自然。明清以来,北京和江南的园林,大都继承和发展了中原园林的传统。

一、从梁园到铜爵园

(一) 西汉梁园

西汉时期,中原最有名的园林是梁园。梁园是梁孝王刘武所建的园子。刘武是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的弟弟。汉文帝封刘武为梁国国王,建都睢阳(今河南商丘)。在西汉的封国中,梁国是个大国,土地肥美,又经常受到朝廷赏赐,财产不计其数。由于梁孝王很有钱,便注重享乐,大建苑囿。

梁园方圆三百里,园中有平台,从王宫到平台有复道相通,其长30余里。

梁园中,建筑物很多。据《西京杂记》说:“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肤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此外,梁园中还有修竹园,园中的竹子,都是天下的精品。还有清冷池,池中有钓台,叫做清冷台。当时的许多著名文学家,如邹阳、枚乘、司马相如等都曾做过梁孝王的侍从,梁园是他们吟诗作赋的地方。梁孝王在梁园曾为这些文学家专门筑有馆舍。他们以梁园为题材的一些文学作品一直流传至今。后来,梁园也成为历代文人题咏的地方。李白《梁园吟》“平台为客幽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就是写的这里。

(二) 东汉洛阳园林

东汉时期,中原最好的园林都集中在首都洛阳。当时洛阳著名的皇家园林有濯龙园,鞞圭园、西园等。

濯龙园在北宫附近,园内有濯龙殿和濯龙池。

鞏圭园在洛阳城南,建于汉灵帝时期。这里原为老百姓的农田。为了建造鞏圭园,汉灵帝派人将上好的良田变为园圃,引起老百姓不满。大臣杨赐等也上书反对。汉灵帝本来已有停止建筑的打算,后来在奸臣任芝、太监乐松等鼓动下,又继续修造起来。

西园在洛阳城西。汉献帝时,曾在园中盖裸游馆(即游泳馆),绿苔披阶,渠水绕砌。汉献帝常同宫人一起,乘船在渠中游漾。渠中植莲,花大一丈,莲叶夜舒昼卷,叫做夜舒荷。汉献帝常在盛夏避暑于裸游馆,由十七八岁的宫女陪他游泳。宫女们还用西域所献茵墀香煮汤沐浴,并将余汁倒入渠内,所以西园中的水渠又称流香渠。

除了皇室的园林以外,东汉洛阳的私人园林也很多。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建有梁冀园。他仿照崑山的形象,采土筑山,十里九坂。园中林深涧绝,到处都是奇禽异兽、花草树木。

袁广汉园也很有名。袁广汉是大富翁,家中仆人就有八九百。他在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构石为山,高十余丈,绵延数里。养白鸚鵡、紫鸳鸯、牦牛、青兕等珍贵动物。又引水入园,堆沙为洲,喂江鸥海鹤,种奇树异草。房屋皆徘徊相连,重阁修廊。

(三) 邳城铜爵园

东汉末年,曹操控制政权,他以邳北城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当时,最有名的园林是邳北城的铜爵园。铜爵园又称西园,是曹操父子和文人学士经常游览的地方。铜爵园中有金虎台、铜雀台、冰井台,即后人所说的邳城三台。金虎台高8丈,台上有屋130间。冰井台亦高8丈,台上有屋145间,其中有3个冰室和1座冻殿。在邳城三台中,最有名的是铜雀台。台高10丈,有屋120间。主建筑物的楼顶,铸大铜雀一只,高一丈五尺,该台也因此而得名。曹操生前曾在铜雀台上制订过统一全国的计划,临死时又遗令诸子:将他的床帐和牌位供奉在铜雀台上。后人曾作歌咏叹此事,所以古乐府中有曲名叫《铜雀台》。

历代诗人描写铜雀台的名篇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唐代杜牧《赤壁》诗中“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二句。二乔即二桥。《三国志·周瑜传》说:“(孙)策欲取荆州,以瑜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杜牧这两句诗就是说,如果不是周瑜在赤壁之战时打败曹操,孙策和周瑜的老婆就都要被曹操俘虏到铜雀台去了。

大约从宋朝起,人们开始从铜雀台废墟上捡取古瓦,琢制为砚台,称为铜雀砚。由于铜雀台的瓦烧制质量高,故用这种瓦制成的砚台贮水不干,十分宝贵。因而王安石有《相州古瓦砚》诗说:“吹尽西陵歌舞尘,当时屋瓦始称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托声名动世人。”

二、芳林园、金谷园和北魏佛寺园林

(一) 芳林园

三国时期,曹丕当皇帝后,又将都城迁到洛阳。在这以后,西晋和北魏也都将洛阳作为首都。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有名的园林主要集中在洛阳。

有些园林可以跨越朝代。洛阳的芳林园就是曹魏、西晋和北魏所共有的皇家园林。它不但没有因改朝换代而毁灭,反而被建得越来越好。

芳林园是魏文帝曹丕统治时开始修建的。园中有名的大湖天渊池开凿于黄初五年(224年),有名的建筑物九华台修建于黄初七年(226年)。到魏明帝统治时,又派人开凿太行山的石英,采谷城山的文石,在芳林园内修筑了一座景阳山,种松竹草木,捕山禽杂兽以置其中。芳林园建成之后,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披崖,殿阁参差。

芳林园在魏明帝死后,因避魏少帝曹芳名讳,而改名为华林园,

这个名称一直沿用到北魏。

西晋时期,华林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发展最大的还是北魏时期。北魏华林园中名叫大海的湖,即曹魏时的天渊池,海中犹有曹丕修建的九华台。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曾在九华台上造清凉殿。北魏世宗宣武帝元恪又在海内作蓬莱山,并在山上建仙人馆、钓台殿和虹霓阁。北魏皇帝经常驾龙舟鹤首,游于海上。酈道元《水经注》曾对北魏华林园有过较详细的记载,它说:华林园“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纓峦带阜,游观者升降阿阁,出入虹陛,望之状鬼没鸾举矣。其中引水,飞皋倾澜,瀑布或枉渚,声溜潺潺不断,竹柏荫于层石,绣薄丛于泉侧,微飈暂拂,则芳溢于六空,入为神居矣。”这些话将这所皇家园林的山光水色描绘得异常具体。

(二) 金谷园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最有名的园林是西晋石崇的金谷园和北魏洛阳的佛寺园林。石崇在晋武帝时曾任南中郎将、荆州刺史,后拜太仆,又出为征虏将军,假节、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他为官时,大肆聚敛财产,后房妻妾数百人,庖厨膳馐穷水陆之珍,还与贵戚王恺、羊琇等人以奢靡挥霍争高下。

金谷园的位置在今洛阳老城的东北,它是石崇的别墅。石崇自己曾在《金谷园诗叙》中比较详细地描写过金谷园,他说:“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余与众贤……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金谷园中以池沼花木为重点,追求山林野趣,形成雅静的风格,楼台亭阁,金碧辉煌,流水潺潺,绿树掩映。

有名的绿珠堕楼的故事就发生在金谷园。石崇晚年,朝廷由赵王司马伦专权。石崇的外甥欧阳建与司马伦有仇。石崇有妾名绿珠,司

马伦的党羽孙秀想把绿珠夺为己有。绿珠被逼，自投于楼下而死。石崇也因为不愿把绿珠交出来，自己及全家十五人皆被杀。唐代诗人杜牧《金谷园》诗云：“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坠楼人。”

（三）北魏佛寺园林

北魏时期，洛阳的佛寺园林大都是由官僚贵族的私人园林转变而来的。《洛阳伽蓝记》记载说：“当时四海宴清，八荒率职，缥囊纪庆，玉烛调辰，百姓殷阜，年登俗乐。”“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竞。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方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修建园林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这些园林跟住宅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住宅的一部分。

北魏洛阳带有园林的住宅很多。如高阳王元雍宅在津阳门（内城南面偏西的门）外御道西。元雍曾为丞相，富兼山海，僮仆六千，伎乐五百人。他家园子里有竹林鱼池，芳草如织，珍木连荫，就像皇家的禁苑一般。

清河王元怱宅在西明门（内城西面偏南的门）外一里。第宅丰大，超过高阳王元雍。宅西北有楼，比曹魏时修建的凌云台还高。楼下有儒林馆、延宾堂，土山钓台，冠于当世。斜峰入牖，曲沼环堂，树响飞鸢，阶丛花药。

司农张伦宅在昭德里。张伦以奢侈出名，园林山池之美，与诸王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见皇家华林园中有景阳山，便在自己园中也造一座景阳山。山中重岩复岭，深溪洞壑，高林巨树，悬葛垂萝，山路崎岖，涧道峥嵘，集中体现了天然山岳的主要形象。

后来由于统治阶级的互相残杀，这些王公贵族纷纷败落下来。他们陆续将第宅施舍给僧尼，于是这些王侯府第都成了寺院。原来的园林就成了北魏洛阳特有的佛寺园林。当这些园林属于私人第宅时，一

般百姓无法进去,但一旦变为寺院所有,老百姓进去的机会就多了。如北魏河间王元琛的第宅变为河间寺后,洛阳士女进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足过。入其后园,见沟渌蹇产,石磴礁峣,朱荷出池,绿萍浮水,飞梁跨阁,高树出云,咸皆啧啧”(《洛阳伽蓝记》卷四),赞赏不已。

三、西苑、神都苑和唐代洛阳私人园林

隋唐时期,中原著名的园林主要集中在洛阳。当时有名的皇家园林是隋朝的西苑和唐朝的神都苑,有名的私人园林是李德裕的平泉别墅和裴度的绿野堂等。

(一) 西苑

西苑是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修建的。它周围229里。中间凿地为大湖,周围十余里。湖中有蓬莱、方丈、瀛洲诸山,皆积土石而成,高出水面百余尺,山上有台观殿阁,亭榭回廊。湖水深数丈,可通龙舟凤舸。湖北有龙鳞渠,逶迤注入湖中。

西苑中花木鸟兽都是各地进贡来的珍品。冬天,树木枝叶凋落,使用彩缎剪成花朵和树叶,缀在枝条上,彩缎褪色之后又换新的,使这些树木常像春天一样。

沿湖和龙鳞渠建有景明、迎晖、栖鸾、晨光、明霞、仪凤、绮阴、降阳等十六座庭院,号称十六院,每院都是一座独立的小园林,充分发挥水景园林的特色。从皇宫到西苑有专用御道,隋炀帝爱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

(二) 神都苑

神都苑又称东都苑,是武则天时期的名园。它“东抵宫城,西至孝水,北背邙阜,南拒非山,谷、洛二水会于其间”(《唐两京城坊考》卷五)。

神都苑四面有苑墙,周长 126 里,墙高 1 丈 9 尺。共有 17 个苑门。

神都苑是由隋朝的西苑发展而来的。隋西苑周长 229 里,唐太宗嫌太大,毁去一部分以供居民耕种,所以唐代的神都苑比隋朝的西苑小。

神都苑最西边是合璧宫,宫中有连璧殿、齐圣殿等。最东边是凝碧池,它就是隋朝的那个建有蓬莱、方丈、瀛洲诸山的湖。神都苑中央是龙鳞宫,由其附近的龙鳞渠而得名。合璧宫东南的洛水南岸是明德宫,合璧宫东边是黄女宫。神都苑西北隅为高山宫,东北隅为宿羽宫,东南隅为望春宫。此外,苑内还有冷泉宫、积翠宫、青城宫、凌波宫等。

(三) 唐代洛阳私人园林

平泉别墅在洛阳城南龙门以西,是唐代宰相李德裕为了实现他父亲李吉甫的遗志而建筑的一所私人园林。李吉甫在南方为官时,曾想在洛阳南郊建一处家园,但他生前未能实现。后来,李德裕在龙门西边买下乔处士的故居,将它修建为平泉别墅,这才实现了李吉甫的愿望。

平泉别墅周围十里,有台榭百余所,其中除了有书楼、瀑泉亭、流杯亭、东溪、西园、双碧潭等景观之外,主要以珍贵的花木奇石出名。李德裕平生酷爱花草树木,他在江淮等地为官二十年,每到一处,就向当地的花农、樵夫以及与他有同样爱好的人搜集珍异花木幼苗,送到平泉别墅栽种。一时间,使平泉别墅的花木泉石之胜,冠于洛阳。

裴度的午桥庄也在洛阳城南。裴度是唐朝著名宰相,历相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他的午桥庄园林,有花木万株。园中建有绿野堂。裴度常与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在此酣饮高歌。

此外,白居易的园子也很有名,他自己曾说:“吾有第在履道坊,五亩之宅,十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

唐朝官僚贵族在洛阳有住宅的有一千多家,他们中很多人都建

有私人园林。一般说来,这些园林在设计上都有比较高尚的格调。唐朝洛阳的园林曾对朝鲜、日本产生过很大影响。

四、北宋开封园林

北宋在开封建都 160 多年,公私园林绚丽多彩。据南宋初年写成的《枫窗小牋》估计,北宋开封约有园圃 100 多个。《东京梦华录》也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阡(今按:阡字,原本如此,疑当作闲)地。”(《东京梦华录》卷六)

北宋开封园林中,最有名的是金明池、琼林苑和艮岳。

(一) 金明池

金明池在开封城西新郑门(外城西面偏南的门)外街北。金明池周围 9 里 30 步。进池门往西百余步,有临水殿一座,是皇帝观看龙舟争标和赐宴的地方。再往西数百步是仙桥,桥呈飞虹状。仙桥北端有小岛处于池中心,岛上有五座殿,以中间的殿最大。殿周围有回廊。仙桥南端有棖星门,门南是彩楼。再往南有砖石砌成的高台,上有宝津楼。这是皇帝观看骑射和演出百戏的地方,亦可俯瞰仙桥和临水殿。池北岸正对五殿有大屋,叫做奥屋,是停泊大龙舟的地方。此外,宝津楼南有宴殿,是皇帝游池时,停放车马之处。

金明池平时是关闭的,每当农历三月一日至四月八日对外开放,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全部可以进池游览。这期间,虽遇风雨,也是人山人海。与此同时,皇家也在金明池内举行大规模的划龙舟比赛(当时叫争标),并在水上表演百戏、水傀儡、水秋千等,宝津楼下的地面上也有各种演出,全国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来此献艺。

金明池开凿于五代周世宗时期,原用以练习水战。北宋统一全国后,不再在金明池练习水战,它逐渐成为开封著名的风景区,每当开池后便成为红男绿女出入的地方。

（二）琼林苑

琼林苑也在新郑门外，它在金明池南，其大门与金明池的大门相对，中间只隔一条新郑门大街。苑中多古松怪柏，又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苑东南隅有华觜冈，高数十丈，上有楼阁，下有锦石缠道。又有月池、梅亭、牡丹诸亭。苑中花草皆为名贵品种。

琼林苑建于宋太祖乾德年间，“岁赐二府从官燕及进士闻喜燕，皆在其间”（《石林燕语》）。太平兴国时期，宋太宗亲试礼部贡士 497 人后，就曾分三甲赐宴于琼林苑。它同金明池一样，平时关闭，只有每年农历三、四月春花烂漫时才对社会开放。

（三）艮岳

艮岳是宋徽宗时期新建的皇家园林，位于开封东北景龙门（内城北面中间的门）内。周围十余里，以仿照杭州凤凰山模样建造的一座人工假山为骨干，布置景点，构成变化无穷的山水园林景观。

艮岳主峰高达九十步。其顶有介亭，以介亭为界分为东西二岭，岭东有萼绿华堂、书馆、八仙馆、紫石岩、栖真磴、揽秀轩、龙吟堂等，岭西有药寮、西庄、巢云亭、白龙湫、濯龙峡、罗汉岩等，再西有万松岭。山下平地有大方沼，沼中有两洲，东称芦渚，西称梅渚，渚上各有亭。从磴道可以上到介亭，介亭左边又有极目、萧森二亭，右边有丽云、半山二亭。从介亭北俯景龙江，可以看到江水缓缓流入山间，还可以看到江边的高阳酒肆、清虚阁等建筑。

艮岳中的石头，都是专门为宋徽宗从江南采集奇花异石的官员朱勔等人通过“花石纲”从太湖一带运来的。这些石头皆“雄拔峭峙，功夺天造”，“千态万状，殫奇尽怪”（《华阳宫记》）。凡是较大的太湖石都有名称，其中著名的有昭功敷庆神运石、玉京独秀太平岩、卿云万态奇峰等。

艮岳中众多的花草树木，也大多是从南方移植而来。集中种植这些花木的地方，被称为梅岭、杏岫、黄杨岫、丁香嶂、椒崖、龙柏坡、斑

竹麓、海棠洲等。

艮岳中还有人工瀑布和大量珍禽异兽,宫室台榭,不计其数。《宋东京考》谈到艮岳时说:“山林岩壑,日益高深,亭台楼观,不可胜纪,四方花木奇石,悉萃于斯,珍禽异兽,无不毕有。”我们今天园林中的人工技术,当时基本上都已开始运用。

此外,北宋开封的其他公私园林也很多,如城西有童太尉园、蔡太师园、王太宰园、下松园、含芳园,城西南有马季良园、孟景初园,城南有王太尉园、一丈佛园子,城东有奉灵园、灵嬉园、王家园、麦家园,城北有李驸马园等。

五、北宋洛阳园林

洛阳在宋代虽然不是首都,但一直是陪都,许多文人学士,或是退职后的达官贵人,都喜欢在洛阳定居,所以当时洛阳的园林也很有名。

(一) 富郑公园

这是宰相富弼的园子。园中有两座假山。有探春亭、通津桥、方流亭、紫筠堂、荫樾亭、赏幽台、重波轩、土筠洞、梅台、卧云堂等建筑。登上园中的四景堂,可以看到全园景色。

(二) 董氏西园

这个园子具有山林特征,在洛阳少见。园内有三堂,一堂在大池中间,另一堂周围有石芙蓉,水从石芙蓉花间涌出。还有一堂,虽不很大,但很深邃,游人到此,往往迷失方向,类似前代的迷楼。

(三) 董氏东园

此园与董氏西园是同一个主人。进入园门后,有棵大松树,十个人也抱不过来。园中有大池,池中有堂,名曰含碧。水从四面向池中喷泄,池水又从暗道中流出,故朝夕如飞瀑而池不溢。据说喝醉酒的

人一到这里,酒就醒了,所以人们又称该池为醒酒池。

(四) 环 溪

这是王开府的园子,因为园中池水成环状,故称环溪。环溪园中有多景楼,登楼南望,则嵩山和龙门都呈现在眼前。园中又有风月台,登台北望,则可见隋唐洛阳故宫,千门万户,嵯峨璀璨,延亘十余里。园中有花木千株。又有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为北宋洛阳园林中所仅见。

(五) 刘 氏 园

这是一座小巧的园林。园中有一台,方圆十多丈,而楼横堂列,廊庑回绕。洛阳人称之为刘氏小景。

(六) 丛 春 园

这是北宋著名学者邵雍的园子,在天津桥南。园内乔木森森,桐梓松柏,皆成行列。由园内丛春亭北望洛水,可见天津桥下,水流澎湃,浪花如霜雪。

(七) 天王院花园子

洛阳所有的园子里都有牡丹,而只有这个园子是专门种牡丹的,所以称为花园子。洛阳以卖花为生的人,都在此种花卖。

(八) 归 仁 园

此园长宽皆一里多。北部有牡丹、芍药千株,中间有竹百亩,南部种有大片桃李。园中水面之大,冠于洛中诸园。

(九) 苗 帅 园

这是苗姓节度使的园子。原为宋初宰相王溥园,因历史悠久,景物皆苍老,经过修饰后,景象空前。园中有两棵七叶松,高百尺,双双对峙,春夏望之如山。有竹万竿。又有桥亭、水轩等。

(十) 赵韩王园

这是宋初朝廷为宰相赵普所建的宅园。赵普退休后回来住了百日就死了,子孙也都住在开封,所以这个园子经常锁门。高亭大榭,花

木丛深，平时只有少数管理工役享受。

(十一) 李氏仁丰园

园中除了五座亭子外，主要种植花木。由于能工巧匠，善于嫁接，所以花木多达千种。其中桃、李、梅、杏、莲、菊各数十种，牡丹、芍药各百余种。

(十二) 松 岛

园中有数百年老松。原为五代时宰相袁象先的园子，至宋先归宰相李氏，后又归吴氏。有亭榭池沼，并筑台建堂，又自东大渠引水入园，清泉涓涓，无处不通。

(十三) 东 园

这是宰相文彦博的园子，靠近东城墙。园中水面弥漫广阔，划船如在江湖。又有二堂掩映水中。

(十四) 水北胡氏园

园在邙山之麓，有台榭花木。登上玩月台，四望百余里，可见伊、洛绕流，烟云掩映，高楼曲榭，时隐时现。

(十五) 独 乐 园

这是司马光的园子。园中有读书堂、浇花亭、种竹斋、见山台、钓鱼庵、采药圃等，皆以小巧见长。

(十六) 湖 园

园中有湖，湖中有台，名为百花洲。虽然一年四季时令不同，而景物皆好。洛阳人说：“园圃之胜不能相兼者六：务宏大者，少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水泉者，难眺望。”只有湖园六样皆能兼备。

(十七) 吕文穆园

园在伊水边，木茂竹盛。园中有三亭，一在池中，二在池边，以桥跨池相连。此园乃北宋名相吕蒙正的园子。

北宋洛阳的园林，在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中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李格非是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父亲，曾任太学博士、著作佐郎、

礼部员外郎、提点京东刑狱等官。《洛阳名园记》是中国园林发展史上的一部难得的重要著作。

李格非认为,洛阳的盛衰是天下治乱的标志,园林的兴废又是洛阳盛衰的标志。他在《洛阳名园记》中就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洛阳名园记》是从园林文化的角度写的,书中抓住每个园子的特征和独到之处叙述,文字不多,却很精采。后来有名的《吴兴园林记》和王世贞《游金陵诸园记》等,都是在《洛阳名园记》的影响下写成的。

第三节 古塔、桥梁和陵墓

一、古塔

中原古塔数量多,构造精美,是中原古代建筑中的重要遗产。

塔是一种佛教建筑,它是将我国传统建筑技术与外来建筑形式结合起来的高层建筑物。塔是为了收藏佛教徒的遗骨遗物而建的。一般说来,凡有塔,必有寺,塔与寺原来都同时存在于一体。但由于时间的推移和人为的破坏,许多寺院被毁得连一点影子都没有了,而塔却巍然独存。一座名塔,往往是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代表和象征,是这个地区的空间标志。

塔在印度原呈半球形,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后,很快与中国固有的楼阁建筑相结合,成为早期的楼阁式木塔。

(一) 白马寺塔

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是洛阳的白马寺,因而中国最早的一座塔也建在白马寺中。《魏书·释老志》记载说:“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佛图”就是塔,是梵文塔的另一种译法。东汉白马寺的塔是四方形的木塔。

（二）永宁寺塔

北魏时期，四方形木塔仍是塔的主要形式，如北魏洛阳永宁寺中的塔就是这样的。《洛阳伽蓝记》说：“永宁寺……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这么高大的塔，简直是一座摩天大楼，历史上极为少见。

（三）太康寺塔

中国早期的塔都是用木料建的，但木塔容易烧毁，所以后来逐渐被砖石等材料代替。中国最早的砖塔，也建在中原，它就是西晋襄阳侯王濬平吴之后，在洛阳太康寺所建的塔，该塔三层，用砖数十万。

（四）嵩岳寺塔

最初的木塔，或用其他材料所建成的塔，之所以建成四方形，主要是受中国传统楼阁形状的影响。但科学和实践证明，四方形塔抗御地震的能力较差，也不太能抵抗风力的破坏。所以后来四方形塔又逐渐被多边形塔所代替。塔由木料改用砖石，是建筑上的一大进步。由四方形变为六边、八边等多边形，又是建筑上的一大进步。

唐朝以前所建的多边形砖塔，保存到今天的，国内只有一座，也在中原，它就是登封的嵩岳寺塔。该塔为十二边形。它建于北魏正光元年（520年），至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历史。

嵩岳寺塔是按照砖的性能建造的，基本没有仿木结构，出檐较短。除塔刹用青石雕成外，其余全用灰黄色的砖砌成。塔高39.5米，底层直径为10.6米。塔底有四个门，全塔上下共有十五层檐。塔身雄健秀丽，呈抛物线形，柔和圆润，异常美观。在设计和施工上都有独到之处，是中国古塔建筑的瑰宝。

嵩岳寺塔不仅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座多边形砖塔，而且在所有各种形状的砖塔中，它的历史也是最老的。此外，嵩岳寺塔又是中国现存唯一的一座十二边形的塔，也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密檐式塔。中国早期的塔一般都是楼阁式的，每层都开有门窗。密檐式的塔与楼阁式

的塔不同。密檐式的塔最下一层特别高大,并雕有佛像等装饰品,但以上各层之间,距离极短,每层塔檐都靠得很近。

(五) 登封净藏禅师塔和安阳修定寺塔

除了楼阁式塔和密檐式塔之外,还有亭子式塔。这种塔大多是砖石造的,只有一层。塔身有方形、圆形、六角形、八角形等多种。下面有塔基,上面有塔刹。这种亭子式塔在中原地区现在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有两座,一座是登封会善寺的净藏禅师塔,它没有过多雕饰,但建筑得很精美。另一座是位于安阳西北 35 公里的修定寺塔,它由多种图案的雕砖组成,这些砖上,不论是佛像、侍女、飞天、童子、舞伎,还是巨龙、狮子、老虎、大象、天马,无不雕刻得生动逼真,栩栩如生,使全塔上下都成了艺术精品。它是全国唯一的模制花砖舍利塔。这两座亭子式塔都是唐代建筑物。

(六) 开封铁塔

砖塔的内部结构也各有不同,有的塔身是空的,有的塔身是实心的。在空心塔中,有的用木头作中心柱,有的用砖石作中心柱。用砖石作中心柱的塔,建筑水平往往极高。这种塔上不用任何木料作构件,塔梯、塔檐等全部用砖石建造。中心柱与外壁通过砖砌楼板紧密连成一个牢固的统一体。中心柱旁边有塔梯,可以盘旋攀登至塔顶。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建造的开封铁塔(原名开宝寺塔,因用铁色琉璃砖建成,故又称铁塔),就是这种塔的典型代表。它八角十三层,高 54.66 米,是仿木结构的楼阁式砖塔,门、窗、斗拱、腰檐以及塔周围的各种花纹图案,都由深褐色(铁色)的琉璃砖砌成,具有非常高的建筑水平。

(七) 安阳天宁寺塔

作为塔的顶端的塔刹,其形状也多种多样。在中国众多的塔刹中,五代时所建安阳天宁寺塔(又称文峰塔)的塔刹,可谓独居一格。该塔为五层楼阁式砖木结构,八角形,高 38.65 米。一般的塔,都是下

部比上部粗,但天宁寺塔却上部比下部粗得多,而在顶端又建了一座高约10米的喇嘛小塔,作为塔刹。这种独特的建筑式样,在国内现存塔中十分引人注目。

由于塔比一般建筑物高得多,所以登塔望远,使周围山川景色一览无余,往往使历代文人学士诗兴大发。我国古代不少文艺作品中,都曾写到中原的古塔。

二、桥 梁

中原的桥梁,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它们有些在技术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有些对促进社会发展起过重大作用。其中主要的有河桥、旅人桥、天津桥、州桥、虹桥等。

(一) 河 桥

我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桥是浮桥,《诗经》上所说的“造舟为梁”,“梁”就是浮桥,它是将许多船连在一起组成的。

中原历史上最有名的浮桥是河桥,它的遗址在今洛阳市吉利区南面的黄河上。由于这里古称河阳,所以这座浮桥又称河阳桥。

最早建造河桥的人是西晋时期的杜预。据《晋书·武帝纪》记载,这一带联系黄河南北交通的,原来主要依靠渡船,但黄河水深浪急,常有覆舟之患。于是杜预向朝廷建议,请求在一处名叫富平津(又称孟津)的地方建造浮桥,以解决交通问题。这个建议遭到许多人反对,他们认为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后人必定做不成。杜预力排众议,终于将浮桥造成了。

从西晋杜预以后,前秦苻坚、北魏孝文帝和唐宋以来都曾在这里造有浮桥。这座河桥虽然常因战争而烧毁,但烧了又建,它对连接黄河南北,推动经济发展,曾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河桥又是洛阳北面的门户。北魏和东魏曾在此建有河阳三城,派重兵把守。唐宋时期,

这里仍是有名的军事重镇。

（二）旅人桥

中国古代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石拱桥也在中原，它就是西晋太康三年（282年），在洛阳附近七里涧上建造的旅人桥。这座桥见于郦道元的《水经注》。据《水经注·谷水》记载，旅人桥“皆累石为之，亦高壮矣，制作甚佳。……下员以通水，可受大舫过也”。西晋修桥时，每天用工七万五千人。到北魏时，此桥仍在用。

（三）天津桥

天津桥是洛阳的古代名桥，位于洛水上。隋炀帝修建东都洛阳时，以洛水从城中穿过，有天汉之象，因建此桥。天津桥在隋朝只是一座浮桥，将大船并排而列，以铁锁钩连而成。桥之得名，是由于《尔雅》云：斗牛之间为天汉之津。天津桥长约一华里，位于隋唐洛阳城最主要的街道定鼎门大街上。

由于天津桥是浮桥，每当洛水泛滥时，常被冲毁，所以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年），将它改建为坚固的石桥。到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年），洛阳留守向拱又用巨石对该桥进行重修，使其基址比唐朝更牢固。

唐宋时期，许多诗人都写过关于天津桥的诗篇。如唐代雍陶《天津桥春望》诗云：“津桥春水浸红霞，烟柳风丝拂岸斜。翠辇不来金殿闭，宫莺衔出上阳花。”唐代孟郊《洛桥晚望》诗云：“天津桥下冰初结，洛阳陌上行人绝。榆柳萧疏楼阁闲，月明直见嵩山雪。”宋代邵雍《天津桥晚步》诗云：“芝盖久稀疏，暮云空块垒。旧年旧都城，一片闲宫阙。禁籞尚连延，脉棱犹岷嶷。桥势横雌霓，堤形偃初月。灞润岸已深，汉唐时未歇。危亭独坐人，浪把兴亡阅。”这些诗歌，有的描写风光，有的感叹兴亡，对我们了解唐宋时期天津桥的情况都是很重要的材料。

（四）州桥

州桥是北宋开封汴河上的名桥。它的位置很突出，由皇宫正门

宣德楼通到京城正南门南薰门的御街，就从州桥上通过。州桥正名叫天汉桥。它比较低平，桥下不能通行大船，只有平船可过。桥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笋、楹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东京梦华录》卷一）。桥北头的御街西边，建有东西两阙。

州桥在唐代就有了，那时称汴州桥。只是到宋代，名声才大起来，人们称它时，也把“汴”字省去了。许多诗人都写过有关州桥的诗篇。南宋范成大于乾道六年（1170年）出使金国，途经开封，曾写下一首《州桥》诗：“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反映开封被金人占领后，人民对山河破碎的悲伤心情。这首诗影响很大，使州桥在当时成了北中国大好河山的代表，震撼着爱国者的心灵。

明末以后，开封被黄河水淹，汴河淤没，州桥也埋入地下。直至1984年，由于建筑施工，州桥被挖出一孔，人们才从地下又见到它的一部分面容。

（五）虹 桥

虹桥也是北宋开封的名桥，它位于开封东水门外七里的汴河上。桥下没有一根柱子，皆以巨木架设而成，宛如天上的彩虹一般。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曾生动地描绘过这座桥。凡看过这幅画的人，很少有不被画上这座桥的气势所震动的。中国现代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说：“它的结构非常奇巧，堪称举世无双。”（《名桥谈往》，《文汇报》1962年9月29日）

（六）小 商 桥

上述诸桥，今天都不存了。据考古工作者近年来的调查，河南境内现存的古桥尚有一百六十多座，它们分布在十七个地市的五十多个县。从种类上分有拱桥（以豫北为多）、梁桥（以豫南为多）等。从建筑材料上分有石桥、砖桥、木石混合桥等。今天中原所存古桥中最有

价值的是临颍县的小商桥,它是一座坦拱敞肩石桥,据记载建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已在小商河上屹立了一千四百多年。桥长21米,宽6.5米。由20条拱石并列而成,造型、结构与河北省赵州桥相似。桥两侧雕有兽面、云龙、花卉等图案,桥墩下部有浮雕力士像。其雕刻技法和风格,有的酷似南北朝时期的作品,有的与汉代画像石相似。对研究我国古代桥梁建筑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三、陵 墓

中原地区历史悠久,所以古墓很多。

(一) 商代和战国墓

原始社会的墓葬,比较简单。《易经·系辞》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这种墓葬在中原地区曾多次发现。

到了商代,中原墓葬的规模已经很大。殷墟中大墓的墓穴,皆是方形的深土坑(竖穴),墓穴由斜形墓道与地面相通。大的墓穴有的深达13米,墓道长32米,墓的面积达460平方米。墓穴中有木料制成的椁,椁中放棺。这种形式,后人称之为木椁深葬制度。殷墟中,有些奴隶主贵族的墓陪葬品很多。如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西北发掘的妇好墓,就出土文物1600多件,很多是稀世珍品。这座墓葬对研究商代后期历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现在还弄不清商代的墓上到底有没有土作的坟堆和其他地面建筑物。但到战国时期,地面上已经有坟。这有河南辉县出土的战国墓可以作证。辉县战国墓上的坟,是一座夯土台,从台上的柱础可以看出,上面原来建有享堂之类的建筑物。墓穴深18米。穴中以石板铺底,木椁建于石板之上。为了防水,椁上和四面用木炭和沙土封严,再上面用夯土填满。

战国时期,中原许多墓葬的建筑都十分精致,随葬品也很丰富。

1956年在信阳县长台关出土的战国早期大型木椁墓就是这样。该墓的七个墓室,系用五百余根刨平的条形方木砌成,木与木之间扣榫合缝,坚固异常,国内罕见。

(二) 汉 墓

从战国末年起,中原开始出现空心砖墓。西汉时,这种空心砖墓已很普遍。这种空心砖,在河南农村中的许多地方,现在可以随时见到。它们有的被砌在墙上,有的被放在房前屋后当搁板用。这种砖有的长达一米以上,宽达三、四十厘米,厚达十多厘米,中间是空的,就像我们现在盖房用的小型预制水泥板。砖面上有各种花纹。河南人称这种空心砖为汉砖。空心砖墓不再用木椁,而用空心砖组成墓室。用这种砖比用木料,既省事,又防腐,是建墓材料上的一次重大改革。但这种空心砖的不利之处是容易断碎,因而到东汉以后,这种空心砖墓室逐渐被小砖(实心的,比现在的砖略大)砌的拱形墓室所代替。

除了大量砖墓之外,两汉时期,中原还有许多墓以长条形的石块建成墓室。这些石块往往跟空心砖的大小差不多。这种石墓的墓壁上常刻有许多画像,所以人们称这种墓为画像石墓,而把墓中有画像的石头称为画像石。近代以来,南阳一带曾出土很多具有极高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画像石。与此同时,两汉时中原的砖墓中也常有许多极富艺术特色的壁画。

两汉时期,也有因山为陵,以山为坟,在石头山中凿洞作为陵墓的。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梁孝王墓,就是凿山而成。这座陵墓,墓道长50余米,墓穴宽达30余米,由前室、中室、后室、耳房、侧室、回廊等组成,结构复杂,规模宏大。它使原来的山成了一座坟堆,而山下全被挖空了。这座陵墓的墓室不是用木料建的,也不是用砖石砌的,而是根据墓的建筑要求,在山中凿的隧洞,隧洞的上下左右都是浑然一体的完整山石。当时,尚未发明火药,全靠人工凿石钻山,其工程之艰巨,实在令人惊叹!

两汉以来,中原墓葬的地下建制已经基本上固定下来:广大无钱的老百姓一般皆用土坑埋葬;凡是有钱的人家皆用砖石砌成较大的墓室。这种情况,历唐宋而经明清,一千余年,没有多少变化。

(三) 历代名人墓

由于中原地区曾长期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全国名人会聚的地方,所以中原大地上,历来多名人之墓。它们大多完整地保存下来了。如虞城县有商朝贤相伊尹墓,高大的墓冢前面有祠堂一所,为元代所建,明代重修。伊川县有北宋名臣范仲淹墓,墓冢旁边的碑楼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撰《范文正公神道碑》,至今巍然屹立。欧阳修自己的墓也在河南新郑市,墓前石人石兽依然,享堂完好。郑县的小峨眉山,有宋代文豪苏轼、苏辙及其父苏洵的墓园。墓园外有围墙,墓园中古柏森森。墓旁祠堂内的三苏坐像,系元代所造,历六百余年而神态奕然。

(四) 皇陵

历史上许多皇帝的陵墓也在中原。如淮阳县有太昊陵,始建于春秋时期。太昊即伏羲氏,是传说中的三皇之一,为人类的始祖。他的陵墓很高大,汉唐以来,一直受到保护和祭祀。墓冢前现存的殿宇,系明代重建。洛阳有东周皇陵。孟津县有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陵墓,古柏苍翠,墓冢高大。东汉明帝、章帝、和帝的陵墓,皆在洛阳东北的邙山上。西晋的皇陵,如晋文帝司马昭、晋武帝司马炎的陵墓,都在偃师市的首阳山一带。北魏孝文帝、宣武帝、孝庄帝的陵墓均在洛阳北面的邙山上。五代后周的皇陵在新郑市,其中周世宗柴荣的陵墓最大,墓冢高三丈,墓园中有石碑四十余通。

中原皇陵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宋皇陵。位于河南巩义市,陵区方圆数十里。这里有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七个皇帝和太祖之父宣祖赵宏殷的陵墓。在这些皇帝陵墓的附近,还有后妃、宗室、大臣的陪葬、陪葬陵墓数百座,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陵

墓群。

北宋皇陵地区的形势是，南有嵩山，北有洛河和黄河。

北宋每个皇帝陵墓的建筑规格，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平面布局上，每个陵墓都由上宫、下宫组成。上宫是陵墓主体，是墓冢（当时称陵台）所在地。北宋皇陵的墓冢与明清以后皇陵的墓冢呈圆形不同，而是四方形的，下大上小，分阶层，冢顶是平的。这种形制是继承了汉唐以来的传统。墓冢四周有围墙，称神墙。神墙四面有门，叫神门。南面的神门外有宽阔的神道，两边排列石刻的文臣武将、外国使臣、宫女，以及石马、石狮、石虎、石羊、瑞禽、望柱等，是国内罕见的宋代石刻宝库。

北宋皇陵在近代以来没有被挖掘过，地下的情况不太清楚。《宋史·礼志》云：宣祖永安陵“皇堂下深五十七尺，高三十九尺，陵台三层，正方，下层每面长九十尺”。太宗永熙陵“皇堂深百尺，方广八十尺，陵台方二百五十尺”。真宗永定陵“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可见北宋皇陵的地下规模是很大的。皇堂就是安放棺槨的地宫。由于年深日久，风吹雨蚀，宋太宗的永熙陵以前曾暴露出一部分墓室，从暴露的部分可见该墓室顶部画有天象图，四壁画有飞鸟、人物和楼台城郭等壁画。

北宋皇陵的下宫都在上宫的西北方，全为地面建筑，是供奉皇帝遗像，“朝暮上食、四时致祭”（《宋史·礼志》）的地方。这种形制与明清时期的皇陵也不相同。明清时期的皇陵，都将享堂、祭殿一类的建筑放在墓冢的前面。

有些朝代的皇帝一即位就修墓，而宋朝不是这样，宋朝的皇帝死后才修墓，且又规定死后七个月内必须安葬，因此修墓工程是很紧张的。

北宋皇陵区内共有二十一座皇后墓，它们都单独成陵，不与皇帝合葬，其体制、布局与皇帝一样，只是规模比皇帝小一半。

《旧唐书·吕才传》说：“《葬书》云：富贵官品，皆由安葬所致；年命延促，亦曰坟垅所招。……今（指唐）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又说：“言五姓者，谓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这种将姓氏分属五音的规定，是“以赵姓为角”。“角”对地势的要求是东南高西北低。宋朝时，非常迷信这种风水理论，因而整个北宋皇陵，南有嵩山，北有洛河和黄河，大地势是南高北低。而每个陵园的地面布局，也是由南向北从神道，到陵台，到下宫，地面逐渐降低，这跟其他朝代的皇陵，进入神道之后，地势逐渐升高的宽敞气势很不一样。

第四节 中原民居

中原古代建筑，不仅在城市、园林、桥塔、陵寝方面有其特色，而且在民居建筑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由于地面广阔，中原各地的民居情况并不完全一样。总的说来，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房屋，一类是窑洞。

一、房屋

（一）原始民房

中原地区的房屋建筑经历了一个艰辛而又长期的发展过程。远古时期，中原的原始人群主要居住在洞穴内。他们不会盖房子，所住的洞穴也不是自己挖的，只是一些天然山洞之类。如安阳西南30公里的小南海原始洞穴遗址就是这样。这里是旧石器晚期遗址，距今约二万年。据科学判断，该洞开口于更新世晚期，先被鬣狗霸占，后来才被人类占有。

自然洞穴太少,很难找到,找到了,有时也不适用。后来,人们逐渐学会自己挖洞。从而由穴居、半穴居,发展到在地上建房子。到原始社会晚期,中原人民已经可以任意建筑自己需要的房屋了。

考古工作者在偃师市汤泉沟发现的房屋遗址,就是一个穴居式建筑,底大口小。穴坑底径2米,口径1.5米,深2米。穴坑内有木柱,木柱上安有脚蹬,以供居住者上下行走。估计当时人们会在坑底放草和兽皮,坑上面用树枝和草覆盖。

再往后,穴坑越来越浅。下面是坑,上面搞些建筑。洛阳孙旗屯发现的房屋遗址,就是个只有1米深的穴坑,穴坑上有篷盖,篷盖的一边有门。这是半穴居住宅,比全穴居进了一步。这个穴居住宅尚未有墙。

穴坑也逐渐由圆形变为方形。陕县庙底沟发现的原始房屋就是方形的。房屋下部有半米左右深的穴坑,穴坑中间有立柱4根,柱下用砾石作柱础。穴坑四周有立柱18根,这说明当时已经有墙。屋底地面很光滑,并涂有白灰。

郑州大河村出土的房屋已经是地面建筑,不但有排房,而且房子也分开间头来了,并有了套间。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地面连间建筑物。大河村遗址上的房基,距今约五千年,最高的墙壁保存有一米多。从残留的墙壁上,可以看出这些房子的建筑方法:在建墙的地方,先挖基槽,槽内栽柱,柱上绑横木,使柱与柱相连,又在柱与柱之间绑一小捆挨一小捆的芦苇,再在芦苇外面,涂以草泥,用火烤干,就成了墙壁,坚硬光滑成青灰色。然后在上面放上屋架,盖上草,房子就建成了。

上述房屋遗址,基本上都是仰韶文化时期不同阶段的房屋建筑。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原的住房已出现夯筑和土坯墙。如永城市王油房龙山文化遗址有一座圆形房屋,墙壁已用土坯,其砌土坯的方法与现代相同。汤阴县白营龙山文化晚期房屋,不但用土坯砌墙,而且屋内

地面经过夯打。

（二）商周民房

商代中原的房屋大多为版筑，其建筑方法有点类似今天中国东北某些地方的“干打垒”。如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商代中期房屋中，凡是较大的房屋都有版筑墙和夯土地基。到商代后期的殷墟，不但房基用夯土筑成，而且房屋柱础都用天然鹅卵石，以较平的一面朝上。有些柱础石上还垫有铜盘，上面再接柱脚。

中原地区，西周时已有板瓦、筒瓦、脊瓦和瓦钉。东周时用瓦已很普遍，并产生了瓦当。洛阳就曾出土很多东周的瓦当和瓦钉。砖的出现较晚，大约是在战国时期。砖瓦的发明，是建筑上的重大进步。从此，中原地区的建筑材料焕然一新。

（三）汉代民房

汉代的房屋，大多用木架结构，屋顶主要是悬山式。整个屋顶重量，由木架支撑，墙体很少起承重作用，因而可使门窗大小任意设计，室内光线充足。

汉代大型住宅，常用墙围成院落，前堂后寝，左右对称，注意长幼尊卑制度；或者建成三合院、日字院等。汉代中原房屋的实物已不可见，但从画上可以见到。郑州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有房屋住宅图形。该图形分前后两个院子，前院以围墙组成，大门在右侧，门边有双阙。院内种花木，停车马。后院的门在左侧，门上有双檐庑殿顶。门内建房屋，供居住用。后院内也种花木。从这块画像砖上可以看出，汉代中原已经出现多重庭院相组合的建筑布局。

中原汉墓中曾出土许多造型优美的明器陶楼。其中河南陕县出土的一座陶楼为三层，层与层之间，以斗拱承托腰檐，檐上加平座，平座四周有栏杆，平座上再建楼层。河南荥阳出土的一座陶楼为七层（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层数最多的古代陶楼），楼基为须弥座，从第三层起，每层四面出檐，周围有回廊，用台阶式楼梯。这些陶楼的建筑式样

可能就是汉代中原楼房的一般建筑格局。

（四）南北朝和唐代民房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许多贵族的住宅都有私家园林，一般居民的住宅，也比较注意美化庭院，体现了使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特征。河南泌阳县发现的东魏造像碑上有一幅住宅图，图上的宅院周围有回廊，廊用直棂窗。这可能就是当时比较常见的住宅建筑式样。

南北朝以来，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他们带来了高的坐具，开始改变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唐后期和五代时，中国家具发生一次重大变革，终于使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到宋朝时被彻底改变过来。家具的形状影响了室内布置的格局，房子也要求建得高大起来。

（五）宋代以后的民房

北宋时期的中原民房情况，在《清明上河图》中有较好的反映。从图上看来，当时的农村住宅比较简陋，主要是茅屋，盖瓦的不多。城市住宅都是瓦房，一般用悬山，有的房屋设有天窗。既有单独的房屋，也有建成四合院、三合院的。凡有院落的住宅，院里一般都种有树木花草，院门上有门楼。

中原民间住房，明清以来虽然有所发展，但总的格局，北宋时期就已经定下来了。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古代的气候比较温和湿润，适宜树木生长，所以长期以来，中原的古代住房，主要利用木料作骨架，用砖石或泥土砌墙，上面盖以草或瓦。为了防寒避风，中原房屋的方向主要向南，以便吸收阳光；墙和屋顶较厚，外观庄重。

中原古代人民，根据各自不同的居住环境，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曾创造出各种不同式样的住宅。据刘景向等人在六十年前编写的《河南新志》卷三说，当时河南农村中的居住情况基本上是这样的：第一，淮河之南，丘陵起伏，河流纵横，山上多梯田，农民多

分散居住，一、二家，三、四家一处。房屋大多为土墙，上面盖草，一家数间不等。房子虽然比较矮小，但宅外环山抱水，树木茂盛，风光极好。房前屋后，常有水池，养鱼种荷。第二，伏牛山区，山势崎岖，层峦叠嶂，涧谷深幽。山中平地不多，聚居不易，一般村子只有十户八户人家，分布在山坡涧侧，很少能见到数十户上百户的村子。房屋大多以石作墙，以茅草覆盖。一般没有院墙，只以竹竿树枝编成短栅。第三，平原地区，地势平坦，宜于耕种，人烟稠密，多聚居之村，一村多至数百户。为了防御兵匪，村周筑墙，形成寨堡。第四，荥阳以西直至潼关，老百姓多住窑洞。太行山深处亦时有住窑洞的人家。第五，陕县一带，宿炕之风很浓，屋内无床，筑土或砖为炕，冬天烧暖后再卧。安阳一带也有宿炕之风，南至淇县、浚县，就不多见了。其他地区大多用床。《河南新志》虽然是1929年编写的，但书中所说的这些情况，跟清末以前的河南民居，基本上是一样的。

二、窑洞

（一）中原窑洞的分布和特点

窑洞是一种极为古老的，又是一种至今还被运用的建筑类型，是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农村住宅的重要形式，体现了黄土高原地区的风土民情和环境特征。它就地取材，因地制宜，造价低，建筑技术简单。

我国窑洞民居，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上游的甘肃、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区。河南省的窑洞民居，又集中分布在郑州以西的黄河南岸各县市，如荥阳、新密、巩义、洛阳、孟津、新安、渑池、陕县、灵宝等地，其中又以荥阳、巩义和洛阳周围地区的窑洞最多，建筑式样最典型。

住在窑洞里,冬天的温度比地面房屋暖和,夏天的温度比地面房屋凉快。窑洞内的温差,昼夜变化很小。如荥阳市有些地方,一般窑洞内冬天温度保持在 7°C 左右,夏天保持在 33°C 左右。而地面房屋内,冬天有结冰现象,夏天有时热到 37°C 。

(二) 中原古代窑洞

人类祖先早就知道土的特性,他们在原始社会就挖掘自地面直上而下的竖穴居住。而窑洞是横穴,它跟黄土山坡峭壁成直角,方向与地面平行,与原始社会人们居住的竖穴不同。至于窑洞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的,由于缺少必要的资料,目前尚难说清。但可以断言,窑洞的出现也是很久以前的事,很可能从原始社会以后,黄土高原上的人们就开始建造这种横向的洞穴供自己居住了。

中原地区的窑洞民居,比其他地区更早见于文献记载。《三国志·曹爽传》云:曹魏后期,曹爽专权,在首都洛阳“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这种窟室就是窑洞。到北魏时,这所窑洞尚未毁坏。到唐代,大诗人杜甫也诞生在河南巩县的一所窑洞里。这所窑洞位于今巩义市南窑湾村。现在,以这所杜甫诞生窑为中心的杜甫故里已成为旅游胜地。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本《巩县志》卷四云:“李密窑,在县南黄冶村。密幼生于此,窑址尚在。”又云:“曹皇后窑,在县西南原良保。宋皇后曹氏幼产于此,因名。”由此可见,隋朝末年瓦岗军中的李密和北宋曹皇后也都是诞生在巩县(今巩义市)窑洞里的。

南宋绍兴九年(1139年),朝廷收复陕西,秘书少监郑刚中随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去该地进行安抚。郑刚中回临安(今杭州)后,曾写《西征道里记》一书,记载他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书中谈到当时河南一带的窑洞情况说:“自荥阳以西,皆土山,人多穴居。”并介绍当时挖窑洞的方法说:“初若掘井,深三丈,即旁穿之。”又说:在窑洞中“系牛马,置碾磨,积粟凿井,无不可者”。这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宋代最

为详细的记载中原窑洞情况的资料。

明清以后,有关中原窑洞的记载逐渐多起来,有些诗人也开始描写中原窑洞地区的风光,如清人陈维崧《巩洛道中书所见》诗中,就出现了“巩洛饶陂陲,水上互蟠结”、“居民数百家,伏处类巢穴”(乾隆《巩县志·艺文》)一类的诗句。

好的窑洞可住几代、十几代人。中原现存的许多窑洞,由于开挖的时间无考,究竟有多长历史,已很难弄清楚。

(三) 中原窑洞的类型

中原地区的窑洞,长期以来,基本上形成了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靠崖式窑洞。这种窑洞建在黄土谷沟或峭壁之下。黄土高原经过长期雨水冲刷,沟壑纵横。人们便在沟畔、崖边挖窑洞居住。根据其所在位置的不同,靠崖式窑洞又可分为沿沟式窑洞和靠山式窑洞两类。沿沟式窑洞凿在冲沟两岸的崖壁上,冲沟两边都有窑洞,窑洞门都朝向冲沟。窑洞前边的地方不如靠山式窑洞前边开阔,但更有利于避风沙,冬天也较暖和。靠山式窑洞凿在黄土山坡上。有些山坡,可以顺着山势,上下建两三层窑洞,参差成台梯式。每个窑洞前面,都修有平台。

这些窑洞的门口,常用砖镶砌成墙,中间留有门洞,门洞上安窗,窗下安门,或者将窗户安在门旁边。窑洞门上方,一般都用砖砌成屋檐,以防雨水冲刷。整个窑洞前面的部分都称为窑脸,一般人家的窑脸都装修得比较漂亮。窑洞内部一般是狭长的,长度往往是宽度的三、四倍,少数甚至七、八倍,可长达20米左右。窑洞顶部都呈半圆或尖圆的拱形,使上面的重量沿抛物线方向分散到两边。若要一洞多室,窑洞中间可留隔墙,再向深处发展。有时也有二、三个洞互相平行地挖在一起,它们之间在内部以门洞相通,对外只有一个洞有门,其他洞皆于外侧开窗采光。有些窑洞之上,隔相当厚度的黄土,又再挖窑洞,称为“天窑”。由下层窑顶穿洞,用梯子登上天窑;也有在洞外另

挖阶梯的。天窑往往较小,只作贮藏之用。也有的窑洞较高,内部用板隔成上下两层,用木梯上下。窑洞内部还常挖有壁龛,以便存放物品。窑洞内壁有的用自然土面,有的刷上石灰,或者用砖券砌。窑洞后部,光线较差,一般只作贮藏室。窑洞前部,空气和阳光充足,一般放灶、床(炕),作起居之用。窑洞内大部分陈设也跟房屋一样。

靠崖式窑洞门外,有时用墙围成院落。有时也配合窑洞建一些房屋,住户们又常将这些窑洞和房屋用墙连起来,组成院落。众多的窑洞院落集中在一起,就形成窑洞村落。

第二种是天井院式窑洞,又称地坑院或下沉式窑洞。这些地方,由于没有垂直的崖面可以利用,人们便先在地上挖成长方形或正方形的天井式的地坑,造成人工崖面,再在地坑四周挖出窑洞。这种地坑,类似庭院。地坑的深度,由窑洞的大小决定,一般皆深达数丈。地坑的范围大小,取决于所要求的庭院大小。地坑四面所挖的窑洞,一般都分主次,如一边挖三洞,则中间为主室,两边为辅室。天井院用隧道与地面相通,为了使入口尽量与天井院靠近,隧道常采用折角方式,有些隧道入口还建有门楼。窑洞上面为场圃田园。天井院中排水,一般都是在院内挖渗井,有些渗井深达10米以上。有时几个天井院之间用隧道沟通,合用一个入口。为了识别和保护之用,天井院周围的地平面上都建有矮墙。在天井院中可种植树木花草,也能喂养牲口、家禽。当然,天井院中的鸡窝、猪圈、牛棚等也都是窑洞。天井院中窑洞的建筑式样跟靠崖式窑洞基本上一样。

在中原地区,有些天井院只有一户人家,也有些天井院住好几户人家,各家又有一个小院落。天井院多的地方,便组成了天井院窑洞村落。如河南巩义市有由二十多个天井院组成的窑洞村落,洛阳以北邙山上有由二百多个天井院组成的窑洞村落。这些都是国内有名的地下村庄。

第三种是独立式窑洞,又称为锢窑。这种窑洞不临沟、不靠崖,也

不在天井院中。它实际上就是在地面上建的窑洞式房屋。独立式窑洞皆用砖石或土坯券成,室内不用木料架构,窑洞上面堆积较厚的土层。独立式窑洞常由多孔排列在一起,亦可建成四合院。独立式窑洞,用材简单,施工方便,也具有一般窑洞冬暖夏凉的特点。由于它纯属人工建造,所以在建筑设计和空间安排上,更可以发挥创造性。许多住惯了窑洞,而又难以找到可挖窑洞的地方的人,常喜欢建造这样的住宅。不过,这种独立式窑洞在整个窑洞民居中比例很小,形成村落的更不多。

凡是挖在黄土中的窑洞,窑洞门口的崖壁都削得很陡,这是为了防止雨霖而造成倒塌,因为斜坡易塌。窑洞上面一般都做成平顶,以防积水。根据中原地区的习惯,窑洞院里的主窑一般住长辈,非主窑住儿孙。凡是作仓库用的窑洞,顶部一般都凿有孔穴,以便倾谷入仓。

中原地区的黄土高原上,由于居住窑洞的人家,不在天井院中,便在崖下沟中,因而在这些地方行走,常听到鸡鸣狗吠之声,就是见不到村庄和房屋。甚至在沟深的地方,连树梢也在地平线之下,不走到近旁,不知有人家。有时沟边的树木将沟遮严,游人往往见不到沟有多深,而误以为街道。夏天洪水暴发,沟中有水,两崖人家可相望对谈,但很难往来。这些窑洞地区的风光,十分别致,也相当有趣。

第五节 李诫和《营造法式》

中原古代建筑如此辉煌,但主持这些建筑工程的建筑学家,大多没有留下名字来,因为在封建统治者看来,他们只不过是一些工匠,是不把他们当作科学家看待的。但有成就的建筑学家毕竟太多,想完

全抹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诫。

李诫(?—1110年),字明仲,北宋郑州管城(今河南郑州)人。曾任曹州济阴县(今山东曹县北)尉、将作监主簿、将作监丞、将作监少监等职。他在将作监做官时,曾主持修筑龙德宫、开封朱雀门、太庙等大工程,为北宋后期著名的建筑学家。

李诫一生最大的贡献是编著了一部《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最好的一部建筑学著作,它总结了前人和宋朝当时的建筑成果,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李诫在《营造法式》中,统一建筑规格,制订施工用料和劳动定额,确定设计和施工制度,记述建筑规程。它是利用文献资料,又利用当时工匠们的工作经验和行之有效的法则,并跟工匠们共同研究,经过总结、提炼后写出来的著作。书中画有图样,文图配合,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际操作价值。

《营造法式》原为三十六卷,现传本为三十四卷。全书分五个方面的内容:(1)序。(2)总释、总例。(3)各作制度(分十三个工种)。这是书中最珍贵的部分。如它规定柱子都要向建筑物的中心略作倾斜,边上的柱子要比中间的柱子略高,以便增加建筑物的稳定性等,都具有很大科学价值。(4)功限和料例。(5)工程图样。有平面图、剖面图、立体图等,非常精细。

《营造法式》的内容十分严密丰富,体例也很完整。

第一、二卷是《总释》、《总例》。《总释》引用古代文献,讲解什么叫宫、阙、殿、堂、城、墙、柱础、飞昂、梁、柱、铺作、平坐、椽、檐、平棋、钩阑、搏风、露篙、门、窗、华表、屏风、斗八藻井、拒马叉子、鸱尾、彩画等近五十个建筑上的专用名词,并讲解了宫、城、井、瓦等建筑物及建筑材料的起源。《总例》类似近代著作中的“凡例”,讲解《营造法式》写作中的总原则,指出书中某些名称的含义。如书中讲施工时限,提到“长功”、“中功”和“短功”之分,那么长、中、短又是如何划分的呢?《总

例》解释说：“诸称长功者，谓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中功谓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短功谓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这说明长、中、短功是根据白天长短而定的。而长功、中功、短功之间相差多少呢？《总例》说：“诸称功者，谓中功以十分为率，长功加一分，短功减一分。”而功的大小又是根据什么人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呢？《总例》说：“诸式内功限并以军工计定，若和雇人造作者，即减军功三分之一。（原注：谓如军工应计三功，即和雇人讲二功之类）”这些规定都是非常具体而又科学的。

第三卷至第十五卷主要论述各作制度。其中第三卷是《壕寨制度》和《石作制度》。《壕寨制度》讲城、墙等建筑物的建筑方法和尺寸规定。如书中讲到墙的厚度与高度的比例时说：“筑墙之制，每墙厚三尺，则高九尺，其上斜收比厚减半。若高增三尺，则厚加一尺，减亦如之。”《石作制度》讲柱础、殿阶螭首、踏道、马台、井口石、趺趺鳌座碑的制作方法和尺寸规定。如“柱础”条云：“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原注：谓柱径二尺，即础方四尺之类。）方一尺四寸以下者，每方一尺厚八寸；方三尺以上者，厚减方之半；方四尺以上者，以厚三尺为率。”

第四、五卷是《大木作制度》，讲栱、斗、梁、柱等的制作方法和尺寸规定。

第六卷到第十一卷是《小木作制度》，讲各种门、窗、照壁板、藻井、井亭子、转轮经藏、壁藏等的制作方法和尺寸规定。

第十二卷是《雕作制度》、《旋作制度》、《锯作制度》和《竹作制度》。《雕作制度》讲建筑部件的雕花方法。《旋作制度》讲建筑部件的旋作规定。《锯作制度》讲“拌墨”、“就余材”等锯作规定。《竹作制度》讲篱笆、竹栅等造作规定。

第十三卷是《瓦作制度》和《泥作制度》。《瓦作制度》讲“用瓦”、“用鸱尾”、“用兽头”等方法和有关规定。《泥作制度》讲“垒墙”、“立

灶”、造茶炉等方法和有关规定。

第十四卷是《彩画制度》，讲“碾玉装”、“五彩遍装”、“丹粉刷饰屋舍”等为建筑物进行彩绘的方法和技术要求。

第十五卷是《砖作制度》和《窑作制度》。《砖作制度》讲“用砖”、“垒阶基”、“铺地面”、“筑井”、“垒墙”等的方法和有关规定。《窑作制度》讲烧制砖、瓦、琉璃瓦和建窑的方法及大小比例规定。

第十六卷至二十五卷主要论述各种工程的“功限”，即计功标准。其中第十六卷是《壕寨功限》和《石作功限》。《壕寨功限》讲“筑城”、“穿井”、“筑墙”等的计功标准（每个工的工作量）。如书中规定，“诸于三十步内供土筑城，自地至高一丈，每一百五担一功”。《石作功限》讲柱础、踏道、殿阶螭首等的计功标准，其中又分雕鏤功、剜凿功、安砌功等，各自都有不同的工作定额。

第十七卷至十九卷是《大木作功限》。其中十七、十八两卷讲制造斗拱等建筑部件的计功标准，由于这些部件的种类、大小不同，所以又规定有不同的定额标准。第十九卷讲殿堂梁柱、仓敖库屋、望火楼的计功方法和标准定额。

第二十卷至二十三卷是《小木作功限》，讲门窗、水槽、井屋、照壁屏风骨、斗八藻井、佛道帐、转轮经藏的计功方法和标准定额。不同规格又有不同的功限规定。

第二十四、二十五卷是《诸作功限》，讲雕木作、旋作、锯作、竹作、彩画作、砖作、窑作、泥作的计功方法和标准定额。如书中规定，柱头雕“坐龙，五寸，四功。每增减一寸，各加减八分功。其柱头如带仰覆莲荷台坐，每径一寸，加功一分”。柱头雕“狮子，六寸，四功二分”。柱头雕“鸳鸯，四寸一功”。彩画，“五彩遍装亭子廊屋散舍之类五尺五寸”，“各一功”。“上粉贴金出靛，每一尺一功五分”。“垒窑每一座，大窑三十二功，曝窑一十五功三分”。

第二十六卷至二十八卷主要论述各种工程的用料数目。其中二

十六、二十七卷是《诸作料例》，集中讲石作、大小木作、竹作、泥作、砖作、窑作、彩画作所用料数。如彩画作规定，每调和颜色一斤（以十六两计），绿色用“雌黄八两，淀粉八两”；紫檀色“常使紫粉一十五两五钱，细墨五钱”。泥作规定，每方一丈，若用红石灰，则用“石灰三十斤，赤土二十三斤，土朱一十斤”。若用黄石灰，则用“石灰四十七斤四两，黄土一十五斤一十二两”。

第二十八卷是《诸作用钉料例》和《诸作用胶料例》，讲诸作用钉大小和用钉数目以及用胶数量。如规定大角梁每一条用钉一枚之类。又如小木作规定，每方一尺，缝用胶二两，卯用胶一两五钱等。本卷还有《诸作等第》一目，讲诸作技术等级。每作皆有上中下三等，工作难的等第高，工作易的等第低。如小木作，造斗八藻井为上等，造格子门为中等，造直缝板门为下等。又如彩画作，五彩装饰为上等，青绿棱间为中等，刷门窗为下等。

第二十九卷至三十四卷是图样。其中第二十九卷是《总例图样》、《壕寨制度图样》和《石作制度图样》，画图表明有关用具和各种建筑部件的图案及形状，如踏道、螭首、望柱的形状和柱础上所雕的图案之类。

第三十、三十一卷是《大木作制度图样》，画斗拱、梁柱形状，铺作转角正样，以及各种殿堂的形状。

第三十二卷是《小木作制度图样》和《雕木作制度图样》，画各种门窗、佛帐形状和雕刻图案。

第三十三、三十四卷是《彩画作制度图样》和《刷饰制度图样》，画五彩杂华、五彩琐文等图案，并指明各种颜色所上的部位，还有人物、飞禽走兽的画法等。

据《营造法式》书末的《总诸作看详》说，整个《营造法式》共三百五十七篇，计 3555 条，其中四十九篇 283 条，是根据古代文献资料而写的，其余三百零八篇 3272 条，都是根据当时的建筑实践写出来的，

可见该书开创之功如何巨大。《营造法式》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原地区的建筑水平,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光辉成就。特别是它所制定的“材分制”,是对建筑物构件进行标准化加工的制度,能大大提高工效,一直沿用到清代。它在建筑物的艺术装饰和使用功能的有机统一上,在工程管理的严密性上,也达到很高水平。全书内容精确,记述全面,既是中国古代建筑学上的经典著作,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珍贵文献。

第十章 中原教育

中原教育,历史悠久。早在夏代,以传授间接知识为主的学校,就已在中原产生。

由于许多王朝都在中原建都,因此中原历史上不仅有各级地方官学和私学,而且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它们规模之大,生员之多,为当时世界所罕见。

唐代以后兴起的书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教育机构,曾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中原的书院也很发达。

教育的发展,使中原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教育家。他们曾为中国古代教育作出过重要贡献。

第一节 官学和私学

中原历史上有官学和私学两条办学途径。官学指官府办的学校,私学是私人办的学校。它们长期并存,互为补充。

一、官 学

中原古代官学包括奴隶社会的官学和封建社会的官学。奴隶社会的官学指夏、商、西周时期的官学,封建社会的官学是汉以后的官学。

(一) 中原教育的起源和夏商周官学

教育是在劳动中产生的。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传授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需要。

四、五十万年以前的南召猿人,已会用火和石器。这些技能不是生来就会的,需要有人传授。这种传授就是中原最早的教育。

二万年前的安阳小南海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器,都是通过一定程序打制成的。制作这些石器的方法需要经过传授和训练。这就是中原当时的教育内容。

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了磨制的石镰、石铲、陶器和猪羊骨骼,说明那时中原已有农耕和畜牧业。这些行业、技术的产生和发展都要依靠教育。

但原始社会的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其他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学校还没有产生。学校的出现是在奴隶社会建立以后的事。因为学校的出现,需要有脱离体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当教师,需要有文字作为传授知识的工具,也只有国家机器产生之后,才需要学校为它培养官吏。因此,学校的产生是与阶级社会的产生相一致的。

中原地区是中国最早进入阶级社会的地方。因而中国最早的学校是在中原诞生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教育文化的摇篮。

据文献记载,中国夏代已有庠、序、校三种类型的学校。夏代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中原地区。因此可以断言,中原地区的学校教育在夏代已经开始。

商代的主要活动范围也在中原地区。当时,文字已大量使用,已

出现书籍。学校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已分“大学”和“小学”两个施教阶段。主要知识分子巫亦兼做教师,他们懂原始宗教、天文、历法、医药、政治、艺术等。

在安阳殷墟甲骨文中,把“学”字写作𠄎。𠄎是卜筮时的象形符号,表明学的内容是卜筮之术。𠄎代表教与学的活动。介指教学场所。这就是商代中原学校的写照。

西周中原学校分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是诸侯所设的学校,位于诸侯国的首都。乡学是地方上的学校。

西周中原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是道德教育,乐是艺术教育,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写字,数是数学。它们包含了德、智、体、美等多方面的培养要求。

夏、商和西周时期,中原所有的学校都是官学。学校皆为官府所设,办学地点就在官府之中,当官的就是教师,史称“学在官府”。当时严格实行“政教合一”的教育体制,没有私人所办的学校。到西周末年以后,“学在官府”现象不能适应社会要求,这种奴隶制官学才逐渐被私学和独立于官府的封建官学所代替。

(二) 东汉曹魏西晋官学

东汉、曹魏、西晋三朝都以洛阳为首都,所以当时中原官学有中央级和地方级两类。

中原的中央官学有太学、鸿都门学、四姓小侯学、国子学等,皆设于洛阳。

中国封建太学创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它也标志着中国封建官学制度的确立。太学的教职由博士担任,太学的学生称博士弟子。太学初建时,规模较小。东汉时,太学达到了最繁盛的时期。

东汉太学设在当时首都洛阳城东南,即今偃师太学村。它是我国第一所影响最大的国立大学,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学校。

东汉洛阳太学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29年)。刘秀自己曾亲自到

太学,为诸生解释疑难,使学士云集。

永平二年(59年),汉明帝也曾到太学讲经,“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后汉书·儒林传》)。永平十五年(72年),明帝又到太学讲经一次。当时洛阳太学声誉很高,连匈奴也派人来留学。

汉顺帝时,对洛阳太学进行扩建,使之具有240房,1850室。让明经下第的人和公卿子弟都到太学读书。到汉质帝时,太学生发展到三万余人。

东汉洛阳太学的教师,都是经过考试、征召、举荐或由其他官员升迁而来的。他们大多为一代名儒,因而使太学的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太学教师也是朝廷命官,待遇优厚,除了教书以外,还有奉使、巡视和议政等任务。

东汉洛阳太学的学生,大多是从全国各地选拔来的。正式学生都有官俸。他们的出路,主要是经过考试录用为官,也有一些要回乡当教师。

大思想家王充、大科学家张衡、经学家郑玄,都曾是洛阳太学的学生。

东汉末年,太学生曾参与反对宦官黑暗统治的斗争。他们注重名节,坚持正义,不畏强暴,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东汉洛阳太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起初用《易经》、《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等十四经,每经各有一名博士讲授。后来又增加《论语》、《左传》、《穀梁传》等。

由于当时的经书,传授不一,内容各异。为了统一教学内容,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命蔡邕主持校正《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论语》七经,用隶书书写刻石四十六块,立于太学门外,史称《熹平石经》,这是中国第一部官定的标准教材。

东汉洛阳太学的教学方法是以老师讲课为主,高年级学生辅导低年级学生为辅。提倡自学,鼓励自由讨论。以考试的方法,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借此为朝廷选拔官员。

曹魏时,曾令各州郡为太学选派学生。当时洛阳太学有学生数千人。曹魏正始二年(241年),曾用古文、小篆、隶书三种字体,将《尚书》和《春秋》二经刻石二十八块,立于太学,史称《正始石经》,这是我国历史上又一部著名的石刻教材。当时太学的修业时间长达八至十年,主要任务是为国家培养官吏。

西晋时,洛阳太学有学生七千人。晋武帝司马炎曾三次到太学视察,皇太子司马衷曾两次到太学与师生见面。1931年在偃师太学遗址出土的刻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的《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上盛德隆熙之颂》碑上记载的就是司马炎和司马衷到太学时的情景。该碑所列学生名单,涉及15州70余县,还有4名西域学生。

鸿都门学是东汉时期的文学艺术专科学校,也是世界最早的一所文学艺术专科学校。因校址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学生以尺牍、小说、辞赋、字画为主要学习内容。

鸿都门学的学生大都是普通地主子弟,但毕业后都有很好的出路,“或出为刺史、太守,入为尚书、侍中,乃有封侯锡爵者”(《后汉书·蔡邕传》)。

四姓小侯学是东汉外戚樊、郭、阴、马四家所办的贵族学校。教材以《孝经》为主。

国子学创始于西晋咸宁四年(278年),限五品官以上贵族子弟方可入学,是晋代士族地主政治特权在教育上的反映,为晋代的高等贵族学校。

东汉时期中原地方官学与行政区划相一致。郡国设的称“学”,县设的称“校”,乡设的称“庠”,聚设的称“序”。都以儒家经书为主要学习内容。办学目的在于贯彻儒家思想,推行社会教化。

曹魏时,中原亦有地方官学。当时规定凡满五百户的县,都要设学官,管理学校。

西晋中原地方官学,有乡校等。由于国家力量不足,这些地方官学皆由地方长官创办,因而时兴时辍。

(三) 唐宋官学

唐代中原官学也有中央级和地方级两类。

中央级的官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都设在东都洛阳。它们约相当于首都长安这类学校的分校,人数分别比长安少。如唐高宗时,长安国子学有学生 80 人,洛阳国子学只有 15 人;长安太学有学生 70 人,洛阳太学只有 15 人;长安四门学有学生 300 人,洛阳四门学只有 50 人。

唐代洛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性质相同,都传授儒家经典,以培养官吏为目标,惟学生家庭出身品级有高低之分。

唐代中原地方级的官学有郡、县学和医学等。

郡、县学根据当地文化情况和郡、县大小分为上、中、下三等。上郡学学生 60 人,中郡学学生 50 人,下郡学学生 40 人。上县学学生 40 人,中县学学生 30 人,下县学学生 20 人。学生大都为庶民子弟。以儒家《九经》为教材,但只要通一经,即可毕业。毕业后可以升入四门学,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也可以由州县委任为小官。

无论中央官学还是地方官学,学生上学时,皆需缴纳学费,称作“束脩”。在校学生,都要参加旬考(十日一次)、年考(年终统考)、毕业考(学完全部规定课程后的考试),并享受旬假(每十日放假一天)、田假(在农历五月,放假一个月)、授衣假(在农历九月,放假一个月)。

宋代官学制度,大部分沿袭唐代,但比唐代完善。

因北宋首都在开封,故中原官学亦有中央级和地方级两类。

中央官学有国子学、太学、武学、律学、书学、算学、画学、医学、宗学、广文馆、四门学和道学等,皆设于开封。

国子学专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定员 200 人。这些贵族子弟,往往在科举考试前夕,才到学校补习功课,一到考试完毕,就又各自回家。所以国子学在中央官学中地位最高,但办学效果很差。

开封太学是宋代中央官学的主体,办学成绩最大。

太学主要招收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庶人中的俊秀分子。宋神宗时,实行三舍法,分太学生为外、内、上三舍,通过考试,依次升级。宋徽宗时,共有太学生 3800 人,其中上舍生 200 人,内舍生 600 人,外舍生 3000 人,是开封太学的极盛时期。当时太学院内,有官廨、讲堂、斋舍、亭园、射圃等,花木扶疏,规模宏大。

太学生主要通过考试录取,面向全国招生。

太学生须食宿在校,不准外宿,有事要请假。斋长负责考察学生的品行。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材。宋仁宗嘉祐年间,曾用篆、楷两种字体将《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九经,刻石立于开封太学,供师生阅读,史称《嘉祐石经》。

北宋开封太学,学术气氛很浓,著名教师有胡瑗、孙复、石介等。太学生们关心政治,忧国忧民。宋徽宗时,太学生陈朝老曾上书议政,批评宋徽宗的腐败行为;陈东曾上书指责蔡京奸佞误国。他们无所畏惧,感人至深。后来许多太学生还参加了抗金斗争。

武学是高等军事专科学校。主要学习《武经七书》,即《孙子》、《吴子》、《尉缭子》等。

律学是高等法律专科学校。官员、举子皆可入学。

书学是高等书法专科学校。主要学习篆、隶、草三种书体。

算学是高等数学专科学校。主要学习《算经十书》,如《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

画学是高等绘画专科学校。主要学习佛道、人物、山水、鸟兽、屋木及花竹的绘画技术。

医学是高等医药专科学校。分方脉、针灸、疡三科。以《素问》、《难经》、《脉经》、《伤寒论》等为教材。

宗学是为宋朝皇室子孙而设立的学校。

广文馆和四门学是为士子参加科举考试而设的预备学校。各地赴京应试的人士和已试而落第的举人皆可入学。

道学是为道士办的宗教学校。

宋代开封太学及各类专科学校，曾为中原和全国培养大批有用人才。

宋代中原地方官学皆按行政区划而设，主要包括府、州、军学和县学两级。这些官学的行政领导、师资力量和办学经费都有一定保证。

（四）元明清官学

元朝中原官学都是地方性的。除路、府、州、县学外，还出现了社学、医学、阴阳学和庙学。

社学是县以下普及文化教育的学校，为元朝所新创。元朝政府规定：“诸县所属村疃，五十家为一社，择年高晓农事者立为社长”，“每社立学校一，择通晓经书者为学师，农隙使子弟入学，如学文有成者，申复官司照检。”（《新元史·食货志》）

医学和阴阳学是科技类学校，一般由路级行政机构开办。

庙学是各地利用孔庙所办的学校。专门宣传儒家伦理道德。在祭祀前后办学，类似现在的讲习班，非常年学校。但由于它面向普通民众，在民间影响较大。

明代中原官学，主要是府、州、县学和社学两类。

朱元璋曾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革污染之习。”于是在全国大办学校，“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明史·选举志》）当时中原的

学官,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皆按级别给俸禄。学生称生员,皆为公费。每校生员皆有定额,最多不超过四十人。

清代中原官学沿袭明制。“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皆设训导佐之。”(《清史稿·选举·学校》)生员分廩膳生、增广生、附学生三种。廩膳生和增广生有定额,专收岁、科两试成绩好的。附学生是初入学的人。

明清中原府、州、县学的办学目的,是为了“善乡俗”和“育人才”。“善乡俗”就是要把年轻人培养成社会基层遵纪守法的乡民。“育人才”是经过科举道路,为封建政权提供官吏。

明代中原府、州、县学课程,分礼、射、书、数四类。其中礼又包括经、史、律、诰、礼仪等。

清代中原府、州、县学教材,有《御纂经解》、《性理大全》、《四子书》、《十三经》、《二十二史》、《三通》、《资治通鉴纲目》、《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等。

为了应付科举考试,明清府、州、县学生员,都把读写八股文作为必修课。

明清中原府、州、县学生员入学时要经过考试。在校时又有月考、季考、岁考。在校考试不及格,要降级、除名或扣除廩食。毕业考试不及格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学生在校不准过问政治。学校经费,主要来自官拨的学田收入。

明清社学,系继承元朝社学而来。朱元璋曾说:“今京师及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明太祖实录》洪武八年)清顺治皇帝也曾明令:“每乡置社学一区,择其文义通晓、行谊谨厚者,补充社师,免其差役,量给廩饩养贍。”(《钦定学政全书》卷六四)

社学是从事普及教育的学校,原为官办。明初以后,民办社学也逐渐增多起来。

二、私 学

中原私学有优良传统。早在春秋末期,孔、墨两大学派,就在中原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战国时诸子蜂起,中原私学进一步发展。汉朝建立后半半个多世纪,中原教育几乎全靠私学维持。汉武帝时,确立封建官学制度。其后,中原官学时有兴废,而私学却从未间断。

在中原私学发展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时期是战国、汉代、北宋和明清等朝代。

(一) 战国私学

中国私学大致起源于春秋晚期。孔子是中国最早开创私学教育的大人物之一。

孔子的弟子中有很多中原人,他们大多从事教育活动。中原的私学教育,最早就是由他们开展起来的。

《汉书·儒林传》载:“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子张居陈”,“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麓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子张、子夏等人都曾在中原从事私学教育。

墨子,也是中原大办私学的人。

战国时期,中原私学林立,培养了许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才。“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吕氏春秋·当染》)在百家争鸣过程中,中原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学者,他们大多是由私学培养出来的。

(二) 汉代私学

汉代私学遍布中原各地。《后汉书·儒林传》云:“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

许多中原人在私学教育方面成绩十分突出。如陈留东昏人刘昆,

在王莽时期，“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后汉书·儒林传》）南阳育阳人注丹，在王莽时期，“常避世教授，专志不仕，徒众数百人”。（《后汉书·儒林传》）颍川鄢陵人张兴，东汉明帝时，“声称著闻，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后汉书·儒林传》）陈留东昏人杨伦，“讲授于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后汉书·儒林传》）汝南南顿人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陈留雍丘人楼望，“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后汉书·儒林传》）陈留浚仪人边韶，“以文章知名，教授数百人”。（《后汉书·文苑传》）

东汉时，中原人才辈出。《三国志·郭嘉传》说：东汉“汝颍固多奇士”。《晋书·陈颙传》说：东汉时“豫州人士常半天下”。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私学发达的结果。

汉代层次较高的私学，主要讲授儒家经书。层次低的私学，主要学习《急就篇》。该书以识字为主，包括姓氏、动植物、农产品、医药、乐舞、身体器官、职官名称等各方面的知识，如同一部小百科全书。

（三）宋代私学

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学习的课程与官学一样，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今后做官，所以宋代中原私学得到很大发展。

经师名儒，设经馆、学舍，讲学授徒，是宋代中原私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的学生大都具有一定学问基础，不再是儿童，这是一种较高阶段的私学。

戚同文在商丘办睢阳学舍，程颢、程颐讲学于河、洛之间，就是办的这种私学。《宋史·杨时传》云：“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谢良佐、游酢、杨时、尹焞等学者，都曾听讲于二程私学。这类私学，后来有的发展为书院。

由于官学系统缺少蒙学教学阶段，所以蒙学是宋代中原私学教育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蒙学即儿童教育。宋代中原蒙学有常日开课的私塾、家塾和义学。私塾是老师在自己家中或借用他人房屋设学授徒。家塾是有钱人家把老师请到自己家中教育家中子弟。义学是地方上出钱或某位官员出钱,聘请教师,教育乡里子弟。

此外,还有农闲开课的冬学。

宋代中原蒙学主要教识字、写字、背书和简单的道德规范,为以后入地方官学读“四书”、“五经”、习字、作文打基础。

宋代中原蒙学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以及《杂字》等。

宋代中原私学,规模都较小,一般为数人、数十人不等,但却设置得很普遍。

(四) 明清私学

明清时期,中原私学盛行于所有城镇和农村。儿童教育主要仍由私学进行。办学形式包括私塾、义学、社学等。

私塾是明清时民间广泛设立的私人办学单位。私塾原指教师在自己家中或借用祠堂、庙宇、他人房屋设的学校,后来把一村一族聘请老师办学的“村塾”、“族塾”和富人独自聘请老师在家教育子弟的“家塾”,也统称为“私塾”。称教书先生的工作为“教馆”或“坐馆”。这种私塾形式,在中原少数地区曾一直延续到建国前。

义学主要是为民间孤寒子弟设立的学校。宋代已有“义学”名称。明清时期,由于朝廷提倡,中原每县都有义学多处。义学不同于私塾之处,在于它不收“束脩”(学费),有时还发学习用品。

社学最初为官办,明初以后允许私立。入学年龄一般为八至十四岁。

私塾、义学、社学都是启蒙教育,属私学的低级阶段。教材主要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合称“三百千千”,此外还有《小儿语》、《女四书》、《弟子规》、《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文字蒙

求》、《唐诗三百首》等。程度较高的还读《唐宋八大家文钞》、《古文观止》等。教学内容包括阅读、习字、作文等。

明清中原私学中,除蒙学外,还有私人讲学。这是私学的高级阶段。老师主要是民间学者、离职官员和边做官边讲学的人。他们的教学机构类似书院。

第二节 书 院

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一般以山林名胜之地为院址。书院初兴时,创办者多是私人,明清以来也有官府创办的。但总体来说,主要为私立公助,与私学不同,也不同于完全官办的学校。

中原书院起于唐代,到清末改为学堂,前后存在一千年,对传播文化,培养人才,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唐五代书院

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朝廷下令在洛阳明福门外建丽正书院,这是中原有书院之始。但丽正书院实为朝廷收藏和校勘图书的地方,与后来书院作为聚徒讲学的教育单位不同。

中原严格意义上的书院起于五代。

现已知中原建于五代的书院有两所,一是洛阳龙门书院,二是登封太乙书院。

洛阳龙门书院,在五代后唐时已经存在。襄城人张谊曾在龙门书院学习。《宋史·张去华传》说:张去华“父谊,字希贤,好学,不事产业。……遂潜诣洛阳龙门书院,与宗人沆、鸾、湜结友,故名闻都下”。

但龙门书院创建的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登封太乙书院创立于五代后周时期。北魏太和八年(484年),曾在登封嵩山山麓建嵩阳寺,有僧人数百。隋代改为道观,称嵩阳观。唐高宗时改称太乙观,仍为道观。武则天时改为行宫,称奉天宫。五代后唐清泰年间,进士庞式在此聚徒讲学。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在此创办太乙书院。

龙门书院和太乙书院是中原最早的两座书院。

二、宋代书院

宋代是中原书院的兴旺时期。见于记载的宋代中原书院共有二十多所。其中著名的有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百泉书院、花洲书院、龙门书院、伊皋书院等。

应天府书院位于商丘,是由五代时期的睢阳学舍发展起来的,亦称睢阳书院。

后晋时期,杨恣在家乡归德军(今河南商丘)建睢阳学舍,聚徒讲学,得到将军赵直的支持。杨恣死后,他的弟子戚同文继续办学,各地士子纷纷到此求学。

宋初,戚同文的学生中,“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许骧、陈家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宋史·戚同文传》)大史学家薛居正、大画家郭忠恕也都在睢阳学舍读过书。

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戚同文去世,睢阳学舍一度沉寂。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民曹诚,“首捐私钱”,“以金三百万”(《却帚编》卷上),在戚同文讲学的旧址上,盖房150间,聚书1500卷,把学校恢复起来,并把它献给朝廷。宋真宗赐名“应天府书院”,令戚同文的孙子戚舜宾主持教务。戚舜宾为书院“制为学规”,使“课试讲肄,莫不有法;宁亲休沐,莫不有时;曲尽人情,人尤乐

从”(《却帚编》卷上)。

宋代应天府书院兴盛了将近一百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大学者向敏中、杨大雅、王洙、尹洙、江休复、蔡挺、石介、吕希哲,大政治家范仲淹、富弼,大建筑学家李诫等都是应天府书院的学生。

嵩阳书院位于登封,是由五代时期的太乙书院发展来的。

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期曾用过三个名字。宋初沿用五代旧名,仍称太乙书院。到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年),赐名“太室书院”,并赐刻印本《九经》。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下令重修,并改名嵩阳书院。

宋代高级官员吕蒙正、赵安仁、钱若水,诗人魏野,教育家种放,是太乙书院的学生。高级官员陈尧佐是太室书院的学生。高级官员王曙,史学家司马光、孙甫,诗人陈与义等都是嵩阳书院的学生。

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与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一起,合称宋代四大书院。在宋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百泉书院,又名百源书院,位于辉县百泉,为邵雍创办。邵雍的学生中有王豫、周长孺等十九名士。词人贺铸、画家李唐等也曾是百泉书院的学生。

花洲书院位于邓州(今河南邓州),为范仲淹所创办。范仲淹为之写《岳阳楼记》的滕子京和大哲学家张载都曾就学于花洲书院。

龙门书院(不是五代时的龙门书院)在洛阳,伊皋书院在伊川,都是二程所创建。朱熹的老师、理学家杨时,曾先从程颢学于龙门书院,程颢死后,又从程颐学于伊皋书院。

大体上说,宋代中原东部人多学于应天府书院,西部人多学于嵩阳书院,北部人多学于百泉书院,南阳人多学于花洲书院。

宋代学者强调自然环境对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作用,因而宋代中原书院都建在山青水秀、风光好的地方,为官学所不及。如嵩阳书院

在太室山麓,百泉书院在苏门山下百泉旁边,龙门书院在洛阳伊阙,伊皋书院在伊川鸣皋大桑坡附近。书院内部建筑也都园林化,经过精心设计。

宋代中原书院,藏书很多,并刻印师生著作和教学研究参考书,是官学做不到的。

书院中,将教学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启发学生自我钻研,主张学以致用,培养真才实学,不尚空谈。有一批大学问家主讲。学术空气自由,不同学派可在同一书院宣传各自的主张。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流动,走者不留,来者不拒,不受学派和地域限制。这都有利于学术文化交流。

三、元代书院

元代,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不愿做官,也不肯到官办的学校中讲学,而愿到书院中去。于是,各地的书院有了进一步发展。元朝政府也想通过书院笼络汉族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对开办书院采取提倡态度。

元代中原书院中除登封的嵩阳书院、商丘的睢阳书院、辉县的百泉书院、邓州的花洲书院、洛阳的龙门书院、伊川的伊皋书院等为宋代所建外,浚滨书院(位于永城浚河滨)、志伊书院(位于陈留)、颍谷书院(位于登封颍阳镇)、崇义书院(位于开州,即今濮阳)、诸葛书院(位于南阳卧龙岗)等,都是元代新建。

元初,理学大师姚枢、赵复等,曾主讲于百泉书院。他们把理学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在中原传播二程和朱熹思想,促进了中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元代思想家许衡,文学家许有壬、王恽,剧作家郑廷玉等曾就读于百泉书院。文学家马祖常曾就读于嵩阳书院,剧作家宫天挺曾

就读于崇义书院,《录鬼簿》作者钟嗣成曾就读于志伊书院。他们都是元代中原书院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材,也是中国文化史上颇有成就的人物。

四、明代书院

明初,政府重视府、州、县学,书院发展较慢。中期以后,科举制度腐败,官学衰落,书院又兴盛起来。

明代中原有书院八十余所,数量居黄河流域各省之首。

元代的中原书院,明初仍然存在。

明代中原新建的书院中,著名的有天顺五年(1461年)建的大梁书院(在开封)、成化元年(1465年)建的丽泽书院(在开封)、成化元年(1465年)建的紫云书院(在襄城)、成化二年(1466年)建的汝坟书院(在伊阳,即今汝阳)、成化六年(1470年)建的思鲁书院(在淮阳)、成化十年(1474年)建的志学书院(在南阳)、成化十七年(1481年)建的汝南书院(在汝南)。此外,还有正德、嘉靖以后建的伊洛书院(在洛阳)、申阳书院(在信阳)、锦襄书院(在睢州),万历以后建的游梁书院(在开封)、文正书院(在商丘),崇祯以后建的天中书院(在郑州)等。这些书院中,除少部分为有名的学者所建外,大多数都由巡抚、道台、知府、县令所建。

明代中原的最有名的书院是开封的大梁书院,其次为辉县的百泉书院。

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廷相,文学家李梦阳,学者高拱、李濂、朱睦㮮、王惟俭、周亮工和史可法等曾就学于开封大梁书院。文学家何景明曾就学于襄城紫云书院。唯物主义思想家吕坤和学者沈鲤曾就学于睢州锦襄书院。著名书法家王铎曾就学于辉县百泉书院和登封嵩阳书院。文学家侯方域曾就学于商丘文正书院。

五、清代书院

(一) 清前期

清前期,朝廷怕私人讲学会引起反清思想发展,故对书院控制较严。

从顺治到雍正九十年间,中原有书院七十余所。这些书院包括省、府、州、县四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辉县的百泉书院和开封的大梁书院,它们都属省级。

明末李自成起义时,统治者决黄河淹开封,大梁书院被毁,所以百泉书院成为清初中原最高学府。

清初,百泉书院由孙奇逢主讲。孙奇逢(1584—1675年)字启泰,又字钟元,直隶容城(今河北容城)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举人,无意仕进,以讲学为生。清初,举荐不就。顺治七年(1650年)全家迁居河南辉县苏门山,在百泉书院讲学25年,边教书边种地。孙奇逢教学成就卓著,培养出了一批贤达人才。他成为当时全国的教育名家,与西安关中书院李二曲、余姚姚江书院黄宗羲并称“三大名儒”。孙奇逢的学生后来大部分都在河南各大书院教书,有力推动了中原书院教育的发展。

清初著名思想家汤斌,文学家宋荦,学者吕履恒、张沐、耿介、冉觐祖、李灼然、窦克勤,数学家李之铤、杜知耕等,都是孙奇逢在百泉书院时的学生。

康熙十二年(1673年),河南巡抚佟凤彩对被水淹坏的大梁书院进行重建。重建后的大梁书院由著名学者张沐主讲。当时“两河之士,翕然归之,多所成就”(《清史稿·张沐传》),又成为中原最高学府。

清代著名思想家张伯行,学者周在浚、王海等都曾就学于当时的

大梁书院。

清前期,在中原的府级书院中,以建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的南阳书院最有代表性。南阳书院由李灼然主讲。他曾编制《南阳学规》、《达天录》等,为士子规定“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南阳书院读书范围广,要求十分严格。

此外,嵩阳、紫云、朱阳、饮泉(在仪封,即今兰考)等书院也较有名。

(二) 清 中 期

清中期,朝廷认识到将书院纳入官学轨道,对维护统治有利。教育政策开始由抑制书院向有计划发展书院转变。当时河南省、道、府、州、县共有各级书院一百余所。

雍正十一年(1733年),皇帝诏令在全国大办书院,由政府拨款。这使清初重建起来的大梁书院得到进一步扩建。

扩建后的大梁书院,有藏书楼、先贤祠、斋舍数百间,还有假山、溪流等。院长由督抚聘任。院生由河南各道、府、州、县选报,布政使考核录取。先贤祠祀宋元明各代河南的理学家二程、孙奇逢、汤斌、耿介、张沐、窦克勤、张伯行、冉勤祖等45人。教材以“四书”、“五经”为主。乾隆时,大梁书院的院长余集(1738—1823年)曾与邵晋涵、戴震、周永年、杨昌霖一同被推荐去修《四库全书》,任翰林院编修,称“五征君”,博学多艺,诗文书画皆精。

当时,大梁书院著名的学生有长篇小说《歧路灯》的作者李海观,学者周之琦、常茂徕等。

道光十六年(1836年),河南巡抚桂良曾聘钱仪吉主讲大梁书院。钱仪吉(1783—1850年),字藹人,号新梧,又号星湖,浙江嘉兴人。汉学家阮元的弟子,曾任工部给事中。他在大梁书院,不课八股文,教学内容以经史为主,兼及小学、天文、地理、算学,开一代新风,曾培养出著名学者宋继郊、蒋湘南等。

清代中期,中原道级书院中最出名的是河朔书院。它由河北道建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占地50亩,有房屋150间,选卫辉、怀庆、彰德三府的优秀生员入学,其地位仅次于大梁书院。

当时中原知名的其他书院有安阳昼锦书院、临颖颍川书院和固始的临淮书院等。著名学者崔述(东璧)辞官后,定居安阳,曾在昼锦书院执教。光绪初台北知府陈星聚,早年曾在颍川书院学习,后来曾率兵抵抗法国侵略,取得台北保卫战的胜利。著名植物学家吴其濬少年时曾是临淮书院的学生。

(三) 清后期

清代后期,中原书院开始没落。当时,省辖书院有开封的大梁书院和明道书院(光绪二十年(1894年)利用二程书院旧址建)。道辖书院有河北道的河朔书院和南汝光道的豫南书院。另外,有府、州、县各级书院一百多所。

清后期的中原书院,教学陷入义理、考据、词章的泥坑,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落后,没有培养出多少有用人材。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后,在国内要求改革教育的呼声下,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从此河南书院陆续改名学堂。如大梁书院改为河南大学堂,明道书院改为中州公学,河朔书院改为河朔中学堂,豫南书院改为豫南师范学堂,昼锦书院改为彰德府官立中学堂,百泉书院改为辉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嵩阳书院改为登封县师范传习所,花洲书院改为邓州官立高等小学堂等。

纵观中原书院,宋元时培养的多为全国性人才,明代培养的为全国性人才与地方性人才参半,清代培养的则大多为地方性人才。

第三节 著名教育家

在中原漫长的教育史上,曾出现过为数众多的教育家,其中著名的有伊尹、墨子、贾谊、韩愈、程颢、程颐、许衡、王廷相、李时灿等。

一、伊 尹

伊尹是商初大臣,名挚,一说名伊,相传生于豫西伊河流域。因被商汤封为尹(宰相),故称伊尹。前文已述及。他是我国第一个见于甲骨文的教师。

伊尹为奴隶出身。相传他的父亲是厨师,他向父亲学会烹饪。又懂历史和治国之道,“以尧舜之道要汤”(《孟子·万章》),帮助商汤制定伐夏策略,消灭了夏桀。

商汤死后,伊尹辅佐外丙、仲壬二王。后又担任商汤之孙太甲的师保。太甲即位后,破坏商汤的法制,失德乱政。伊尹特作《伊训》、《肆命》、《徂后》对太甲进行教导,使太甲悔过从善,成为商朝有为的帝王。

伊尹曾说:“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伊尹一贯以先觉而觉人的老师自居。

二、墨 子

墨子(约前 468—约前 390 年),名翟,战国时期宋(今河南商丘)人,一说今河南鲁山人。前文已述及。他是中原先秦时期影响最大的

教育家,也是中国先秦时期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大教育家。

墨子早年学习儒术,后对儒家学说不满,聚徒讲学,另立新说,创立了墨家学派。

墨子的学生很多,其中有一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淮南子·泰族训》),为墨子思想的忠实信徒。

墨子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他的学生多穿粗衣、草鞋,与平民为伍。

“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他的学说对当时思想界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

在教育思想上,墨子主张人人都要受教育。他认为,不管是“王公大人”,还是普通百姓,都是教育对象。

墨子注意环境对教育的影响。认为人性如染丝,染于什么颜料,就成什么颜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如果所染得当,人就学好,所染不当,人就变坏。

在教育方法上,墨子主张发挥教师主动性,强教于人,进行灌输。他说:“今求善者寡,不强说人,人莫之知也。”(《墨子·公孟》)《庄子·天下》也说他“周行天下,上说下教,虽天下不取,强聒而不舍者也”。

在教育实践中,墨子重视知识技能和道德的双重培养,并注意因材施教。他教学纪律严格,违犯必纠。学生入学,以服役劳动为条件,不收学费。

三、贾 谊

贾谊(前200—前168年),西汉洛阳人。二十多岁时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三十三岁去世。前文已述及。他是西汉著名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在贾谊所著的《新书》中,有许多

精辟的教育思想。

贾谊认为,人的教育要从胎儿开始,怀孕的妇女需要“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新书·胎教》),始终保持良好的姿态和心情。小孩出生以后,需要“仁者养之,孝者襁之,四贤傍之”(《新书·胎教》),使其“前后左右皆正人”,“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这样才能培养出正人君子。

贾谊指出,教育是为政之本。他说:“教者,政之本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新书·大政》)各级国家官员,都要将正身行、广教化、修礼乐、美风俗作为教育内容,列入议事日程,放到重要位置上。

贾谊看到教师与国家的兴衰存亡关系密切,所以竭力主张君臣百姓都要尊敬老师。

但教师也应具有高尚的师德。贾谊认为,合格教师的标准是,“智足以为源泉,行足以为表仪,问焉则应,求焉则得;入人之家足以重人之家,入人之国足以重人之国”(《新书·官人》)。既然做了老师,就应尊善去恶,广显道德,在智慧和行为规范上都合乎社会要求。

四、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唐代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他是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也是著名教育家。

韩愈在教育上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亲自执教。他曾担任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国子祭酒等教职,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上课时,“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皇甫湜:《韩文公墓志》)教学效果很好,培养了一大批韩门弟子。

二是当地方官时,注意发展地方教育,有时自己还拿出部分俸禄

来办学校。

三是著《师说》、《进学解》等文，系统阐述自己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的教育理论。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在于传道、授业、解惑。他主张学无常师，有道即可为师。人不从师，其惑不解；从师不论贵贱，不分长幼，以闻道先后为准。他又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和学生可以互相学习，教学相长。韩愈还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主张对学生进行严格要求，使大家都做到“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韩愈的许多见解都有独到之处。

五、程颢、程颐

程颢(1032—1085年)，字伯淳，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年)，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兄弟二人，合称“二程”，为北宋洛阳人，是宋明理学的主要创始人，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程颢曾任鄆县(今陕西户县)、上元(今江苏南京)、晋城(今属山西)、扶沟(今属河南)等县地方官。他在这些县内都注意兴建学校。如他任晋城知县时，就曾在诸乡设学，“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宋史·程颢传》)有时，自己还亲自给学生讲课。他任县令数年，就能把一个原先文化落后的县，转变为文化比较先进的县。

后来，程颢辞官回洛阳，“日以读书劝学为事”，“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二程集·刘立之叙述》)“有不远千里而至者”。(《二程集·范祖禹叙述》)

程颐因考进士未中，便决定以讲学为业，不再往仕途上发展。先后在开封、洛阳从事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五十四岁时，程颐以布衣受诏，担任崇政殿说书，成为年幼皇帝宋哲宗的老师，这才走上做官

的道路。后来,朝廷贬他管勾西京国子监,他便又在洛阳广招门徒,继续进行讲学活动。

二程弟子中,出名的有吕希哲、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尹焞等。

在教育思想上,二程认为,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措施。“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为急务。人才不足,虽有良法,无与行之矣。”(《二程集·粹言》)二程特别重视道德教育,注意通过立志、存诚、主敬、养心、寡欲等手段,让学生学做道德高尚的人。

在教学方法上,二程主张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守约贵专,循序渐进。

在教学内容上,二程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基本教材,称为《四书》,将它们抬高到与《五经》并列的地位。从此,这些书成为封建王朝的法定教材。

二程初步建立了理学教育思想的基本体系。他们的思想和教育活动,造就了中国哲学史上的朱陆两大学派。

六、许衡

许衡(1209—1281年),字仲平,号鲁斋,元代怀庆河内(今河南沁阳)人。是元代著名思想家,也是著名教育家。

元初,许衡曾任京兆(今陕西西安)提学。当时,关中正处于兵乱之后,欲学无地,许衡在关中各县都建起学校,受到百姓普遍欢迎。

后来,许衡又被任命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他曾上书朝廷,建议“自都邑而至州县,皆设学校,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于学,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自洒扫应对以至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后,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元史·许衡传》)这个意见被元世祖忽必烈所采纳。

许衡曾受命专门教育蒙古贵族子弟。他采用由他的十二个汉族弟子对蒙古学童进行伴读的办法,分斋教学,因材施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著《大学要略》、《中庸直解》、《稽古千文》、《编年歌括》等,就是他当时的教材。许衡的工作,对蒙古贵族接受汉族文化、行汉法起了重要作用。

在教育上,许衡有许多高超的方法。《元史·许衡传》评价他的教学特点是:“善教,其言煦煦,虽与童子语,如恐伤之,故所至无贵贱贤不肖,皆乐从之,随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为世用。”

许衡有句教育名言:用人当用其所长,教人当教其所短。这是很有哲理性的。

七、王廷相

王廷相(1474—1544年),字子衡,号浚川,又号平厓,明代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自举进士至历官保中,两任郡邑,三督学校,以礼范海内者四十余年。”(《丧礼备纂·张卤序》)是明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又是著名教育家。

王廷相任亳州判官、赣榆县丞时,皆热心当地教育,使当地科举考试,由无人中第,到“不乏取中科第者”。(高拱:《浚川王公行状》)

王廷相任北畿学政、四川按察司提学僉事、山东提学副使时,注意“振扬文教”,教学生“务以实用相期,不专文藻”。(高拱:《浚川王公行状》)

王廷相反对脱离实际的教育方法,主张“历事”、“致用”,注重实践。他曾亲自授徒,培养出许多“才名播天下”的学生。“豪杰之士,多出其门。”(高拱:《浚川王公行状》)他是明末清初启蒙教育思想家的先驱。

八、李时灿

李时灿(1866—1943年),字敏修,号闾斋。清河南汲县(今卫辉市)人。20岁考取举人,26岁中进士。曾任清政府刑部部曹、河南教育总会会长、河南学务公所议长等职,为河南教育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

李时灿生活在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新旧交替时期。他自己虽然是科举出身,但却大力提倡新学,成为近代河南资产阶级新学运动的先驱。

光绪末年,李时灿曾与王锡彤、高幼霞一起,创办汲县读书学社,通过讲学、读新书、研究时务,传播新思想,从事新型的教育活动。读书学社人员最多时达150人。后来又在读书学社基础上扩建为“经正书院”,用新思想教学,研究有用的学问,院生多达三、四百人。“河朔人士知科举外有学问自此始。”(李季和:《先父李敏修事略》)

李时灿还曾在开封创办“中州公学”,在汲县创办汲县中学和小学,主编《河南教育》杂志等。他认为“民不学无以强国,官不学无以施政”。在教学内容上注意古今兼容,中外并蓄,培养了一大批有名的学生。

近代学者嵇文甫曾说:清末以倡办新学而闻名中国的有三人:江南是张季直,河北是严范孙,河南则是李时灿。

第十一章 中原体育

体育是为适应人类生产劳动和生活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化活动。

健康和长寿,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体育的目的,就是锻炼身体,增进健康,从而使人获得更大的生产和生活能力。

中国古代体育是不同于西方体育的另一个体系。中原古代体育是中国古代体育的优秀代表。

中原古代体育,历史悠久,项目繁多。球类、棋类、田径、体操、水上运动等都有。其中应用性强、娱乐性高的体育项目,如武术、角抵、蹴鞠等发展较快,特别是有健身、攻防和观赏价值的武术等,成就更大。

主张身心统一,使肉体和精神都得到锻炼,不但重视运动技巧,而且重视体育道德培养,是中原古代体育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一节 足球、马球和百戏中的体育内容

一、足球

足球,古称蹴鞠,战国时期已在中原地区流行。它是中国传统体

育中历史最悠久的项目之一。

东汉安帝延光二年(123年)建的嵩山启母阙上有一幅我国现已发现最早的女子蹴鞠浮雕图。画面上一个身材修长、头挽高髻的女子,正飞起双脚,弯腰踢毬,形象生动逼真。同年建的嵩山少室阙上也刻有蹴鞠图,图中二人观看,二人作踢球状。说明汉代中原蹴鞠运动已较普遍。

唐代以前,“鞠”(毬)是实心的,外壳以熟皮子做成,里面装填毛发等物。颜师古《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注云:“鞠,以皮为之,实以毛。”

唐代足球,不仅外壳用皮,还用动物尿胞当球胆,用嘴吹气,使足球由实心变为空心。正如唐代徐坚《初学记》说:“古用毛纠结为之。今用皮,以胞为里,嘘气闭而蹴之。”这是足球史上的一大进步。

唐代有一首描写足球的诗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闲气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见宋·刘放:《中山诗话》)可见当时足球是由八块皮拼合而成的。

寒食前后,是唐代中原盛行踢足球的日子。白居易《洛桥寒食日作十韵》诗云:“踢毬尘不起,泼火雨新晴。”

唐代足球场设有两个球门,跟现代相似,分别置于球场两端。“植两修竹,高数丈,络网于上,为门以度毬。球工分左右朋,以角胜负。”(《文献通考》)

北宋中原足球分有球门和无球门两种。

有球门的足球,又称“筑毬”。是在皇帝寿宴、春秋朝廷大宴、外交宴会上进行表演比赛的重要节目。

每个球队 12 至 16 人不等。

与唐代不同,宋代只有一个毬门,竖立在毬场中央。球门“约高三丈许,扎彩结络,留门一尺许”(《东京梦华录》卷九),称作“风流眼”。

参加比赛的两队,分别位于球门两边,按照规则轮流传毬与射

门,进行间接对抗比赛。哪一队射进“风流眼”的毬多,就是赢家。

要把毬踢进架在三丈多高的空中、直径只有一尺多的小球门中去,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不用球门的蹴鞠称为“白打”,主要比赛踢毬花样和技巧。除足踢外,头、肩、胸、膝等部位皆可代替两足。比赛场地较小,周围有网围住。比赛人数从二至十余人不等。

这种踢法,上从皇帝,下至老百姓都喜欢。

北宋画家苏汉臣曾画过一幅《宋太祖蹴鞠图》,描绘赵匡胤等六人在开封蹴鞠的情景,相当传神。此画原作已佚,但元代画家钱选的临摹本现存上海博物馆。

清明前后,蹴鞠和秋千是汴京民众的重要体育活动。《东京梦华录》卷六云:“举目则秋千巧笑,触处则蹴鞠疏狂。”

《水浒传》中的高俅,实有其人,原为苏东坡的“小史”(书僮),因踢得一脚好毬,在开封受到赵佶的赏识,竟然平步青云,“数年间,建节,循至使相,遍历三衙者二十年”(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

宋人曾作词称赞蹴鞠说:“健体安身可美,喜笑化食堪夸,更有一事为佳,肥风瘦瘠都罢。”(《蹴鞠谱·西江月》)可见他们对蹴鞠作用的了解是很深刻的。

二、马 球

马球,古称击鞠、击毬。是骑在马上用球杖打毬的运动。

要打马毬,首先需要有过训练的马,其次运动员要有娴熟的骑术。因此,打马毬是军队、宫廷和贵族的运动项目。

关于马毬的记载,在中国最早都是见于曹植的《名都赋》:“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值千金,被服光且鲜。……连翩击鞠壤,巧捷唯万端。”说明公元三世纪初,洛阳已有马毬运动。往后延续 1000

多年,直至清末。

唐朝盛行马毬。唐太宗和唐玄宗都曾下令在军队中通过打马毬,来提高骑马技术,加强军队战斗力。从而推动了马毬在全国的普及和发展。

南阳人张建封(唐德宗时任徐泗濠节度使、尚书右仆射等职)就是一个善于打马毬的中原籍将帅。

马毬比赛,速度快,运动量大。韩愈看了张建封参加的马毬比赛后,担心发生危险,几次劝张建封不要再打。张建封没有听从,并写了《酬韩校书愈打毬歌》,表明自己打毬的豪情。

唐代马毬,呈圆形,大小如拳头,系用有弹性的木头制成;中空,外涂红漆。毬杖长数尺,顶端弯曲如月牙。毬赛一般分为两队,每队十多人。

唐代马毬毬场很大,陈许节度使薛能在许昌修筑的马毬场,曾接待过从徐州开往澠水(在河南临颖西)的三千过境部队。

和唐代一样,宋代也将马毬作为一种军事训练手段。

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年间曾令有关机构制定打马毬的仪式和规则。其中对毬场大小、毬门高低、毬员服装、比赛方法等都作了规定。并规定每年三月(阴历)在首都开封“会鞠大明殿”。如果皇帝参加马毬表演赛,王公大臣要陪赛。如果皇帝打进了毬,“从官呼万岁”(《宋史·礼志》)。皇帝打毬,要配以鼓乐。

宋代中原,除军队、宫廷外,达官贵人也有打马毬的习惯。

宋代中原,不仅有男子马毬队,还有女子马毬队。

女子马毬队,主要作表演用。宋哲宗时大臣王珪的《宫词》云:“内苑宫人学打毬,青丝飞鞚紫花骝。朝朝结束防宣唤,一样真珠络控头。”宋徽宗赵佶的《宫词》云:“金鞍宝辔簇骅骝,乐奏相从共击毬。花帽两边成锦阵,谢恩长喜上头筹。”可见开封宫女们经常进行马毬表演。

《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曾说宋代开封的女子马毬队员皆“珠翠装饰，飞带红靴，各跨小马”，“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妍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

宋代马毬比赛，有双毬门和单毬门两种。比赛时分两队，双毬门，以射中对方的毬门为得分；单毬门，两队都射同一毬门，哪队射中哪队得分。

除骑马打毬外，宋代中原还有骑驴打毬的。

金末，迁都开封，中原马毬仍很盛行。据文献记载，“贞祐三年（1215年）七月，工部下开封市白牯取皮，备御用取鞠杖”（《续文献通考·乐考》）。

“鞠杖”又称“毬杖”，就是打马毬的木棍子，它可能是用白公牛皮裹的。

马毬技术要求高，活动范围广，需有良马和大场地，除朝廷、官府、军队、少数富家子弟外，在中原民间的流行程度不如蹴鞠普遍。

三、百戏中的体育内容

中原古代百戏，内容很广，其中有些节目，既是杂技，又有体育内容。

（一）寻 橦

寻橦，又称都卢（国名）寻橦，为爬竿和竿上的杂技表演。

寻橦在春秋时传入中原，它是河南汉画像砖和汉画像石上常见的题材。

（二）弄剑、弄丸

弄剑、弄丸，又称跳剑、跳丸，类似今天的杂耍。它始见于春秋战国时。

《列子·说符》云：“宋有兰子者，以技干宋元公……弄七剑，迭而

跃之，五剑常在空中。”这位豫东艺人，同时在手中连续抛接七口剑，是要很高技巧的。

又据《庄子》记载，楚庄王攻打宋国都城商丘时，得市南勇士熊宜僚，在宋军前弄九丸于手，宋军停战观看。楚军从而不战而胜。

（三）冲 狭

冲狭，即钻圈，它讲求跑速和跳跃。

南阳汉画像石中，有一幅画，画一高髻女子，穿束腰长袖衣，引颈侧身，向插有利刃的狭圈冲去的场面。

除钻刀圈外，还有钻火圈的。

（四）履 索

履索，即走索。能锻炼人的平衡能力。《晋书·乐志》云：东汉时，曾在首都洛阳德阳殿举行履索表演，“以两大丝绳系两柱头，相去数丈，两倡女对舞，行于绳上，相逢切肩而不倾。”

此外，百戏中的倒立、折腰、跟斗等，也都是体育项目。

第二节 骑射、相扑、围棋与养生术

一、骑 射

夏代中原有车，并用车兵作战，练习驾车是重要的军事体育内容。当时称作“御”。

夏代中原狩猎和作战都用箭，练习射箭是重要的军事体育内容。当时称作“射”。

商代以前，马只驾车，不单骑，故无骑术。

中原骑术是在商代出现的。骑术出现之后，便与射术相结合，称为骑射。安阳殷墟有骑射遗址。从此，练习骑术和骑射，就成为中原

重要的军事体育项目。

十六国时期,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大量涌入中原,使骑术得到发展。陆翊《邺中记》云:后赵石虎时,曾在首都邺城(今河南安阳)表演“猿骑”。即运动员以猿猴之形表演骑马技术,“或在马肋,或在马头,或在马尾,马走如故”。

北魏时期,曾在洛阳举行过银杯奖射箭比赛。

《北史·魏宗室常山王遵传》云:“初,孝武在洛,于华林园戏射,以银酒卮容二升许,悬于百步外,命善射者十余人共射,中者即以赐之。”结果,濮阳王元顺射中而获得奖杯。

这种将银质酒杯挂在百步之外,让十多名优秀射手去射,谁射中,酒杯就奖给谁的做法,是我国体育史上第一次奖杯赛。

北齐文宣帝时,曾在邺城(今河南安阳)举办过历时七天的骑射比赛。并令邺城妇女前往观看,不去的以犯法论处。

北宋时,中原骑术十分高超。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能表演立马、骗马、跳马、献马、倒立、拖马、飞仙、镫里藏身、赶马、绰尘、豹子马、马上抡弄大刀等十几种惊险动作。

二、相 扑

相扑,古代又称角力、角抵或争交(即摔跤)。它是中原历史上时间最久远的体育项目之一。

南阳汉代画像石上有一幅画,画一人将另一人摔倒在地,两人又抱着在地上打滚的情景。

河南新密打虎亭二号汉墓壁画,绘有两个力士角抵场面。二人头上各扎一个向上竖的辫子,大胡子翘起,赤裸上身,肌肉暴突,只穿一条短裤。双方正在做出准备扑向对方的架势。

角抵既有健身功能,又有观赏价值,是我国古代艺术表演和运动

竞技的综合表现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扑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宫廷和民间体育的重要内容。《角力记·考古》引王隐《晋书》云:“襄城人王弘与颍川功曹刘子竺会于界上。子竺谓弘曰:‘襄城人不如颍川人能扑。’弘对曰:‘相扑下技,不足以明优劣。’”

这说明,襄城(今属河南)和颍川(今河南许昌),当时都流行相扑运动。

隋炀帝时,曾在洛阳举行规模盛大的角抵会演。

北宋开封,每当皇帝庆祝生日时,要举行相扑表演。朝廷宴会时要举行相扑表演。招待外国使节有时也举行相扑表演。

宋代相扑运动员表演时皆赤裸上身,只穿一条短裤,与今天的相扑差不多。

宋代开封有女子相扑队,表演时也赤裸上身,为此,司马光曾专门写有《论上元令妇女相扑状》,向皇帝提意见,说“使妇人裸戏”,不合礼法。

北宋相扑比赛不分重量等级,对身体高大的人有利。但也出现了许多身体虽然不很高大,但却以灵活敏捷取胜的运动员。

相扑很早就由中原传到日本,至今在日本盛行。但在中国,宋以后演变为中国式摔跤,明清以后,古代相扑不再流行。

三、围 棋

围棋是中国古老的棋类。《说文解字》称围棋叫“弈”。《论语·阳货》有下围棋的记载。《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已使用“举棋不定”这个成语。

围棋产生于春秋中期以前,是当时军事斗争的反映。战国时期的频繁战争和城市文化兴起推动了围棋的发展。后来在中国广为流行。

魏晋时期,中原人阮籍对下围棋达到着迷的程度。他本是孝子,但母亲病故时,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晋书·阮籍传》),直至下完为止。

1959年在河南安阳市北郊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白瓷围棋盘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十九道围棋盘。这个棋盘为正方形,高4厘米,边长各10厘米。棋盘上横竖各刻17条线,加上边线,即成纵横19道。这些直线交叉成许多小方格,共构成361目,与今天的围棋完全相同。

围棋在隋代已传到日本。日本正仓院收藏的古鏤钿棋盘(鏤钿是漆器,以贝壳镶嵌在漆中制成纹路),纵横19道,与河南安阳出土的隋代白瓷围棋盘相同。

唐代是围棋大发展的时期,在中原知识分子中,几乎达到普及的程度。

中原名僧一行曾与翰林院棋待诏王积薪对弈。

杜甫夫妇都爱好下围棋:“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杜甫:《江村》)“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杜甫:《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宋代,中原围棋长盛不衰。

宋太宗赵光义是围棋高手,曾创“三势棋谱”,并著《太宗棋图》一卷。其三势指“对面千里”、“独鹅飞天”、“海底取珠”。前二势在棋谱书《忘忧清乐集》中保存至今。

宋徽宗赵佶也善于下围棋,他曾有“忘忧清乐在枰棋”的诗句。

北宋开封宫廷有棋待诏,其中著名的有贾玄、刘仲甫等人。城市里还有专业“棋士”,他们的棋艺一般也很高超。

四、养生术

甲骨文中有寿、老等字,表明殷商时期中原人已有长生观念。养

生术就是为了寻求长寿之道的。

中原古代最重要的养生术之一是导引。导引是以肢体运动为主并结合呼吸运动的保健操。

导引分步引、坐引、卧引三类。导引术的呼吸运动称为“行气”、“服气”或“食气”。

中原导引出现很早。《庄子·刻意》云：“吹响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成玄英注云：“吹冷呼而吐故，响暖吸而纳新，如熊攀树而自悬，类鸟飞空而伸脚。”

可见在二千三百年前的战国中期，中原已出现了一批导引养生家。

战国末期，中原人吕不韦在他主编的《吕氏春秋》中总结了顺生、节欲、去害、运动等养生思想和方法。尤其是“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以动养生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吕氏春秋·尽数》云：“流水不腐，户枢不蠹（蛀），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聾为聋，处目则为瞶为盲，处鼻则为鼽为窒，处腹则为张为疔，处足则为痿为蹶。”指明运动对增强体质、维护健康的重要性。

唐代，中原养生术得到进一步发展。温县（今属河南）道士司马承祯（647—735年，字子微，道号天隐子），曾著《天隐子养生书》、《修身养气诀》、《服气精义论》等，论述养生之道。他说：“神仙之道，以长生为本，长生之要，以养气为根。”（《天隐子养生书序》）

司马承祯吸收佛教的“渐悟”、“禅定”、“止观”等理论，丰富道家养生思想，提出“斋戒”、“安处”、“存想”等养生方法。并编创了一套包括导引、行气、叩齿、按摩、咽津的导引保健操，流传后世。

司马承祯认为“肢体关节本资于动用，经脉荣卫实理于宣通。今既闲居，乃无运役事，须导引以致和畅。户枢不蠹，其义信然。”（《云笈

七笈》卷五七)

道士的成仙思想,固属迷信,但重视身体的保养锻炼,则有积极意义。

五代和宋初的道士陈抟,对中国养生术也有很大贡献。

陈抟(?—989年),字图南,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后唐长兴年间科举考试落第,便隐居深山,研习养生术,行内丹修炼法。宋太宗赐号希夷先生。

陈抟的养生术之一是睡功。“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宋史·陈抟传》)睡功又称“蛰龙法”,其特点是以睡姿行气,不动、不饮、不食,达到寂静境界。

陈抟的养生术之二是十二月坐功。这是一种坐式导引,共二十四式,按二十四节气进行。动作有按膝、捶背、伸展四肢、转身、扭颈等。明代高濂所编《遵生八笈》中有陈希夷坐功二十四势图说。

陈抟的养生术,在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

第三节 田径、水上运动和节令体育

一、田 径

(一) 商代先马走

先马走是在车马前护卫的武士,要求在官吏出行时跑在前面。

先马走实际就是“马前卒”。必须经过严格的长跑和竞走训练。

殷墟甲骨文有不少关于“先马”的记载。他们就是中原最早的长跑和竞走运动员。

(二) 魏国负重长跑

战国后期,建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的魏国,曾用负重长跑的方法

在中原选拔武卒。参加选拔的人员,要穿戴沉重的铠甲头盔,带着弓箭戈矛,背三天干粮,半天跑百里。(见《荀子·议兵》)这个距离比现在的马拉松赛(42公里195米)还长。

(三) 汉代驱傩火炬接力赛

驱傩是古代旧历岁底从官府到民间常常举行的一种驱逐鬼疫的仪式。

东汉时,宫廷在首都洛阳举行驱傩仪式时,先由宦官持火炬“送疫出端门”(《后汉书·礼仪志》),再由端门外的卫士把火炬传到宫外,交给城门外的五营骑士,五营骑士再分三队把火炬送到洛河,抛到水里。参加者在千人以上。

这实际上是一种大规模的火炬接力赛。

(四) 北魏掷高运动

北魏时,中原盛行掷高运动。《洛阳伽蓝记》“禅虚寺”云:“羽林马僧相善抵角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

他们都在投掷方面,创造了当时掷高的全国纪录。

(五) 宋代水毬掷远

北宋中原,有一种把毬掷入水中,以毬的远近决定胜负的运动,称为“水毬”(与现代在水中打球的水球不同)。

宋徽宗赵佶有一首掷水毬的宫词说:“苑西廊畔碧沟长,修竹森森绿影凉。戏掷水毬争远近,流星一点跃波光。”

二、水上运动

(一) 操舟

商周时期,已把船只用于军事活动。《史记·周本纪》云: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

两年以后，周武王的军队，就是从盟津渡过黄河，去攻打商朝的。这些军队，平时必然要经过严格的操舟训练。

古代中原妇女也善于用船。《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意思是蔡国女子做了桓公夫人，桓公和她一起乘船。夫人划船，使船摇晃，桓公很害怕。

蔡国在今河南驻马店地区的上蔡、新蔡一带，属淮河流域，自古赖舟楫之便，妇女会用船是不奇怪的。

（二）竞 渡

竞渡即龙舟赛，起源于南方，但战国时期，中原已经流行。河南卫辉市山彪镇战国墓出土的铜鉴上就有竞舟图案。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每年三月，都要在开封金明池举行龙舟锦标赛。

比赛时，在水中插有标竿，标竿上挂彩旗银碗，参赛龙舟鸣鼓向标竿前进，以最先夺得标竿者为胜。

金明池龙舟锦标赛，气氛热烈，场面很大。有时皇帝也要去观看。

宋代画家张择端的《金明池争标图》，就是描绘开封龙舟比赛情景的。

（三）游 泳

中原古代游泳，一般作为军事训练项目，有时也作为娱乐表演。

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在开封金明池举行游泳运动会。于水面放置银瓿，让参赛运动员游泳去夺取。当时在岸上观看的人成千上万。

这是见于正史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游泳有奖赛。

宋徽宗时，宦官杨戩，在开封家中建有游泳池。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〇云：“中贵杨戩于堂后作一大池，环以廊庑，肩镻周密，每浴时，设浴具及澡豆之属于池上，跃入池中游泳，率移时而出，人莫得窥。”

这是中国私人建游泳池的最早记载。

(四) 水秋千

水秋千是北宋开封的跳水运动。用秋千作跳台,当秋千摆到与秋千架平时,秋千上的人翻筋斗跳入水中。这种秋千一般安装在船上,跳时有音乐伴奏。当时称这种跳水运动为“水秋千”。

在秋千上跳水,比在固定跳台上跳水的难度要大得多。它是现代高台花样跳水的前身。

王珪《宫词》说:“内人稀见水秋千,争擘珠帘帐殿前。”这是中国体育史上最早的跳水记载。

三、节令体育

中原节令体育大多是春天的项目。

(一) 秋 千

据文献记载,秋千原为“北方山戎之戏”,公元前七世纪传入中原。后来成为清明时的节令体育活动。

唐代,杜甫有“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的诗句(《清明二首》),可见秋千在当时相当普及。

宋代,秋千在中原更为盛行。王珪《宫词》云:“禁籞春来报踏青,御池波漾碧涟轻。内人争送秋千急,风隔桃花闻笑声。”

(二) 风 箏

中原风筝在战国时就有记载。《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墨子为木鸢,三年而成,蜚一日而败。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鸢飞。’”

木鸢就是以木为骨架的风箏。

放风筝主要在清明前后,这时草长花开,宫廷和民间都很流行。

王明清《挥麈后录》说:“徽宗初践祚,曾文肃公当国,禁中放纸鸢落人间。”

（三）踏 青

踏青,今天称作“春游”,是周代就出现了的节令体育活动。

《诗经·郑风·溱洧》就是描写今河南郑州一带春天踏青的民歌:“溱与洧,方涣涣兮。士与女,方秉简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到宋代,踏青活动更进一步发展。邵伯温《闻见前录》云:“洛中风俗,……岁正月梅已花,二月桃李杂花盛,三月牡丹开。于花盛处作园圃,四方伎艺举集。都人士女载酒争出,择园庭盛地,上下池台间,引满歌呼,不复问其主人。抵暮,游花市,以筠笼卖花。虽贫者亦戴花饮酒相乐。”

第四节 武 术

武术是我国民族体育的主要内容之一。

武术的发端,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的狩猎和战争。

武术,既能格斗,又能健身。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武术的格斗功能逐渐衰退,健身功能得到发展。

中原号称武术之乡,历代名家辈出,特别是洛阳、开封、濮阳、焦作等地,世代练武成风。流行于河南民间的武术有套路 1200 多种,拳类 160 多个。其中最有名的是少林武术和陈氏太极拳。

一、少林武术

（一）少林武术与少林寺

少林武术,始于北魏,至今已有 1400 多年历史。

少林武术以少林寺得名,少林寺又以武术显扬于世。武以寺存,寺以武闻,结果少林寺和少林武术一齐闻名于天下。

少林寺位于嵩山西部的少室山北麓。它是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孝文帝为安置印度僧人跋陀落脚传教而建。因寺院坐落在少室山北的密林中,故名少林寺。

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印度高僧达摩来到少林寺传授禅宗,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从此少林寺成为中国禅宗的祖庭。

在少林寺历史上,唐代最有名,有僧1500人;明代最兴盛,最多时有僧2500人;其次是元代,僧人常二千。

(二) 少林武术形成的原因

1. 健身的需要

达摩来到和禅宗流传对少林武术的产生,起有关键作用。

禅宗是佛教中的一派,主张通过静坐修行、长年面壁、排除杂虑的方法,达到成佛目的。

长期静坐,使僧人精神疲倦,身体虚弱。为了健身的需要,就促使僧人寻求练拳习武的路子。只有锻炼好身体,才能继续坐禅。

相传达摩为了驱除静坐带来的身体疲劳,曾编创“活身法”,用来活动身体。后来又吸收中国古代养生家的传统,模仿飞禽走兽的动作,编创了“罗汉十八手”套路。

这些把首创之功归于达摩的说法不一定可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僧人把锻炼身体的动作,逐渐固定下来,便形成了拳法。

2. 防卫的要求

由于少林寺处于深山老林之中,僧人常遭野兽威胁,寺院屡受盗匪进攻。为了防身和保护寺院的财产,也必须练武,以至建立自己的武装。于是少林武术中,除了徒手武术套路之外,棍、剑、刀、枪等器械套路也陆续发展起来。

北齐时,少林僧人已经练武成风。据唐人张鹭《朝野僉载》记载,北齐时,少林寺有个稠禅师,幼小入寺,因体单力弱受同伴欺侮,故发愤习武,结果练成了“筋骨强劲”、“拳捷骁武”、“横踏壁行”、“引重千钧”的本领。

3. 政治的鼓励

隋末农民大起义,群雄割据。王世充占洛阳,李世民据关中。少林寺僧人抗拒王世充,投靠李世民。特别是昙宗、惠场等 13 个少林寺和尚,帮助李世民打败王世充,擒获王世充的侄儿王仁则,为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立下了大功。

唐朝开国后,对少林寺大加封赏。昙宗和尚被封为大将军,赐少林寺土地 40 顷,允许少林寺常备僧兵,参与政事。

开元十六年(728 年),唐玄宗又下令刻碑纪念昙宗等 13 个僧人帮助李世民打王世充的事迹。此碑在少林寺一直保存至今。

唐王朝从政治上对少林武僧的嘉奖和鼓励,不但大大提高了少林寺的地位,也对少林寺僧人习武传统的进一步形成起有重要作用。所以后来徐学谟《少林杂诗》云:“名香古殿自氤氲,舞剑挥戈送落曛。怪道僧徒偏好武,昙宗曾拜大将军。”

4. 战争的激发

明代中叶,倭寇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当国家征集抗倭援兵时,少林寺僧兵毅然开赴前线,杀敌报国,屡立战功。

据《松江府志》记载,全国赴浙江抗倭援兵中,“少林寺僧兵最为骁勇”,曾于“烟墩斩倭八十余,解上海之围”。

《江南经略》亦云:天真、天池二人率领的少林僧兵四十余人,屡次“大破倭寇”。

《吴淞倭变志》也说:月空和尚率领的三十多名少林僧兵作战英勇,“敌遇者即仆”。最后,月空等三十多名武僧光荣为国捐躯。

由于少林寺僧人积极参加爱国战斗,少林寺名声更大。抗倭斗争

激发了少林寺僧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把练武与爱国结合在一起,也使武艺大有长进。

(三) 少林武术发展的条件

一千多年来,少林武术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套路越来越多,技艺越来越精,传播越来越广。

其中明代是少林武术的鼎盛时期。

明代少林寺已成为武林圣地。明唐顺之(1507—1560年)诗云:“浮屠善幻多技能,少林拳法世稀有。”(《峨眉道人拳歌》)《五杂俎》卷五也说:“河南少林寺,拳法天下所无,其僧游方者,皆敌数十人。”

当时,中国北方武术,大都源于或受影响于少林武术。它还影响到南方武术。

少林武术不断发展提高的条件是多方面的。

1. 武人皈依

历史上,少林寺僧人中,有不少人在出家前,就是官员、军人、练武的壮士,或反抗封建统治的好汉。他们武功高强。皈依佛门,成为少林弟子之后,虽然隐姓埋名,但常把武艺传授给自己的弟子。

宋代的智瑞,金元时的秋月,出家前就是武林豪杰。

明朝灭亡后,一些反清志士,遁入空门,削发为僧,在少林寺互相研习,苦练武功,作反清复明准备,就是清朝前期少林武术日益精粹的重要原因。

2. 外出学习

少林武术不但注意在自身演练中发展,而且注意派人到寺外向武林名人学习。明代少林寺曾派宗擎、普从二僧向抗倭名将俞大猷(1504—1580年)学习剑法,回寺传授众僧。

少林武术是寺内寺外许多人共同创造的财富。

3. 融合吸收

少林寺既以武术出名,便逐渐成为各派武艺的会武场。它通过会

武,互相取长补短,不断充实发展自己。

宋代福居禅师曾邀请全国十八家武林高手到少林寺交流武艺,从中吸取精华,编成多种拳谱,广授门徒。

明代少林寺僧众常用武术表演接待游人和香客。王士性《嵩游记》云:该寺僧人“武艺俱绝”,有时六十多人集体表演,“拳棍搏击如飞”。表演猴拳的人,“盘旋蹕跃,宛然一猴也”。通过表演,多方面听取意见。

4. 积极传播

元代福裕和尚,在山东、河北等地建了五座少林寺,传授禅法和武术,扩大了少林拳术的影响。

清初统治者为防止汉人反抗,对习武闻名的少林寺,先是破坏,后加控制。不少具有反清意识的武僧,只得云游他乡,引起少林武术广泛流传。

清代各地秘密会社,有的也以传授少林拳术为手段,发展势力,从而壮大了少林武术队伍的力量。

明亡之后,精通少林武术的陈文赞,抗清失败,亡命日本,收徒传艺,从此日本也流行少林武术,并发展为柔道。

(四) 少林武术的种类

少林武术主要包括拳术和器械两类。

少林拳是一个综合名称,它指源于少林寺,或经少林寺整理改造,以少林寺名义传播,具有少林拳特点的拳术。

少林拳早期只有罗汉十八手一种,后来逐渐发展,宋代达 300 多种,流传到现在的尚有 140 余套。其套路之多是中國其他任何拳术都无法相比的。

现在流传的少林拳主要有小洪拳、大洪拳、罗汉拳、梅花拳、炮拳、通臂拳、长拳、猴拳、七星拳、柔拳、醉拳、心意拳、黑虎拳、螳螂拳、金刚拳、看家拳、莲花拳、七星连环拳、降龙十八掌等。

这些少林拳主要是单人练。双人对练的少林拳有扳手六合拳、咬手六合拳、踢打六合拳等。

少林器械主要有枪、刀、剑、棍。其中常练的枪有十八名枪、二十一名枪、二十四名枪、三十六名枪、四十八名枪、杨家枪、赵氏枪、秦氏枪、罗汉破门枪等；常练的刀有梅花刀、春秋刀、罗汉刀、飞刀、地堂刀、少林看家刀、少林乾坤刀等；常练的剑有达摩剑、龙泉剑、二堂剑、七星剑、飞龙剑等；常练的棍有少林烧火棍、猿猴棍、眉齐棍、盘龙棍、五虎群羊棍、夜叉棍、六合棍、看家棍、排棍等。清代乾隆以来，少林器械中尤以棍术最著名。

此外，还有方天戟、方便铲、三股叉、黑虎铜锤、虎头双钩、一路草镰、单铜、双铜、羊角拐、马牙刺、九节鞭等。

这些器械，可以单人练，也可以双人对练。常用的对练有双枪对刺、刀砍刀、刀破枪、拐破枪、棍破枪、草镰破枪、三股叉破枪、方便铲破枪、九节鞭对棍、六合棍对练、眉齐棍对练等。

少林器械各种套路共有 130 多种。

（五）少林武术的特点

在中国的拳法上，有内家拳（又称内功拳）和外家拳（又称外功拳）之分。

内家拳主静，以柔为主，健身旨趣较大。外家拳主动，以刚为主，“主于搏人”。

少林拳是外家拳的代表。它的主要特色有以下几点：

第一，少林拳朴实无华，刚劲有力。套路结构严谨，节奏鲜明，动作敏捷。着眼于实战，具有先发制人，以动制静的功能。出拳迅速，势如破竹。

为了使打出去的拳勇猛有劲，冲拳皆用“滚出滚入”法，出拳前拳心向上，打出后拳心向下，让拳在空中像钻一样，螺旋形向前进击。

第二，少林拳虽以刚为主，但刚中有柔，外猛内静，招势变幻莫

测。注意声东击西,指上打下,善于顺人之势,制人之身,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击拳之后,手臂保持不曲不直姿势,可攻可防。

第三,运动形式一条线。少林拳的大多数套路,从开始到收尾,都要求演练者在一条线上活动,起、落、进、退、反、侧、收、纵都不能偏移一条线。故少林拳向有“拳打一条线”之说。

第四,“拳打卧牛之地”。演练少林拳的场地可大可小,就是只能卧下一条牛的狭小地方,也能充分发挥少林武术的力量。

少林武术,千余年来绵延不断,流派遍布大江南北,誉播海内外,成为中华武术的主要代表之一。

近年来,作为少林武术发源地的少林寺日渐兴旺,少林寺所在的河南登封市,成了少林武术之乡,少林武术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二、陈氏太极拳

(一) 陈氏太极拳的形成

太极拳发源于河南温县陈家沟。为当地明末清初人陈王廷所编创。

陈王廷祖籍山西,明洪武七年(1374年),陈氏家族在河南温县的第一代始祖陈卜,由山西迁到河南,先定居温县陈卜庄,又迁居温县常杨村。常杨村在温县城东青风岭上,村中有一深沟,随着陈姓人口日益增多,常杨村被改名为陈家沟。

陈卜精于拳术,常于“耕读之余,而以阴阳开合,运转周身者,教子孙以消化饮食之法”(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以后世代相传。

陈王廷为陈卜九世孙,明末清初生员,能文能武。他在祖传拳术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结合古代导引吐纳之术,参照古代阴阳学说,编创了太极拳。

“太极”二字出自《周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陈王廷在太极拳中巧妙地运用了阴阳变化的辩证法原理。

虽然太极拳的某些招势、动作在以前的拳术和导引中已经出现，系长期发展而成。但到明清之际，才由陈王廷对它们进行创造性地组合，编成太极拳。

太极拳中螺旋缠绕、柔中寓刚、以意行气、劲由内换等原则都是陈王廷确定的。他曾写有一首词云：“叹当年，披坚执锐，扫荡群氛，几次颠险。蒙恩赐，枉徒然，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闲来时造拳，忙来时耕田。趁余闲，教下些弟子儿孙，成龙成虎任方便。”

自陈王廷之后，陈家沟练拳之风长盛不衰，当地谚语云：“喝喝陈沟水，都会跷跷腿。”历代陈氏子孙不断对太极拳进行加工提炼，先后出现的著名拳师有陈卜十四世孙陈长兴、陈有本，十五世孙陈青萍，十六世孙陈鑫，十七世孙陈发科，十八世孙陈照丕等。

后人把陈王廷创始的太极拳称为陈氏太极拳，它正式形成于明清之际，清中叶广为流传，清末流行全国。

（二）陈氏太极拳的发展

陈氏太极拳经过清代发展，形成许多不同风格的流派。其中除陈姓自己一派（又有老架、新架，即大架、小架之分）外，又有杨式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孙式太极拳等。它们都是从陈氏太极拳发展来的。

古代武术，大多为口传身授，父子相传，轻易不传外人。十九世纪初，杨露禅以卖身为奴的办法到陈家沟偷学，事情感动了陈王廷五世孙陈长兴，从而得到他的教导。这是陈氏太极拳传授外姓人之始。

杨露禅（1799—1872年），名福魁，字露禅，河北永年人。在陈家沟从陈长兴学陈氏太极拳老架，得其秘术。

杨露禅学成后,到北京任武术教师,许多王公贵族都向他学拳。为了适应王公贵族体弱者锻炼身体的需要,他在陈氏太极拳基础上加以改进,简化姿势,取消跳跃、震脚等激烈动作。后经其子杨建侯(1839—1917年)、其孙杨澄甫(1883—1936年)等进一步完善,自成一派,称为“杨式太极拳”。

杨式太极拳的特点是,舒展沉着,柔和大方,简洁严谨,朴实平正。它以大架势为主,也有中架和小架,适宜不同体质的人练习。

武式太极拳的创始人为武禹襄(名河清,字禹襄,1812—1880年),河北永年人。

武禹襄先向同乡杨露禅学陈氏太极拳老架,又到河南温县向陈青萍学陈氏太极拳新架。他把杨露禅的拳法和陈青萍的拳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武式太极拳。

武式太极拳,以小架势为主,结构紧凑,身法小巧,动作灵活,步法敏捷,身体保持中心,出手不过足尖,适应老年人需要。

吴式太极拳的创始人为吴鉴泉(1870—1942年),河北大兴人,满族。

吴鉴泉的父亲全佑(1834—1902年)曾从杨露禅学拳。他先学杨露禅的大架,又学杨露禅长子杨班侯(1837—1892年)的小架,互相融合。

吴鉴泉继承其父拳法,加以改进,创造了吴式太极拳,流行于美国和东南亚一带。

吴式太极拳的架式大小适中,动作轻松自然,灵活紧凑,以柔化见长。

孙式太极拳的创始人为孙禄堂(名福全,字禄堂,1860—1930年),河北完县人。

孙禄堂先学形意拳和八卦拳,又向武式太极拳的传人郝为真(1849—1920年)学太极拳。他吸收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融为一

体,创造了孙式太极拳。

孙式太极拳架高步活,虚实分明,进退开合,如行云流水,适应各种年龄的人练习。

(三) 陈氏太极拳的特点

陈氏太极拳是内家拳的一种。它从形式上说属武术,但主旨却属养生类体育。

陈氏太极拳受道家影响较大,将肢体动作和体内行气相结合,是一种融合拳法和导引术的健身运动。

陈氏太极拳虽然有几个流派,但它们的基本特点是一样的。

第一,以意念指挥运动全过程。陈氏太极拳要求以心行气,以气运身。肢体动作只是意的外在表现。练拳时,先意动后行动,意到气到,气到劲到。意念、呼吸、动作三结合。

陈氏太极拳用意念指挥气,活跃于全身。久练太极拳的人,只要思想上想到身体某一部位,某一部位就可以产生气的活动。

第二,以柔为主,刚柔相济。陈氏太极拳在外形上具有缓、柔、稳的特色。初练时,越柔越好,以后练柔成刚。要求外柔内刚,柔中含刚,绵里藏针。《拳谱》称:“常求柔软之于外,久之自得坚刚之于内。”

练拳动作要求由慢转快,快慢相间,慢不能停,快要沉着。

第三,要求身肢放长,使全身产生弹性。陈氏太极拳对身躯、手、足都有拉长的要求。如《拳谱》规定的“虚领顶劲,气沉丹田”,是为了放长身躯;“含胸拔背”是为了放长脊背;“沉肩坠肘”是为了放长手臂;“开胯屈膝”是为了放长腿部等。

练拳时,放长身肢,可以使肌肉在不断放长与恢复的过程中,锻炼收束能力,从而产生弹簧劲,提高血液循环速度,降低血压,提起精神。

第四,动作如缠丝,四肢伸缩翻转呈螺旋形。陈氏太极拳的每个动作都是在空间划不同形式的圆弧,其动作轨迹为太极图(俗称阴阳

鱼)形状。

练拳时,要求掌心由内往外翻转(顺缠),或由外往内翻转(逆缠),并由不断翻转掌心,带动上肢旋腕转膀,下肢旋踝转腿,身躯旋腰转脊,出现全身旋转曲线。

所有的拳式,都是由双顺缠丝,双逆缠丝,或一顺一逆缠丝三种组合构成的。

螺旋式缠丝状运动,也是太极拳名称的由来,它是世界罕见的运动形式。

第五,虚实分明,耐久不疲。陈氏太极拳的每个动作都有一虚一实。练拳时,要求一足负担重(实),一足负担轻(虚),并根据运动进展,不断变换虚实,让身体重心在两足上经常倒换。

在两手动作上,运劲上棚之手为虚,下沉之手为实。在手与足的配合上,左手实则左足虚,右手实则右足虚,使内劲保持中正。

陈氏太极拳主要以分清虚实和重心偏移而产生力量。

第六,运劲时,动作用折叠法。如手的动作,意欲向前,须先向后,意欲向上,需先向下,如写毛笔字的回锋一样,一往一复,使身体有不偏不倚之感,动作留恋缱绻,形神兼备,如波浪起伏,连绵不断。

第七,以腰脊为中心,带动全身关节活动。练拳时,腰为主宰,周身一体,一动全动。如做上肢动作时,力起于腰,行于肩,通于臂,达于手;做下肢动作时,力起于腰,推动胯,行于膝,达于足。掌、腕、肘、肩、背、腰、胯、膝、足九个关节的劲,都是由腰上发出的。近代以来,太极拳流传到日本、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近年来,温县陈家沟的太极拳学校,不但有许多国内学员,还为世界上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一百多批共 2600 多名学员。太极拳日益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文化财富。

第十二章 中原民俗

民俗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民间传统习俗。

中原民俗既有中部内陆地区的特点,又受东西南北四邻风俗的影响。它较多地反映了中原百姓的人生愿望、生活风貌和心理状况。

“百里不同俗,十里改规矩。”中原民俗虽然大体上是一致的,但不同市县有时也存在着明显差异。

中原民俗中许多传统美德,已与今天的社会主义新风融合在一起。中原民俗中的迷信、落后部分,已被淘汰,或处在正被淘汰之中。

第一节 婚姻习俗

婚姻是人生大事。婚姻习俗一向受到中原人的重视。

一、婚前习俗

婚前习俗,主要指订婚前后的习俗。

中原历史上的婚俗,长期遵循古代“六礼”原则。“六礼”见于《仪礼》和《礼记》,它把缔婚程序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是纳采,即说媒,也称提媒。男家请媒人向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后,男家备礼前去求婚。

第二是问名,中原俗称“过八字”、“过庚帖”或“换帖”。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日期、时辰,以归卜其吉凶,看男女二人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克。

第三是纳吉,即订婚。男家问名之后,求卜于神,若得吉兆,便送礼订婚。

第四是纳徵,也称“纳币”,中原俗称“过礼”。订婚后,男家将聘礼,如衣料、首饰等送到女家。

第五是请期,即议定结婚日期。男家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家,求其同意。开封、新安等地称为“送好”,夏邑称为“要好”,方城称为“看好”,新县称为“送日子”。

第六是亲迎,即结婚。新郎亲自迎娶女方。

由于六礼太烦琐,清末以来,中原民间常对它进行简化,并改用通俗说法。有的简化为提亲、合八字、下定礼、送好、迎娶五步。有的简化为提亲、下定礼、送好、迎娶四步。有的简化为提亲、下定礼、迎娶三步。

建国以后,旧的六礼被废除,中原缔婚程序一般分为四步。一是恋爱,对象有自找和经人介绍两类。二是订婚,男方宴请女方亲友和介绍人。三是登记,即领结婚证。建国前无登记手续。四是迎娶。

如果是经人介绍的,中原农村婚姻,近年来常有这样几个过程,即见面(男女相见)→看家(女方察看男方的家庭情况)→扯衣服(男方给女方买衣料,女的跟着去买,买好后男方带回家)→订婚(男方去女家)→送聘礼(送结婚礼品和衣服)→结婚。

二、结婚习俗

中原结婚习俗,内容丰富,细节繁多。有些仪式很陈旧,连当事人也不解其义,旧时也照样遵照进行。建国后,对落后习俗进行改革,并对一些旧仪式注入了新内容。

(一) 布置新房

迎亲前一个重要的准备工作是布置新房。一般说来,床帐被褥,桌椅柜子,在新房里都是少不了的。

中原结婚用的被子,都是请儿女双全、夫妇健在的嫂子和邻家妇女套的。嫂子们常在被角偷放痰藜、碎皂角,以让新婚夫妇不能安眠来取乐。

新房的房门前、窗户上都贴上红“囍”字,被子上也放上用红纸剪成的“囍”字。“囍”字也贴在大门前,甚至街口。

中原结婚普遍贴“囍”字的习俗,相传起于宋代。据说王安石赴京赶考,途经马家镇,马员外门前挂一走马灯,灯上写一副对联的上联云:“走马灯,灯走马,灯息马停步。”并注明,谁对出下联,就招其为婿。到京考试时,主考官出的题目是“飞虎旗,旗飞虎,旗卷虎藏身”,要求对出上联。王安石使用“走马灯”相对,主考官十分赞赏。回来时经过马家镇,又用“飞虎旗”去对“走马灯”,被招为女婿。结婚时,忽报金榜题名,双喜临门。王安石随手写下一“囍”字。从此结婚贴“囍”字流传至今。

王安石这个故事,不一定有什么根据,但结婚贴“囍”字,却是中原长期以来的事实。

(二) 迎 亲

旧时,中原迎亲主要用花轿。花轿由男方家中出发时,坐有压轿童。

迎亲时,林县(今林州市)等地男方带到女方家中的礼品盒中有红线缠艾、盐、石子等。艾表示夫妻恩爱,盐表示夫妻言投意和,石子表示实心实意。

罗山、方城等地迎亲时有“奠雁礼”,即男方随花轿带一只公雁(以公鸡代替)到女家,回来时,女家又添一只母雁(以母鸡代替)带回男家,取“雁无二配”之意。

卢氏等地的“奠雁礼”不用鸡代替,而用一块连刀肉,名为“代雁肉”。

中原规定,无论冬夏,新娘上轿都得穿棉衣。一般上穿红棉袄,下穿棉裤,外罩红裙子。1957年以后,改穿时新衣服,但农村仍保留穿棉袄习俗,只是夏天棉袄做得薄些,或将单衣四角放些棉花,做成象征性的棉袄。

新娘上轿时,脚不得沾地,由哥哥或舅舅背送到轿上。

起轿时,新娘必须哭,以示惜别和感谢父母养育之恩。

迎亲花轿,来回不能走一条路。一般采用逆时针方向,去时走右边,回时走左边。相传,走重路会只生女不生男,或只生男不生女。

花轿在路上如与另一花轿相遇,新娘要互换礼物,并放鞭炮。

除花轿外,旧时中原迎娶用席卜楞车的也不少。席卜楞车即有林箴花席作棚的牛车。新娘坐男方迎亲的席卜楞车,送客坐娘家的席卜楞车。新娘车前坐有干练的迎亲老妇,故歇后语说:“席卜楞车前头坐个老太婆——好的在后头。”

河南修武有些迎亲习俗与其他地方不同,如规定迎亲须在下午,若路远,则女家在当天早些时候先将新娘送到男方附近的人家,称为“送亲”,然后再由男方用花轿接走。

五十年代以后,花轿被废除,迎亲主要用自行车、马车、拖拉机或汽车。但一些迎亲习俗大家仍然遵守。

(三) 拜 堂

在中原,花轿抬到婆家之后,新娘双脚也不能着地,必须走在红毡或布袋之上。两边有人将红毡或布袋依次向前传递,称为“传袋”,具有传宗接代之意。

新娘进门后,举行的最隆重的仪式,就是拜堂,即拜天地,拜父母,夫妻对拜。旧时都是跪拜。

今天中原民间的结婚典礼,就是由过去的拜堂发展演变来的。一般都不再拜天地了,但拜父母、夫妻对拜都是不能省的,只是把跪拜改为鞠躬。新娘也由头顶红盖头变为胸戴大红花。

(四) 喝交杯酒

拜堂之后,新郎、新娘进入洞房。旧时多举行“撒帐”仪式,即由儿女双全的与新郎、新娘同辈的中年妇女把五谷、花生、大枣等撒到新郎、新娘的帐子里,边撒边唱,祝愿他们夫妻吉祥如意,白头到老。撒大枣的意思是希望他们早生贵子;撒花生是希望他们花着生,生男也生女。

接着新郎、新娘喝交杯酒,表示他们相亲相爱,永结同心。卢氏等地称交杯酒为换盅酒或合盅酒,汤阴称为交心酒,用意都是一样的。

喝交杯酒后,有人端上饺子,饺子多不煮熟。这时外边有人问新娘:“生不生?”新娘必答“生”,这是出嫁前娘家妈交待过的。“生”就是生子之意。

(五) 闹 房

结婚当天晚上最热闹的节目是闹房。

闹房是戏谑新郎、新娘,增加欢乐气氛的活动。

中原闹房,不分男女老幼,故有“新房三日无老少”之说。闹房方法争奇斗巧,花样百出。

豫西义马等地闹房有“织布袋”、“海底捞月”等形式。

“织布袋”即数人围成一圈,推新郎、新娘在里面相撞。

“海底捞月”是在一碗面汤上面漂个馍，让新郎、新娘同时去咬馍。

豫南方城等地闹房有“吸过桥烟”、“糊顶棚”、“摸蚰蚤”、“摸金豆”等形式。

“吸过桥烟”是新娘点着香烟，噙住烟的中部，送到新郎嘴边，让新郎去吸。

“糊顶棚”是新郎舌尖粘上小纸片，伸到新娘口中，贴于上颚。

“摸蚰蚤”是让新娘把手绢藏于腋下，新郎伸手到新娘衣服内把手绢拿出来。

“摸金豆”是把玉米粒从领口丢入新娘内衣中，让新郎去找出来。

这些活动，皆无恶意，只图喜乐。只要掌握一定分寸，越闹主人越高兴。

三、婚后习俗

(一) 回 门

结婚之后，新娘要回一次娘家，称为回门。

中原回门的时间，各地不同。开封在第二天，南阳、新安等地在第三天。

汤阴在第二天下午由娘家将新娘接回去，第三天送回来。

卢氏旧时回门在第三天，只新郎去娘家，新娘不去。同日，女方至亲要带礼品到新郎家，名为“送汤”。现在，结婚第二天，新娘、新郎同去回门，第三天娘家到新郎家“送汤”。

方城回门一般在第四天，新娘在娘家住八天，名为“住四还八”。

浚县、修武等地，回门在第九天，称为“回九”。新娘在娘家住四天或八天，最多不得超过九天。

中原新婚后虽然都要回门，但回门的方法和时间，却各地各乡不同。

（二）认亲、添仓、追节

结婚之后，男女姻亲开始来往。

婚后第一个春节或过夏，女婿要带礼品探望女方亲戚，名为“认亲”。

女方亲戚要在正月十六或十九给男方送礼，名为“添仓”。

端阳、重阳时，女方亲戚还要给男方送两次礼，称为“追节”。

四、非正常婚习俗

中原历史上，曾存在许多非正常婚习俗。它们流行时间很长，影响深远。建国后大多已经革除。

（一）童养媳

童养媳，中原又称“小媳妇”，是指被出卖或由家庭包办订婚，从小就到婆家生活的妇女。

童养媳的男人有的比女人大十几岁，女方长大后常成悲剧。据1948年统计，豫南罗山童养媳占婚姻的5%，其中造成悲剧的有二分之一。

童养媳长大后举行婚礼，中原俗称“圆房”或“上头”。一般都在黎明前举行，无鼓乐，也不摆筵席。

（二）早婚

中原早婚，一般都是男子早娶。结婚时，男子十来岁，女子比男子大六、七岁或十多岁。

早婚现象大多出在富裕人家，目的是为了媳妇进门后早管家务，早生子女。

（三）换亲、转亲

换亲是一家兄妹二人与另一家兄妹二人，互相交换成亲。转亲是三家以上的兄妹循环联姻。它们的本质都是以姊妹换妻子，都是因为

家境贫寒,娶不起妻子的缘故。

林县(今林州市)称转亲为“拐弯亲”。鹿邑称转亲为“三角联姻”或“多角联姻”。

转亲有三家、四家甚至十二家转的。即 A 妹嫁 B, B 妹嫁 C, C 妹嫁 D, ……M 妹嫁 A。

换亲如有不幸,涉及面还不算太大。转亲如一家发生纠纷则波及多家,一家离婚则引起各家离婚,甚至酿成人命官司。

建国后曾明令禁止换亲、转亲。

(四) 冲喜婚

冲喜婚,又称“冲喜亲”。

男方生病,提前娶女方,以图借喜事冲走晦气,求得病愈。仪式同正常婚礼一样。

结果,女方多遭折磨,有时新婚即成寡妇。

(五) 鬼娶妻

男子未婚而亡,由死者的妹妹女扮男装,代兄行礼娶妻。新娘守寡终身。

此俗,旧时尤以南阳为盛。

(六) 冥婚

冥婚又称“鬼婚”。有两种情况:

一是未婚夫亡,女方终身不嫁,死后与未婚夫合葬。

二是经媒人说合,将已死的未婚女子遗体迎来与已死的未婚男子合葬在一起,表示完婚。有时还举行隆重的仪式。

(七) 下一樁、上一樁、姐死妹续

历史上,中原流行兄死后弟娶嫂,或弟死后兄娶弟媳的习俗。这种情况,义马等地称为“截脚”。而驻马店等地称嫂嫁与亡夫之弟为“下一樁”,弟媳嫁与亡夫之兄为“上一樁”。

与此同时,中原还流行姐姐死了,妹妹接着嫁给姐夫的习俗,称

为“姐死妹续”。

（八）寡妇改嫁

寡妇改嫁，本来应是很正常的事。但中原历史上，却被视为见不得人的事，做法很不正常。

南阳等地，寡妇改嫁时，男方只能在夜间用车把女方接到自己家里，不举行婚礼。

驻马店等地，改嫁的妇女结婚时不准坐花轿，不准从娘家走，要从事先安排好的庵棚或土窑上车，去到男方家中。

建国后，所有歧视寡妇再嫁的习俗都已破除。

（九）招女婿

招女婿，本来也是很正常的事。建国后，还提倡男方到女方家中落户。

但中原历史上，入赘之人普遍受社会歧视。

新县称招女婿为“招坐堂”，修武称为“招养老”，而河南大部分地区都称为“倒插门”或“倒踏门”。

旧时，招女婿大多不举行婚礼，女婿要改姓女方姓，或所生子女用女方姓。

第二节 生育习俗

生儿育女是关系到家族延续和人丁兴旺的大事。

中原各地重视生育之风盛行，其习俗亦颇具乡土特色。

（一）求子

求子，中原也称“拴娃娃”。

旧时，妇女结婚后不生育，常向菩萨求子，烧香、上供、许愿，生子后谢神还愿。

当时,中原许多地方都有送子观音庙、送子娘娘庙,或在一些大型庙宇中建有奶奶殿、百子堂等,专供求子之用。

(二) 怀 孕

中原妇女怀孕,要求节制喜怒哀乐,目不视恶色,食不进邪味,使胎儿得到健康发育。

(三) 生 产

旧时中原孕妇,大多在家里生小孩,由产婆接生。

产后,要在产妇房门上挂红布,表示外人不能入室。

凡是头生(第一胎),婴儿的父亲要到岳父家报喜。报喜的时间,豫北一般在当天,豫西要求在三天之内。

新县等地习惯,产后三天,婴儿的姥姥就可以去看。而方城等地认为,生孩子时,娘家妈如果不在场,则不满月不能去看孩子。

产后一个月,称为“坐月子”。产妇要避风,禁生冷,不能久坐久站,不能劳累,不能生气。最初几天,只能吃鸡蛋、红糖、面汤、面条、小米粥等。

中原把生男孩称为“大喜”,生女孩称为“小喜”,这是由历史上重男轻女倾向造成的。

如果是双胞胎,十二岁前,两个小孩衣帽鞋袜的布料、颜色、款式都要相同,表示对他(她)们完全平等看待。

(四) 洗三、做九

新生儿三天,中原称为“三朝”。要给小孩洗澡,叫做“洗三”。这是人生首次洗礼。

新生儿九天,要举行庆祝活动。中原各地一般称为“做九”,也有一些地方,如浚县称为“办九”,开封称为“过九”等。

做九时,摆宴请客。产妇娘家和亲朋好友所送之礼,主要是红糖、鸡蛋、挂面、小米、婴儿鞋帽和衣料等。方城称为“送米面”,驻马店称为“送祝糜”,商丘、夏邑叫做“送祝米”。主人回敬的礼品一律是颜料

染成的红鸡蛋。

(五) 剃胎毛、闯干大、挪臊泊

婴儿满月时,中原民间常做的事有剃胎毛、闯干大、挪臊泊等。

剃胎毛就是给婴儿剃头。剃头时,不把头发全部剃光。有的在脑门上留一块,长成桃子形;有的在脑后留一撮,像个小尾巴;还有的在脑袋周围留一圈,称为“铁箍”,到小孩十二岁才能剃光。

闯干大主要流行于豫西等地。满月那天,大人抱孩子外出,碰到第一个年纪相当的人,就认作义父。民间称此为“闯干大”,据说有干大的孩子好养成人。

挪臊泊,又称挪臊坡。指产妇满月后,娘家将闺女和婴儿接回去住几天,婆家对产妇卧房打扫卫生后,再接回来。婴儿回来时,姥姥要送小碗和调羹,叫做“衣饭碗”。

驻马店等地,产妇在娘家只住一、两天;方城等地,产妇在娘家要住三、五天,还规定婴儿回来时要由奶奶去接。

中原也有些地方,将挪臊泊称作“住弥月”、“叫满月”(长垣),或“吃满月盐”(新县)。

有些人家,婴儿满月的时候也请客,称“过满月”。旧时,小孩的姥姥、外公,常在这一天给小孩送项圈、手镯和长命锁。

(六) 起 名

中原人的名字分乳名和大名两种。

乳名又称小名。越是娇贵的小孩,名字往往越俗。

男孩有叫石头、铁柱、铁蛋、拴住、留住的,是希望小孩健康长命;有叫粪堆、屎蛋、臭包、箩头、驴套、狗蛋、狗剩的,意欲以其名贱,可以避邪。

女孩有叫跟弟、招弟、引弟的,是希望下一次生男孩;有的女孩名字中有换、改、变等字样,如“改来”、“换子”等,是希望换胎,改生男孩;也有娇贵的女孩,起名黑妞、丑妞的。

这些小名,大多是孩子生下来后,由家中老人起的。

中原也有些地方,当孩子生后,父亲出门,第一眼看见什么就以什么作为孩子的小名。也有在婴儿出生后的头一个黎明,父亲出门第一个遇见谁,就请他为孩子起名,随其所好,说什么就叫什么。这就是所谓“闯姓起名”。这些做法,都是希望孩子能够顺利养大成人。

大名又称学名,是开始上学时起的。男孩的名字,除了有辈分排行字眼之外,其他字眼大多具有希望、祝愿和激励孩子上进的意思。女孩的名字常用枝、叶、花、香、春、秋、秀、红等字,含有优雅秀美之气。

(七) 做 百 岁

小孩一百天,中原称之为“百岁”。家中要庆祝,称为“做百岁”。但一般不请客,只搞家庭宴会。

近些年,“做百岁”新增加的内容是给小孩照相。豫南、豫北、豫东、豫西皆如此。

(八) 抓 周

周岁是小孩过的第一个生日。这一天,中原的主要风俗是抓周。从孩子抓的东西上,据说可以看出孩子长大后的志向和前途。

抓法和所抓的物品,中原各地有所不同。

卢氏是将鸡蛋、馒头、笔、镰刀等放在门外,让孩子隔着门槛去抓。

方城是将书本、算盘、食品等放在簸箕内让孩子去抓。

开封男孩主要抓印章、令旗、书画、笔砚、弓箭、脂粉、赌具等;女孩抓刀尺、碗筷、糖果等。

如果小孩先抓书本或文具,就认为他长大后会读书上进,有做官的希望;如抓着农具,则可能务农;如抓着弓箭,则可能当兵;如抓着算盘,则可能经商;如抓的是食物,则认为这孩子贪吃,长大难以发达;如男孩抓的是脂粉,则认为这孩子长大后只会在女人身上花功

夫,没出息。如抓着赌具,就表明他今后不务正业,会成为败家子。

一般人都知道抓周没有什么科学根据,但至今大家都仍这样做,主要是想为小孩生日增添更多的欢乐气氛。

(九) 送 羊

送羊为河南汤阴等地的古俗,至今仍在流行。

女儿生了子女,姥姥在农历六月里给外孙送“羊”(蒸成羊形的小麦面馍)。初送一个大羊,一个中羊,八个或十个小羊。外孙十五岁后,只送小羊,不送大羊。

本俗起于“羔羊跪乳”。相传古代有子不孝于母,后见羊羔跪于母羊脚下吃奶,受到启发,从此对母极孝。后人为教育外孙尽孝于老人,先送活羊,后演变为面羊。

第三节 丧葬习俗

中原传统实行棺木土葬。近年来在城市提倡火葬,用花圈代替纸马,黑纱、白花代替孝衣,开追悼会表示哀悼。但农村很多地方还依土葬风俗进行,只是略有简化。

中原新的火葬习俗与外地差不多,这里主要记述传统的旧时土葬习俗。

要在丧葬上移风易俗,必须破除迷信,提高人的素质。

一、葬前习俗

(一) 送 终

老人临死,儿女们要守候在身边,称为“送终”。中原习俗认为,送终是儿女们最重要的尽孝表现之一。老人如有子女送终,则谓之“得

济”，是有福气的表现。

老人亡故时，如果子女在外地，得到丧讯后，必须风雨无阻，昼夜兼程赶回家，俗称“奔丧”。

老人断气后，要象征性地给死者擦洗身体，给死者穿寿衣。所有衣裤皆不准用扣，只用布带扎系。旧时，中原许多地方，老人过了六十岁就有先备寿材（棺材）、寿衣之风。一般人家，在老人病危时，寿衣也都准备好了。穿好寿衣，还要给死者修面梳头。

由于习俗认为，活人的眼泪不能掉在死人身上，所以穿寿衣时不能哭。穿好寿衣才能哭，旧称“举哀”。

旧时，人断气后，要烧纸。烧纸的说法各地略有不同，修武称烧“断气纸”，罗山称烧“落气纸”，新安称烧“倒头纸”，卢氏称烧“开路纸”。

（二）发 丧

发丧是将死者移到住宅中堂灵床上，迎门停放，即所谓“寿终正寝”，让亲友悼念。南阳等地又称为“停灵”。

停灵时，要在死者脸上盖以黄纸，表示不忍再看死者面孔。

要用麻绳捆住死者双足，称为“绊脚索”，要在死者脚前点燃油灯，称为“长明灯”。

要在死者头前放瓦盆，称为“老盆”。老盆的用处，中原各地不完全一样。方城用以烧纸钱。林县（今林州市）用老盆给死者供饭，子女们吃饭时，要向盆里添一点。新县的老盆是为老人断气后擦洗身体用的。

虽然用处和说法各异，但停灵时，在死者头前放老盆，在中原是一致的。

从死亡到出殡，死者身边都要有亲人守护，称为“守灵”。

（三）报 丧

报丧是迅速将丧事通知亲戚朋友。浚县等地又称之为“送孝”。报

丧的孝子到了亲友家，不能直接进门，要先跪在门外禀报老人亡故的时间和原因。如是母亲亡故，子女首先要到舅舅家报丧。

（四）吊 孝

亲戚朋友得到消息之后，要赶到死者灵前拜祭，称为“吊孝”。旧时，吊孝者要烧纸，并用古礼跪拜。不论吊孝者年纪大小，孝子都要向他叩头，故俗云：“孝子的头不值钱。”并给吊孝的人发一块白布，名为“孝布”，又称“吉利儿”。

近年来，吊孝者常送花圈和挽幛。

（五）穿 孝

中原旧俗，从死者断气，就要赶制孝服，全家大小都要戴孝。

治丧期间，男的戴孝帽，女儿、儿媳散发，头扎白布，皆穿孝衣、孝袍。

治丧以后，男的只穿白鞋，或在黑鞋上敷白布；女的头扎白头绳。

第一个春节，门上不贴对联（可糊白纸），不走亲戚，第二个春节贴蓝对联，第三年服满，可贴红对联。

方城等地，孝子在“五七”之内不理发，新县在“七七”之内不理发。

二、安葬习俗

（一）打 墓

中原有些人家有家族坟地，即祖坟，再穷，祖坟也不卖。定好穴位后，先由孝子动土，其他帮忙人再动手挖穴。

旧时，林县（今林州市）等地还有老人活着时就建“喜墓”的习俗。

（二）入 殓

入殓是在亲友都见过遗容后，把死者装入棺材。

如果死者尚有伴侣健在，只能单日出殓；如无伴侣在世，单日、双日皆可入殓。

修武等地习俗，入殓时要由大女儿抱着死者的头放入棺内。

（三）送 葬

送葬又称出殡。旧时棺材多用人抬，或用牛车。

中原习俗认为，如父母单亡，双日不能出殡，否则对生者不利。

出殡时，亲朋好友都要到灵前，与死者告别。

灵柩起动时，要在门口路上，迎着灵柩将老盆摔碎，称为“摔老盆”。

中原绝大部分地区，摔老盆的都是长子或长孙，因为牵涉到继承权问题，不能让别人摔。但也有少数地方，如修武，摔老盆的可以是长媳；方城可以是女婿。

灵柩行进时，长子扛引魂幡引路于前，其他孝子手持哀杖护送于后。

在送灵的队伍里，旧时常聘有僧道和鼓乐吹奏人员，携带一些象征性的随葬品，即纸扎的车、马、房屋之类。

送葬时，沿途要撒纸钱。

有时灵柩需在途中停几次，接受邻人路祭。但停时，棺材不能沾地。

（四）安 葬

中原墓穴的方向，一般是头朝西北，脚朝东南。

如果埋在祖坟，成年儿子原则上要埋在父墓下边，名为“父蹬子肩”。未成年子女，不入老坟，只埋在地角。

如父母中一人早逝，另一人死后，常将他们合葬在一个墓穴。合葬时，中原民间要求男棺靠祖坟，女棺在外边。倘合葬于祖坟以外的地方，则男左女右。

新县等地习俗，棺材放入墓穴之前，孝子要先在穴中躺卧一下，名为“暖坑”。

封土时，普遍由孝子铲第一锹土。

封土后,将引魂幡、哭丧棒插于坟前或坟后。并焚烧纸扎的金山、银山、金童、玉女、摇钱树、聚宝盆、车、马、房屋及各种生活用品等。

三、葬后习俗

(一) 点 主

老人亡故之后,按中原习俗,旧时家中都要供奉牌位,称为“木主”,上用墨书“显考×公讳××字××神主”,或“显妣××公元配×孺人神主”字样。木主是提前制好的,但“神主”的“主”字不写上边一点,要等葬毕回家请有道德有名望的人用朱笔补上,称为“点主”。

点主要举行一定仪式。点主时,孝子须跪地以待。

豫西义马等地,制牌位时除“主”字空一点外,“神”字还缺末笔,留待点主先生一起补齐,故又称“穿神点主”或“贯神点主”。

建国后,牌位大多用相片代替。

(二) 圆 坟

安葬当天,坟不做圆,第三天加工为圆锥形,称为“圆坟”,又称“复三”。以后三年内不能动土。

(三) 做 七

佛教认为人死要托生,七天一次机会,第七个七天,一定会托生出去。因此,每个七天,子女都要烧纸祭奠一次,称为“做七”。“五七”要隆重。

“七七”是最后一个“七”,称为“尽七”,晚辈也要穿孝衣上坟大祭一次。

(四) 周 年

旧时,守孝时间一般三年。守孝期间,孝子不得婚嫁,不得参加娱乐活动。

“尽七”之后有“百日祭”,每逢周年时有“周年祭”。其中第三个周

年,祭礼最隆重,称为“三年祭”,为最后一次祭奠。以后除孝,一切恢复正常。

长期以来,人死后,洗澡换衣,用纸蒙面,以麻绊脚,入殓钉棺,孝子亲戚戴孝送殡,长子捧老盆,扛引魂幡,在墓地烧车马纸扎,葬后点主、圆坟、做七、百日祭、周年祭、三年祭等习俗,旧时在中原普遍流行。至今在人们心中仍有很深影响。

第四节 节日习俗

节日习俗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有些内容是民族文化的优秀结晶,至今长盛不衰,如敬老爱幼,亲友礼节往来等。有的有新发展,如元宵发展为灯节,清明成为扫祭烈士墓的日子。有的用旧形式装进新内容,如春节由敬神变为欢庆新春。有的节日和习俗已经废除。

传统节日全国皆过,但各地过法不同,这里主要记述这些节日在中原的特点。节日时间,皆以农历计算。

(一) 春节

春节是农历正月初一。中原又称为“过年”、“年下”或“大年”。

初一早晨,大家竞相起早,穿新衣,放鞭炮,名为“接年”。

早饭,中原普遍吃饺子。饺子,中原许多地方也称之为“扁食”。就是再穷的人家,不管馅儿好坏,也都要争取吃上一顿。

初一白天,亲朋好友,互相拜贺,称为“拜年”。

初二,开始串亲戚,看老人;出嫁的闺女开始走娘家。

闺女走娘家的时间,中原各地习俗不一。开封是初二,驻马店等地是在初五、初六。一般都不把日期搞乱。

初一至初四,禁忌很多。初五破禁,俗称“破五”,一般也吃饺子。从此,各行各业开始转入正常。

在所有的节日中,春节是最受中原人重视的节日,也过得最隆重。

(二) 元宵节

元宵节是正月十五,中原又称“灯节”。

灯节一般过三天,十四为试灯,十五为玩灯,十六为送灯。

农村人家门前挂灯笼,或供旺火,以示一年兴旺发达。城镇搭彩棚,搞灯展,放焰火。开展各种民间文娱活动,如旱船、高跷、狮子、竹马、抬阁等。

豫东夏邑等地,家家蒸面灯,放在门槛、磨房、鸡窝等处。

豫西新安等地,多蒸各式灯盏馍,馍上有小坑插捻,加食油点燃。有的馍大如茶盘,全家每人一捻,点着后,全家围观,象征光明和团圆。

开封从唐宋以来就有灯会。

灯节习惯吃元宵。1913年,袁世凯说元宵与“袁消”同音,下令改称“汤圆”。从此,中原也称元宵为汤圆。

方城,正月十四新媳妇要回娘家,称为“躲灯”。因为“灯”与“蹬”谐音,蹬有蹬散之义,害怕婚姻不长久。此俗至今还存在。

(三) 二月二

二月初二,俗称“龙抬头”。中原习俗,这一天要吃炒豆等。

相传古代有一年大旱,玉龙因同情老百姓,而偷着下雨,被玉皇大帝压在山下,说只有金豆开花,才能放它回到天上。老百姓便炒玉米花、炒豆,使玉皇大帝误认为金豆开花,放了玉龙。

为了表示对龙的敬重,豫西卢氏、豫南罗山等地,建国前二月初二这天禁用针剪,停止做针线,说是怕戳瞎龙眼。

驻马店、陕县农村还蒸龙形馍供食。

豫东商丘等地,又称二月初二为“围仓节”。旧时儿童常在这天以棍敲屋梁,并唱道:“二月二,敲梁头,大囤尖,小囤流。”据说这样做可

使庄稼获得丰收。

(四) 清 明

清明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一般在二月底或三月初。

旧时，中原人把清明称“上坟节”，要给亡人上坟扫墓。

建国后，清明成为祭扫烈士陵园，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日子，老百姓上坟扫墓之风已很淡漠。

清明时，中原还有在门边插柳枝的习俗，谚云：“清明不插柳，死后变黄狗。”豫南息县人还把柳叶编圈戴在头上。

清明也是青年踏青、放风筝、野餐的时节。

(五) 端 午

端午节是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

中原各地都在这天吃粽子。但粽子的包法各有不同。

一般的粽子都是芦苇叶包江米、红枣、红豆、肉等。

豫西卢氏无芦苇叶，粽子是用榭树叶包的。所包为粘质小米、秫米、小豆等，形状为扁形长条，长宽2×6寸为一扇。两扇合成一捆，放在锅里煮食，称为“榭包”。

鲁山等地的粽子也用榭树叶包成，形状如槌，故称“榭槌”。

豫南息县的粽子是用竹箨叶包的，呈三角形，里面包糯米。

南阳称粽子为“角黍”。

过端午节时，一般人家门上都插艾。妇女缝香囊佩戴。小孩的手腕、足踝上系五色线。修武等地还用雄黄抹小孩的鼻孔、耳孔和肛门。据说这样做可以避毒驱邪，防止蛇蝎、蜈蚣侵害。

香囊，中原又称“香布袋”，常以彩线和彩色布料制成，有鸡心、菱角、盘脚娃娃等形。

浚县等地，婚后第一年，娘家在端午节要给女儿送凉席、竹帘、扇子，叫做“追节”。

新县等地，新婚夫妇五月初五要被女方娘家请去过节，称为“过

新端阳”。

(六) 六月一

六月初一，中原称为尝鲜节，又称为半年节。

旧时，豫东和豫北都在六月初一用水果祭天。现在不祭了，但仍改善生活。

(七) 六月六

六月六日，中原风俗，多在这天晒衣、曝书，以防虫蛀。所以豫东鹿邑等地称之为“晒衣节”，因神话传说六月初六为龙女晒衣日。

豫西和豫南有些地方也称六月初六为“回门节”，已出嫁的闺女要在这一天回娘家看父母，称为“望夏”。

(八) 七月七

七月七日为乞巧节，豫西等地又称之为“女节”。

旧时，妇女们，特别是未婚女子，这天晚上，都要在院中呈供瓜果，向天上的织女星乞求针线、绣花技巧。

据说，姑娘们还能在这天晚上听到天上牛郎、织女相会时的说话声。但听的风俗各有不同。陕县的姑娘是聚在树下听，息县的姑娘是咬着丝瓜根听，方城的姑娘是隐藏在扁豆架下听。

建国后，乞巧之风渐废。但妇女们在这天争看牛郎、织女星的兴致不减。

(九) 中 秋

中秋节是八月十五。中原又称为团圆节。

旧时，中秋要祭月。祭月时，一般把月饼、果品放在案上祭嫦娥，把毛豆和水放在案下祭玉兔。

现在月已不祭，但吃月饼、庆团圆之风更炽烈。

新县中秋，旧时吃“羹粑”。它是用当年新糯米粉做成的一种有馅的糍馍馍。现在也改为吃月饼。

中秋时节，瓜果成熟，丹桂飘香，赏月庆丰收。息县等地还有乘月

到田野里“摸秋”的习俗。

(十) 重 阳

重阳是九月初九。

据说,阴阳学认为六为阴,九为阳,故称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历史上,每逢重阳节,中原流行登高、赏菊活动。

现在主要流行吃重阳糕。城里大多是街上买的,农村主要是自己蒸的。一般重阳糕上都有红枣。

近年来,重阳又发展为老人节。

(十一) 冬 至

冬至,也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中原的习俗是吃饺子。

冬至开始交头九,相传这天吃饺子可以防止冻坏耳朵。浚县、汤阴等地还把冬至吃饺子直接称为“安耳朵”。三门峡还认为冬至吃饺子,可以防咳嗽。

(十二) 腊 八

腊八是腊月初八,要吃腊八粥。

腊八粥的用料,中原各地不同。有用米、豆、枣、红薯的,也有用胡萝卜、豆的。

南阳的腊八粥里有面条。浚县腊八粥里有花生。陕县腊八粥里有核桃仁、柿饼、大米、小米。息县腊八粥里有莲籽。修武有豇豆、绿豆。汤阴有山药蛋。开封有百合、龙眼。

总之,腊八粥要八种材料配成。所以罗山又称腊八粥为“八宝饭”。

驻马店等地的幼女要在腊八时穿耳朵,以便长大戴耳环。

浚县还将腊八粥涂在果树上,据说这样做可使来年果树多结果。

(十三) 祭 灶

祭灶,中原又称“小年下”,在腊月二十三。

这天,送灶君上天,各地都供红公鸡,给灶君作马。其中方城等地

的公鸡不宰,只在鸡头上洒冷水,让鸡扑楞,象征灶君骑马的形象。

相传灶王爷上天前要清点人口,所以走娘家的媳妇和其他出门在外的人,都要在这天赶回来,否则认为不吉利。

南阳旧有“男不祭月,女不祭灶”之说。

陕县祭灶要烙饼,其他地方主要用麦芽糖。

建国后,已不祭灶,但该日吃麦芽糖之风,仍相沿不衰。

(十四) 除 夕

除夕,中原又称“大年三十”。全家团圆,吃团圆饭,喝团圆酒。长辈给小孩“压岁钱”。全家“守岁”。

开封、南阳、三门峡等地,把“守岁”叫做“熬年”,息县等地称为“守皮袄”。

过了腊月二十,中原许多人家就准备过年。浚县的习俗是:“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贴花码(年画、窗花、神码)。二十九,啥都有。三十儿,捏鱼儿(饺子)。”一切准备就绪,百业封门。

修武民谚也说:“二十三,祭灶关。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咚咚鼓(排练文艺节目)。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洗萝卜(准备油炸食品)。二十八,蒸馍馍。二十九,去打酒。三十黄昏煮刀头(肉)。初一五更乱点头(叩头)。”

开封也有相似的民谚,只是由于方言不同,说法略有差别:“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杀只鸭。……三十儿,贴门旗儿。初一,撅着屁股作揖。”

第五节 交往习俗

中原民间,乡里邻居,亲戚朋友,讲究和睦相处,礼尚往来频繁,

具有浓厚的人情味。

(一) 贺新婚

男子娶妻，亲朋好友送礼品庆贺，主家设宴招待，名为“喝喜酒”。

女子出嫁，亲戚朋友送礼品庆贺，主家设宴招待，名为“添箱”。

(二) 贺新生

从孩子出生到满月，至亲好友要给生孩子的人家送礼庆贺，称为“送月礼”，又称“送祝糜”或“送祝米”。

所送的礼品，主要是产妇的营养食品或婴儿的用品。

(三) 贺生日

贺生日，又称贺寿。中原人一般到六十岁生日才开始庆寿，称为“花甲之年”。儿女们要送寿糕、寿桃(桃形馒头)、寿糖和长寿面，还要送鞋、帽、衣料等。亲朋好友也要备礼祝寿，称为“送寿礼”。

以后除了满十之寿，如七十、八十、九十，称“大庆”，要隆重庆祝之外，六十六、七十三、八十四也要庆祝。

中原民间谚语云：“六十六，不死也要掉块肉。”所以六十六岁的寿礼中一定要送块肉。

中原民间谚语又云：“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所以给七十三岁和八十四岁的人送寿礼时，一定要有鲤鱼。因为鲤鱼能跳龙门，表示帮老人跳过这个“坎儿”。

近年来，中原祝寿，除了传统礼品之外，送寿幛、寿匾的也不少。

(四) 贺新居

盖新房是民间大事。新房盖好后，房主迁入新房时，亲邻好友要送菜、肉、喜联和其他礼品，祝贺乔迁之喜。主人备饭招待。

因建房必立灶，所以中原大多数地区都把这叫做“燎锅底”。也有些地方，如陕县称此为“踩院”。

(五) 贺节日

正月初一至初五，亲戚朋友互相拜年，互相邀请饮酒，称为“请年

酒”。

春节、端午、中秋是一年中走亲戚的三大节，女婿要给岳父送礼。春节送年礼，端午送粽子，中秋送月饼和水果。

麦收后，出嫁的农村闺女要带馒头回娘家送礼看父母。馒头为双数，一般为 20 个。娘家退回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称为“回礼”。

（六）悼 亡

有人死亡，亲戚朋友要送礼悼念。城市里大多送挽联、挽幛，农村大多送迷信品和现金。

第六节 赶会习俗

古代中原民间的贸易活动，主要是在庙会和集市上进行的。

人们在庙会上进行物物交易或钱物交易。

赶会习俗是中原民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内其他许多地方所没有。

一、庙 会

旧时，中原到处有庙宇，庙中有神，每年有一定的日子唱戏祭神。祭神时，称为“庙会”，各地信徒至庙烧香、叩头、还愿。附近百姓也来会场，称为“赶会”。会上有市场，赶会者既可看戏，又能做买卖。

有的庙会上，同时有两个戏班唱对台戏，称为“赛戏”，也称“赛会”。另有些庙会，同时有大戏三、四台，还有社火，商贾云集。

建国后，不再烧香拜佛。对庙会采取抑弊扬利、扶持改造政策，都改为物资交流会，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有些地方，虽然庙已早废，但人

们照样“赶会”。

中原各县的庙会多少不等。如罗山县每年有大小庙会 43 个，商丘县有 70 个，长垣县有 124 个，浚县有 257 个。

庙会的时间一般在该庙所奉之神的生日。如方城认为正月初七为火神生日，正月初九为玉皇生日，二月十九为观世音生日，三月初三为祖师(真武大帝)生日，四月十四为吕洞宾生日，五月十三为关帝生日，六月二十六为马王生日，各庙的庙会就分别在这一天举行。因此，不同类型的庙有不同的庙会日期。

由于同一神的诞辰各地说法不一样，因而同类型的庙其庙会日期也不完全相同。如火神庙庙会日期，在中原就有正月初七、四月初八、六月二十三、十月初一、十月二十三等多种。关帝庙庙会日期一般为五月十三，但个别也有三月十五的。

每个庙会的正会都是一天，但往往前加后续，使会期变为数日。因此中原庙会的天数有一天、三天、四天、五天、十天，甚至一个月不等。如方城有名的小顶山(小武当山)香火会，在三月三日祖师爷(真武大帝)生日举行，会期三天。二月十八城隍庙庙会，会期一个月。长垣县城的庙会自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正会为二月十九日)，会期五天，起于明朝，因有宝的人家要在会上亮宝，所以又称“亮宝会”。

再如浚县浮丘山正月会，起于明朝中叶，会期半个月，自正月十五至月底。赶会者上山朝老奶，故称“老奶会”。庙院内外，人山人海，有时多达 20 多万人。豫、冀、鲁、皖、晋的商人都来做生意。

庙会皆因庙而兴，解放后庙会性质发生变化，但会址和会期皆如旧。

二、集 市

集市是一种定期市场。它虽有固定场所，但无庙宇作依托，这一

点与庙会不同。

中原集市,大多在县城、乡镇或大的村庄。分三天一集,两天一集,天天集和节日集等多种。

一般以三天一集为多。一个地方的逢集日期,常与邻近的集市相错开。如某地的逢集日定为农历每月二、五、八,则它邻近集市的逢集日就可能是一、四、七,三、六、九,或四、七、十,以便各集市的货物可以互相流通。

两天一集的集市,又分单日集和双日集两种。

每当逢集日,远近乡民皆去贸易。在市场上,各种货物按类集中摆放。货棚、货摊星罗棋布,人山人海。

中原不少地方,一年有四个大集。其日期为正月十三,五月初三,八月十三,腊月二十三,分别为春耕、种秋、种麦、过年做准备。尤其是腊月二十三,赶集之人往往比平时多几十倍。

在中原集市或庙会的牲口市上,经纪人都不明言价格,而用手指比划着在买卖双方之间讲价钱,传消息。

经纪人常在手脖上搭一块毛巾,他与买卖双方轮流在毛巾下或衣襟下摸手指头,使对方了解要价或给价,而不让其他人知道。

如果没有经纪人,有些卖主也与买家互摸手指头,讨价还价,合则卖,不合则不言而散。

这种打哑谜的做法,由来已久,至今仍在使用的。

不同的数码,所伸的指法不同。一伸一个指头;二伸两个指头;三伸三个指头;四伸四个指头;五称“一巴掌”,即伸出一个手掌;六称“挠子”,又称“拐”,即将食指与拇指捏起;七称“捏子”,即将食指、中指与拇指捏在一起;八称“叉子”,即将食指与拇指岔开。九称“勾子”,即将食指勾起;十称“老整”,又称“一扒郎”,即翻手,或出一个拳头。由这些不同的指法,组成各种复杂的数字。

第七节 禁忌

旧时,由于迷信,或因礼教,或源于感情,往往形成禁忌。

禁忌也是一种习俗。中原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禁忌,不完全相同。

有些禁忌现在还在流行,有些已逐渐被人们淡忘。有些禁忌有积极作用,有些在今天看来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有消极影响。

一、饮食禁忌

端饭给人时,筷子不能放在碗上。

来客忌用三个菜。

过年蒸馍、包饺子,忌说“完了”,要说“满了”、“齐了”。

正月初一,忌吃药。

正月初一吃饭,不准乱说话,怕说错话,对一年都不吉利。

正月初一至初五,忌打破碗和盘子。

餐馆忌用筷子敲碗,茶馆忌用壶盖敲壶。

借用药锅熬药,用后不能送还,要等人家取回;若送时,也只能送到人家门口,不能一直送到人家家中。

二、住房禁忌

庭院布置,大门要比二门和上房门狭窄,表示能“存财聚宝”。

住宅大门不能正对着树,也不能正对着墙头。

宅地忌前宽后窄。

院中配房忌高过主房。

房前不栽桑,房后不栽柳,院里不栽鬼拍手(杨树)。

忌用槐木作门。

忌门窗高低相等,相等叫“三眼齐”。又忌窗子高于门。有些地方如林县(今林州市),民间盖房忌“眼(窗)比嘴(门)大”。

忌狗上房。

准备盖房用的屋梁,忌人从上面跨越。

旧时上梁时忌妇女观看。

住店忌住梢头店,即村边街头偏僻处的旅店,怕不安全。

三、生产禁忌

打麦场上,忌坐石碓。

堆谷、扬场,忌说“堆小”、“糠多粮少”之类的话。

生意人,每天第一份生意忌赊帐。

林县(今林州市)忌杀、忌阉五爪猪。

义马煤窑忌用鞭子,拿鞭者不准近窑口。

与生意人交谈,忌说“蚀”、“亏”、“贴”、“赔”等字眼。

旧时打井,忌妇女在场观看。

店铺忌人站门坎。

乘船忌说“沉”、“翻”等字眼,所以在中原很难找到姓陈的渡船老板。

正月初一,忌做针线。

四、人生禁忌

儿童起名忌与祖宗的名字重复。

嫁衣要双数,忌单数。

结婚时,姑不送亲,姨不接亲。

单日不办婚娶。

结婚忌寡妇、孕妇及子女不全者帮忙。

孕妇、寡妇不能为新婚夫妇做被褥,不能搀新娘,不能当迎客,也不能当送客。

婚后头一个元宵节,新媳妇忌在婆家看灯。

年纪到73岁和84岁,要少说一岁,或多说一岁,把这岁隔过去。

问年龄时,忌说“四十五”,一般都说四十六。

七(初七、十七、二十七)不出门,八(初八、十八、二十八)不回家。

孕妇忌给死人做寿衣。

妇女亡故后,忌子女触摸身体。

死于外地的人,尸体忌抬入家中。

孕妇至亲丧亡,送葬不能送到墓地,须半途而返。

儿童死亡说“没成人”,青年死亡说“殁了”,老人死亡说“老了”,皆忌说死。

五、交往禁忌

对盲人忌说瞎,说失明。

对聋子忌说聋,说耳背。

对矮个子忌说矮,说不高。

对改嫁妇女忌说改嫁,说又超一个门槛,或又走一步。

与鳏寡交谈,忌说儿女事。

晚辈对长辈,忌直呼其名。

旧时下午不看望病人。据说下午属阴,看望对病人不利。

客人在,忌扫地。

吊丧人忌兼走亲串友。

儿女亲家,一方死了,另一方忌吊丧会面。

人尸、棺木忌停放在别人家门口。

女子出嫁后回娘家,不能与丈夫同房住。已嫁女子不能在娘家过春节,不能在娘家生孩子。

旧时男女不同席,现在婚嫁中,一般仍分别迎接,分别款待。

产妇不满月,忌进别人家门。忌他人来家借东西,尤其是借盐。

带猪娃不准到别人家院子里。赶猪途中也不准将猪放进人家院里。

新娘未下轿,他人不得掀帘偷看。

公与儿媳、哥与弟媳,忌说玩笑话和戏闹。

公爹忌入儿媳卧室。

六、其 他

早起不说梦。谚云:“早起说梦,三天不幸”。

忌母鸡学公鸡叫。如发现母鸡学公鸡叫,立即宰杀。

戏班里忌说灯、伞。因灯与蹬、伞与散同音。

正月初一,忌扫地,忌汲水,忌向人家借东西,忌倒垃圾,忌向外泼水。

旧时,中原有些地方忌某些戏目。以豫南方城为例:

独树街忌唱《桃花庵》。因传说陈妙善出身独树街的名门大族,苏大人住苏营,张才是张庄人。

吴湾不唱《崇祯逼死煤山》。因造成崇祯皇帝上吊的大奸臣杜之衡是吴湾人,其后代不让演。

招抚岗忌演《刘金定下南唐》。因传说刘金定招亲就在招抚岗,她的后代不让唱。

杨楼因有金山寺,不准唱《水漫金山》。

马道有关帝庙,忌唱《走麦城》。

酒店忌唱《杨八姐闹酒店》。

哪里姓陈的多,戏班就主动不唱《铡美案》。

关于这些戏的禁忌原因,大多是牵强附会的,但当时谁若破禁就会引起麻烦。

第八节 陋俗改革

中原历史上的陋俗有缠足、敬神、信鬼、算卦、相面、看风水等。

一、缠 足

旧时,中原妇女都缠小脚。大脚妇女受歧视,难找婆家。

女孩缠足,息县从4—5岁开始,夏邑从6—7岁开始,浚县从7—8岁开始。一般缠到14岁,足才定型。

缠足时由母亲和祖母强制监督执行,对妇女身心和肢体造成严重伤害。

民国时开始放脚,但解放后缠足陋习才真正废除。

二、敬神、信鬼

中原旧时敬神成风,几乎家家都供神像。主要有天神、财神、灶君等。

村镇有龙王庙、关帝庙、火神庙、城隍庙、土地庙等。

从事不同职业的人,还供有各种行业神。

每逢初一、十五或过年过节,都要烧香叩头,求神降福免灾。

建国后,进行唯物主义教育,大力破除迷信。人们思想上的鬼魂观念逐步得以消除。

三、算卦、相面

旧时,大多数中原人都相信命运,认为祸福、疾病、何时死亡、与谁结婚等都是命中注定的。于是算卦、相面的人应时而生。他们或在城里挂牌设馆,接待顾客,或在乡下走村串户,合八字,看面相,预卜未来,破除灾星,帮人们择定“通年、利月、吉日、良辰”。虽然都是一些无稽之谈,但许多人仍然上当受骗。

建国后对算卦、相面进行取缔,净化了社会空气。

四、看风水

旧时中原人相信风水好坏之说。建房屋、选墓地都要请风水先生察勘,以求避凶就吉,人财兴旺。

风水先生,中原又称“阴阳先生”或“二宅先生”。他们对建筑方位的确定,包括对光线、温度、水源、风向、耕作、健康等方面的有利选择,有时有一定道理,但总体来说是一种迷信活动。

风水先生认为,对不利的形势可以“破”。一些旧宅子,如房屋比邻家低,则在屋脊竖一小碑亭,上刻“吉星高照”四字,就可遇难呈祥。如房子正对路口,则在对面立一石,上用朱砂书“泰山石敢当”五字,就可逢凶化吉。显然,这些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第十三章 中原语言文化和行旅文化

说话和行路,是能体现中原人生活风貌的两个重要方面。因此,语言文化和行旅文化也是中原文化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节 语言文化

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自古以来,中原人就是依靠自己的地方语言交流思想,创造文化的。

中原的方言土语、谚语、歇后语,甚至谜语,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方言土语

汉语方言差异,先秦就有。

扬雄《方言》一书,所分西汉的十三个方言区中,郑韩周、梁和西楚、魏卫宋、陈郑之东郊,都在今河南境内或涉及河南部分地区。可

见,汉代中原的方言也是很复杂的。

由于社会变化,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各地各民族语言渗透影响,中原方言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现代的方言面貌已与古代大不一样。

现代中原方言,大约是宋以后逐渐形成的。它属于北方方言区华北方言片中的中原方言小片,接近普通话,但语音声调及词汇与普通话有差异。

中原不同地区的方言也略有不同,就是同一个县,有的也分几个小方言区域。特别是豫北焦作一带,保留古入声字,自成入声调,既不同于华北方言片,也不同于西北方言片。

中原方言的地方文化特色特别浓厚。一开口就知道是哪儿人,地域特点很明显。它具有亲切性、形象性、浓厚的泥土气息以及旺盛的生命力。

语音、声调不易表达,语汇也很能说明问题,现分类略作记述。

(一) 称 谓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你	恁	后娘	娘、姨、姨娘
你们	恁们	外祖父	姥爷、外爷
我	俺	外祖母	姥姥、外奶
我们	咱们、俺们	舅母	妯子
曾祖父	老太爷	女儿	妞、妮儿
曾祖母	老奶奶	女婿	客
祖父	爷爷	男人	外先人
祖母	奶奶	女人	屋里人
父亲	爹、大、伯	猎人	打坡的
母亲	娘	接生婆	拾小孩的
伯父	大爷、大伯	丈夫	妮儿她爹、孩儿他伯
伯母	大娘	夫兄	大伯子哥
后父	大大、叔叔	连襟	一条船、一条橹、一担挑

(二) 人 体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咽喉	胡咙眼	脚掌	脚底板
腋下	胳膊肢儿	中指	三拇指
膝盖	不罗盖、胳膊把儿	肩膀	将膜头
乳房	妈儿、妈妈、密	肘	胳膊柱
赤身	赤肚猴	拳头	锤、锤头
头	顶脑、帝脑		

(三) 时 间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今天	今儿个、今个儿、今儿	刚才	江江儿
明天	明儿个、明个儿、明儿	前年	前年个
昨天	夜儿个、夜个儿、夜儿	后天	过明儿、后个儿
前天	前儿个、前个儿、前儿	上午	前晌儿
去年	年时个、年梢	下午	后晌儿
今年	基年	傍晚	擦黑儿
现在	正会儿、眼时、丈夜儿	过去	起先
中午	晌午、晌午头		

(四) 饮 食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馒头	馍	点心	果子
粥	汤	腐竹	豆筋
饺子	扁食	白开水	茶
面粉	好面	面酵子	面头
面汤	糊涂	吃晚饭	喝汤
油条	油馍	肘子	蹄花

(五) 衣 物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大衣	大氅	褥子	铺底
背心	坎肩儿	拖鞋	踏拉板儿
褂子	布衫	围巾	围脖
制服	操衣	戒指	戒篮子
被子	盖体	耳环	耳坠子

(六) 处 所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正房	堂屋	上边	高头、顶儿上
厨房	锅屋、灶火	门上	门高头
角落	杓晃	野外	漫地里
地面	脚地	渡口	埠口
台阶	圪台儿、扇台子	磨房	磨道、磨屋
卧室	屋里边儿		

(七) 用 物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家具	家使儿	锅铲	餞锅刀、铲锅刀
灶	锅头	针线筐	活筐箩儿
幕布	遮堂	门帘	门帘布搭
水桶	水管	门栓	门插板子
棺材	木头		

(八) 动物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麻雀	小鹁、山喜虫、小虫	蚯蚓	出出串
乌鸦	黑老哇、老哇、老鸱	蜻蜓	马朗、蜓蜓
喜鹊	马野鹊、麻野鹊	蜘蛛	蛛蛛
跳蚤	蛭蚤	蝉	马唧鸟子、马唧了
蛇	长虫	蜥蜴	蛇出旅儿
青蛙	水鸡	啄木鸟	叨木信
蝙蝠	夜鳖虎儿	蚂蟥	马鳖
壁虎	蝎虎	蟋蟀	蚰蚰儿

(九) 家畜、家禽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牛	欧	牛发情	漫群
公牛	犍子、牯欧、老犍头	狗发情	走窝子
母牛	牯欧	猫发情	叫春
公马	儿马、叫马	猪交配	打圈儿、跑圈儿
母马	水马、骡马	鸡交配	压蛋儿
公山羊	骚胡	羊交配	撵羔、跑羔
公绵羊	圪得、圪羝	狗交配	恋蛋儿
母羊	水羊	牛交配	牵接儿
公驴	叫驴	驴马交配	牵驹
母驴	草驴	牲畜产仔	浆、勃
公猪	牙猪	公猫	郎猫
母猪	草豚	母猫	女猫、咪猫
种公猪	郎猪	母鹿	草鹿
羊发情	引草	公狗	牙狗
驴发情	骑骡	鸭子	扁嘴
马发情	掉线		

(十) 气 象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太阳	日头	月亮	月奶奶
雷	忽雷	阳光下	太阳地
虹	将	冰柱	琉璃
闪电	火闪	冰雹	冷子

(十一) 农 事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掘地	刨地	甘蔗	甜秫稽
高粱	秫秫、桃黍	高粱秆	黍秆、秫秸
玉米	玉桃黍	玉米芯	包谷芯、包谷瓢
花生	罗生儿	杏	横
辣椒	秦椒	南瓜	倭瓜
李子	灰子	轮作	调茬
荸荠	地梨	套种	套庄稼

(十二) 其他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逃学	赖学	豁拳	猜枚
娶亲	接老婆	神像	神胎
出嫁	出门子	木偶戏	独台戏、玩猴头
抖空竹	抖地犛牛、抖牛	生病	不得劲
悬挂	滴溜	小孩打架	格气
谈天	喷空儿	卖能	圣蛋
剩下	卯下	故作阔气	烧包
风筝	豪	野蛮	二求、二旦、二百五、 生坯儿
讨厌	格意	愚蠢	差窍
羡慕	眼气	蹲	圪就、姑堆
招牌	幌子	外行	白脖
发霉	丝气	发呆	癔怔
包赔	包管来回	骂人	绝人、卷人
赖帐	黄帐	利索	郎利
称一称	吊吊	虚张声势	咋咋虎虎
怎么	咋着	不值得	哥不住
不灵活	死相	说梦话	发吃症
恰好	看好	性情鲁莽	二杆

(续表)

普通话	方 言	普通话	方 言
根本	就弯儿	额头	囱门头
躺下	挺下	没关系	没啥子
估计	约摸	办事吃 亏、倒霉	憋气
吹唢呐	吹响器	老婆	秀儿
试一试	样当样当	雷厉风行	虎虎腾腾
可以	中		

二、谚 语

谚语是民间流传的一种充满智慧和情趣的语言。简练通俗,意义深刻。

中原谚语是千百年来,中原人民生活经验的总结,虽非成套理论,却很有实用价值,是重要的知识财富,文化色彩亦浓。

(一) 气象谚语

蚂蚁搬家,大雨哗哗。

厨房不出烟,必定连阴天。

人黄有病,天黄有雨。

水缸穿裙,大雨来临。

先毛(毛毛雨)不下,后毛不晴。

蚂蚁搬家蛇过道,三天以内大雨到。

东风头大,西风腰粗。

春雾黄风夏雾热,秋雾连阴冬雾雪。

(二) 农业谚语

犁细耙光,压瓷保墒。

犁地不耙地,等于蒸馍跑了汽。

一个坷垃一张嘴,一天要喝一碗水。

高粱地里卧下牛,还嫌高粱种得稠。

小豆地里卧下鸡,还嫌小豆种得稀。

稠谷子稀麦,坑死老伯。

苗不别是草。

干锄壮,湿锄旺。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九成收。

花地花,麻地麻,茄子地里怕坐茬。谷子玉米大调茬,十年瓜地再种瓜。

谷雨前后,点瓜种豆。

头伏萝卜末伏芥,中伏里头种白菜。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

麦怕胎里旱,人怕老来穷。

蚕老一时,麦熟一晌。

麦追黄芽谷追节,玉米追的七个叶。(施肥)

一早三分壮,一晚三分薄。(播种)

桃三杏四梨五年,枣树当年就来钱。

(三) 牲畜谚语

牲口卸了套,别拴顺风道。

马浪叫,牛浪跳,猪浪跑断腿,驴浪圪张嘴。(发情)

老配早,少配晚,正口配中间。(配种)

遇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

草膘料力水精神。

养猪无巧，圈干食饱。

(四) 经商谚语

一分利钱吃饱饭，十分利钱饿死人。

生意好做，伙计难合。

名不出，利不来。

(五) 人生谚语

兄弟齐心金不换，妯娌齐心家不散。

骡大马大值钱，人大不值钱。

染房里倒不出白布来。

打人别打脸，揭人别揭短。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

不怕慢，就怕站。

无事不惹事，有事不怕事。

宁吃过头饭，不说过头话。

宁买吃亏物，不买便宜嘴。

吃不穷，喝不穷，打算不到一世穷。

头生儿亲，老生儿娇，挨打受气正当腰。

一正压百邪。

一人不进庙，二人不观井。

不怕先告状，就怕后没理。

饱时给一斗，不如饿时给一口。

响水不深，深水不响。

穷站街头无人问，富住深山有远亲。

力气是奴才，不使不出来。

不怕无能，就怕无恒。

学艺终身富，是艺不亏人。

积钱千万，不如一技在身。

上炕是夫妻，下炕是君子。

娇生惯养，不往好长。

严是爱，松是害，不教不说就变坏。（教子）

（六）保健谚语

病怕无名，疮怕有名。

只要心宽，不要体宽。

坐卧不迎风，走跑要挺胸。

三分吃药，七分养病。

不生气，不犯愁，无病无灾到白头。

三、歇后语

歇后语是一种诙谐而形象的语言，中原称为“坎儿”或“吊杆话”。

中原许多歇后语，新鲜活泼，幽默生动，文化内涵十分丰富。这里略举数例。

城隍奶奶害喜——怀的鬼胎。

城墙上跑马——净绕圈子。

脖子里围裹脚——臭一圈。

孔夫子搬家——净书（输）。

俩哑巴亲嘴——好得没法说。

一个指头和面——净捣。

门神卷灶爷——画（话）里有画（话）。

旗杆上插鸡毛——好大的掸（胆）子。

客厅里挂狗皮——不像画（话）。

老鼠钻进书箱里——咬文嚼字。

膝盖上钉掌——离蹄（题）太远。

野地里烤火——一面热。

鞋壳里长草——荒(慌)了脚了。

木匠带枷——自作自受。

拄拐棍下煤窑——一步步捣(倒)煤(霉)。

四、谜 语

猜谜是中原地区传统的文化游艺活动。田间地头,灯前月下都可以进行。

中原民间,老人们常通过猜谜,使儿孙增长文化知识,增强聪明才智。叔嫂、平辈之间猜谜,多含玩笑性质,常见“荤破素猜”。表面很“荤”,实际谜底平常。

中原谜语巧妙形象,通俗易懂,朴实押韵,常为四句、二句或一句一谜。它有较强的稳定性,是前人创造后传承下来的,很有生命力。

(一) 字 谜

四十八个头。(打字一:井)

一口咬掉多半截。(打字一:名)

有马跑遍天下,有水能养鱼虾,有人不是你我,有土能长庄稼。
(打字一:也)

(二) 动植物谜

奇奇怪,怪怪奇,站着反比坐着低。(打动物一:猫)

天上有个长不老,地上有个吃不饱,河里有个洗不净,田里有个不净草。(打动植物四:小虫即麻雀、鸡、泥鳅、灰灰菜)

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个白胖子。(打植物一:花生)

(三) 器物谜

四棱头,大扁嘴,腰中长眼,眼里长腿。(打物一:斧子)

二人一样长，出入总成双，山珍和海味，都让它先尝。（打物一：筷子）

姐妹二十人，个个穿白裙，红笔头上点，全身化灰烬。（打物一：香烟）

（四）地名谜

自相矛盾。（打地名一：开封）

白口依山尽。（打地名一：洛阳）

床下破劈柴。（打古地名一：南阳府）

第二节 行旅文化

一、道路

中原古代道路，包括陆路和水路两种，这里主要指陆路。

中原古代陆路，有官道、乡间道路和村道。

官道类似现在的省道或国道。因是官员骑马坐车走的路，故称“官道”。

中原古官道，商周时就有了。由于中原地处我国中部，从来就是交通要冲。由郑州经洛阳、三门峡至潼关的古道，是历史上我国东部地区进入关中的主要通道。经方城缺口、南阳盆地进入湖北襄樊的“南襄夹道”，则是我国古代南北交通的重要通路。

许多古官道，已演变为今天的公路。它们在建国前主要是土路，本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为沙石路，七十年代以后成为柏油路。

乡间道路，中原有的地方又称为“大路”，即大车路，是联系乡镇之间的牛车道。建国前为土路，七十年代以前大多还是土路，八十年

代起,有些修筑为沙石路。

村道是村与村之间的道路,是人们赶集和下地劳动的路。

二、行路方式

(一) 步 行

旧时,中原男子走亲访友、赶集等,主要靠步行。有些青壮年可日行百里。

(二) 骑 驴

旧时,中原闺女、媳妇回婆家、走娘家,常骑驴。驴有自养的,有借的。骑驴翻山越岭方便。驴上有鞍有镫。

有时,妇女抱着小孩骑在驴上,丈夫牵驴或跟在后面。

有时,新媳妇骑驴走娘家,打着小伞,臂挎红包袱,很别致。

外地客商,亦可雇赶脚毛驴。

骑驴现象在本世纪六十年代还有,八十年代已罕见。

(三) 骑 马

旧时骑马都是有钱的人家,一般人家只能养驴,养不起马。因此,骑马的人没有骑驴的多。

不同牲畜,有不同的骑坐部位。中原民谚云:“驴骑后,马骑前,骡子骑在正中间。”

(四) 坐 车

历史上,中原代步的车辆有人推的独轮小车、太平车(牛车)、马车等。

五十年代以前多牛车,七十年代以前多马车。八十年代以来,自行车、手扶拖拉机、摩托车、汽车等的使用,日益普及。

(五) 坐 轿

古代中原人行路除步行、骑牲畜、坐牛马车之外,官员和富人外

出时常坐轿。

轿子有二人抬、四人抬和八人抬三种。

有时用两根木杆或竹竿绑上圈椅，坐人后由两人抬着。这种简易的轿子，中原称为“兜子”。

建国后，作为客运工具的轿子已被废除。

三、行路习惯

（一）步行带棍

旧时，中原山区人出门，手里常拿根棍子。这是因为翻山爬坡时拄棍方便，也能打狗和防卫护身。

（二）过河防洪

中原山区河流，暴雨后一般涨势凶猛。夏季沿河沟行走，需观察上游天气变化。若不注意，山洪下来时，会来不及脱身。

（三）晚上路早投宿

旧时，中原许多地方的深沟、河滩、桥涵、古庙、旷野等处，常有土匪劫路。土匪常在早上、中午、傍晚地里干活人少时出动。他们对外地人一般劫财不害命，对本地人却劫财又害命（因怕走漏风声）。

因此，过去中原人走路，注意晚上路，早投宿，不住孤店、古庙，尽量结伴而行，逢人不讲真话。

尤其在腊月里不摸黑走路。外出做工经商的人，腊月里带积蓄回家过年，这时劫路的最多。

（四）出门择日子

旧时，中原除有“七不出门，八不回家”之说，豫东等地还有“初一、十五、二十三，太平老爷不出安”之说。

一般人出门，尤其是妇女，都需要注意梳洗修饰，保持整洁。

四、旅 店

旧时,中原旅店主要有干店、车马店、旅客店三类。

干店有房屋供旅客做饭、住宿,粮食和被褥一般由旅客自备。

车马店留车马住宿,供应草料。跟随人员另有宿舍。

旅客店有懒躺铺和单人间两类。懒躺铺即通铺,每人席子、被褥各一条。单人间的特点是“小屋高铺,枕头夜壶”。有茶水、灯烛,伙计伺候。

五、运 输

(一) 人 挑

人挑是中原古代最简单的运输方式。专业挑运货物的人,被称“挑夫”或“挑子手”。箩筐、扁担是他们主要的运输工具。

每逢灾荒,常见丈夫挑两个花眼筐,一头坐小孩,一头装行李,妻子跟在后面逃荒。

(二) 畜 驮

建国前,中原山区用畜驮的方法运输,很普遍。所谓“帮口骡子队”,在山区维系货物运输数千年。

(三) 船 只

中原古代水运发达,鸿沟、通济渠、汴河等人工运河和许多自然河道都可以通航。金元以来,由于黄河泛滥,许多河道被淤平,水运衰落,但豫南淮河、南阳唐白河、豫北卫河的水上运输并未停止。

(四) 车 辆

古代中原运输车辆主要有独轮车、牛车、马车等。

独轮车又称红车。春秋时就有,沿用了几千年。木制独轮,双辕。

一种中间起脊,脊两边装货;另一种无脊,车平面装货。这两种式样的独轮车,都由一人双手推双辕前进。若车上货多,可在车前拴一绳,再加一人拉车。

牛车,单辕,木轮,双牛拉。东汉时就盛行,二千年来一直为中原农村大型运输工具。七十年代后被机动车辆代替。

马车,双辕,一马驾辕,两马拉套。出现于商周时期。古代多用铁边木轮,五十年代以后改用胶轮。

建国后普遍使用架子车。上盘为木质,下盘为铁圈胶胎双轮,人在车前持双把拉。

七十年代以来,四轮拖拉机和汽车,也广泛用于民间运输。

六、通 讯

旧时,外出人员与家中的音讯来往,主要通过捎信、捎物、专人传递实现。

捎信,一般是带口信。被托的人不能拒绝,捎忘了要道歉。被托的人也不能托别人代转,以示不失信于人。

捎物,要托信得过的人。被托者一定要捎到。

专人传递是自家派人骑马或步行,将消息送到。

后 记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得到多方面帮助。其中曹娟玲、单洲杰、单洲伟、王香梅同志在整理资料、抄写稿件方面,出力尤多。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单远慕

1997.5.1.